

# 還原

1957

魏紫丹 著

五七學社出版公司



## 作者簡介

魏紫丹，本名魏立言，1933年生于河南省安陽縣，現居美國。

1951年，參加工作，任安陽市二中數學教師。

1956年，調安陽四中任數學教師兼自然科學教研組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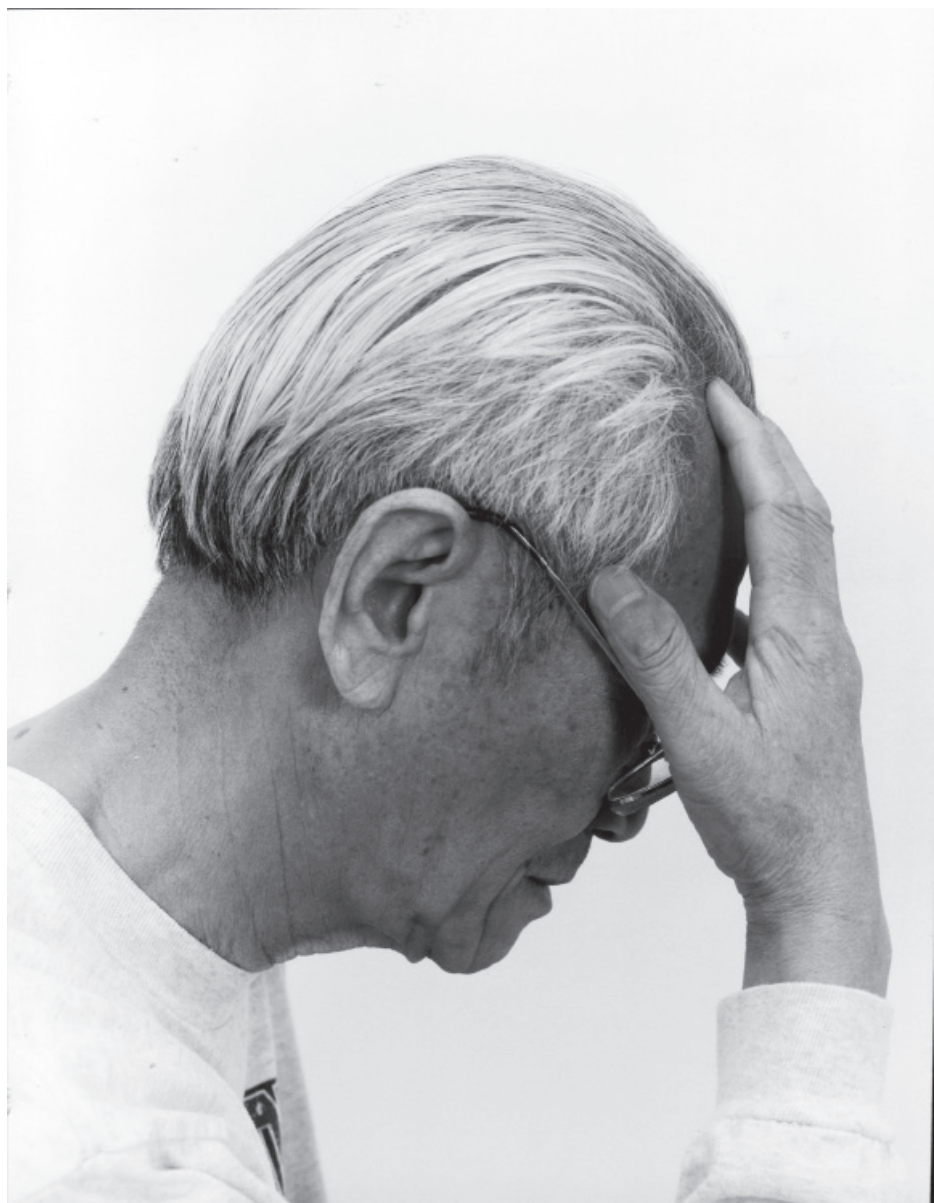
1957年，被劃為極右派分子、死硬派，受到“開除公職、勞動教養”處分。中共支部書記劉廷俊在宣布後又狠狠加了一句：“是第一類處分！”看來是大快人心！

1958--1962年，在河南省勞動教養，先在内黃縣白條河農場、後在西華縣五二農場。

1978年，獲改正，恢復工作。在回答“黨給了你第二次政治生命”時說：“是的。那我的‘第一次政治生命’哪裏去了？”這一回那些喝了右派分子的血，在反右後入（共產）黨、提幹的積極分子，自不會像反右那麼興高采烈、那麼大快人心了。

1993年，在教育學院教育系主任崗位上退休。

2007年，分別參加了在美國普林斯頓和洛杉磯召開的“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有關於教育學和政治哲學方面的著作和論文多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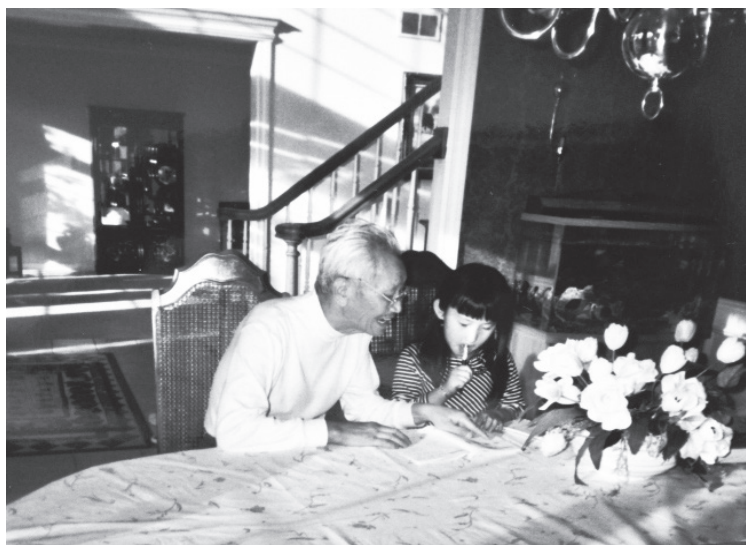
作者魏紫丹教授



作者夫婦



作者夫婦攝于 1958 年



作者與孫女



2007年6月紫丹與林希翎留影（張先痴攝）



魏子丹與辛灝年合影於芝加哥



(左起) 魏紫丹、遇羅文、武宜三、陳奎德相聚華盛頓

作者攝於芝加哥





作者與方勵之夫婦



作者（右）與俞梅蓀（左）、戴晴（中）





作者與章立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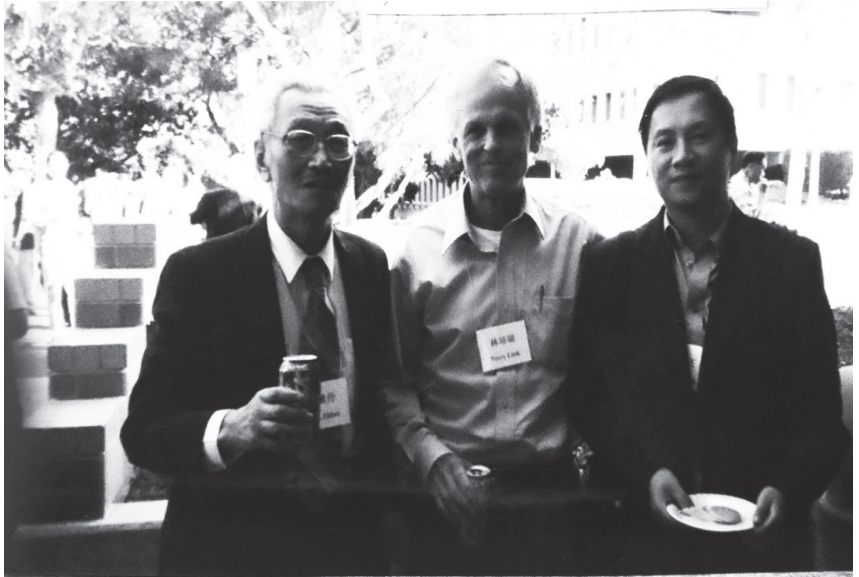
作者與郭羅基



作者與巫一毛



作者與鄭義



作者與林佩瑞、王丹合影



自左至右：葉永烈夫婦、魏子丹、錢理群、丁抒都是研究反右運動的學者



作者和遇羅文



2009年作者參加反右5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洛杉磯），和與會的林希翎等合影

# 還原一九五七

魏紫丹 著

五七學社出版公司

香港・2012

作者：魏紫丹  
發行人：武宜三  
排版設計：葉子

出版社：五七學社出版公司  
地址：6H,Blk.12,Ph.1,Kingswood Villas,HongKong  
電話：852-95733657  
電郵：wuy099@gmail.com  
出版社牌照號碼：39763663-000-09-08-3

香港總經銷：香港田園書屋  
地址：香港九龍旺角西洋菜街 56 號二樓  
電話：852-23858031  
傳真：852-27702484  
<http://www.greenfieldbookstore.com.hk/>

總經銷：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880 號 14 樓  
電話：886-2-82275988  
傳真：886-2-82275989  
<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2013 年 1 月  
國際書號：978-988-15588-6-2  
定價 HKD：120 元  
TWD：500 元  
USD：20 元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五七學社出版公司調換。

## 題 解

本書原名《還原 1957》，後又想改爲《還原 1957 論》。其所以多添一個“論”字，是考慮到，本書不是單純在寫 1957 年那段反右派運動的歷史，而是還要對那段歷史作理論的思考，是史、論并舉，論從史出。後聽從好友辛灝年先生勸告，說是不用添“論”字就是“論”，無“論”而論；故而，原名依舊。

在中共奉行黑箱作業、掩蓋歷史、毀滅檔案、歪曲真相的情況下，人們在“還原 1957”方面進行了艱苦卓絕、持久的努力、掙扎，做出了得來不易的巨大成績。在此基礎上，我寫出此書，主攻目標就是要揭示反右派運動的罪惡本質。史論是更高層次上的史實，是重在“本質”的實。我之所謂“作理論的思考”者，即期望能夠達到由表入裏，認透運動及其發動者的罪惡本質之目的。

灝年還勸我在內容上作一些大的刪簡，這一點倒很乾脆，我做到了大刀闊斧。另外在結構上作一些改組，把五篇合并爲三篇，達到“鳳頭、豹尾、豬肚腰圓”。可惜後一點沒有像前一點那樣如願以償，祇能說是差強人意。原因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細作下來工作量不小；碰巧我這一陣一面忙着背誦公民入籍的試題，同時又想趕在 5 月底以前，利用紀念反右派運動 55 周年學術會議的機會，能出版此書以就教于來港參會的朋友們。于是就日夜兼程拼命忙，結果引起腦子打陣兒劇痛。真是不服老不行，畢竟歲數不饒人啊！又湊到一起，屋漏偏逢連夜雨——電腦欺我太外行，不知怎麼一點竟把修改了半天的文件全部消失了！雖然苦惱得莫名其妙，但千“蹶”仍“振”，決不灰心喪氣。想到這裏，我不能不感謝共產黨在我的人生中讓我經受了“屢戰屢敗”的摧毀性鍛煉。我跟難友開玩笑說，當我輕于鴻毛時，你作爲我的生前好友給我作悼詞，可以這樣說：“魏紫丹先生是失敗的一生。”我不像人家偉大的共產主義

# 還原 1957

---

戰士那樣：“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追求真理的一生，爲人民服務的一生……”



## 《還原一九五七》序

辛灝年

魏紫丹教授是一個“右派”，而我是一個“右派之子”。

我們曾經“同是天涯淪落人”，今日又“同為海外流亡者”。雖同屬“自我流放”，蓋因我們都是“不要共產黨的人”，而不是“共產黨不要的人”，所以，我們“同氣相求”，自然是“相逢何必曾相識”。當然，“要共產黨的人”和“不要共產黨的人”；或者是“共產黨雖不要你，你却要共產黨”，這裏面的區別和講究就大了。因為它決定了我們在海外的感情趨向，基本立場，行為方式。這對於在海外為人與交往，固然是一種界限；而對於一對志在“還原歷史”者，其中的關係便尤其要緊。雖然我要辨識“誰是新中國”，他要“還原一九五七”，但我們注定是要“順途同歸”的。

不過，促使着我們相識的，連接着我們的志向的，加深了我們友情的，還是海外的一家完全獨立的民間歷史文化季刊——黃花崗雜誌。我是這個雜誌的編輯義工，魏老則是這個雜誌的主要作者。我從來稿中，發現了一個情致超然、文筆生動、思想深邃的“老右派”，他則在與我聯系稿件的交往中，發現了我這個壓根兒就“不承認共產中國是新中國”的右派兒子。我們欣然相識，不僅在對一九五七那個“悲慘世界”的回首中，有着共同的語言；而且在對中國現代歷史的辨識上，一起指斥那個“顛覆了共和、復辟了專制”的馬列中國，絕不是“新中國”。于是，“還原一九五七”這個題目，就首次出現在黃花崗雜誌上，我當時為它寫下的按語便是：“右派分子魏紫丹教授的新著《還原一九五七》一書，無疑會成為一部真正還原了‘一九五七’的學術著作。其充滿着學術精神的嚴密論證，特別是他對馬列主義、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毫無戀情和決絕之慨，猶將他對‘一九五七’的痛心研究和艱難追述，推升到了一個更其純淨和高遠的歷史境界……”（《黃花崗雜誌》

## 還原 1957

---

2005年第1期》……”

我與魏老終於成了忘年交。這些年來，我總是認真閱讀他的大作，幾乎每一次都伴隨着我由衷的讚賞和嘆息。他則因為對我那本歷史書的滿懷贊成，總是在想着和寫着與之相關的文章。後來，他那晚來的文學興趣，竟促使着他開始閱讀和研究起我早年的小說來了，甚至和另一位因寫文章公開批評我，却與我成了朋友的大陸教授一起，接二連三、頗費周章地為我三十年前的小說，寫了好幾篇文學評論，可謂字字在理，句句真情。我將它們壓了很久，才負疚似地將它們發表出來。因為我一生從未請人為我寫過一篇“吹捧”的文章，在國內共產黨的那個文壇上，自己向來不屑于此，別人也根本不敢碰我。猶如當年一位時髦的評論家所言：“給他寫評論，就是給自己找麻煩。”是魏紫丹教授才為評論我的小說開了這樣一個頭。而他倆都因沉浸在對時代和生活的反思之中，又置身于自由的海外，所以寫得都相當地透徹與深沉。這對遠離故國，早已背離昔日文壇的我，雖是一種慰藉，還是給了我晚年回歸文學之後，能夠繼續“上下而求索”的信心。

我與魏老的友情，是“隔代”情，也是“忘年”，且是日見其深。他對我的關切，甚至是對我的偏愛，總是讓他對我時刻充滿着憂心，時時在我的心中激起重重的溫情。前一向，我因病而未與他聯繫，他因擔心我而寢不能安，信中的憂心悲切之詞，令我心酸。而我因為研究、寫作、講演和編雜誌，四處奔波，太忙也太累，與他的聯繫也就少了。這些年，我一直都沒有為他做過什麼，內心裏雖然對他充滿尊敬與愛戴，却時時感到自己對他的欠缺。所以，當他要我為他的“還原一九五七”這部巨著寫序時，我雖然覺得難負重任，但是，我與他十年的友情，我與他共同的使命，還有我與他“右派與右派之子的緣份”，都使我不能推却、也不敢推卸。

魏老從發表志在“還原一九五七”的某些篇章算起，于今已經整整八年了。八年來，他經過不懈的努力，用“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的精神，特別是懷着對歷史忠貞不二的意志，懷着對在“一九五七”年所有遇難者的痛苦深情，懷着他對我們民族的拳拳之心和深沉期望，終於就要出版他的巨著“還原一九五七”了。

對魏紫丹教授的這部巨著，我將有一篇實實在在的專論會發表出來。在這篇短序中，我祇想簡略地說，這部巨著的不凡之處，就是它確實達到了那種“純淨和高遠的境界”，而此一境界的三個明顯特徵，就是——“還原的

學術性、還原的真實性和還原的真理性的”。

其學術性的表現，便是明晰的哲學高度。而構成這一哲學高度的，就是他為“還原一九五七”，所付以的“高屋建瓴的哲學思考”，所獨自建構的“邏輯嚴密的方法論體系”，還有他那種“貫徹始終的歷史感”。正是上述三個特徵，才體現了這部巨著深刻的思想性和悠遠的歷史性。而思想性才是學術性的靈魂所在，歷史性是才學術價值之真正體現。

其真實性的表現，一是“主見在胸，着眼于史”，以親身的經歷，真摯的感情，誠實的反思，來“還原一九五七”。二是以“轉益多師是汝師”的精神，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厘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三界之內，又能跳出三界之外”，從而使這部著述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了“同一”的境界。為“還原一九五七”留下了一座思想和史實并豐的裏程碑。

其真理性的卓然表現，則是集中在他對共產黨及其政治制度的徹底認識和全面批判上。這個認識和批判的原則，就是還原一九五七年“真右派們”對於民主和自由的熱情呼喊，對於崇拜馬列教條、毀我民族國家的痛苦指斥，對於一黨專政和“黨天下”的猛烈抨擊……將至今五十年來不復再現的知識分子群體性“覺醒”和“絕響”，重新予以論證和褒揚，以激勵今日的國人，能夠以“前已有古人，今當有來者”的精神，激勵和鞭策自己……

魏紫丹教授多年來矢志于“還原一九五七”，沉潛于“還一九五七”，皓首窮經于“還原一九五七”，實非為一己之痛和一己之冤，他如赫爾岑一樣，“向後看，是為向前進”，是為我們民族的出路和前程。誠如他在“還原”一書中談及中國前途的慷慨陳詞，就是：“在宏觀上，革命之外無出路！”

魏紫丹教授之所以對現存的專制統治和專制秩序，有着如此的決絕之心，是因為在中國三十餘年來“雙重思想解放”的道路上，他一直行走在“人民自身思想解放”的大道上，縱然風雨如晦，他也絕然地不屑于另一條要“助共改良”的所謂思想解放路綫；同時，還因為他將“還原一九五七”納為中國大陸民間歷史反思運動的一個環節，既要從“一九五七”出發來還原歷史，又要和人民一起，在對百年中國艱難歷史的反思中，重新認識腥風血雨的“一九五七”之所由來。這就不僅將他錘煉成了一個卓犖不群的“摘帽右

## 還原 1957

---

派”，又將它磨礪成爲一位堅如盤石的“自由鬥士”，正在“九死而不悔”地爲他自己的民族和人民的未來艱苦奮求着。

一九五七，是我們民族的一場巨大悲劇。真正地還原這場悲劇用血腥所包裹着的真實性和真理性，才可能使我們的民族擁有未來。所有在“誠意正心”地還原著一九五七者，都將功不可沒。而魏紫丹教授却以其卓犖不群和堅如盤石的還原精神，以其還原的高度、廣度和深度，實爲今人和後人留下了一位“卓越右派”的楷模，一部浸透着還原意志的巨著。誠如我在爲他“還原一九五七”的文章所寫的按語所說：“魏紫丹先生……確實將中共發動的那一場‘意在進一步整殺全中國知識分子，旨在全方位施行絕對思想統治’的政治運動，講清楚了。他指出，中國從此徹底地喪失了思想，中國的知識界從此成了共產黨統治思想機器的一個部份，它的罪惡源遠流長，甚至直到今天還在控制着相當一部份知識分子的靈魂，特別是那些在共產黨思想統治下既自號爲‘自由派’、又自稱是‘精英’的知識分子們……。”（黃花崗雜誌 2007 年第一期）

然而，祇因爲魏紫丹們還在，何況“前已有古人，後更有來者”，可以相信，中國知識分子們“魂兮歸來”的日子，中華民族“魂兮歸來”的時代，畢竟已經不會太遠了。

此序爲魏紫丹教授的巨著《還原一九五七》而寫，亦爲祝賀魏紫丹教授的八十壽辰而作。

## 目錄

題解	魏紫丹
序	辛灝年
上篇：對反右派運動的哲學思考	1
甲：思索	3
一，“兩類矛盾”說，非治國之正道	3
二，三條戰綫·兩類矛盾·一個目的	15
乙：考證	33
一，毛澤東的“雙百方針”考	33
二，毛澤東“引蛇出洞”考	41
三，毛澤東的“實事求是”考	81
丙：認清反右派運動本質應遵循的方法論原則	93
一，掌握總、分原則	94
二，施行內、外原則	99
三，追蹤前、後原則	104
中篇：對反右派運動的探源溯流	109
甲：探源	109
一，反右“必然”論	109
二，反右“陰謀”論	113
三，外星球的“劉鄧陰謀論”	136
四，“半陰半陽”說	139
五，“變卦說”中衆說紛紜	141
六，毛澤東親口承認了：“陰謀說”	193
乙：溯流	211
一，右派言論大觀	215
二，右派言論的歷史定位	334

# 還原 1957

---

丙：流毒·····	368
一，大躍進是反右派運動的第一個惡果·····	368
二，對比反右派與反右傾·····	388
三，“反右”與“文革”·····	413
下篇 實事求是，總結歷史的教訓·····	451
甲：“實事”（追求真相）：認清運動的本質是接受教訓之本·····	451
一，運動的一方是右派，為人權大鳴大放，右派就是人權派·····	451
二，發動反右派運動的一方是極權派，給中國帶來一場人權浩劫·····	453
三，這場浩劫使運發動者的本質對象化、直觀化、展開化·····	455
四，壞人與壞制度的關係·····	482
乙：“求是”（接受教訓）：人權覺醒是接受教訓的基本尺度·····	503
附錄一：6月8日今又是 ——駁毛澤東為《人民日報》所作社論：《這是為什麼》·····	512
附錄二：談談右派的正名問題·····	516
附錄三：怎樣理解陳澤昆老先生？ ——讀《從老報人陳澤昆說到民間辦報》·····	519
附錄四：不堪回首憶往年 ——讀《反右研究文集》有感（之一）·····	525
附錄五：還原反右真相 ——讀《反右研究文集》有感（之二）·····	529
附錄六：讓歷史記住這一年：一九五七 ——讀《反右研究文集》有感（之三）·····	534
附錄七：尤甚于“莫須有” ——讀《苦難的歷程》有感·····	539
附錄八：壯哉奉孝！ ——讀《夢斷未名湖》·····	544
附錄九：《格拉古軼事》一書的價值所在·····	548
附錄十：理達：贊辛灝年先生的《〈還原 1957〉序》·····	566
附錄十一：我劃右派的全過程·····	569

## 上篇：對反右派運動的哲學思考

首先我們要來一個正名：你要是談話，或寫一般的文章，可以說“反右”或說“反右鬥爭”，但，如果你寫學術論文，因為它是科學研究，概念就要求準確無誤。“反右”可指“反右傾”；“反右鬥爭”可指思想鬥爭，可指和風細雨的整風學習；而“反右派運動”是特指1957年那場針對知識分子的、席卷全國的、狂風暴雨般的政治大迫害運動。先作此規範，雖本書在以後論述中可能也有簡使用法，但理解上祇有做“反右派運動”一解，才可以免除歧義。

毛澤東說，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哲學。他對馬克思主義，“祇取它四個字，‘階級鬥爭’”。他一生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始於“其樂無窮”，終於“不亦樂乎”。而把鬥爭胡謔成哲學的、最基本的是兩篇：《實踐論》和《矛盾論》。前者是鬥爭的認識論原理，後者是鬥爭的方法論原理。而“鬥爭”最廣泛、最經常的實踐形式，就是搞運動。行業的、地區的、全國的運動，接連不斷。有許多時候是這個運動尚未結束，下一個運動已成不速之客，比如農村的四清運動尚未掃尾，文化大革命如迅雷不及掩耳，風吹樹、風滿樓、風起雲湧、蜂擁而至，弄得有些拔腿較慢的四清工作隊都出不了村。總之，正如農民對“運動”的描述：“這兒運動，那兒運動，全國規模的大運動。大運動，小運動，運動裏頭套運動”。“先整黨，後整團，然後再整老社員。”“馬頭接馬尾，馬嘴咬馬腿，運動不斷頭，賽過洪水和猛獸。”運動就成為鬥爭哲學的展開式，同時也成為毛澤東本質的展開式，“因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還有直接現實性的品格。”本書就是通過對諸運動之一的反右派運動的哲學思考。透過復雜紛紜的亂象，特別是毛共散布的雲遮霧罩，揭示出毛共極權是如何採用“恐怖”與“謊言”兩手都要硬，以運動治國，來統治全國人民，特別是對知識分子進行靈魂消滅和肉體迫害（也包括消滅）

的。事後，鄧小平總結反右歷史教訓，一曰：“正確的、必要的”，二曰：“擴大化”。別人較真，說：“難道 99% 以上都劃錯了還叫‘正確的’和祇是‘擴大化’嗎？”有好多單位全都改正了，一個沒留，例如：“1957 年的北京大學師生之中竟有 1500 人因‘反右擴大化’而蒙冤羅難，終於被開除公職或學籍，發配于窮山惡水、荒原大漠之間亡命了之，22 年後，又把這‘擴大化’了的 1500 人無一例外地平反，此就北大來說：‘擴大化’已‘擴大’到無一正確全盤錯誤的程度！”（張元勛《北大一九五七》，明報出版社，頁 2）鄧小平、共產黨給鼎鼎大名的北大數學系師生出了一道數學難題：“貴校到底‘擴大’了幾倍呢？”（哪怕能算出個天文數字也行，甚至祇要能由十個阿拉伯數字符號組成個任意什麼數都行。）豈不知，共產黨鬥爭哲學的精髓就在這裏，叫做：“擴大化因為是必要的，所以就是正確的。至于什麼叫做‘擴大化’，則完全不必在意。”你祇用想想看，共產黨搞的所有運動，爲了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無論黨內的，還是黨外的，有一次不是“擴大化（包括無中生有）”的嗎？是整肅 AB 團，還是延安整風？還是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反胡風、肅反……？至于具體到這次反右派運動，你問爲什麼要擴大化呢？因爲祇有如此才能達到一箭三雕之目的：一是以言治罪，消滅獨立思想和獨立人格；二是鄧小平說的打擊的人數太多，打擊的分量也太重（當然他這是假惺惺。他手上沾滿了知識分子的鮮血！包括後來鎮壓北京天安門“八九民運”。）因爲當時，惟其如此，全國才能處處都有黥面的反面教員，讓人人恐懼填膺，個個心裏住進公安局派出所；自然的結果，便是三，先說黨內：有識之士，免開尊口，“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再說黨外：全國的工人罷工、農民退社、學生鬧事，所有“人民內部矛盾”，都乖乖地自動化解。事實證明，毛主席運用鬥爭哲學來運動群眾，已達到出神入化之境界，論述鬥爭哲學則是夫子不言、言必中；果然是“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全國人民團結一致、衆口一詞，一起大聲高唱《社會主義好》！歌聲傳遍大江南北，聽啊！它是多麼地豪邁、嘹亮、激越，聲情並茂！我要指出歌詞中的兩句：一句是“全國人民大團結，掀起了社會主義建設高潮，建設高潮。”另一句是“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就是反右的輝煌戰果。

社會主義建設高潮，有如不盡長江滾滾來！反右勝利的政治之花，結出了大躍進農業衛星上天、鋼鐵元帥升帳的豐碩的經濟之果，創造了人類史上



讓人目瞪口呆的奇迹。人民群眾從來也沒有像現在這樣精神振奮，意氣風發，鬥志昂揚。毛澤東最完美地體現了他在《實踐論》中提出的真理標準：“理論的東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觀真理性這個問題……應用理論于實踐，看它是否能够達到預想的目的。”他預想的目的達到了。往下的實踐，是歷史的下一章，請參閱我發表于《觀察》網上的文章《大躍進的發生是反右運動的第一個惡果——對大躍進政治本質思考之一》；在《觀察》連載至“之七”：《毛發動大躍進目的何在》。“之八”是：《大躍進是人類史上最大的人權災難》，載于《民主中國》。

## 甲：思索

### 一，“兩類矛盾”說，非治國之正道

整個來說，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下簡稱《正處》）重在“處理”，是一篇指導實踐——具體說，是對反右派運動量體裁衣、從發動到處理的文章。從“處理”着眼，它是一篇歪門邪道、禍國殃民的東西。它的理論基礎是《矛盾論》，正如我在《〈矛盾論〉與論矛盾》一文中指出的那樣，從“理論”着眼，它的概念混淆、原理荒謬、論點站不住腳。這是我通過一甲子的切身體驗、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才作出的一項嚴肅負責的、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科學判斷。謂予不信，容我慢慢論證如下：

#### （一）爲什麼說是“概念混淆”？

《正處》提出的的第一個問題是“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它是本篇的靈魂，其中提到“矛盾”這一概念的地方有九十九處。所以不能說它是“概念混淆，矛盾百出”，用數學的準確性來說是“矛盾九十九出”。

#### 1，從定義出發，明確“矛盾”這一概念

《辭海》上的解釋是：（1）《韓非·難一》：“楚人有鬻盾與矛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之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後以“矛

盾”連舉比喻互相抵觸，互不相容。如：自相矛盾。（2）辯證法的基本範疇。指事物內部所包含的既對立又統一、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依存的關係。（3）形式邏輯上指兩個概念互相否定或兩個判斷不能同真也不能同假的關係。

從作為辯證法的基本範疇來說，矛盾的內涵有二：一曰：內部性（自相矛盾）；二曰：二重性（既……又……）。凡不具備這兩條內涵者，就都不可稱之為“矛盾”。

### 2. “敵我矛盾”不具此內涵，故非“矛盾”，實際是“對抗”。

矛盾是一個表達“我——我”關係的概念，即“自相矛盾”。但“我”的外延是可以擴展的：我——我們——我們國家、民族、人類社會等等。“敵——我”不屬於矛盾的範疇，一則，它不具有內部性，即便在空間上距離很近，但從概念上講，“敵”必在“我”外；二則，它不具有二重性，因為祇有敵我對立、敵對、對抗、衝突、分裂、鬥爭、仇恨、拼殺……你總不能說敵我同一、統一、友好、親密、團結、合作……如果既有前者又有後者，那就不是敵我了，就是化敵為友了。總之，祇要是敵，就祇能是前者。而所謂“矛盾”，必須是“既是前者，又是後者——具有二重性。”毛澤東在後來也是這樣說的：“像托洛斯基那種人，像中國的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那種人，對他們無法採取幫助態度，因為他們不可救藥。還有像希特勒、蔣介石、沙皇，也都是無可救藥，祇能打倒，因為他們對於我們說來，是絕對地互相排斥的。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沒有兩重性，祇有一重性。”（《毛澤東選集》五卷，頁497）這和我曾經例舉的“人與草有矛盾”，因為田地裏的草必須消滅才能保苗；而草地上的草又必須保留，以防土地沙漠化。但不能說“人與蚊子有矛盾”：蚊子祇能消滅，不能既消滅又保留——因為不具二重性，所以不能說成是“人與蚊子有矛盾”。原來，矛盾“在本來的意義上來說”是具有兩重性的，但毛所妄指的這個所謂“敵我矛盾”，却自己承認：“是絕對地互相排斥的。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沒有兩重性，祇有一重性。”既然祇有一重性，所以就構不成矛盾。反過來說，在確認“敵我矛盾”就根本不是矛盾的前提情況下，把它確認為“對抗”，這時再來說“一重性”才是能夠站得住腳的。如果你既承認敵我矛盾是“矛盾”，又說“沒有兩重性，祇有一重性。”這不成了悖論嗎？在這裏，又一次確證毛在《矛盾論》中引用的列寧所說的“對抗和矛盾斷然不同”是一個千真萬確的命題。

由此“株連”，所謂“對抗性矛盾”，自然屬於錯誤的概念，而成爲僞命題。

這裏還有個“人民和敵人”區分的標準問題。毛澤東是這樣界定的：“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看來區分敵我的標準就是看他對待社會主義的態度。可是，直到1980年代末，共產黨自己也說不清什麼是社會主義。所以鄧小平才有必要提出“三個有利于”的判斷的標準：“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372）鄧要判定社會主義，却在表述中用了“社會主義”這一未經定義的概念。他這個標準是不合邏輯的。所以直到今天，人們在談論社會主義的時候仍是各說各話。令人感喟萬端的是，多少人在“一念”（一個概念：反社會主義）之差中人頭落地，更別說從黑五類直到臭老九、敵人人數之衆了！其實，祇用舉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竟“選舉”了一個敵人當國家元首，中共無產階級司令部副統帥（上了黨章、憲法的正統帥接班人）也都是敵人、都屬敵我矛盾，就足以說明“兩類矛盾”的說法，荒謬到何種可笑的程度、爲害到何種可悲的程度！

### 3, 對矛盾概念切戒亂用

當毛說“矛盾着的對立面又統一、又鬥爭”（從此凡引自《正處》的話，便不再注明出處）的時候，他對矛盾概念的理解是正確的；當他說“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着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的時候，他對矛盾概念的理解就發生了混亂。這一句話中用了前後兩個、含義各不相同的“矛盾”，前一個是對的，錯誤發生在後一個是用“矛盾”偷換了“對立”的概念，即“矛盾 = 對立”。正確的應該是“矛盾 = 既對立又統一”。

“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說來，是非對抗性的；在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說來，除了對抗性的一面以外，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面。”前已說明，“敵我之間”不是矛盾，“對抗”也與矛盾斷然不同。

“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礎上的矛盾”這樣的敘述，就篡改了矛盾概念的本意，本意應該是既一致又不一致。這裏却成了“矛盾 = 不一致”。如用“不一致”代替“矛盾”，改述為：“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礎上的不一致。”雖然說法很別扭，但意思卻沒有錯。而敵我之間要硬稱為“矛盾”的話，就應該表述出二重性：“敵我矛盾是在利益根本不一致基礎上的一致。”這樣說可就不僅別扭，而且荒謬可笑了。原因無他，矛盾皆內部也。敵我不能捆綁成“夫妻”（這裏的“夫妻”是作為典型的內部矛盾的範例）。

“我們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眾之間也有一定的矛盾。”這裏的概念錯誤，是“矛盾 = 利益抵觸”。

“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這裏的問題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是否原於生產關係的“不完善的方面”；如果“完善”了是否就會沒有了矛盾？

總之，我們在毛的論述中發現，矛盾概念歧義叢生。這一點，我在《〈矛盾論〉與論“矛盾”（上）》中，已分別列舉出把“矛盾”等同於單純的“對立”、“鬥爭”、“分裂”、“磨擦”、“離間”……等等的例子。

### （二）為什麼說是“原理荒謬”、“論點站不住腳”？

#### 1. 為“人治”大開綠燈，個人專政得以暢行無阻

一則，“敵我矛盾”就是為了轉移目標而制造的欺人之談。反右就是殺雞儆猴。當時工人罷工、農民退社、學生鬧事。毛澤東就採取了反右這一招。頭號右派章伯鈞當即看穿，說：“老毛是要借我的頭。”（章怡和《往事並不如烟》）費孝通也說過章先生對他說：“章伯鈞約我去，他說：‘共產黨要借我的頭，貼上個反動派的字條，我也願意，這叫借東風。’章伯鈞的意思是說，共產黨受到了群眾的反對，壓不下去，所以要借他的頭。這句話，章伯鈞重復不止一次……”（戴維·阿古什《費孝通傳》）二則，“敵我矛盾”是懸在人們頭上的一把恐怖之劍，類如斬首示眾；三則，借“敵我矛盾”解決“內部矛盾”，一石投二鳥：一是團結內部，一是消滅內部異己（如，讓

日本多占地，假日滅蔣和借蔣滅張國燾、項英）；四則，就說他為轉移目標而創造的“敵我矛盾”，這個概念也是、也祇能是指敵我兩方面各自的“內部”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中國這個“內部”，從概念與實際相結合地說，官與民是相對的概念；而事實也正是，騎在人民脖子上壓迫和剝削人民、而為人民所切齒痛恨的不是地主、富農，不是資本家，不是知識分子，甚至也不是帝國主義，而正是共產黨的各級黨委和行政領導幹部，以及爪牙、嘍囉、痞子等所謂“積極分子”者流橫行鄉裏。毛澤東所以“抬舉”工農、打壓知識分子，就是為他實施愚民政策掃清道路，就是要消除為民請命的人。潑婦罵街式地批判梁漱溟和背信棄義地發動反右，就是最為明顯的例證。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子弟為毛打天下當了炮灰，毛哄騙他們說是他們坐了天下；這些坐天下的人又數以千萬計地被餓死，却一息尚存不忘“呼爾嗨吆，他是人民大救星！”毛說他們餓死是由于民主革命不徹底，階級敵人搞報復。于是大搞階級鬥爭，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重把地、富拿來問斬；彭德懷為民鼓與呼，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頭子；劉少奇搞了三自一包的救急政策，被說成是復辟資本主義，要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泱泱大國之堂堂“元首”，慘遭迫害而死。食髓知味，這就是“敵我矛盾”的真精神。

## 2. 堵塞了“法治”的道路，領袖得以無法無天、為所欲為

“兩類矛盾”說，從動機上說，不打自招是“陽謀”；從作用上說，是要堅持極權專制的“人治”、徹底堵死中國走法治道路的可能性。因為，毛劃分兩類矛盾的大權在握，如劃胡風為反革命，不僅高層中有很大的反對意見，即便連胡風的死對頭周揚也感到太過分了——這是劉賓雁告訴我的，還說，周總理很了解胡風。可是，毛大權獨攬、一意孤行，誰也無可奈何。結果，全國展開揭露、批判、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使2100餘人受到牽連，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離審查，73人被停職反省。1978年底，有關部門撤銷對胡風關於無期徒刑的原判，宣布釋放。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轉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的復查報告》，認為“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將有錯誤言論、宗派活動的一些同志定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團的一件錯案，中央決定予以平反。凡定為胡風反革命分子的人一律改正，恢復名譽。凡因“胡風問題”受到牽連的，要徹底

糾正。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又發出《關於為胡風同志進一步平反的補充通知》，說有關部門近年來對胡風的文藝思想等方面的幾個問題作了復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同意復查結論，對其文藝思想、宗派等問題作了澄清和說明。這樣，“胡風反黨集團”不僅獲得了政治上的平反，文藝思想等方面也得到了徹底的平反。

再說，所謂“正確處理”，劃右派有99%以上都劃錯了，20年後，鄧小平還說是“正確”的，問題祇是擴大化了。右派無人犯法，對他們的處理也是什麼“整風反右領導小組”說了算，全屬非法。究其實，法律上的“矛盾”，也祇有合法與非法、罪與非罪、重罪與輕罪等等的區分。你怎樣區分是“敵我矛盾強奸犯”，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強奸犯”呢？更何況，在毛心目中哪裏有什麼法律？立幾條法律也僅僅是個擺設！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建議加強法制，毛澤東對他說：“你要知道，法制是捆住我們手脚的。”（李世濤：《知識分子立場：激進與保守的激蕩》頁231）而“兩類矛盾”却可以任由他變戲法，祇要判定某人為敵我矛盾，他就在劫難逃；什麼法律、憲法？統統變成了廁所裏最粗糙的手紙。共產黨人死後、蓋棺論定的悼辭上都寫有“XX的一生”，如“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等。毛澤東的悼辭上本該寫，但沒有寫：“和尚打傘的一生”。毛雖作惡多端、罪大惡極，但這並非祇是他個人的問題，列寧界定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和尚打傘”的意思。這也就是“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鄧小平文集》二卷，第293頁）的原因。斯大林的罪行就是在處理敵我矛盾、“消滅人民的敵人”的名義下進行的。

我國憲法規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也不允許對任何人實施法律之外的歧視。法學家童之偉先生指出：在立法上，我國從來沒有劃分人民和敵人的界綫並且規定差別待遇。在適用法律層面，我國解決矛盾的主要形式是民事、行政、刑事三大訴訟。而事實上，在我國民事法領域和行政法領域，完全沒有區分人民與敵人、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的空間。在民事法領域，不可能制定和實施諸如屬於人民範圍的公民欠了屬於敵人範圍的公民的錢可以不還或少還，或屬於人民範圍的公民侵犯了屬於敵人範圍的公民的人身權利或財產權利可以不承擔民事責任或少承擔民事責任之類的法律；在行政法領域可照此推論。而在刑事法領域，即

使一個人嚴重危害了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也祇能把他作為犯罪嫌疑人，依法由公安部門偵查、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法院審判，追究其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或其它嚴重罪行，而這些定罪量刑的條款針對的是不特定的人的行為，不是針對已被劃到敵人範圍、有了“敵人”身份的特定公民；而且，對犯有這類罪的公民在定罪之前並沒有可能做人民與敵人的區分，而在定罪之後，依法執行法院判處的刑罰就可以了，在法律上也沒有再對其做人民和敵人區分的必要。嚴格地說，在刑法領域也沒有從法律上劃分人民與敵人的空間。（童之偉《關於更新若干基礎性法觀念的構想》，《法學評論》，2007年第2期。）

### （三）為什麼說“從處理着眼”，則是“歪門邪道、禍國殃民”？

#### 1. 以我劃綫和由我劃綫

所以說關於處理“兩類矛盾”的原理是荒謬的，首先如前所述，概念是模糊不清、混淆混亂的；其次，這就為“如何處理”留下了主觀隨意性的無限空間。他可以先翻手為雲，說：“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林彪是親密戰友、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光輝榜樣；然後覆手為雨，又說：“什麼老革命？老反革命。”總而言之，他祇要想置你于死地，就祇用置你于“敵我矛盾”就行了。然後他玩弄“群眾路綫”的慣技，激起愚民的愚性、痞子的痞性，憤老、憤青齊出陣，虛張聲勢、同仇敵愾，造成“國人皆曰可殺”的“輿論一律”，讓敢與“我”為敵的人死有餘臭。什麼反黨、反革命、反社會主義的個人或集團，統統是既不按國法也不按黨紀劃的，全是以“反我”、不“反我”劃綫的，至于反我不反我，又全是我說了算、全是由我來劃綫的。一個是“以我劃綫”，一個是“由我劃綫”，而且還有第三，一旦把你劃為“敵我矛盾”，即便自然生命尚可苟活，政治生命就斷然祇死不活了。因為，處理“敵我矛盾”的方法就是“專政”——根據列寧的定義：“專政是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列寧選集》第3卷623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如果不拘泥于詞句，而是根據現實生活，這裏的“無產階級”在中國就祇能是指唯一的人——“我”——毛澤東而已。因為，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人都不是。

毛澤東首鼠兩端，出爾反爾，前言不着後語；即請閱讀他下面的這段話，

你來領會他說的意思，到底是該、還是不該專政：“爲了維護社會秩序和廣大人民的利益，對於那些盜竊犯、詐騙犯、殺人放火犯、流氓集團和各種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壞分子，也必須實行專政……專政的制度不適用於人民內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專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壓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間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這和壓迫人民的敵人的專政是有原則區別的。”不是一般區別，而是“原則區別”！

前言：“也必須專政”；後語：“但是”。到底專政不專政？要說不專政，“必須”作何講？要說專政，又“但是”個什麼呢？是不是判了刑、專了政，還貫徹“兩類矛盾”的精神，不按敵我矛盾處理，顯示出“這和壓迫人民的敵人的專政是有原則區別的”呢？我在勞改隊倒是遇到過這樣一件事，因我的政策水平低，到底也沒能解釋得了。一位刑期很長的勞改犯對我們說：“你們右派反黨反社會主義是政治問題，我從來沒犯過政治錯誤，我是道德問題，所以政治上仍是好人。”他倒是犯了什麼法、被判重刑了呢？群眾的說法是：“血扒灰”。我是第一次聽說，尚不明其意。經解釋，原來是這樣的意思：與兒媳通姦是“扒灰”；他是與親生女兒通姦，故曰：“血扒灰”。

### 2，所謂“正處”，乃是假惡醜集中的表現毛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針如下：

在政治上實行“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毛自己說，這條方針的精神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以李立三爲例，他的存在，就標志着毛澤東處理犯錯誤的同志的原則是以“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八字方針爲旗號，來掩蓋他“以殺人如兒戲”（周恩來語，《毛澤東與周恩來》第100頁）。李立三夾緊尾巴做人，像小媳婦侍奉惡婆那樣臨淵履冰。他在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簡稱“八大”）上現身說法，發言的題目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但是，對毛掩蓋罪惡、制造假象、用紙包火，都祇能是轉瞬即逝的事情。《紅太陽是怎樣升起來的》一書，用事實真相說明毛的權力是建立在赤血白骨之上的。就連曲意逢迎、極力歌功頌德的李立三，也未能逃脫文革中的殘酷折磨、被逼自殺而死的可悲命運。

共產黨除了叫喊過團結，什麼時候真正團結過？誰跟誰團結過？都沒有。對內、對外，都表現出：分裂、鬥爭是他們的基本屬性。最好的場合也是各懷鬼胎的互相利用、狼狽爲奸於一時。毛澤東把馬列主義歸結爲兩個“四個



字”：一曰：“階級鬥爭”，一曰：“造反有理”，都是在搞鬥爭和分裂。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成爲諷刺的，團結也得靠鬥爭。“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這一真理，已經逐漸爲黨內同志們所了解。”（《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 703 頁）這句的實質就是沒有靜態的團結，祇有動態的鬥爭，動態的鬥爭就是團結。《實踐論》和《矛盾論》便是鬥爭哲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由於鬥爭哲學基於“內因論”的原理，因而它就必然表現爲“窩裏鬥”。國際共運也好，中共也好，他們的窩裏鬥總是表現爲三部曲：從明爭暗鬥到分裂；從分裂到決裂；從決裂到聲嘶力竭喊團結。這個“三部曲”不是我從政治學原理中分析出來的，而是從生活經歷中總結出來的。中國共產黨分裂爲無產階級司令部和資產階級司令部；無產階級司令部又分裂出個林彪反革命集團。總之是，“團結——批評——團結”，金玉其外；“分裂——鬥爭——分裂”，敗絮其中。

在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關係上，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他標榜開明地說：“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蘇聯不同。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民主黨派，讓他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對他們採取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 279）

蘇聯解體，檔案解密，揭了他的老底。原來，按他“有意識地”，並不是“留下民主黨派”而是正好相反。1947 年 11 月 30 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說：“一旦中國革命取得最後勝利，按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經驗，除中國共產黨之外，所有政黨就都應該退出政治舞臺了，這樣將會加強中國革命的勢力。”

斯大林否定毛的意見，于 1948 年 4 月 20 日復電說：“中國各在野黨代表着中國居民中的中間階層，並且反對國民黨集團，所以應該長期存在，中國共產黨將不得不同他們合作，反對中國的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列強，同時保持自己的領導地位。可能還需要這些政黨的某些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爲聯合政府，從而擴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礎，孤立帝國主義及其國民黨代理人。應當考慮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勝利後建立的中國政府，就其政策而言，還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而不是共產主義政府。目前還難以預料這將持續多長時間，至少在勝利後會是這樣。這也就是說，暫時還不能實現土地國有化和取消土地私有制，不能沒收所有大大小小的工商業資產階級的財產，也不能沒收大土地占有者以及依靠僱傭勞動的中、小土地占有者的財產。要等到一定時候才能進行這些改革。即使是南斯拉夫，除了

共產黨以外，也還有其他政黨參加人民陣綫。”（邱路《斯大林特使密訪西北坡——來自俄國檔案的秘密》，《百年潮》1998 第 1 期）

在幾天後召開的中央會議上，毛澤東對此一設想講得更加具體。他說：民盟解散了，中間派沒有了，今後國民黨也沒有了，新中國自然應該考慮像南斯拉夫那樣，實行在一黨制下的民族統一戰綫政策。換言之，一黨制並不取消統一戰綫，也不否認聯合政府，但統一戰綫和聯合政府並不等於說一定要有許多黨派並存。事實上，像南斯拉夫那樣，黨與非黨聯盟也是可以說是聯合政府。（馬貴凡：《毛澤東致斯大林電之我見》，《中共黨史研究》1999 年第 6 期。）

後來的事實證明，毛改變初衷，是出于對斯大林唯唯從命，一切遵照執行。這裏能夠發現和說明的幾個問題是：（1）毛澤東一再表明是要讓民主黨派都退出歷史舞臺，但斯大林不批准，才改變主意，現在却說是“有意識留下”。說明毛從來都是按着他的需要，隨意編瞎話的；（2）發電報的時間是 1947 年。但遼沈、淮海、平津具有戰略決戰性的三大戰役，却是發生在此後的 1948 年的 9、10、12 月，一方面的事實是國民黨還有很大實力，另一方面的事實是民主黨派正充當毛所謂的反蔣第二戰綫的主力軍，恰如鷹犬垂涎三尺地起勁追逐着前面搖晃着的骨頭。正值此時，毛却打算完他們的蛋，實行“黨天下”，自己獨吞預期的果實；（3）後來，經過大鳴大放，他發現民主黨派當真要行使互相監督的職能，便又暴露出他要消滅民主黨派的心迹。他于那篇背信棄義、聲名狼藉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中，後來添加道：“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這是我們的願望，也是我們的方針。至于各民主黨派是否能夠長期存在下去，不是由共產黨一方面的願望作決定，還要看各民主黨派自己的表現，要看他們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這裏當然無需提出這一同樣的問題：“至于共產黨能否存在下去，還要看共產黨的表現，要看他們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因為，“人民”就是“毛自己”。而于最後，可能是“人民”看到，經過反右派後各民主黨派的表現，猶如演傀儡戲，由共產黨牽着綫，叫走走就走走、叫扭扭就扭扭，完全傀儡化；搖尾乞憐，跟屁逐臭，徹底走狗化，徹底名存實亡了，才暫且恩準它作為花瓶，“長期共存”，以觀後效、以騙觀瞻。

處理群眾鬧事，是四條原則。毛澤東說：這些鬧事，不能說主要是因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為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我們不會教育，不會領導。我說

人民內部經常不斷地發生矛盾，罷工、罷課，農民打扁擔，去年有，今年還會有，以前幾年就有，不能都歸咎于匈牙利事件，說匈牙利事件一來，中國的事情就不好辦了。關於這個問題，我搞了四條辦法，大家看對不對。第一，克服官僚主義，適當地處理矛盾，使其不鬧；第二，要鬧就讓他鬧；第三，要鬧就讓他鬧够；第四，除個別人以外，一般不要開除。我看將來問題還多。人心不齊，幾億人口，中間許多人會跟我們的想法不同，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們的工作人員，許多人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文化高的人，也不見得不犯錯誤，有時知識分子犯起錯誤來還要更厲害。

這迴異於一個月前、給省市自治區書記的講話：“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而是說“不能都歸咎于匈牙利事件”；也沒說階級仇恨和大學生多是地富資產階級子弟；還沒說讓他們放臭屁，後發制人……而是說“主要是因為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我們不會教育，不會領導。”若與事後的說法和做法相比，就更顯出其虛偽與殘酷。事後說：“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祇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利益極大。這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上既有反動派存在，中間份子又未受到現在這樣的教訓，黨又未受到現在這樣的鍛煉，亂子總有一天要發生。”（同上，頁432）

事情又是這樣做的：真正在反右前後第一批被砍下鮮血淋漓的頭顱的，是所謂章羅聯盟策劃的“小匈牙利事件”，即“漢陽中學事件”中槍斃的三名“主犯”：漢陽縣民主黨派聯合小組長、民盟盟員、縣文化圖書館圖書管理員楊煥堯；民盟發展對象、漢陽縣一中副校長王建國；語文教研組組長、初三畢業班班主任鐘毓文。牽涉此案者約70人，其中13人判刑或勞教，很多人死于獄中。現在真相已明，純屬胡編亂造；祇用舉出鐘毓文被槍斃是因為他好“眨眼睛”一例，足示荒謬之極矣。然而當時《人民日報》的報道稱之為《馬哲民策動的“小匈牙利事件”》，許多報刊對事件大加宣揚，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把事件攝成新聞片《鐵證》，在全國放映。其內容，大事渲染“反革命分子血腥暴亂”。很可能哪一位文人就是看了此類報道，在

今天仍然抱着僵尸的大腿“有根有據”地大事叫囂反右必要論的。

1986年元月上旬，湖北省委向中央報送的《關於“漢陽事件”復查情況和處理善後問題的請示報告》，得到中央正式批復。中央同意省委關於“漢陽事件”徹底平反的意見，並對處理善後問題作了明確指示。但三個死者是無法復活的。難道這就是毛所說的處理學生鬧事的“四條辦法”嗎？即小見大，毛按其需要虛構出的“漢陽縣小匈牙利事件”，就是解剖整個反右運動的一隻麻雀。

在科學文化工作中，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這是臭名昭著的引蛇出洞的“陽謀”。劉賓雁先生當時是《中國青年報》記者，深為敬佩鄧拓先生的先見之明，他懷着感恩之情，說：

直到三十年后，包括我在內的許多知識分子仍然未能識破這個騙局，以為毛的“引蛇出洞”的陰謀是在鳴放開始后意外地發現竟有那麼多人攻擊和否定他的政績以后才改變主意，決定反擊的。

有一個人（就我所知，也祇有這一個人）是從一開始就識破了毛澤東這個陰謀，並冒着極大的風險去同毛作了鬥爭的，那就是當時的《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鄧拓先生。他自然不能去揭破那陰謀，而是用了一種令毛澤東都難以問罪的巧妙辦法：當毛澤東四處“點火”時，他按兵不動。（五七年一月，陳其通等人那篇令毛澤東十分惱火的文章，鄧拓一拿到，就把它發排到頭版頭條）。表面上看似乎是他保守，對於文教界的自由化不以為然。這就是“左”派的“忠心耿耿”，其實大錯了，而實際上他卻是在向中國知識分子發出警告，警戒他們不要上毛澤東的當。而毛澤東却祇能罵他麻木，不善于領會他的意圖（豈料是領會得太深了），先說是“書生辦報”，後來又罵“死人辦報”，反右后終於將他調出《人民日報》。有一件令我感恩的事，也能看出鄧對毛的抵制。五七年五月我在上海采訪時，“左葉事件”出來了。我有感于中國記者的使命同他們的地位之不諧調，在一個興奮得不能入寐（鳴放高潮，夜夜如此）的夜裏，一口氣寫了一篇幾千字的文章，題為《記者這一行》，寄給鄧拓先生，再無下文。六月底，反右開始后的第一次首都新聞界“座談會”（實為對右派的討伐會，第二次就輪到我了）上，鄧拓先生在休息時間把我拉到主席臺后，悄悄把那篇文章的原稿交到我手裏，以目示意，一言未發。那也就成了我們的訣別。我成了右派以后，再也不能見他了。（為華民《中國大逆轉——反右運動史》一書作序：《毛澤東一手定乾坤》）

在經濟工作中，實行統籌安排、全面兼顧的方針。這裏祇用指出隨後的大躍進中以糧爲綱，高產衛星上天；以鋼爲綱，鋼鐵元帥升帳，就可知在全民發瘋中，把統籌安排、全面兼顧的方針糟蹋到何等地步！

至于在教育工作中，實行“使我們的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爲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這並不是他內心中的教育思想，真正的教育思想是階級鬥爭作爲主課，一至發展到寧要沒有文化的勞動者，不要有文化的精神貴族！

聽其言而觀其行。《正處》發表之後，毛澤東就逐漸變爲“一人敵全黨”的孤家寡人了。從此，中共和中國的日子就每況愈下、國將不國、黨將不黨，直至瀕臨崩潰的邊沿。

## 二， 三條戰綫·兩類矛盾·一個目的

哪三條戰綫呢？在1958年3月19日成都會議上，毛澤東爲重印《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部分按語寫了說明，指出：“我們沒有預料到1956年國際方面會發生那樣大的風浪，也沒有預料到1956年國內方面會發生打擊群眾積極性的‘反冒進’事件。這兩件事，都給右派猖狂進攻以相當的影響。”這段話的意思，用他的“鬥爭哲學”的語言來表達，就是：反右、反修、反“反冒進”。

### （一）打退右派的猖狂進攻：陰謀之中套陰謀

毛主席問道：“各位在宣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時，究竟還有什麼具體困難沒有？”

我說：“我體會雙百方針的提出，在政治意義上，是高價徵求批評，讓人民暢所欲言，慢慢再加以說清楚，不要一下子壓下去，我認爲這就是高價徵求批評。”

毛主席說：“你的意見很對，很好。”

我接着說：“我們《文匯報》開展電影問題的討論，收到來信很多，批評相當尖銳，也有一些不同意見，我們故意放一放，好讓大家把意見說完，等以後再開展討論。但在上海却遭到了圍攻（指張春橋組織的圍攻），請問主席，我們該怎麼應付？”毛主席說：“我叫周揚同志給你們這場討論寫一

## 還原 1957

---

篇小結，這批評、反批評、小結，這就叫正、反、合，這就是辯證法你同意不同意？”

我高興地回答：“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徐鑄成《“陽謀”親歷記》）

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在天安門城樓上舉行座談，請黨外人士幫助中國共產黨整風。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指出：幾年來都想整風，但找不到機會，現在找到了。整風的總題目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反對三個主義。整風會影響到黨外。規定非黨員自願參加，自由退出。有意見就說，黨內外打成一片。整風主要是黨內整風，可是有黨外人士參加就更全面了。兩種元素可以起化學作用。但黨外人士不是自己搞，而是幫助共產黨整風。目前各方面批評意見最多的是集中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衛生部等部門。有人很擔心，怕矛盾一揭發，一批評不得了。我們對人家提出的意見，不要害怕，應該歡迎，給人家以提意見的機會。矛盾沒有什麼不得了，到處唱對臺戲，把矛盾找出來，分分類。如文學、藝術、科學、衛生等方面，提出的問題最多，矛盾突出來了，應該攻一下，多攻一下。愈辯論愈好，愈討論愈發展，人民民主政權愈鞏固。兩個月來各界人士對政府工作的批評意見是很好的。在報上發表，可以引起大家注意，不然官僚主義永遠不能解決。幾年來不得解決的問題，可以在幾個月解決了。還說：“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希望對老和尚也提些意見。”他說：統一戰綫中的矛盾是什麼呢？恐怕就是有職無權的問題吧！過去民主人士有職了，但是沒有權，所以有人講民主人士不大好當，有些惱火，現在不但應該有職，而且應該有權。因此，這次整風，在黨內對有職無權的問題也要整一整。

講到高等學校實行黨委制問題，說：教授治教恐怕有道理，學校黨委制恐怕不適合，要改一下，應當集中在校務委員會或教授會。由鄧小平同志負責找黨外人士和中國民主同盟、九三學社等開座談會，對有職有權和學校黨委制問題徵求意見。在5月10日出版的《民盟中央工作簡報》第15期刊出了章伯鈞所作的傳達，說：“毛主席說，大學校的管理工作如何辦？可以找些黨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個辦法來。共產黨在軍隊、企業、機關、學校都有黨委制。我建議，首先撤銷學校的黨委制，不要由共產黨包辦。請鄧小平同志約集民盟、九三等方面的負責人談談如何治校的問題。”

毛還說：“現在是新時代和新任務，階級鬥爭結束，進入另一種戰爭，

就是向自然界開戰。要懂得自然科學，不懂怎麼辦，要老老實實學。”

毛對各個民主黨派最近召開的以發展壯大自己組織為主要議題的會，對他們“黨要擴大，政要平權”的勢頭，感到非常惱火，本來決心要狠整他們，但此時却佯裝退兵 30 里，說：最近各民主黨派都開了一些會議，開得不錯，提出了些問題。祇要黨外人士談出來了，大家一齊搞，這就更好談了。希望黨外人士對共產黨多提些意見，幫助共產黨進行工作。

經過毛澤東一鼓作氣，再而不衰，三而不竭地鼓動鳴放，于第二天，1957 年 5 月 1 日，《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在《人民日報》公布，“中央指示的提要”如下：幾年以來，在我們黨內，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有了新的滋長。因此，中央認為有必要按照“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的方針，在全黨重新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風運動。——這次整風運動應當以毛澤東同志的兩個報告為思想的指導，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作為當前整風的主題。——這次整風運動，應該是一次既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應該是一個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運動。——非黨員願意參加整風運動，應該歡迎。但是必須完全出于自願，不得強迫，並且允許隨時自由退出。

不僅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而且自由參加、自由退出，不得強迫。可說是客氣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了。

李洪林說：“6 月 19 日，毛澤東 2 月 27 日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正式發表了。人們吃驚地發現，6 月 19 日的文本和 2 月 27 日的文本已經大不相同了。除語句上按照‘反右派’的需要刻意修改甚至重寫以外，最重要的是新增加了兩處‘反右派’的武器。

“一處是講階級鬥爭的……

“另一處是劃分‘香花’和‘毒草’的標準，即劃分敵我的標準，也就是劃右派的標準……

“增加了這兩處之後，反右派就有充分的根據了。你們不是埋怨我没有早說嗎？我在 2 月 27 日就說了，階級鬥爭是長期的，有時還是很激烈的。你哪裏是給我提的意見？分明是在進攻。你說你不是進攻嗎？那麼用六條標準衡量一下吧：你的話‘不利于’社會主義建設，你是想擺脫共產黨的領導，這是毒草。因此，你就是敵人，就是右派。這是我 2 月 27 日‘已經說過’的。”

“總之，毛澤東的講話經過這番修改之後，反右派鬥爭就成爲‘有言在先’了。也就是說，不是我‘不教而誅’，而是你‘明知故犯’。活該！”（李洪林《中國思想運動史》，頁100—101）

李先生說的“活該！”是反話正說，是怒不可遏，是“恨上來我不把別人來罵，罵一聲毛澤東你男盜女娼！”——把事先沒說過的話，事後加上去，這就叫做“有言在先”。毛澤東之無賴，舉世無雙。就連剛才他在上面說的那些用以引蛇出洞的話，諸如“給老和尚提意見”、“教授治校”、“有職無權”等等，也無一例外的、都是右派言論！如果再把他2月27日的講話錄音拿來放，恐怕最猖狂向黨進攻的中國天字第一號極右派，就非毛澤東莫屬了。

乘反右陰謀得逞，毛澤東施展他的陰謀連環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把“反冒進”跟右派聯繫在一起，對反冒進者施壓。毛澤東說，“反冒進”的人說1956年是冒進，右派攻擊1956年是“全面冒進”，二者之間是相互關聯的。毛向周恩來、陳雲發出了警告：

“右派把你們一拋，拋得跟他相距不遠，大概五十米遠……”這便是陰謀背後的陰謀。要知道，在反右運動的火山爆發中，右派早已是莫此爲大的罪名，右派分子個個都被燒得焦頭爛額，舉國上下，殺雞儆猴，人心惟危，莫不談虎色變。

周恩來、陳雲等乖乖地作了檢查，“對於當時反‘冒進’的那個方針性錯誤”，承擔了責任。

周恩來在3月25日的會上對反冒進問題再次作檢討。他說：“在當時就是沒有聽取多方面的意見，沒有接觸群眾和實際，而祇局限在會議室和辦公室中，更沒有看清在所有制改變後解放了的生產力要求大發展的群眾運動正在起來。我們反而祇看見死的物不看見生氣勃勃的人，務實而不務虛。我負主要責任提出的‘反冒進’報告就是對群眾生產高潮這個主流潑了冷水，因而不是促進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費，四十條也就被打入冷宮，這就是問題的本質。”

“當時確沒有這樣認識，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眾實踐更啓發了我，才逐漸認識這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方針性的錯誤。更深一層說，也就是對社會主義革命本質的東西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建設的主流發動群眾、發展生產，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了。”



毛澤東在反右派和反“反冒進”的兩個戰場，分進合擊，節節勝利，一路高歌，向着自己的最終目標躍進，大躍進！

## （二）反右運動的哲學精髓，就是消滅“實事求是”

無論是說“陰謀”，或說是“陽謀”，都是在說“動機”。現在，再讓我們來說說“後果”：大躍進的發生，是反右運動的第一個惡果。

一個不是別有用心的人，大概不會把大躍進祇歸結為經濟問題。有人說，大躍進的失敗，是由于毛澤東不懂經濟所致。這話固然有點道理。可是，同理可問：難道文化大革命的失敗是由于毛澤東不懂文化所致嗎？所以，假如我們說這裏面也含有某些正確的因素，那麼，正好是這個正確的因素被居心騙人的政客、御用學者們擴大為主導因素，才掩蓋、模糊、曲解了大躍進真正的政治本質特徵，從而誤導人們認為：毛主席、共產黨和全國人民一樣，出于急切擺脫貧窮落後，才發動了大躍進，問題祇是出在急于求成、缺乏經驗上。

李銳先生在《廬山會議實錄》中，無限感嘆地寫道：“我們都感覺主席對經濟建設太外行，去年不到前臺來指揮就好了。”（頁46）這個說法是不錯的。但，如果不是他到前臺，大躍進就根本不會發生；這就把問題凸現出來了：他到底為什麼要一意孤行地把別人（特別是主管經濟的周恩來、陳雲等）批倒、排除在外，自己跑到前臺來直接指揮呢？大躍進的政治本質就隱藏在這個問題中。讓我們從它的發生談起。

毛澤東1958年9月5日在第15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幾億勞動群眾，工人農民，他們現在感覺得心裏通暢，搞大躍進。這就是整風反右的結果。”先不說心裏通暢不通暢，先肯定下面一點：搞大躍進的的確確是反右派的結果。他們大事宣揚大躍進是反右的勝利的果實，是反右正確性的確證。經過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人都認為反右派鬥爭開放的“燦爛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要結成“大躍進的經濟之果”，這樣的因果關係就決定了從大躍進的領導人到大躍進的指導思想，必然是與反右派一脈相承的。1958年4月5日，毛針對各行其是、分散主義的現象，強調權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我為正帥、鄧小平為副帥”。毛的秘書李銳先生說過大意是這樣的話，綜觀鄧小平的一生，他是和毛澤東一樣的左。所以領導大躍進的正帥和副帥，正好是原先領導反右派的正帥和副帥。

這絕不是偶然性的巧合，而是具有本質意義的現象，是事物發展的必然性的規律。

右派言論的共同點，就是對“三害”（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進行了抨擊。1958年呈現的另一個規律，正是，遠非一般所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是代表“道”的右派，低頭一尺；代表“魔”的“三害”，却氣焰萬丈，成了精。所謂“成精”，是指“三害”變成了“五風”（共產風，浮誇風，高指標，瞎指揮，強迫命令）作出了淋漓盡致的表現，興妖作怪，興風作浪，刮得神州大地昏天黑地，日月無光，哀鴻遍野，餓殍載道（實際上不全是“載道”，因為不準離家，所以絕大部分是“在家”）。而所謂“淋漓盡致”，是因為都是上面壓下來的，全是正帥和副帥壓下來的。所以下面執行得特別有恃無恐，肆無忌憚，窮凶極惡，而這個“上面”表現出的這個“三害”變成“五風”的猙獰面目也是明目張膽，毫不掩飾的。不像1957年那時右派所說：“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不是存在在個別機關或個別學校裏，是在目前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普遍地存在着。那麼我們要根除‘三害’是不是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裏挖掘一下呢？”（陝西師院講師王尊一：《“三害”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裏挖》，《陝西日報》6月12日）現在不用“挖”了，已經跳出來、不打自招了！正帥和副帥就是“三害”的化身，正帥每天一跳八丈高，茲以趕超為例以明之：“1958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提出要在15年左右趕上英國，再用20年到30年趕上美國；5月，八大二次會議提出了7年超過英國、16年趕上美國的口號；6月，毛澤東在薄一波的《匯報提綱》上批示：‘超過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祇需兩到三年，兩年是有可能的’；9月2日，毛澤東在一封信中說：‘為5年接近美國，7年超過美國這個目標而奮鬥吧！’”關於人民公社，1958年8月30日，毛澤東對“一大二公”做了這樣的解釋：大，就是地大物博，人口衆多，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人多勢衆；公，就是社會主義比合作社多，把資本主義的殘餘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養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實行工資制度，搞農業工廠，破除了資產階級法權制度。北戴河會議關於公社的決議說：“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人民公社實行公社所有，統一核算，分配推行供給制，導致窮富隊之間和社員之間的平均主義；把自留地、家庭副業、集體貿易、小商小販統統做為“資本主義尾巴”割掉，公社化運動刮起了“共

產風”。我再舉副帥的一例：鄧小平麾下之中央書記處屢次麾軍前進，規定高指標的進度。1958年9月5日，中央書記處電話會議強調，北戴河會議確定和下達的鋼鐵工業指標祇能超額完成，不準完不成；不但一噸不能少，少一斤也不行。9月24日，中央書記處又召開電話會，要求要達到日產鋼6萬噸、鐵10萬噸。（宋連生，《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始末》，頁140-141）他們以“一天等於20年”的速度在發瘋發狂。毛陶醉得飄飄然，忘乎所以，並“謙遜”得讓人嘖飯：如果我們先到共產主義的門口，也先要等一等。等蘇聯趕上來，然後一起進入。如果我們先進去了，對他們不太尊重。

指出這些倒行逆施，不是本文的重點，重點是指出反右派與大躍進的關係。從這些關係中自然就可以暴露出反右派運動的反民主、反民生、反人民、反歷史的反動性，也就說明他們是倒行逆施的反動派。例如我要指出土法煉鋼，不是僅僅指責他們是一群瘋子、一堆傻瓜、一群冥頑不化、反科學的家伙，而是如朱正指出的那樣：“大躍進是反右派鬥爭的直接結果。能看出點問題，敢提點批評意見的人這時多已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剝奪了發言權。那些沒有被劃為右派的知識分子和幹部眼看到不久前別人是怎樣成為右派，落到怎樣的境地，當然不敢再多說一句話。土法煉鋼，打麻雀，高產衛星田，吃飯不要錢，對於這些層出不窮的新事物，沒有誰敢說一個不字，大躍進就這樣沒有遇到一點抵抗，開展起來了。”（《反右是流產了的文化大革命》）我在這裏要指責他們的是，反右派以後，把知識分子打倒在地，胡說什麼“外行領導內行，這是客觀規律”，結果把經濟搞得一蹋糊塗。又如在大躍進中號召：不要迷信科學家，不要怕教授，對科學技術要又信又不信，往往是没有學問的人勝過有學問的人，結果把破除迷信變成了破除科學。

總之，反右派與大躍進是一種“正相關”的關係：反右派越厲害的地方，大躍進越狂熱，惡果越慘重，餓死的人也越多。反右派，河南省居全國之首。大躍進又是河南省一馬當先。人民公社、農業衛星等都是河南省打頭炮。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河南省長吳芝圃彈着發瘋的鋼琴，寫出對大躍進的哲學論證《躍進的哲學與哲學的躍進》。結果，河南省在遭受大躍進的災難上，也是最為慘重，僅信陽一個地區就餓死人105萬，當時全區總人口是850萬。這個“餓死人105萬”的數目，是大有來歷的：1960年，“董必武同志隨即派李堅、李振海（李振海同志後來在信陽擔任了一段地委副書記）進一步調查了解。他門花費了近三個月的時間，逐縣進行了調查訪問，在調查報告中，

寫上了餓死人 105 萬的數字。”（〈痛憶“信陽事件”全程〉，《葉落瀟瀟江流滾滾》頁 486）但本文作者余德宏認為這個數字太小，問題不在調查者，而在被調查者。“理由是，在 1960 年的生產救災中，糧款是按人頭多少發的，人多則多發，人少則少發，不少大隊、生產隊爲了多領錢糧，不少社員爲了多打飯菜，故將死人報成了活人。我岳母趙王氏、我堂兄余德敏就是死了很長時間還在領取糧款的。在信陽事件中，我雖然職務不高，但我在專署辦公室工作（辦公室秘書，負責文牘暨農村工作等），除經常隨專員、副專員們一起下鄉外，自己也不斷帶幾個同志一起下去檢查農林水利方面的情況，在 1959 年內我曾先後向地委、專署寫過 10 份反映情況的報告（在批鬥我時，揭發我寫了 16 份），所以我既了解一些全面情況，也了解不少典型情況。”（同上，頁 470）

1980 年，《河南日報》記者站站長魯嘉賓寫了題爲《信陽事件應當重視》的建議文章，因爲這在當時還是“禁區”，故登在內參上，領導上一直無一人置可否，總編說，不要再提此事了。時間又過 20 年，魯先生才又“作爲一個親歷者”，重提此事：“爲什麼會發生‘人相食’、餓死一百多萬人的大慘劇呢？反右鬥爭的後果人所共知。河南省是反右的重災區，劃的右派占全國 15% 以上。信陽是河南省的‘重中之重’。信陽地區反右派中，反映真實情況，敢講真話的人，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戴上了‘右派’、‘中右’、甚至‘反革命’之類的帽子。1926 年入黨，1948 年深入虎穴策動敵軍一個旅起義，建國後歷任縣委副書記、信陽地直機關黨委書記的老紅軍李華軒，因爲反映農村真實情況也被劃爲右派；忠誠正直、堅持實事求是抵制左風，反右時不忍把無錯誤幹部劃成右派的信陽地委黨校副校長董玉寶，也被劃成了右派，他被劃右派的過程竟是由于地委副書記王達夫的一句話：‘地委黨校劃不出右派，你就是右派’，而被帶上右派帽子的。確山縣縣長張遵道，黨性強、作風好，是山東老區南下來的老黨員，因爲沒有阻止報社記者揭露縣委組織部長私自拘留親自動手毆打鄉黨委書記王好平的違法亂紀行爲，‘給確山縣摸了黑’，傷了縣委書記的尊嚴，也被劃爲右派。荒唐可笑的劃右理由，隨心所欲的劃右手段，不勝枚舉，全區竟劃了一萬多人！

“信陽地區作爲執行極左路線的急先鋒，在反右中，不僅隨意濫劃右派，在極左聞名的河南省創造了最高紀錄；而且在懲治右派中又慘絕人寰，使這批無辜者大批在絕境中傷生，拋骨荒山，更多的妻離子散，家破身殘未盡天

年。如此驚心動魄的一場反右，誰不毛骨悚然！因此反右之後，立即出現兩個嚴重惡果。其一便是真話從此完全絕迹，實事求是作風蕩然無存；其二則是權力意志，違反科學蠻幹的極左路線惡性膨脹，泛濫成災。”（同上，頁497-498）這就是本文的主旨：“大躍進的發生是反右運動的第一個惡果”。在本文開始引用的李銳的話，說毛“去年不到前臺來指揮就好了。”其實應改為“不搞反右派就好了。”但這全是假設。歸根結底應改為：“歷史如果能够假設就好了。”

反右派的副帥鄧小平說，反右派的正帥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我則說，消滅“實事求是”，就是反右運動的哲學精髓。（意猶未盡，後面，我還要對此主題繼續再議。）

### （三）目的未達，萬骨已枯

毛澤東反右派、批判反冒進，是爲了向自己的政治目標大躍進。在大躍進中，毛膾炙地表示，當中國比蘇聯先一步到達共產主義門口時，要等蘇聯老牛爬坡似地趕上來，然後客氣地道一聲：“請！”在這之前，我們先以社會主義之名行共產主義之實。人們不禁要問：他這樣做到底目的何在呢？

諸如目的、動機、意圖、居心這類內在的東西，除非自己老實說出，否則，別人祇能以X之心、度Y之腹。即便X是君子，如果他没有運用科學的方法，做這種隔皮斷筋的事，也會淪於瞎猜，更別說X是小人了。毛澤東在反右時說“善意，惡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毛澤東選集》五卷，頁427）別說“看”，即便是“猜想”，更有甚者，即便是“瞎猜、胡猜”，也有可能瞎貓碰個死老鼠；蒙對的幾率按大數定律說，該是50%。可毛澤東自認爲有把握“看得出來的”所謂“善意，惡意”，不管是當時對右派，還是隨後反右傾對彭黃張周，還是文革對三家村、四家店、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甚至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陳伯達、關王威、林彪、黃吳葉李邱；統統算起來，沒有一次是正確的！其正確率等於0。這說明什麼呢？這說明若是“和尚打起傘來”搞武斷，那就比“瞎猜”還要更惡劣、更荒謬無數倍。所以，祇有態度端正、方法科學，才能庶幾乎無大錯矣！那麼，毛澤東喪心病狂地搞大躍進，其真實目的、動機、意圖、居心到底何在呢？

王若水說：“毛澤東需要創造奇迹，需要做一番震驚世界的事業，需要使全世界目瞪口呆，這樣才能確立中國的強國地位和他自己在國際共運中的

## 還原 1957

---

領袖地位。這就是毛澤東發動 1958 年大躍進的背景。”（《毛澤東爲什麼要發動文革？》，《明報月刊》1996 年 10 月號）

楊光認爲，“大躍進”與“世界領袖”這二者是緊密相連的。中國若不能實現“大躍進”，毛的“世界領袖”之夢就斷然不可能成真，反過來，如果毛澤東命中注定要成爲真正的“世界領袖”，中國也就必將勢不可擋地出現一場驚天動地、驚世駭俗的“大躍進”。（《毛澤東爲什麼要發動反右運動？》《民主中國》）

在《晚年周恩來》一書的第二章中，高文謙先生寫道：“對於斯大林之死，毛澤東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在失去了斯大林這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大家長後，一直深感受制于人的毛澤東終於多年的媳婦熬成婆，從此行事可以不再有所顧忌；而且社會主義陣營一時群龍無首，正好可以‘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一逞其壓抑已久的充當世界革命領袖的雄心抱負。

“在這種欲望的驅使下，毛澤東的頭腦開始急劇膨脹，決意獨辟蹊徑，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向蘇聯模式挑戰，企圖再一次創造奇迹，與蘇聯一爭高低。毛後來種種好大喜功，頭腦發燒，急于求成的舉動，諸如改變原來中共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大幅加快國家工業化、農業集體化的進程乃至發動‘大躍進’，莫不根源于此。”

毛號召中國要“超英趕美”，我的朋友張先痴一語戳穿：他是“骨子裏想當地球球長”（《格拉古軼事》第 42 頁）。

我由于切身感受而體會到：毛實現自己的圖謀，總有一個“三步走”的思維框架。1957 年毛反右的三步是：一月，在省、市、自治區委書記會議上，告知黨內：螞蟻出洞嘞！大學教授、學生、知識分子、民主黨派要在中國搞匈牙利事件，要推翻共產黨，左派要做準備；二、三、四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在天安門上，笑容可掬地、誠心誠意地布置陷阱；五月中旬，以中央文件和《事情正在起變化》爲題的文章，向黨內發出反右密令。毛最大的三步走是：由延安整風建立全黨的領導權到奪取全國的領導權；由一黨專政到一人專政；由中國的斯大林到世界革命導師。謀取世界霸權地位也是三步：當社會主義陣營的頭；當第三世界的頭；最後是，“把地球管起來”。

所以毛的超英趕美，實際上是“聲西擊北”；祇是一場以英美爲參考系的中蘇較勁，當下的目標是“陣營的頭”。

同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上，薄一波傳達了毛的一個想法：要破除迷信，美國不算什麼。用不了一、二十年，蘇聯可以變為兩個美國，我們可以變為四個美國。

這句話隱含的意思，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較量，而是中國與蘇聯的競賽：你蘇聯不過變成兩個美國，我比你多一倍，我是英、美、蘇一起超過！在此前後，毛還說：中國人口多，為什麼不應當成為世界第一大國？在延安的時候，林彪同志向我說，將來要趕上蘇聯，當時我還不相信，我想蘇聯也在進步呀？現在我相信了。我看我們的共產主義可能提前到來，因為我們的方法比蘇聯的好，速度比蘇聯的快，再加上有6億人口和蘇聯的技術援助，理所當然應當走到前面去。（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頁436。）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柯慶施向毛澤東說：“明年上海可以試行吃飯不要錢了。”毛澤東聽了非常高興地說：“做到吃飯不要錢，有全世界的影響，可比蘇聯放一顆衛星大得多。”（李銳《毛澤東的晚年悲劇》頁71）

在蘇聯人看來，他們的國家要比中國發達得多，但赫魯曉夫也祇敢提十五年趕上美國，基本上實現共產主義，而比他們落後許多的中國，原來還祇是說用十五年趕上資本主義世界第二位的英國，可不久就改變了口號。到了八大二次會議的時候，就已經變成了七年趕上英國，再用八到十年趕上美國。也就是說，趕上美國的時間幾乎與蘇聯老大哥同步了。而到了1958年9月初，毛澤東則幹脆提出五年接近美國、七年超過美國了。

毛澤東甚至並不忘諱中國要先于蘇聯進入共產主義。他在八大二次會議上說：“我看我們的共產主義可能提前到來，因為我們的方法比蘇聯好，速度比蘇聯快，再加上有6億人口的齊心協力，理所當然要走到蘇聯的前面去。”

同年11月的武昌會議，毛澤東再一次講到了超過蘇聯的問題。他說：中蘇對比，我們快，他們慢的關鍵是，他們的資產階級等級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級懸殊，貓鼠關係，我們是幹部下放勞動，將軍當兵。他們缺乏群眾路線這一着，即缺少政治，所以搞得比較慢。另外還有幾種差別，工農、城鄉、體腦勞動，沒有破除。毛澤東還說，不管我們走得快，還是要給蘇聯人留面子，我們一定要讓蘇聯先過渡，我們無論如何要後過渡，我們可以以社會主義之名，行共產主義之實。他還說，我們10年後就可以搞到4億噸鋼，

160 萬臺機器，25 億噸煤，3 億噸石油，還有天下第一田。可是，他們搞了那麼久，還沒有過渡，落在我們後頭，現在已經發慌了。他們還沒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想搶上去。我們過渡到蘇聯人前面，他們臉上無光。（羅平漢《“文革”前夜的中國》）

《毛澤東全傳》的作者辛子陵說：“發動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釀成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大慘劇——餓死 3755 萬人（我根據解密檔案推算，此數應為 4687.5 萬人。古人說：‘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成功萬骨枯。’于今，毛澤東則是，目的未達，近半億的農民已經生地被餓死。令人聞之發指，言之齒冷，憶之心有餘痛。——紫丹注）。研究毛澤東的晚年錯誤，要抓住這個重大歷史事件。這是破解毛澤東之謎的一把鑰匙。”（《千秋功罪毛澤東》導言）所以，實事求是地確定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目的，許多毛澤東之謎就可迎刃而解，否則，如按下面論斷進行思維，則毛澤東之謎就會百思而不得其解，如：“烏托邦”論、“改變一窮二白”論、“好心辦了壞事”論、“急于求成”論、“全民狂熱”論、“詩人浪漫氣質”論、“精神萬能”論、“太不懂經濟”論，甚至“個人崇拜”論、“政治經濟體制”論，等等，即便有一點道理，但終于難免是屬於隔靴撓癢的皮毛之見，而對於正確解決作為重大歷史事件的大躍進中的一系列問題，則毫無裨益。比如，為什麼說“大躍進是反右運動的第一個惡果”？為什麼把大躍進的“人禍”歸于“天災”？為什麼毛為假衛星推波助瀾，說“大放假衛星，有極大好處，無假哪裏來真？”（《廬山會議實錄》，241 頁）為什麼他拍着桌子說：“祇有陳雲能管經濟，我就不能管？”（《廬山會議實錄》，頁 18）為什麼“不可思議的大救星”居心要讓人民窮？為什麼毛對餓死幾千萬人態度那樣冷血？為什麼人民、特別是農民遭受那樣空前絕後的人權災難，財產（連鍋碗瓢勺）被剝奪精光，餓死不能逃荒？為什麼對在廬山會議、在七千人大會上指出大躍進錯誤的人進行迫害，甚至置之死地？為什麼大躍進不算經濟賬，強調要算政治賬呢？

如果實事求是地認定毛的目的、動機、意圖、居心，就能讓許多此前此後、大惑不解的問題，茅塞頓開，一通百通。如，為什麼毛于 1953 年違反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起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提出貫徹廢除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為什麼 1955 年批“小腳女人”鄧子恢？為什麼 1956、1957、1958 年批周恩來等的“反冒進”？為什麼毛要堅持斯大林主義？為什麼毛 1957 年發動反右派運動使知識分子遭受浩劫、



把科學民主精神一舉殲滅？毛爲什麼要踐踏“八大”路綫、大搞“階級鬥爭爲綱”？毛爲什麼親自出馬大樹“正確的”個人崇拜？毛爲什麼批“三和一少”、不顧本國人民死活，拼命出口革命，對阿爾巴尼亞、對亞非拉進行超出國力的“援助”？連衆說紛紜的、毛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以及毛爲什麼要屢廢自己的接班人？這些問題的答案，也成爲數學上的術語：“同理可證”。

這樣做，追求毛的目的、動機、意圖、居心，是否會成了爲共產黨所批評的“唯心論”呢？不會的。系統論認爲，目的是系統的形成性要素，是貫穿各個環節的一條紅綫。點明了毛澤東搞大躍進的野心，這就擊中了大躍進的要害，揭示出大躍進的靈魂所在。他們的老祖宗馬克思恩格斯說過：“歷史不過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9頁）毛澤東本人在《論持久戰》中也說過：“戰爭的目的，就是戰爭的本質，就是一切戰爭行動的根據，從技術行動起，到戰略行動止，都是貫徹這個本質的。戰爭目的，是戰爭的基本原則，一切技術的、戰術的、戰役的、戰略的原理原則，一點也離不開它。”我們是否可以比貓畫虎，做成如下的改述：“大躍進的目的，就是大躍進的本質，就是大躍進中一切行動的根據，從技術行動起，到戰略行動止，都是貫徹這個本質的。大躍進的目的，是大躍進的基本原則，一切技術的、戰術的、戰役的、戰略的原理原則，一點也離不開它。”

張顯揚在《毛發動文革，生前防篡權，死後防鞭尸》一文的結尾說：

“我說了那麼多，中心的意思，就是決不要用理想主義的眼光去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要掉進人家的思維模式。這裏沒有任何理想主義的東西，有的祇是赤裸裸的、血腥的權力鬥爭。”（《開放》雜誌2006年5月號）

其實，毛澤東權欲熏心的、極度惡劣的的本質，早在延安時期，莫斯科派來的、以記者身份作中共太上皇的弗拉基米洛夫就對之洞若觀火。他在1944年12月25日的日記中寫道：“毛通過拼命奪權來壓制每一個人。他的全部‘理論’，祇不過是爲這種一直縈繞心頭的目的打掩護而已……毛澤東平時從來不閱讀馬列著作，祇是研究中國古代史書和小說中的權術鬥爭……毛澤東根本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個喜歡說粗話和隨地吐痰的狡詐的農民，儼然就是掌握了所有人生殺予奪大權的皇帝。”1945年6月26日寫道：“毛澤東的主要目的，是不惜一切代價地要在這個國家奪取政權。

他之所以對黨有興趣，祇是因爲黨能保證他奪到這個權力。”

根據馬克思關於人的創造是其本質對象化的原理，我們說，毛澤東有多麼惡劣、凶殘、瘋狂，他的創造——大躍進就有多麼惡劣、凶殘、瘋狂！反之，也然。

最後，我們再來聽聽他的自鳴得意之詞：“現在看來搞十幾億人口也不要緊，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國來糧食也够用。將來我們要搞地球委員會，搞地球統一計劃，哪裏缺糧，我們就送給他！”螞蟻打哈欠——口氣可不小，毛澤東要以管理地球爲己任了。

#### （四）敵歟？我歟？試析毛澤東實踐中的“兩類矛盾”

奪權和保權自始至終是毛澤東在政治上認識問題和處理問題的內在尺度，對外（即毛所謂的“敵我矛盾”）服從于對內（內部矛盾）。因爲奪權的關鍵是取決于在“窩裏鬥”中取勝，所以誰跟他到一個“窩裏”、他就跟誰鬥。

##### 1. 在國共結成“抗戰的內部”時，他就要假日滅蔣、讓日本多占地

“要冷靜，不要到前綫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本的正面衝突，繞到日軍後方去打游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建立抗日游擊根據地，要千方百計地積蓄和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對政府方面催促的開赴前綫的命令，要以各種借口予以推拖，祇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要趁着國民黨與日本人拼命撕殺的天賜良機，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領中國的大好時機全力壯大，發展自己，一定要抗日勝利後，打敗精疲力盡的國民黨，拿下整個中國。”（毛澤東在1937年8月在陝北洛川會議上的講話摘要）

#####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寫道：

他（毛澤東）認爲日本軍事勢力遠勝中國，抗戰絕無幸勝之理。前此中共強調武力抵抗日本，並不是認爲就此可以打勝，而是爲解決國內矛盾所必需……

他（毛澤東）警告會衆不要爲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綫去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危害，將遠過于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他主張八路軍應該堅持游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的後方去打游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

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游擊根據地。（《我的回憶》1296頁，明報月刊出版社，1974年）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說：主動出擊日軍是幫了蔣介石。當時是共產黨、國民黨和日本人三國鼎立，我們就是要讓國民黨和日本人鬥個你死我活，而我們從中發展壯大。一些同志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百團過早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了日本軍對我們力量的注意；同時，使得蔣介石增加了對我們的警惕。”（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186）

1941年初，發生了“皖南事變”。這可使毛澤東假日滅蔣、又假蔣滅項，表現了駕馭“兩類矛盾”得心應手的高度藝術。（項英，新四軍副軍長兼政治委員，是毛澤東視為異己）需要補充一筆的是，國軍為江北行動中陳毅（黃橋戰役）和劉少奇（曹甸戰役）的二次行動（經毛澤東批准的）所激怒；這是皖南事變發生的最為直接的原因。

1942年到1945年間，弗拉基米洛夫作為共產國際的聯絡員被派駐延安。在他死後，其子整理出版了他的《延安日記》。他的日記裏記載着對毛澤東較為真切的就近觀察。1942年6月17日，他寫道：“我看，中共領導人希望得到武器，並不是為了向侵略者展開武裝鬥爭，而是為了同國民黨鬧摩擦。這使東京的人感到多麼高興呀！”

1942年7月9日：中共部隊對目前日本掃蕩其占領區的行動不作抵抗，他們撤上山去或者渡過了黃河。

中共領導把國民黨看作是主要敵人，不遺餘力地要奪取中央政府控制的地盤，用各種手段來達到目的。

弗拉基米洛夫在1943年10月19日的日記中，對蔣介石和毛澤東作了如下的比較，認為他們“都為權欲迷住了心竅”，但兩人仍有本質的不同，“如果說，一個是在重慶公開這樣幹，但至少他還在抗拒外國侵略；而另一個却忘記了自己國家的榮譽和苦難，欺騙了黨，毀了受到愛戴的黨的領導人。”

1944年10月14日：中共毛澤東搞分裂是日軍獲勝的主要原因。這並不是國軍的戰鬥力問題。這種分裂是中國不祥的現實。而且這種分裂顯然有利于日本軍國主義者。毛澤東分裂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無異于為日本侵略中國如虎添翼。

無論如何也要削弱蔣介石，這就是中共領導所採取的政策實質。讓日

軍占領中國的土地、燒毀中國城市去吧！

1945年8月15日：日本的投降使中共領導感到沮喪，在他們看來，日本應該還能防守好幾年（無論如何，起碼是兩年）。

可以互為印證的是，毛澤東的談話與此如同出一轍：“（抗戰勝利後國共和談期間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是爲了爭取時間，準備奪取政權。日本投降早了一點，再有一年我們就會準備得更好一些。’（1959.8.17毛澤東的一次講話，《學習資料（1957～1961）》第260頁，清華大學，1967）。

再者，與此前後、遙相呼應的是，毛澤東曾屢次親口向日本政界領導人士說出不勝“感謝”涕零之至一類的話。

## 2，在共黨內部，他還曾利用國軍消滅張國燾

我們來看毛澤東是怎樣借國民黨的軍隊來消滅張國燾的軍隊的？司馬璐在《中共歷史的見證》中寫道：

張國燾原來打算西進，紅四方面軍遇黃河對岸大雪封山，祇好北上。9月13日，“毛派”中央電張國燾表示“十分佩服與歡慰”。10月一四兩個方面軍在貴寧會合。周恩來趕到同心城局“歡迎”張國燾，隨後就挾持張國燾于旺堡，再轉保安。毛周又以張國燾的名義調動四方面軍，直接指揮徐向前、陳昌浩繼續“西進”，待九軍、三十軍相繼渡河後，毛又電令其餘部隊留原地迎敵，因此，已渡河的紅軍陷于孤軍苦戰。11月10日，中央軍委將河西紅軍正式命名爲西路軍。建立河西根據地，打通新疆，連接蘇聯，原是張國燾的構想，爲毛周所反對。現在這個張國燾的“西進路線”却成爲毛周用來消滅四方面軍的手段。1937年3月，渡河的紅軍從兩萬兩千人，打到祇剩幾百人逃到新疆。張國燾留在陝北不斷接受批鬥，毛周連手打倒張的目的總算達到了。（頁513－514）

司馬璐還說，組織上對我們說：“當發現一個同志不可靠的時候，最好是能通過敵人的手把他幹掉。這是一舉兩得的事，既可以爲我們組織上除去隱憂，又可以增加我們的政治宣傳數據。否則的話，祇好我們自己動手了。”（頁126）

## 3，過河拆橋，恩將仇報：昨日的功臣，今日的禍首

1927年10月，毛澤東領導的秋收暴動失敗，決定上井岡山。山上有兩支以王佐、袁文才爲頭目的土匪隊伍。毛對他們做工作，山盟海誓：“上有

天，下有地，我們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我毛某如違此誓，天誅地滅。你們今後有什麼問題，我毛某赴湯蹈火……”

1930年2月20日，王佐、袁文才被通知參加軍事會議，就被扣押、審問。王佐說：“要整老子啊，我要找毛委員。”審問員說：“毛委員說你們目無組織。”袁文才說：“你們過河拆橋啊。”審問員立刻拔出手槍，袁文才應聲倒下。王佐逃出，才發現橋已被拆了。他大叫一聲：“毛委員，你好狠！”縱身一躍，淹死在河裏。因他兩的牽連而被殺者有500多人。毛殺了他的恩人也是心腹之患的袁文才、王佐以後，就成為閩贛蘇區的最大力量。（司馬璐《中共歷史的見證》，頁437-438）

下一個是槍殺江西紅軍最早的創造者李文英。毛澤東說：“我早就知道，AB團就在共產黨內，就在江西省委，AB團的頭子就是李文英。”（同上，頁445）這個事件，我在《〈矛盾論〉與論矛盾》一文中已有詳述。共產黨的黨史專家承認，死于共產黨窩裏鬥的同志遠比死于敵人手裏的為數更為巨大。

至于彭德懷、劉少奇、陶鑄、林彪、周恩來等的下場，已是人們耳熟能詳，無須贅述了。唯張戎在《鴻》一書中記載她父（中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母（中共區委宣傳部長）的一席談話，表明老幹部的徹悟；毛的神龕在他們心目中倒塌了，頗有意思：

“文革是用血腥的手段來擴增毛澤東個人的權力。”父親說這番話時說得很慢，字字斟酌。

我母親問：“毛主席不是很寬宏大量嗎？他都能容得下溥儀，為什麼要把那些與他一起出生入死，打下江山的戰友置之死地呢？為什麼他對這些人就如此狠心呢？”

父親很激動，但却平靜地說：“溥儀嗎？他是個罪人，早已被老百姓唾棄了，留下他，他能復辟嗎？但是……”他停住了，意味深長地看着母親。母親理解他的意思……不過她仍不解地問：“為什麼讓我們這些下面的人受大罪呢？為什麼要害這麼多無辜的人呢？又為什麼要造成這麼大的混亂呢？”

父親說：“可能毛主席覺得他不把整個世界翻個底朝天就達不到目的……”父親沉默了一會兒又說：“……他為了個人權力，讓國家和人民遭受這麼大的災難，肯定是錯的，簡直就是犯罪！”（頁266）

這裏還需稍加說明的是，毛用癌細胞讓周死在他之前，說明毛不僅要在

生前抓權，而且打好了死後抓權的如意算盤。

#### 4. “反右派”算是“窩裏鬥”還是“窩外鬥”？

如果說《矛盾論》是鬥爭哲學的結晶，那麼，《正處》就是“窩裏鬥”的結晶。後者是專為反右而量體裁衣的。右派作為一個群體，是知識分子，包括共產黨內的，但主要是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他們在政治上的特點是維護民主，具體說，擁護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聯合政府和反對蔣介石獨裁政治。他們都鑽進了“反蔣統一戰綫”這個窩裏。他們在反蔣鬥爭中為中共奪權火中取栗，在人力、物力、財力方面立下汗馬功勞，有的人（如李公樸、聞一多等）獻出了生命，可毛澤東却在謀劃解散民主黨派，對其成員（包括李公樸、聞一多）都歸類為“民主個人主義者”。毛在評美國國務院白皮書和艾奇遜的信件中就曾說道：“他們的頭腦中還殘存着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們不是國民黨反動派，他們是人民中間的中間派，或右派。他們就是艾奇遜說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的欺騙做法在中國還有一層薄薄的社會基礎。”（《毛澤東選集》四卷本：頁1374）

“右派”是“人民中間的中間派”，所以處理右派的原則是所謂：“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而所謂“兩類矛盾”者，竟是這樣一種鬼把戲也。無怪乎有的老師對反右表示憤憤不平，認為這是過河拆橋、卸磨殺驢，對不起朋友。其實，毛澤東何曾對得起任何人！別說朋友，也別說同志，甚而至于也別說親密戰友，就連自己的一個個親人，他都是冷血以對。如，楊開慧為他在政治和愛情上作出壯烈犧牲，他却在她就義前二年半就冒着重婚罪與18歲的賀子珍“由同志的愛變為夫妻的愛”了。這就是毛為什麼拒絕開慧上井岡山，也拒絕營救她的原因。毛和楊的共同同學蕭瑜在《和毛澤東一起行乞》一書中更是明確指出：“是潤之殺了開慧。”（《毛毛蟲害花——毛澤東害死了楊開慧》）賀子珍悲慘的下場是，在生理、心理雙重糟蹋下變成了神經病；江青的下場也不妙，最後在政治上毛把她當成一祇惡犬，叫她咬誰、她咬誰。由于毛堅信“權中自有黃金屋，權中自有顏如玉”，于是在全國大修行宮，遍找妃子，江青就過上了“共產共夫”的美好日子。毛澤東以身作則，把對矛盾原理的運用，可以套在《中庸》上的、對“中庸之道”所說的話，並改述如下：“兩類矛盾，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 乙：考證

### 一，毛澤東的“雙百方針”考

整風，從任何意義上說，從動機到目的、從起因到結果，一以貫之、一以蔽之，都是反右。按毛澤東抓住和解決主要矛盾的說法，就是“興無滅資”。整風用來整“三害”，實質是滅資，毛澤東說“三害”要掛在資產階級賬上；整風用來整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右派），就是讓學生把關，他們人人過關；整風用來整“反冒進”，就是反右傾；右傾、右派在毛澤東詞典裏是以五十米笑百米。不管轉多大圈子，歸根結底還是反右派。但，轉的這個圈子，却大有名堂，曰：“引蛇出洞”。用什麼手段“引蛇出洞”呢？又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過癮的說法是：“大鳴大放”。所以，研究反右派運動，首先要弄清“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來龍去脈，乃是思維邏輯的必然要求。

#### （一）由“四字方針”到“八字方針”

1942年10月，“魯藝”的平劇研究團（平劇即“京劇”）與八路軍120師的戰鬥平劇社合並後成立的“延安平劇研究院”，提出了改造京劇的主張，毛澤東爲之題詞：“推陳出新”，這四個字成爲後來戲曲改革的指導方針。

1943年底《逼上梁山》演出成功，1944年1月9日，毛澤東在第二次觀看此劇後，給編導者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稱贊此劇是“舊戲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毛澤東在信中還說：“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着舞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黃修己《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中國青年出版社，1988）

“推陳出新”的意思，就是排除舊事物中的糟粕，取其精華加以發揚、創新，構成新事物。

典故出自：當年韓信剛投奔劉邦時，劉邦讓他管理糧倉，韓信提出了“推陳出新”的管理理念，即把糧倉開設前後兩個門，把新糧從前門運送進去，把舊糧從後門運出來，這樣可以防止糧食在蜀中炎熱潮濕的環境下腐敗變質。從而使蜀中糧倉不再有變質浪費的現象，這無疑是倉儲管理史上的創舉。

1951年，毛澤東應梅蘭芳之請，為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題詞，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八個字。“推陳出新”這四個字，毛澤東在延安就為平劇研究院題過，“百花齊放”這四個字，是這次新增的。毛澤東後來在政治局擴大會議那次決策會議上敘說過這個過程：“‘百花齊放’是群眾中間提出來的，不曉得是誰提出來的。人們要我題詞，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當時座中有人說，是周揚提出來的。據說，周揚對人說，“百花齊放”是戲曲會議上提出來的，他認為很好，向毛澤東報告了。在延安，“推陳出新”還祇是向平劇（京劇）界提出，1951年，“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八個字，就是向所有劇種、向整個戲劇界提出了。但還沒有明確地推向整個文藝界。

章詒和在《人生不朽是文章——懷想張庚兼論張庚之底色》中說：

在我記憶中，他（張庚）是第一個講述寫作提綱的。其中的許多見解，令我震驚。比如，對官方制定的“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戲曲方針的看法。他說：“在我們黨的各種文藝政策裏面，毛主席為戲曲藝術制訂的‘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是比較正確的。但在貫徹過程中，問題往往出在對‘新’與‘陳’理解上。理解的錯誤、片面，不僅出在底下的文化部門，也出在我們的這些人的身上。我可以舉個例子來說明。五十年代初，我和戲劇界的朋友組成中國戲劇家代表團到蘇聯訪問。大家熱情很高，都想看看社會主義藝術是些什麼樣的作品。到了莫斯科安頓下來以後，給我們看的第一個劇目是芭蕾舞《天鵝湖》。接着又連續看了莫索爾斯基的歌劇《鮑利斯·戈東諾夫》、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以及契訶夫的《海鷗》。一連幾天下來，看的都是沙俄時代的東西，大家感到很奇怪，到了第四天，終於忍不住了。便去問蘇聯的文化部長：‘什麼時候可以讓我們看看你們國家的社會主義藝術作品？’部長很奇怪我們的提問，說：‘請你們看的所有節目，都屬於社會主義作品。’我們十分不解，又問：‘這些作品不都是創作于沙俄時期嗎？’‘是的。’部長說：‘是沙俄時代的作品，但是，今天被我們拿過來了。祇要拿過來了，那就屬於社會主義文化。’這番講話給我們以很大的啓示——說明



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當有一個無比廣闊的胸懷。”張庚由此聯系到中國戲曲的“推陳出新”方針的貫徹情況。他說：“和蘇聯相比，我們對政策的理解就偏狹得多，總認為社會主義文化應該是全新的，也就是說唯有今人創造的作品，才有資格進入社會主義文化領地。而從前的東西，包括《西廂記》、《紅樓夢》在內，不管怎麼優秀，都屬於封建文化性質，或者說是封建文化中的精華部分。抱着這樣的觀點去理解“推陳出新”的“推”字，勢必是推掉，推倒，推光。而且，永遠也推不完了。因為昨日之新，乃今日之陳，而今日之新，又為明日之陳了。

## （二）由“一百方針”到“雙百方針”

“百家爭鳴”最初的提出，則是在1953年。當時，對中國奴隸社會何時向封建社會轉變的歷史分期問題，兩位著名的歷史學家郭沫若和範文瀾，有不同的意見和熱烈的爭論。當時的中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主任陳伯達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說要百家爭鳴。陳向歷史研究委員會傳達了，第二年創辦《歷史研究》雜誌，也以此作為辦刊的方針。這件事，歷史學界幾位黨內主要領導人大概是知道的，在歷史學界外一般還不知道。（龔育之《龔育之的回憶“閻王殿”舊事》江西人民出版社）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論十大關係》的報告：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中國共產黨在討論十大關係過程中確定的關於科學和文化工作的指導方針。

4月28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指出：講學術，這種學術可以，那種學術也可以，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勢必就會越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看這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

在5月2日的會議上，毛澤東又講到：現在春天來了嘛，一百種花都讓它開放，不要祇讓幾種開放，還有幾種不讓它開放，這就叫百花齊放。他還說：百家爭鳴是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代，兩千年前那個時候，有許多學說，大家自由爭論，現在我們也需要這個。他指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範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干涉他們。

5月26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在中國科學院和中國文學藝術聯合會召開的會議上作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這是中宣部長代

表中央所作的報告，是最初的、比較系統地闡明這個方針的報告，是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一篇報告。他指出：要使文學藝術和科學工作得到繁榮發展，必須採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我們所主張的這一方針，是提倡在文學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在學術和討論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麼特權，以“權威”自居，壓制批評，或者對資產階級思想熟視無睹，採取自由主義甚至投降主義的態度，都是不對的。

6月13日，《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了陸定一這篇長達一萬五千字的報告。報告一開始就說：“中國共產黨對文藝工作主張百花齊放，對科學工作主張百家爭鳴，這已經由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宣布過了。”

中共八大，確認了“雙百方針”，寫進了政治報告和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從而使這個方針成為中共的全國代表大會這個最高領導機關的決策，而被確定為共產黨指導科學和文藝工作的基本方針。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中講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於藝術和科學的發展。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採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為了判斷正確的東西和錯誤的東西，常常需要有考驗的時間。歷史上新的正確的東西，在開始的時候常常得不到多數人承認，祇能在鬥爭中曲折地發展。”還說：“對於科學上、藝術上的是非，應當保持慎重態度，提倡自由討論，不要輕率地作結論。我們認為，採取這種態度可以幫助科學和藝術得到比較順的發展。”（《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8-389頁。）

右派中的有識之士，早已戳穿了毛澤東“雙百方針”的人治本質。諾貝爾物理學獎金獲得者李政道的老師、東星北教授在山東大學舉行的座談會上說：“鳴”“放”的問題其實在3年前就已經解決了，憲法，就是1954年黨領導人民制訂的根本大法，第八十七條上明白的寫着：“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國家供給必需的物質

上的便利，以保證公民享受這些自由。”（本書第三篇，“東星北的右派言論”）毛澤東這個人極不文明，動輒罵人“放屁”。本來是他動員黨外人士鳴放的，他却又罵人家鳴放是“放屁”、“放臭屁”。祇有說話不算話才叫“放屁”，如事先保證鳴放“言者無罪”，最後却是“引蛇出洞”，“誘敵深入，聚而殲之”，這才是貨真價實的“放屁”。就算毛澤東說話算話，在鼓噪“雙百方針”這一點上，也是放屁。因為有憲法在，祇用認真執行就比提倡“雙百、雙千、雙萬方針”都強。所以，把憲法放一邊而來鼓噪“雙百方針”，即便是真心實意而不是“陽謀”，那也無此必要，那也祇能說是“退了褲子放屁”。

### （三）由雙“百”方針到二“大”方針

“雙百”方針是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是領導國家的基本方針。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不但是使科學和藝術發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廣之，也是我們進行一切工作的好辦法。這個方法可以使我們少犯錯誤。有許多事情我們不知道，因此不會解決，在辯論中間，在鬥爭中間，我們就會明了這些事情，就會懂得解決問題的方法。各種不同意見辯論的結果，就能使真理發展。”（《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15-416頁）“推而廣之”云云，這話是毛在1957年3月12日說的，到了10月13日他又說：“感謝右派，‘大’字是他們發明的。我在今年2月27日的講話中，並沒有講什麼大鳴，大放，沒有這個大‘大’字。去年5月我們在這裏開會講百花齊放，那是一個‘放’，百家爭鳴，那是一個‘鳴’，就沒有這個‘大’字，並且是限于文學藝術上的百花齊放，學術上的百家爭鳴，後來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麼問題都要鳴放，叫做鳴放時期，而且要搞大鳴大放。”（同上，485頁）。至于那些“大”字，他在本篇的第一句就說：“現在整風找出了一種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是群眾創造的一種新形式。”（第480頁）中間又說：“北京三十四個大專院校，開了很多會才放開。爲什麼可以不怕？爲什麼放有利？大鳴大放有利，還是小鳴小放有利？或者不鳴不放有利？不鳴不放是不利的，小鳴小放不能解決問題，還是要大鳴大放。”（同上，第481頁）。現在已經一目了然，昭然若揭。到底鳴放是“右派要涉及政治”，還是毛要“推而廣之”？“大”字是“右派發明”，還是“群眾創造”？是右派“要

搞大鳴大放”、猖狂進攻，還是“開了很多會才放開”？毛在這些問題上都不打自招。我看了最近出版一本書，名叫《翻雲覆雨毛澤東》，這些典型的例子，有待收羅進去。

其實，他整風預定的步驟就是：“大鳴大放階段（邊整邊改），反擊右派階段（邊整邊改），着重整改階段（繼續鳴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評反省、提高自己階段，這是中央、省市、地、縣四級整風的四個必經階段。”（同上，第 465 頁）

### （四）由“百家爭鳴”到“祇有兩家”

毛澤東說：“我們提倡百家爭鳴，在各個學術部門可以有許多派、許多家，可是就世界觀來說，在現代，基本上祇有兩家，就是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或者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或者是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共產主義世界觀就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它不是任何別的階級的世界觀。我們現在的大多數的知識分子，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是從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農民的家庭，但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409 頁）這裏，毛澤東把所有的不論家庭出身好壞的知識分子，都打入資產階級的行列，當然都屬於資產階級這一家，按毛澤東的理論，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又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顯然，百家，一下子變成了兩家，所謂“百家爭鳴”，就勢必成爲一種不可設想的尷尬局面了。

許信良先生當讀到毛澤東在 1957 年元月在省市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時，覺得這時毛已布置好要反右，後來號召鳴放祇是陰謀而已。“同時，他（毛）還泄露了‘雙百’方針的天機：‘毒草，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祇能處在被統治的地位。’在他心目中，馬克思主義以外的九十九家，永遠祇能充當順從的被統治者，如此‘百家爭鳴’，無異于雙簧滑稽劇。”（本書第三篇《李慎之、許信良、劉賓雁的後見之明》）

### （五）由“齊放”到“獨放”

既然是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毛澤東當然就不會允許你兩家平等地“齊放”了。

果不期然。“斯諾笑了，很自然地問起了中國的現行政策，並且問到了中國的‘百花齊放’和反右派鬥爭。”毛澤東對他講：

你說我們停止了百花齊放，那是傳言，事實上我們並沒有停止。我們主張社會主義的百花齊放。我們從開始就是這樣的，不是說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都可以“齊放”。（《歷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澤東》）

但他原來《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是這樣講的：“領導我們國家可以采取兩種不同的方針，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于說話，敢于批評，敢于爭論；不怕錯誤的議論，不怕有毒素的東西；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批評批評者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不是壓服，而是說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許人家說不同意見，不許人家發表錯誤的意見，發表了就一直打死。”他認為，“放有百利而無一害；而收是錯誤的，不是解決矛盾的辦法，而是擴大矛盾的辦法。”（同上，第414—415頁）這其中講的“放”是什麼意思？如果指的是“我們主張社會主義的百花齊放。”“不是說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都可以‘齊放’。”那麼，“收”又是什麼意思呢？別難為老人家了，再把這一例，也暫時存而不論，隨後也加入到《翻雲覆雨毛澤東》一書裏好了。

鄧拓先生早看透了毛的“雙百”把戲，告訴胡績偉：“主席說百家者兩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講的雙百方針是假的，《人民日報》不能學《光明日報》、《文匯報》那樣鳴放，學了要出亂子。”（《爭鳴》2001.4）

赫魯曉夫和許多中國人一樣，看出來：“百花齊放這個口號是個激將法。毛假裝把民主和自由發表意見的閘門開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們把自己內心深處的想法用口頭或書面的形式發表出來，以便他能夠把那些被他認為是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赫魯曉夫《最後的遺言》頁417）

任何一個事物，如果你把它孤立起來，就變成不可理解的了。如果你要理解它，就要把放回原始的縱橫聯系中。“雙百方針”的出爐，是在蘇共20大赫魯曉夫揭出斯大林問題之後，毛鑒于“蘇聯現在不搞對子，祇搞‘單幹戶’，說是祇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認社會主義國家中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存在。事實上無論哪個國家，都有唯心主義，都有形而上學，都有毒草。蘇聯那裏的許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義出現的，那裏的許多怪議論，都戴着唯物主義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帽子。我們公開承認唯物主義和唯心主

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香花和毒草的鬥爭。”（《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 346）“但是，他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現，那就祇好讓它放，這樣才有利于對它進行鑒別和鬥爭。”（同上，頁 338）“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同上，頁 333）

這樣加以聯系，可以看出什麼問題呢？其一，毛澤東老謀深算。論城府之深，遠非蘇聯人能望其項背；其二，而毛上述那些話，正好是對赫魯曉夫的論斷來了一個實證。

毛提出整風是在國際上發生匈牙利事件之後，國內工人罷工、農民退社、學生鬧事、知識分子要求解凍。毛提出整風是對此“多事之秋”的應對。怪事年年有。而令人怪上加怪的是，整風之意不在整風，而是把吃奶的勁兒集中在號召黨外人士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上。最後整的是“幫助整風的人”，就像是出殯、埋了送葬的人。鄧拓看出真相，不得好下場，卒以自殺演了一出“楊修之死”。

### （六）由“百家爭鳴（ming）”到“九十九家爭鳴（wu）”

在大鳴大放期間，據我的視野所及，徐懋庸的雜文寫得最多、最好。他有一篇是諷刺幹部不學無術的：那時，中共剛開過“八大”，上級布置學習“八大文件”，他傳達成：“學習八個大文件”；上級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ming）”，他傳達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wu）”。結果，倒真成了“百家爭鳴（wu）”，百家都嗚嗚地哭了起來。不過，準確地說，應該是“九十九家爭鳴（wu）”才對。

“文化大革命”初起，彭真主持的《二月提綱》中提出，對學術問題應平等討論。他說：“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本來也是本着毛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基本精神。怎會料到毛竟會惱火得火光衝天呢？請看他在《五·一六通知》中，寫的這一段話：

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消除資產階級鑽進共產黨內打着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麼平等嗎？……他們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同資產階級、帝

國主義一道，堅持資產階級壓迫、剝削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他們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絲毫談不到什麼平等。因此，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祇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不能是什麼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而不能是什麼別的關係，例如所謂平等關係、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係、仁義道德關係等等。（1966年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

這就是雙百方針的最終歸宿。爭鳴本來是讓說理的，現在成了你死我活的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壓迫、獨裁或專政的關係。青面獠牙代替了甜言蜜語；“他們這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代替了57年說的右派分子，在文革中一個個遭受浩劫；曾經曇花一現、隨即轉瞬即逝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鳴春景象，代之以被紅衛兵修理得趴倒在地、又踏上一祇腳，口中念念有詞：“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嗚呼哀哉求饒命！

## 二，毛澤東“引蛇出洞”考

如果說陰謀就是陰謀家的本質屬性的話，那麼，引蛇出洞就是陰謀家毛澤東施展的陰謀中慣用的伎倆之一，直到壽終正寢之前，他總是在故伎重演。

“引蛇出洞”，是反右運動中產生的，並且至今仍是與反右運動相提並論的一個短語，也叫“釣魚”，源于過去軍事上的“誘敵深入，聚而殲之”。雖然此說廣為流傳，“但是遺憾的是，‘引蛇出洞’這四個字，我竟至今還沒有找到出處。”李慎之先生寫道：“我的印象是：反右開始以後不久這個說法就已流行了，而且好象並沒有什麼忌諱。有人說這話是毛主席自己說的，所以大家才敢說。事實上省委書記一級人物同類說法倒不難找到，不過這就算不得‘第一手材料’了。看來祇有等將來檔案解密以後，未來的史家再去努力，義山詩不雲乎：‘武皇內傳分明在，莫謂人間總不知’。”（《毛主席是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

“毛澤東藉‘鳴放’引蛇出洞”；這是已經“解密的反右派運動檔案”

中唯一的有關記載，說明此說大有來頭，絕非空穴來風，同時，下面的“檔案”也提供出一個引蛇出洞的輪廓，但却仍無法確定，此“說法”像“釣魚”、“陽謀”一樣，就是出自毛之口。

### 附錄：“解密的反右派運動檔案”

1956年11月10日至15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14日晚，毛澤東提出臨時發言，他在會上說：“東歐一些國家不斷在政治上混亂，基本問題是領導層沒有階級鬥爭觀念，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新老反革命沒有搞掉，這方面我們要引以為戒。（注1）……我敢說，我們黨內也有階級鬥爭。（注2）”

注1：既然有“那麼多新老反革命沒有搞掉，這方面我們要（怎樣）引以為戒”（呢？）。當然是有反必肅，是“搞掉”。然而“肅反”與“反右派”又是什麼關係呢？薄一波說：“反右開始後，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指出，‘反右派就是肅反’，‘新式肅反’，是‘清黨清團的好機會，也包括各民主黨派’。”（《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622）原來毛澤東至少在1956年11月14日晚，已經把預備請來幫助黨整風的人，當成了“新老反革命”而予以“搞掉”，無怪乎，他上前就用“引蛇出洞”和“誘敵深入”等，這些對敵鬥爭的毒招，來對付他們了。現在大家都清楚了：原來毛千方百計發動大鳴大放，祇是“肅反”的前奏；曲調優美，祇是為了取得“肅反”效果！

我在前面所引證的王若水說的，毛澤東在1956年下半年就着匈牙利事件得出與劉少奇大異其趣的結論，就埋藏下1957年的“殺機”；“殺機”是1956年埋下的！這一點，薄一波在具體方面應該知道的更清楚，他為什麼至今仍不說實話，反而在他的回憶錄的“從整風到反右派的轉變”一節中，掩蓋真相，重復過去濫透了的謊言呢？——

在整風初期，我們黨為了改正自己的缺點錯誤，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誠心誠意（？）地歡迎黨外人士幫助我們整風，虛心聽取他們的各種批評和意見。但是，不料（？）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利用幫助黨整風的機會，殺氣騰騰（薄是鄧的“殺氣騰騰”派），向黨向社會主義發動了猖狂進攻（又攀附毛的“猖狂進攻說”，但薄對他們黨內的歷史學界一再申明的“那時候根本不存在猖狂進攻”，却頑固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欺騙和煽動一部分人，掀起了一股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潮。例如，他們把共產



黨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領導地位攻擊為“黨天下”，說什麼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都要安排一個黨員作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請問：不是這樣嗎？還是就應該這樣？）。他們公然反對共產黨執政，鼓吹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輪流執政”（又叫“輪流坐莊”——原注），說什麼“一黨執政有害處”。“如果不要共產黨一黨執政，而要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通過競選來輪流執政，由各黨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綱來，由群眾自由的選擇，這就好得多”（不是這樣嗎？還是就應該一黨專政？）……他們全盤否定我們黨進行的歷次政治運動（當你寫這幾行時，你們黨自己已經全盤否定了幾個運動？部分否定了幾個運動？你在運動中害過人嗎？受過害嗎？），說什麼“過去幾個大運動，都是共產黨整人”（不是這樣嗎？還是就應該這樣？），“肅反是對人類道德的進攻，對人類心靈的摧殘”（不是這樣嗎？還是就應該這樣？肅反整不到你頭上，你當然沒受過那個洋罪。文革中把你打成叛徒，可能對你的心靈予以莫大的慰藉吧？你們黨鄭重其事地下結論：“徹底否定”“我們黨進行的歷次政治運動”之一的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與“全盤否定”，孰輕孰重？你是不是還留戀那些可愛的政治運動？既然政治運動這麼大得人心黨心，你們黨為什麼要宣布不再搞政治運動？當然我知道這是偽善，是欺騙，但是，“偽善”畢竟是“真惡”向“真善”的投降，雖然是詐降。作為被打過右派的人，當然更知道：詐降的目的是“誘敵深入，聚而殲之”。）他們把矛頭直指黨中央、毛主席，說什麼“三害”“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裏挖”（你說應向哪裏挖？還是不挖？），“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這可是老和尚自己在天安門城樓上，為引蛇出洞說的話呀！你說說，說這話該當何罪？你這個候補政治局委員豈是要揭發你們的黨主席是男盜女娼不成？）……等等，等等。總之，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說得一塌糊塗，一無是處，公開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並認為時機到了。這種情況，是我們黨在決定開始整風時所沒有預料到的。（你是個雙料的不說實話者！一是你們黨主席預料的，比這嚴重得多；二是你說的這全是誣陷栽贓，你所指的這些“言論”，在你們決定反右時根本尚未出現。不信，你去查當時的報紙。）……當各種座談會和社會上陸續出現

一些激烈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時，引起毛主席的極大警覺。5月15日，他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頁611-612）

呀呀呀！真是胡說八道。前面我已指出過100遍，現在再101遍地指出：如上言論，不論正確與否，激烈與否，殺氣騰騰與否，都發表在5月15日之後！你們振振有詞，決定要反擊的是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而鐵的事實是，你們認為的“猖狂的進攻”，這時候全然無有，需待以時日才會出現，作出“預支”式的反擊，這不是太滑天下之大稽了嗎？這種荒唐，是由于薄政治局候補委員太想為自己的黨主席的預設陰謀遮醜，而昧着良心嫁禍于人，才造成這種不顧事實的胡扯。

其實，按着這個“解密的檔案”的話實說：“毛澤東藉‘鳴放’引蛇出洞”。這樣一來，就一切都順理成章，絲毫不費周折，省得現在政治局候補委員為了替主席擦屁股，弄巧成拙，弄成了西瓜皮擦屁股——膩擺不清。

注2：“我敢說，我們黨內也有階級鬥爭。”這句話在此後的5月15日的應驗是：“我黨有大批的知識分子新黨員（青年團員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確實具有相當嚴重的修正主義思想……他們跟社會上的右翼知識分子互相呼應，聯成一起，親如弟兄。”

在6月8日的應驗是：“黨政基本上不潰亂，祇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原注），利益極大。”

最後應驗在文革中就是：“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

劉少奇在會上補充發言，說：“毛澤東同志的講話是他個人的意見，中央政治局沒討論過，會議要備案。”（注3）

注3：我的理解是，這都是毛澤東的個人動作。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會議進行了3天。毛澤東提出：“革命時期大規模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鬥爭要幾經反覆，還要持續50年、100年。你們信不信？我看，坐在主席團上，也有不信的。”（注4）

注4：應該將毛澤東篡改原稿的過程和陰險的、醜惡的用心，一並公之于衆。例如，當年我聽到的傳達稿上有：“官大也救不了你！斯大林官大不大？活着不受批判，死後也要受批判。”你聽這話多麼誠懇！你能說毛主席整風的決心不大嗎？所以，人們就會前撲後繼，紛紛上當。這裏的經驗教訓是，

聽毛澤東的話，也有個科學方法的問題，這就是，對他說的一切話，首要之點是審查其“真”與“假”的問題。在真假未辨之前，切勿輕信。其次才是審查他說的“對”與“錯”的問題。再次才是好不好的問題。這個次序萬萬不可顛倒。如上所說，毛說得不僅不錯，而且對得很！好得很！大得人心。可惜！可惜！是騙人的！在構成全部毛澤東思想裏，這類“對得很！好得很！大得人心，可惜！可惜！是騙人的”話，多得不可車載斗量，諸如：實事求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有一句是真的嗎？

### 毛澤東藉“鳴放”引蛇出洞

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注5）

注5：猴不上竿直敲鑼。

1957年4月11日晚，毛澤東和陸定一、陳伯達、康生談話。毛澤東說：“我贊成放，放得盡些，才能讓各階級都出來表現。不放，怎樣來辯論？放半年，不夠，放一年。左派要有準備。”（注6）

注6：首先要注意兩點：一是“放”的目的是“讓各階級都出來表現”，並無隻字提出：為幫助黨整風。二是，左派的對立面是右派。毛教“左派要有”什麼樣“準備”呢？矛頭指向什麼派呢？當面是毛號召鳴放，幫助黨整風；背後却是他交代：“左派要有準備。”現在檔案已經解密，難道還有人堅持還要硬說，或還要相信毛是誠心誠意要整風，這種鬼話嗎？其次是，你要特別注意這個日期：1957年4月11日晚。剛剛昨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管是明君、昏君、仁君、暴君，即便如希特勒、斯大林輩，也不曾設陰謀，定詭計去誘惑他治下的臣民、數以百萬計地丟掉進陷阱！這裏，我們正好用得着宣讀一項最高指示：“又何其毒也！”

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注7）

注7：人說，共產極權的統治是靠暴力和謊言，一點不錯。這個《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和毛澤東動員鳴放的種種言論，提供了謊言的絕好樣板。什麼“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什麼“幫助黨整風自願參加，自由退出”云云；統統成了狗屁。毛澤東的臉皮需要有多厚，才能厚顏無恥到撒這麼大的彌天

大謊而還能够臉不紅、氣不喘、心不慌地說：“這是陽謀。”無怪乎我在農村監督勞動的生產隊，有個農婦說：“毛澤東，臉皮厚，機關槍打不透。”豈但是說，老貧農隊長拉車往地裏送糞，高聲叫喊着罵：“老毛啊！我日你娘。”兩個青年社員為隊裏抬磚，邊走邊說笑：“給老毛去造磚墓。”這事發生在1962年，罵聲不絕于耳。我從前在知識分子隊伍裏，從未聽到過有人罵，更別說罵這麼痛快。

5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為什麼要整風？》的社論。毛澤東作了指示：“不要搞那麼多條條框框來束縛，要改。怕放，無非怕引火燒身。”（注8）

注8：“火”在“坑”裏，怎麼會“燒”着你們的”身”？整風這個火坑，祇是要讓那些幫助整風者往裏跳的。出殯，完全是為了埋葬送殯者。

5月2日至5月12日，全國各地召開28,250多次各類會議，向黨中央、各級黨組織、黨員幹部，提出了372,345五條意見、建議。（注9）

注9：我大致估計，平均每個支部絕對分不到一條意見。實在是：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 “一放，各階級就原形畢露”

毛澤東在《情況匯總》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階級就會表現出來，原形也畢露。共產黨執政還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萬條意見、錯誤、罪狀，那共產黨是不是該下臺？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岡山！”（注10）

注10：你姓毛的，如果怕提意見，就別求爺爺告奶奶，請人家提意見不就得了！這是不用下禁令，輕而易舉就能作到的嘛！

再說，這倒是個什麼樣的“一放”呢，竟使姓毛的要“重返井岡山”？雖然這是他慣用的虛張聲勢、危言聳聽的詭詐故伎，但表明他要與右派作一場定性為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却是早在事先就下了決心和作了安排的。而這時候，右派的重要言論還都未出臺呢！你去查查當時的報紙，雖經毛澤東千呼萬喚，可至今根本沒有一條鳴放是要共產黨下臺的。同時，毛澤東不是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嗎？這哪裏有“戒”、“改”、“勉”的一絲一毫的氣息呢？這比起你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來，簡直不可同日而語！甭提別的迫害了，單說脫褲子割尾巴，自辱人辱，挖思想根源、社會根源、歷史根源，鬧得人祖宗三代神鬼不寧，逼得人活不成、死不成，死活都得咎！你姓毛的“重返井岡山”，那姓“知”的又該“重返”什麼“山”呢？

5月13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討論局勢，意見分歧，但同意“要正確引導，要再觀察一個時期”。（注11）

注11：這裏透露出，直至5月14日的氛圍，仍不很緊張。否則，大家怎麼還會都同意“要正確引導，要再觀察一個時期”呢？

### 毛澤東寫《事情正在起變化》

5月15日，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此文送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閱，建議發至黨內17級以上幹部參閱。

17名政治局委員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羅榮桓、陳毅、李富春、彭德懷、劉伯承、賀龍、李先念；政治局候補委員為：烏蘭夫、張聞天、陸定一、陳伯達、康生、薄一波。

陳雲、李富春、劉伯承、張聞天四人閱後，沒有在毛澤東文章上批注意見或“已閱”。

毛澤東文章，在黨內分二個階段下達：第一個階段，發至十級以上幹部；第二個階段，再發至17級以上幹部。

毛澤東的《事情正在起變化》內指：“我黨有大批的知識分子新黨員（青年團員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確實具有相當嚴重的修正主義思想……他們跟社會上的右翼知識分子互相呼應，聯成一起，親如弟兄……社會上的中間派是大量的，他們大約占全體黨外知識分子的百分之70左右，而左派大約占百分之20左右，右派大約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況而不同。”“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注12）

注12：這裏充分暴露毛澤東急不可待地要實現自己的陰謀。這篇文章純屬克裏空。至少有兩位黨內歷史學家對毛持否定態度，一位是近代史研究所長黎澍，他說：“直到反右派開始時，也並沒有什麼資產階級猖狂進攻需要‘打退’。”另一位是中共黨史專家許全興教授在他的專著《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一書中說：“從整個報道看，很難得出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的結論。毛澤東根據什麼材料講‘猖狂進攻’就不得而知了。”（頁90）這簡直成了寓言故事中狼吃小羊了，什麼理也無需多講，吃的理由就是我要吃：“不

是你就是你爸爸，反正都一樣！”

### 中央發指示“反擊右派分子進攻”

1957年6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該指示稱：“這是建國以來，一場大戰，戰鬥是無烟、無光的，在黨的心臟展開。他們大多已在不同領導崗位，有一定追隨力量。”

1957年7月17日至21日，毛澤東決定在青島召開一次省市書記會議，會議討論了關於反右鬥爭的部署。會議期間的8月3日，毛澤東寫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勢》一文，作為黨內文件印發。毛澤東在青島會議上說：“匈牙利事件會不會在中國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5年、10年，也可能不用5年。納吉式人物有可能在會場內。”

這時，會場內有35張紙條遞上主席臺。大會主席周恩來當場宣讀了這些紙條。其中有支持毛的意見，並要求毛澤東能公開誰是納吉式人物；也有反對毛澤東這種無的放矢的觀點。

### 黨外人士對毛搞反右的異見

1957年5月30日，人大副委員長宋慶齡致信毛澤東主席，對全國範圍在黨內、民主黨派內、知識學術界展開反右鬥爭，表示十分憂慮、十分詫異、十分驚奇，要求對沒有行動“反黨”的右派、右傾人士，作不同意見的爭論處理。

1957年6月10日，人大副委員長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陳叔通，分別寫信給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信中都對展開反右鬥爭表示很不能理解。李濟深在信中寫道：在政治上出爾反爾、營造鬥爭氣氛、制造對立階層，會造成深遠創傷。

### 300多萬人被劃“右派分子”

1958年5月3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布：反右鬥爭取得階段性勝利，定性為右派集團22,071個，右傾集團17,433個，反黨集團4,127個；定為右派分子3,178,470人，列為中右1,437,562人；其中，黨員右派分子278,932人，高等院校教職員工右派分子36,428人，高等院校學生右派分子20,745人。在運動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注13）

注13：關於右派的人數，我們没法確定，但據我親知，就有五個同學、同事當了20多年右派，到時一查檔案，原來不是右派：一個是朱秀洲老師，

他到老家河北省農村接受監督勞動；一個是馮和璧老師，他由中學下放到小學；一個是華瑞甫同學，還有一個是朱庭秀，兩人都是勞動教養；第五個倒真是右派，但他的右派身份却不被承認，所以也就沒被統計進去。情況是這樣的：他叫閻竟鑫，在蘭州大學中文系劃的右派，畢業後分配到農村中學教書，他偷跑回城市老家自謀出路。到“改正”時，農村中學不管給他落實政策，城市沒有他的檔案。連他的右派身份都成了問題。我來美國前，他已癱瘓，家人和朋友還在為他跑“落實政策”呢。類似的情況，我聽到和在報刊上看到的就更多了。我還知道有好多右派根本就不是知識分子，是文盲。其中有一個窮光蛋讓你哭笑不得。我不了解他的身世，每到月頭他就到街道辦事處去領救濟。所有右派都是“資產階級右派”，他自稱是“無產階級右派”。街道給他發救濟時教育他要牢記黨的恩情。他說：“我咋會忘了哩？每到月頭就會想起的。”還有一個是我在高中上學時校長的警衛員，自幼是撿腿隊長、兒童團長，長大是革命隊伍裏的紅小鬼，是個大字不識幾個的文盲。後來調進百貨公司，大小算個幹部。當我們一塊勞動教養時，他說他劃右派的結論中有一條是“借了500元外債。”他說他根本就沒有，“連一元也沒有，我就沒有借債。”解除教養後，一直上訪，要求平反，所有回答都是：“不予受理”。又去找已居高官的革命老上司，得到的安慰是：“這是老人家定的案，誰也不敢翻。你祇有等等，看看將來的政策。”後來他得了癌癥，等不及便去世了。他進城後娶的聰慧、漂亮的妻子，早已離婚。他孤身一人，死後便一切銷聲匿跡，烟飛塵滅，真到落實政策時，他已是陰間一鬼。僅僅是我一個人就接觸到這麼多不在“55萬多”，這個統計數內的；在全國，該有多少呢？可知55萬多，那個數是絕對靠不住的。但55萬多，作為被1979年前後，落實政策到身的右派數目，可能是正確的，因為這是從下面報上來的。它沒有必要浮誇或縮減。至於解密檔案暴露右派分子數目為三百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那是包括了各色各類右派在內的。

人們都知道，匈牙利事件是毛發動反右運動的誘因之一，但較少人知道，據師哲回憶，毛要劉少奇告訴蘇聯：“毛傾向於進行鎮壓，但以爲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時候再行動。”（李丹慧沈志華《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機 中國的角色和影響——“波匈事件與中國”研究之一》）據此，寒山先生的分析是：當時應邀到莫斯科和蘇共協商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態度最堅決，而在北京的毛澤東在同意鎮壓後要求蘇聯再給匈牙利的所謂“反

革命”一點時間，讓他們充分暴露，再一網打盡。了解中共在鎮壓匈牙利事件過程中的出謀劃策，也就不難理解中共爲什麼不久在自己的國家會從鼓勵“鳴放”轉到全面“反右”了。（《紀念 1956 年匈牙利革命》）從這裏可以看出，毛搞“引蛇出洞”的陰謀，已成思維定勢，既要“引”中國的反革命，又要引“洋蛇”。

中共掌權初期，鎮反時，開始宣布“寬大政策”，把地方上的一些原先在中華民國黨政軍憲警部門任過職的，或是當過保甲長，或是地主老財的當家人，這些鷄飛狗跳四處躲難的人，招引回家，讓他們“安居樂業”；當差不多都就範時，突然宣布糾正“寬大無邊”，並且捏造是群眾的呼聲：“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產黨講寬大。”結果一聲令下，一夜之間，同時大搜捕，“滾水潑老鼠，一個跑不掉！”殺幾百萬，關幾百萬；人們把這叫做“欲擒故縱”。反右前的讓知識分子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聲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毛澤東和中共黨的正式整風文件上都說過參加和退出都是自願和自由的，隨後一變臉，國務院作出硬性規定，國家工作人員都必須參加整風和反右派運動。毛把它說成是“釣魚”，“讓毒草出土”，“讓牛鬼蛇神出籠”，“讓右派自投羅網”，“引蛇出洞，聚而殲之”。毛澤東說：“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毛澤東選集》第 5 卷第 437 頁）可以看出，“引蛇出洞”，從事實和邏輯上講，絕對是一個陰謀實施的過程。試想，如果是“陽謀”，明打明地說：“蛇你出洞吧！好讓我聚而殲之。”蛇會出洞嗎？

當然，即便耍陰謀，蛇如果仍不出洞，他也仍有更無耻的辦法，請看郭羅基先生提供的例證《周揚是按名單抓右派》：“我曾聽到周揚透露文藝界反右派的一個重要情節，公諸于衆，以存史實。”

1979 年胡耀邦主持的理論工作務虛會期間，周揚是我所在的第三組的召集人。那時他已有 70 好幾了，而且因患肺癌動過大手術，主持會議，帶頭發言，却未嘗懈怠。有一天，他沒有來。次日，問以故。他說參加（馮）雪峰的追悼會去了。他一進靈堂就痛哭流涕，見了雪峰的照片深感“愧對故人”。

我們小組有人直率地問：“那麼當年你怎麼下得了手呢？”

周揚這才說出：“抓右派之前，主席給我一個名單，名單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匯報‘戰果’。我說，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



沒有材料，怎麼辦？主席說，翻延安的老賬！我當時常常說‘在劫難逃’，許多人聽不懂。”不知內情，誰能聽得懂？

這次整風，毛澤東說是繼承和發揚延安整風的精神，實質是“一次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我聽到的是最高國務會議講話傳達稿）；方法和目的是“團結一批評一團結”。可他没有說也要繼承和發揚延安整風的“引蛇出洞”的謀略。

1943年8月，康生在一個訓練班上講話。他得意洋洋地傳授經驗說：“我們領導上的方針是，強調‘四三決定’的民主，號召大膽講話，提倡出牆報，提倡批評領導，遇到錯誤的問題不立即反駁，也不加以壓制，於是這就熱鬧了，共產黨是半條心的問題也出來了，那時反革命的兩條心的問題也出來了……所以你們看一看，這個暴露階段，暴露到什麼程度！”（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第96頁）總結雖是康生作的，但誰都知道康生祇是毛澤東的一條狗，延安整風中“引蛇出洞”的知識產權，當然是屬於主人的。

那時的牆報，和1957年的大字報一樣，都產生了轟動效應，都落得個悲慘的下場。毛澤東去看了牆報，回來說：“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

王實味發表在牆報上的幾篇文章，事實證明，那便是他的死刑判決書。

毛澤東說：“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發源地都是在北京。”（毛選五卷第448頁）實際上應該說是王實味，發源地在延安。王先生之膽（有正義感，不平就鳴，有氣就出）、之識（民主思想，科學見解，平等意識），堪稱右派老祖宗。李志綏先生在《毛主席私人醫生回憶錄》中說，他在伺候毛的“一組”所接觸到的情況，和《野百合花》裏的描述是一模一樣的。

在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中，毛如法泡制，絲毫不差地“號召大膽講話，提倡出牆報，提倡批評領導，遇到錯誤的問題不立即反駁，也不加以壓制，於是這就熱鬧了，反對一黨專政的黨天下，提倡實施民主政治的政治設計院，清算中共歷次政治運動罪惡的平反委員會……諸多問題都提出來了。”毛澤東借口有人給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寫匿名信，為《人民日報》寫社論《這是為什麼》，遂掀起了血雨腥風的鋼刀直刺知識分子胸膛的反右運動。有人祇知其表，不解“引蛇出洞”之裏，便說：“都怪那個寫匿名信的人。”其實絕對不是那回事。據參與其事的當時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在回憶錄中說：

6月7日，毛澤東主席找胡喬木和我到他家中談話。當我們一起到他臥

室時，發現沒有其他人參加這次談話。

我們剛坐下來，毛澤東主席就興高采烈地說：今天報上登了盧鬱文在座談會上的發言，說他收到匿名信，對他攻擊，辱罵和恫嚇。這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發動反擊右派的好機會……

毛澤東主席說：這封恐嚇信好就好在是黨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員；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個有名有姓的人署名。當然署名也可以作為一股勢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們廣泛地聯想到一種傾向，一股勢力。本來這樣的恫嚇信在舊社會也為人所不齒。現在我們邀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這樣的恫嚇信就顯得很不尋常。過去幾天，我就一直考慮什麼時候抓住什麼機會發動反擊。現在機會來了，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發動反擊右派的鬥爭。社論的題目是《這是為什麼》，在讀者面前提出這樣的問題，讓大家思考。雖然社論已經把我們的觀點擺明了，但還是要讓讀者有個思想轉彎的餘地。魯迅寫文章常常是這樣，總是給讀者留有餘地……（《憶毛主席》，39頁～40頁）

你祇用玩味一番他說的“我就一直(!?)考慮什麼時候抓住什麼機會發動反擊”這一句話，就可茅塞頓開，作出清醒的判斷：“反擊”，這一點是板上釘釘子，定死了的；產生任何幻想都是自欺；散布任何幻想都是欺人。你就認定吧，即便是躲過初一，你也別想躲過十五！歷史用屢試不爽的事實，證明了這個殘酷無情的真理。

至于陰謀實施的具體過程，我在其他文章裏，都有論述，這裏我單單祇用指出一點：它與延安整風所採用的陰謀伎倆一脈相承，毫無二致。

鄭振鐸“反右”日記：感嘆毛澤東“陽謀”用得妙，大家包括正被批鬥和將被批鬥的“右派”們，第一次看到“陽謀”這個詞，無不感到新奇，嘆其舊詞翻新之妙，同時深感這個詞內含的肅殺之氣。然而早在1949年4月13日所作的《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的報告中，毛澤東在批判王明的教條主義時，已使用了“陽謀”一詞。他說：“整風運動提高了同志們的嗅覺，縮小了教條主義的市場。有人說，這是陰謀，是要取而代之的。其實，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也是要取而代之。”這份黨內報告，至1996年方公開發表，所以1957年的人們還不知毛澤東早就創造了這個新詞。“釣魚”和“引蛇出洞”，似乎更為直露，但也是毛澤東和他的同僚在反右時並不諱言的用詞。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在發給黨內幹部閱讀的《事情正在起

變化》的有名文章中寫道：“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這種魚不是普通的魚，大概是鯊魚吧，具有利牙，歡喜吃人。人們吃的魚翅，就是這種魚的浮游工具。”（1959年的廬山會議閉幕式上，毛澤東再次承認“釣魚”，針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又說了幾乎同樣的話。）

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說：在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開始時，毛澤東同志並沒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為了反右而開這個會，不是“引蛇出洞”。兩個座談會反映出來的意見，我都及時向中央常委匯報。五月中旬，匯報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時，已經放出一些不好的東西，什麼“輪流坐莊”、“海德公園”等謬論都出來了。毛澤東同志警惕性很高，說他們這樣搞，將來會整到他們自己頭上，決定把會上放出來的言論在《人民日報》發表，並且指示：要硬着頭皮聽，不要反駁，讓他們放。在這次匯報之後，我才開始有反右的思想準備。那時，蔣南翔同志對北大、清華有人主張“海德公園”受不住，毛澤東同志要彭真同志給蔣打招呼，要他硬着頭皮聽。當我匯報到有位高級民主人士說黨外有些人對共產黨的尖銳批評是“姑嫂吵架”時，毛澤東同志說不對，這不是姑嫂，是敵我……及至聽到座談會的匯報和羅隆基說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份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份子，是外行領導內行之後，就在5月15日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這篇文章表明毛澤東同志已經下定反擊右派的決心。（《回憶與研究》下）

如果說，這時李部長還不是為了“引蛇出洞”的話，隨後他在引出全國第一號大右派章伯鈞來却立了頭功。對李維漢而言，章伯鈞是他釣到手的一條大鯊魚，自可邀寵于毛。但遠非祇此而已，在他的《回憶與研究》中還記載着如法炮制的其他陷阱：

“工商座談會期間，有人提出真正的資本家與會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斷擴大規模，找到了北京的吳金梓，天津的董少臣，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會鳴放，後來這些人都被劃為右派。這個做法實際上是‘引蛇出洞’，把對敵鬥爭的一套用于人民內部，混淆了敵我。”

北京市委主要領導人彭真原是抵制毛的整風運動的，後來他心領神會了毛的“引蛇出洞”，便也踴躍地加入，助紂為虐。

戴煌說，他就是中了彭真的陰謀詭計而被劃為右派的。我讀他寫的回憶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感慨萬分。他的歷史能紅得滴出血來，

## 還原 1957

---

幼年當兒童團長，十幾歲參加新四軍，後為中共打內戰，當隨軍記者，“建國”後到新華社，參加抗美援朝，援越抗美，還受到胡志明的器重。

1956年到外交學院調幹培訓，他是班級的黨支部書記。在全國大張旗鼓地掀起了反右運動。在這之前，他沒有提過意見，沒寫過大字報。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那篇遺臭萬年的社論《這是為什麼》。

許多人大惑不解：不是信誓旦旦地反復保證“廣開言路”，歡迎一切人幫助我們黨純正黨風的麼，怎麼突然自食前言、反目為仇呢？

正當這節骨眼兒，一天下午，北京所有高等院校的黨支部委員以上的同志，奉命到廣安門內白紙坊人民印刷廠禮堂去，聽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做報告。彭真這樣高級別的人物而又表演得如此活靈活現：

彭真精力充沛，紅光滿面，音宏氣足。他開門見山地說，這次報告的主題，就是動員黨內同志繼續向黨的組織領導提意見，不要受社會上“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的影響。因為那些人和我們中國共產黨不是一條心。他們裝着響應我們黨“歡迎發表不同意”的號召的樣子，骨子裏却要推翻我們黨，或與我們黨平分秋色，輪流坐莊。

接着，彭真打着有力的手勢，用憤慨的語調，說到了章羅聯盟，也說到了龍雲等人。繼而他一改口吻，用十分親切的調門對臺下的聽眾說：

這些人能和我們今天在座的同志相提並論嗎？我們都是自家人。一方面，黨的組織領導確有許多自己尚未覺察的不足之處，需要大家提意見，多幫助；另一方面，黨內也的確有許多人蛻化變質，胡作非為，騎在人民的脖子上拉屎撒尿，使得在他們魚肉之下的人民怨聲載道，有冤難伸。這更需要予以無情地揭露，並請大家幫助黨組織想想辦法，認真解決這個大難題。

再說，黨的方針政策及其貫徹執行，也並不都是十全十美，一帆風順的。這也需要大家協助黨的領導洞察秋毫，力求改正與完善之。

總之，‘門外’反右歸反右，‘門內’有意見照常提，這叫做‘內外有別’。而且黨支部書記和支部委員同志們要帶頭提，為整個支部的黨員同志做出表率，把我們黨的這次整風運動堅決搞好、搞到底！”

這時，彭真提高了聲調說：“即便提的意見不一定都正確，甚至都錯了，那也不要緊，黨絕對不會把這些同志與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混為一談。這一點，我可以代表中央在這裏向同志們作保證……”

彭真熱誠坦率，語重心長，侃侃而談了兩個多小時，尤其是後半部分的講話，說得我們的心頭都熱乎乎的。一切茫然與疑慮，都隨着大家長時間的掌聲烟消雲散。對這次整風運動的預期效果，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

當天晚上，中央許多部門住外交學院學員的英、法、西班牙文三個黨支部的支委支書們，就在宿捨樓洗漱室隔壁堆雜物的屋子裏，舉行了聯席鳴放座談會。

我第一個發言，把一年來鬱積于胸的種種思考和盤盡托。結論是：全黨全國最嚴重、最危險的隱患，就是“神化與特權”。如果不立即予以抑制與消除，而繼續聽任其發展，必將國閉民塞，全民族都會跟着遭大難。對其抑制與消除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大膽批評，切實監督，改進選舉；人民代表要講話，人民說話要算數，確保和尊重人民應有的民主自由；舉國上下都應該講平等，取消一切足以助長特權現象的或明或暗的措施與制度；降低高薪者的待遇，削減過分優厚的福利撥款，以大力縮小國家幹部與工、農、人民之間生活水平的懸殊。同時改變統購統銷中某些過死過急的做法，適當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以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精簡高等院校的政治課，讓學生們有更多的時間研究專業，等等。整個發言慷慨激昂，大有“爲着衆人去下海，不怕沾滿一身泥”的勁頭。

戴煌認爲，就說美國人民吧！他們今天活得好好的，憑什麼要砸掉自己的洋房、小車，去揭竿而起鬧世界革命呢？

後果就悲慘了：挨批、挨鬥、劃右派、勞改……百般苦罪，概括爲一言：“九死一生二十年”。

據時任北京農業大學黨委書記的施平後來回憶：“‘反右’開始前，北京市委主要領導人多次召開大學黨委書記會議，聽取各校關於民主黨派、教師、學生幫助黨整風‘鳴放’的情況，布置各校抓緊時間，動員‘鳴放’。有一天下午，市委負責同志找了清華、北大、師大和北農大四所重點大學的黨委書記去談話，聽取了學校‘鳴放’的情況後說：你們幾所大學老教師多，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翹尾巴的專家、教授、民主黨派成員多，有影響的人物多，要用各種辦法，制造適當氣氛，‘引蛇出洞’，讓他們把毒都吐出來，以便聚而殲之。你們幾所大學‘鳴放’得還不够，因爲黨委力量強，黨委書記要示弱……讓他們敢于盡情‘鳴放’，無所顧忌。”（《六十春秋風和雨》）

鄧小平是中共中央總書記、整風小組組長，就是在5月14日，鄧小平主

持的中央書記處發出了《關於報道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足以證明和充分表明陰謀的籌劃早在5月15日之前已在進行之中。此一文件與毛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的磨刀霍霍，陰險用心，是出于一致的。文件稱：“最近各地黨外人士正在展開對於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這是很好的現象，這不但會大大幫助我黨的整風，消除對黨外人士的隔閡，而且可以在群眾中暴露右傾分子的面貌。我們黨員對於黨外人士的錯誤批評，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的言論，目前不要反駁，以便使他們暢所欲言。我們各地的報紙應該繼續充分報道黨外人士的言論，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論，必須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道出來，使群眾明了他們的面目，這對於教育群眾，教育中間分子，有很大的好處。近來我們許多黨報，對於一些反共的言論加以刪節，是不妥當的。這實際上是幫助了右傾分子，並且使人感到是我們懼怕這些言論。這種現象，請你們立即加以糾正……”

“以上各點，請即召集黨報負責同志加以布置，至要。”可見鄧在5月15日以前就已經預得天機。而右派的“三大理論”及其他有分量的右派言論都在此後，都在6月初、5月下旬。指出這一點，可以說明毛澤東是“王八吃秤砣——鐵了心”要搞“引蛇出洞”，而不是鄧小平連“陽謀”那一把壺也不提了，徑直地厚着臉皮三番五次說：“1957年反右派是擴大化了，擴大化是錯誤的，但當時反右派的確有必要。大家都還記得當時有些右派分子那種殺氣騰騰的氣氛吧……”（《鄧小平文選》二卷第345頁）這句話可以表達為這樣一個公式：“殺氣騰騰（原因）——決定反右（結果）”可是這位以“實事求是”而香名昭著的鄧大人，却在以“殺共產黨人”而臭名昭著的右派分子葛佩琦的花崗岩腦袋上撞得粉身碎骨。他無法解釋這個基本事實：是在毛決定反右半月之後，葛佩琦才“騰騰”的，其他，如所謂“右派三大理論”也都是之後而不是之前“騰騰”的。原因怎麼會發生在結果之後呢？實乃咄咄怪事！怎麼“結果”竟然捷足先登，而“原因”却姍姍來遲呢？這是什麼邏輯？鄧小平以“騰騰論”作為“當時反右的確有必要”的根據，實在是蠻不講理地撒謊！也許，毛澤東衝着鄧小平的這類邏輯，才說：“那個小個子的前途，不可限量。”

鄧小平是“引蛇出洞”最重要的施工者，據知內情的陳伯達說，鄧小平主持一次省市書記會議，“說現在時間比金子還寶貴，要書記們趕快回去收集右派言論，否則晚了，收集不到了。”陳聽到“很驚訝”，他認為，人總

會說錯話的，這樣收集，牽涉太多，“反右搞得那樣擴大化，鄧小平同志有很大責任。”（《重新審視陳伯達》，《開放》雜誌 2005 年 3 月號第 42 頁）

又據常安《趙紫陽：鄧小平是“反右”急先鋒》一文說

趙紫陽說：“鄧小平一到廣東來做報告，說放長綫釣大魚，那就是打招呼準備反右派了。”

陽謀論中有個說法，叫“引蛇出洞”。而在各類反右運動的歷史記載中，亦可見到放長綫釣大魚的說法。

周恩來配合毛澤東，從來都是得心應手的，這，我到後面將從他對王造時實行“引蛇出洞”而得出結論：周恩來不殺王造時，王造時却由周恩來而死。

錢伯城在《鄭振鐸 1957 年日記紀事》一文中說：1959 年的廬山會議反右傾，實際就是在黨內的又一次反右派。廬山會議前的 1958 年 11 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到 1959 年 4 月上海會議，直到廬山會議的神仙會，毛允許批“左”，批評他的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帶來的特困局面。我來介紹一個場景：

毛澤東往日是習慣於離群索居，這次上山伊始，一反常態，頻頻召見衆人。今晚來美廬謁見的，都是有見地的人物。周小舟在延安時期是他所賞識的秘書；李銳是水電部副部長因反對長江三峽大壩上馬，毛澤東、周恩來賞識其真知灼見和反潮流精神，毛要他做自己的兼職秘書；田家英從 1948 年就跟他當秘書，從來不肯隨聲附和，有時還敢跟他頂撞幾番；周惠，湖南省委書記，管糧食有成績。毛視察湖南發現他在大躍進中沒有亂來，邊界農民跑湖南這邊來搶糧食，所以特意要他來廬山參加會議。

37 歲的田家英談他春天帶領工作組去四川農村調查的情況。在全國勞動模範羅世發的家鄉，聽他講被逼說假話、放衛星的苦景。田家英學着羅的腔調說：“水稻要畝產萬斤，哪個鬼兒子哄你，祇好把谷子往田裏堆！”毛澤東哈哈大笑，衆人也跟着笑起來。毛說：“58 年有些事我有責任。提倡敢想敢幹，‘八大’二次會議達到高峰。其中也有些胡思亂想，唯心主義。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個部門。”

“其中也有些胡思亂想，唯心主義。”此語是相當誠懇的，令人感動和吃驚。

毛接着說：“鋼鐵要翻番，不料搞了個‘兩小無猜’——小高爐、小轉爐，把別的事情忘記了，本末倒置。”

“主席，鋼鐵元帥升帳，也使工業內部比例失調。”李銳覺得今晚氣氛

很投機，不妨敞開說，“您曾經批評過斯大林單搞重工業的做法，北戴河會議一提出 1070 萬的高指標，幾千萬人上山搞小高爐，用磚瓦石灰窯煉鐵，報紙也是天天放衛星，結果不僅是浪費原料燃料，也打破了平衡，使真正的短綫，比如電力、輕工業的生產受到影響，能源缺口、市場緊張、財政虧空……”

毛澤東認真地聽着，李銳問道：“主席，您怎麼也相信了畝產萬斤呢？”

“我也是受了人家影響，錢學森寫文章說祇要太陽能多利用一點，農作物就可以大幅度增產。”他的神情忽然變得非常單純可愛，繼續說：“說 58 年糧食增產三成，我懷疑……”他接着談了人的認識過程是對立統一的過程，正確的認識同錯誤的認識是在不斷的鬥爭之中。他說：“要有對立面。我常常是自己的對立面，有的時候上半夜與下半夜就互相打架。”主席既然這樣坦然，大家就又作了進言，如讓陳雲重新來主管財經，等。

“來，我們喝點茅臺酒，以助談興。”毛澤東今晚興致頗高，毛飲一杯，抿抿嘴，說道：“58 年的毛病，主要出在綜合平衡上……六億五千萬人的衣食住行沒有安排好，出了一點亂子。我是始作俑者嘍！怪不得下面工作的同志。”

“是的！高指標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周小舟像是被茅臺酒壯了膽，橫檔裏插進這一句。

“嚓”，毛澤東擦着火柴，燃起一支“熊貓”，繼續說：“我 40 歲以前肝火旺，總覺得真理在自己手裏，現在也還有肝火。吶，在江西蘇區的時候，有一次對胞弟毛澤覃發脾氣，或許是要伸手打人吧，毛澤覃說：‘共產黨又不是毛氏宗祠！’”

衆人哄堂大笑，毛澤東更是笑聲震耳，繼而又海闊天空，談了一氣。

他們乘着酒興，祇管直通通地衝着今夜極溫和的毛澤東放炮：“58 年是小資產階級思想，唯心主義大發展的一年，‘以鋼為綱’、‘三大元帥’，這些口號不科學！”

“以後可以不提這些口號嘛！”毛澤東說。衆人又說，這次會議有壓力，恐怕都是說半句、吞半句。

“哎——”毛把大巴掌在空中一擺：“不要有壓力。我在上海會議說了，不敢講話無非是六怕：怕警告，怕降職，怕沒面子，怕開除黨籍，怕殺頭，怕離婚。岳飛就是殺頭才出名的嘛。王熙鳳說，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言者無罪嘛。轉告大家，也不要那麼沉重。去年是幾件事壓在一起了。鄭州



會議後，我開始右傾。打麻將十三張牌，基本靠手氣。在肯定成績偉大的前提下，中央願意聽取各種意見……”（李銳《毛澤東人際交往實錄》第182頁）

其氣氛、其話語，跟反右派前夕簡直是一模一樣；其後果，仍然是一模一樣：這些人都成爲彭黃張周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成員，把“六怕”不同程度地落實在每個人身上。

毛在8月11日下午的大會上講道：“180度轉變，我是蝙蝠，開頭屬你們俱樂部，23日怎麼轉變了？三番四復要求民主，很同情。每個支部都不要壓迫民主，放臭屁，通通放，讓大家講話……對俱樂部同志也（！）講硬着頭皮頂住，還有什麼屁要放？聽說還有十大綱領。”（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332頁）

所謂“也（！）講硬着頭皮頂住”的“也”，是指他在兩年前“也”曾經這樣對付過右派，這是年長的知識分子耳熟能詳的。當時毛說：“人家批評起來，就是說火一燒起來，豈不是痛嗎？要硬着頭皮頂住。硬着頭皮頂住，就是你批評我，我就硬着頭皮聽，聽一個時期，然後加以分析，加以答復，說得對的就接受，說得不對的加以批評。”（《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40頁）根本不是什麼“加以批評”，而是叫你“家破人亡”！

蓋棺論定：毛澤東是陰謀的化身。他不僅對敵人、對路人、對一般朋友，即便是對親密的戰友，也無不要陰謀詭計。仍僅以“引蛇出洞”這一陰謀品種爲例，加以論列。

毛對彭德懷的迫害，已爲衆所周知，但對彭也施行過“引蛇出洞”的毒招，却是大多數人所不知底裏的。

《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實》第313頁：四月，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在會上毛推薦大家看《海瑞傳》，號召大家學習海瑞精神，敢于批評皇帝。無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捨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馬”，“希望同志們敢于提出各種不同意見”。“有些同志報喜不報憂，不把真實情況反映上來。”“我們又不打擊又不報復，爲什麼不敢大膽批評，不向別人提意見？”他說，海瑞這個人對皇帝罵得很厲害，說“嘉靖”是“家家皆淨也”，還把這話寫在給皇帝的奏疏裏。以後被關進監獄。有一天，忽然拿酒菜給他吃，他很奇怪，問看監的老頭，才知道是嘉靖死了，他大哭，把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毛說，盡管海瑞攻擊皇帝很厲害，對皇帝還是忠心耿耿的。他把《明史》送給彭德懷看了，並勸周總

理也看一看。

會後，彭德懷回北京，一直到出國訪問，大約半個多月時間裏，案頭總放着一本《明史·海瑞傳》。

據 50 年代後期曾任中共湖北省副秘書長、省委書記處辦公室主任的梅白回憶：會前，我去毛主席那裏，毛主席便問我：“你認不認識海瑞？”又說：“我希望中國多出幾個海瑞。”我問：“是不是‘釣魚’？”他說：“不是。”第二天，在會上講了海瑞……會後，毛澤東講了希望黨內多出海瑞式的人，毛澤東又問我：“今天講海瑞反應如何？”我說：“有突如其來之感。你先打了招呼，我不感突然。會有海瑞的，出了海瑞時，請主席沉住氣。”（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上册第 342 頁）

《黃克誠自述》：“毛澤東的策略也很高明，是引蛇出洞。上海會議上提倡海瑞精神，廬山會議前，彭德懷本不想參加，已經請假，毛親自打電話要彭參加。在廬山上，毛和幾個秀才談話裝出一個虛懷若谷的樣子，以至周小舟勸彭德懷寫信，終於釣出了一條大魚。事後毛又說：‘海瑞歷來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歡迎，’‘現在是右派海瑞。’他說彭德懷‘到處散布別人都行，祇有他自己是海瑞’。”（第 349 頁）

生活在他身邊的李志綏就近觀察到：“毛熟讀中國歷史，深曉宮廷鬥爭中奪權傾壓……毛認為他的朝廷自然也不例外，他本人更是玩弄權術的高手……因此毛這次提倡學習海瑞精神，和先前 1957 年他用所謂‘引蛇出洞’法，鼓勵知識分子批評黨、替共產黨整風一樣，都是他慣用的策略。”（《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 285 頁）仍是用同一方法，在下面抓了幾百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代海瑞們下場淒慘，毛對他們毫不留情。”（同上，第 286 頁）我們再來對以下的毛的反復呈現性，加以觀察：1959 年反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鬥爭，開始于神仙會，與 1957 年反右派鬥爭開始于大鳴大放，何其相似乃爾！憑空捏造出彭、黃、張、周軍事俱樂部，要他們交代，反黨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綫的，這與憑空捏造出章羅聯盟冤案的做法又是如出一轍。巧中之巧，由神仙會到反右傾是抓住什麼戰機借題發揮的呢？是抓住一封信。這和大鳴大放轉入反右派抓住一封信，借題發揮，在《人民日報》上裝腔作勢發出嚎叫：“這是為什麼？”（社論）又是不謀而合——實質是同（陰）謀而合。“把個廬山幾乎轟掉了一半”與瞪眼說瞎話、編造右派進攻的形勢“黑雲壓城城欲摧”，從神似上講，近乎字字相印。鬥爭對

象彭德懷代表了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向危害國家、民族、人民的錯誤以至罪惡作鬥爭，是站在歷史的正確方面，右派也和彭一樣，代表民意、得民心。毛為掃除彭廣泛的社會基礎，將反右傾引向下層，又抓出數以百萬計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做法與反右一樣，抄襲了反右用的“引蛇出洞”的陰謀詭計。請看《鴻》書中所描寫的真情實景：

“四川省負責人開完廬山會議後，帶着印有彭德懷在廬山發言的文件回到成都。文件發到 17 級以上幹部，要他們對彭的觀點表態。（劃右傾却不限于 17 級以上。）

“我父親已從李省長處聽到了一些廬山會議的爭論。在他參加的‘考試’會上，他對彭德懷的信作了一些含糊的評論。回家後，他做了一件以前從沒做過的事：暗示我母親這是一個又一次‘引蛇出洞’的圈套……

“在母親的‘考試’會上，她很驚訝地發現其他許多人似乎都已聽到風聲。一半以上的同事對彭德懷的信表示憤慨，說他對毛的政策批評是‘顛倒是非’。”（第 170 頁）

“成都市糧食局長和郵政局長曾是彭德懷部下老紅軍，兩人都說同意他們德高望重的老司令員之觀點，他們還加上自己在農村的經驗來支持彭的意見。我母親擔憂這些老紅軍知不知道這是個陷阱，如果知道，他們仍說出自己的心裏話，真是英雄！……支持彭的老紅軍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解除職務，下放體力勞動。

“由于許多共產黨幹部同意彭德懷的觀點，清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運動再次撼動全黨上下。這次的教訓是：不準對毛澤東提任何批評和意見——即使明顯是他的錯誤。幹部們都看到：不管你的職位有多高，也不說你過去的功勞有多大，祇要觸犯了毛澤東，一夜之間就淪為階下囚……”（第 171 頁）這裏所說的“教訓”是極端消極的，迥異于我說的“教訓”，但這的確確是大多數人，甚至于是絕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教訓。唯其如此，人才能昧着良心顛倒是非，如：“一半以上的同事對彭德懷的信表示憤慨，說他對毛的政策批評是‘顛倒是非’。”到底是誰在顛倒是非呀？同樣，反右時，左派憤慨得幾乎要得腦溢血，腦漿崩裂而亡，這都該歸咎于右派“顛倒是非”，才激起左派的“義憤填膺”。也唯其如此，多虧這些媚毛左派，毛澤東才能屢屢得逞，中華民族才能災難深重——共產黨自己起的名字叫做：“浩劫”。

毛本人對此等事作何反應呢？他在為《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如何正確地對

待革命的群眾運動》一書寫的批語中說：“你們是不願意聽我的話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專橫獨斷’不給你們‘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又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又是‘錯誤一定要錯到底才知道轉彎’，‘一轉彎就是一百八十度’，‘騙’了你們，把你們‘當大魚釣出來’……”（《廬山會議實錄》第272頁）毛又在8月11日講道：“他們不愛，給他們自由，讓放出毒素。你講我陰謀就陰謀，大魚小魚一起釣，特別釣吃人鯊魚。”（同上，第331頁）

當他今日講出“你講我陰謀就陰謀”的時候，這總算是水落石出了。人們不禁要問：“當初你為什麼要耍無賴，說成‘我們說，這是陽謀’呢？生造一個詞頭就能改變了問題的實質嗎？”

廬山會議，反了彭德懷，全國餓死幾千萬，毛在七千人大會上作檢討：“凡是中央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王若水說：“毛澤東看清了黨內形勢：劉少奇等人是同情彭德懷的，是對‘三面紅旗’有所保留的……實際上，毛澤東在大會號召大家講，不過是‘引蛇出洞’的故伎。”（《新發現的毛澤東·下》，第384頁）

你祇用看看毛澤東在會上會下，以及會後的所作所為，就要佩服王若水真是有見地了。

毛澤東在會上說：“有這麼幾天，我相信能夠解決上下通氣的問題。有一個省的辦法是：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幹一稀（兩頓幹飯，一頓稀飯），大家滿意’。我建議讓人家‘出氣’。不‘出氣’，統一不起來。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氣’都沒有出嘛！積極性怎麼調動起來。到中央開會，還不敢講話，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講話。我們常委幾個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決‘出氣’的問題。有什麼‘氣’出什麼‘氣’，有多少‘氣’出多少‘氣’，不管正確之‘氣’，還是錯誤之‘氣’，不掛帳，不打擊，不報復。”（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1019）

可在會下呢？“他（毛）有一天跟我說：‘應該改成 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幹一稀，完全放屁。這就是他們所謂的‘馬列主義’。”（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373）

劉少奇在會上說：“這裏提出一個問題：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我也問了幾位省委幹部。我問過陶魯

筋同志：在你們山西，到底天災是主要的，還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的？他說，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河北、山東、河南的同志也是這樣說的。其他一些省我沒有問。總起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劉少奇選集》下卷，337頁）又說：“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于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在那些地方雖然也有缺點和錯誤，可能祇是一個指頭，而成績是九個指頭。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祇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同上 421頁）

“毛爲此很不滿意。毛在會議後跟我說：‘開會不講階級，不講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脫離這些，講什麼天災和人禍。我看這種講法的本身，就是災難。’但許多幹部都同意劉少奇的看法。”（《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 372）

彭真說：“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臺。如果毛主席的 1%、0.1% 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都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各有各的帳，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次日，陳伯達發言說：“彭真同志昨天關於毛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歷史的回顧》，1026頁）

“林彪說：最近幾年的困難，‘恰恰是由于我們沒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的優點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較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幹擾的時候。”“1962年3月20日，毛主席在就修改林的講話致田家英、羅瑞

卿同志的信中說：‘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同林彪的講話相反，少奇同志在講話中，用‘一個大的馬鞍型’來批評‘大躍進’，說‘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過5年10年後‘再來總結經驗’，‘作出結論’；他還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等等。這些話，今天看來很平常，但在當時聽起來的確有些刺激，從而也就留下了後來黨內鬥爭的陰影。”（同上，頁1045）薄在另一處說：“我認為，這是導致‘文化大革命’悲劇產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同上，頁1037）當時把林彪、陳伯達、柯慶施這類幹部稱為“風馬牛（看‘風’駛舵，拍‘馬’屁，吹‘牛’皮）幹部”。

“林講話以後，毛從主席臺走回一一八會議室，一路走一路說：‘林彪的話講得多麼好哇。要是黨內的領導人，都有他的這個覺悟，事情就好得多了。’”（李志綏《毛澤東的私人醫生回憶錄》，頁375）

在會上，“毛主席還誠懇地說”：“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別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來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陳雲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較多。”（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歷史的回顧》，1030頁。）

胡喬木說：“毛主席並不是不了解陳雲同志對經濟工作比他熟悉，比他謹慎，可是毛主席不但不聽他的話，而且簡直把他當做所謂黨內的右派，這好多同志都是這樣講了，也並不是毛主席一個人這樣講。”（尚定《胡喬木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二十年》頁235）

毛在陳雲的財經小組報告上面批道：“將情況說成一片黑暗，沒有光明。此人是店員出身，資產階級本性不改，一貫的老右傾。”“在毛有生之年，陳未再在政壇上扮演要角。直到1980年，鄧小平復出後，陳才重返政治舞臺。”（《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378）

毛在會上說：“犯了錯誤，就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對於那些被錯誤處理了的幹部，一經發現就要甄別平反，向他們賠禮道歉；而這些幹部也要從逆境中受到益處和鍛煉。”（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1034）

在後來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又申斥彭德懷‘要翻案’。彭在6月份交了一份申訴書，說明自己沒有組織反黨集團，也沒有裏通外國。彭‘請求主席和中央組織專案審查，處理我這類莫須有的罪名’。毛指控彭不但裏

通蘇聯，還勾結了全世界（包括美國）的反動勢力。于是全會跟着毛的指揮棒轉，對彭進行缺席審判，說彭和國際反動勢力一起搞反華反共大合唱。”（《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381）

也就是在這次全會上，毛大講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大反“翻案風”，“黑暗風”，“單幹風”。正如：七千人大會讓“出氣”，相當于反右傾前的“神仙會”；也是反右派前的“大鳴大放”；十中全會便等于拉開了“反右派”的序幕；直至文化大革命，才徹底打倒那些在七千人大會上的所有“出氣”者。

在為通向文化大革命鋪路的時候，毛澤東對文學藝術作了一系列的批示，開展了馬頭接着馬尾似的批修性質的整風運動。“在向文學藝術猛烈開火的同時，康生等人很快就把批判的烈火燒到了哲學、經濟學、歷史學等等學術領域：哲學界批判了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經濟學界批判了孫冶方的‘修正主義利潤掛帥’論；歷史學界批判了吳晗、翦伯暫的‘非階級觀點’和‘讓步政策’論等等。其中對楊獻珍‘合二而一’論的批判，自始至終由康生親自策劃操縱，並得到了毛澤東的指令，因而頗具代表性。”現在讓我們繼續介紹《毛澤東與康生》一書中“制造‘哲學罪案’”一節的敘述：

1964年夏，理論學術界批判“修正主義”進入高潮。康生正瞪大眼睛搜索批判對象時，5月29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的文章。康生看過後，認為：“合二而一”與“一分為二”是對立的。“一分為二”是毛澤東最先提出用以表達對立統一規律的，現在冒出來一個“合二而一”，這不是同毛主席對着幹嗎？當得知文章作者艾恒武、林青山是中央黨校哲學教研室教員時，他便認為是中央黨校副校長楊獻珍“找的代言人”。于是一方面責令中央黨校追查“合二而一”的後臺，另一方面則與他的親信“反修哲學寫作組”負責人關鋒密謀，布置人寫了一篇題為《“合二而一”不是辯證法》的文章，在6月5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發表的當天，康生把有關“合二而一”的兩篇文章，交給江青，讓她拿去給毛主席看。毛澤東當即批示：“合二而一”是矛盾調和論。接着6月8日，毛澤東又在中央工作會議講話時說道：“‘一分為二’是辯證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義，階級調和的吧！”毛澤東不能容忍和他的‘鬥爭哲學’唱反調，所以一下子就給扣上了嚴重的政治帽子。

原來“合二而一”的觀點，是楊獻珍在講課時最早提出來的。他認為“統

一物之分爲兩個部分”，可以用“一分爲二”來表達，“統一物是由兩個對立面組成的”可以用“合二而一”來表達。由此，他得出結論說“一分爲二”與“和二而一”都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用來表達對立統一思想的。艾恒武和李青山由於受到楊獻珍上述觀點的啓發，他們根據自己的理解和體會，寫出了《“一分爲二”和“合二爲一”》的文章，事先並未同楊獻珍商量過。

康生得到了毛澤東的上方保劍。喜出望外，立即行動起來，他召集各報刊負責人布置刊登關於“合二而一”正反兩種意見的文章，以引起“學術爭論”。然後單獨接見《光明日報》負責人，面授機宜：“你們報社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是主張‘合二而一’論的，一篇是反對‘合二而一’論的。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學術爭論的局面。很顯然，‘合二而一’論是反對毛主席一分爲二的辯證法的。不過，你們要先引發大家講話，把觀點都亮出來再說。”接着康生就把“引蛇出洞”、“誘敵深入”的一套戰術亮出來：“在安排版面上，也要講究一下策略，可以輪流坐莊，今天把贊成‘合二而一’的文章排在重要版面上，明天再把反對‘合二而一’的文章排在重要版面上，使人琢磨不透這樣才能把那些擁護‘合二而一’的文章放出來。等放個差不多了，再聚而殲之。那時候，‘合二而一’的人想溜也溜不了啦，大功便可告成！”從此以後，康生就忙起來了。中央黨校是他的專有“領地”，他要把楊獻珍作爲毛澤東所說的“修正主義”典型揪出來，因此他要親自指揮中央黨校的批判。同時，他還要控制報刊上批判的進度情況。從1964年6月以後的三個月內，康生九次召開會議和召見有關人員，具體布置把“學術討論”引向政治批判。康生自己在1966年11月5日的一次談話中說得明白：“64年，‘合二而一’的鬥爭……開始好象是學術鬥爭，我們也有意思地搞一下（學術討論），先引起大家講話，以後點了楊獻珍的名，提到政治方面了，這個鬥爭一來，楊獻珍就垮了。”

康生舉起了屠刀，楊獻珍祇有挨宰的份兒。1964年7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爲《就“合二而一”問題與楊獻珍同志商榷》的文章，首先公開點名批判楊獻珍。這篇文章是康生責令《人民日報》根據中央黨校提供的材料起草的。7月15、16兩天，康生親自主持，有艾思奇、範若愚等人參加的中央理論小組經過反復討論，逐字逐句地修改完稿的。中共中央機關報點了楊獻珍的名，而且以至高無上權威的口氣定了性，哪裏是什麼“商榷”？實際上，它是向全國發起對“合二而一”的“進軍令”。正如康生所說：“在



黨報上公開批判一個中央委員不是隨便的，這本身就是對楊獻珍在政治上的批判。”

康生始終緊緊地抓住楊獻珍不放，僅僅把“合二而一”搞成階級調和論，還不足以搞垮楊獻珍，于是他祭起了“新帳老帳一起算”這把刀子。這是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打彭德懷使用的武器，祇有用它才能置楊獻珍于死地。7月24日，康生在釣魚臺，召集中央和北京市宣傳部，他在會上明確提出：“我們要以‘合二而一’坐莊，舉一反三，聯系其他問題，在政治上一定要聯系楊獻珍在1958年反三面紅旗的言論、1962年翻案的問題、鼓吹單幹風的問題、辦校方針的問題、對待毛澤東思想的問題，要往政治上發展。總之，就是要把楊獻珍說成是“一貫反動”，才更有理由證明：這是一場嚴重的“意識形態裏的階級鬥爭”。

接着，根據康生的授意，《紅旗》雜誌第16期發表了《哲學戰線上的新論戰》文章殺氣騰騰地說：“楊獻珍同志在這個時候大勢宣揚‘合二而一’論，正是有意識地適應現代修正主義的需要，幫助現代修正主義者宣傳階級和平、階級合作，宣傳矛盾調和論。同時，也是有意識地適應國內資產階級和封建殘餘勢力的需要，給他們提供所謂‘理論’武器，對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紅旗》文章所投射出來的猛烈的火力，標志着對楊獻珍的批判又升了一級。如果說《人民日報》的文章是批判“合二而一”，是批判楊獻珍的觀點的話，那麼《紅旗》的文章則是批判楊獻珍“有意識”地為反動勢力提供“理論武器”，從而也就批判楊獻珍其人了。

5月23日，康生親自召集全國省市宣傳部長、黨校校長和報刊負責人會議。他在會上趾高氣揚地說：“要看看各省市贊成‘合二而一’的是些什麼人。”這次批判不是楊獻珍個人的問題，包括的地區很廣泛，從北京到窮鄉僻壤，從文化到工廠、商店，從黨、政、民，一直到軍隊……鬥爭很激烈，又很復雜。他們是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反毛主席的。今後這種形式的階級鬥爭還會發生。”接着，康生責成《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中央報刊，把贊成“合二而一”觀點的來信、來稿者的姓名、住址和單位登記下來，報送“反修哲學寫作小組”，以便“通過各省市的有關部門轉送原單位進行批判。從此，批判“合二而一”的運動又升了一級，不僅批判楊獻珍，而且要批判贊同楊獻珍觀點的一些人，於是災難降臨在更多人的頭上了。

在中央黨校這個“主戰場”，批判運動更是如火如荼，小會逼供、中會

審訊、大會批鬥，集中火力猛攻楊獻珍。1965年3月1日，中央黨校校務委員會向中共中央作了《關於楊獻珍問題的報告》。報告列舉了楊獻珍的十大罪狀：（1）反對毛澤東思想；（2）制造反對社會主義的理論；（3）攻擊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4）鼓吹資本主義復辟、大刮單幹風；（5）攻擊歷次的政治運動，大鬧翻案風；（6）同彭德懷一道反黨；（7）站在赫魯曉夫一邊；（8）包庇、安插惡霸、地主反革命分子；（9）把高級黨校變成獨立王國；（10）企圖抓全國黨校領導權，並且伸手到許多方面去。給楊獻珍的結論是：“他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言人，是彭德懷的一伙，是個小赫魯曉夫。”9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了這個報告，作為中共中央文件批發全黨。並撤消了楊獻珍的中央黨校副校長職務，降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文革開始後，楊獻珍已經是“死老虎”了，但還是在劫難逃，被戴上了“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裏通外國分子”、“大叛徒”等政治帽子，受盡了各種各樣的凌辱和折磨。1967年5月，楊獻珍被囚禁起來，9月康生親自下令將其正式逮捕，在監獄裏關了八年之久。1975年5月從監獄裏放出來，被逐出北京，在陝西過了三年多的流放生活直到1980年才得到了徹底平反，此時的楊獻珍已是84歲的老人了。

在中央黨校受“合二而一”冤案株連就有154人，他們被加上各種莫須有的罪名受到迫害。其中哲學教研室副主任孫定國，被迫害跳入黨校人工湖冰窟窿裏自殺。哲學教研室講師黎明，下放農村勞動，在文革中被迫害，跳井自殺。那兩位寫《“一分為二”和“合二而一”》文章的教員，一個被遣返到吉林省長春市，在一個菜店裏賣菜，一個被發配大偏僻的山溝裏勞動改造。

在全國，由于“引蛇出洞”而被株連的人，更是不計其數。他們也都受到了殘酷的迫害。海軍航空兵學校有一教師，因寫了一篇關於“合二而一”的稿子，寄到一家報紙，被報社轉回學校，這個教師被打成楊獻珍的“孝子賢孫”，遭到批鬥，最後被開除軍籍趕回農村。廣東省有一個人寫了一篇同意“合二而一”的文章，投到報社，被報社轉回原單位，這個人就成了“楊獻珍的黑幹將”，被關押了好多年。其中最慘的一例，江蘇省一個五好戰士陳波，就因為寫過贊成“合二而一”的文章，竟至被處死碎尸。凶惡殘害，令人發指。事過16年之後，楊獻珍劫後餘生，悲憤地對一位訪問記者說：“歷史上有過株連十族的例子，那就是明朝的方效儒的故事。所謂十族，就是九

族加上他的學生。而“合二而一”受株連的却遠遠超過十族。而那些受株連的人中，很多人同我毫無關係，我也根本不認識他們，不過僅僅因為寫過贊成“合二而一”的文章，竟也遭到各種各樣的迫害。”這種人數多、時間長的大規模株連，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第46-52頁）

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劉少奇，但是，是從《海瑞罷官》開的刀。吳晗搞的是遵命文學，毛曾贊揚過演海瑞的馬連良的演出和吳晗的劇本。怎麼到後來又成了“要害是罷官”，要為彭德懷翻案呢？吳被置于死地，原來他在反右時是衝鋒陷陣的英雄，有名的大左派，現在他才噬臍莫及，咬破自己的舌頭，寫了四個血字：“悔不當初”。

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出籠，也是一個“引蛇出洞”的連環套。從開始，署名不用張春橋（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不在《解放日報》（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發表都是為了避開官方色彩，便于討論（釣魚）。葉永烈的《江青傳》寫道：

江青不斷通過張春橋，向上海《文匯報》下達“指示”，以求“擴大戰果”：“姚文發表後，意見很多，但均在地下，要引到上面來。”“要採取‘誘敵深入’的辦法，要使敵人感到你‘不堪一擊’，這樣，他就會去，出場。這樣反復搞，他們非上馬不可。”“前一時期，‘海罷’太過了些，敵人不出來。”“總之，要調動敵人兵力。”“採取‘圍而不殲’的戰術，環繞此周圍，辟戰場。”……

打着“百家爭鳴”的幌子，上海《文匯報》刊登各種反姚文章，為的是“引蛇出洞”、“誘敵深入”。

於是，“向陽生”出動了——向陽生，也即中共北京市委文教書記鄧拓。

於是，“方求”出動了——方求，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副部長周揚主持下的寫作組（第301頁）。

當時的中共上海市委副秘書長馬達在他的自述《是陽謀，更是陰謀——〈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前後》中寫道：

批《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前夕，陰謀就已經施行。我從1963年到1965年擔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書長。我的工作任務，主要是為市委起草向中央的工作報告，並隨市委第一把手去中央參加會議，起草發言稿和會議傳達稿。一天中午，我到張春橋的辦公室（我們的辦公室是相連的），看他正埋頭修改文件，我問張：“你修改什麼文件？”張詭秘地說：“我在改《文匯白頭情況》。”我聽了一愣，我怎麼沒有看到過什麼“白頭情況”？我回

到辦公室問秘書，秘書說要問一室主任。當時規定，凡中央下發的電報、文件及上海各部委上報的情況，都要交正副秘書長傳閱。一室主任告訴我：“《文匯白頭情況》是張春橋親自安排的，連標題、樣式、字體大小都是由他定的。共印十二份，其中十份交‘客人’（江青的代號，她正在上海）專送在杭州休息的毛主席和她控制的北京寫作班子。上海祇發張春橋、寫作組兩份，陳丕顯發過兩期，後來停了。據說連周總理也看不到。”說着，他把剛從市委印刷廠保密車間印好送來的《文匯白頭情況》讓我先翻一翻，我眼睛掃了一下，主要是批《海瑞罷官》的反應。

原來，江青、張春橋一伙利用《文匯報》作為他們控制的工具，由當時《文匯報》負責人為首成立一個三人小組。張春橋每天和《文匯報》負責人碰頭一次，傳達“上頭”的精神，布置採訪對象的名單和要求，要報社在上海和駐北京辦事處的十多名記者逐個去訪問他們要訪問的人。名義上是讓記者徵求對評《海瑞罷官》一文的意見，實際上是摸底，了解對方的思想動向，把採訪對象的心裏話掏出來，還規定“祇聽不說”，“誰泄密，要追查”，然後詳細整理出一份份情況上報。同時，由姚文元擬出二十多道選題，要市寫作組和報社針對採訪對象的觀點，準備批判文章。姚文元還特地交代，“批判時要用吳晗本人文章及為《海》劇捧場及辯護的論點，作為展開論戰的對立面”，要“揭露它（指《海瑞罷官》）是為反社會主義勢力說話的毒草”，要說明“這不是學術論爭，而是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張春橋、姚文元事先已定下調子，準備打棍子，進行圍剿。

評《海瑞罷官》的文章見報後，當時並未引起讀者關注，因為姚文元的名聲不好，他的文章又強詞奪理，因而青年學生中無人響應，知識界更不予理會。在二十天內，《文匯報》僅收到三篇來稿。張春橋本想在《文匯報》拋出這一黑文後就可以撒網釣魚，可是祇有馬捷等幾位作者發表文章，批駁姚文元不講史實、任意扣帽子的文風。張春橋看了以後認為沒有知名人士的文章，成不了氣候，於是布置《文匯報》在上海、北京分別召開文學界、史學界等知名人士座談會。會前說：內部談談，聽聽各位意見，不算賬；會議結束時，却突然宣布：要整理成文，公開發表。到會者目瞪口呆，驚呼“上當”。張春橋、姚文元又布置報社“捉刀代筆”，“組織”了四封所謂的“讀者來信”，張春橋還特地加了個“編者按”，假惺惺地說：“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經常教導我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社會主義文

化繁榮的方針……”“我們發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正是爲了開展百家爭鳴，通過辯論，把《海瑞罷官》這出戲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則問題弄清楚……”爲了引起讀者注意，張春橋指令報社將這個“編者按”連續刊登了六天。暗地裏，他們派記者去了解參加座談會的人發言的動機和思想狀況，把沒有講出來的話再挖出來。同時，按照論點排列歸類，凡是不同意姚文元觀點的都被列爲“右派人物”和“右派言論”。善良的知識分子怎麼會料到：他們以坦誠的胸懷，以史實爲據，發表評論，表達自己的觀點，反對壓制學術討論，却一個個墜入了張春橋一伙預先設計的圈套。當這些知名人士發表了自己的見解以後，一份份按人頭整理的所謂“右派言論”的《文匯白頭情況》接連上報，張春橋姚文元策劃的所謂批判“右派言論”的選題計劃也一一布置下來。在座談會開完以後，一場以“百家爭鳴”爲幌子的鬧劇剛剛鳴鑼，就草草收兵，而殺氣騰騰的大批判戰場却已經擺開了。

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大學副校長翦伯贊對《文匯報》記者說：“吳晗和我朋友，我了解他，難道吳晗要退田？”“思想批評，要聯系個人歷史，要看他是什麼人，吳晗在抗日戰爭時期就參加了民主革命。”翦還公開聲明：“如果整吳晗，所有進步的知識分子都會寒心。”不久，他便遭造反派揪鬥，含冤而死。著名歷史學家、上海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周予同在座談會上說：“目前報紙的做法有些問題值得研究。例如：一、戲劇藝術和歷史科學是兩個問題，兩個路數，戲劇和歷史有關係，但關係究竟怎麼樣，可以討論。二、清官評價問題，清官屁股坐在什麼地方的問題，這對史學界來說似乎已經清楚。以前有人說清官比貪官更壞的問題，這一點還可以討論。這樣說，那麼，在蔣匪幫時代，是否做壞教授比做好教授要好呢？”他講了大實話，可是被張春橋定爲“堅決打擊對象”，幾次被揪到山東曲阜批鬥，造成全身癱瘓，從此臥床不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平心，因不同意姚文元文章，發表了實事求是的意見，被姚文元誣陷爲“反黨反社會主義”，李平心臨死之前，在病中對人說：“有幾個問題是我事先絕對料想不到的：第一，歷史人物要全盤否定；第二，對清官一棍子打死，這無論如何也不合邏輯；第三，現在忽然從學術討論完全轉到政治鬥爭。現在問題很難說，很可能今天沒有問題的人，明天有了大問題。吳晗哪裏會打着紅旗反紅旗呢？現在反正就是一頂帽子戴上去……”他滿腔悲憤的話，是對張春橋、姚文元一伙的有力控訴。著名表演藝術家周信芳按照周揚建議，創作了京劇《海瑞上疏》，向國慶十

周年獻禮，1959年8月就上演了，比吳晗《海瑞罷官》早兩年，跟1961年的單幹風、包產到戶更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而江青一伙硬說《海瑞上疏》與《海瑞罷官》一“罵”一“罷”，南北勾結，向黨猖狂進攻，周信芳一夜之間被打成反革命，遭受無休止的批鬥，隔離，坐牢，直到被逼死為止。張春橋正是在編審《文匯白頭情況》中，給一個個所謂“右派分子”、“右派言論”劃框框，定調子，造成遍及全國的文字獄。“文革”初期，張春橋在上海把賀綠汀、周谷誠、周信芳、周予同、李平心、李俊民、瞿白音、王西彥等八人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就是在批《海瑞罷官》中蓄謀已久的陰謀。

一石激起千層浪。姚文元的文章，引出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大論戰——這論戰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毛通過打吳晗，對彭真來說就是引蛇出洞，這叫做“打了孩子娘出來”。果然，彭出來講什麼“學術問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云云。他要中央出個指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要他制訂，並且毛也不要看。這便是鋪向被打倒之路的大毒草《二月提綱》的出籠。整個發動文革，就是這樣一個引蛇出動的過程：吳晗——三家村（鄧拓、吳晗、廖沫沙）——四家店（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劉鄧司令部。

文化大革命起來了，毛躲得遠遠的。劉鄧派工作組，前去向他請示。他不但不事先阻止，反而心懷叵測，“一心以為鴻鵠之將至！”劉鄧趕回北京，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主張派遣工作組。電告毛澤東，毛復同意。當學生與工作組的矛盾到不可開交時，劉少奇、鄧小平于1966年6月11日，在文革匯報會上指示李雪峰、吳德：打右派學生，“不要定框框，有多少定多少”。13日，劉少奇批轉中南局和西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指出：“當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于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着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高中應屆畢業生“經過市委批准，可以鬥爭和戴帽”。（《文革大年表》第120頁）他們把毛澤東對右派“引蛇出洞”的惡毒陰謀，來了個東施效顰。他們在“引”學生的“蛇”，却不知道，這樣一來他們本身這條“蛇”正好被毛“引”出了“洞”。古人有言：“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火候一到，毛宣布派工作組是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並貼出《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將無產階級轟

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攻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無毒不丈夫的大巫斥責小巫：“又何其毒也！”

毛對劉的檢討說好，特別是後半更好。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他一面要穩住劉，要他坐以待斃，直到要他的命之前，還好言相勸：“好好學習，保重身體”；另一方面，是要看清中央其他人對劉的態度。結果，陶鑄把鬼話當作人話，順竿而上，便當上了“全國最大的保皇派”。

毛對他的接班人，親密戰友，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光輝榜樣林副統帥怎樣施行“引蛇出洞”的毒招呢？他以“不設國家主席”刺激他跑出洞外，作出反應。因為這不是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而是廢除他當接班人的問題。鬧騰了半天，撈了個陳伯達當替死鬼，進行“批陳”整風。毛澤東的難處是，爲了打倒劉少奇，把林捧上了天，把林接班人的地位，寫進憲法和黨章裏。僅憑他說過毛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如今，“我說過六次不設國家主席，一句也不頂，等于零。”就可以廢黜他嗎？就可以昭告天下嗎？朝三暮四，出爾反爾，即便國人不敢巷議，也恐難免于腹非的。

毛南巡，對各大軍區政委、司令員進行吹風，透露林的問題，又是唱《國際歌》，又是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像一個醜角演員，裝腔作勢，作出破斧沉舟之勢。但作爲陰謀家，他却達到了目的。他是爲了敲山震虎，讓林彪聽到風聲，就會感到走投無路，作出過度反應，甚至狗急跳牆。這正是他爲他設計的一條自取滅亡之路。當然不能設想如折戟沉沙那麼樣地神機妙算。而是，祇要林作出過度反應，毛便可變被動爲主動。事後證明，毛對林真是做到了“引蛇出洞，聚而殲之”。

#### 王年一、何蜀、陳昭三位先生在他們的文章中說：

毛澤東習慣于以“打招呼”來强行統一思想。所謂的“打招呼”就是非正式地頒布“最高指示”，全黨與全軍幹部祇許恭聽，不“允許發表不同意見”，更不“允許發表反對意見”，對毛的意見誰若想不通，就必須趕緊“轉彎子”。毛澤東這一次爲了打倒林彪，事先不開中央會議，不發中央文件，幹脆拋開中央領導集體，憑着他個人的“絕對權威”，于1971年夏南巡“打招呼”。

此次南巡後共28天，在途中毛約見各地軍政大員，講話13次。講話中充滿了給林彪“上綱上綫”、“定性定罪”的話：“有人看到我年紀老了，快要上天了，他們急于想當主席，要分裂黨，急于奪權”；“這次廬山會議，

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我看他們的地下活動、突然襲擊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的。綱領就是‘天才’和要當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共全會的議程和九大路線”；“林彪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改也難”；“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不徹底，還沒有總結。”

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一再誣指林彪等人在廬山會議上搞“反革命政變”的綱領之一是“要當主席”。然而，因為說林彪“要當主席”毫無事實依據，太“莫須有”了，所以“九·一三”事件之後，當毛澤東審定並批准中央公布的此前他的南巡講話時，又自行把當時講話中對林彪“要當主席”的指控改成了林彪欲“設國家主席”。毛澤東的蠻橫無理、任意誣陷、信口捏造，由此可見一斑。

這次南巡講話是毛澤東欲打倒林彪的宣言書、挑戰書、逐客令（逐林令）。當時的海軍政委李作鵬聽到毛的南巡講話後，把它概括為3點：廬山的問題沒有完；上綱比以前更高；矛頭指向首長（林彪）。他的概括一點也沒有錯，林彪當然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澤東不在中央高層內部講，不對林彪當面講，黨中央的主席背着黨中央的副主席，背着中央，到下面去煽風點火，動員打倒他自己欽定的“接班人”、黨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但毛同時又假惺惺地聲稱：“現在不要作結論，結論要由中央作”；“不要公開的去講這次廬山會議，因為中央還沒有作結論……不要像我對你們說的這一套”。如此作為的毛澤東居然還道貌岸然地提出了“三要三不要”（“要團結，不要分裂；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究竟是誰在分裂黨內高層，誰在搞陰謀詭計，難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嗎？

毛澤東把林彪逼到這一步，林彪已沒有任何轉圜的餘地。彼時彼地，林彪還能怎麼辦？低頭認“罪”顯然是行不通的，彭德懷、劉少奇不是都低頭認“罪”了嗎？但他們的下場如何？何況此時的林彪不是1959年的彭德懷（那時的彭德懷比他年輕、身體也好），也不是1966年的劉少奇（劉少奇比他理論修養更高、政治鬥爭經驗更豐富），林彪身患重病，經不起“認罪”後必不可少的長期折磨，于是他不想“認罪”，祇想“認命”，“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這裏。一是坐牢，二是從容就義”。但葉群、林立果又不願意認命，于是就有了林彪被逼出逃的“九·一三”事件。（《毛澤東逼出來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當代中國研究》總第85期）



鄧小平從實施毛的陰謀，到對右派的殘酷懲處，可以說是把“瓮”燒得火紅，簡直是做得斷子絕孫。毛澤東却對他來了個“請君入瓮”。鄧小平的三起三落，其中就有兩起兩落是毛對他玩的貓吃老鼠。我們從最後的一起一落中，例舉毛是如何對他施行“引蛇出洞”的陰謀的。

江青通過大反“經驗主義”反周，旁及鄧和大批老幹部。鄧告了狀，毛在一個批示中敲打了江。鄧在借貫徹批示精神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伙同葉劍英，猛烈地向江青開炮，歷數她近年來所犯錯誤，除了這次大反經驗主義之外，還聯系她屢次違背毛指示，“另搞一套”。讓四人幫嘗到了鄧的厲害。會後，王洪文向毛報告了江青遭到“圍攻”的情況。毛警覺到鄧說出周想說而不好說的話，與周合流，這樣一來，黨內的復辟勢力將如虎添翼。於是，毛對鄧就采用了他“引蛇出洞”的拿手好戲。

毛表態支持政治局會議對江的批評，隨後又指定鄧取代王洪文主持批江的會議，給他充分的表演機會。

鄧在他主持的會上，作了主要發言，圍繞自1973年以來江青等人多次另搞一套以及拉幫結派等問題提出嚴厲的批評，甚至拍了桌子。王洪文、張春橋作了檢討，江青則表示：“對問題還得消化一下，再作進一步檢討。”（《晚年周恩來》第464頁。以下多取材自此書）

毛通過觀察，深為憂慮：鄧的強勢作風，如在他身後搞翻案，則是無任何力量可以堵擋的。所以，就進一步引他出洞；更委以重任，讓他接替王洪文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工作。

政治局會議後，毛特意讓江青登門拜訪找鄧小平“談心”。毛也找鄧談話，肯定對江青等人的批評，說：你有成績，把問題擺開了。他們幾個人過去有功勞，反劉少奇，反林彪。現在不行了，反總理，反你，反葉帥，現在政治局的風向快要轉了。毛一再鼓勵鄧要把工作幹起來，並表示：我準備找王洪文談，叫他找你，聽你的話。

鄧小平作風強勢，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一面殺“四人幫”的威風，江青也不得不檢討自己另搞一套所犯錯誤，承認她無組織，無紀律，自作主張，隨便亂講話，表示：“對不起恩來，劍英同志。”同時也承認了“四人幫，是個客觀存在”。

一方面，鄧大張旗鼓，快刀斬亂麻地進行各行各業的全面整頓。

毛冷眼觀察，已覺察出鄧要動搖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全面否定文革，但

仍在表面上不動聲色，大擺“揚鄧抑江”一類的迷魂陣，誘敵深入。特別是，毛對轟動當時的《紅都女皇》一事作了如下批語：“孤陋寡聞，愚昧無知，三十年來惡習不改，立即攆出政治局，分道揚鑣。”玩了個假要離婚的鬼把戲。據傳說，鄧批：“同意離婚”。

鄧打着“以三項指示為綱”的旗號，加大整頓力度，兩個鋼鐵公司對着幹；聲稱“不怕第二次被打倒”。毛不承認“三項指示為綱”，祇承認“以階級鬥爭為綱，其餘都是目”。何況鄧心目中祇是重在“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一項？

又如，鄧在政治局會議上，居然提出應該解決“61人叛徒集團”的問題，認為把登報《反共啓事》的責任，完全歸咎於他們是不公道的。然而，挖出這個叛徒集團正是文革的“重大成果”。尤有甚者，鄧曾對當時在上海擔任領導工作的老幹部馬天水做工作，向他透露了毛對江青的批評，並點了張春橋的名，告誡他不要與他們為伍，企圖挖《四人幫》大本營的牆角。後被馬出賣，密報王洪文。鄧小平的所作所為，使毛澤東確認他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準備伺機予以殲滅。但為了穩住他，遂讓他繼續表演。毛對江青在大寨大談評《水滸》的“現實意義”，宣稱現在黨內有人“架空毛主席”，還故作姿態地批示：“放屁，文不對題。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文革大年表》第381頁）

在周恩來的生命名存實亡的時候，毛抓住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寫給毛的一封信（信中批評黨委書記遲群和謝靜宜兩人生活墮落，專斷獨行），大做文章。劉冰將信交鄧小平轉呈。毛覺得那封信動機不純，矛頭是對着他的，而且覺得鄧偏袒劉。

毛多次與毛遠新談：“鄧對文化大革命有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他們罵遲群，實際上是反對我。”

1975年11月3日，清華大學黨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傳達毛主席對劉冰信的批示，直接點了鄧小平的名，稱：“清華大學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綫鬥爭的反映。”

一場雷厲風行的“批鄧，反擊右傾反案風”的運動，在全國展開了！

毛澤東如果再多活一、二年，鄧小平這條蛇恐怕就祇有翻肚子了。在這裏，真正是“你死我活”，毛不死則鄧難活。

人們總以為，以周恩來的精明強幹，毛決不會對他也來“引蛇出洞”這一套吧！事實證明，毛對周也來。

人們多聽說毛批評周的四句順口溜：“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出修正。”周從毛抓住外交部內部刊物上的一篇文章小題大作，預感到，一場政治風暴正衝着他而來。慣于運用“敗狗”戰略的他，對毛堅持順守，曲意奉迎，磕頭如搗蒜，檢討如雪片。怎奈“克己從人人不諒”，終于，“毛澤東抓住周恩來與基辛格會談中的‘紕漏’，親自出馬為蓄謀已久的批周敲響了開臺鑼鼓，指周對蘇聯怕得不得了，擅自接受了美國的核保護傘，如果蘇聯人打進來了，他要當兒皇帝！隨後下令政治局召開會議，批判周的‘右傾投降主義’。周由此經歷了晚年最大的一場劫難。”（《晚年周恩來》第458頁）

所謂“引蛇出洞”，正是要引出“紕漏”。下面，我們要根據上書的資料，說一說，紕漏是什麼？怎樣引出的？怎麼激化的？怎麼收場的？

1973年11月12日，毛澤東會見了基辛格，談話的主題是“聯美整蘇”。事後基辛格寫道：“我們開始明白在這次訪問中為中國外交政策規定官方路線的並不是周恩來。”周當然更會注意到這一點，知道毛近來對外交工作的敲打，火氣是來自嫌他在外交上搶了鋒頭，因而在對基辛格會談中謹言慎行，處處把毛放在前面。

會談中，基辛格按照慣例向中方通報蘇聯軍事動向，對外傳蘇聯準備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外科手術式打擊的報道，探詢中美軍事合作的可能性，其中包括互通情報、向中國出售武器以及建立防止核戰爭的“熱綫”等內容。為人一向謹慎的周當然知道茲事體大，請示毛後答以：現在不談，等打起來再說。

13日晚，告別晚宴結束後，基辛格臨時提議，同周舉行一次單獨會談，繼續討論一下中美雙方的軍事合作問題。周恩來來不及請示毛，就談了，但並未表態，祇是表示報告中央，明晨基辛格上機前再予答復。

奇怪的是，第二天早晨，周並未請示毛，擅自表態：中美軍事合作的問題，雙方今後可各指定一個人繼續交換意見。

毛似乎正在等待着周邁出這一步，以便他出師有名，興師問罪。他把王海容、唐聞生找去談話，並讓她們立即整理出周、基談話記錄。為了不讓周這次滑過去，老于權謀的毛，授意王、唐二人不露聲色地找周本人核實談話記錄。周還蒙在鼓裏，以為祇是技術性問題，並未在意。

隨後，根據毛的旨意，王、唐二人四處散風，說總理在這次會談中闖了亂子，被蘇聯的原子彈嚇破了膽，沒有請示報告主席，就向美國承擔了搞軍

## 還原 1957

---

事合作的義務，接受了美國核保護傘。

11月17日，毛親自出馬，對周及有關外交人員，放出狠話：“當你們的面講，政治局開會，你們可以來，在後面擺一排椅子，誰要搞修正主義，那就要批呢！你們要有勇氣，無非是取消你們的職務。”

根據毛的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隨後連續召開會議，主要是批周恩來外交路線上的“右傾投降主義”。

周又是檢討，又是解釋，又是送信，又是給自己戴上“修正主義”的帽子。而毛却認為他是敷衍過關。

早在一旁蠢蠢欲動的江青對毛的意圖心領神會，率先在政治局會議上向周開炮，想趁機在政治上把他搞臭。她胡攪蠻纏逼周交代在同美國人的會談中究竟幹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並按毛定下的調子，給周扣上“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弄得周連話都講不下去。

周不大相信是毛的意思，還以為又是江青在無理取鬧，所以盡量克制，希望毛能出面制止她的這種搞法。後來江青上綱越來越高，指責周“喪權辱國”、“蒙騙主席”、“給美國人下跪”，逼迫他承認犯了“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根本不容分說。周對這種政治上的栽贓侮辱，實在忍無可忍。當場對江青拍了桌子，說：“我周恩來一輩子犯過很多錯誤，可是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扣不到我的頭上！”

周的頂牛，正好給毛以大做文章的口實。毛隨即下令擴大批周會議的規模，並親自擬定了列席會議的名單，除了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即姬鵬飛、喬冠華、黃鎮、曦東和王海容、唐聞生、羅旭、章含之以及中聯部部長耿飆參加以外，還有鄧小平。這樣，批周的政治局會議就改為政治局擴大會議，主持人由周改為王洪文，王海容、唐聞生擔任毛的聯絡員，毛通過她們遙控會議的進展。

從11月25日到12月5日，對周展開了前所未有的批判鬥爭。為了給會議加溫，會議一開，就由唐聞生介紹情況並傳達毛的批周最新指示和對外交工作的批評，足足講了八個小時，調門非常之高，許多用語與毛對劉少奇、林彪所使用的一模一樣。諸如：外交部是周恩來的獨立王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外交部不執行毛的外交方針，因此要“甩石頭”（此語是毛對林彪所用策略，意為發出警告——高文謙注）毛還危言聳聽，說周要當蘇聯的兒皇帝！

周才猛醒過來，原來不是江青和他過不去，是毛本人的意思。行了，就按毛定的調子給自己扣帽子，潑污水吧！

會議的發言：“賣國”、“屈膝投降”、“目無中央”、“蒙騙主席”，等一類提法比比皆是。牆倒眾人推。更有人乘機泄私憤，翻老帳，狠踹周一腳。

江青提議並經毛批准，成立了批周幫助小組，由四人幫和汪東興、華國鋒組成——江青開炮，甚至於提到路綫鬥爭高度，說什麼“第十一次路綫鬥爭”，這已是見多不怪。問題是鄧小平的發言，對周做了誅心之論，僅僅幾句話就把毛對周的欲加之罪講了出來，而這恰恰是讓周恩來深感委屈的地方。鄧並非不知道這一點，但為了重新獲得毛的信任，還是昧着良心講了出來。

周曾求見毛，當面做檢討，被一口回絕，說沒有必要，要檢討就在會上作。江青則以幫助小組的名義，責令周必須自己動手寫出檢討，其他任何人不能插手。周低首下心，唾面自幹的姿態，再加上毛剛過林彪事件，形勢剛穩，離不了周收拾這個爛攤子。對周的檢討作了批示：可以了。

怎麼一個謹小慎微的，以“外交無小事”作為秉持的人，怎會作出膽大妄為、自作主張的事呢？簡直不可思議！原來他在時間緊迫的情況下，曾打過電話向毛主席請示，但被告以“主席正在睡覺”。毛認定他人睡後周是決不會打擾他的。周的警衛曾記載了他在辦公桌旁團團轉的情況；事急又不能等，於是，出于關心和保護主席的安眠，便“自作主張”地做了本屬自己職權範圍之內的事。不料中招而禍從天降。

陰謀的尾聲更有意思，實際也是更可鄙。毛嫁禍于人，讓王海容、唐聞生背黑鍋。他指着王唐二人說：“她們整我，整總理，在我頭上拉屎撒尿，將來就是要說她們整總理。”對此，王唐二人私下發牢騷說：“他做臉，我們做屁股。”他這般卑劣鄙俗，連兩位小姐都看他不起。

俗話說，“看了《三國》戲，低頭就是計。”縱觀毛澤東一生，一舉一動盡是做戲，一顰一蹙全是詭計。這當然不能簡單歸結于他自幼就把《三國》當成人生教科書。而是更復雜的原因，造成毛又陰險又惡霸的作風，毛16歲時寫的狂言《七絕，咏蛙》：“獨坐池塘如虎踞，綠蔭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倒是毛個人專權，決不容他人在權力上染指；不容他人在政見上置喙的心態的活靈活現。

在這衆多事實面前，陽謀說和變卦說（原無意反右派，後來才變卦的）再也無存身之地了。況且，持那些說法的人，也多是，說着說着就變換了

主題，反而成爲對“陰謀說”的論證了。

我以王若水先生爲例加以說明。他說：毛“在提出這個方針時，這既非陰謀也非陽謀。毛澤東當時確實是想走一條與蘇聯不同的道路。誠然，毛開始時預料會放出一些毒草，但並沒有想到有這種規模（這話不對。第一，毛想到的比這種規模要大得多，甚至想到嗚呼哀哉重回延安；第二，毛在5月15日告知高層要反右時，主要毒草都未出土，規模仍是小得很；第三，退一步說，如果規模小到祇跳出一人，此人名叫胡風，又當如何？——紫丹）；他主要希望看到大量香花，他要保護這些香花。他自己也是一朵香花，被那些教條主義者指責爲毒草；他現在要保護那些新的香花不被誤認爲毒草而遭到踐踏（？）。從整風以後，黨外人士、知識分子批評的尖銳程度超過了毛的預料，當時幹部的怨氣也超過毛的預料，於是，他來了個急轉彎（與文革時幹部的怨氣發展到形成“二月逆流”相比怎樣？他爲什麼沒來急轉彎？）”，（《新發現的毛澤東》第275頁）且看他隨後在第293頁又是怎麼說的？——“在這次會議（1956年11月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可以看出（毛和劉、周）有不一致的地方。一，在如何吸取匈牙利的教訓上，劉少奇強調搞好經濟，關心人民生活，擴大民主，反對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要限制領導人的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毛澤東則強調階級鬥爭。在經濟建設的方針上，周恩來強調穩妥可靠，批判了1956年的冒進傾向；毛澤東則強調不平衡是絕對的，錯誤難免。在第一個問題上，我們看到了來年‘反右派鬥爭’的殺機；在第二個問題上，則爲其後的批評反冒進和大躍進埋下了伏筆。”

好一個“殺機”！先一年有“殺機”，“來年”動手殺，這本是順理成章的事，哪裏用得着“急轉彎”呢？

由“殺機論”導致“急轉彎論”，在邏輯上，無論如何也是說不通的；而在事實上，二論則是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的。祇有毛先有“殺機”，後來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才會有“急轉彎”，同時，這也才叫做“急轉彎”。

我所以說王先生發現的這個“殺機”好，好就好在，這使我們看到，毛1956年懷有“殺機”後，1957年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和宣傳會議上以及天安門城樓上，請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所表現的態度誠懇，開放開明，溫柔敦厚，談笑風生，活潑風趣，甜而且美，臉上堆着笑迷迷……這一切，是爲中國人形容陰險毒辣，陰謀詭計的詞語——“口蜜腹劍，笑裏藏刀”，作了一個血腥的表演。同時使人們反思到，如果不是出于陰謀，他的這番表現，與對梁漱溟

的潑婦罵街，對胡風因言定重罪相比，是極端反常的，也與他“哪個蟲兒敢開口”的、不容他人置喙的一言堂惡霸作風，絕不相容的。一脈相承，你看鄧小平對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是如何把“殺機”變為血肉橫飛的。王若水先生在《壓制思想的思想運動——讀李洪林的〈中國思想運動史〉》一書中說：

關於“六四”，作者指出，當局如何一步一步為戒嚴和軍事鎮壓製造借口，“顯然，祇有把事情弄到用戰爭解決問題的程度，才能玉石俱焚，才能把政治對手一網打盡。應該說，這才是真正的‘有計劃的陰謀’……如果廣場上的絕食早日適可而止，拔腿走人，陰謀家們將極度失望，因為學生們沒有落入圈套。而學運領袖的失策，正好對方的陰謀得以完全實現。這個教訓是極其慘痛”。我多麼希望那些身在海外的學運領袖好好反思一下這個教訓啊。（《當代中國研究》總 70 期）

### 三，毛澤東的“實事求是”考

“實事求是”一詞，最初出現於東漢班固撰寫的《漢書·河間獻王傳》，講的是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這本是西漢古文經學派提出的一個考據學的實證命題，是指一種嚴謹的治學態度、原則和方法。後來成了古代學者治學、治史的座右銘。唐代學者顏師古在對《漢書》作注時，把實事求是解釋為：“務得事實，每求真也是。”他把它分作兩層意思來解說：先說“實事”，即務必要弄清楚真情實況，“實其事”。次說“求是”，是要“求真是”即真理。“每”是每每，有反反復復、萬變而不離“求真是”之宗旨的意思。“也”者，表明是一種完成式時態，意味着要一竿子到底。實事求是這個成語的語法結構跟它的反義詞“弄虛作假”一樣，都是“動賓+動賓”——雙動賓構成聯合關係。

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對“實事求是”作了這樣一個新的解釋：

“‘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

盧志丹在《毛澤東“實事求是”的國學溯源》一文中，對毛的實事求是觀作了所有中共意識形態宣傳者眾口一詞的鼓吹，下面是我建立在對盧文（**黑體部分**）評析的基礎上所作的立論：

毛澤東的上述論斷既繼承了“事即物”，“是即理”的中國傳統哲學思

想，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用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改造傳統的“實事求是”命題，從以下幾方面闡釋了實事求是的科學內涵：

第一，毛澤東科學地界定了“實事”的內涵，肯定了客觀存在的“實事”是人們認識的對象和出發點。毛澤東把“實事”明確地界定為“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這裏的“實事”不僅是指與意識相對而存在的物質，而且主要是指與主體相對而存在的客體。“實事”作為人們認識的出發點，是與人們的實踐緊密相連的，從這一意義上講，“實事”就是人類活動的一切客觀條件，也就是“實際”。這就為“實事求是”奠定了牢固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基礎。

### 駁論之一：毛徹底摧毀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基礎

“實事”的“實”原本是個動詞，是核實、證實、落實、求真的意思，就是“實其事”。毛捨此意，而在認識論領域把它曲解為天然地明擺着的、不分青紅皂白、真假善惡而唾手可得的“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這樣對“實事”的“實”進行了閹割，祇留下了“事”，解做“事物”，或把“實”當作定語，解為“客觀存在的”；諸如此般，就都破壞了原來的動賓結構而使人在“事物”面前省去做核實、證實、落實、求真的功夫了，在“實”字上無所作為了。奇怪的是，盧文竟說：“這裏的‘實事’不僅是指與意識相對而存在的物質，而且主要是指與主體相對而存在的客體。”簡直令人莫名其妙！到底這麼說有何憑據呢？這是一句話毫無根據的徹頭徹尾的空話、假話。要知道，與人無關涉、而僅僅是“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在認識論領域就是“無”。祇有採取“實其事或不實其實”的態度和做法，才算是使二者建立起了主、客體的關係。在這一點上，毛比費爾巴哈離馬克思還遠。費還是讓人在場的，把對象作為客體的。

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一句話中寫道：“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事物，現實，感性，祇是從客體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看來《實踐論》的作者在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的時候，正是在更差的水平上重蹈“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而面對“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認為應該發揮主體的能動性，“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的唐代顏師古，他說的“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這話，倒與馬克思主義的精



神實質有點暗通款曲。

我所以堅持要回歸“實事求是”的本真，決不是一味地在摳字眼，而是有其絕對的必要性的。因為“實其事”太重要了，是“求其是”不可或缺的大前提。無此前提，就會徹底地摧毀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礎。可以絕對地認定：無前者而能求到後者者，未之有也。

再則，“實事”也並不是如毛澤東輕佻地解說的那樣，像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着的“事物”；不費吹灰之力便可得到。相反，人類在撲朔迷離的世事面前，欲達“實其事”的目的，談何容易？全世界所有的科學家在實驗室裏，運用最先進的設備、使用最精密的科學儀器，終生含辛茹苦、嘔心瀝血，所表現出的獻身精神感天地而泣鬼神，所求者何？就是在求出事實的真相——宏觀或微觀的、定性或定量的真憑實據。從另一方面說，像對“實其事”，這麼重大、艱巨而無可逾越的一步，如果故意加以玩忽，讓人視若無睹，而却在下一步——“求是”上，裝腔作勢地大做文章，這樣“捨本”，怎麼能“求”到“是”呢？除非此人是毫無“求是”之意，全然一片玩權售奸之心。林副統帥在日記裏記載有，他的正統帥總是把不是他的意見強加給他，然後再來批判他；這算是信手拈來的供你思索、供你觸類旁通的一條綫索吧！這是對人，對所有人“欲加之罪”而慣用的險惡做法。

鄧小平不僅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是“實事求是”，而且宣稱自己是“實事求是派”：“國外有些人過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別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錯；如果要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較正確地說，我是實事求是派。”（《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09頁）那麼，他這個系統、完整解釋和貫徹毛澤東思想的共產黨人，究竟是怎樣地“實事求是”的呢？他能求到“是”嗎？他對反右運動定性說：“反右是正確的，問題是擴大化。”試問反右運動劃的右派99.99%以上都錯劃了，難道還能說“是正確的”嗎？怎麼會發生這種顯而易見、性質十分嚴重的錯誤呢？就是因為他在“實事”上采取“宜粗不宜細”的打馬虎眼的態度，首先不能對反右運動認真地“實其事”，這當然就“求”不到什麼“是”了。有鑒于此，我們就決意要反其道而行之，再也不能走他們毛、鄧這一條通過假相求歪理的的認識路綫，而是要本着不走樣的“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的本意，首先是嚴格地“實其事”，即先弄清真相；在此基礎上再“求其是”，即再來求出真理。祇有兩個“真”合二而一，才能、

也才是做到了實事求是——唐代顏師古所解說的那樣：“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在假相的基礎上，你就算有天大的本事、地大的能耐，也是求不出真理的。

在坐天下的日子裏，你若不“實其事”，却仍然可以“求”到帶引號的“是”（“規律性”）。何故？因為“是”是由着你的權力規定的。你說“外行領導內行是客觀規律”就是客觀規律。你說“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來一次是階級鬥爭的規律”就是階級鬥爭的規律。你說“右派是資產階級反動派”就是資產階級反動派。你說大躍進成績是“九個指頭”，劉少奇不認賬，你眉頭一皺，立馬就“求”到了“是”。這個“是”就是一句潛臺詞：“我看你劉少奇是活膩歪了！”

如果在打天下的日子裏你要不“實其事”，敵人的機槍、大炮就會不客氣地指點給你：讓你“每戰必敗”！這樣“求”到的“是”，是由累累尸骨、堆積而成。觸景生情，讓我節外生枝地附帶一句：組成毛澤東思想路線內涵之一的“群眾路線”，“實其事”則為炮灰主義矣。

“中國古代大軍事學家孫武子書上‘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句話，是包括學習和使用兩個階段而說的，包括從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展規律，並按照這些規律去決定自己行動克服當前敵人而說的；我們不要看輕這句話。”（《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1卷，第182頁）這句話的實質就是“實其事”。毛在這裏提醒道：“我們不要看輕這句話。”這句話就是叫人做到“知己知彼”、對己對彼都要盡力“實其事”。祇對一方“實其事”行不行呢？毛澤東堅決認為：“不行！”“有一種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種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們都是不能解決戰爭規律的學習和使用的問題的。”（同上）

他在戰爭問題上要重視而“不要看輕”、“實其事”的態度是嚴肅的、鄭重的、科學的、頑強的。為什麼還需要“頑強的”態度？因為，即使在和平時期，要想做到“實其事”也不是那麼輕而易舉的；而在戰爭中，要想做到完全的“知己知彼”就更是難乎其難了。正如毛說的：“《孫子》的規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仍是科學的真理。錯誤由于對彼己的無知，戰爭的特性也使人們在許多的場合無法全知彼己，因此產生了戰爭情況和戰爭行動的不確實性，產生了錯誤和失敗。然而不管怎樣的戰爭情況和戰爭行動，知其大略，知其要點則可能的。”（《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490頁）

按原意推論，“求其是”（百戰不殆）仍是“實其事”，是下一步的

“實其事”。如堅持完全地“實其事”（知己知彼），不期然而然地就會達到“求其是”（百戰不殆）。因為，如能堅持做到“知己知彼”，就必然能做到“百戰不殆”。反之，例如他毛澤東，不首先弄清社會主義是什麼，就要大搞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並且還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鄧小平後來承認了：“社會主義是什麼，馬克思主義是什麼，過去我們並沒有完全搞清楚。”（《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頁）所以，不限于中國，而且是在全世界範圍內，凡以無產階級專政為國體的、以共產黨為領導的、以馬列主義為理論基礎搞社會主義的政權，從誕生那一天起、到壽終正寢，無一不是以大量的殺、關、管，制造冤假錯案，實施國家恐怖主義而貫穿始終的。因為不需要“實其事”，對一個人的定罪是無需查證、核實，找出證據、證人，而祇需按着政治目的隨心所欲地偽造一切。如此這般，劉少奇便成了“叛徒、內奸、工賊”；原本一對冤家對頭的章伯鈞、羅隆基，毛澤東硬叫他們結成“章羅同盟”，後人稱之為“古今奇冤”；既可笑、又可悲。凡此種種都是不首先“實其事”而“求”到的、他心隨心所欲的“是”。反過來說，如果真的“實其事”，結果反而會“是”與“願”違，即：“求”不到他心目中追求的“是”，而會“求”到“真是”，即：“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而求到“真是”就會引火燒身，這是犯大忌諱的。例如以弄虚作假、扯謊撩炮為能事的大躍進，毛澤東却理“直”氣壯、義“正”詞嚴地說：“放衛星好，放了許多假衛星，還要放的。大放假衛星，有極大好處，無假哪裏來真？有假衛星，才有真衛星。”彭德懷在肯定成績（作假）的基礎上，說了點真話，這就犯了忌諱，這就讓他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從弄虚作假到倡假打真，黨的思想路綫是越來越挂着引號“實事求實”了。

如此說來，難道當年毛澤東那樣解釋“實事求是”，是居心為自己留下撒謊的後路嗎？不管是居心還是本能，大凡撒謊總是要露馬腳的。因為任誰都不能撒謊“一以貫之”，保證句句是假話，而是，總會有說真話的場合。這樣，真話與假話前後對照，就會弄得假話無地自容。如毛澤東談論戰爭時就說了“不能輕視‘實其事’”意思的話。但當他談到哲學的功能的時候，就照搬馬克思的話說，不在于了解世界、因而能解釋世界，而在于能動地改造世界。這就還是把輕重顛倒了，不首先着重“實其事”，而是着重在“改造”，如他搞的“一化三改”（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能“改造”好嗎？矛盾就發生在這裏。

這是撒謊者一方的規律。受騙者一方的規律則是：受騙者中至死不悟者畢竟是少數；決不可能大多數人都受騙而且至死不悟。這兩條規律起作用的結果，導致今天的大多數（包括鐵杆毛派）都覺悟到：“實事求是”在毛澤東、鄧小平口中純屬鬼話、謊言，而且是共產黨所有的謊言的總包裝。例如那本由江澤民題寫書名的《辭海》，修訂本在《毛澤東》條目下刪去“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一詞。有讀者提出異議，總編輯夏徵農回答說：“辭書應保持科學性和穩定性。對這個原則，我們是請示了中央的。”爲什麼他不敢理直氣壯地說：“我們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是實踐證明了他不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嘛！”他爲什麼會膽怯氣軟呢？難道檢驗真理的標準不是“實踐”或“實事求是”，而是“中央”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此題，我將在下面加以展開）這塊金字招牌，難道不是童叟無欺、而是愚弄顧客的掛羊頭賣狗肉嗎？實踐派和凡是派分工合作、殊途同歸：一個揭破“羊頭”，一個坐實“狗肉”。總之是，大家都在假戲真做，沒有哪一個傻瓜會相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超過相信“毛說了算”、“鄧說了算”、“中央說了算”、“黨說了算”、“頂頭上司說了算”的。說“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的柯慶施，之所以官運亨通、飛黃騰達，是因爲柯認準了毛最大的需要是讓人人都對他盲從、人人都對他迷信；從而盲、或信而不迷，皆有違于他的“認識論”的真諦。林副統帥說：“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這是他對共產黨所宣稱的思想路線活學活用，落到實處，所作的簡明扼要而透底的概括。這個概括說明毛澤東首先在“實事”（實其事）上弄虚作假，就使中國成爲一個謊言帝國在世界崛起。這個概括雖在定性上堪稱透底，但在定量上還不够徹底，還需要右派加以補充。著名的右派林希翎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召開的反右50年紀念會上說：“在中國，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連小事也辦不成。”

第二，毛澤東精辟地闡明了“是”的內涵，肯定了物質、事物及其發展規律的客觀實在性。他明確指出：“‘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毛澤東對“是”的這一科學界定，有很强的針對性和現實指導意義。在實際工作中，有的人常常把“實事求是”僅僅理解爲“務實”，而忽視了“求是”，往往容易導致經驗主義。“求是”的深刻涵義是要把握事物的本質，揭示事物的內在規律。

## 駁論之二：毛的“求是”，有甚于緣木求魚

上面提到，實踐是認識真理性的標準，這當然是實事求是的應有之義。否則，你“求”到的是不是“是”，是“真是”還是“假是”，由什麼來檢驗呢？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導致中共高層的權力重組。據作者之一胡福明的回憶文章《真理標準討論與解放思想》中說道：

“《人民日報》第二天轉載了。當天晚上，就有毛選辦公室的負責同志給胡績偉打電話，指責這篇文章，理論上是錯誤的，宣傳‘不可知論’，政治上‘很壞很壞’，是‘砍旗的’。汪東興尖銳批評了胡耀邦、楊西光、胡績偉等同志發表實踐標準一文。剛剛開始的真理標準討論面臨夭折的可能。”

又據參與寫作的孫長江回憶：

汪東興說：“不能因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衝擊，就把文化大革命說得一錢不值，最壞的是把矛頭對準毛主席。”（在中宣部和中央直屬機關新聞單位負責人會議上的講話）

又說，“文化大革命成績是主要的，是毛主席肯定的，不能批‘四人幫’把毛主席也批了。”（在山東視察時的講話）

《人民日報》原來的總編輯吳冷西打電話給當時的總編輯胡績偉，批評這篇文章是方向性的錯誤，政治上很壞很壞。說毛主席思想要經過實踐檢驗才成其為真理，是根本錯誤的。作者的意圖是引導人們懷疑毛澤東思想，目的是“砍旗”。林彪說“一句頂一萬句”，難道一句頂一句還不行嗎？當時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管意識形態，也是中共中央黨校的第一副校長汪東興，就說文章是對着毛主席來的，他們是代表哪個中央？當時《紅旗》雜誌總編輯熊復則說，毛澤東思想祇能維護，不能創新，不能發展。（孫長江：《我的一九七八》）

“諸公袞袞登臺省”。這些輿論陣地的領軍人物，都自以為是毛澤東思想紅旗的高舉者，說出上面那些話，顯示出一種當年紅衛兵“誓死捍衛”的氣概：“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砸爛它的狗頭！”難道他們不知道“實踐”派的論點是毛白紙黑字寫在書上、紅嘴白牙說出口外的嗎？真是大煞風景！他們的“捍衛”還有啥意思？其實他們是充當了安徒生童話故事中說實話的小孩，但却把老娘偷養漢子的醜事兜露了出來。新編的童話把原來的故事翻了

個過：皇上在衆臣簇擁下，走在大街上，沒穿內衣，空空蕩蕩祇披了件外衣。是傻小子跑到跟前，給他剝了個赤條條一絲不掛。“外衣”就是皇上宣稱的“實踐標準”；光了身子就露出了摸不得的“老虎屁股”——這就是皇上誠于中的真理標準：“朕說了算”。鄧小平心知肚明，他後來繼承毛的衣鉢、宣稱的“實事求是”就是那件外衣；光了身子則是：“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可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自始至終是欺人之談，也是自欺欺人。現在鄧小平用這個真理標準把華國鋒趕下臺，一朝權在手，真理標準就改成了：“我說了算，不爭論！誰敢跟我掄起批判的武器，我就跟他來武器的批判。”

既然討論真理標準之意不在真理，那你就別再具體分析誰在哪一點上有幾分道理了。例如當時“凡是”派反駁說：“共產主義沒有經過實踐檢驗，難道你能說它不是絕對真理嗎？”在1950年代初，我是在李達著述的《〈實踐論〉〈矛盾論〉解說》導讀下學習的“二論”。李達說：“人類社會都要到達于共產主義——這是馬克思在百年前認識人類社會所得到的結論。這一結論是客觀的絕對真理。由于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努力，已經逐步接近于這一絕對真理了。”（頁9）在今天，實踐已經證僞了馬克思的“絕對真理”；非但“絕對”，“相對”也不可得，實事求是地說，是罪惡滔天。可在那時，“凡是”派自以為抓住了洋理，是何等地為他們對“實踐”派的將軍而歡呼雀躍、自鳴得意呀！實踐派在凡是派的挑戰面前祇好掛免戰牌，“王顧左右而言他”。他們兩派，所有的共產黨人，在不願、不敢、不能實事求是這一點上是一丘之貉。他們，兩派，所有的共產黨人，都是在放棄“實事”的基礎上“求是”的；放棄“實事”來“求是”，豈不是緣木求魚嗎？他們會求到“是”嗎？而他們自稱是求到了“是”，而且是“大是”，即不僅是“真理”，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準、傳之萬世而不變的“人類社會都要到達于共產主義……這一客觀的絕對真理”。

返回爭論的出發點。說來說去，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實踐”派、“凡是”派兩軍對壘，都是在爭長子繼承權，爭摔“高舉”的老盆。所以鄧小平並不在應不應該“高舉”上做文章，而是轉移議題，提出：“怎麼樣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是個大問題。現在黨內外、國內外都贊成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什麼叫高舉？怎麼樣高舉？大家知道，有一種議論，叫做‘兩個凡是’，不是很出名嗎？凡是毛澤東同志圈閱的文件都不能動，凡是毛澤東同

志做過的、說過的都不能動。這是不是叫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呢？不是！這樣搞下去，要損害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為中央黨校題了‘實事求是’四個大字，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是這四個字。”（《鄧小平文選》一卷，頁121）

實際上不是四個字，而祇有“求是”兩個字。我前面說過，這是在緣木求魚。我現在還要更進一步說：這是“尤甚于緣木求魚”！為什麼？孟子曰：“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孟子·梁惠王上》）

共產主義運動是人類有史以來由錯誤認識導致的最嚴重的、最慘烈的社會實踐。這提醒人類：放棄“實事”、而來“求是”，認識不先于實踐、重于實踐，至少是穿插于實踐，則“後必有災”；這是必須記住的教訓。如果好了瘡疤忘了疼，有人再來用盲目實踐忽悠你，叫你為實現無中生有的烏托邦而奮鬥！你可千萬不能再輕信，你一定要認識準了再幹，並且在幹中求證認識。總之是先“實事”而後“求是”；這樣，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憤青是再也不能當了！人們要互相揪着耳朵問一聲：“你忘記了共產主義帶來的數以千萬計、萬萬計的生命、財產和無法計量的精神的損失了嗎？”這是20世紀留給人類最嚴重的歷史教訓。

第三，毛澤東科學地闡釋了“求”的基本內涵，肯定了人們在認識過程中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他指出：“‘求’就是我們去研究。”就是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去認識世界，探索規律。這裏的“求”不是一個靜態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祇有在實踐的基礎之上，通過從感性認識飛躍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飛躍到實踐的不斷深化，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質和規律。這一過程實際上就是人類認識的辯證過程。

### 駁論之三：毛是他一人在“求”，讓萬眾盲從

就像盲從、迷信是認識、求真理的死敵那樣，清醒、明智是愚民政策的死敵。毛以實事求是，追求真理，凡事都要問個為什麼，號召天下。其實，他是心不照口、口不照心，堅決實行愚民政策的。他對臣下的要求是：“磨道的驢——聽喝！”就是，驢拉磨，戴上蒙眼，聽從吆喝：叫走就走、叫停就停。必須做到迷信、盲從，稍有不從，則施以鞭策。毛澤東的群眾路綫的

具體實踐是運動治國、運動治黨，群眾運動、運動群眾；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烏有的。有是有，就是不讓你不知道。說“若驅群羊”，或比作“磨道的驢”，都是一個意思，都體現了他的愚民政策。還可以讓比喻來個現代化，比作“電腦”。實踐就是改造；對人改造就是洗腦；要刪除淨盡原存資料，輸入新的文件，導師毛澤東的思想便是總的程序設計，繼任者鄧小平又是號稱總設計師。從毛時代起，中國就成了電腦大國：那時是“八億神州盡電腦”，之後是“十三億舜堯盡電腦”。但腦裏的軟件——毛澤東思想是個寶，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一場球賽打勝了，都要說是一支毛澤東思想的響徹雲霄的凱歌。幸運的中國人，還用自己“求”什麼呢？大家祇用發揮受動性，由一個大腦來發揮能動性，“求是”就綽綽有餘了。

因毛澤東賦予其嶄新的科學內涵，這就使“實事求是”成爲一個包含唯物論、認識論和辯證法思想的科學的哲學命題，成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可見，毛澤東正是運用“實事求是”這條中國古代成語，科學地、簡明扼要地表述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把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和方法，升華到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高度，使它成爲既具有科學的哲學涵義，又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全新命題。這是毛澤東在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來分析批判中國古代哲學與傳統文化，對“實事求是”命題進行創造性的闡釋，用“實事求是”來表徵自己的哲學思想，使之成爲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精髓；並應用“實事求是”這一民族形式去創造性地闡釋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這是毛澤東在哲學史上的重大的理論創新。

### 總論：毛的“實事求是”是實事求是的反義詞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反義詞”說，我就要請反面教員來給你上課，題目是“論大躍進——中國怎樣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偉大導師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我們講的是實事求是的合乎實際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觀主義的多、快、好、省”，“今天（1958年5月8日）《人民日報》上登的是‘讓高山低頭，河水讓路’，我看這個話好……我們不是狂人，是實事求是的馬列主義者。”（羅平漢：《“大躍進”的發動》，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P36, 154）。如果你年齡太小，沒趕上大躍進年代，就請上輩給你補補這一課。然後你再回味導師說的大躍進農業高產衛星上天、鋼鐵元帥升帳“是實事求是的合乎實際的多、快、好、省”，“我們不是狂人，是實事求是的馬列主



義者”。恐怕你就會發出浩嘆：我們的導師怎麼能幽默到這步田地呢？年青人！這不是幽默。說大躍進是實事求是的，這完全合乎毛澤東思想詞典上的“實事求是”之真諦。他說的“實事求是”就是弄虛作假。世人皆知，大躍進是天大的弄虛作假，他偏說是“實事求是”、是“馬列主義”。又如，面對4,600萬餓殍，他却說：“我們一天一天好起來，敵人一天一天爛下去。”在反右中，他說：“人們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這裏處處顯示出毛主席在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毛澤東是天下之大勇者。我不知道除了他之外，還會有任何一個人會說：大躍進“是實事求是的合乎實際的多、快、好、省”？在文革中有“惡攻”的罪名。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祇有不要臉的人們，才說得出不要臉的話。”這一句毛主席語錄就是犯了惡攻罪，不過是他在惡攻自己。

《資治通鑑》，這部書毛主席看過17遍，宋人司馬光在書中引用句悅的話說：“故德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真，然後授其刑……”這裏說的“核其真”就是“實其事”，而“受其X”則是“求其是”，合起來就是從古到今常人所說的實事求是的本意。而我們偉光正的黨及其領袖則適得其反。因為不肯首先“核其真”，所以所有“求其X”幾乎是無有不錯的，即以“受其刑”一項為例，你去調查吧！冤假錯案率不能達到100%，就稱不起是“實事求是”的。

由於毛澤東要搞反義詞，並用來考核德、能、功、罪，所以當他用自己的面貌來改造黨時，就造就出一班“風（跟風）、馬（拍馬）、牛（吹牛）”黨幹和黨員。群眾對毛提出的黨的三大作風，遂作出了撥亂反正、去偽存真的解讀：“理論聯系實惠，密切聯系領導，表揚與自我表揚”。根據“負負得正”的原理，這個解讀倒是符合了真正意義上、不掛引號的實事求是。

什麼是反義詞？為什麼會出現反義詞呢？這不是一個語法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反義詞就是與該詞的表面價值適得其反的詞，例如毛說反右是個“陽謀”，事實證明是個“陰謀”。

讓我們分析：（1）掛羊頭賣羊肉是實事求是；（2）掛狗頭賣狗肉也是實事求是；（3）唯有掛羊頭賣狗肉，才是弄虛作假——成了實事求是的反義詞。羊頭代表善，狗頭代表惡，實事求是代表真，弄虛作假代表偽。（1）是真善，（2）是真惡，（3）是偽善。毛搞的是（3），是用偽善來推銷真惡。又如，大躍進是善，果如他說的“是實事求是的合乎實際的多、快、好、省”，

這就成了真善。大冒進或大躍退是惡。如果事實是大躍退而却對它宣稱是合乎實際的大躍進，則是十足的偽善。屬於（3）掛羊頭賣狗肉。毛主席對掛羊頭賣狗肉是深惡痛絕的。他當年為抵制國府的“統一”要求，曾說：“這是陰謀，這是借統一之名，行專制之實，掛了統一這個羊頭，賣他們的一黨專制的狗肉，死皮賴臉，亂吹一頓，不識人間有羞耻事。”潑婦罵街，溢于詞表。我這裏說的，祇是指“行掛大躍進羊頭，賣大躍退狗肉”。至于毛說的：“行賣他們的一黨專制的狗肉，死皮賴臉，亂吹一頓，不識人間有羞耻事”，這該是“不識人間有羞耻事”的人的天字第一號的夫子自道。

搞反義詞的根源在于，反面人物要講正面話，假裝正經，即婊子要樹貞節牌坊。所以就祇能口“正”心“反”了。這在中共治下的中國，已經不是一道風景綫，而是凡事皆如此的普遍現象了，諸如，到處皆是貪污犯大講廉政建設。這是没法子事情，因為能講廉政的祇有貪污犯，而廉政講得越生猛的人，貪污量也越大，級別也越高。你没聽說過“大貪污犯作報告、小貪污戴手銬”嗎？

共產黨把自己的篡政行為，美化為“解放”。什麼是解放？《現代漢語詞典》上解釋道：“解除束縛，得到自由或發展，特指推翻反動統治：解放區|解放思想|解放生產力。”誰不願意追求“解除束縛，得到自由或發展”呢？可解放後讓人領教的却是肅反、鎮反、剿匪、反霸、土改、三反、五反……絞肉機日夜隆隆盈于耳；挨整、被批、思想改造更是日日鬥、月月鬥、年年鬥，沒完沒了；饑腸轆轆還要被逼着交餘糧；朝不保夕，惶惶不可終日。被殺、自殺、餓死的人無計其數。無怪當時香港人民拒絕解放，一定要“祖國”跟他訂條約，保證資本主義制度 50 年不變，即，保證 50 年不從資本主義制度的壓迫、剝削、奴役下“解放”他們，他們才回歸祖國。同樣的原因，也難怪臺灣人民寧肯選舉主張“臺獨”的陳水扁當了兩屆總統。

這樣，“解放”呈現的就成了它的反面現象：束縛、挨整、監控、監禁、被告密、啼饑號寒、恐怖籠罩、被殺、自殺、餓死……至于共產黨所散布的美好的“社會主義”，在農民的心目中則徹底地失去了信仰，民謠為證：“社會主義好，天天吃不飽。社會主義工業化，不拉犁就拉耙。社會主義優越性，吃不飽也不敢吭；吭吭就是反革命。”

原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澤厚說：

我們是以社會主義作為目標的，我們是標榜自己是社會主義者的，實際

上我們這個黨，在取得全國政權以後，用國家把社會“吃”掉了，“國家”把“社會”吞沒了，一切都聽命于官方，聽命于官員！從幼兒園管到火葬場，從婚姻登記就開始管，而且管到火葬場以後，人已經死了，我們的政府還要管到他（她）的子女、他（她）的後輩。在談到他（她）的後代的時候，還要看看他的祖宗、他的父母是個什麼人，真是荒唐之極。總之，國家代替一切。

什麼叫社會主義？以社會為主義，為社會而主義，才叫社會主義！我們的目的就是為了社會的進步，為了社會的繁榮，為了社會的自主，為了社會生動活潑地自主向前發展。我們反對過去的政權對社會的壓制、統治、限制，所以我們是為社會解放而奮鬥的一群人。我們組成一個黨，就是不同意原來那種國家對社會的統治、限制、專制！是為了社會解放，不為了社會解放，你搞什麼社會主義啊？（李洪林：《朱厚澤的精神財富》，《往事》第100期）。這就是說，社會主義也變成了它的反義詞：消滅“社會”的“主義”。

毛澤東的所謂“實事求是”，經過考察而證實，適得其反。僅就反右派運動中所涉及的詞匯，列舉如下：

整風——虛晃一槍；群眾運動——運動群眾——炮灰主義；一人天下——黨天下——人民的江山；陽謀——陰謀；言者無罪——無罪之人言之無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大鳴大放——放屁有利論；香花——毒草——肥料；百家——兩家；（文革中江青表述如下：百家爭鳴，一家作主，最後聽老娘的；）有志于改革的志士仁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極右派、死硬派；人民內部矛盾——窩裏鬥；整人——幫助；擺實事，講道理——胡亂捏造，上綱上綫；人民內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解決——需要對你專政就劃你是敵我矛盾；辯論——及物動詞：聲討；右派帽子——緊箍咒——槍斃政治生命；思想改造——槍斃靈魂；勞動改造——折磨肉體——消耗生命；給出路——爬狗洞；坦白交待——自辱人格，痛罵自己，迎合上意，自我栽贓；喪盡天良——進步分子……

### 丙：認清反右派運動本質應遵循的方法論原則

錢理群教授在前幾年提出建立“1957年學”。現在這方面的研究已開

始取得豐碩的成果。我認爲總結一下經驗教訓，對推動下一步的研究是有好處的。爲此，我想就寫作拙著《還原 1957》，談一些心得體會。在我所運用的所有方法中，總結出三個主要的方法論原則，加以介紹。

### 一，掌握總、分原則：

知“分”不知“總”，祇見樹木不見森林；知總不知分，祇見森林不見樹木；知總又知分，既見樹木又見森林。

對掌握總、分原則的運用，就是在對從“現象”到“本質”，從“部分”到“總體”的認識基礎上，再利用對“本質”與“總體”的把握來理解“現象”與“部分”。作爲具體方法叫做“總分法”。

前些時臺灣舉行毛澤東的影展，據說他“微笑”的魅力傾倒了觀衆，甚至於有的認爲，他還是有人性的，過去不應該把他妖魔化爲殺人魔王。這使我認爲，是蔣中正先生實在對不起這些（僅限于“這些”）臺灣人，使他們没能親身領受足毛主席的“微笑”。我已讀到領受足毛微笑的大陸人傾吐的自己的血淚控訴。但我希望人們都來分享右派的感受。著名作家、右派分子從維熙在《走向混沌》中說：“張滄（張滄是他的也劃了右派的自殺未遂的愛妻）和許許多多知識份子命運的悲劇，正深藏在你那嘴邊慈愛的笑紋之中呢！”（第 87 頁）用總分法就會看出“微笑”滴瀝着的億萬人的血淚！臺灣這部分觀衆就是一葉遮目，缺乏對毛的總體認識。被毛澤東鋼刀直刺胸懷的右派分子，是不會對“笑裏藏刀”產生“魅力”感的。

言歸本題。經過 50 年的研究，我們得出一個對反右運動的總體認識。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郭羅基教授指出：“1956 年在中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合格的，也是不合法的。這種社會主義叫做主觀社會主義，農業社會主義，封建社會主義。主觀社會主義的建立取決於共產黨的一黨專權。一黨專權既違反憲法，又違反馬克思主義。

“1957 年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潮’，就是以民主反對黨主，反對黨主操縱的主觀社會主義。共產黨進一步以僭越了的國家政權的力量，來鎮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他得出的結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是一個正確的命題。”在這個正確的命題面前，當時的反右派，和後來的鄧小平的“反右必要論”，就不僅僅是站在歷史的錯誤的方面，而且是倒轉

歷史的車輪，開歷史的倒車。

至于說發動反右的手段是陰謀，是陽謀，或是沒有預謀，那祇是臨門一脚的問題。方勵之教授已從總體上對此問題作了科學的論斷：“現代科學的實證精神和方法並非僅僅與中共一兩個政策相矛盾，而是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根基——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君臨一切之上是難于共存的，所以，一批傾向自由主義的青年知識份子與共產黨之間的離異，或遲或早是注定要發生的，反右運動祇是加快了離異的進程。”這個“難于共存”，就是共產黨所說的“與右派是敵我矛盾，是你死我活的鬥爭。”“1957年學”就是要研究右派前瞻性的大鳴大放是如何推動歷史前進，和共產黨發動反右派是如何開歷史倒車的。這是一個總的大前提。古人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當然，也不能忽略對某一部分，甚或某一微小細節的研究。比如說，我在書中第二篇“反右派運動的歸因研究”和兩篇論文《毛澤東“引蛇出洞”考》和《中共發動反右派鬥爭的前前後後》中，論證了“陰謀論”，否定了“陽謀”和“沒有預謀”的說法。但在我讀到胡平先生的文章中說：“作為毛的醫生，李志綏能夠觀察到毛的情緒的起落。這往往比毛那些意思含糊、前後矛盾的講話更能說明問題。李志綏觀察到在1957年的5月中旬，毛的情緒很壞，‘最後毛幾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鬱，患了感冒，把我叫回來，睡眠更加不規律’。”胡平是擅長於講道理的，包括這次，都很令人信服。這倒引發我深思：如果我的“陰謀論”成立，這時候毛何以會情緒如此呢？這的確是如胡平所說：“這往往比毛那些意思含糊、前後矛盾的講話更能說明問題。”經過研究，澄清情況：1，這並不完全是李志綏的觀察，而是“林克的看法，毛這次是受到重大打擊。”（《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187）；2，林克在《歷史的真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證言》中說：“當時毛的確因為患感冒而身體不適，並不是李志綏捏造的我所說的‘毛這次是受到重大打擊，而形體衰弱，精神憂鬱’。”（頁58）雖然我們不能確定誰說得對，但也不能確定誰說的不對。這就成了“原告一張紙，被告就該死；被告一張紙，兩下都有理。”

總分法是正確認識毛澤東和中共的科學方法，別說中共一向是黑箱作業，即便將來檔案解密，不用此法，仍可置你于烟霧之中。俗話說：“問路問來人。”司馬璐就是過來人。他說：“研究中共黨史的一個最大困難是，中共原始文件本身，經過權力鬥爭，或路線改變的影響，時時被否定或篡改。甚

## 還原 1957

---

至毛澤東本人的著作，經過一再刪改，不同年月的版本，說法就大不相同。所以，要鑒定一份中央文件的真偽，足够的原始資料固然重要，另一方面，有關中共的全面知識，以及閱讀的判斷能力尤為重要。”（《中共歷史的見證》，頁 418）這就充分說明了運用“總分法”具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如果你認清了毛極端自私自利的惡劣本質，他是一個自私到“家”的人，對他的妻子們都可以翻臉不認，難道你還指望他對你比對楊開慧更有情意，更有愛情，更有親情，更有友情，更有同志之情嗎？認清這一點，就請你放棄一切幻想吧，包括投機心理在內！

如果你認清了毛澤東從來就是品質惡劣，性格暴戾，作風專橫跋扈，從大殺 AB 團、延安整風、鎮反、肅反、三反、五反、破口大罵梁漱冥、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文革——從肉體上消滅意見相異者李文林、袁文才、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周恩來直到小人物田家英，可知，他是決不許可“哪個蟲兒敢開口”的。難道他會許可他早已認定是美帝國主義第五縱隊、民主個人主義者的知識份子在藝術上百花齊放、科學上百家爭鳴，並用鳴放來幫助共產黨整風即把鳴放同時引入政治領域嗎？這絕對不可能是真的！真的是一場陰謀。

實際上，除掉毛 1957 年春季爲了“引蛇出洞”而拋出“雙百方針”，對知識份子好到反常的程度外，你把他的骨頭砸碎也是砸不出真正的“雅量”呀，“寬容”呀，“開明”呀，以及“民主與科學精神”的因子來的。

鄧小平說：“1957 年反右派是擴大化了，擴大化是錯誤的，但當時反右派的確有必要。大家都還記得當時有些右派份子那種殺氣騰騰的氣氛吧。”（《鄧小平文選》二卷第 345 頁）如果國人把握住鄧小平的雙手沾滿右派的鮮血這一基本事實，和李銳說他和毛澤東一樣左這一總體評價，以及國學大師牟宗三說他和毛澤東“是一丘之貉”：“共產黨耍的那些文字魔術，都是沒有意義的話，你聽他那些話幹什麼呢？偏偏有些人利用這個機會，去捧葉劍英、鄧小平，你捧他作什麼呢？其實，說穿了，還不是一丘之貉。當年鄧小平作副總理的時候，還不是順着毛澤東的話轉，還不是一樣地拍馬屁。根本的關鍵在於共產黨的本質即是徹頭徹尾的摧殘、斫喪人的廉耻。”那麼國人對鄧的胡言亂語，就自然會認爲：“你聽他那些話幹什麼呢？”

毛澤東衝着鄧小平左得過人，才說：“那個小個子的前途，不可限量。”所謂“還原歷史”，就是一是一，二是二地還它以原貌。就着總分法來

說，就是有總有分：有分無總，祇見樹木；有總無分，祇見森林。在拙著中，我是怎樣把握這一點的呢？可以從我區別對待鄧小平與柯慶施作為例子。

許多寫關於反右的文章，涉及到上海，都寫那一位“毛主席的好學生”如何如何緊跟，好象他表現得最惡劣。總的來說，我對他的左也是恨之入骨，但我認為，對壞人也不能冤枉。柯在反右中，還真是沒有實行他的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他還真比不上鄧小平、彭真壞。請看我所了解到的他在這方面的某些表現：柯在反右中否定了不少下面送來報批的內定右派。《勞動報》總編馬達，總工會領導認為他是十足的右派。《文匯報》黨組書記欽本立，還有唐海，《文匯報》領導認為他倆够上右派。《解放日報》副總編馮崗，《解放日報》認為他够上右派。報批時，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替他們幾位解釋了幾句。柯慶施說：“這幾個同志是缺少經驗的問題。他們是有錯誤，不能做現在的工作了，給他們一點處分也是應該的，但不要劃右派。右派劃多了不好。這些人還是可以用的。”當時在場的《解放日報》副總編王維回憶這段往事時，說：“柯老的這些話都是最關鍵的一些話。在當時的形勢下，如果不是柯老講了這樣的話，石西民一個人是保不下來的。”

在柯慶施“右派劃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導下，上海市第二商業局整個局裏沒有劃一名右派。當時的商業二局局長裴先白說：“我們是搞食品供銷的，有的同志講些怪話我們就沒有打右派。不打右派的事，柯老沒有問過我。”

在柯慶施“右派劃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導下，上海科委系統的科技人員沒有劃一名右派。當時的科委主任舒文回憶說：“上海市委召開一次常委會議，柯老主持。會上發了兩個科學家的材料。從當時看來，他們的言論超過劃右派的標準。柯老把這兩個人的材料印出來交給大家討論，讓每一個人發表意見，會議開了一整天，每個人都發表了意見，大家意見不統一。這時，柯老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把這些人劃成右派對國家有利還是不劃成右派對國家有利？二、這些人都是從國外回來參加祖國建設的。他們為什麼回來？說他們反黨，不過是思想上有些轉不過來，他們絕不會反黨。柯老的這種傾向性意見啓發了大家，一致認為還是不劃右派為好。這件事造成的直接影響是，科委系統的研究人員一個右派都沒劃。”——在這兩個“漏劃右派”中，有一位始終不知道市委常委保他過關的情節。在反右派鬥爭45年後頗為詫意地回憶說：我1957年提出“科學院應該由科學家來管理，得罪了領導，

引來了麻煩，但是沒有把我劃為右派。”

在柯慶施“右派劃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導下，上海的外事系統沒有劃一名右派。

還有，關於在大學生中抓右派的問題，柯慶施告訴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楊西光：“應該實事求是，不能套比例。”

柯慶施的著名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裏有這樣一句話：“某些單位經過實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後，如果確實沒有發現右派份子，那就不要去進行反右派鬥爭”。這是何等鏗鏘有力的聲音！大家知道，1957年的反右一直延續到1958年。有一部分“五七”戰士實為1958年的兵。身為市委第一書記的柯慶施同志在那種形勢下能喊出這麼一句，是有千鈞之力的。這個報告是公開的呀！是代表市委的呀！在上海這次黨代會前後，不祇上海一地在開黨代會，與此同時，各地都有人在做報告。我粗粗對比了一下，更加體會到柯老這句話的來之不易。此說一出，雖不能力挽狂瀾，但擋住了一大批優秀人物被劃進中國55萬右派之中。由於柯慶施堅持“不能套比例”，以致上海雖然劃了15419名右派，但是，相對數還是比別處明顯“落後”。（鄧偉志《如何評價柯慶施》，《黨史縱覽》2003年第9期）比如說我們河南省，官方數字是70869人。

同理，陳伯達是文化革命小組組長，一貫地“左”，自不用說，但他在反右中就沒有胡喬木表現惡劣，起碼他沒為《人民日報》寫過一篇反右的社論，而胡喬木却是反右社論寫得最多，最惡毒的一個！

我們既然認為，對壞人也不應該冤枉，那麼，對毛澤東也當然不應該妖魔化。實際上，毛澤東之凶惡，之邪惡，之醜惡，之罪惡滔天，遠遠超出常人的想象，直到現在，有關資料仍大量密封於黑箱裏，祇存在估計不足的問題，尚不存在妖魔化的情況。相反，對毛認識的錯誤，大多是發生在對他的妖魔性缺乏認識；尤其是面對著官方的、民間的、政論的、傳記的、散文的、詩歌的、戲劇的、影視的，充斥著無恥的編造，肉麻的吹捧，無限制的美化與神化，興“熱”作浪；缺乏抵制。總分法要求從總的傾向與個別表現相結合地看問題，而不要抓住芝麻丟掉西瓜，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最後我還要提醒一點：如果毛本身就是妖魔，並且是妖魔中最惡最惡的惡魔，超過了斯大林、希特勒，那麼，當人們提到毛澤東這個惡魔時，難道還用得着妖魔化嗎？妖魔化論者就是對總體情況缺乏明確的認識。為什麼德國和俄國就沒



有人出來說“妖魔化”斯大林、希特勒呢？中國人呀中國人！劉賓雁生前曾氣憤地說：“活該受統治！”

## 二、施行內外原則的要求：

研究問題時既要入乎其內、又要出乎其外。

所以需要“入乎其內”，是因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例如，我書中提到的作家黃秋耘，在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邵荃麟家得知一個政治信息——邵放下電話，說了一句：“周揚來的電話，唔，轉了！”由此，他便對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陰謀得出判斷：“這個‘急剎車’的措施可能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直到5月中旬才決定下來。周揚那一級的高級幹部（他當時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宣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至早也到5月中旬稍晚一些時候才確知這一消息，我相信他知道以後，一天也沒有耽擱就通知了邵荃麟。邵荃麟在當天（5月18日）晚上就暗示給我。”今天看來，他作出的判斷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準確的。難道他是未卜先知的事前諸葛亮嗎？他用切身的體驗回答了這一問題：“事後聰明，人皆有之。最可貴的却是事前的聰明。但，政治上的先見之明，往往不完全是得力於敏銳的觀察力和周密的分析力，而是得力於準確的、及時的情報。比方那一個‘轉’字，哪怕我是個‘小諸葛’，5月18日晚之前，也是無法想得出來的。祇不過由於偶然聽到的一個電話，才‘頓悟’起來。”（《風雨年華》）

足夠多的例證，都說明了“入乎其內”的必要性。1957年“反右”開始後，上海市委得到毛澤東已撰《人民日報》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社論點名《文匯報》編輯部是“鬧資產階級方向期間掛帥印的”，而且帥上有帥，即章羅聯盟中的羅隆基，兩帥之間還有一帥，即“能幹女將”浦熙修。羅隆基——浦熙修——確定誰為《文匯報》之帥的“現實問題”。一天，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與當時分管宣傳的副部長張春橋同車去見市委書記柯慶施。途中，張春橋問石西民：“你看此帥應是誰？”浦熙修乃《文匯報》副總編兼駐京辦主任，能夠領導她的祇能是總編徐鑄成與黨委書記兼副總編欽本立，兩者之中必選其一。

石西民對張春橋說：“徐鑄成3月27日就出國訪蘇了，這幾個月《文匯報》由欽本立主持工作。徐出國前，毛主席曾親自接見，並對徐和《文匯報》給

了很高的評價。這個開資產階級方向的帥應該是欽本立。”張春橋答曰：“你說得不錯，但是老人家（指毛）的心思誰也吃不透，哪天他又要揪欽本立的後臺，豈不揪到你我身上來了嗎？還是定徐鑄成，再要揪徐鑄成的後臺，往章羅聯盟身上一掛不就了事了嗎！”石西民覺得有理，隨後柯慶施也同意了“定徐”。如此這般，徐鑄成的“右派”尚未經群眾揭發批判，早早內定了。而且，爲了徹底撇清上海市委，不留任何後患，《文匯報》中的黨員一個都不劃右，連原定要劃的欽本立與唐海反被塑造成“反右英雄”，藉以說明《文匯報》黨組織在上海市委的正確領導下，與徐鑄成爲首的民盟支部一直在做堅決鬥爭。

後來，事情還真讓張春橋說着了，毛澤東真要揪《文匯報》後臺，即揪徐鑄成的後臺，徐鑄成順杆子“掛靠”上章羅聯盟，違心承認接受了章羅的“思想領導”，算是檢討過關，了結“右”差。此後，石西民與徐鑄成再無任何接觸。1981年，徐鑄成增補全國政協委員，“文革”中也飽受磨難的石西民當面向徐道歉，並說出徐之“劃右”的這段秘史。可見，張春橋確有相當敏感的政治前瞻性，當時就看透了“老人家”，其日後窺機爬竿應時發迹，自在情理之中。

可知，如果不是石西民告訴他，徐鑄成本人還一直以爲“劃右”是自己發言惹的禍，深責自己“禍從口出”，自己不好。他怎能想到“劃右”另有秘情呢？（裴毅然：《徐鑄成“劃右”秘聞》）

還有，我在下面“半陰半陽說”中，介紹郭道暉對1951年思想改造中清華大學對潘光旦教授扭住不放，大惑不解。後來市委統戰部長對他交底，說這事由中央掌握，是有意對民盟右翼要敲打敲打，整潘光旦是要敲打羅隆基，警告民盟。因爲民盟唯一有政治資本挑戰共產黨的領導權。這使他領悟到，此乃1957年反右“陽謀”的序幕。如果他不是摸到這個底細，怎能把《“陽謀”背後的權謀——以親身經歷剖析整風反右運動》中的“陽謀”剖析得那樣準確和深刻！

但是，如果僅僅入乎其內而没能出乎其外，那就會“不見廬山真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如李志綏之所以太離譜地認爲，毛發動知識分子幫助共產黨整風是想借知識分子的刀，殺向那班“反冒進”的“黨內的敵手”，而不是預謀反右。結果他說，毛感到上了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的當。對此原由，我在書中已對他不了解外情，作過詳細的分析。

我和許多右派對於反右派鬥爭，也可以說是“入乎其內”的，但我們“入”的“內”太小，祇知道挨鬥爭的過程和感受：很需要知道人家左派怎樣策劃對我們的鬥爭；對全國的總形勢也祇限于讀到的報紙和聽到的報告；受到勞動教養處分後，和勞教、勞改的右派互通信息，擴大了我的“內”的範圍；及至粉碎四人幫來，我才讀到幾部反映反右派的作品，那也多半是作者看着共產黨的臉色寫的，充其量是打個擦邊球以嘩眾取寵，並不敢真正正視歷史和現實。在我到海外之後，才接觸到一些右派朋友的，和當年是反右積極分子現在良心發現了的朋友的回憶錄；也讀到一些這方面的國內外學者的論述和論著，其中《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鴻》、《晚年周恩來》、《陽謀》和徐平華的文章《九死一生 20 年》等給予了我較深的印象。我們右派所需要的“出乎其外”是，不要沉溺于悲情，要通曉“1957 年學”的研究成果，不能“出乎其外”的“入乎其內”是“陷乎其內”。下面，許良英對李志綏的批評就是說他“陷乎其內”。

林昭經歷了既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的過程。林昭青少年時期，受到來自母親的革命教育，及早追求革命，把毛澤東比父親，把黨比母親，參加過土改和新聞工作，直到在北大求學，看到同學被劃右派遭到殘酷鬥爭、無情批判，才恍然大悟，才從“入乎其內”中，認識到深受其騙而“出乎其外”，因而，才能置身、心于體制之外，比人們更早期、徹底地認清中共這個極權暴政的罪惡性質及其“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毛澤東的醜惡而偽善的真面目。

所謂“內外”，從定性說，是指面子和裏子；從空間說，以國分，有中國與外國，以黨分有中共與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以派分有左、中、右。如果沒能入乎其內，那就會“不是個中人，不解此中情”。比如，都承認斯諾這個洋大人是個中國通，先別說他對共產黨的隱情（毛總是故意布置迷魂陣，騙他）通曉得怎樣，光是他把毛澤東說成是打著傘旅行的“孤獨的和尚”，就可想而知這個“中國通”是多麼可憐了。天知道他在世界上散布了多少諸如此類的以訛傳訛、扭曲事實的故事？所以作為鄭重的學者，一個局外人，一個外國人，既要認清自己具有出乎其外，“旁觀者清”的優勢，又要認清自己具有“洋鬼子看戲”的劣勢。總之要有自知之明，不要太過洋洋得意。仍以“和尚打傘”為例，就算洋大人知道了這個歇後語的意思是“無法無天”，但因你自幼就浸泡在法制教育和法制環境中，這就使你很難能領略到浸泡在帝王術中的毛澤東說的“無法無天”的語意方面的皇權無邊、老子天下第

一和語感方面的“我是政治流氓，我在乎什麼？”的原汁原味。這和毛澤東不解地問基辛格：“爲什麼你們國內，對‘水門事件’這個屁事那麼在乎？”有點兒異曲同工。無獨有偶，英國記者麥克法誇爾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說什麼毛實行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是“自由化政策”；說什麼吳晗揭發批判“章羅同盟”的發言是反毛的；以及對毛和劉、周等之間關係的描寫，我讀後認爲，簡直純屬一派“海外奇談”。在這一點上，許良英先生是最權威的見證人。他說：

1973年出版的英國記者（後任哈佛大學教授，曾任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80年代已出了兩個中譯本。由于作者被認爲是英美中國問題研究權威，他開的“中國文化大革命”課又曾作爲哈佛大學的基礎課，我不得不認真去讀這本書。可是讀後，不僅十分失望，而且有被愚弄的感覺。請聽他在《引言》中所說的：“毛的政治局同斯大林的不同，那裏有辯論，主席也可能被擊敗，或者被人置之不理。”劉少奇“對機遇和個人使得黨的領導權落入毛的手中的情況有些忿忿不平。”他把“雙百”方針和鳴放說成是“自由化政策”，在《結束語》中說：“毛的自由化政策試驗的失敗，是對她領袖威信和權威的沉重打擊。”“毛不現實地設想通過整風的形式就可實現黨員品行上面的任何長期性的轉變。”他認爲文化大革命起源于毛澤東與劉少奇于1957年的“不和”，其主要證據竟出于我的口。他引用了1957年7月29日《人民日報》上我的右派言論：“中央分裂了，劉少奇、彭真壓制毛主席。”事實上，這句話並非我說的，而是清華大學一位朋友對我說的，我並不相信，祇是向哲學所黨支部匯報過，想不到他們把它捅給《人民日報》，變成是我最嚴重的右派言論，“美聯社”也當作新聞報道了。這純屬誤會，麥克法誇爾却把它當真，作爲“毛劉不和”的主要根據。這種效法所謂“克裏姆林宮學”寫出來的中國歷史，能有多少可信度，是值得懷疑的。90年代初，我曾給他本人去信，指出他不了解中國內情，對報上宣傳的都信以爲真，難免上當。我告訴他，毛澤東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足以說明“鳴放”絕非自由化，不過是一種“引蛇出洞”的計謀，他無法理解。中國帝王的權術謀略太“深奧”了，頭腦簡單的西洋人確實難以理解，我自己也是被蒙蔽了17年之後才恍然大悟的。

這個內外法的道理，余英時教授在寫給《當代中國研究》的出版祝詞中，

說得清楚明白：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中英文刊物之所以在西方能別樹一格，主要的原因是它們的作者群幾乎全部來自中國大陸，但同時又在西方受到了人文和社會科學的較長期的訓練。他們是在中國大陸成長的，因此有來自生活經驗中的內在知識；他們已熟悉西方學術界的操作方式，因此又能超越主觀的限制，對中國大陸的最近演變做客觀的了解和深入的分析。這種主客交融、能所兩忘的境界正是一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所追求的。而他們竟能自然的結合了起來，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一九八九年以後，許多過去親自參加過中國大陸開放改革的知識分子也大批地來到了西方。他們和八十年代起先後進入西方學術主流的中國留學生匯合在一起，更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研究隊伍。他們將對於當代中國的研究作出特殊重要的貢獻是可以預期的。我個人尤其高興看到他們今後能通過《當代中國研究》，將研究成果直接傳布給海內外的中國讀者。

本刊的作者並不是“隔岸觀火”式的所謂“中國觀察家”(China Watchers)，他們都有為中國大陸的繼續開放和改革貢獻一份力量的悲願。歷史已一再證明，十九世紀末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由于種種不得已的原因暫時寄居海外，往往能發揮意想不到的學術和思想上的效用，促進中國的現代化。今天已不是傳統的時代，世界已縮小為一個“地球村”了，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也不會再興“遠托異國，昔人所悲”的慨嘆。相反的，他們大可以把“異國”當作為中國儲才之地，潛心研究，一起在更長遠的意義上報效中國。

余教授反復強調這個內外法的運用，他為阮銘《鄧小平帝國》一書作序，寫道：“從作者所引用的大量文獻而言，《鄧小平帝國》顯然和一般置身事外者的客觀研究並無不同，但是我們通讀全文，便會發現作者本人最初也曾參與了這個帝國的創建。作為一個參與者，他是身在廬山之中的，然而作為這部帝國興衰史的撰寫人，他却能跳出廬山之外，因而看清了廬山的真面目。這樣主客統一的著作確是不多見的。這是此書最能吸引讀者的所在。”

許良英說：不少人，包括李維漢和陸定一，以及鄧小平定調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論述鳴放、反右歷史時，都重復毛澤東1957年5月以後那種自欺欺人的論調。出人意料的是，被官方斥為“自由化分子”的阮銘，直至80年代還持這種觀點。甚至1994年出版的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的回憶錄，竟也附和這種顛倒是非的說法，說什麼毛澤東“感

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自信心受到極大挫折，因此毛準備狠狠‘整’民主人士。”李醫生顯然不了解外界實情，輕信了毛澤東自編的由頭。”其實，何止阮銘！王若水說是“極拐彎”；趙紫陽說“陽謀”是“托詞”；胡耀邦說“引蛇出洞祇是短時間。”在識破這一陰謀上，有先見之明的，劉賓雁說，祇有鄧拓一人，我認為吳宓教授也該算一個；有後見之明的，有李慎之、許良英、劉賓雁、王若望……就多了。

作為方法，總分法和內外法，是相互為用的。要想能夠做到從總體上、本質上把握人和事物，就必須用內外法；而入乎其內和出乎其外在一個人身上，在某一方面往往不能雙全其美，就會產生偏差，而糾偏就要借助于總分法。這是在本篇中用來還原歷史和總結歷史教訓的主要方法。這個方法在本書某些章節，如在《毛澤東引蛇出洞考》一節中，就是用總分法說明毛在反右前後一貫是施展這一陰謀詭計的，陰謀已形成陰謀家的本質特徵。同時，也還運用了我下面要講的屬於追蹤前、後原則的“逆推法”。一般說，不可能祇單用某一方法。

### 三、追蹤前、後原則

瞻前顧後，前因後果，宜細不宜粗；既順藤摸瓜又順藤尋根，弄清脈絡，描述軌迹，闡明真相，揭示真理。

右派老祖宗章乃器先生說：“實踐檢驗真理；時間解決問題。”

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李洪林先生寫他那部《中國思想運動史》時，深有體會地說：“事情都是事後看得更清楚。”（頁 280）他這番感慨是出自如下背景：胡耀邦要發動一場關於“生產目的”的討論，遭到胡喬木的陰謀反對。後者找到黨中央主席華國鋒。華已領教過真理標準討論的滋味，當然不喜歡這個“生產目的”的討論。況且他在這兩個討論中的處境是一模一樣的。他正是舊經濟體制的代表人物，而且是主要決策人，“要搞十來個大慶”，就是他制定的。他知道這個討論將會給他帶來什麼後果。所以他自然不贊成這場討論。胡喬木又到鄧小平那裏，說華國鋒不贊成“生產目的”的討論。鄧小平固然不維護舊的經濟體制，但他不能不考慮舊體制後面的人，而且，“生產目的”問題又不像解決“兩個凡是”那樣迫切，出于政治權衡，就採納了胡喬木的意見。胡喬木又把鄧小平和華國鋒的意見端給胡耀邦。這樣一來，

討論祇好停下來了。《人民日報》爲此專門給胡耀邦寫信，要求繼續討論下去。胡耀邦把《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找去面談，希望報社照顧大局，也照顧他的困難。就這樣討論中途夭折。李洪林事後想，如果那時（1979年），經過討論摸到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規律，中國轉向市場經濟的步子，大約會提前十幾年。他說：“在1979年，人們自然不可能一下子看清這一點。”

李洪林就着另一重大事件（鄧小平廢黜胡耀邦），還說：“有些事情，當時未必清楚，過些時候回頭再看，就清楚了。”（頁306）當然，他這些話，是屬於無甚高深的經驗之談。正是足夠的經驗，使它便也具有了哲理性。

我在《反右派運動的歸因研究》和《中共發動反右派鬥爭的前前後後》中用的方法主要也是逆推法，順瓜摸藤，順藤尋根，由果推因，由終返始。如果我們沒有把握預報明天的天氣；難道我們憑借時空優勢，以後見之明，還不能“預報”昨天的天氣？站在今天看昨天，我們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例如有人說，毛發動整風是真心要除“三害”（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右派的猖狂進攻破壞了整風，經過反擊，打垮右派這個階段之後，再回到整風，即進入整改階段。這是當年中共召告國人的。當年懷疑者甚少；而至今相信者仍大有人在。要使歷史真相大白，祇能在反右之後看反右。反右之後看到了什麼呢？大躍進。大躍進不是整掉了“三害”，而是“三害”發了瘋，“三害”成了精！有人說毛是真心想通過整風克服政治弊端，不是右派進攻，文革會提前十年。好吧，文革過了，我們總算從革委會中看到毛克服了什麼樣“政治弊端”。這中間，國民經濟瀕于崩潰，餓死4,600萬人，受迫害的人，以億爲單位。從文革看反右，從大躍進看反右，我們看清反右不僅是卑鄙的陰謀，而且是毒謀，而且，蓋棺論定，毛耍陰謀的手段是無與倫比的，渾身充滿了陰謀細胞，可以當之無愧地稱之爲“陰謀的化身”。

再從反右往前推，毛以出奇的誠懇，笑容可掬，信誓旦旦，號召“知無不言”；而且猴不上竿直敲鑼。再之前，在黨內却對匈牙利事件定性爲有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對中國出洞的螞蟻，要採取後發制人，並要左派要做好準備。再往前推，堅決要蘇聯出兵匈牙利進行鎮壓，而且讓反革命多鬧鬧，人民看清了再鎮壓。這裏突現出毛反右的思路。再再往前推，批改劉少奇在八大上的政治報告，說共產黨主要靠工人農民監督，提意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意見多是從右的方面提的。這裏的兩個問題是：一，幫助黨整風爲什麼不主要號召工農鳴放，甚至于連次要也沒有呢？二，難道毛居心唯一

地要聽一聽從右的方面提的意見嗎？在之前……今天，中共解密的反右運動檔案，使這個“陰謀論”結論，更得到確鑿無疑的證實。

這三個是關於關於我進行論述的主要原則，也即方法論：總分法、內外法、前後法。還有一些是具體的但也為我所常用的方法，例如：引證法。

我為了讓讀者有所明斷，就大量引用了正、反兩方面的言論。就大量引用正面言論而言，我自己的想法是要證明，這不單是我個人的一家之言，而是有衆口一舌的基礎，是群言堂。從這個動機出發，我也很重視“轉引自”的運用，如《龍陳聯盟，胎死腹中》一文，我本可以引自原發資料，但那樣，就缺乏了胡平先生的參與。又如在《毛澤東本質》中，關於毛在“富田事件”中大殺異己，和後來的大反“反冒進”，這原是衆所周知的著名事件，我可以直接敘述。但我還是找了掛靠的文章和作者。其原因就是證明吾道不孤，更不是姑妄言之。

再則，因為我是一個平頭百姓，其實連“平頭”都說不上，而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五類分子，賤民一個。我每說一件事或一句話，耳邊就會響起一個質問：“你是怎麼知道的？”這是我在大陸聽到讀者對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和京夫子的《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二書的不同反映而受到的啓發。所以我力求我的書要像幾何證題那樣，每推演一步，必有理論根據，或根據公理，或根據定理，或根據定義，或是根據幾何原理而添加的輔助綫。總之盡可能地作到事事有所本，句句有根據。而後方能做到：“一分材料一句話，沒有材料不說話”。

三則，大量引用正反兩方面的言論，旨在把一些資料，如右派的代表性言論和毛澤東及其打手們的罪惡行徑，公之于衆，留存青史，向當代人和千秋萬世的人們，特別是不專門從事史學研究的讀者，通過接觸這些資料以明真相、辨是非、別善惡、定功罪，從而達到能當好歷史法庭陪審員的目的。

再如：窮舉法和點睛法。

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寫道：“攻其一點或幾點，盡量誇大，不及其餘。這是一種脫離實際情況的形而上學的方法，1957年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他們用的就是這種方法。”“一個人有十個指頭，要使幹部學會區別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我們的工作，除非發生了根本路線上的錯誤，成績總是主要的”。

僅從我掛一漏萬，所舉出的右派言論所涉及，就涵蓋了黨政軍民學、東



西南北中……這難道還是“攻其一點或幾點”嗎？應該說是面面俱到，幾無漏網。歷史證明，正確方面和真實方面是屬於右派一方的；歷史同樣證明，共產黨方面，如登在《人民日報》上赫然在目的右派言論的標題，所指出的那樣：“羅隆基說：共產黨處處是錯”。所以，實事求是的“指頭論”，正如後面以批駁毛說的“肅反成績是主要的”為例，以數學的精確性，算出爛掉9.4個指頭，沒爛的是0.6個指頭。就算如此，這個6%的所謂“正確”率，也是相對於中共中央肅反十人領導小組所定肅反政策說的，而這個殘暴不仁的政策是正確的嗎？何況這個十人小組又是個非法存在呢？

遠的不說，單說共產黨篡權後，在大是大非方面，有没有人敢對人民，對歷史負責地說：“我擔保毛澤東做的某一件事情裏沒有包藏禍心和罪惡行徑？”是土改？是鎮反？是剿匪反霸？是批判《武訓傳》？是抗美援朝？是三反五反？是批判《紅樓夢》研究？是反高饒？是統購統銷？是逼農民買餘糧？是農業合作化？是反胡風？是肅反？是反鄧子恢“小腳女人”？是反劉少奇鞏固新民主主義？是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是擁護斯大林主義？是反周恩來反冒進？是反右派？是屠殺西藏、新疆人民？是大躍進？是人民公社？是土法煉鋼？是反右傾？是餓死四千六百多萬條人命？是反三自一包？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是批《早春二月》、《北國江南》、《李慧娘》……？是批楊獻珍的“合二而一”？是批三家村？是批《海瑞罷官》？是文化大革命？（這本身就又是一個母題……）是在援外項目中揮金如土？對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有請中國的良心、共產黨的忠誠（雖因是“第二種忠誠”而給劃了右派）的黨員劉賓雁先生來作出通盤答復：“仔細回顧一下的話，1949年以後毛澤東各個方面的決策幾乎全是錯的，包括外交政策——沒幹一件好事。”（《誰是反革命？》）

二世鄧小平、三世江澤民、四世胡錦濤，各有各的賬，都是罪惡累累，罄竹難書，舉不勝舉，難於窮舉。所謂“窮舉法”也者，意在看問題務求全面，立論堅挺，無懈可擊者也。你毛澤東不是擅長於詭辯嗎？窮舉法就是專門解除哪怕像毛似的，無理辯三分者的全副武裝，給予殲滅性打擊。也就是常人說的“關起門打狗”。窮舉法就是“關起門”；狗便再也無法逃遁。

再則，我非常重視別人的點睛之筆，有選擇地引而用之，說出我心中之有之而筆下無之之意。有些點睛之筆份量較重，由有份量的人，例如劉賓雁說出，較易令人信服，因為一則他是著名右派記者，消息靈通人士，二則他是中

國的良心，寧屢受迫害也絕對不說假話的人。如果由我說出，上前讀者會想：“你這個人是老幾啊？”當然，也還有一種情形，尤其是對反面的材料，祇用別人畫的“籠”，我來由表及裏，作出“點睛”，揭示本質，達到讓其原形畢露之目的。

窮舉法和點睛法結合起來，就可以避免瞎子摸象，而達到摸着全象，得到真象（truth），即通過真相，得到真理；也即共產黨當作謊言總包裝的帶引號的“實事求是”，却被我們不帶引號地實事求是地做到了。

總之，廣泛地引證正反兩方面的東西，盡量做到窮舉而又重在點睛。點睛的要旨在于還原歷史，具體到本書，則是：《還原一九五七》。

## 中篇：對反右派運動的探源溯流

### 甲：探源

#### 一，反右“必然”論

我們事後通過對反右的前因與後果的內在與外在的聯系的觀察與反思，發現了反右運動的發生，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 （一）先從客觀方面講：

旁觀中共的歷史，所謂的“革命”，實質就是“反右”。其表現形式是：用槍杆作為武器的“批判”，或用筆杆作為批判的“武器”。有人會問：“不是也有反‘左’嗎？”但是這個“左”統統掛有引號，基本意思是“形左實右”，結果還是反右。尤有甚者，連掛引號的“左”，在毛澤東，也像阿Q忌諱說“光”、“亮”一樣，極力護短、反對批“左”，例如對林彪，明明是“極左”，毛却祇許批他的“極右”實質。這在共產黨的詞典裏也是說不通的。

“右”的實質，在他們心目中的基本含義就是保守、落後、反動，現在的說法，歸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說：“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沒有什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正。”（《鄧小平文選》二卷 182 頁）這就表明，極權主義與自由主義是水火不相容的。物理學家方勵之教授說：“現代科學的實證精神和方法並非僅僅與中共一兩個政策相矛盾，而是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根基——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君

臨一切之上是難于共存的，所以，一批傾向自由主義的青年知識分子與共產黨之間的離異，或遲或早是注定要發生的，反右運動祇是加快了離異的進程。

（《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發言綱要和作者簡歷》）陳彥博士從“意識形態專政”，來論證反右的必然性：

僅僅從共產黨與知識人的關係來看，從擁護還是反對共產黨領導的角度來講，將衆多理念上認同共產黨意識形態的知識人打成“右派”，也許是一場“誤會”，從主觀上看他們也的確是“無辜”的。然而，從意識形態專政的角度講，這種專政的目的本來就是閹割獨立精神、訓練不能思考的思想奴隸。無論知識分子對共產黨的批評建議多麼善意、多麼中肯，祇要他們還在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就表明他們仍然保持着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而從極權主義的邏輯來理解，知識人保持着思想能力與獨立精神這一事實本身，其實就意味着極權機器的失敗，表明中共建國後鋪天蓋地的思想政治教育並未使一部分知識分子喪失思想與判斷能力。在當局眼中，這樣的知識人自然就“其罪當誅”了。換言之，“反右”運動不能被簡單地解讀為一場知識分子與民主黨派人士上當受騙、共產黨翻臉不認人的卑鄙與冤枉互植的歷史“悲劇”：“反右”的本質一方面是共產極權主義自我擴張進而全面控制社會、禁錮思想的全能邏輯的必然歸宿，另一方面也是中共建國後知識分子對意識形態馴化的偉大抗爭。（同上）

這裏指出，毛共反右是一種命定的客觀必然性。

### （二）再從主觀方面講：

毛澤東居心要把剛建立起的一黨專政，即“黨天下”，加以強化，加以鞏固，變成共產黨的鐵打江山。面對當時國際反蘇反共風潮，國內工人罷工、農民退社、學生鬧事、知識分子求“解凍”的燃眉之急，他就動了“殺機”。

“殺機”說，是王若水先生提出的：“在這次會議（1956年11月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可以看出（毛和劉，周）有不一致的地方。一，在如何吸取匈牙利的教訓上，劉少奇強調搞好經濟，關心人民生活，擴大民主，反對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要限制領導人的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毛澤東則強調階級鬥爭。在經濟建設的方針上，周恩來強調穩妥可靠，批判了1956年的冒進傾向；毛澤東則強調不平衡是絕對的，錯誤難免。在第一個問題上，我們看到了來年‘反右派鬥爭’的殺機。”（就是這個“殺機”！特別要注意產生“殺機”的時間：與他所謂的“右派猖狂進攻”根本沾不上

邊，就連距他在下年二月末最高會議上講話、布置“陷阱”也還有三個月的時間。——紫丹）；在第二個問題上，則為其後的批評反冒進和大躍進埋下了伏筆。“（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第293頁）

毛的保健護士吳旭君說：“毛關心的是國家政權的穩定，而不是個人地位的安危。有一次他對我說：你看我們的政權能不能穩得住，會不會亂？”（林克、徐濤、吳旭君著《歷史的真實》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中說：“共產黨在民主黨派、知識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當然不可能有領導權，因為他們是敵人；在多數人（中間派）中的領導權不鞏固；有些文教單位還根本沒有建立黨的領導。必須建立對中間派的鞏固的領導權，並且盡可能早日鞏固起來。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心服，他們中的右派分子決心要同我們較量一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461頁。）

到底是他先有了殺機，要反右，或說“鎮反”，或說“肅反”？還是“右派分子決心要同我們較量一下”？薄一波在回憶錄中說：“反右開始後，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指出，‘反右派就是肅反’，‘新式肅反’，是‘清黨清團的好機會，也包括各民主黨派’。”（《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622頁。）這一點，又可與毛自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相印證：“鎮壓反革命，極有必要。1957年右派進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來了。”（李銳《廬山會議實錄》223頁）

所謂“造反”，是反什麼呢？當時主要是反對共產黨一意孤行地對農業、手工業、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等，以及此前的各項政治運動中的倒行逆施和伴隨而來的駭人聽聞的殘酷迫害。

就毛這時所說的“反革命”的性質，郭羅基教授遵循着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評論道：“1956年在中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合格的，也是不合法的。這種社會主義叫做主觀社會主義，農業社會主義，封建社會主義。主觀社會主義的建立取決於共產黨的一黨專權。一黨專權既違反憲法，又違反馬克思主義。

“1957年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潮’，就是以民主反對黨主，反對黨主操縱的主觀社會主義。共產黨進一步以僭越了的國家政權的力量，來鎮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他得出的結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是一個正確的命題。”（《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發言綱要和作者簡歷》）在這個正確的命題面前，當時的反右派，

和後來的鄧小平的“反右必要論”，就不僅僅是站在歷史的錯誤的方面，而且是倒行逆施，大開歷史的倒車。

歷史學家馮治軍按着馬列主義的唯物史觀講：“毛澤東認為，在經濟基礎領域實現了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一統天下後，在上層建築也必須實現單一的‘無產階級專政’（即共產黨一黨專政）的一統天下。然而建國以來形成的一些民主人士占據國家機關（如民主人士羅隆基時任森林工業部長，張奚若時任教育部長，章伯鈞時任交通部長，章乃器時任糧食部長等），以及知識分子把持了學校和各種文化事業單位的領導權，專家、教授、學者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都是與共產黨一黨專政的一統天下矛盾對立的。”所以他深刻地認為：“長期以來，在人們的認識中，反右運動似是一起偶發的事件，許多書刊、文章將當時的國際形勢——由蘇共‘二十大’引發的‘波匈事件’以及國內形勢——各地爆發了多起的罷工、罷課和上街游行事件這些表面現象，視為反右運動的起因，認為是毛澤東‘錯誤的估計階級鬥爭的形勢’而導致擴大化的錯誤。其實反右運動具有更深層次的因素，即這是毛澤東的極‘左’路線在上層建築領域的發展，即使沒有‘波匈事件’和國內的罷工游行，也是必然要發生、遲早要到來的。”（馮治軍《鄧小平與毛澤東》213-212頁。）

一方面，民主人士的反對“黨主”、“黨天下”，是絕對不可能不發生的。而毛澤東施陽謀，發動他們大鳴大放，他們在心有餘悸下仍是忍不住一吐為快。這便出現了1957年“不平常的春天”。右派鳴放（或以其他方式）爭民主，與毛共違背諾言，要堅持黨主、反民主，這樣的兩種思潮、兩種運動、兩種制度的衝突，或遲或早、或明或暗、或自覺或自發，絕對不出現是很難的。更何況作為矛盾主要方面的共產黨（實際就是毛），對他們處心積慮、引蛇出洞，聚而殲之？正如胡耀邦所說，有人不贊成鳴放，沒有人不贊成反右。毛澤東的陰謀，在維護“黨天下”的旗號下，受到全黨一致的支持。而毛要實現“得隴（鞏固黨天下）望蜀（建立毛氏一人的天下）”的狼子野心，則照此辦理，在再一次反右派的運動中“請君入瓮”；在《516通知》中明確規定，走資派就是右派。這裏預示了九年後的文化大革命和今天的反右一樣，具有同一的歷史的和邏輯的必然性。

## 二，反右“陰謀”論

反右派，是不是毛澤東預設之謀？若就着這個問題徵求意見，恐怕大多數人會持否定態度的，就是說，不贊成“預謀說”，當然更不贊成是“陰謀說”了。這是由于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實在令人如醉如痴；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關於“放”和“收”的講話，簡直令人心花怒放；在天安門城樓上共商整風，又熏熏然令人如沐春風。總之，大家對於雙百方針的心領神會是，春天到了，毛主席要讓百花都開放，不能是祇有幾種花開放，另有幾種不讓開放。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鬼話連篇，施行了催眠術，營造出一種心理狀態：心花怒放、眼花繚亂、鬼迷心竅。當然做夢也不會想到，毛的目的是讓毒草出土，便于鋤掉。

不堪回首憶當年。毛在1957年施行催眠術之前，在所有關於形勢問題結合知識分子問題的對黨內高幹的講話，都是殺氣騰騰地在論證：“反右派乃當務之急”，並把右派其人、其觀點對號入座地向黨內高幹作了交代。他要反右的緊迫感，與劉少奇真心實意要整風的緊迫感，兩個緊迫感是大異其趣的。茲舉一例以明之：

毛1957年1月18日（特別要注意時間，這是關鍵之所在。）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電影《武訓傳》，你們看了沒有？那裏頭有一枝筆，幾丈長，象徵‘文化人’，那一掃可厲害啦。他們現在要出來，大概是要掃我們了。是不是想復辟？”

一場刀光劍影、血雨腥風的反右運動在中國大地上雷厲風行地展開之後，毛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幹部會議上作《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的講話，說：“我們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的革命，是人民的事業。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業，社會主義革命是人民的事業，社會主義建設是人民的事業。那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好不好？有沒有成績？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右派否定人民事業的成績。這是第一條。第二條，走那一個方向呢？走這邊就是社會主義，走那邊就是資本主義。右派就是要倒轉這個方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第三條，要搞社會主義，誰人來

領導？是無產階級領導，還是資產階級領導？是共產黨領導，還是那些資產階級右派來領導？右派說不要共產黨領導。我看這一回是一次大辯論，就是在這三個問題上的大辯論。辯論一次好。這些問題沒有辯論過。”

毛這兩次講話，可以說是前呼後應，同時也說明反右運動是有的放矢，“的”是在前一次講話中明確地預先定好了的。諸如此類，毛在反右之後的種種講話、指示，幾乎全可找到“前呼”，因而全可被稱之為“後應”。我將在下面逐步地、具體地加以展開，這裏先舉出的這一例，已能透露出，反右是毛的預謀。毛本人也持“預謀說”，在這一點上雙方沒有分歧。但是，預謀可分為陰陽，“陰謀”也算預謀，“陽謀”也算預謀。李慎之說：“最為平實的說法是：不管是陰謀還是陽謀，總之都是預謀、是蓄謀。”（《毛主席是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炎黃春秋》1999年第1期第7頁。）這是應該被肯定的、然而却為官方諱莫如深的一個基本點。

毛把從延安到今天的“整風運動”，總結成一個公式，叫做“團結——批評——團結”。如果你沒有讓鬼迷了心竅，不從他說的詞句而從實際生活出發，這個公式便應該理解如下：“從分裂的願望出發（國共分裂，與黨外右派分裂，與黨內右傾分裂……），經過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在分裂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分裂（黨內毛林無產階級司令部與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分裂，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分裂，毛林無產階級司令部內部與林彪分裂）。”我是為了一方面揭穿毛澤東的鬼話，另一方面套用毛澤東的這個公式，得出他反右的公式：“從反右的願望出發，經過施展陰謀詭計，達到反右的目的。”簡化為：“反右——陰謀——反右。”

毛澤東承認是“預謀”，但不承認是“陰謀”。他說：“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祇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它們，毒草祇有讓它們出土，才便于鋤掉。”（《毛澤東選集》五卷：頁437）

看來，判定是陰謀還是陽謀，關鍵在於：“事先告訴了敵人”什麼？

### （一）階級敵人與黨外朋友

他當時並不是把告訴的對象心口如一地、就像現在說的這樣，說成是“敵人”，或者說像他在1956年11月15日八屆二中全會和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上，背着黨外人士咬牙切齒地說的，是烏龜王八、是鯊魚、



是代表反動階級，是放屁有利論；而是相反，偽裝慈祥地、揮灑自如地、嬉皮笑臉地稱他們為“黨外朋友”、“同志式的合作者”、“有志于改革的志士仁人”，給這些人散布幻想，讓他們自我感覺良好，自作多情地覺得他在毛的心目中還是“蠻可愛”的、“要團結他們一起奮鬥”的志同道合者。

## （二）同是“捨得一身剮”

當他當衆、而不是在背後講到“毒草”的時候，不但不是預警，明白說出讓它出土是爲了“便于”鋤掉，而是刻意掩蓋這一圖謀，解除人們這方面的顧慮。凡是聽過他講話或錄音的，都可以從語義到語感上覺出，他所說的“毒草”這東西往往是尚未被公認的新生物。如馬克思、孫中山、哥白尼、路德等，這些革命家、科學家、宗教革新者；特別是他強調指出，“正確的東西，好的東西，人們一開始常常不承認它們是香花，反而把它們看作毒草。”

“馬克思主義在開始的時候受過種種打擊，被認爲是毒草。現在它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還在繼續受打擊，還被認爲是毒草。”（如上，頁438-439。）返回“草”的本意，他舉出營養豐富的西紅柿一開始也是被當作毒草的。他爲了證明這次不是撒謊，還搬出當時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爲證：“是布爾加寧告訴我的。”爲了鼓勵大家鳴放，不要怕打成毒草，他慫恿說：“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議論譏笑，也不要怕向我們共產黨人提批評建議。‘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另一方面，他又向大家保證“在共產黨人方面，我們要給這些合作者創造有利的條件，要同他們建立同志式的良好的共同工作關係，要團結他們一起奮鬥。”（如上頁438-439，4，頁412）

這簡直象是黨內右派在煽動黨外右派，要以“捨得一身剮”的精神向黨猖狂進攻、鬧事……在後來的反右派鬥爭中，如果黨內有人也學着毛這樣向黨外人士說話，是絕對地要劃做右派的。

你別看他談笑風生、心平氣和的樣子，其實他早已暗藏殺機。一個多月前，他已給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作了交代：除了上述“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復辟？”繼而又說：“黨內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隨着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現在情況起了變化，他們不吭聲了。不吭聲不是本心，本心還是要吭聲的。”（《毛澤東選集》

五卷,頁 333-334)他後來號召大鳴大放,其實就是引發這些烏龜王八都來“吭聲”的。

他已做好了“要準備出大事”;甚至“再到延安去”這樣“嗚呼哀哉”的結局都假設了。再往前推,在上一年度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他就說:“你們怕群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十萬也不怕。‘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前後兩個“捨得一身剮”,其精神是相反相成的。他是先下定“捨得一身剮”的決心來鎮壓“文化人”的“復辟”、“鬧事”,架起了機關槍;然後才騙誘你要“捨得一身剮”,敢于鳴放,敢于衝鋒陷陣,投入‘幫助黨整風’的這個陷阱,跳進這個火力密織的火海。然而,你却自多情,受寵若驚,慶幸逢上“當今”這個知識份子的“知心”人。于是百鳥就都扯起嗓子“鳴春”了。

那些為毛打圓場,胡說毛是誠心誠意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人,有必要鄭重其事地回答如下的問題;而如下的問題却與誠心誠意請求黨外人士幫助整風是絕對地南轅北轍的:“為什麼毛先前對黨內高幹講話時,把問題說得很嚴重,其內容是這些文化人反對共產黨,捧波匈事件,要復辟,毛要讓他們“多行不義必自斃”,要對他們“後發制人”,態度是對敵鬥爭:咬牙切齒,充滿殺機;隨後在最高國務會議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却鼓勵文化人對黨提意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還要保證“言者無罪”,而其態度又是輕鬆愉快,談笑風生,嬉皮笑臉,笑容可掬呢?前後一個月竟產生如此天差地別的巨變,這是為什麼?”解釋不了這個“巨變”,你就不要對他後面的翻臉(也是巨變),再塗脂抹粉。

探索這個“巨變”產生的原因,我認為答案可能有如下幾個選項:

1,是文化人在這個極短時間內,有了脫胎換骨的質變,不再搞復辟了:

2,是毛對一貫敵視文化人的態度,有了轉變;

3,文化人沒有“質變”,毛也仍“敵視文化人”,毛之所以產生這個“巨變”完全是偽裝,是為把刀藏在笑裏:如他5月15日對內部最高層秘密布置的那樣:“大量的反動的烏烟瘴氣的言論為什麼允許登在報上?這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鋤掉它,消滅它。”(《事情正在起變化》)如果也把這話向“敵人”直說:直說鋤毒草,毒草便不會出土;直說釣鯊魚,鯊魚便不會上鉤;直說打蛇,蛇便不會出洞;直說殲滅牛鬼蛇神,牛鬼蛇神便不會出籠。所以早在4月30日,他約集各個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

人士談話，就如此這般地“事先告訴了敵人”：“現在已經造成批評的空氣，這種空氣應當繼續下去。揭露出來的矛盾在報上發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義永遠不得解決。”（《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實》頁62。）啊！原來“有言在先”說的是：“在報上發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義永遠不得解決”；而不是後來密謀的：“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鋤掉它，消滅它。”你可以看出，事先的和事後的，隱秘的和公開的……毛澤東都搞了些什麼鬼名堂？他搞的這是“陽謀”嗎？根本不是那回事！夫“陽”者正大光明也；祇能說是“陰謀”，“陰”者暗也，暗中搞鬼，惡毒地謀算人也。

### （三）鳴放就是“放屁”

“1957年，毛澤東談大鳴大放，說鳴放就是放屁，越臭越好。劉少奇後來發揮說，大家都聞到臭味，自然清醒。毛說，反右就是引蛇出洞，不是陰謀是陽謀，有些人三天不打屁股，就翹起尾巴了。劉加以發揮說：‘賤嘛！’劉少奇並說，他本來是反對大鳴大放的，認為鳴放的後果不可收拾。後來也覺得放屁放得好。”（司馬璐《中共歷史的見證》頁557。）

我再提供兩組相映成趣的鏡頭，以資人們領教，毛所謂的“陽謀”到底是一種什麼玩意兒？

一組鏡頭是，1957年3月2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會議上作報告曰：

第七點：“放”還是“收”？這是個方針問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一個基本性的同時也是長期性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性的方針。同志們在討論中間是不贊成收的，我看這個意見很對。黨中央的意見就是不能收，祇能放……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于講話，敢于批評，敢于爭論；不怕錯誤的議論，不怕有毒素的東西；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批評批評者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不是壓服，而是說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許人家說不同的意見，不許人家發表錯誤的意見，發表了就“一棍子打死”。這不是解決矛盾的辦法，而是擴大矛盾的辦法。兩種方針：放還是收呢？二者必居其一。我們採取放的方針，因為這是有利於我們國家鞏固和發展文化的方針。（《毛澤東選集》五卷：頁333-334。）

請看毛澤東在此提供的這幅民主、自由的“願景”是多麼誘人啊！其實，

他講話的原稿比這個修改稿更誘人，更親切，更可愛！比如他說，胡風的文章還是可以寫的；住班房是因為他搞反革命秘密團體。修改稿上就刪去了。這麼美好的方針政策，用“放”一言以蔽之。不過，毛澤東說出口的、欺騙世人的“放”，你道它實際上是個什麼東西？說出來會大煞風景的；原來他裝在肚子裏或祇說給高幹而要暗中保密的“放”，竟是“放臭屁”的意思。謂予不信，請看第二組鏡頭。時間則在前（！）一個半月。

1957年1月27日（注意日期！），毛澤東對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講話：

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够。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得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同上，頁414）

1957年6月10日，他又在《中央關於反擊右派份子的步驟、策略問題的指示》中說：“他們的臭屁越放得多，對我們越有利。”通過以上這些不同時間和空間的鏡頭，我們看到了毛陰一套、陽一套，左邊是人，右邊是鬼。

#### （四）陰陽臉

我們再來看一組同一時空、同一場景的鏡頭。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一副古代諷刺漫畫《陰陽臉》，或如川劇中于瞬息之間的“變臉”。

毛澤東看過冒廣生在《人民日報》上的文章《對目前整風的一點意見》後，派車接他到中南海。

“老先生講得好啊！”毛顯得神采奕奕，“你講，如果說共產黨沒得偏差，那就何必整風？批評是幫助黨員糾正錯誤。我們這次整風，正如你所說的，是‘愛人以德，相見以誠’。”

冒廣生自稱行年八十又五，經歷幾個朝代，從未見過今天的政治清明。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共產黨員也不會承認自己是聖人吧？

毛不住頷首傾聽。

冒稱對主席的“雙百”方針，起初懷疑會不會把思想搞亂。後來一想，各人立場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強人以苟同。國家無道，則庶人不議。人民敢說話是好事，不因其語近偏激而以為忤。祇要以國家為前提，而不是以個人為目的，那就叫“爭鳴”也可，叫“和鳴”也可。

毛以堅定的語氣鄭重宣示：“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個方針一定不變。”

當毛澤東信誓旦旦表態的時候，冒先生那個陪他前來的兒子舒湮，却無意中望見鄰座同志正在手握一束文稿，紙上有着毛批改的密密麻麻的墨迹，但見露出的標題竟然是：《〈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你看玄乎不玄乎？

告別時，毛握着冒先生的手說：“我過幾天要到外地去。希望你老明年再來北京。”又問：“老先生有何臨別贈言？”

老先生推心置腹，以誠相告……

“講得好呀！”毛趕上一步，用嚴肅的表情，右手搭着胸口說：“我一定牢記在心上。”（舒湮《1957年夏季我又見到了毛澤東主席》）

要知後事如何，現在已是事後，故早已水落石出：“九旬老人冒廣生先生萬萬沒有想到，就在這次談話後的幾個月，他就被‘擴大’到‘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隊伍中去了。”（葉永烈《反右派始末》頁230。）但見《陽謀》一書說：“歷史上空前的災難落到中國知識分子頭上時，冒老先生已經作古，無從知道自己被毛耍弄了，而他隨他晉見毛澤東1938年以記者身份訪問延安時曾被毛宴請過的兒子、劇作家冒舒湮則沒有逃過那場浩劫，成了百萬右派大軍的一員。”（頁199）。據我查證，此處有誤。冒老先生1959年8月10日作古于上海。至于他被劃右派一事，我後來在洛杉磯舉行的“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命運：紀念反右運動5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又曾親自向葉先生做了對證，確證事實無誤。

毛的所作所為，本屬最準確定義下的“陰謀”，他却胡攪蠻纏，說成是“陽謀”。無怪乎作家叢維熙放語問蒼天：“什麼叫‘陽謀’？‘陽謀’和‘陰謀’有什麼區別？”“張滄（他那自殺未遂的妻子）和許許多多知識份子命運的悲劇，正深藏在你那嘴邊慈愛的笑紋之中呢！”（《走向混沌》頁18-87）

### （五）陳其通杞人憂天與鄧拓“死人辦報”

如果說冒老先生曾擔心“雙百”方針政策會不會把思想搞亂，是出于對黨的自作多情的話，那麼，陳其通等四人聯名在1957年1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却反映出黨內大部分人憂國憂

黨的心態。毛澤東一面稱贊四人是“忠心耿耿，為黨為民”，却又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批評了《人民日報》刊載這篇文章，並且明確表態：“我是不同意他們的意見的。”他後來批評鄧拓：“陳其通四人的文章發表後，《人民日報》長期以來也沒有批評，直到今天，才有一篇社論，總算對陳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一個態。”

這篇社論說：“目前的問題不是放得太寬而是放得不够。黨的任務是要繼續放手，堅持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有些人對於黨的方針抱着不同的想法。照他們看來，這樣下去，思想將會一團混亂，文化科學發展的方向將要模糊，資產階級思想將要泛濫，馬克思主義理論將要動搖——總而言之，前途簡直是不堪設想。

在本報一月七日所發表的陳其通、陳亞丁、馬寒冰、魯勒等四同志的文章《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就是這種傾向的一個代表。他們在文章中對目前文藝界狀況畫了一副嚇人的暗淡的圖畫：“在過去的一年中，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向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越來越很少有人提倡了。”“真正反映當前重大政治鬥爭的主題，有些作家不敢寫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因此，使文學藝術的戰鬥性減弱了。時代的面貌模糊了，時代的聲音低沉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光輝在文學藝術這面鏡子裏光彩暗淡了。”

很明顯，這種估計是對於事實的一種極端歪曲……問題是何以會有這種極端歪曲的估計呢？這是由於，到現在為止，黨內還有不少同志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實際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們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極的現象，加以渲染和誇大，企圖由此來證明這方針的“危害”，由此來“勸告”黨趕快改變自己的方針……

毛澤東肯定了這篇社論，並向社論作者王若水說：“我要請你吃飯。”

人們不禁會問：毛澤東為什麼要對這篇後來證明是十足的“香花”的文章，以及後來被封為大左派的陳其通等作者大張撻伐，而對於《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又大動肝火呢？為什麼你正起勁鼓勵鳴放的時候，偏偏要打擊左派的鳴放呢？何況你還承認人家是“忠心耿耿，為國為民”呢？可憐的作者之一馬寒冰為捍衛毛澤東文藝路線，却被毛澤東給逼得“自殺”了。這該叫做什麼名堂？曰：“捨不得孩子打不着狼。”韓信所以將樊噲撤職，是後者干擾、破壞了前者“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謀略。

如果事實要象毛澤東說的是“陽謀”的話，他們四人還會“杞人憂天”嗎？可惜他“陰謀”耍得過深，不僅蒙騙了“敵人”，而且連自己人也坑蒙拐騙了。天下有先見之明者，唯鄧拓，他看透了毛澤東這個人，看穿了他耍的陰謀詭計。這使毛澤東起了曹操要殺楊修之心。

### （六）毛澤東的心中之鬼與鄧拓的先見之明

“這裏有鬼，鬼在什麼地方？”毛澤東問。

爲了表示對第一手資料的珍惜和尊重，我將當事人鄧拓的副手胡績偉先生的《自述》，照抄幾節如下：

毛主席說：最高國務會議和宣傳工作會議開過一個多月了，共產黨的報紙沒有聲音，你們按兵不動，反而讓非黨的報紙（指《光明日報》和《文匯報》）拿去我們的旗幟整我們。你們不是黨報，是派報。過去我說你們是書生辦報，不是政治家辦報，不對，應當說是死人辦報。你們到底是有動于衷，還是無動于衷？我看是無動于衷！你們多半是對中央的方針唱反調，是抵觸，反對中央的方針，不贊成中央的方針的。

鄧拓趕快檢討。但他的話多次被毛主席的措詞尖銳而嚴厲的批評所打斷。鄧拓解釋說：過去中央曾有規定，黨的會議不發消息，主席講話未公布前，也不引用。

毛主席說：什麼時候有這個規定？最高國務會議發了消息，爲什麼不發社論？消息也祇有兩行，爲什麼把黨的政策秘密起來？宣傳工作會議不發消息是錯誤的。這次會議是黨內外人士參加的，不祇是黨的會議，爲什麼也不發消息？黨的報紙對黨的政策要隨時宣傳。最高國務會議以後，《人民日報》沒有聲音，非黨的報紙在起領導作用，黨報被動，黨的領導也被動，黨報在非黨報紙面前丟臉。這裏有鬼，鬼在什麼地方？（《毛澤東怒批我們四小時》，《爭鳴》2001, 2）

以上摘自《毛澤東怒批我們四小時》，以下摘自《伴君如伴虎》：

毛澤東“引蛇出洞”的政策，在中央最高領導集團中，了解毛澤東真實意圖的人並不多。難怪毛說：“當時百分之九十五的老幹部都不理解。”那時劉少奇和鄧小平也被毛認爲是保守的。毛批評對他的兩次講話在“黨報上沒有聲音”，“而讓非黨報紙抓住了這面旗幟。”他表揚了《光明日報》、《文匯報》“鳴放”得好。記得鄧拓曾經對我說過：“主席說百家者兩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講

的雙百方針是假的，《人民日報》不能學《光明日報》、《文匯報》那樣鳴放，學了要出亂子。”鄧拓說：“《人民日報》如果也象那樣的鳴放，也被打成右派報紙，黨中央也會陷於被動，《人民日報》社內部又不知要增加多少右派份子。”以後事實證明，《光明日報》、《文匯報》都被打成“右派”報紙，兩家報社的總編輯都成了大右派。因“鳴放”得好而受到毛澤東贊揚的《中國青年報》，四個正副總編輯，三個當了右派，一個被撤職受到嚴重警告處分，中青報的領導班子幾乎全軍覆沒了。可見，毛主席批評說：“人民日報按兵不動，黨報被動，黨的領導也被動，這裏面有鬼，鬼在什麼地方？”看起來鄧拓就看出有一個“引蛇出洞”的“鬼”，有個能把“陰謀”說成“陽謀”的鬼，這個鬼就在毛澤東的心裏。（《爭鳴》2001,4）

以上說法，正合我意。區別僅在於，鄧拓有了不起的一點，先知先覺是也。“先”的時間跨度應在說“我就更相信他講的雙百方針是假的”之先。說這話表明，他過去就相信毛講的雙百方針是假的；于今尤甚（“更”）而已。

陽謀乎？陰謀乎？現已剝繭見蛹。毛澤東成竹在胸，是反右派鬥爭的始作“蛹”者。但是，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為官、為民的，在過去和現在，認為毛澤東原先並沒有打算要反右派的却大有人在，為他塗脂抹粉的也大有人在。這是由于人們給陰謀弄花了眼睛。最迷惑人的說法，竟然說“毛反右是被右派逼上梁山”的。

### （七）劉賓雁、許良英、李慎之的後見之明

被稱為中國的良心的劉賓雁先生，深為敬佩鄧拓先生的先見之明，他懷着感恩之情，說：

直到30年后，包括我在內的許多知識分子仍然未能識破這個騙局，以為毛的“引蛇出洞”的陰謀是在鳴放開始后意外地發現竟有那麼多人攻擊和否定他的政績以后才改變主意，決定反擊的。

有一個人（就我所知，也祇有這一個人）是從一開始就識破了毛澤東這個陰謀，並冒着極大的風險去同毛作了鬥爭的，那就是當時的《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鄧拓先生。他自然不能去揭破那陰謀，而是用了一種令毛澤東都難以問罪的巧妙辦法：當毛澤東四處“點火”時，他按兵不動。（1957年1月，陳其通等人那篇令毛澤東十分惱火的文章，鄧拓一拿到，就把它發排到頭版頭條）。表面上看似乎是他保守，對於文教界的自由化不以為然。



這就是“左”派的“忠心耿耿”，其實大錯了，而實際上他却是在向中國知識分子發出警告，警戒他們不要上毛澤東的當。而毛澤東却祇能罵他麻木，不善于領會他的意圖（豈料是領會得太深了），先說是“書生辦報”，后来又罵“死人辦報”，反右后終於將他調出《人民日報》。有一件令我感恩的事，也能看出鄧對毛的抵制。1957年5月我在上海採訪時，“左葉事件”出來了。我有感于中國記者的使命同他們的地位之不諧調，在一個興奮得不能入寐（鳴放高潮，夜夜如此）的夜裏，一口氣寫了一篇幾千字的文章，題為《記者這一行》，寄給鄧拓先生，再無下文。6月底，反右開始后的第一次首都新聞界“座談會”（實為對右派的討伐會，第二次就輪到我了）上，鄧拓先生在休息時間把我拉到主席臺后，悄悄把那篇文章的原稿交到我手裏，以目示意，一言未發。那也就成了我們的訣別。我成了右派以后，再也不能見他了。（為華民《中國大逆轉——反右運動史》一書作序：《毛澤東一手定乾坤》）

還有許良英先生和李慎之先生，同樣也力持此議。許先生說：

要了解反右運動的歷史真相，第一個關鍵問題是：反右究竟是“陽謀”，還是陰謀？所謂“陽謀”是指：毛澤東提出整風鳴放是真心誠意的，右派却趁機向共產黨猖狂進攻，毛澤東不得不以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策略予以反擊。這是毛澤東自己的一貫說法，當時我也信以為真。可是，在文革初期，我讀到紅衛兵印發的毛澤東講話文集中他于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發現那時毛澤東就已向黨內高級幹部布置了反右運動，一個月后的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講話和三個月后的整風鳴放，都不過是一種殲敵的計謀（即陰謀）。請聽聽他的原話：“蘇共二十大的臺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他們不搞什麼大民主，不到處貼標語，還不曉得他們想幹什麼。他們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同時，他還泄露了“雙百”方針的天機：“毒草，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祇能處在被統治的地位。”在他心目中，馬克思主義以外的九十九家，永遠祇能充當順從的被統治者，如此“百家爭鳴”，無異于雙簧滑稽劇。可惜我不知就裏，把他的所謂百家爭鳴當真，以為中國將再現春秋戰國時期，以及古代希臘和歐洲文藝復興以后的學術繁榮局面。可是，在毛

澤東的愚弄下，它所帶來的却是對學術文化領域的全面專政和知識分子的無盡劫難。

真實反映“毛澤東思想”的這篇重要講話，收在1977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但沒有引起人們應有重視。不少人，包括李維漢和陸定一，以及由鄧小平定調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定》，在論述鳴放、反右歷史時，都重復毛澤東1957年5月以後那種自欺欺人的論調。出人意料的是，被官方斥為“自由化分子”的阮銘，直至八十年代還持這種觀點。甚至1994年出版的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的回憶錄，竟也附和這種顛倒是非的說法，說什麼毛澤東“感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自信心受到極大挫折，因此毛準備狠狠‘整’民主人士。”李醫生顯然不了解外界實情，輕信了毛澤東自編的由頭。但瑕不掩瑜，這本回憶錄仍不失為了解毛澤東人品的極為珍貴的歷史資料。（《關於反右運動的片段回憶和思考》《北京之春》1997年2月號）

其實，豈止阮銘先生，連王若水先生也持這種認識，最近得知，趙紫陽也認為毛是真心誠意要整風，聽到右派的意見“真受不了”，才反右，說毛說“陽謀”是“托詞”。

對李維漢說的毛聽了羅隆基有關小資產階級大知識分子與馬列主義小知識分子以及輪流坐莊等等的言論後，才決定反右。李慎之先生却認為大謬不然：

6月8日可以算是轉折點了，對這一點，史家是不會有異議的。但是，引人尋思的是，毛主席在上半年一而再，再而三，可以說是幾十上百次地號召人家鳴放，鼓勵人家鳴放，而且一再批評黨內有90%以上的人思想不通，為什麼會一下子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呢？這是“簡在帝心、幹綱獨斷”的事情，除他本人以外，也許不會有第二個人能確切地知道這個最高機密。

當代史家對此多有探討，甚至有人說，這是毛主席4月30日請民主人士幫助黨整風以後，沒有料到鳴放如此放肆，忍無可忍，才在5月15日寫出《事情正在起變化》的黨內通訊，這才是形勢真正的轉折點。然而這些同志也未免太低估毛主席了。

毛主席是何等樣人物！平生軍事的、政治的，大戰場、小戰場經歷過不知其數。就以我所知的蘇共二十大以後，他單是從《內部參考》和《參考消息》上能看到的而且必然看到的國內外批判共產黨的話就不知有多少，他志

麼能為羅隆基的一句“小知識分子領導大知識分子”就沉不住氣而龍顏大怒呢？毋寧說為大魚游入網內而高興的可能性還更大些。（《毛主席是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

現在情況逐漸澄清了：說毛真心要整風的人，“大多數”不是居心騙人，而是受到蒙騙。中共官方的說法，包括冠冕堂皇的決議和道貌岸然的袞袞諸公，皆屬於不在“大多數”之列，李維漢部長也未能例外。對他說的毛那個5月15日的“反右決心書”——《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根據，李慎之先生已作了合情合理的駁斥，我再來補充一個細節：部長說的“輪流坐莊”，是《天津日報》5月27日才報道的消息，提出此論的，是第三女子中學教師黃心平先生。不知部長怎樣在15日之前就能未卜先知，作此匯報呢？

### （八）三個戰場，一個陷阱

毛澤東既然要誘敵深入，聚而殲之；在哪裏殲滅敵人呢？那就要部署戰場，設置陷阱，予敵人以葬身之地：召開幫助黨整風的上上下下、各種各樣的座談會，有目共睹，這是一個大戰場。我還要指明另外兩個戰場。

戴晴在《儲安平與黨天下》中說：在1957年春天的宣傳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曾分別會見各界人士。在與新聞、出版界人談話的時候，他老人家突然轉向《光明日報》的代表，問道：是不是共產黨員？那次出席談話的是總編輯常芝青，他站起來，說：是，是共產黨員。毛澤東說：共產黨替民主黨派辦報，這不好吧！此時是3月10日。（紫丹按：此前一直是“好”，並且事實又將證明：此後又永遠是“好”；為什麼單單“此時”說“不好”呢？這裏邊有什麼鬼呢？今天水落石出，事情已一目了然：是把“陰謀”說成“陽謀”的鬼，是“引蛇出洞”的鬼。下面，戴晴女士又揭穿他“明知故問”的險惡用心。）

考慮到毛澤東是偉大領袖的同時還是偉大的謀略家這一事實，很難斷言他那時究竟是確實不知道《光明日報》由誰人主編，還是明知故問。因為，第一，《光明日報》向來就不曾由非共產黨人士編過，後離任的前兩屆主編胡愈之與邵宗漢，都是身份從未公開的CP；第二，早在9個月前，在他《論十大關係》講話之後，中宣部就已經在緊鑼密鼓地活動着，為《光明日報》物色總編輯。在這個講話裏，毛澤東已經預見到一年後的局面：

現在我們國內是民主黨派林立，其中有些人對我們還有很多意見……形

式上沒有反對派，所有民主黨派都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但是實際上，這些民主黨派中的一些人就是反對派，在外交、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問題上，他們都是又反對又不反對……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關係要改善。我們要讓民主黨派人士，談出自己的意見，祇要說得有理，不管誰說的，我們都接受。

要說話，總得有塊地盤（大眾傳播媒介）。那時還沒有《世界經濟導報》，也沒有《現代人報》，不知誰首先想到了《光明日報》【原注：後來，又想到何不讓《文匯報》復刊？於是《文匯報》1956年10月復刊。這兩份報紙，在1957年春均受到毛澤東的稱贊，夏天以後，則作為“資產階級方向”的代表，受到首當其衝的批判。】而且是非共產黨員辦的《光明日報》，於是開始物色主角。（後來物色到的主角儲安平，是想這樣利用這塊地盤的：“《光明日報》要成為民主黨派和高級知識分子的講壇，就要創造條件主動組織、並推動他們對共產黨發言，從政治上監督。”如果說，羅隆基、徐鑄成、浦熙修辦的《文匯報》，是要從新聞領域去實踐毛澤東提倡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話；那麼，章伯鈞、儲安平主持的《光明日報》則是想從民主黨派機關報的角度，來貫徹和嘗試毛澤東所講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了。——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烟》）

1956年夏，徐鑄成正帶着他《文匯報》的原班人馬，北上首都，在與柳湜、葉聖陶（這兩位是當時的教育部長）和諧的合作中，輕輕鬆鬆地編着一張周二報紙《教師報》。姚溱找到他。

“喂，心情怎麼樣？”這位當年的宣傳部副部長問。

“很好，很愜意。你瞧，住在鄉下，有一部小車，沒事就到處玩玩。”

“嘿，昧心之論！你這人一輩子辦報，現在一周兩張的專業報紙，你過得了癮、安得了心？”

“的確安心。既然說了是社會主義改造的需要，《文匯報》停就停吧。現在教師報對我不錯，就安心在這裏做了。”

姚溱不再與他打迂回，單刀直入解釋形勢：《光明日報》決定完全交給民主黨派，章伯鈞仍任社長，常芝青撤離，中央的意思叫他接任總編輯。面對這足夠誠懇的交底，徐鑄成也以實言相告：

“做事總要有一個班底，不能一人唱獨腳戲。現在我的人馬都在《教師報》，讓我光身一人去上任，這臺戲唱不了。”一再謝絕。

“好，那就不勉強了。”姚溱說。

徐鑄成拒絕了，中宣部開始進行第二人選方案。這次是喬木出馬，親自登門徵求儲安平的意思。

雖然又同齡又是小同鄉，與他這位被封過三次的同行比，儲安平是“嫩”多了。英國派頭的他不認“班底”說，也不以“上無常操”，或者“上下一日百戰”為然，那是上百、上千年前的事了，那時候有政協嗎？有憲法嗎？他祇認 Fairy Play。他不用拉攏誰，也不用提防誰，包括，比如說，常芝青。後面我們將會看到，這種天真，令人心惻。

在談話中，喬木特別提到《觀察》，提到他成功地編這本刊物的時候，聯系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希望將來主持《光明日報》，與這批舊朋友還要多聯絡，鼓勵大家多寫文章、多說話。喬木接着還特別補充說，過去工作上的助手也可以考慮邀些來幫忙。

雖然出自 Prf. Laschi 之門，安平畢竟是中國人。他潛在的虛榮心、他對“三顧茅廬”之恩德的顧念，再加上他 1949 年之後實質上的不得志，都決定了他的欣然受命。喬木接着的作法也是頗具人情味的，先安排他到青島去度蜜月（此時正值他鰥居 10 年之後的第二次新婚）：

“把新疆的採訪寫完，上任的事以後再說。”喬木親切囑咐。

他去了，並在海濱寫作，直到秋天。1956 年 11 月，他收到章伯鈞的信，稱經“各民主黨派公推”，請他出任光報總編。他于是也一本正經地復了信，表示接受。今天可以肯定的是，這“公推”顯然不過走走形式而已——中國八大民主黨派近 40 年歷史，類似的形式不知走了多少——但這次，應該說，“策劃”與“走”的雙方，都沒有絲毫惡意，雖然這已成的局面並不是人人都滿意的——這點，儲安平當時就有了察覺：

我當時有這樣一個感覺，章伯鈞並不歡迎我作《光明日報》的總編輯，他對我的態度是很冷淡的，我和他過去太沒有私人淵源，而黨的推薦我出任《光明日報》總編輯，他也不好拒絕。

讀者在這裏可將儲與胡、章二人的親疏作一個比較。遺憾的是，在後來的鬥爭中，他主要罪名之一竟成了“向黨猖狂進攻的章羅聯盟骨幹分子”。（《文匯報》牽出以羅隆基、徐鑄成、蒲熙修等一大群右派，《光明日報》牽出章伯鈞、儲安平等一大群右派。毛澤東着意給知識分子的“說話地盤”，便是一個讓他們葬身的陷阱。——紫丹）

1957 年初，按照喬木“聯絡老朋友”的指示，他去了一趟上海。從他

後來所作的交待看，一到上海，就去拜望徐鑄成。

當時，《文匯報》奉中宣部之命復刊已近半年，那場著名的關於電影的爭論，正鬧得火熱。宣傳工作會議雖然還未召開，“雙百”的提法已經傳下來。徐鑄成很興奮，但也有不少疑慮。兩名小同鄉都不再提 10 年前之嫌，反復切磋這 8 個字的含義。此時正主持着一張報的徐鑄成處處顯得比較保守，而即將接手另一份大報的儲則“冒”得多了。他不同意“爭鳴”祇限于學術界，覺得應該擴展到政治領域，鼓勵大家多講話。他斷言：“百家爭鳴是全面的，電影討論祇是一個局部。如果電影都不能談，還談什麼百家爭鳴？”

讀者在前面已經知道儲安平辦《觀察》的勁頭，對他在此刻所作如是說定覺毫不足奇。有趣的是直到 30 年後，在 1986 年一次軟科學的閉幕式上，當一位開明的中共高級幹部將此觀點再度明確提出時，與會群眾竟欣喜若狂，於是引出鄭重的否定與又一次的再否定，直到今天尚未了局。

當時，儲氏新的出任已在上海傳開，原光華同學決定聚會作東請他。據趙家璧回憶：晚飯約在 7:00，大家左等右等，等到 9:00 這位老學友才匆匆趕到。坐定之後，沒吃幾樣菜，就被一部小車接走了——其紅火與煞有介事至此。

幾乎與此同時，在 1957 年那乍暖還寒的季節，毛澤東為說服黨內接受“雙百”的“親莅巡說”，也正在緊張運行中……

先是在 9 省市宣傳、文教部長座談會上，而且開宗明義就談到今天誰都不大敢碰的“言論自由”：

有選舉權的，憲法就規定他有言論自由，我們就得讓人家講話。我可以批評他，他也可以批評我，這就是言論自由。有人問馬克思主義可不可以批評？如果馬克思主義被批評得倒，也該倒，證明那樣的馬克思主義是沒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現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應該再放。

接着和文藝界人士談話。當時有一種風氣，一篇文章的好壞，不看文章本身，祇看“上頭”對這篇東西的態度。在那次會上，大家很想摸摸主席對陳其通等四小“左”的態度。毛澤東的反應幹脆利落：

“說我說陳其通四人的文章是好的，真奇怪，我說是要放的麼！”

當時顯得最為開明的康生立刻為這句話作注：“這是他們對‘雙百’政策有懷疑。陳其通等人的文章正適合他們的胃口。”

在與新聞出版界談過話之後，又會見高等院校校長，開場第一句話即為：

“馬列主義從來就是主張百家爭鳴的。”

這位巡說人接着去了天津，這次是對黨員幹部：

對百家爭鳴沒有信心，對百花齊放怕放出毒來。我看完全不是這樣。若採取壓服的辦法，不讓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那就會使我們的民族不活潑、簡單化、不講理；使我們的黨不去研究說理、不去學會說理。至于馬克思主義可不可以批評，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評，共產黨可不可以批評，老幹部可不可以批評，我看沒一樣不可以批評的，祇要誰願意批評。什麼人怕批評呢？就是蔣介石那樣的黨，蔣介石那樣的法西斯主義。

三天之後，老人家又到了上海。這裏有他的好學生柯慶施。而且下面這番話，就是在柯慶施主持的會上講的：

同知識分子問題、科學藝術問題有密切的聯系的，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方針的問題。關於這個方針，我們還需要在黨內作許多宣傳解釋工作。有些同志覺得這個方針太危險了。百花齊放，放出些鬼來怎麼辦？關於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有人說，“民主黨派有什麼資格和我們長期共存？還是短期共存吧！”“我監督你，我還用你監督呀？你民主黨派哪年打的天下？”所有這些意見都是反對我主張收。中央認為主張收的意見是不對的……不但在純粹的科學藝術的問題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問題上，祇要不屬於反革命一類，也應該讓他們自由說話。

接下去到了南京，會見南京部隊、江蘇安徽兩省的黨員幹部。此時毛澤東自己也承認，“我變成了一個游說先生，一路來到處講一點話。”

沒有誰能否認，在這一連串的會晤中，毛澤東雄才大略、博聞強記、風趣幽默的特點發揮到了極致。至于與會的大多數，如果不看他們畢恭畢敬的迎送，不聽他們當時報以的掌聲，僅從他們四個月之後的作為來反觀，當時多半祇有跟着傻聽傻樂的份。

與這輕鬆融洽的氣氛相對照，對《人民日報》的批評顯得分外嚴厲。除了上文所引“死人辦報”外，還有：

宣傳會議未登消息是個錯誤。這次宣傳會議黨內外人士合開的，為什麼不登消息？最高國務會議為什麼不發社論？為什麼把黨的政策秘密起來？這裏有鬼。鬼在什麼地方……省委書記會上為什麼聽錯了？這叫“各取所需”。最近黨的政策宣傳，《人民日報》不是沒有抓緊，而是沒有抓……你們多半是對中央的方針唱反調，是抵觸的，反對中央的方針的，不贊成中央的

方針的……中央開了很多會議，你們參加了，不寫，祇是使板凳增加了折舊費。如果繼續這樣，你們就不必來開會了，誰寫文章叫誰來參加會。

在這一陣緊似一陣的批評中，毛澤東提到了《光明日報》：

對當前政治情況的討論，《光明日報》連發了幾篇，都是當前重要的政治情況（如“為放而拿”），這些情況編輯部應該討論。

這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徐鑄成朝見毛澤東時的那番景象，也就是本章開頭所說的那次會見。這次沒有儲安平，但常芝青與鄧拓都在場，顯得特別受冷落。那次會見，徐鑄成遲到了。他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景：

聽到康生的介紹，老人家立即伸出大手，緊緊地握着我的手說：“你就是徐鑄成同志？你們《文匯報》辦得好，琴棋書畫、梅蘭竹菊、花鳥蟲魚應有盡有，真是放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們的報看，然後看《人民日報》，有功夫再翻翻別的報紙。”

當時徐鑄成正被上海市委“反擊”得心灰意冷，聽到主席的這番贊賞，“我心中翻起熱流，感到無比溫暖幸福。”

這時康生宣布，有什麼問題要主席回答的，請提出來。

徐鑄成趕緊揣出他心中最大的結：“宣傳雙百，心中無數，抓緊一點還是鬆一點，該怎樣掌握，請主席指示。”

讀者此刻應該注意的是，毛澤東曾經考慮到“鳴放”的高度和深度，徐鑄成此時根本沒有觸及，更不必說提出諸如民衆對權力機關的監督與批評等等了。他祇是向中共中央主席請教，如何更好地宣傳中共的方針。

毛澤東沒有正面回答，祇講了一番片面性的問題。在說到魯迅、李希凡、王蒙等人都有片面性之後，突然說了一句：“我看姚文元片面性比較少。”那時姚是上海市委宣傳部文藝處的一名幹事，在座的幾乎沒有人知道他。但這位小姚不但被特別指定到北京參加會議，還受到這樣的當衆稱贊，足見毛澤東要培養自己得心應手的理論家的心願在那時就埋下了。歷史已經證明，姚的文字果然在後來的每個關鍵時刻，都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徐還不放過機會，仍舊追問：“我體會雙百方針的提出，在政治思想上說，是徵求高價的批評，讓人民暢所欲言，說的不對慢慢再說清楚，不要一下子壓下去？”他在這裏並不敢強調嚴正的批評（如馬寅初的“人口說”）對黨對國之寶貴，祇問說錯了能不能不壓，而且限定了政治思想領域。

毛主席回答道：“你的意見很對、很好。”（“你的意見很對、很好。”



照此辦理，把布袋的口張得大大的，讓知識分子們蜂擁而入！這便是毛澤東潛藏于心的妙算——後來命名為“陽謀”。——紫丹）

徐依舊不放心，舉出因電影討論而遭圍攻的實例，追問：“請問主席，這時我們應該怎麼應付？”

徐鑄成不愧老資格報人。他的這個問題之足夠咄咄逼人，不在語氣，而在回答者無法用含混的語言大而化之。毛澤東當然不會被問住，他在幾乎不能回避的時候還是避開了：

“我叫周揚同志給你們這場討論寫一篇小結，批評及反批評的小結，這就叫正、反、合，這就叫辯證法嘛，你同意不同意？”面對如此玄妙、又如此高屋建瓴的答案，徐鑄成還能說什麼呢？他于是點頭稱是：“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

在這次接見中，毛澤東預告了共產黨的整風：“要用小小民主的方法，就是小民主上再加一個小字，就是毛毛雨下個不停，先整共產黨。現在我們有些同志裝腔作勢，他們沒有本錢，又要做官，不擺架子就不行。”

毛澤東下面的一番話很難不令人感動。他誠懇地交底，說他的思路：“我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談話，本來在心裏積累了很久，去年已經講了幾次，後來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陳、馬他們的文章，想到會有人以為他們的文章是代表中央的意見，因此覺得有好好說說的必要。”他承認共產黨的拿手好戲是打仗、專政，“說到辦報，共產黨不如黨外人士，全國性辦報沒有經驗，辦學、搞出版、科研都是這樣，現在是外行領導內行。”他並且囑咐：“開會的時候，就是要黨內黨外的人在一起，共產黨不要關起門來開會。”這不可能不給人以黨內黨外不分彼此親如一家的印象。

4月30日，毛澤東落下了他這場偉大的戰略部署中最後的也是最濃重的一筆。

那是“五·一”節前夕，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親自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請大家幫助中共整風。他說：“現在是新時代和新任務，階級鬥爭結束，向自然宣戰。”他還着重號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衛生等部門的官僚主義，並責成專人就民主人士的有職有權和學校黨委制問題專門開會徵求意見。

這次時間地點選得可謂匠心獨具：春天已經到了，第二天就要過節，伴着巨大的紅燈籠，被告知以“階級鬥爭結束”：想來也祇有在這樣的氣氛中，

毛主席才會親切地使用這樣的字眼——這字眼後來傳到我們主人公耳中，又從他口裏說出來，成了十惡不赦、萬劫不復的罪行：

“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希望對老和尚也提些意見。”

“五·一”節之後，再未見毛澤東出來。用今天的眼光看，頗似臨戰前短暫的寂靜。

至此，戰場已部署好，陷阱已設置好，香餌已投放好……總之是萬事具備，祇待“盡入我彀”，機關一拉；滾水潑老鼠，一個跑不掉！

### （九）李洪林的“兩難說”

那些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在中共感召下正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時候，誰也不曾想到：大禍已經臨頭了。

在鳴放高潮中，毛澤東在5月15日寫了一篇文章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題目叫做《事情正在起變化》。

事情是在起變化，整風運動要變成反右派運動了。

還沒有材料證明毛澤東或中共中央在邀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之初就預謀“引蛇出洞”，然後來一個反右派運動。事實上除了卑鄙的政客以外，任何政治家也不會出此下策，對被領導者玩弄陰謀。

現在研究者所肯定的事實：中共確實要整風，準備虛心聽取意見，並沒有計劃“反右派”。（李洪林先生的諷刺真够辛辣！他指出的這個，正好不是事實。事實是中共官方對反右派的檔案已經解密所披露的，當初的的確確就是“引蛇出洞”。誰是“出此下策”的“卑鄙的政客”？讀者就按着事實來對號入座吧！——紫丹，）連當時主持黨外高級人士座談會的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都說，毛澤東開頭並沒有說要反右。”（李洪林《中國思想運動史》頁98）

部長的原話是：“在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開始時，毛澤東同志並沒有提出要反右。”陰謀就在于“並沒有提出”；毛不是說“有言在先”嗎？怎麼部長說“沒有”呢？諷刺的辛辣更在于下面兩點：

#### 1. 毛是怎樣“陰謀變陽謀”的？

“遍查毛澤東的講話和中共的‘八大’決議以及《整風指示》，都找不出反右派的理論根據和政策規定。于是祇好求助于別的辦法了。”（頁

99)

“6月19日，毛澤東2月27日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正式發表了。人們吃驚地發現，6月19日的文本和2月27日的文本已經大不相同了。除語句上按照‘反右派’的需要刻意修改甚至重寫以外，最重要的是新增加了兩處‘反右派’的武器。

“一處是講階級鬥爭的……

“另一處是劃分‘香花’和‘毒草’的標準，即劃分敵我的標準，也就是劃右派的標：……

“增加了這兩處之後，反右派就有充分的根據了。你們不是埋怨我没有早說嗎？我在2月27日就說了，階級鬥爭是長期的，有時還是很激烈的。你哪裏是給我提的意見？分明是在進攻。你說你不是進攻嗎？那麼用六條標準衡量一下吧：你的話‘不利于’社會主義建設，你是想擺脫共產黨的領導，這是毒草。因此，你就是敵人，就是右派。這是我2月27日‘已經說過’的。”

“總之，毛澤東的講話經過這番修改之後，反右派鬥爭就成爲‘有言在先’了。也就是說，不是我‘不教而誅’，而是你‘明知故犯’。活該！”  
(頁100-101)(把事先沒說過的話，事後加上去，這就叫做“有言在先”。領袖之無賴，舉世無雙。——紫丹)

## 2. 毛是怎樣陷入兩難之地的？

“一個堂堂的執政黨，那麼‘誠懇’地請人來幫助整風，而且信誓旦旦地許了願：‘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結果人們提了意見之後，却發起突然襲擊，把自己請來的人打成‘右派’。這不是騙人嗎？這不是故意陷害人嗎？而且那被騙和被陷害的是自己的臣民，這些臣民是忠心耿耿來進忠言的。難道還有比這更不可原諒的行爲嗎？毛澤東深知這一層道理，所以他反復說明自己没有玩弄陰謀，而是在耍‘陽謀’，反右派是有言在先，早就定好了的。但是這並沒有使他擺脫困境，因爲這是一個兩難的命題：如果真是早就定好了整風當中要反右派，爲什麼不明說？爲什麼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中祇字不提？這不是誘人上鉤嗎？一個領袖人物，一個執政黨，對自己的人民設陷階還有資格當領導嗎？還有資格執政嗎？如果不是這樣，就是說，原來沒有打算反右派，而是半路上被一些批評意見所激怒，因而改變主意要來一個‘反擊’，那就是說，這個黨說了不算，言而無信。這樣一來，執政黨

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也就跨了。孔子說：‘民無信不立’。失去信用，就失去起碼的立身依據，這個傷害是極其沉重的。”（頁 107）

李先生這番義正詞嚴、邏輯井然的論述，即便說歪理成性的毛澤東復活，量他也再沒有法子把“陰謀”說成“陽謀”了。

那就無怪乎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校長楊獻珍先生曾給過反右派運動一個一針見血的評價了：“一個堂堂執政大黨，不敢光明磊落地表明自己的態度，竟然鬼鬼祟祟採取兩面三刀的手段，實在太不成話了！”（岩石《支持胡星門：難道能回到毛時代嗎？》）

### （十）吳宓教授也有先見之明

知識份子是用他的知識、智力，秉持良心作出科學的判斷，以顯示其力量，創造社會文明，推動社會前進的。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文學藝術家都是如此。馬寅初的“新人口論”，越來越被承認其價值。毛澤東對馬寅初的打壓批鬥，說明他不僅是個暴君，而且是個昏君，弄得民不聊生，還堅持“寧要原子，不要褲子”。如果聽了馬寅初的話，今天的孩子就不會有那麼多被排斥在幼、小、中、大各級學校的門外了；今天也不用寧捨孩子，也要神州五號升天了。

我深深感到，一個正確的論點，你就想象不到它的社會作用是多麼大！反之，一個錯誤的論點被強行貫徹，它的負作用也是難以估量的。還原反右，可知對它的起因做出正確的論斷是何等必要！到底是知識份子借黨整風向黨——如毛所說“向黨猖狂進攻”呢，還是如鄧拓一眼看穿的，毛心裏有一個“引蛇出洞”的鬼呢？先知先覺者所見略同。讓我舉出吳宓教授和張紫葛教授在反右前後的言談遭遇來說明之。當時，吳宓談到這次大鳴大放，問張：“其旨意你有省悟否？”

張說：“看不出什麼言外之意。”

“傷哉！”吳嘆息，“你簡直利祿在心而思慮俱蔽。這也看不到？古人說過又說過：言甘而幣厚，其必叵測。今要開門整風，下一紙文，表一下態就夠了，何用如此盛詞大噪，千呼萬喚，言之懇懇，促之諄諄。而其鼓動對象，厥為民主黨派與知識份子……毛公將有事于天下書生矣！”

張惶恐問計，吳沉吟久之，說：“惟有三緘其口。”遲疑一會兒又說：“當然，不發言也不是萬全之策。被秦始皇坑掉的數百儒生，誰出過一言半

語呢？”

張以爲，拒絕發言，祇怕辦不到。

吳說：“正是，有這麼一個邏輯，不發言，不表態，就是抵觸，就是對黨離心離德。那麼，反正你牢記，萬一要發言，祇能歌功頌德。”又說：“歌功頌德也不一定免禍。君不見，頌明太祖‘光天化日’、‘天生聖人爲世作則’者，竟被論爲譏諷朱元璋做和尚，刺光頭，乃是‘爲世作賊’！”

張大爲煩惱，說：“你向來運籌進退，步伐周扎，果斷肯定。怎麼今天這麼上下兩可之詞？”

吳兩掌拍膝：“情勢使然也！我再高明，也祇是塘中之魚，但能察知在投餌張罟，却無法料定網究竟有多大。網小，但網趨餌之魚；網大，則不趨食香餌者亦將難免。設或竟是攔河網，則全塘水族將無遺類。所以，問題要看網有多大，設或你剛剛處于網緣，還可望三緘其口或歌功頌德而幸存。設或你處于網內，那就在劫難逃了。”

1957年5月初，院長胡光和黨委書記劉佑東一再到張紫葛辦公室和宿捨拜訪他，動員他在鳴放會上發言。“你是有影響的教授，務請和我們合作，帶頭把鳴放搞起來！”

他仍未發言。劉佑東邀他到他家吃茶、密談。“你太不够朋友，鳴放會上一言不發。”

張說：“我確實對你們非常滿意，沒有任何意見，總不能無病呻吟嘛！”

劉痛心疾首：“什麼話！毛主席說過，祇有兩種人沒有缺點，沒錯誤，一個是沒出生的人，一個是死人。你咒我們是死人？！你要知道，如果鳴放搞不起來，我這黨委書記就得垮臺。你哪怕胡亂捏造，指着我們鼻子臭罵一頓，也是幫我的大忙，我也會無限感激你的。”

張無奈，在當晚的座談會上說了十來分鐘，全是歌功頌德。而第二天出版的院刊《鳴放每日刊》上所載他的發言記錄却顛而倒之。他的原話是：“我認爲黨群之間沒有鴻溝”，記錄改爲“大有鴻溝”。原話：“我認爲院黨委辦大學很在行。”顛倒爲“很不在行”等等。通篇無一句不如此。張氣得不行，去找劉書記。誰知他倒打一耙：“是我叫改的。象你那樣說。我能下臺嗎？叫我動員鳴放，是提批評意見，沒叫我動員表揚我們！”

1957年6月28日，西南政治學院貼出了第一批反右大字報：

“張紫葛是個口蜜腹劍的大右派！”“揪出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

的右派份子張紫葛！”

他問劉佑東：“憑什麼把我定成右派份子？”

劉答：“我有什麼辦法？我是黨的馴服工具。那會兒叫我動員鳴放，我就動員你鳴放，這會兒叫我劃右派，我就劃右派。你不當右派我當？我給你交底吧，這右派是有指標的！在市委分配指標時，各校黨委書記爭得面紅耳赤，都訴說：我那裏政治條件好，劃不到這麼多右派！市委書記惱了，叫：放下指標，先反掉你們的右傾思想再說！我差一點兒回不來！……總而言之，你這右派當定了，除非你是毛主席的好朋友，毛主席出來保你。”

剛開始劃了右派，尚未限制人身自由。張又來到吳宓家，吳說：“估計當如此。”轉而安慰道：“勿怪勿惱，在劫難逃也。這回是拉開臉了……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既甘且美，翻手為雲倡鳴放，懇請大鳴大放，幫我整風。不過兩月，把臉一拉，嘿！爾等乘我整風，猖狂進攻！發表關於內部矛盾之光輝著作……面目全非，語言迥異，還創造了鏟除毒草之六條標準云云。于是覆手為雨，掀起反右之惡浪……尤有進者，以神州普天下之主，親自援桴急鼓，進攻一小小之《文匯報》，且對準其中之一女兵——女記者浦熙修，聲嘶力竭，衝鋒陷陣……我舉此數端，意在提醒你：在劫難逃者多矣。汝罹此難，萬非汝之德行有虧，舉措失當。既無愧于心，就不用戚戚于懷。天降奇禍，復何言哉！且而，我已再四演算，汝雖有不測之禍，却是絕無性命之憂！”

說罷，叫他“趕快離去，善自保重。”握手時又叮囑說：“處今之時，惟有達人知命，聽之任之。養浩然之氣，存萬全之軀。切切不可憂傷憤激，自暴自棄。否則，古有賈誼，今有李源澄！老李氣憤填膺，已經瘋了！”（李是歷史學教授，已劃右派）（張紫葛《心香淚灑祭吳宓》頁326-330）

我等後知後覺，當時祇是毛說的“有人說這是陰謀”中的“有人”之一，身經了反右的整個過程，今昔對比，又看到如許“出土文物”，方始對其陰謀的認識由直感到達論證。吳、張兩位教授的見證，既對陽謀說予以揭穿；又對變卦說予以指迷；面對這種陰險毒辣、無耻無賴的陰謀，甚至用“該縮頭時便縮頭”的烏龜法也不能自保了。

### 三，外星球的“劉鄧陰謀論”

【我對此論的點評，放在方括號內，好與原文的小括號區別。】

黨內“生產力水平決定論者”【即劉鄧】要先走一段時間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認為黨內右傾思想是受到了黨外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在整風運動初期，資產階級右派發動對黨進攻的時候，毛主席趁機發動“反右鬥爭”想清除黨外資產階級思想對黨的腐蝕。也就是說，毛主席把“反右鬥爭”當成整風運動的一個階段，但不會把“反右鬥爭”搞成“反右運動”去轉移整風運動的鬥爭方向。【意即毛的陰謀是通過鳴放“想清除黨外資產階級思想對黨的腐蝕”，並非誠意請他們幫助黨整風，祇是不要把“鬥爭”搞成“運動”。說這話有根據嗎？】黨內“生產力水平決定論者”用擴大化“反右鬥爭”（即反右運動）來轉移“整風運動”的鬥爭方向。個人認為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雖然國外出了很多問題，但這些問題還不足以能夠鼓動中國資產階級起來反對共產黨。而且國內的經濟建設搞得不錯，人民的生活水平一直在提高，中國共產黨在國內的威信也是相當高的。即使中國資產階級想反對共產黨，也不會挑共產黨聲望如日中天的這個時候。我們現在所說共產黨這個錯誤、那個錯誤在1957年一概沒有。“整風運動”鬥爭的焦點是在黨內，“反右運動”鬥爭的焦點是在黨外。“延安整風”再怎麼整得厲害也沒有整到黨外人士身上去。“57年整風”到後來，完全被黨內“生產力水平決定論者”轉移到打擊黨外人士身上了。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為了幫助黨整風，號召黨外人士向黨提意見，要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大多數民主人士積極響應黨的號召，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見。許多會上發表的意見，都通過《人民日報》發表了。可以說，開始【所謂“開始”，就是直到5月中旬。】氣氛很正常，效果也很好。廣大群眾、黨外人士和廣大黨員積極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對黨和政府的工作以及黨員幹部的作風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批評、建議。然而，在黨內“生產力水平決定論者”的蓄意操作下，【誰“然而”？不是在“生產力水平決定論者”的蓄意操作下，正是在毛澤東的蓄意操作下。】整風運動慢慢的變了味道。本來，既然是黨內整風，報紙上刊登一些批評建議也很正常，但報紙上為何要刊登謾罵、諷刺、挖苦共產黨的言論呢？而且，祇看到一方錯誤的言論，看不到正確一方對錯誤觀點的批評？又如何能夠提高廣大黨員對黨內錯誤思想的認識呢？又如何能夠促進

黨內整風運動呢？廣大黨員看了這些謾罵、諷刺、挖苦共產黨的言論，都十分氣憤，希望不要再刊登。可是報紙仍是照登不誤，而且號召大鳴大放。有人說這是毛主席搞的引蛇出洞。我倒是覺得這是黨內“生產力水平決定論者”在蓄意激怒毛主席，然後借毛主席的怒氣把整風運動的鬥爭方向從黨內轉向黨外。現在看來，“生產力水平決定論者”很成功，5月15日毛主席發表《事情正在起變化》【這時候就正是所謂“開始”的時候。氣氛很正常，連著名的“北大五·一九”都還沒有發生；三大右派言論，更沒有發生。是毛自己按着預謀，向黨內發密令。】、6月8日毛主席發表《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7月1日毛主席發表《〈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7月9日毛主席發表《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8月毛主席發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針對黨內錯誤思想的“整風運動”在一段時間內完全變成了針對黨外資產階級的“反右運動”。【是毛太幼稚、太單純了，被“蓄意激怒”、很輕易的就上當了。不是知識分子上了毛的當，而是毛上了“生產力水平決定論者”的黨。這樣解釋反右派運動的發生，倒是頗具創造性。不過，這個“創造性”的定義是無中生有，異想天開。】

1978年9月，鄧小平上臺之後，黨中央決定摘去大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50多萬右派分子經過摘帽子後祇剩下幾個右派了，但仍然不敢否定“反右”運動。當然不敢否定“反右”運動，“反右”運動一否定，那他們用“反右運動”來轉移“整風運動”鬥爭方向的陰謀豈不是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這，簡直胡扯得沒有邊沿了。實際情況是，毛、鄧這兩個罪魁禍首，發動的這一場毀滅科學文化及其載體——知識分子的運動，一經否定，必將接受歷史法庭的審判。說“反右是正確的”，就是逃避罪責。]“反右運動”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把敢于同錯誤思想、錯誤傾向作鬥爭的中堅力量打下去”。為劉少奇後面破壞農業合作化、破壞落實《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形左實右”行動掃清了障礙。【誰要是不知道什麼是胡扯八道，請讀此文。】（《人為禍害的“三年困難時期”》，2007-11-27，《九月十五國學網——中國經濟史論壇》）

誰也不敢得罪主管黨務的劉少奇——“寧犯政治錯誤，不犯組織錯誤”，明知“浮誇風”、“共產風”不對，但祇要劉少奇堅持，就誰也不敢違抗。這才是“反右擴大化”、“按指標抓右派”的真正後果，所以說這是陰謀，是“借力打力”，借反右暗算毛澤東，架空毛澤東，自己乘機奪權。“第二



司令部”就這樣悄悄形成了。[本來對共產黨內部這種“狗咬狗、兩嘴毛”的濫事，根本不值一睬，但是，因為它涉及歪曲反右派運動的歷史真相，所以需要澄清。但願毛澤東的哭喪婦節哀，不要哭得昏迷不醒。]（《毛澤東扭轉乾坤，胡錦濤繼往開來》）

#### 四，“半陰半陽”說

到1957年5、6月間整風鳴放期間，清華學生中提出的主要是針對學校領導的方針政策和工作作風問題，如批評1952年學蘇搞院系調整，使清華淪為單純工科大學，要求實行“理工合校”；對黨的幹部作風不滿，貼大字報要求罷免？選舉？團委書記；反對黨委領導幹部享有特權，要求取消對他們的“優待證”……等等。屬於政治性的則有“庶民社”及其系列大字報《庶民報》，批評在學生中搞肅反，侵犯人權，其中有云：“清華黨委是如此找敵人，殘忍呀殘忍，沒有人權，沒有憲法，沒有常倫，必須以法律制裁肅反中的真正罪人”；其雜文《神、鬼、人》中說：“人之所以敬神（隱喻共產黨）是因為神能給人帶來吉祥……畏鬼情有可原，但畏神却令人費解！”表示“願：人裏不再出‘神’，而‘神’永在人間。則庶民萬幸！祖國萬幸！”還有的大字報要求“還政于民”、為胡風翻案……等等。這些言論當時被認為大逆不道，實則都是公民言論自由，而且反映了人民的民主要求。

至于政治方面，則多集中在肅反中的侵犯人權問題，物理教研組被錯批鬥的教師訴說肅反中“完全失去人權，把喝水的杯子、香烟全拿走了，不能受到人的待遇。我祇能忍氣吞聲。我曾準備跳樓自殺，但我想，要死祇需要幾秒鐘的勇氣，而活下去要更大的勇氣。我要活下去，看他們是否代表真理。”他們批評校黨委主持的肅反是違反憲法，肅反案件應該交法院審理。他們還舉出1954憲法第八十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對於國務院所屬各部門地方各級國家機關、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檢察權。”憲法第八十九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為自己和他人肅反中所受冤屈辯護。（1957年6月3日第190期《新清華》）這表明當時教師具備相當的憲法意識和人權觀念。而黨中央及基層幹部則為了搞所謂的階級鬥爭，而不顧剛通過才3年的憲法。

此外，物理系一位剛“海歸”的教授徐璋本，不諳中國“國情”和政局，

誤認為中國有像美國一樣的言論自由，大膽提出不能把馬克思主義作為全民的指導思想，要實行多黨制民主，這種思想言論在國內頭腦“正常”的人看來，實屬大逆不道，反右初即被作為“反革命”予以逮捕，關入監獄。

這種對潘光旦教授的特殊對待，並非清華黨委的自作主張，而是根據北京市委指示行事。我到市委統戰部長李樂光同志（他也是清華大學的老校友）家裏匯報。我說潘光旦已經在系裏和文法學院檢討了三次，還不讓他過關，是什麼原因？李樂光說了一句：“這個你就別管了。”當時統戰部幹部吳維成直接聯繫我。他後來說，這是中央直接掌握的，中央就是要敲打一下民盟的右翼，擔心他們挑戰共產黨的領導權。當時唯一能和共產黨爭奪領導權的就是民盟。民盟有政治資本，他們反國民黨是有功的。我們黨中央也擔心這股勢力強大了，成爲一個對立面，所以解放初就說要對他們敲打敲打。思想改造運動中是借批潘光旦，敲打羅隆基，是給民盟“右翼”一個警告。後來潘光旦第四次在全校大會上檢討，才勉強通過。爲此市委還先後布置清華黨委宣傳部編印了《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動思想》和《歡迎潘光旦先生開始的進步》兩期專刊，在校內外（特別是民盟中央）散發。

現在看來，這實際上爲後來 1957 年反右派鬥爭中整民盟“右翼”留下了伏筆，這是中央和毛澤東的一個決策。如果說，反右早有預謀，以上毛澤東對待民主黨派、特別是民盟的謀算和整潘的做法，就是可說是“陽謀”的序幕。

循此軌迹，不能排除毛澤東當初想利用整風來整偏離他的“左”傾路線、挑戰他的絕對權威的黨內高層人物。他發動群眾大鳴大放，“幫黨整風”實際也恐包含了試圖利用群眾運動，把“除三害”（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矛頭引向整黨內高層人物。但這個想法，因“右派”（特別是民主黨派中的“右翼”民主人士）出人意料的大舉“進攻”，矛頭反而對了他本人（“黨天下”、“輪流坐莊”、“小知識分子領導大知識分子”，“老和尚”等問題），對他和共產黨的領導權挑戰，這當然是他更不能容忍的。于是他掉轉矛頭，發動反右鬥爭，狠狠打擊“右派”的“猖狂進攻”。（郭先生應該清楚，即便所謂的“猖狂進攻”，也全部無一例外地發生在毛決定反右之後，而不是之前，這怎麼能作為他決定反右的根據呢？——紫丹）

當然，毛想利用雙百方針暴露民主黨派（特別是民盟和農工民主黨）中的極少數“右派”，確如前述是早有預謀的。但對大批民主派知識分子的鳴

放實施陽謀，則是自5月15日寫《事情正在起變化》這個黨內指示才有此創意。正是出乎意外地發現，事情並非他原來企望的那樣，把群眾的矛頭引向他要排斥的高層異己勢力；相反却直接衝着他本人和黨的執政地位而發，所以才說事情起了“變化”，實際上是他主觀估計和謀略上起了大變化。（郭道暉：《“陽謀”背後的權謀——以本人親歷論析整風反右運動》）

吳國光算把這個問題看透了，他從反右這個陰謀中，看出陰謀的連環套，說道：“所以我感覺呢，反右是陰謀中的陰謀。一套陰謀是整個要反右。然後這裏面又套了一個小陰謀，就是要反他政治局裏的這些經濟務實派的同志們。”（BBC中文網《反右運動50周年：毛澤東與反右》）

## 五，“變卦說”中衆說紛紜

如果說，上面的條分縷析是從正面直接論證“陰謀”的客觀存在，那麼，“變卦說”還可以從反面，曲折地使“陰謀說”得到進一步的證實。

### （一）李維漢的“出軌說”

統戰部長李維漢的“出軌說”與預謀說中的“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互別苗頭。也就是說，他把毛澤東的“陽謀說”也同時予以否定了。他說：

在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開始時，毛澤東同志並沒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爲了反右而開這個會，不是“引蛇出洞”。兩個座談會反映出來的意見，我都及時向中央常委匯報。五月中旬，匯報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時，已經放出一些不好的東西，什麼“輪流坐莊”、“海德公園”等謬論都出來了。毛澤東同志警惕性很高，說他們這樣搞，將來會整到他們自己頭上，決定把會上放出來的言論在《人民日報》發表，並且指示：要硬着頭皮聽，不要反駁，讓他們放。在這次匯報之後，我才開始有反右的思想準備。那時，蔣南翔同志對北大、清華有人主張“海德公園”受不住，毛澤東同志要彭真同志給蔣打招呼，要他硬着頭皮聽。當我匯報到有位高級民主人士說黨外有些人對共產黨的尖銳批評是“姑嫂吵架”時，毛澤東同志說：不對，這不是姑嫂，是敵我……及至聽到座談會的匯報和羅隆基說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份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份子，是外行領導內行之後，就在5月15日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

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這篇文章表明毛澤東同志已經下定反擊右派的決心。  
(《回憶與研究》下)

這裏，一是更充分地暴露了毛的所謂“陽謀”，是極端虛偽的。直至後來，毛還給他私人醫生李志綏說：“有人說，你這是搞陰謀，讓我們大鳴大放，現在又來整我們。我說，我是搞陽謀……我們做事都是有言在先，出了安民告示的，你們不聽，硬照你們的資產階級政治綱領辦，怎麼說我搞陰謀。”（《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189，）還說：“原本想用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幫助整黨。想不到他們這樣不可靠，最壞是民主同盟，他們是男盜女娼。”（同上，頁188）如果真如毛所說“有言在先，出了安民告示的。”那爲什麼作爲“陽謀”主要實施人的中央統戰部長都不知道會有殲滅出籠的牛鬼蛇神、出土的毒草，即反右派呢？當他覺察出毛的這一招時，趕緊讓孫起孟去做黃炎培的工作，黃才沒有鳴放下去，免予中毛的招而劃爲右派。歷史證明，他說的“男盜女娼”乃夫子自道也。這是指他政治上的流氓行爲；至于他生活上的“男盜女娼”，這裏暫且存而不論。

二是衆多關於反右派的論著，都把李維漢的回憶錄作爲權威論據，認爲是從5月15日毛才開始變卦的，而變卦的原因乃是出軌論：“放出了一些不好的東西。”更具體說，是羅隆基的鳴放——“馬列主義的小知識份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份子，外行領導內行”，才促使毛下定了反右的決心。李維漢“匯報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時”，時間在5月11—12。這時毛就把鳴放定性爲“是敵我”。而在5月1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就下達了“引蛇出洞”的文件。

所以，所有認爲5月15日毛才下決心反右的人，統統是自欺或欺人，起碼是誤會了毛澤東。因爲，陰謀決不能祇靠他自己孤軍奮戰，而要靠全黨、全民去實施。他必須把所懷的鬼胎，有步驟地，一股兒一股兒地向人們去泄露天機。所以，五月十五日祇是毛捕捉到手的時機之一，是流，不是源。

陰謀與陽謀最外在的表徵在於，是偷偷摸摸地幹還是正大光明地幹。《事情正在起變化》這個謀劃，不僅沒有告訴敵人，恐怕連部長先生當時都是被蒙在鼓裏。因爲毛在清樣上批道：“劉、周、朱、陳、彭真閱。如認爲可用，請尚昆印若干份，發給中央一級和省、市一級負責同志。退尚昆辦。”在他們圈閱後，毛又批：“尚昆同志：此文請即印發中央一級若干同志並印送各省、市委、內蒙黨委，新疆、西藏不要發。北京及外地各發多少份爲宜，請

加酌定。”于6月12日，毛在印發件上，又一次加上曾寫在清樣上的八個字：“內部文件，注意保存。”毛還加寫了這樣一行字：“不登報紙，不讓新聞記者知道，不給黨內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在半年或一年之後，才考慮在中國報紙上發表。”爲什麼如此鬼鬼祟祟？這是在搞“陽謀”嗎？

李維漢論述問題，語言是溫和的，沒有張牙舞爪的“猖狂進攻，殺氣騰騰”的昏話。但把反右歸罪于知識份子的咎由自取，這種撒謊乃黨性本身應有之義，除非你不當黨員。所以，對這類回憶錄，不可全不信，更不可全信。

## （二）毛澤東的“猖狂進攻說”

這是毛澤東用來欺騙人民，作爲反右派正當性的說詞的。所謂“反右派”，就是“反擊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

毛澤東寫于1957年5月15日作爲向中共最高層發出反右信號的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其中提出：“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

由于這個調子是毛澤東定的，所以不僅是甚囂塵上，簡直是一切媒體及所有公開場合的輿論全然一律。同時它又是毛澤東整個反右陰謀中關鍵性的一舉，即爲的是“出師有名”。所以對這個問題很有必要從頭細說。

能够就近和長期觀察毛澤東的李志綏醫生說：“八大路綫（即堅持集體領導、發展經濟、反對個人崇拜、主張實事求是等）從未得到毛的支持。毛往後所有的政治行動——共產黨整風、大躍進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全是爲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總路綫而做的出擊。直到1969年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時（那時劉少奇被開除出黨，並已死亡，鄧小平被撤職）毛的思想成爲全國指導綱領，毛的報復才算落幕。”（《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111）

這要從蘇共20大說起。在大會即將結束時，赫魯曉夫作了秘密報告《個人迷信及其後果》，譴責“歷史上最凶暴殘忍的罪犯”——獨裁者斯大林。李志綏寫道：“赫魯曉夫突來的舉動使朱德（中共代表團團長）措手不及。朱德向中央打電報請示時，表示要支持反斯大林。毛十分震怒。毛說：‘朱總司令這個人十分糊塗。可見朱德和赫魯曉夫都靠不住。’”毛又說：“你們蘇聯反斯大林，我們不反，我們不但不反，我們還要擁護。”（同上，頁174）

毛用陰謀伎倆來騙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同志打開了我們的眼界，擦亮

了我們的眼睛，增強了我們的視力。他終於把事實真相告訴了我們。我們也要進行改革。”赫魯曉夫的反應是，毛說這話是在“哄騙我們”，“毛澤東簡直就是隱藏自己思想和意圖的大師！”（《赫魯曉夫回憶錄》頁 659;）

李志綏回憶道：“毛在‘八大’中做了開幕講話。我隨同毛出席了開幕和閉幕會議，並在後臺聽了劉少奇的政治報告。我一聽到劉、鄧兩人的報告就知道毛一定會大為震怒。我也非常驚駭。毛的確有理由覺得中央在壓制他。劉的政治報告和鄧的修改黨章的報告中，贊揚集體領導路綫，反對個人崇拜。鄧小平進一步向黨代表保證，中國絕對不會出現個人崇拜。鄧修改的新黨章中，不但刪掉‘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一切工作指針’這句話，並為毛設立了榮譽主席的職位——這些都顯示毛的黨主席職位並非終身職，黨領導要他交出權力。

“跟隨赫魯曉夫起舞，頌揚‘集體領導制’的基調，特別令毛不安。如果中國共產黨真的實施集體領導制，那表示領導人之間地位平等，所有重大決策將經集體裁決。毛的重要性便會銳減。但毛要做天下第一人，他想搞個人崇拜。”（同上，頁 185）

為此，毛精神憂鬱，形體衰弱，整天躺在床上，除大小便外，不起床，甚至吃飯都在床上。他在處心極慮地醞釀一個巨大的陰謀。李志綏說：“毛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發表的一篇演說，便是他策略的一部分。毛以國家主席的身份，召開了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毛在此會上嚴厲批評黨官僚體系，又提出‘大鳴大放’號召‘民主黨派人士’隨意給共產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同上頁，186）但是，由于某種原因“中國共產黨向來是一個體系嚴密、力量強大的排他性組織，非共產黨人士一向不允許向其建言。敢這樣做的人都被打成‘反革命’。”所以，“雖然毛大力號召給黨提意見，知識份子仍一再沈默。”于是，毛于 1957 年 3 月 6—13 日中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又重復了二月講話的重點，鼓勵民主黨派人士拿出“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勇氣，解除一切思想顧慮。四月底，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三度號召群眾給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民主黨派人士終於展開了熱烈的爭鳴運動。”（同上，頁 187）

這個過程是人所周知的，並且後來還更多地獲知毛為誘敵深入而布置的陷阱，為釣魚而準備的香餌。不過，李志綏這個時期進修去了。“五月十五日回一組後沒幾天，毛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信，並在黨內高級幹部間

秘密傳閱。整風運動的本質必須立刻改變。毛準備給那些發表猖狂議論的右派份子大大反擊。”（同上，頁188。）

所以他的立論根據，是“林克的看法，毛這次是受到重大打擊。他萬萬沒料到批評的箭頭會轉而指向他本人。例如：‘共產黨念的這本經，因為大和尚念，小和尚才會念……等等，形成了一個時期毛所說的‘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局勢。”（同上，頁190）

但是，他所指的“猖狂議論”，當時並沒有發生。右派議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三大理論：儲安平批評大和尚的“黨天下”、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以及多次為鄧小平指責為“殺氣騰騰”的葛佩琦的“殺共產黨”等議論，統統都是發生在毛寫《事情正在起變化》一、兩個星期之後。

所以，一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決不會袒護右派的）黎澍，遂秉筆直書：“這個講話（最高國務會議講話）廣泛傳達以後，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幾個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學工作者中間果然起了鼓舞作用。他們被邀請在一些座談會上發言。可是，即在這個時候，這種場合，發言者也還是心存顧慮。毛本人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說，人們‘怕釣魚’。這篇文章是反擊右派進攻的信號。既然直到此時人們還說‘怕釣魚’，可見直到反右派開始時，也並沒有什麼資產階級猖狂進攻需要‘打退’。”（《未完成的回憶》，《論歷史的創造及其他》第171頁）這是與事實相對照的歷史結論。

中共黨史專家許全興教授在他的專著《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一書中說：“從整個報道看，很難得出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的結論。毛澤東根據什麼材料講‘猖狂進攻’就不得而知了。”（頁90）

一個著名的右派，他寫的文章《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在當時產生了轟動效應，曾被說成“資產階級右派進攻的信號彈”。他就是費孝通，改正錯劃後當上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我記得大約是1997年，他在中央電視臺明確否認“進攻”。他說他就不知道什麼叫“進攻”。這該算作是右派向毛澤東的“反攻倒算”或“秋後算帳”吧！

毛澤東總愛把“說話”罵成是“放屁”，好象是嗜癩有癖。這回他說“猖狂進攻”，連他黨內的人都說“毛澤東根據什麼材料講‘猖狂進攻’就不得而知了”；可見足以證明，他這回不是放屁，而是沒屁吹風。

### （三）李志綏的“整黨內敵手說”

這是李志綏聽了毛關於“陽謀”云云之後，“我終於了解毛是心口不一。原先毛想利用知識份子將他的黨內敵手整一整的策略適得其反。”“毛感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自信心受到極大挫折，因此毛準備狠狠‘整’民主人士。”（《回憶錄》，頁 195）

他以爲毛的陰謀是借刀殺人，利用知識份子整黨內敵手；反右並非預謀。所以他才有：“今日我的後見之明是，如果當時民主人士提的意見未涉及毛，那麼‘文化大革命’一定會提早十年，在 1957 年，而不是 1966 年發生。我們今天祇記得反右派運動時對右派人士的恐怖行徑。其實毛開始是想藉用民主黨派人士來替共產黨整風，目標是‘反冒進’的那些領導。毛未料到民主黨派人士竟群起質疑‘社會主義路綫’和‘共產政權’的合法性。毛萬萬沒有想到，民主人士提的意見越來越尖銳，攻擊的矛頭逐漸指向毛本人的統治。毛不禁暫時回頭和黨內反對他的同志聯合起來。黨內領導人人自危，大家一致槍口對外，出現了大團結的局面。”

由於某種原因，他特殊的御醫身分，使他能見到、聽到人之所未能者，故能得出此一獨到之見。如，毛此後的一切政治行動都是爲了推翻“八大”路綫。但他對反右和文革發表的見解，却是“不識廬山真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

再則，問題出在事態的發展並不是一條綫似地發展下去，而往往是節外生枝、千絲萬縷亂如麻的。即，不是一因一果，簡單明了；而是多因一果，一因多果，互爲因果。例如，蘇共 20 大在中國的反應就不同于在蘇聯本國的反應，也不同于在南斯拉夫的反應；在南斯拉夫的反應不同于在東歐其他國家如波蘭、匈牙利的反應；在國際共運內部，在執政黨的反應也不同于在野黨的反應；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反應更不同于在資本主義陣營的反應；而且，還存在着連鎖反應。而作爲綜合的反應，則是敲起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喪鐘。這便是波匈事件的爆發及其影響。

毛澤東說，1956 年是“多事之秋”。他作出兩項決斷。一項就是防止黨內出赫魯曉夫，把赫魯曉夫批倒批臭。在當時中國，婦孺皆知，赫魯曉夫是個大壞蛋。李志綏的後知之明就是說的這一項。最後，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揪出並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及其司令部。



另一項是防止中國出匈牙利事件。毛把此件當成當務之急。波匈事件對中國影響之巨、之深，非現在中國人（外國人更別說了）可以想象的。我劃右派後，在農場勞動教養。有一個報社來的青年人，22歲，比我小兩歲。他告訴我，他正在談戀愛，跟戀人說，中國如果發生匈牙利事件，他和別的青年人都表示要參加。結果，戀人在反右運動中進行了揭發，於是，幾個年輕人全都打成了右派。

現在我們來看看毛當時的心態，以及他是如何磨刀霍霍、咬牙切齒地在背後向他的黨羽暗傳殺機的，而在當面——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在天安門城樓上，却給他的敵人以朋友似的笑臉相迎，使他的敵人誤以為“氓之蚩蚩，抱布貿絲”，而覺察不出“匪來貿絲，來即我謀”。茲從《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錄下幾段，也好拿來示衆：

“波蘭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總是要燃燒的。燒起來好，還是不燒起來好？紙是包不住火的，現在燒起來了，燒起來就好了。匈牙利有那麼多反革命，這一下暴露出來了。”（第318頁）毛不說是由於某種共產黨極權統治，傷天害理，倒行逆施，激起了天怒人怨，而胡說是“那麼多反革命”；由此可以想象他下一步要作什麼文章。

“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物論和唯心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第323頁）劉少奇却是從經濟上、民生上、黨的工作和政策上總結教訓，說明他對整風還有幾分真意，不似毛居心叵測。

“在學校裏頭也出了問題，好些地方學生鬧事。石家莊一個學校，有一部分畢業生暫時不能就業，學習要延長一年，引起學生不滿。少數反革命份子乘機進行煽動，組織示威游行，說是要奪取石家莊廣播電臺，宣布來一個‘匈牙利’。他們貼了好多標語，其中有這樣三個最突出的口號：‘打倒法西斯！’‘要戰爭不要和平！’‘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照他們講來，共產黨是法西斯，我們這些人都要打倒……北京清華大學，有個學生公開提出：‘總有一天老子要殺幾千萬人就是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來，這一‘家’也出來了。”（第332—333頁）那個“要殺幾千萬”，根本是空穴來風，毛却用來聳人聽聞。這些娃娃要大難臨頭了！出現什麼問題也不會下罪己詔，祇會加罪于人。

在一部分大學生中間，哥穆爾卡很吃得開，鐵托，卡德爾也很吃得開。倒是鄉下地主、富農，城市裏的資本家、民主黨派，多數還比較守規矩，他們在波蘭、匈牙利鬧風潮的時候還沒有鬧亂子，沒有跳出來說要殺幾千萬人。對於他們這個守規矩，應當有分析……他們的老于世故，許多人現在隱藏着。他們的子弟、這些學生娃娃們，沒有經驗，把什麼“要殺幾千萬人”、什麼“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這些東西都端出來了。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是不是想復辟？（第 333 頁）

每逢臺風一來，下雨之前，螞蟻就要出洞，它們“鼻子”很靈，懂得氣象學。蘇共“二十大”的臺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黨內黨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第 334 頁）

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第 338 頁）

現在（1957 年 1 月 18 日）還是多事之秋，各種思想還要繼續暴露出來，希望同志們注意。（第 339 頁）

他們是被剝奪的階級，現在我們壓迫他們，他們心懷仇恨，很多人一有機會就要發作。在匈牙利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希望把匈牙利搞亂，也希望最好把中國搞亂，這是他們的階級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議論，跟我們也是對立的。他講唯心論，我們講唯物論。他們說，共產黨不能管科學，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合作化壞得很；我們說，共產黨能夠管科學，社會主義有優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學生中間跟我們對立的人也不少。現在的大學生大多數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對我們的人，毫不奇怪。這樣的人北京大學有，石家莊有，其他地方也有。（第 351 頁）（到這裏，哪些人是右派？什麼話、什麼事是右派言行？已勾劃出一個輪廓。——紫丹）

我看要準備出大事……

在國際，無非是打世界大戰，甩原子彈。在國內，無非是出全國性的大亂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幾百萬人起來反對我們，占領幾百個縣，而且打到北京來。我們無非再到延安去，我們就是從那個地方來的。我們已經在

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請我們回延安怎麼辦？（第 352 頁）

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臺戲，放手讓他們批評……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實際是聲討——紫丹），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够。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第 355 頁）

就此，章乃器的兒子章立凡于 1995 年 9 月在回憶文章《風雨沉舟記——章乃器在 1957》中寫道：“這段‘放屁有利論’可為後來的‘引蛇出洞’策略作一注腳。”

毛在以上的講話中，發放出來一絲一毫的“春消息”的善意嗎？更別說誠心誠意了。他有的是充滿火藥味的惡意、敵意和殺機！而隨後造成的氣氛却使文化人在翹盼着、期待着毛主席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會給他們帶來春風送暖、鳥語花香，于是便祇管豪情滿懷地贊頌：萬紫千紅總是春！我說的這，並不是文學描寫，而是當時的現實，甚至“萬紫千紅總是春”等話語，都是當時媒體上的原話。但是，在前者轉到後者的 180 度的巨變中，這中間有一個“斷層”，用什麼來填充呢？現在多數人都明白了，這唯一的填料便是“陰謀”，或由右派老祖宗的兒子所指明的：“這段‘放屁有利論’可為後來的‘引蛇出洞’策略作一注腳。”可有少數人至今硬是堅持毛原先是誠心要整風呢！那就請你們回答：“毛背後秘密的殺氣騰騰！怎麼在一個月後、突然間變成了大庭廣眾下的滿面春風呢？”

事實上，毛澤東早就把反右的策略底定了。祇剩下最後一個問題了：魚要不上勾，螞蟻或者蛇要不出洞，毒草要不出土，知識分子、民主黨派等烏龜王八、階級敵人要不“放臭屁”、要不“先發”，該怎麼辦？

不多不少，正好是在一個月之後，2 月 27 日，毛粉墨登場，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隨後又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天安門城樓上，以及在各種場合上，把“口蜜腹劍”表演得淋漓盡致，出神入化。以致使中國的優秀知識份子們，如著名文學家傅雷對他的談笑風生、笑容可掬、花言巧語、甜言蜜語感到如醉如狂，給兒子寫信說：“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于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

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衆的心……真是藝術高手。”（《傅雷家書》頁158）再往下的信，就是：“真興奮……踴躍爭鳴……都紛紛寫文章響應，在座談會上大膽談矛盾談缺點，大多數都是從熱愛黨的觀點出發，希望大力改進改善。尤其是以前被整的，更是揚眉吐氣，精神百倍。”（同上頁163）

再往下的信，就是他妻子寫的了：“作協批判爸爸的會，一共開了十次。前後作了三次檢討，最後一次說是進步了，是否算結束，還不知道。爸爸經過這次考驗……活到50歲了，才知道看人不是那麼簡單，老朋友爲了自己的利害關係，會出賣朋友，提意見可以亂提，甚至造謠，還要反咬一口……”（同上頁167）傅雷當上了資產階級右派份子。

然後的信……直到沒有了“然後”——夫妻自殺，同歸于盡。被說成是花崗岩腦袋，自絕于人民，死有餘辜……

這便是毛編、導、演的《陰謀》全劇。他的出發點是什麼？近因是五個字：“匈牙利事件”。他在1957年6月8日這個血腥的日子裏，爲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中寫道：

總之，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爲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祇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利益極大。這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上既有反動派存在，中間份子又未受到現在這樣的教訓，黨又未受到現在這樣的鍛煉，亂子總有一天要發生。

可見，毛澤東“主動的整風”不是目的，而是“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這說明他是要反右的，要搞掉社會上的“反動派即右派”的。

從發生匈牙利事件，到反右以後，毛澤東當面說人話，背後說鬼話。現在，人話、鬼話被放在了光天化日之下，反映出反右來龍去脈、血迹斑斑的軌迹，突現出血淋淋的反右陰謀的紅綫。讓陽謀說、變卦說都來個原形畢露。

顯然，用“整黨內敵手說”來說明反右的起因是太不得要領了，不是不對而是不全。所謂“不是不對”，是因爲它有事實根據；所謂“不全”，是因爲不是祇此而已；所謂“太不得要領”，是因爲它遠非起主導作用的因素。

很可能是發生在反右之後，于1958年3月——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

政治秘書室在整風中，要將林克定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後來這便發展為‘黑旗事件’，是我在中南海所見，最為殘酷的政治鬥爭。有人家破人亡，有人撤職處分。這個教訓使我沒齒難忘。”這促使李醫生將他的“整黨內敵手說”變成了他幾十年後的“後見之明”。

林克等八人向政治秘書室副主任何載提意見，說他邀功諉過，對上拍馬屁，對下專橫壓制。何向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黨委書記楊尚昆報告，說他們有向黨進攻的議論。到三月，把他們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集團。

毛對李醫生說：“我找田家英談過了。情況嘛，大體上是清楚了。這八個人就是不滿意政秘室領導人的右傾。中央辦公廳和中直黨委，官官相護，反而打擊他們……這八個人在去年反右的時候，是積極份子。現在反過來，說八個人是反黨份子。我說，說這樣話的人，本身就是站在右派立場，為右派說話……”

過了“五·一”，毛躺在床上，召集田家英、林克、何載和中直黨委的劉華峰、李東野、蕭蘭談話。指出，政秘室的運動進展得不正常。在反右運動中的左派，不可能在整風運動中成了反黨份子。

蕭蘭發言，說：“這八個人的議論，矛頭指向了中央辦公廳，指向了中央辦公廳的領導人。何況中直黨委已經作出決定，指出這八個人進行反黨活動，決定他們停職反省。”發言的語氣既激烈，而態度又昂揚。她捋了虎鬚，事情就鬧大了。

會議開了一個月，蕭仍大力批判林克等八人。她在一次發言中，稱他們八人打的不是紅旗，是黑旗。這便是中央辦公廳的“黑旗事件”名稱由來。

李醫生說：“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才恍悟毛在這次黑旗事件所使用的策略。毛的目標不但有楊尚昆，還有楊尚昆的領導鄧小平。”這次事件的結果，楊丟了中直黨委書記。中直黨委副書記李東野、劉華峰二人被下放。中直黨委辦公室主任蕭蘭被開除黨籍，後死于勞改。

黑旗事件對於說明“整黨內的敵手說”，是一個有力的例證；但對於詮釋反右的根由，却是無力的，甚至是不倫不類的。第一是時間背景迥異。這時已結束反右，五十多萬人受到嚴懲，另有幾十萬人是內控。第二是爆發匈牙利事件的隱患已被“搞掉”。即，政治形勢改觀。第三是人物的政治屬性有別。林克等八人已被右派的鮮血染紅了頭頂。毛封他們是“去年反右的積

極份子”，“左派”。何載對林克和後來文革初期劉少奇對蒯大富，都是沿用了反右的思維模式並都得到了毛澤東給予“打擊左派”的罪名，而遭到毀滅性打擊的。

毛澤東利用整風，不僅是“引蛇出洞”，而且是要知識份子激怒黨員、幹部。當時的事實正是這樣。知識份子響應毛的號召，對那些不堪忍受的政治弊端進行了批評。被批評的黨員、幹部，誠惶誠恐，敢怒不敢言。一待毛發出反右的號令，他們便懷着百倍的仇恨殺將過來。文革中毛故伎重演，讓劉少奇等“黨內敵手”激怒革命小將，他把《我的一張大字報》一貼，全國便風起雲湧，高喊“砸爛劉少奇的狗頭”。祇有經過激怒，才能做到借刀殺人。

我也來個後見之明。1989年鄧小平鎮壓“八九民運”，就是活學活用了毛的這一陰謀。現在來請齊奧塞斯庫作為參照物。奧氏調令軍隊去鎮壓群眾，軍隊卻調轉槍口將他打倒。不是抽象地打倒，而是具體地槍斃。

鄧小平呢，他將軍隊調進北京，進行思想欺騙（中共的術語是“思想教育”），然後駐足待命，與學生和群眾對壘、僵持。一則絕對無可避免地會出現某些辯論、口角，甚至過頭的言語、行動；二則他們會誤導學生去做些激進的、冒險的蠢事，使矛盾激化；三則事實證明，他們會唆使壞人混進群眾隊伍中胡作非為，甚至殺人放火；四則軍隊中也會出些極端份子做出惹起眾惡的事情；最後，最無恥的一招是他們制造一些“共和國衛士”，算在群眾帳上。他們却心懷叵測，裝作正人君子的樣子來宣告：

“我們是人民解放軍，人民軍隊愛人民，一定要作到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當軍隊被激怒到忍無可忍時；“不惜以任何手段進軍天安門”的命令一下，履帶和機關槍便會按捺不住胸膛的怒火，也不管現在是什麼時代了，祇管血洗天安門！

鄧小平笑齊奧塞斯庫妄長了一個高大的身軀，齊奧塞斯庫噬臍莫及，悔愧生前未能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

#### （四）“錯估說”與“上當說”互為因果

有人揭發章伯鈞，說他說：“這次整風運動，要黨外的人提出意見，其後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計到的。民主黨派提意見向來總是客客氣氣的，但估計不足；沒有估計到黨會犯這樣多的錯誤，現在出的問題大大超過了估計，真是‘超額完成了任務’，弄得進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閔剛侯：

《章伯鈞召集的一次緊急會議》，《人民日報》1957年7月4日）

所謂“緊急會議”即有名的6月6日六教授會議。這個會議的召開，其中就窩藏着禍心：原本是章伯鈞想了解一下北京教授鳴放的情況，可民盟北京市委不買盟中央的帳，以“此會難開”反饋之。後來，盟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隱藏在盟內的秘密中共黨員閔剛侯（即上文作者，所指“禍心”，即表現于此）受指使，來電話說：“老金（金若年，民盟北京市委副秘書長、組織部副部長），章伯鈞提議的那事，你不用管了，我們已做了安排。會議定在明天開，地點在南河沿全國政協文化俱樂部，你也得來。有一點現在講清楚，這回不要當面做記錄，可你得用腦子記，會後我們再搞份文字記錄……”讀者至此，該有陰森的感覺了吧！

這裏章伯鈞的估計犯了雙重的錯誤。一是毛早已估計到最壞的結果；二是毛至少在星期三前已采取了斷然措施，根本不存在“進退失措”。並且此後，毛澤東在7月1日的《人民日報》社論裏，作了讓你吃不了兜着走的回應：反動的階級敵人為什麼會自投落網呢？他們是反動的社會集團，利令智昏，把無產階級的絕對優勢，看成了絕對劣勢。到處點火可以煽動工農，學生的大字報便于接管學校，大鳴大放，一觸即發，天下頃刻大亂，共產黨馬上完蛋，這便是6月6日章伯鈞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的目前形勢的估計，這不是利令智昏嗎？

這是章伯鈞的“錯估說”。但，也有毛的“錯估說”和“上當說”。李醫生說：“毛這步棋估計錯了。最後毛幾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鬱，患了感冒，把我叫回來。睡眠更加不規律。毛感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自信心受到極大挫折，因此毛準備狠狠‘整’民主人士。”（《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188）

李是持“整黨內敵手說”的，認為整民主人士不是毛的本意。其實，整兩者都是他的本意。前者是避免中國出赫魯曉夫；即反修。後者是避免中國出哥穆爾卡、納吉或說避免出波匈事件；即反右。其社會的、歷史的根源是蘇共20大及中共八大及其反個人崇拜路線；其認識根源，脫胎于列寧關於俄國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掃除兩堆垃圾的論述和他自己在《矛盾論》中所說，不能掌握矛盾發展的階段性，認識和處理問題便會如墜烟海。所以，先反右，掃除一堆兒“垃圾”；然後，用反右中的積極份子整黨內敵手，黑旗事件，前已闡明，而作為掃除另一堆兒“垃圾”的大動作的文章，所依

靠的是比林克等八人還要積極的反右急先鋒鄧小平（大躍進中是副帥，文革中又復出）、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等輩。

李醫生在書的上一頁說：“毛感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頁188）下一頁又說：“知識份子這下覺得上了‘當’。”（頁189）到底是誰上了誰的“當”呢？所以，事實上不是毛，而是“右派”錯估了，上當了。

作為例證，龍雲直到5月22日，大家已嗅出毛要收網的氣息，他還對毛表示了信賴，認為“收”是不可能的，說：“共產黨是執政黨，怎會出爾反爾，開這樣大的玩笑，讓大家把思想暴露出來，然後再整。”（《人民日報》5月24日）好象這是不可思議的。

無獨有偶。6月8日，毛澤東捕捉到罵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鬱文“為虎作倀，無耻之尤”的匿名信事件這一戰機，在《人民日報》以頭版頭條地位，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向全國公布了要開展一場反擊右派的轟轟烈烈大運動。工商界這天開了最後一次座談會。座談會結束後，章乃器提交一篇書面發言，反批評吳大琨、孫曉村：“這不是睜眼睛撒謊，便是健忘。這樣的辨論作風正派不正派，是值得考慮的。”特別耐人尋味的是，面對中共發出反右派的歇斯底裏號召，他于結尾處寫道：

我告訴工商界：整風運動是一定要進行到底的；共產黨絕不會做半途而廢的事情。共產黨代表了工人階級忠誠老實的品質，是不會表面一套，裏面一套的。我們要完全相信黨的方針、政策，用老老實實、實事求是的態度揭發矛盾，幫助黨做好整風工作。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擊。整風運動從某一些角落來看，肯定會有曲折，肯定會有過“左”、過“右”的偏向，但黨是會明是非的，是非最後也一定會明的。”（6月10日《人民日報》）

他們兩位都是政治老手，竟然會上當受騙而至執迷不悟！有人評論他倆說這話，可以理解為他們對黨信賴；也可以理解為他們預感到收的可能，故意說破，希望避免這種前景。我們說，無論對他們的話作何理解，都說明他們對毛的無耻、無賴的程度作了錯誤的估計，以致見了棺材還不落淚。

張戎作為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長的女兒，根據自己的所經、所見、所聞，寫了紀實文學《鴻》。關於反右的緣起，她寫道：“1956年秋匈牙利發生推翻共產黨政權的暴動事件——不久被鎮壓住了——也使毛大受刺激。他知道中國有一批受過教育的人都希望開放、自由。他想要防止中國發生類似的匈牙利事件，後來他曾對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表示，鼓勵人批評等于是個陷



阱……毛澤東不擔心工人或農民。他堅信這些人會感激共產黨讓他們填飽了肚子，使他們過安穩的生活，他不相信這些人會起來造反。毛澤東從來不信任知識份子，他們比別的階層更喜歡獨立思考。匈牙利事件就是知識份子扮演了重要角色。”

不僅右派上了毛的當，掉進他設置的陷阱，即便左派如陳其通等四人也掉進去了；可憐的馬寒冰竟輕于鴻毛了。位至中央部長的李維漢，雖不能說“上當”，但是他也沒有估計到“引蛇出洞”。當然，下面的黨員就更估計不到了。張戎說她母親——“1957年春，共產黨邀請知識份子批評各級領導。我母親聽了毛澤東的一個一級級向下傳達的講話後，非常激動，整夜沒有睡意。她覺得中國共產黨真的越變越民主了，她為自己是個共產黨員而自豪。”到反右時，“她打從心底覺得此事不公：先是宣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現在却把提了意見的人打成右派。”（《鴻》頁156,157-158,）

毛澤東真的“開這樣大的玩笑”，讓左派、右派都上當了！讓黨員、國人都上當了！甚至開到國際上，讓蘇聯、美國也都上當了！

毛澤東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講中蘇關係時指出：

我們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時，我們講，他們不講，還說我們是搞自由主義……

這個報告公布後，《紐約時報》全文登載，並發表了文章說是“中國自由化”……當時蘇聯看不清，給我們一個照會，怕我們向右轉。反右派一起，當然“自由化”沒有了。

無怪乎江青說：“主席這個人，在政治鬥爭上，誰也搞不過他。”（《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137）可見，如果真象他說的——是“陽謀”，能讓這麼多人上當嗎？能把國人、洋人玩得如此眼花繚亂嗎？當然，出河才見兩腿泥。

赫魯曉夫和許多中國人一樣，終於看出來了：“百花齊放這個口號是個激將法。毛假裝把民主和自由發表意見的閘門開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們把自己內心深處的想法用口頭或書面的形式發表出來，以便他能夠把那些被他認為是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赫魯曉夫《最後的遺言》頁417）

是的，一點不錯，正是志在“搞掉”。“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

“搞掉”是目的，“陰謀”是手段；如此而已，再無其它。

但是，還有很多人，事後仍持“錯估說”。例如，政論家凌鋒說：“經過了上述恩威並施以後，毛澤東以為可以控制中國的知識份子，成為會說話的黨的高級工具了。因此在 1956 年出現了蘇聯共產黨第 20 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及其後的波蘭和匈牙利事件，毛澤東自以為中國的知識份子絕不會‘亂說亂動’，所以以退為進，在 1957 年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大鳴大放，以緩和及改善黨和知識份子的關係。豈料却引來一大堆批評意見，包括一些相當尖銳的意見。毛澤東大吃一驚，一怒之下發動了反右派鬥爭，加強對知識份子的鎮壓。而為了不失他的‘英明’形象，便詭稱大鳴大放是他的‘陽謀’。”（《中共風雨八十年》，頁 124）

他又不接觸毛澤東，怎能知道“毛澤東大吃一驚”和“一怒之下”呢？所以我猜想，他是受了待在毛身旁的李醫生回憶錄的影響。他得結論的前提條件——“毛澤東自以為中國的知識分子絕不會‘亂說亂動’……以緩和及改善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就錯了。一是毛自以為中國的知識分子這班烏龜王八蛋不僅亂說亂動，而且亂放屁；二是毛早已做了最壞的準備，早已下了最狠的心。三是最主要之點，說毛有意“緩和及改善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在本質上就誤解了毛。

### （五）“因素”說：遠因和近因

有一本研究反右派鬥爭的專著，書名起得很醒目：《1957 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如果從這個書名引出鄧拓的結論：“主席說百家者兩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講的雙百方針是假的。”那會是很好的。可惜！可惜！他在對赫魯曉夫上述言論抨擊中，顯示了一種與此絕然相反的意思：這當然祇是一種懷着敵意的情緒化的評論，把本來很複雜的事情看得過於簡單了。他抹煞了毛確實有消除弊端的願望。

“國內一些研究者持有類似的說法。他們的理由是：……”筆者刪去的那些“理由”，大致上是本文前面引述的毛澤東那些充滿殺機的對內講話。為了避免重重復復，故而刪去。作者的說法是：“但是這些都僅僅說明他的思想中有發動一場反右派鬥爭的因素，却不能說這時他已經在計劃開展這場鬥爭了。”（《1957 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540 頁。）

好一個“這些都僅僅說明他的思想中有發動一場反右派鬥爭的因素”！

好一個“因素”！

要是當真地來追查“因素”，早在中共建國前夜，毛在評美國國務院白皮書和艾奇遜的信件中就曾說道：“他們的頭腦中還殘存着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們不是國民黨反動派，他們是人民中間的中間派，或右派。他們就是艾奇遜說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的欺騙做法在中國還有一層薄薄的社會基礎。”（《毛澤東選集》四卷本，頁1374。）

艾奇遜說，還是要搗亂的，並且確定地要搗亂。效果呢？據說是會有的。依靠一批什麼人物呢？就是“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說：“……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手，中國終於會擺脫外國的羈絆。對於中國目前和將來一切朝着這個目標的發展，我認為都應當得到我們的鼓勵。”（同上，頁1375。）

中國的許多自由主義份子，亦即舊民主主義份子，亦即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們所矚望的，和經常企圖爭取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們，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動地位，對問題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美國統治者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國民黨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蘇聯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中國共產黨的觀察也往往不正確，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或不贊成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問題的緣故。（同上，頁1376）

那些近視的思想糊塗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着，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你們的好教員。你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不是嗎？你們能在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裏找到一絲一毫的仁義道德嗎？（同上，頁1384）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又不但因為艾奇遜公開地宣稱，他們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份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國人特別是那些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中國人注意，大家相約不要上美國人的當，到處警戒帝國主義在暗地裏進行的陰謀活動。還因為……艾奇遜的歷史觀點正是中國知識份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觀點，就是說資產階級的唯心的歷史觀。駁斥了艾奇遜……對於那些抱着和艾奇遜相同或有某些相同觀點的人們，則可能是更加有益。（同上，頁1398）

上述這些話，跟毛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話，“帝國主義國家和我們之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們裏頭有他們的

人，拿中國來說，就是資產階級中間和民主黨派中間的許多人……”相對應，就可以判斷，在毛緊繃的階級鬥爭為綱這根弦上，早把民主個人主義的知識份子定為敵人，當作帝國主義的第五縱隊，而當年稱作“人民中間的中間派或右派”，祇是策略上的考慮，到反右時，就定性為“反動派”了。作為“因素”，為反右派打下伏筆，是其遠因。

或有人問，他既然是一個具有超帝王思想的人，民主之死敵，那他為什麼還能提出：“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和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呢？他還標榜開明地說：“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蘇聯不同。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民主黨派，讓他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對他們採取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毛澤東選集》五卷，頁 279）。

蘇聯解體，檔案解密，揭了他的老底。原來，按他“有意識地”，並不是“留下民主黨派”而是正好相反。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說：“一旦中國革命取得最後勝利，按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經驗，除中國共產黨之外，所有政黨就都應該退出政治舞臺了，這樣將會加強中國革命的勢力。”

斯大林否定毛的意見，于1948年4月20日復電表示反對，毛才改變初衷。

1947年12月17日周恩來起草的一個黨內指示中說：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產階級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毛澤東在審閱這個文件的時候，加寫了這樣一段：

在蔣介石打倒以後，因為自由資產階級特別是其右翼的政治傾向是反對我們的，所以我們必須在政治上打擊他們，使他們從群眾中孤立起來，即是使群眾從自由資產階級的影響下解放出來。但這並不是把他們當作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一樣立即打倒他們，那時，還將有他們的代表參加政府，以便使群眾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特別是其右翼的反動性，而一步一步地拋棄他們。（朱正《反右是流產了的文化大革命》）

這裏明確無誤的作出“反右”的界定，“反右”的決心和反右的手法。如果說，上述這些話，如：“以便使群眾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特別是其右翼的反動性，而一步一步地拋棄他們。”是造成“人們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的歷史根源，是從長計議的話，那麼，他現在搞的大鳴大放：“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醜類。”就是圖窮匕首現；就是時候一到，一切全報。與其像毛澤東說的，反右派鬥爭，是政治

上思想上一場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的話；倒不如按着歷史的本來面貌說，叫做“蓄謀已久的陰謀得逞”，更合事實。

“李銳在訪問過程中揭露一段頗有分量的史實，他說毛在延安中共七大上說過，掌握政權以後，我們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金鐘《回首十年說批毛》，《開放》2003.12）可見毛早把民主人士當作鬥爭對象，是處心積慮，蓄謀已久。按其盤根錯節，毒根很深來說，更可以追溯到：

早在毛澤東在1925年的《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分析》一文中看出毛對知識分子的敵視態度——王丹在訪問許良英的《撥開“反右”運動的歷史迷霧》中說：“此文發表於1925年12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1926年2月的《中國農民》月刊第二期和1926年3月的《中國青年》第116—117期，1952年重刊於《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時，已面目全非，文中把知識分子分為三類：（一），‘反動知識階級’，包括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專院校教授和學生，屬於大資產階級，是‘極端的反革命派’，是‘民族革命之死敵’。（二），多數‘高等知識分子’，包括大部分東西洋留學生，大部分大專院校的教授和學生，屬於中產階級，其右翼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以當作我們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三），‘小知識分子’，包括中學生、中小學教員，屬於小資產階級，‘是我們的朋友’。”王丹說：“這是‘知識越多越反動’濫調的濫觴。”（王丹：《我們在寫歷史》第144頁）

1956年，中共召開八大，劉少奇主持起草的政治報告，原稿提出中共特別需要各民主黨派的監督。毛澤東增改為“首先是階級的監督，群眾的監督，人民團體的監督。”原稿另一處把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批評說成同“黨內的自我批評”和“勞動人民的監督”等量齊觀，毛澤東將論述改寫為：後兩者的批評監督“是主要的一面”，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批評“常常是從右的方面出發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散見第136—212等頁）。可見，毛澤東後來的通過鳴放讓知識分子幫助黨整風，而且態度誠懇得出奇，是要“逗”出“從右的方面出發的”意見來的。這一點，他早已胸有成竹，而其後續步驟是陰謀或陽謀，可作另議，但從早前到晚近，一直是懷有“預謀”這一事實，已為歷史所確證。可見毛處心積慮，蓄謀已久，盤根錯節，毒根很深，很深。

事實上，自“解放”以來，對知識份子的所有思想改造運動，都具有反右派鬥爭、鬥爭民主人士的因素；而反右派運動，究其本質，仍是屬於反“民

主個人主義”的範疇。簡直可以把上節引用毛的那句話，改述如下：“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有那么多民主個人主義者沒有搞掉。”

“毛確實有消除弊端的願望。”該書作者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是不是向黨表明，自己雖被錯劃為右派，受了很大苦難，但絕對沒有“懷着敵對的情緒”，甚至懺悔當年包括自己在內的右派份子向黨猖狂進攻，致使“弊端”沒能“消除”成，辜負了偉大領袖“確實有”的“願望”？其實大可不必。邵燕祥在該書“序”中說：“有人說反右派鬥爭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預演，我以為不如說是序幕。”

一齣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九年後發生了，一革革了整十年，付出了中共組織癱瘓、國民經濟幾乎崩潰、上億人受害的代價，總算徹底實現了“毛確實有消除弊端的願望”。付出的代價是“值得”的！他讓世人看到了毛“消除”的到底是什麼“弊端”！

我不能不驚嘆、感佩鄧拓的先知先覺。他在中國沒有付出文革的代價前，甚至沒有反右前就說出了這樣的話：“主席說百家者兩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講的雙百方針政策是假的。”假的就是假的。時至今日，我們應該在鄧拓“更相信”的基礎上再加一個“更”字。孰料，以“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作為著書立說之“眼”的作者，竟然指責別人“抹煞了毛確實有消除弊端的願望”。夫“確實有”者，蓋非鄧拓所說的“假的”也。“假作真時真也假”，這該叫讀者說什麼好呢？

如果我們回過頭來看，與毛相反，當時劉少奇的諸多言論和行動，似乎倒可以說明他對於整風是抱着“確實有消除弊端的願望”。至于毛澤東，他整風是假的；真的是一場包藏禍心的，充滿殺機的大陰謀。

至于說到近因，也是說來話長。毛澤東曾說過：我們沒有預料到1956年國際方面會發生那樣大的風浪……給右派猖狂進攻以相當的影響。

去年這一年，國際上鬧了幾次大風潮。蘇共20次代表大會大反斯大林，這以後，帝國主義搞了兩次反共大風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也有兩次大的辯論風潮。在這幾次風潮中，歐洲美洲有些黨受的影響和損失相當大，東方各國的黨受的影響和損失比較小……斯大林問題牽涉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各國黨都牽涉到了。

對蘇共“二十大”……也有少數人起了波動。每逢臺風一來，下雨之前，螞蟻就要出洞，他們鼻子很靈，懂得氣象學。蘇共“二十大”的臺風一刮，

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這是黨內的動搖分子，一有機會他們就要動搖。他們聽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搖過去喊萬歲，說赫魯曉夫一切都對，老子從前就是這個主張……黨內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毛澤東選集》五卷，頁333—334）“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頁338）

所以，講近因，主要地是三個事件：1，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2，波匈事件；3，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

### 1.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

在中蘇論戰的“九評”中，《一評》說：“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對於斯大林的批判，無論在原則上，在方法上，都是錯誤的。”《二評》說：“中國共產黨一向認為，赫魯曉夫同志利用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全盤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錯誤的，是別有用心。”鄧小平指責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爲什麼人都死了，還要這樣醜化他呢？”（李越然：《中蘇外交親歷記—首席俄語翻譯的歷史見證》，頁240。）毛澤東說：“他們不要這把刀子，我們要拿起這把刀子，我們要充分使用這個武器。你們蘇聯反史大林，我們不反，我們不但不反，我們還要擁護。”（《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111）

毛澤東要擁護斯大林；這是爲什麼呢？王若水先生在《毛主席與他的世界共運領袖之夢》一文中有清楚明白的敘述：

“文革”的發生是突然的，但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念頭却是醞釀已久的。要了解事情的原委和背景，我們必須多費一些篇幅，從五十年代的“斯大林問題”談起。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失去了領袖。誰來代替他的位置呢？這個人要有長期領導革命鬥爭的資歷和豐功偉績，要有卓越的領袖才能和高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水平，以及由此而來的崇高威望。這樣的人本來應當由蘇共的領袖來充任，因爲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然而無論是斯大林指定的繼承人馬林科夫（他很快就下臺了）還是後來掌權的赫魯曉夫，都不具備這樣的資格。

在斯大林死後，世界上活着的領袖中，沒有一個人的威望能和毛主席相

比。以毛這樣的性格，產生當世界共運領袖的雄心，這是極為自然的。幾十年中，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盛行着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斯大林享有政治的和理論的絕對權威；現在該輪到毛主席了。

實際上，赫魯曉夫並沒有全部否定斯大林的功績，也沒有徹底揭露斯大林的罪行。然而赫魯曉夫批判個人崇拜，却妨害了毛主席，因為毛正要搞對自己的崇拜。這才是毛的真正所“懼”。

毛也不會不想到，“肅反”的錯誤，他自己也不是沒有犯過。1930年到1931年，毛在贛西南搞肅清“AB團”的運動，殺害了一大批無辜的革命者。紅一方面軍四萬多人中就殺了幾十個團長，打出4400多AB團分子。紅二十軍幹部，從軍長，政治委員到副排長以上幹部，共700多人，都被當作AB團關押，先後處死。紅二十軍番號取消，戰士被編入紅七軍。一支英勇善戰的紅軍隊伍，就這樣全軍覆滅了！地方的情況更糟。贛西南地區的幹部百分之九十被打成AB團分子。永新縣被錯殺的約1890人。遇害的還有江西省行委書記李文林等人。這個大冤案一直沒有平反。後來，在延安整風期間搞“審幹運動”，也弄得草木皆兵。延安和陝甘寧邊區清理出“特務”多達一萬五千多人，有的單位清理出的“特務”超過總人數的一半。雖然這主要是康生執行的，但身為總學委主任的毛主席是無論如何不能辭其咎的。

現在，斯大林已經不再是毛的阻礙，赫魯曉夫也沒有被毛看在眼裏，可是對個人迷信的批判，却妨礙了毛主席。他正想取代斯大林，享有那種世界性的萬人膜拜的威風。儘管那時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已經在中國流行，可是和蘇聯對斯大林的崇拜相比，在程度上和規模上却是瞠乎其後的。

毛主席要保護自己，就要保護斯大林；他要為自己樹立斯大林在世時享有的那種至高無上的權威，就要想辦法為“個人崇拜”翻案。

王若水的文章說明三個問題：一是，毛要當世界領袖，讓世人對他個人崇拜。二是，毛怕人們在斯大林的鏡子裏，看到自己更加瘋狂地殘害“階級敵人”和黨內異己的血腥罪惡，會對他進行譴責與清算。三是，毛要維護斯大林的根本制度。因為祇有這個制度，而不是別的任何制度都能夠實現其無限膨脹的領袖欲的。這也就是他自始至終“一邊倒”向斯大林主義的原委。

起先他還假惺惺地表示贊同在中共八大上反個人崇拜。1956年9月16日，鄧小平在中共八大代表黨中央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指出：“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



神化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表示“我們黨也厭棄對於個人的神化”，“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

後來在 1958 年 3 月成都會議上，毛幹脆赤裸裸地講：“赫魯曉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種壓力。中國黨內絕大多數人是不同意的，有一些人屈服于這種壓力，隨聲附和，要打倒個人崇拜。還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我們不是崇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嗎，斯大林正確的東西也還要崇拜。對於他們，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裏，為什麼不崇拜呢？列寧在世時，許多人批評他獨裁。說：政治局祇五個委員，有時還不開會。列寧回答很幹脆：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因此，祇要正確，不要推，不如我獨裁；也開點會，不全是獨裁就是。不要信這個邪，你反對個人崇拜，反到天上去，無非想自己獨裁。”還說：“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

許多參加會議的省委書記和中央委員們的競相歌功頌德，發言說：“對於領袖應當無條件地信任，特別是經過幾十年實踐證明，中國不存在個人崇拜的問題，要更加強調學習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著作。”

“要宣傳毛主席的的領袖作用，宣傳和學習毛主席的思想。高級幹部要三好：跟好、學好、做好。”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內奸和工賊，後來死無葬身之地的劉少奇當時在會上發言說：“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不論從思想、觀點、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們都比他差一大截。我們的任務是認真向他學習。”更有甚者，他在 1959 年的廬山會議上竟說：

我想，我是積極地搞個人崇拜的，積極地提倡某些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澤東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黨章上就寫上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這一條。黨要有領袖，領袖就要有威信。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的運動，赫魯曉夫搞這一手，我看也有許多不正確的地方，不應該那樣搞。所以在（蘇共）二十大以後，有人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上是對黨、對無產階級事業、對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活動。

柯慶施更高唱：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

1970 年 12 月 18 日，毛接見斯諾時，說：“總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諾沒

有人崇拜你，你就高興啦？你的文章、你的書寫出來沒有人讀你就高興啦？總要有點個人崇拜，你也有嘛。你們美國每個州長、每個總統、每個部長沒有一批人崇拜他怎麼混得下去呢！”

斯諾說：“對於人們所說的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須由一位個人把國家的力量人格化。在這個時期，在文化革命中間，必須由毛澤東和他的教導來作為這一切的標志，直到勝利的終止。”毛澤東說：“這是為了反對劉少奇。過去是為了反對蔣介石，後來是為了反對劉少奇。他們樹立劉少奇、蔣介石，我們這邊也總要樹立一個人啊！”

毛澤東這裏說的“過去是為了反對蔣介石，後來是為了反對劉少奇”，就是他為自己蓋棺論定的，終生做了的兩件事。前者是建立黨天下，後者是建立毛天下。右派反的是黨天下；反右派是鞏固黨天下。反右派是屬於前者，即“第一件事”，文革屬於後者，即“第二件事”。所以，反右與文革，不管在形式上有多少雷同之處，而在本質上，在概念上是屬於兩個不同的範疇。對二者關係的許多錯誤之見，都由於對此本質的混淆不清。

在毛澤東本人對個人崇拜的鼓吹下，在林彪，柯慶施，康生等人帶動下，中國的造神運動大大超過蘇聯，而於文革中達到登峰造極，前無古人！

1957年，右派却對“個人崇拜”發起了“猖狂”的進攻，茲舉一二：

民主建國會成立於1945年，章乃器是主要創始人之一，“民建”在1949年前為爭取中國的民主化做了大量工作，建國後章乃器被任命為糧食部長，但是在1957年卻被打成“極右分子”，撤了部長職務。主要的根據是章乃器當時說了不要搞個人崇拜，說對毛澤東也不能搞個人崇拜。現在看來他的講話完全正確，但是他戴着右派帽子過了22年，“文革”被打得遍體鱗傷。（孫文廣：《“民建”座談會發言紀要》博訊自由發稿區）

首發在《觀察》的曉楓的文章《最早揭露毛澤東偽馬列面目的女英雄》寫道：

22歲的四川大學學生馮元春以極其平靜的聲調在鳴放辯論會上說：“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用暴力奪取政權後的統治階級組成的政府，借用軍隊、警察、監獄去鎮壓老百姓，他們不給人民任何民主自由的權力，也不遵循法律去依法辦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制定通過的‘憲法’僅是一紙空文，毛澤東要想怎麼幹就怎麼幹，想打倒誰就打倒誰，想關押誰就關押誰，這決不是馬列主義者，是徹頭徹尾的獨裁！”

她就着“高饒事件”說：“根據已發表的材料觀察，高饒的罪名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我們請問，黨中央和毛主席有缺點難道就不能反對嗎？這不是出于個人崇拜是什麼？高饒沒有反人民，他和暴力集團也沒有聯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這是違反憲法的。報上公布高饒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婦女，但為什麼被侮辱的婦女却没有提出控訴呢？因此，毛主席是犯了錯誤，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她繼續說：“我們再來看看共產黨，這個集團對工人農民的剝削是巧妙的、殘酷是空前的。工人加班不給加班工資，美其名曰‘奉獻’；農民辛辛苦苦種出的糧食自己不能支配，大部分被國家統購去再無存糧，今後要是發生一點災害便會餓死人。再看共產黨的各個單位都養了一大批不務正業，專門監視別人思想、言論、行動的政治工作人員，美其名曰改造別人思想，實際上是狗屁不通，祇會扣帽子，或是說我是一個黨員，是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他們就這樣靠吸取別人腦汁而生活，他們對待老教授是那樣橫蠻、無理，是最卑鄙的一種人。”

她就着胡風事件說：“毛主席經常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為什麼胡風先生公開向共產黨中央上書三十萬言就成了罪人了呢？而且還把別人朋友之間的來信公布出來，說是反革命罪證。這不是毛澤東公然破壞法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毛澤東主席的特權思想，和歷史上一切統治者的特權一模一樣，毛澤東是中國再次出現的劉邦。”

清華大學一位署名一個清華人的學生貼出一份《我控訴、我抗議》的大字報，直呼毛澤東為皇帝，他說：“皇上啣，秦始皇與你相比，也祇是個無名小卒了，無怪乎你說‘秦皇漢武，略輸文采’，你在鎮壓人民這方面，是勝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多少倍了。”（《許行：1957年學生民主運動尋思》）

1956年11月30日，毛澤東接見蘇聯駐中國大使尤金時，明確表示：“斯大林執政時期的根本方針和路線是正確的，不能用對待敵人的辦法來對待自己的同志。”

《光明日報》1957年6月8日載：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將越反越多。

陳新桂認為目前“鳴”“放”中有五種顧慮。他說：其中有人根本懷疑整風有何用處。儲安平在統戰部的座談會上提出“黨天下”、“一黨治國”。儲安平的話還沒有說完。在蘇聯以及新民主主義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是通

過工人階級先鋒隊——共產黨專政。把黨外人士看成異黨分子，這樣，不出宗派主義就很奇怪了。這是個理論問題：如何一黨專政？一黨專政，民主黨派如何監督？這要毛主席繼續發展了。在延安整過主觀主義，愈整愈厲害，無產階級專政是個“根”，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將越反越多。

著名的右派、中國人民大學女學生林希翎，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說：“我有很多問題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鐵托演說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認為個人崇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所有社會現象都有社會歷史根源，斯大林問題絕不是斯大林個人的問題，斯大林問題祇會發生在蘇聯這種國家，因為蘇聯過去是封建的帝國主義國家，中國也是一樣，沒有資產階級的民主傳統。我覺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認為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如果是的話，也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裏是不民主的。我管這個社會叫做在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思憶文叢：《在北大的第一次發言》）

“一個政黨也好、一個人也好，進步的標準是能不能正確地反映社會發展的要求，能不能推動社會進步。不能的話，就是反動。斯大林在後期阻礙社會發展，因此是反動的。他殺了那麼多人，如果不是斯大林的錯誤，二次大戰不一定起來。不是斯大林的錯誤，赫魯曉夫領導的十萬人也不會全死掉。”“毛主席的話又不是金科玉律，為什麼不能反對呢？”（同上，《在北大的第二次發言》）

北大學生王書瑤說：“正是蘇聯人民對共產黨可能發生的錯誤領導喪失了任何警惕性，認為斯大林就是一切，再加上蘇聯政治制度本身的重大缺陷，就促成了斯大林的全部錯誤和犯罪得以實現，而中央權力極大這點起了重大作用。由此可見，今天在我國廣泛流行着的對共產黨的某種崇拜，是十分有害的。”（同上：《從斯大林的錯誤中應得到的教訓》）

北大學生群學說：“由于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的懸殊，就必然地要產生個人崇拜。”“首先他們強調了一個政黨在革命中的作用，並予歌頌、贊美，進而把它的作用誇大到似乎一切都是一個黨能完成的，因而奉若神明，拒絕群眾的意見，而當把黨的地位異常特殊之後，再就進一步推崇個別高級領導人員，以至發展到如神的崇拜，一句話，全部理論基礎是：歷史主要由個別

政黨所創，而政黨由領導者所創，一切及時指示奉若神明，否認了群眾的主要作用。”（同上：《論“個人崇拜”產生的歷史必然性》）

因為這些老少男女右派們都信仰民主自由，都反對極權專制；因而，反對個人崇拜，個人獨裁，簡直是他們的天性！而反對個人崇拜的性質，歸根結底是反對“黨天下”。

## 2. 波匈事件

吳冷西在《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第一章《從評價斯大林說起》中指出：

少奇同志指出，這十天的活動中，感到蘇聯同志的大國沙文主義由來已久，表現十分突出，由此而引起兄弟黨對他們的強烈不滿。東歐國家的民族主義情緒也由來已久，于今尤烈。蘇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帶來的惡劣影響，現在已相當充分地暴露出來。

小平同志說，波蘭同志在莫斯科向我們訴苦，情緒激動，有時簡直有點像我們土改時貧雇農“吐苦水”。從波蘭和匈牙利的情況看，已經出現了否定蘇聯的一切以至否定十月革命的傾向。各自誇大民族特性，否定國際共性。蘇共領導人雖然開始感到過去大國主義一套不靈，但並未覺悟到必須改轍易轍。我們幫人要幫到底，今後還須要向兩方面多做工作。

兩人的發言明顯地反映出這樣一種傾向：雖然他們都實際地感到了“蘇聯大國主義”所帶來的巨大危害和惡果，但比起深入挖掘大國主義的危害，他們的關心點更多地在于警惕否定“社會主義”本身、“蘇聯的一切”的傾向，並將其原因歸咎于“斯大林批判”的不良影響。

這就是中共對波蘭和匈牙利事件的基本的認知和鮮明的不同態度。了解到這一點，你就會對下面的事態發展了然于心，不致大惑不解了。

關於波蘭事件，書中說：

毛主席聽了後說，現在情況非常緊急，我們要早定方針。兒子不聽話，老子打棍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另一個社會主義鄰國武裝干涉，是違反最起碼的國際關係準則，更不用說違反社會主義國家相互關係的原則，是絕對不能允許的。這是嚴重的大國沙文主義。

毛主席說，事不宜遲，我們應該馬上警告蘇方，堅決反對他們對波蘭動武。會議一致同意這個決定。毛主席即說，會議到此結束，馬上約見蘇聯駐

華大使。他要胡喬木和我留下作陪。

毛主席這時仍穿着睡衣，喬木建議他是不是換穿中山裝。毛主席說，就這樣也沒什麼關係。

約半小時後，毛主席在菊香書屋的臥室裏接見蘇聯大使尤金。尤金原是毛主席的朋友，過去兩人多次在一起討論哲學問題。現在兩人都表情嚴肅，尤金似乎預感到這次接見非比尋常。

毛主席劈頭就直接了當地對尤金說，我們的政治局才剛開過會……我們政治局一致認為，蘇聯武裝干涉波蘭是違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的。中共中央堅決反對蘇共中央這樣做，希望你們懸崖勒馬。如果你們竟然不顧我們的勸告，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中共中央和中共政府將公開譴責你們。就是這幾句話，請你立即打電話告訴赫魯曉夫同志。情況緊急，時間無多，談話就此結束，請你趕緊立辦。

尤金滿頭大汗，連聲“是”！“是”！迅速退走。

那麼，對匈牙利事件又是什麼態度呢？

吳冷西寫道：

毛主席在 10 月 30 日晚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時，除同意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支持蘇方外，還特意電告我們代表團，聲明受中共中央委托，反對蘇軍從匈牙利撤退。少奇同志在 10 月 31 日會見蘇共中央主席團全體成員時，嚴厲指出：蘇共這個決定是對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蘇共中央如果拋棄社會主義匈牙利，將成為歷史罪人。

由此，毛澤東便欠下了匈牙利人民一筆血債。劉賓雁說：可以斷言，中共領導集團和中共反動派造下的罪孽，遠遠超出今天已知的最大限度。它們是逃不過總清算和大審判的。審判席上還將有外國人在場。因為毛澤東一伙手上不僅染著中國人的血。1956 年，蘇軍第一次進入布達佩斯後，曾一度撤出。是在毛澤東派出中共特使劉少奇赴莫斯科力促之下，蘇聯才再次出兵，對匈牙利人民起義血腥鎮壓的。（《迷霧重重的中共八十年》）

20 萬蘇軍在毛澤東的督促和周恩來的坐鎮支持下，長驅直入匈牙利，一場血腥屠殺開始，納吉政府垮臺。納吉和他的 15 名支持者躲 23 日至 11 月 4 日整整 13 天，有 7,800 人喪生，12,000 人受傷，30,000 多人受迫害，幾百名革命領導人被捕處決。200,000 多萬人逃亡西方，4,700 人流亡美國。（《開放》2006.11）據徐鑄成回憶，當以他為團長的中國新聞代表團訪蘇時，“我

們團到達的當天的晚上，恰好匈牙利事變後新上臺的首領卡達爾到蘇訪問，蘇共中央特為他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盛大的歡迎酒會，我們被邀請參加……在平息匈牙利事件中，周總理出了不少力，所以卡達爾對中國很感激。當蘇聯朋友把我們向卡達爾介紹時，他對我團代表一一熱情握手，還和我擁抱。”（徐鑄成《“陽謀”親歷記》）

這兒需要提出一個質問，以揭示毛出爾反爾，翻雲復雨的嘴臉：決定對匈牙利出兵，難道就不是你剛剛十天前說的“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另一個社會主義鄰國武裝干涉，是違反最起碼的國際關係準則，更不用說違反社會主義國家相互關係的原則，是絕對不能允許的。這是嚴重的大國沙文主義。”的了嗎？認你說成什麼，也絕不能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另一個社會主義鄰國武裝干涉”內政的正當理由。

前已點明，毛澤東所以態度強烈地反對蘇聯出兵波蘭，是因為波蘭祇是反對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而這一點正合毛意。毛這時候出的一切主意，對蘇共都是包藏禍心的，都是為了抬高自己，要充當國際共運的領袖，事後也證明這一點。斯大林在時的分工是，蘇共管歐洲，中共管亞洲，現在，毛的魔爪已伸進歐洲。

至於堅決主張出兵匈牙利，是因為匈牙利事件的性質為毛所不容：要廢除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要蘇聯撤軍，主張芬蘭式中立化……

李丹慧、沈志華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機：中國的角色和影響——“波匈事件與中國”研究之一》中寫道：

中方的說法完全相反，以師哲的回憶最為詳細：10月30日上午，蘇方將米高揚關於匈牙利局勢惡化的報告送給劉少奇。中共代表團看了這個報告後深感意外。經研究提出兩種辦法，一是蘇軍撤出布達佩斯，二是蘇軍採取鎮壓行動。由於兩種辦法各有利弊，大家討論了一天也沒有結果。晚上劉少奇打電話請示毛澤東。毛澤東表示，可以把兩種辦法都向蘇聯提出，跟他們商量。毛傾向於進行鎮壓，但以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時候再行動。當晚，應中共代表團要求，中蘇領導人舉行緊急會議。劉少奇明確表示，對匈牙利的局勢，是不是還有挽救的機會？不要就這樣放棄了，放棄了可能要犯錯誤。鄧小平更是直截了當地提出：先要掌握住政權，不讓政權落在敵人手裏。蘇軍部隊應當回到布達佩斯，堅決維護人民政權。中共的意見很清楚，匈牙利的問題不同于波蘭，已經具有反革命的性質了，

必須想辦法加以挽救。（《歷史研究》2005年第2期）

這裏引人深思之處在於：“毛傾向於進行鎮壓，但以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時候再行動。”這一點說明，毛澤東施展“引蛇出洞”的陰謀，已成一種思維定勢：對國人，對洋人，一視同仁。我和寒山先生的所見不約而同：

當時應邀到莫斯科和蘇共協商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態度最堅決，而在北京的毛澤東在同意鎮壓後要求蘇聯再給匈牙利的所謂“反革命”一點時間，讓他們充分暴露，再一網打盡。了解中共在鎮壓匈牙利事件過程中的出謀劃策，也就不難理解中共為什麼不久在自己的國家會從鼓勵“鳴放”轉到全面“反右”了。（《紀念1956年匈牙利革命》）

另一點，寒山先生也說得對：

毛澤東的雙百方針在世界共產主義領導人中並沒有得到擁護，因為他們都害怕群眾，但是很多國家的知識分子卻對這個方針十分有好感。在匈牙利，中共大使郝德清不但邀請匈牙利知識分子來大使館作客，而且四處旅行，和各地知識分子廣泛接觸，宣傳雙百方針。他還主持了一個面向匈牙利報紙和電臺的有關中共八大的宣傳活動，在其中雙百方針是一個重要內容。因此，匈牙利知識分子一直把中國看得和蘇聯不一樣，直到蘇聯出兵鎮壓時，很多人還說中國是站在他們一邊的。

除了匈牙利知識分子對中共有好感外，匈牙利黨內的民主派也對中國寄予希望。匈牙利共產黨和東歐其他黨一樣，內部有蘇聯派和本土派的矛盾，斯大林時期蘇聯派掌權，壓制本土派，赫魯曉夫反斯大林後本土派抬頭，很多人被從監獄中放了出來重新掌權。就在這個人事轉變的關頭，中國大使積極地和當時還被壓制的本土派聯系，甚至得到了一份當時還沒有恢復名譽的黨內改革派領袖納吉給中央的信的副本。

納吉在信中對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十分贊賞，說這五項原則也應該應用到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之間，這明顯是在挑戰蘇聯的大國大黨主義。

然而，當匈牙利知識分子、學生和黨內民主派把運動發展到要求改變共產黨一黨獨裁的局面，退出蘇聯用來控制東歐衛星國的華沙條約組織時，中共大使館的態度逐漸轉變了。當時郝德清下令斷絕和匈牙利人的來往，關閉使館大門，每天把匈牙利的情況向北京報告。中共最終判斷匈牙利的事件已經發展成反革命，在赫魯曉夫動搖猶豫的時候強烈要求蘇聯出兵鎮壓，在這



個決策中大使館的報告無疑起了很關鍵的作用。

匈牙利事件之後，匈共領導人訪問中國時，毛澤東告訴他們在匈牙利發生所謂“反革命暴亂”時，他每天都聽取大使館的報告，和其他領導人一起研究局勢。從匈牙利事件中他吸取了教訓，制定了在中國防止出現類似事件的方針。

今天當人們回顧這段歷史時，應該想到中了毛澤東“陽謀”的不但是中國知識分子，也有其他共產黨國家的知識分子。匈牙利就是一個事例。（《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毛澤東的雙百方針》）

從這一點說開去，作為事後的諸葛亮，我們不僅僅是如過去看到和想到的那樣：毛澤東搞整風反右，匈牙利事件是其外因，或說誘因；而且現在更進一步看到和想到：那時中國存在着的內政“黨天下”與外交“一邊倒”所產生的政治弊端，正是爆發匈牙利事件的原因和條件。但他決不會用消除政治弊端，來預防和克服匈牙利事件之爆發；而是為了保護這個“政治弊端”，堅決主張出兵鎮壓所謂匈牙利發生的“反革命暴亂”，實質上就是，進行一場國際的反右派鬥爭。這時，在他腦子裏已打好要進行一場國內的反右派鬥爭的底稿。不是嗎？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毛對二者都定性為鎮壓反革命，而且在克敵制勝上又都是同一思路，都是先“誘敵深入”，後“聚而殲之”。再進一步說得更開些，文革何嘗不是如此？正如我前引李銳所說：“他自己為什麼搞文化大革命，是因為赫魯曉夫……”——先是反蘇聯的赫魯曉夫，搞國際的文革；後是反中國的赫魯曉夫，搞國內的文革。說明毛澤東是從稱霸世界來解決獨霸中國的問題的；這和常言說的：“外交是內政的延續”，正好是相反相成吧！

### 3. “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

毛澤東口出髒話，罵人“放屁”，“拉屎”等，已成他的家常便飯。這次說“螞蟻出洞了”，不算罵人，祇能算是輕蔑。可是，接着說的“烏龜王八都出來了”，在中國就是惡狠狠的臭罵了。不管這些，試看“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烏龜王八”是指哪些人，以及他們的動靜。

根據王光美的回憶，她跟着劉少奇曾沿着京廣綫進行了實地考察：

波匈事件以後，少奇對怎樣從波匈事件中吸取教訓想得很多。思考的結果，少奇同志認為，為了不使類似的事件在中國發生，我們一定要關心人民

的生活，重視發展農業和輕工業；要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反對幹部中的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要限制領導人的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少奇提出：“還要規定一些制度，使我們這個國家發展下去將來不至于產生一種特殊階層，站在人民頭上，脫離人民。”

河北省工會主席杜存訓同志就工人的情況作了匯報。他提到：一年半的時間裏，發生罷工、請願24起，工人中有人說：“共產黨怕罷工，一鬧就老實”、“匈牙利工人有辦法”、“共產黨好，就是吃不飽”等等。

石家莊基本建設局的李德仁同志詳細匯報了工人、學生參加的14起鬧事的情況，涉及14個單位的500多人。

國營一一六廠按計劃招收了一批工人，開工後發現沒那麼多位置，便宣布將多出來的人調到一個五金生產合作社。但未向工人講清緣由，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又不一視同仁，有“走後門”現象。群眾提出意見，領導又採取了壓服的辦法。結果引起工人群起反抗，有100多名工人參加了罷工鬧事。當地政法機關把它定為反革命事件，將帶頭的人抓了起來。

化縣的麻風病防治委員會在化縣的一個地方蓋麻風病院。未蓋之前，與群眾商量，群眾不同意。縣政府不管群眾是否同意，就硬要在那裏蓋一座麻風病院。開始蓋時，群眾就不滿意，今年3月下旬，化縣縣委書記、公安局長同群眾談話，群眾還是不同意。他們扣留了群眾3個代表，有黨、團支部書記和一個轉業軍人。這樣群眾就更加不滿意，有400多人在一個合作社主任的領導下，把麻風病院的房子拆掉，並把幹部的衣服也扯爛了。化縣公安局的副局長帶了8名警察，在現場開槍打死5個人，打傷9個人。

在廣州，我們遇到的另一件典型事例是內港工人鬧事。原因是那裏的800多名工人因為工作時間太長，工作班次調得不好，工人太累，加上港內要求工人義務勞動蓋集體宿舍，而房子蓋好了，却通通分給職員、幹部和家屬住上了，工人很不滿意，於是鬧事。（《王光美訪談錄》）

1956年下半年，共產黨對農民、手工業者、工商界資本人進行了實質上的掠奪，並受到敲鑼打鼓的歡迎之後，國內形勢反而更形緊張，一些社會矛盾也表現得更行突出。在半年內，全國各地，大大小小，大約有一萬多工人罷工，一萬多學生罷課。從十月起，廣東、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遼寧等省，還發生了部分農民要求退社的情況。人民對政府批評的意見，對現實不滿的言論，日漸增多和激烈。

被劃為右派的重慶中學的一位普通教師鄧祜曾，在一次中學教師集中參加整風的座談會上的發言，雖並不出語驚人，但却說出了人人心中有之的意見。他認為“中國也有個人崇拜”，並且批評糧、油、棉實行統購統銷，違背了價值規律；批評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是崇俄媚外。還說中國有五千年燦爛文化，為啥還要立一個大胡子洋人作祖宗？（李才義《呼喚右派難友鄧祜曾》）

為了避免重復，毛關於石家莊、北京等地學生鬧事、教授不要共產黨呀、我看要準備出大事等來自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以及來自1957年1月18日和27日對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的講話，放屁有利論、螞蟻要出動、希望同志們注意等秘傳給黨內準備反右的預告，這裏就從略了。總之可以看出，毛澤東分析匈牙利事件發生的原因，在側重階級鬥爭上與劉少奇側重從經濟、民生、改變黨風、反對特權，解決問題的思路迥然二致。他說：“波蘭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總是要燃燒的。燒起來好，還是不燒起來好？紙是包不住火的，現在燒起來了，燒起來就好了。匈牙利有那麼多反革命，這一下暴露出來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318）“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物論和唯心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同上，頁323）

從內因外因遠因近因，任何一方面的原因，特別是這些原因的總和來進行分析、判斷，必然會引出個九九歸一的結果，這就是，早已暗藏殺機的毛澤東，定要通過鎮壓，堅決掃除“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烏龜王八”！

### （六）“整風” = “反右” = “整資產階級”

誰也不會料想到，毛竟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如上所述，多次提到學生上街、上訪、鬧事，民主黨派和教授發怪議論，階級敵人心懷仇恨等等之後，不是提出消滅“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烏龜王八”！也不是如後來說的鏟除毒草，掃除牛鬼蛇神，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等，而是責己從嚴，把矛頭指向共產黨自身：“我們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同上，頁327，即所謂“三害”。）在這次講話中，兩處提到整風，另一次是這樣說的：“你要搞資產階級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風，就是思想改造。把學生們統統發動起來批評你，

每個學校設一個關卡，你要過關，通過才算了事。所以，教授還是怕無產階級大民主的。”（頁326）兩次所說，兩個基本點：一次是整黨，一次是整教授。時間證明：整黨是虛晃一槍，整教授却落到實處。且不止于此，整黨的結果，遂了毛澤東設陷阱的初衷：讓幫助整“三害”的人，激怒“三害”，當毛一聲令下——“反右”時，“三害”以百倍的仇恨，千倍的瘋狂，殺向幫助黨整風者！其殘殺之悲壯程度，50年後的今日書之，奚啻寫一篇現代的《弔古戰場文》！

反右之後，他又是怎樣談整風的呢？在1957年10月的八屆三中全會上，他說：

去年下半年，階級鬥爭有過緩和，那是有意要緩和一下。但是，你一緩和，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地主、富農以及一部分富裕中農，就向我們進攻，這是今年的事。我們緩和一下，他進攻，那也好，我們取得主動。正像《人民日報》一篇社論所說的，“樹欲靜而風不止”。他要吹風嘛！他要吹幾級臺風。那麼好，我們就搞“防護林帶”。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風。（同上475——476頁）。

原來整風是爲了“一緩和，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地主、富農以及一部分富裕中農，就向我們進攻”；“我們緩和一下，他進攻，那也好，我們取得主動。”

即便真的如他所說：“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會整到誰頭上呢？他說道：“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我們黨內存在這三個東西，這個賬要掛在資產階級身上。”說來說去，整風還是要整資產階級。這就完全可以看清楚了：整風、反右，用階級觀點看問題都是整資產階級，一前一後，前爲誘敵深入，後爲聚而殲之。

### 1. 開臺鑼鼓

在殺氣騰騰的1957年1月27日毛對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講話之後，正好一個月的時候，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粉墨登場。與一個月前的殺氣騰騰相比，我舉一例，看看毛澤東，簡直判若兩人：第九個問題是如何處理罷工、罷課、游行示威請願這些問題。毛澤東說：這些鬧事，不能說主要是因爲反革命，而主要是因爲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我們不會教育，不會領導。我說人民內部經常不斷地發生矛盾，罷工、罷課，農民打扁擔，去年有，今年還會有，以前幾年就有，不能都歸咎于匈牙利事件，說匈牙利事件一來，中國的事情

就不好辦了。關於這個問題，我搞了四條辦法，大家看對不對。第一，克服官僚主義，適當地處理矛盾，使其不鬧；第二，要鬧就讓他鬧；第三，要鬧就讓他鬧够；第四，除個別人以外，一般不要開除。我看將來問題還多。人心不齊，幾億人口，中間許多人會跟我們的想法不同，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們的工作人員，許多人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文化高的人，也不見得不犯錯誤，有時知識分子犯起錯誤來還要更厲害。（與跟省市自治區書記剛講過的話相比，這裏沒有說“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而是說“不能都歸咎于匈牙利事件”；也沒說階級仇恨和大學生多是地富資產階級子弟；還沒說讓他們放臭屁，後發制人……而是說“主要是因為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我們不會教育，不會領導。”若與事後的說法和做法相比，就更顯出其虛偽、殘酷、無耻到了罪不容誅的程度。事後說：“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祇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利益極大。這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上既有反動派存在，中間份子又未受到現在這樣的教訓，黨又未受到現在這樣的鍛煉，亂子總有一天要發生。”（同上，頁432）事後又是這樣做的：湖北省漢陽縣第一中學學生因升學問題上街游行，被誣稱為民盟策劃的小匈牙利事件，槍斃了三個，監禁了四個。雖然文革後徹底平反，但三個死者是無法復活的。難道這就是毛所說的處理學生鬧事的“四條辦法”嗎？即小見大，毛按其需要虛構出的“漢陽縣小匈牙利事件”，就是解剖整個反右運動的一隻麻雀。

你聽這次報告，毛做作得是多麼地細聲嫩氣呀！（這一篇，在《毛澤東選集》五卷上，正好安排在《省市自治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之後，如果不是事後對這篇《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進行了篡改，兩篇文章將形成多麼強烈的對比和辛辣的諷刺，以致把毛的嘴臉扭曲和撕裂得不成樣子啊！全部報告，簡直能把人感動得不禁涕零之至！我聽的是傳達稿。有幸聽到錄音的著名文學家傅雷對毛的談笑風生、甜言蜜語，感到如沐春風，如醉如痴，給兒子寫信說：“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真是藝術

高手。”（《傅雷家書》頁 158）

這在前面已經說過。

如果把毛澤東這次開臺鑼鼓式的講話，比作是一鼓作氣，那麼，三月的宣傳工作會議的講話，就是再而不衰；四月底的天安門城樓接見，就是三而不竭。毛主席其樂無窮的生命力，如癌細胞般頑強，實乃全中國人民的最大福氣！

## 2, 再而不衰

應毛主席邀請出席這次會議的《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先生，在回憶錄《“陽謀”親歷記》中，有翔實的記錄，讀者將會從領袖營造的那和諧溫馨的場景中，沐浴到浩蕩的皇恩。這是如何地感人肺腑啊！

## 3, 三而不竭

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在天安門城樓上舉行座談，請黨外人士幫助中國共產黨整風。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指出：幾年來都想整風，但找不到機會，現在找到了。整風的總題目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反對三個主義。整風會影響到黨外。規定非黨員自願參加，自由退出。有意見就說，黨內外打成一片。整風主要是黨內整風，可是有黨外人士參加就更全面了。兩種元素可以起化學作用。但黨外人士不是自己搞，而是幫助共產黨整風。目前各方面批評意見最多的是集中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衛生部等部門。有人很擔心，怕矛盾一揭發，一批評不得了。我們對人家提出的意見，不要害怕，應該歡迎，給人家以提意見的機會。矛盾沒有什麼不得了，到處唱對臺戲，把矛盾找出來，分分類。如文學、藝術、科學、衛生等方面，提出的問題最多，矛盾突出來了，應該攻一下，多攻一下。愈辯論愈好，愈討論愈發展，人民民主政權愈鞏固。兩個月來各界人士對政府工作的批評意見是很好的。在報上發表，可以引起大家注意，不然官僚主義永遠不能解決。幾年來不得解決的問題，可以在幾個月解決了。還說：“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希望對老和尚也提些意見。”他說：統一戰綫中的矛盾是什麼呢？恐怕就是有職無權的問題吧！過去民主人士有職了，但是沒有權，所以有人講民主人士不大好當，有些惱火，現在不但應該有職，而且應該有權。因此，這次整風，在黨內對有職無權的問題也要整一整。講到高等學校實行黨委制問題，說：教授治教恐怕有道理，學校黨委制恐怕不適合，要改一下，應當

集中在校務委員會或教授會。由鄧小平同志負責找黨外人士和中國民主同盟、九三學社等開座談會，對有職有權和學校黨委制問題徵求意見。在5月10日出版的《民盟中央工作簡報》第15期刊出了章伯鈞所作的傳達，說：毛主席說，大學校的管理工作如何辦？可以找些黨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個辦法來。共產黨在軍隊、企業、機關、學校都有黨委制。我建議，首先撤銷學校的黨委制，不要由共產黨包辦。請鄧小平同志約集民盟、九三等方面的負責人談談如何治校的問題。

毛還說：現在是新時代和新任務，階級鬥爭結束，進入另一種戰爭，就是向自然界開戰。要懂得自然科學，不懂怎麼辦，要老老實實學。

毛對各個民主黨派最近召開的以發展壯大自己組織為主要議題的會，對他們“黨要擴大，政要平權”的勢頭，感到非常惱火，本來決心要狠整他們，但此時却佯裝退兵30裏，說：最近各民主黨派都開了一些會議，開得不錯，提出了些問題。祇要黨外人士談出來了，大家一齊搞，這就更好談了。希望黨外人士對共產黨多提些意見，幫助共產黨進行工作。

毛澤東把口蜜腹劍表現得淋漓盡致，用文學家傅雷的話說：“毛主席的講話……是到了化境的。”

另外，還必須挑明一點，毛澤東是“右派”的教唆犯。他示範給了黨外人士：說什麼話就可以當上右派？所以，凡是涉及上面的問題提意見的，哪怕是拾毛澤東的牙慧，也都劃了右派。這次談話後，毛就不露面了，躲在一旁，暗窺這些短命鬼怎樣前僕後繼地落入陷阱。

#### 4, 緊鑼密鼓

經過毛澤東一鼓作氣，再而不衰，三而不竭地鼓動鳴放，于第二天，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在《人民日報》公布，“中央指示的提要”如下：幾年以來，在我們黨內，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有了新的滋長。因此，中央認為有必要按照“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的方針，在全黨重新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風運動。——這次整風運動應當以毛澤東同志的兩個報告為思想的指導，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作為當前整風的主題。——這次整風運動，應該是一次既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應該是一個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運動。——非黨員願意參

加整風運動，應該歡迎。但是必須完全出于自願，不得強迫，並且允許隨時自由退出。——在進行整風運動的同時，應該在全黨提倡各級黨政軍有勞動力的主要領導人員以一部分時間同工人農民一起參加體力勞動的辦法，並且着手進一步建立黨和國家的領導工作人員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相結合的根本制度。——整風計劃應該貫徹整風和工作兩不誤的原則，並且使整風運動的進行同工作的改進結合起來，同人民內部矛盾的具體解決結合起來，防止關門整風，妨害工作。

原來在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說：“如果上半年發通知，下半年整風，中間隔幾個月……預先發出告示，到期進行整風，不是‘不教而誅’……”（同上，頁 327-328）現在，不知為何如此火急火燎，接着前面的緊鑼密鼓，馬不停蹄地又是一場緊鑼密鼓，並且是鼓動黨外人士去對共產黨“不教而誅”，大誅特誅：從 5 月 8 日至 6 月 3 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了 13 次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的座談會，有 70 餘人次發言。從 5 月 15 日至 6 月 8 日，中央統戰部和國務院第八辦公室聯合召開了 25 次工商界代表座談會，有 108 人次發言。從 5 月 4 日至 23 日，《光明日報》編輯部分別在上海、廣州、武漢、西安等 9 個大城市邀請部分民主人士、高級知識分子提意見，報紙對發言作了報道。同時，新聞界、文藝界、科技界、教育界、出版界、衛生界也先後召開座談會，各界人士紛紛發言向黨提意見。

看來是一不作，二不休，捉不住右派不煞戲。

後來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說：“雙百方針，長期共存，田不贊成（形左實右），我同李濟深講，黨內有人不贊成，用來嚇民主人士。”（《廬山會議實錄》頁 244）這裏的“田”是他的秘書田家英。為什麼田不贊成“雙百方針”就是“形左實右”呢？這在廬山是不用多說了，因為引蛇出洞的陰謀早已大白于天下。你不贊成讓右派向黨進攻，形式上是愛護黨，實際上蛇不出洞你怎麼消滅它呢？這不是形式上是愛護黨實際上是保護了右派嗎？毛說此話是爲了“用來嚇民主人士”的。可見雙百方針是假的，鄧拓以其先見之明，早就揭穿“雙百方針是假的”。50 年後的今天，你指出這一點“假”，簡直是了無新意了！且慢，我還有話說。毛澤東騙人，他用的是假話之中套假話。就此例而言，你認爲田真說過不贊成雙百方針一類的話嗎？請看：“田還說了這樣一件事：反右前，爲鼓勵鳴放，當時批評了放手發動群眾的阻力有來自黨內的。有次同民主人士談話中，舉了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不同意鳴



放的例子。田說，根本没有這回事，他從未反對過鳴放。”（同上，頁45-46）指出這一點是爲了說明，你別以爲你揭穿了毛澤東或共產黨說的假話，就是還原了事實真相，遠非如此，他爲了施展某一陰謀，把假象搞成連環套。當你自以爲得到真相的時候，其實你在連環套中還未走出去！

### （七）章立凡的“整風失控說”

反右與整風：章立凡在文章《毛澤東“反右”動因及後果的再研究》中說：“毛澤東爲何要發動‘反右’，其動念‘引蛇出洞’始於何時？一直是現代史學界關注的焦點。現在比較普遍的觀點，是把毛澤東在1957年初提倡‘雙百’方針並發動黨內‘整風’視爲釣餌，是將黨外知識分子‘引蛇出洞’，聚而殲之的謀略。這種觀點固然可以成立，但忽視了事物的兩重性，有簡單化的傾向。”他針對着“比較普遍的觀點”，即“陰謀說”，作出自己的結論：“綜觀‘反右’前後的歷史，我認爲‘反右’的動因在黨內，借助清議‘整風’的目標也首先是針對黨內，但也隱含‘引蛇出洞’的戰略意圖。‘整風’的失控才導致了‘反右’的大逆轉。”他論證“動因在黨內”的“整風失控論”這一觀點時，根據的理由是本文前面已作過分析的李志綏的“整黨內敵手說”和李維漢的“出軌說”。他不同于二者的是，又承認陰謀說“固然可以成立”。文章顯露出作者在“首先是針對黨內”的大前提下，又懷着一種猶疑不決的心態。我以為，在做學問上與做事上有一點是一樣的，這就是當斷不斷，必受其亂。現在我們從兩方面來審視這個問題：

#### 1. 歷史的客觀進程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去。

1956年2月14—25日，蘇共召開20大，赫魯曉夫作了揭露斯大林罪惡的《秘密報告》。

4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發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對斯大林保護大于批評。

12月29日，再發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矛頭指向修正主義。

4月25日，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想拿出一套比蘇聯高明的貨色。

4月28日，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既說是無產階級

## 還原 1957

---

的政策，又說百家者兩家也。其妙諦，祇有江青一語破的：“百家爭鳴，一家作主，最後聽老娘的。”剩下的一句話說在法庭上，老娘是老爹的一條狗。

5月26日，陸定一作《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報告，6月13日發表于《人民日報》。

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毛澤東批：“不看了。”

9月15——27日，中共召開八大。

10月，爆發匈牙利事件。

11月中旬，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提出：經濟上批判“穩妥可靠”，反“反冒進”；政治上鎮壓反革命，“要殺。有些民主人士說殺得壞，我們說殺得好，無非是唱對臺戲……對反革命一定要殺掉一批，另外還捉起來一批，管制一批。”還提出1957年準備整風和大民主、小民主的問題。在國際形勢方面，一是指責蘇聯把“斯大林這把刀子丟了。”一是指責“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物論和唯心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毛澤東選集》五卷，頁317-323）因此他要撿起斯大林這把刀子殺向帝國主義，殺向修正主義。而在接受“基本問題”的教訓方面，一是搞掉階級敵人，一是自己人要搞好三個“分清”。要做到這點的最佳方案就是實行“肅反”（後來毛澤東說：“反右就是新式肅反。”），而搞整風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並且把二者攪和起來。

1957年1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陳其通、陳亞丁、馬寒冰、魯勒的文章《我們對目前文藝創作的幾點意見》。此文簡直要打草驚“蛇”，壞了毛的“引蛇出洞”大計。

1957年1月18日和27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指出形勢的萬般嚴重性，大學生、教授、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這些烏龜王八的萬般惡劣、可惡的“階級本性”，“一有機會就要發作”！等等。我在前面已有敘述，這裏特別再指出，毛澤東這時候對黨內已秘密動員，進入一級戰備的：“現在還是多事之秋，各種思想還要繼續暴露出來，希望同志們注意。”要摟着扳機，準備好“後發制人”，待我一聲令下，立馬萬箭齊發！

這個“後發制人”云云，就是章立凡先生點明的“放屁有利論”，可作

為“引蛇出洞”的注腳。

2月27日，毛澤東以美麗的醜態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6月19日公開見報。）其作用，一個字可以作結：“引”！

3月6—13日，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毛澤東作報告。可以說是“再引”。

4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這篇社論的作用是：“猴不上竿祇敲鑼”！

同日，毛澤東嫌鄧拓不敲鑼，批他是“死人辦報”。

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

4月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商談幫助整風運動。毛澤東“以誠感人”。可以說是一引，再引，三引。為了對知識分子“引蛇出洞”，毛苦心孤詣，遠勝過劉備為引諸葛出山而“三顧茅廬”。

5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為什麼要整風？》

5月4日，中央發出《關於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指示》。好話叫共產黨說盡。

凡此種種，可謂：“千呼萬喚”。

5月14日晚上9時至次日凌晨1時，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關於報導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

5月15日，毛澤東寫出《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毛下令：“進入戰鬥準備！”

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毛下令：“開火！狠狠地打！”

這哪裏有什麼“大逆轉”？這哪裏是什麼“中途變卦”？明明白白的，順理成章的是：“圖窮匕首見”。

毛澤東的竭誠邀請，重新激發了黨外老朋友的參政熱情。開門一經打開，批評的洪流便奔騰直瀉，廣泛涉及政治、經濟、司法、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如果批評之火僅燒到毛點名的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藝、科學、衛生等幾個國務院部級單位，甚至國務院本身，或者出幾個“小匈牙利”，似乎都在可控範圍之內。但形勢很快“出綫”，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的言論固然“出綫”，但“出綫”更多的當屬《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的文章：“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于是他對“老和尚”提了意見：“現在國

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黨外人士，是不是黨外人士中沒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人可以被培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

民主黨派人士鳴放，尚能坐而論道，不失雍容氣度。青年學生却是熱血沸騰，群情激昂，抨擊時弊不遺餘力。學生們的言論不受黨派關係和社會地位的約束，廣泛涉及前輩們尚未問津或不敢直道的領域，並結成各種社團，出格就太多了。以致清華大學副校長錢偉長形容當時的校園氣氛說：這好象到了“五四”運動的前夕。

毛澤東本想利用“大民主”手段來衝擊官僚體制，却產生新的兩難境地：“大民主”危及到黨的一元化領導，這是他始料未及的。卷入其中的絕大部分人都未想過要從根本上推翻共產黨，而是要求政治改良，實踐執政前的民主諾言。麥克法誇爾等西方學者認為，毛在黨內的巨大壓力下改變了主意。後來被打成右派的清華大學黨委常委袁永熙當時曾透露：“毛主席受到很大的壓力，國內告急，電報雪片飛來，都要求收。”在中央與地方關係中，毛的支持者主要來自大區和省級幹部。應該說正是這些人的呼吁，促使他將自己放出的“魔鬼”收回瓶中，全黨“整風”開始轉為全國“反右”。毛的英明決策，使被“大民主”燒得寢食難安的各級領導如降甘霖，得到從中央到基層的一致支持。他的權威也開始重新樹立。

章立凡的以上所述，全已為別人（包括他要商榷的李慎之先生）所駁倒。我就不再訴諸語言，而祇是緊緊依靠歷史的客觀進程。這裏有個基本事實，國內、體制內、黨內的許多學者都已明確指出：毛在5月15日決定要反擊右派猖狂進攻的時候，這個“猖狂進攻”（也如立凡的上述）就根本不存在。海外學者丁抒提出一張時間表如下：

有一種說法，謂毛澤東本欲接納對共產黨的批評，祇是在鳴放超出了他的接受限度才轉而決定反擊。這與事實不符。這裏不妨列一張時間表：

北京大學第一張鳴放大字報于5月19日貼出，是毛澤東寫《事情正在起變化》以後四天的事。

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5月21日提出。

龍雲的“反蘇謬論”，5月22日。

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5月22日。

林希翎在北京大學演說，抨擊中共的封建社會主義”，5月23日。

葛佩琦的所謂“殺共產黨人”（見本章稍後的敘述），5月30日。

吳祖光的《黨“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5月31日。

儲安平の“黨天下”，6月1日。

有些中共事後用以證明反右之必要的“罪惡活動”，全是在毛澤東5月15日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通知黨內高層準備反擊右派之後，在不知中共幕後部署的情況下，為中共反覆邀請而“放”出來的。

該以事實為準了吧？不哩！真虧有共產黨久經訓練的詭辯家能挖空心思來圓謊！據他說：《事情正在起變化》，“從文章內容看，從5月中旬開始，毛澤東就對反右作了具體部署。這大概是西方學界一直鼓吹所謂‘引蛇出洞’的由來。國內學界大多不同意這種觀點，但是並沒有拿出具有說服力的文獻證據。

尚定先生說：“筆者以為，此文所定之著作時間似有誤，不應是現在一般人認為的‘5月15日’。認定這一點，對於糾正所謂‘引蛇出洞’之說，顯然是十分重要的。”（《胡喬木在毛澤東身邊工作20年》頁185）這個與“現在一般人”不同的“二般人”的尚定先生，“更確切地說，將其定在5月底6月初，似乎更合理、也更符合實際情況。”（頁187）這樣一來，“對於糾正所謂‘引蛇出洞’之說，顯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與“似乎更合理、也更符合實際情況。”却相去十萬八千里！正是：“理屈詞窮疑無路；強詞奪理又一村。”自以為得計，豈不知，事情並非孤立的存在，而往往是牽一發而動全身，於是漏洞百出：這首先涉及到你有没有蠻勇、去篡改此文の“聖經”《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其二，5月15日的歷史意義在於，它是毛傳反右密旨於高層的日子。要想篡改歷史，還需要對其它檔案存件同時篡改，如：

5月14日（注意日期：5月15日的先一天）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報道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最近各地黨外人士正在展開對於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這是很好的現象，這不但會大大幫助我黨的整風，消除同黨外人士的隔閡，而且可以在群眾中暴露右傾分子的面貌。我們黨員對於黨外人士的錯誤的批評，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的言論，目前不要反駁，以便使他們暢所欲言。我們各地的報紙應該繼續充分報導黨外人士的言論，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論，必須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導出來，使群眾明了他們的面目，這對於教育群眾、教育中間分子，有很大的好處。近來我們許多黨報，對於一些反共的言論加以刪節，是不妥當的，

## 還原 1957

---

這實際上是幫助了右傾分子，並且使人感到是我們懼怕這些言論。這種現象，請你們立即加以糾正

5月16日（注意日期：5月15日的後一天）毛澤東代中共中央寫的《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

“最近一些天來，社會上有少數帶有反共情緒的人躍躍欲試，發表一些帶有煽動性的言論，企圖將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以利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方向，引導到錯誤方向去，此點請你們注意，放手讓他們發表，並且暫時（幾個星期內）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過一個時期再研究反駁的問題。這一點，5月14日我們已告訴你們了。爲了研究問題，請你們多看幾種報紙。有些地方例如上海黨外批評相當緊張，應當好好掌握形勢，設法團結多數中間力量，逐步孤立右派，爭取勝利。”

這些反右密旨是傳給“各省委、直屬市委、自治區黨委、各中央直屬部委首長，各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的負責同志”。從發出兩個文件的日期是5月14日和5月16日，看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寫作日期定在5月15日，該算是天衣無縫。尚定先生反而用這兩個文件曲意來爲篡改這個日期當作論據，實在是撒謊撒得有點兒抓住鼻子不顧腮。作出連中共都覺得是理虧氣軟的事，雖然是邀功心切、餘勇可賈，但確實爲毛澤東出了一個算不上是好主意，而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和“掩耳盜鈴”的餽主意。對毛的行奸祇能是欲蓋彌彰。而事實竟是如此無情地撕破騙子們的嘴臉。這樣做，無法解釋的事還多着呢！

其一，毛的秘書林克于5月12日（注意日期！）在《日記》中所載：“毛主席在同我談話時說，目前全國已經爭鳴和齊放起來，知識界爭得最響。民主黨派不那麼響，工商界最先神氣，章乃器、羅隆基、章伯鈞、陳銘樞等人發言有取消黨的領導（！）的味道。資產階級唯利是圖、爭名奪利的本質也有所暴露，像定息20年。自1956年算起可以說是一種典型。有敵視社會主義（！）的情緒的某些人也有所表露。春天來到，各種蛇（！）也開始動起來了。民主黨派某些人及資產階級某些人的鳴放，並不增加他們長期存在、共同監督的資本，相反某些言論會使它（他）們在群眾中喪失威信，這樣就不是長期共存而是短期共存了。”“關於反社會主義（！）言論，可以多登一些，這有利於我們。”（沈志華《整風是如何轉爲反右派運動的》——其中的“！”

是紫丹加的。)

其二，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在5月18日晚(注意日期!)通過電話告訴邵荃麟，邵荃麟隨即向在他家的黃秋耘轉告：“周揚來的電話，哎，轉了!”

其三，中共中央委員、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中寫的：“工商界人士座談會開始于5月中旬(注意日期!)。這時(!)，中央要反右的方針在我腦子裏已經清楚了。當時胡子嬰從西北視察歸來，在會上講了上海一批工廠搬遷西北，辦得不好。黃炎培從外地考察回來，也講了一篇類似的話。我看到讓他們這樣講下去，將來要劃為右派不好辦，就宣布休息。請孫希孟去做黃炎培的工作。保護了他。”

你以為祇要篡改一個“日期”，就可以給毛澤東的極端邪惡和陰謀詭計的嘴臉上塗上一層正義與正大光明的厚厚的脂粉或油彩嗎?“事實”會把不管是多麼厚的脂粉或油彩都給衝刷掉的!這才“顯然是十分重要的”。

我們言歸章立凡的話題，以令尊章乃器先生為例證，來作研究。毛澤東在反右之前，背着章先生的面，向高級黨徒們點着章先生的名罵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實際是聲討——紫丹)，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够。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毛在發動反右前三天，6月5日，對民主黨派二老，陳叔通和黃炎培示密，說：“章乃器是和我們走兩條路的。”就是說，在反右的鍋裏早已下了令尊的米;而在反右之後，又封他為右派的老祖宗。從章先生身上，我們尋不出一絲一毫你說的，毛要“竭誠邀請”令尊幫助整風的“竭誠”在哪裏。倒是看到了一場鴻門宴。于如今，反右檔案已解密，很多真相已大白：毛澤東是自始至終居心叵測，貫穿着一連串的預謀——陰謀，却没有發現你說的“整風失控”。

章乃器先生可是非凡的歷史人物。在政治上、道義上、物質上，對共產黨是恩重如山的!應當說是共產黨欠他帳;是共產黨不仁。先生這麼偉大的人格，竟遭毛澤東這號卑鄙小人的政治愚弄，歷史玩笑開得可謂太殘酷了!他的偉大人格，為千萬人所敬仰，我也是其中一個。直到我的右派“改正”，

還留了一條尾巴：“同情右派言論”。這是因為我劃右派的條件之一是贊揚右派，宣揚右派言論。具體內容包括在人面前贊揚章先生人格偉大、有知識分子的骨氣，記憶猶新的是他說的那句“心安理得”……

### 2. 毛的心路歷程

從主體方面考慮問題，是毛澤東的老祖宗馬克思的觀點：“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在內）的主要缺點是：對事物、現實、感性祇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主體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費爾巴哈論綱》）這就是說，應當把上面的歷史的客觀進程，當作毛澤東的主觀的心路歷程的對象化、當作主體來理解。

馬克思還認為，人們“不僅引起自然物的一種形態變化，同時還在自然物中實現他的目的。他知道他的目的，並把這個目的當作規律來規定他的活動樣式和方法，並使他的意志服從這個目的。”（《資本論》第一卷，頁129）

毛自己也說過：“戰爭目的，就是戰爭的本質，就是一切戰爭行動的根據，從技術行動起，到戰略行動止，都是貫徹這個本質的。”（《論持久戰》）

一句話，毛澤東一切行動及其後果，都是他的目的的物化。而到底，規定他使用陰謀詭計這種“活動樣式和方法”，作為他“行動的根據，從技術行動起，到戰略行動止，都是貫徹”着一個什麼樣的目的呢？在李慎之的文章《毛主席是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中指出：“究其原因，拋開他自己好像洞若觀火的空話大話，其實祇是對一個‘權’字迷戀上。”我幾乎相信所有的人都會對此說法不持異議的。章立凡對毛的分析也是圍着權力進行的。是啊！林彪說得更透底：有了權就有了一切，失掉權就失掉一切。我說：這就抓住了毛的要害。按毛的說法：是抓住了他的“本質”；按馬克思的說法是抓住了毛的活動“規律”。

爲了權，他發動整風是處心積慮要反掉劉少奇、鄧小平在八大提出加強集體領導和發展經濟的路綫；要反掉周恩來、陳雲反冒進的右傾保守主義。然而這是順民心、得民意的。他的那一套個人獨裁、階級鬥爭、急躁冒進創造奇迹、大搞政績工程，是爲當世界革命導師掃清道路、奠定基礎。但他打出的旗號，却聲稱整風是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教條主義云云，



這當然完全不是出自他本人內心，而是投國人之所好，而且特別是由于抓住了整個知識分子的興奮點。于是就在此處設下引蛇出洞的陷阱。

二則，他對斯大林原是不滿的，認為蘇共 20 大是揭開了蓋子、解放了思想。但它不要丟掉斯大林這刀子；這把刀子就是極權制度。所以他要維護斯大林，並據胡喬木說，他要以斯大林自居。（意思就是，斯大林不在了，以後我說了算。鄧小平對毛的評價和毛對斯大林的評價如出一轍；正是繼承了這個個人獨裁的衣鉢。他說：毛在毛說了算，現在我說了算。）

三則，1956 年發表的《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中表明，毛內心估計的形勢是，修正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險。但他撿起刀子為什麼不刺向修正主義，反而到了 1957 年在講人民內部矛盾的最高國務會議上屢次大批教條主義呢？祇是到反右以後，經過篡改後才改掉那些批教條主義的句子，暴露了毛的真心實意是反對修正主義（敵人）、居心保護教條主義（好人）。

四則，整風是在匈牙利事件之後提出的。而毛總結匈牙利事件的“基本”教訓是許多反革命沒有搞掉。而且他對黨內說，大學生、知識分子是希望中國出匈牙利事件的。毛澤東一貫反右，他清楚知道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在本質上是右的。他怎能靠這些人來幫助整風呢？這些人是反個人迷信、反冒進的社會基礎；是反對鎮壓匈牙利而主張民主改革的；是對反胡風懷着一肚子無名怒火的……事後證明，毛是要以“整風”為名，先把這些人“搞掉”，作為避免發生匈牙利事件的當務之急。

五則，反右後的事實還證明，他聲稱要整“三害”，全是虛晃一槍，根本什麼也沒整。而凡是響應他的號召批評“三害”，批評教條主義的言論，統統都打成右派言論。隨後你就看見，“三害”之為害不僅有增無減，且加速度地越演越烈，竟而至于在中國大地成燎原之勢，至毛死而不後已。

六則，我為什麼要把歷史的進程從 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完蛋之日起始？這是因為，毛雖然權力欲火光衝天，但他總不能在斯大林活着的時候就給他摔了老盆吧！他急不可耐，要當世界霸主的“司馬昭之心”——就我所知，從哲學家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的第八章“誰將是國際共運的領袖”的論述，到我被監督勞動的所在公社一個婦女社員說：“蘇聯賣國了，毛主席要當世界人民領袖了。”便可說明——路人皆知！婦孺皆知！

文化大革命的興起，由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光輝榜樣林副統帥，把毛澤東的狼子野心、主觀願望，一律宣布為客觀事實：“毛主席是是我們黨的締造者，

是我國革命的締造者，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偉大領袖，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主席所經歷的事情，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多得多。” “中國人口比德國多十倍，比俄國多三倍，革命經驗之豐富，沒有哪一個能超過。毛主席在全國、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 “毛澤東思想是人類的燈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銳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就這樣，副統帥便把自己的正統帥宣布為世界革命導師了。

足證他整風、反右都是為此鋪路。而之後的讓人不可理解的三面紅旗大瘋狂，群魔亂舞、小醜跳梁，都是為了創造人間奇迹，好欺世盜名，為作世界霸主的登基而作醜態百出的彩排。司馬璐在《中共的歷史見證》一書的第一章《還中國共產黨史的本來面目》裏，指明：“中共黨史，權力鬥爭是綱——以派系為核心，以路綫為旗幟，以權力為目標。”（頁 417）這就是中共黨史和國際共運史的實質。毛煞有介事地，以指責蘇共修正主義路綫為幌子（旗幟），實則，他的居心（目標）是，國際共運領袖志在必得。不僅共產黨史，而且所有人類歷史都可以作證：任何一個人，當他不擇手段地、無限貪婪地、以追求私權為目標時；而以陰謀為手段，幾乎是自古華山一條路。

### （八）金觀濤的“延安模式說”

衆所周知，知識分子並非一開始就主動投入大鳴大放，他們是在共產黨再三動員下才向黨提意見的。如果共產黨把知識分子提意見看作向自己奪權，那麼為甚麼要動員知識分子幫助黨整風？除非我們把反右理解為共產黨為了鏟除知識分子異己的陰謀，不然這是不合邏輯的。由於陰謀論同 1956 年“八大”前後中國寬鬆活躍的黨內外氣氛不合，大多數學者都不同意這種過份簡單化的看法。他們傾向於把鳴放起因歸之于毛澤東對共產黨的不滿，即 1956 年後毛澤東認為黨已經退化為一個保守、因循守舊的官僚機構，而恢復黨的革命精神的辦法是從外部對黨挑戰。這一任務首先落到了非黨知識分子身上。（金觀濤、劉青峰《反右運動與延安整風》）。

對這段話，我作幾點分析：

- 1，“不然這是不合邏輯的。”就是說：“陰謀論”是合邏輯的。
- 2，難道“1956 年‘八大’前後中國寬鬆活躍的黨內外氣氛不合”，“陰

謀論”嗎？要知道，毛澤東後來已經表明：“去年下半年，階級鬥爭有過緩和，那是有意識地要緩和一下。”（《毛澤東選集》五卷，頁477）

劉賓雁更是一語破的：“1956年的寬鬆，顯然又是毛澤東在那裏搞他的‘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毛澤東一手定乾坤》）

3. 關於“陰謀論”是“過份簡單化的看法”的問題。

金先生看問題和說問題，都很尖銳、明快，比之章立凡、朱正把反右歸因于“陰謀論”，說成是“簡單化”，他則說成是“過分簡單化”；李慎之說毛澤東迷戀一個“權”字，他則濃墨重彩地說，毛澤東迷戀的是“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是“意識形態最高權威”，是“霸權”。但他却没有揭示出：這就是毛澤東思想、言論、行動，“從技術行動起，到戰略行動止”的“根據”、“本質”、“規律”。反而結合反右，說：從鼓勵鳴放到反右，“爲甚麼不到半個月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會發生一百八十度的轉向？我們認爲，離開延安整風模式就很難理解這一點。1957年鳴放突然變成反右，祇是1942年延安整風中大民主轉向批判王實味之重演。”你要用延安整風模式來理解反右，當然可以。但是，用哪一點來理解他爲什麼要採用“延安整風模式”，即那樣的“活動樣式和方法”呢？從事實上和邏輯上都證明，毛澤東完全是爲了達到他所迷戀的那個“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意識形態最高權威”、“霸權”！至于手段麼，就正如今天他回答反右說的：“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當年他回答關於“延安整風模式”，說：“整風運動提高了同志們的嗅覺，縮小了教條主義的市場。有人說，這是陰謀，是要取而代之的。其實，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也是要取而代之。”（錢伯城：《鄭振鐸1957年日記紀事》）可以再清楚不過地明示出：它們本質的一致在于目的和手段，目的的卑鄙性決定手段的陰謀性，從而不是否定，而是確證了“陰謀論”（即毛自己說的“陽謀”）。離開目的和手段，還會有所謂“模式”嗎？所以我認爲“陰謀論”不是“簡單化”，更不是“過分簡單化”，相反，倒是抓住了問題的實質，是“深刻化”；而“模式說”雖然也對，但“模式”畢竟是表層的東西，所以這樣看問題難免會有“過分表層化”之嫌。再說，從實質看問題，難道你還真的把“雙百方針”當成是個什麼正經完藝兒嗎？鄧拓早已揭穿：“是假的”。更何況我剛剛指出，文革旗手江青對此曾作過一杆子插到底的剥皮露骨的解說呢？——“百家爭鳴，一家作主，最後聽老娘的。”這裏有一句潛臺詞，到法庭上才明白說出：老

娘祇是老爹的一條狗！

4,更何況,由於我們察覺到,毛澤東在對待與處理胡風與王實味問題上的同質性,這樣一來,是否反胡風運動也可以用“延安模式”來解釋呢?又及,此後的廬山反右傾,文化大革命,是否也然?“延安模式”是否成了一個筐,很多運動都可以往裏裝?

5,事實昭然,毛澤東八百輩子也不可能把整黨的“這一任務”,“首先落到了非黨知識分子身上。”而倒是把最沉重的,蠻不講理的打擊,“首先落到了非黨知識分子身上。”這便是歷史給出的結論。

### (九) 中外都有的“黨內壓力說”

這是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甚至於流傳到國外。現在首先就着國外的說法,來進行研究討論。一般地說,是兩種情況:一是國內搞的“出口轉內銷”;一是外國人搞的“進口——加工——返銷”。

英國記者,後任哈佛大學教授的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屬於後一種情況。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中指出:“無疑,一部分電報出自省一級領導人之手,談擔心批評的迸發,會使自己的下屬官員們威信掃地。有證據表明:至少有九個省的第一書記反對毛。這九個省擁有兩億五千萬人口,占全國人口總數的40%以上。在這些省份形成的反對派,業已成爲毛在政治局裏的反對者的後盾……”

我總是覺得,當然也不能一概而論:外國人談中國問題太隔膜;甚至於隔着不僅一層膜,而是一層靴,簡直是隔靴搔癢;更甚而至於海外奇談。無怪乎外國學者終於發現,他們國家所了解的中國是“編造的中國”。

中國人論述此事,就不可能出現這道風景綫:“在這些省份形成的反對派,業已成爲毛在政治局裏的反對者的後盾。”——這就是不折不扣的海外奇談!是真正不了解共產黨。請你落實一下:這些省份反對派的成員都是誰?他們是政治局裏哪個反對者的後盾?恐怕沒有一個人敢承認。遠的不說近處看:作爲黨的總書記,前後兩任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胡耀邦和趙紫陽,祇是跟太上皇鄧小平沒有保持一致,就得下臺,就是“分裂黨”!難道在毛的淫威下,還會讓什麼“反對派”存在嗎?何況毛提出整風是要整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是絕對名正言順的呢!我們都知道,當他的錯誤已到天

怒人怨的時候，彭德懷等祇是在肯定成績的前提下提了點意見，他們也並沒有什麼反對派，僅此，就給他們捏了個“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罪名，打倒在地，永世不得翻身！在中共詞典裏，有的是“反黨集團”，沒有西方所謂的“反對派”。一時想不通的絕對會有，不同意見也絕對會有，但都形不成反對派，而祇能“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也執行”。如果要想和能够保存下來自己的異見，除了善于偽裝，打着紅旗反紅旗，別無他途。毛澤東也說過“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如造反派和保守派，看的是兩派，實際上都是“誓死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綫”的；又如無產階級司令部和資產階級司令部，後者和彭黃張周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是一個性質，基本上是毛為打倒他們而扣的帽子，包括右派。總之，即便有“派”，也跟西方所謂的“反對派”根本不一道勁，別有一番滋味。這是共產黨的“黨粹”。

再說，“這9個省擁有兩億五千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40%以上。”從語感上可以覺出作者非常在乎，誠然，如果是在西方，有兩億五千萬張選票反對你，那就不僅僅是形成壓力的問題，而是政治上完蛋的問題。可在中國，在毛澤東眼裏，却是250,000,000x0=0。你沒聽毛說過搞世界革命，一開口就是死他三億人嗎？當然在大躍進中餓死四千多萬人，他更可以輕忽地說：“埋了做肥料！”

我這一分析，毛澤東推行整風受到過大的壓力才轉而反右的說法，自然便無法成立。試想，毛澤東在乎什麼壓力嗎？就不說，發動文化大革命，所遇到的壓力，從廣泛性到激烈的程度，比這回何止大百倍！單說，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失敗後，上自劉鄧，中間鄧子恢等多數省部級的幹部，直到最底層廣大農民社員，都要求實行“三自一包”。毛澤東力排眾議，大批單幹風，統統打了回去，連中央農村工作部都給撤消了，並對田家英說，在“三自一包”上，不能實行群眾路綫。如果說剛才的數字兩億五千萬，占總人口40%以上，現在的數字絕對肯定，占兩個40%以上！往事歷歷在目，已經反復證明，說毛澤東屈服於某種壓力，實在是不了解他一意孤行，一頭碰到南牆上，能够頭硬到何種程度！

同理，該書說的“他制造了不是一個而是兩個信用差距……一方面他作為能洞察一切的中國革命舵手的聲望，由于整風運動，在黨員中間受到了嚴重衝擊；另一方面，由于反右運動，黨外人士對他的真誠，至少是他在中國共產黨中的權威，產生了懷疑。”這祇是作者替“古人”擔憂。毛澤東祇用一

抹拉臉，說聲“陽謀”，便萬事大吉。

我接觸到的實際情況是，那些“三害”分子受到尖銳的批評，祇是對批評者懷恨，對整風即便反對也祇敢腹非。而一旦毛澤東發起反右，看“三害”分子懷着階級仇恨在反右前綫衝鋒陷陣吧！而這也正是毛的預謀。碧眼高鼻的洋專家，是無法領略到共產黨權術文化的深邃的！

不僅他們的判斷有些是想當然的，而且據以立論的材料，有時候也是不大靠得住的。例如，毛澤東在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時，劉少奇不在場，我想這肯定是毛澤東安排他去幹其他工作，他不可能，也不敢如麥氏所說：“劉這種態度顯然是做給全國看的。毛在發表共產黨政權產生以來他或其他人關於政治問題最重要的講話時，劉却不打算在這個場合出現在他的身邊。沒有一位《人民日報》的讀者不會得出結論，這是因為劉不同意毛所說的意見。”並且，麥氏把這時候他所謂的“劉毛不和”當作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也是在當年的《人民日報》上，我曾讀到揭發許良英先生的右派言論，他說劉少奇、彭真一綫向毛主席施加壓力……後來我到農場勞動教養時，把此事說給一位從區長崗位上下來的右派，他大不以為然地回說：“他敢！”我才第一次驚奇地發現，竟然毛、劉的政治地位不僅是不平等的，而且是君臣式的！

還是讓我們來看看當事人許先生是怎樣說的吧：

請聽他（即麥氏）在《引言》中所說的；“毛的政治局同斯大林的不同，那裏有辯論，主席也可能被擊敗，或者被人置之不理。”劉少奇“對機遇和個性使得黨的領導權落入毛的手中的情況有些忿忿不平。”他把“雙百”方針和鳴放說成是“自由化政策”，在《結束語》中說：“毛的自由化政策試驗的失敗，是對他領袖威信和權威的沉重打擊。”“毛不現實地設想通過整風的形式就可以實現黨員品行上面的任何長期性的轉變。”他認為文化大革命起源于毛澤東與劉少奇于1957年的“不和”，其主要證據竟出于我的口。他引用了1957年7月29日《人民日報》上我的右派言論：“中央分裂了，劉少奇、彭真壓制毛主席。”事實上，這句話並非我說的，是清華大學一位朋友對我說的，我並不相信，祇是向哲學所黨支部匯報過，想不到他們把它捅給《人民日報》，變成是我最嚴重的右派言論，“美聯社”也當作新聞報道了。這純屬誤會，麥克法誇爾却把它當真，作為“毛劉不和”的主要根據。這本效法所謂“克裏姆林宮學”寫

出來的中國歷史，能有多少可信度，是值得懷疑的。90年代初，我曾給他本人去信，指出他不了解中國內情，對報上宣傳的都信以為真，難免上當。我告訴他，毛澤東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足以說明“鳴放”決非自由化，不過是一種“引蛇出洞”的計謀，他無法理解。中國帝王的權術謀略太“深奧”了，頭腦簡單的西洋人確實難以理解，我自己也是被蒙蔽了17年之后才恍然大悟。（《北京之春》1997年8月號）

在國內有代表性的，是王若水先生曾把毛澤東發動反右的原因，歸之于，毛為了應付黨內反制整風的強大壓力。對此，我另作安排，另作辨析。

## 六、毛澤東親口承認了：“陰謀說”

毛澤東氣急敗壞，一怒之下甩掉了“陽謀”這塊遮羞布；現在更加無耻地原形畢露。他說：“我他們不愛，給他們自由，讓放出毒素。你講我陰謀（！）就陰謀（！），大魚、小魚一起釣，特別釣吃人鯊魚。”（《廬山會議實錄》第331頁）雖然這比說“你講我男盜女娼就男盜女娼”更加無耻和無賴，但這總算是他打自己嘴裏承認了是“陰謀”。

### （一）李維漢跟上了毛的部署

果如前引李維漢部長所說，“在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開始時，毛澤東同志並沒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為了反右而開這個會，不是‘引蛇出洞’。”如果這時候部長還蒙在鼓裏的話，那麼，隨後他便成為“引蛇出洞”陰謀的施工者了。

據第一號右派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在《往事並不如烟》中回憶道：

5月15日，毛澤東致送《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給中共高幹閱讀。信中，老人家把共產黨人分為馬克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把社會上各階層人士分為左派、中間派、右派。並指出“在民主黨派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我們越有利。”

這邊廂，民主黨派裏的兩個元老人物，在中南海受到秘密召見，獲得了“東南風轉西北風”的天氣預報。他們完全三緘其口，靜觀以民盟農工為舞臺中心，以章（伯鈞）羅（隆基）為主要角色的一臺踐踏知識份子、打擊民

主黨派的慘劇。那邊廂，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還在積極響應中共中央整風號召，大講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的光明未來，宣傳“鳴放”，鼓勵“監督”。

爲了把昔日的朋友制造成爲今天的敵人，並讓全社會認可，毛澤東在上海發出了指示：“讓牛鬼蛇神都出來鬧鬧。”“這不叫誘敵深入，叫自投羅網。”這羅網，便是由中共中央統戰部組織、召集系列整風座談會。

座談會是從5月8日起召開的，先後搞了13次。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發表意見，來幫助中共整風。

座談會的頭幾天，父親沒有去。一則，他的意見早就發表過了，二則，他正拉肚子。

李維漢很着急父親不入圈套，便親自撥電話敦請：“伯老，你一定要去參加座談，給我們中共提提意見呀。”

5月21日，實在踩（音：托）不過李維漢的面子人情，父親去了，行前還跟母親講：“今天開會，我真不知說什麼好？”

進了會議室，他被請入主賓席——在頭排大沙發入座。這顯然是一個必須發言的席位。果然，親自坐鎮的李維漢點名要父親“給中共提意見”。

父親講了幾十分鐘，他談到政治設計院問題；“聽意見于基層，放權于部會”，發揮管理機關的作用問題；國務院會議程序問題；及檢查歷次政治運動的建議。最後父親說：“我的講話不是靈感和一時高興，所提意見也不都是那麼嚴重。無非是希望共產黨改革體制，改善領導，在決策民主化、科學化方面前進一步罷了。”他講話的時候，李維漢一直神情怡然。父親大概以爲是稱許自己的談話；殊不知，他這是在爲獵物墮網而心安。

對李維漢而言，章伯鈞是他釣到手的一條大鯊魚，自可邀寵于毛。但遠非止此而足，在他的《回憶與研究》中還記載着如法炮制的其他陷阱：

工商座談會期間，有人提出真正的資本家與會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斷擴大規模，找到了北京的吳金梓，天津的董少存，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會鳴放，後來這些人都被劃爲右派。這個做法實際上是“引蛇出洞”，把對敵鬥爭的一套用于人民內部，混淆了敵我。

### （二）彭真現身說法擺圈套

當時上海有人問劉賓雁：“黨中央整風的決心大不大？”劉是個年輕氣盛、忠誠直率、從不設防的人，他隨口答問：“毛主席的決心大！至于黨中央嘛，



還得走着瞧。”（我曾把登在《人民日報》上的這段話，親自向劉賓雁求證過，確證是他說的）後來又傳說：“劉少奇、彭真一綫，向毛主席施加壓力。”（這話是許信良說的）現在真相已經明明白白，當這些黨政大員對毛的“引蛇出洞”陰謀心領神會時，黨中央就成爲一個共同迫害知識份子的沆瀣一氣的陰謀集團。各個領導都是施展陰謀詭計的能手。他們用實踐證明：“有人說這是陰謀”是千真萬確的，現在，讓彭真現身說法。

著名記者戴煌說，他就是中了彭真的陰謀詭計而被劃爲右派的。我讀他寫的回憶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感慨萬分。他的歷史能紅得滴出血來，幼年當兒童團長，十幾歲參加新四軍，後爲中共打內戰，當隨軍記者，建國後到新華社，參加抗美援朝，援越抗美，還受到胡志明的器重。1956年到外交學院調幹培訓，他是班級的黨支部書記。

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那篇遺臭萬年的社論《這是爲什麼》，在全國大張旗鼓地掀起了反右運動。在這之前，他沒有提過意見，寫過大字報。

反右展開之後，彭真親自召集了首都高校黨支部委員以上幹部的聯席會議，戴煌參加了，望着彭真那偉岸的身軀，滿面的紅光，誠懇的態度，聽着他宏亮的山西普通話：

反右歸反右，整風歸整風。我們黨內的同志，機關的同志，還要繼續幫助黨搞好整風。有什麼說什麼，有什麼問題還得改什麼問題。經過前一階段的整風，表明黨內的問題的確不少……我們有些黨員幹部就象封建把頭一樣，騎在人民的脖子上拉屎拉尿，這樣的人不整整行嗎？

所以，我們黨內的同志應該說，而且說錯了也不要緊，和“章羅同盟”他們攻擊共產黨，企圖和黨在中國平分秋色，顯然不是一種性質……

彭市長的一番話，引起他審視自己的黨性，心中明明有一些憂心的問題，如回到蘇北故鄉，看到慘敗的景象和鄉親的怨聲載道；以及認爲，神化與特權是中國的最大隱患。這些並未積極向黨提出，幫助黨整風。

6月13日，新華社召集在外交學院學習的同志開了一個座談會。他發言了，主要是談反對神化與特權。他指出，現在已經開始了對毛主席的神化，祇要是毛主席說過的話，不管對不對，科學不科學，那就一定千真萬確，一定是馬列主義真理。

他批判毛主席最近會見南斯拉夫代表團的談話。毛說，我們不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我們還希望早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國有6億人口，打掉了3

億人，還有 3 億人，一樣建設社會主義。可帝國主義國家能剩下多少人呢？而且人民趁機起來造反了，從而引起世界範圍內的革命……

戴煌認為，就說美國人民吧！他們今天活得好好的，憑什麼要砸掉自己的洋房、小車，去揭竿而起鬧世界革命呢？

戴煌的後果可就悲慘了：挨批、挨鬥、劃右派、勞改……百般苦罪，概括為一言：“九死一生二十年”。

### （三）王造時由周恩來而死

引蛇出洞的伎倆，屌膿尿血的人格，賣國的嘴臉，鱷魚的眼淚。說的是，周恩來不殺王造時，王造時却由周恩來而死。

時是政治學博士，29 歲的大學教授，少有“安福三才子”（另二為羅隆基、彭文應）之稱，長有“愛國七君子”之名。七君子之另一，鄒韜奮對他的評價是八個字：“天真爛漫，篤實敦厚”。

所謂“七君子”，都是救國會的頭面人物，另外五位是沈鈞儒、沙千里、李公僕、章乃器、史良。在周恩來操控下，以抗日為名，大事反蔣。于 1936 年 12 月 22 日他們以“危害民國罪”被關進蘇州高等法院監牢。他們雖被利用，但確是出于愛國熱忱，故獲釋後，得到“愛國七君子”美名。我謂“利用”；你不相信嗎？試看，“愛國七君子”若真的愛起國來，中共又是何種態度？

1941 年 4 月 15 日，《新華日報》頭版：“塔斯社莫斯科 13 日電”

#### 條約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與日本天皇陛下，願鞏固蘇日兩國間之和平與友好邦交，茲特決定締結中立條約，因此雙方任命各自代表，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任命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員長維拉徹斯拉夫·莫洛托夫；日本任命外相松岡洋右及特命駐蘇全權大使建川美次陸軍中將，為各自代表。雙方代表互閱國書，均屬完好妥善，當即議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締約國雙方保證維持相互之間和平與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對方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

第二條、倘締約國之一方成為一個或數個第三國敵對行動之對象時，則締約國之他方，在衝突期間，即應始終遵守中立。

第三條、現行條約自締約國雙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定五年。在期

滿前一年，倘締約國雙方均未宣告廢棄本約，則有效期限即自動再行延長五年。

第四條、現行條約當從速呈請批准。批准證件當從速在東京交換。

現行條約用俄文及日文繕寫兩份，由上述雙方代表簽字蓋章，以昭信守。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即昭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立于莫斯科。莫洛托夫（簽署）；松岡洋右，建川美次（簽署）。

#### 宣言

遵照蘇日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締結之中立條約精神，蘇日雙方政府為保證兩國和平與友好邦交起見，茲特鄭重宣言，蘇聯誓當尊重“滿州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于莫斯科。蘇聯政府代表莫洛托夫（簽署）；日本政府代表松岡洋右，建川美次（簽署）。

消息傳開，輿論嘩然，各界人士反應強烈。中華民國政府鄭重聲明，對條約涉及中國的部分宣布無效，並指示駐莫斯科大使要求蘇聯方面澄清。

親蘇親共但又自認是中國人的人士，不僅無法面對別人的質問，也無法面對自己的民族良心，因而自己也義憤填膺。黃炎培在日記中寫道：“4月7日2時，招周恩來、董必武來，舜生、伯鈞也到，請中共表示態度。周極言蘇聯此約乃其一貫之政策，與對華毫無關係；至中共態度，決不因此變更云云。董略同。”

黃炎培等，他們的救國會經過討論，表明態度，由王造時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帥的公開信》。內稱：“今貴國于4月13日與我們的侵略者日本帝國主義訂立中立協定，並發表宣言相互尊重所謂‘滿州國’及‘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之完整與不可侵犯性，顯然妨害我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我們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遺憾。故對於我政府宣布其無效的鄭重聲明，絕對擁護，且深信這是我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公意。”

這一下可大大地觸怒了中共，同時也大大地暴露了中共的賣國嘴臉。

章乃器的妻子胡子嬰在她寫的《我所知道的章乃器》（《文史資料選輯》第82輯，第80頁）中回憶道：

1941年，蘇聯因戰略上的需要，和日本簽訂互不侵犯協定，其中有涉及中國主權的地方，國民黨報紙即借此攻擊蘇聯。救國會也發表宣言對蘇聯提出抗議。周恩來同志知道後，認為這樣做不適宜。沈蘅老表示救國會要作

自我檢討。章乃器對這件事很不以為然。他認為救國會發表宣言是救國會的事，共產黨無權干涉，救國會也不應該檢討。他爭之不得，就退出了救國會。章乃器退出救國會時，要我同他一同退出，我沒有接受。

半年後，他們夫妻離婚。這事我們不管，我們關心的是如不離婚，則會出現賣國與愛國同床異夢的黑色幽默。

共產黨對王造時記仇在心，“解放”後先讓他失業，再給以迫害，七君子中健在的其他人，都當上了中央大官。而且，1949年毛澤東去蘇聯給斯大林祝賀70大壽時作為獻禮，就在民主黨派中唯一地宣布解散了救國會，以謝罪于斯大林大元帥。（當然中共一貫是不強迫，而讓其“自動”。）

在《沉重的1957》中載有王造時的有關此事的遺稿：1957年寫的《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的問題的交代》，其中寫道：

在重慶救國會的重要負責同志開會討論這件事的結果，認為救國會運動是由于日本侵略東北而起的，中國抗戰也是為着這個問題。蘇聯雖是我們最好的友邦，但是這個協定實在地對中國是一個打擊，大家認為有公開表示的必要，當場推舉我起草，張申府審查。我隨即擬了一個致斯大林大元帥的公開信，表示該項協定是妨害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認為是很大的遺憾。張申府看過之後，旋經開會修正通過。當時我們七個人（指“七君子”——紫丹注），除鄒韜奮同志生活書店被迫已遷往香港外，我們六個人都在重慶參加會議。（記得王炳南，張友漁同志等也參加會議。）開會決定：由沙千裏謄清兩份，于次日在史良家簽字。簽名的有沉鈞儒、章乃器、史良、李公僕、沙千裏、張申府、劉清揚、胡子嬰和我九人……（第106頁）

這封公開信被說成是反蘇，反共，反斯大林。為縮小打擊面，造謠說是王造時一人幹的。

當時黨的個別領導人按照《真理報》的調子，說成是斯大林的一種策略：讓日本的矛頭向南（專門侵略中國——紫丹注，下同）不向北（不打蘇聯），免使蘇聯腹背受敵，便于集中全力抵抗法西斯德國。因此，那條約及宣言是正確的。（第107頁）

王造時政治上受冷遇，經濟上處困境，心理上陷苦悶，采取了少說話，不寫作，免是非的消極態度。

1957年的春天，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好一派萬紫千紅！中共中央統戰部消除對他的誤會。3月27日傍晚，周總理接見了他，晚宴上，一邊給

他夾菜，一邊聊天，回憶解放前那些不平常的歲月。後來又談到讓他到北京工作以及恢復救國會的問題。實在可以說是枯木逢春。王造時舒心之情，可以從他 1957 年 6 月 12 日早晨寫給周總理的信中看出：

周總理：

2 月下旬我進京參加全國政協，三月間與統戰部兩度談話結果，得將 1941 年日蘇互不侵犯協定所引起對我的誤會及其間的是非問題，相與澄清，多年來私衷的悶惑，為之豁然一爽。最感幸運的是您在萬機待理之中還邀請我作一懇談。您那衝曠的襟懷，誠摯的態度，殷切的期待，尤其是那種為國家為人民多方謀慮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動，永不能忘。您提出我來北京工作及恢復救國會各節，我定當從祖國的需要上慎重地加以考慮。同時，請您接受我至誠向往之忱，隨時予以指教，使我更能夠為社會主義建設辛勤工作，無負盛意……

關於“恢復救國會”，遺稿記載：

3 月 27 日的晚上，我在北京蒙周總理召見。在談話中周總理曾經問我是否考慮恢復救國會的問題（既然恢復，何必解散？——紫丹注，下同）我答復說要問沈鈞儒，史良和其他與救國會有關的朋友（為什麼不問他們，單單問你？）。周總理說，當初解散救國會是一個錯誤。毛主席看見民主黨派抗美援朝的聯合宣言沒有救國會的名字，認為是一種損失（裝迷！那是誰叫解散的？）。周總理說我當初反對解散是對的。（那就是說，第一，當初你是反對解散的，這一點先肯定下來；第二，你是對的，黨是錯誤的，別人不反對也是錯誤的。）我答復說，我當初也不是絕對反對解散，我當初的意見是如果其他民主黨派解散，救國會也就應當解散；如果其他民主黨派還有歷史任務，救國會也就考慮不解散……（第 109—110 頁）（真是糊塗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當初為什麼單單提出解散救國會而不提解散其他任何一個民主黨派？現在又為什麼單單問你是否考慮恢復的問題，而不問其他任何人？而其他任何人現在都是比你更具分量的呀！現在你是最人微言輕的了，你呀你！王博士。人家賣了你，你還要老實巴腳地替人家數身價）。

王造時誤以為報國有門了，積極性也上來了，熱情地投入了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大鳴大放之中。他這條本來是凍僵的蛇，硬是被“春天”的暖氣給哈出了洞。結果，“自投羅網”，給共產黨劃了右派。

不僅僅門他現行的右派言論，還挖他反蘇、反共、反斯大林大元帥的歷

史罪惡以及要“恢復救國會”的陰謀活動。七門八門，他受不了了，就向總理發出求援信：

恩來總理：

6月12日晨緘上一函，並附呈在上海宣傳工作會議和上海市政協的發言兩紙，想蒙鑒察。不意即日起由上海法學會（我忝為該會副會長）及市政協政法組（我忝為該組召集人之一）召集了六天的座談會，主要對我在宣傳工作會議及《新聞日報》座談會的發言，作尖銳的批評，我得到了很好的啓發和教育。但在批評之中及各報發表關於我的消息，動輒冠以反黨反社會主義甚至右派份子的帽子，私衷實不勝感慨而惶惑。

多年以來，由于家庭疊遭不幸事故，加以自黨對我有薄膜存在，故一向緘默，不敢有所獻議，誠恐言或失當，于公于私都無好處。本年三月間在京得有機緣同統戰部及救國會諸友暢談之後，相與澄清了一些歷史上的問題，復蒙我公召見懇談，猥承勉勵，精神為之一奮，私衷自矢，今後對黨對社會主義，更應竭忠盡慮，以圖報答。適值黨大力號召放鳴，廣開言路，我鑒于官僚主義相當普遍，激于愛黨愛國之情，感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之召，深受鼓舞之下，遂破除顧慮，放膽為言，殊不料由于對政策的體會不够，對社會的觀察不周，所發生的客觀效果徒加了黨和政府的困難，造成了不良的影響，此雖非始願所及，但後果責任應由我來負。以惟恐天下不治之心，招致惟恐天下不亂之誚，我不僅愧對黨國，愧對我公，抑且愧對自己。我將嚴肅認真，實事求是地作一書面檢查，以冀彌補損失于萬一。但若強我承認為反黨反社會主義之右派人物，則違心之言，我所不為。恐于社會主義的建設也無裨益也。

承您關懷備至，我當此疑難，心懷又不免向往您處。誠知您正在開人民代表大會，原無暇晷處理瑣事，但向日之葵，仍期一照，不知可否由您斟酌通知上海市委或正在京參加人代會的劉述周部長，由此間負責同志約我面談，指示對我的要求，使我能够認識問題的所在，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做好書面檢查，糾正不良影響，同時不强我作言不由衷之論。如果您認為我當面聆教更為妥當，我也可隨時入京趨謁。

我的長兒長期患精神病于上海醫院，幼兒初患精神病于南京醫院，長女神經曾受刺激在家修養，而愛人則于去年三月中旬逝世，我個人也有血壓嫌高及風濕痛之病，自顧孑然一身，原無所求。如能以殘餘年華追隨黨及毛主

席和我公，作一磚一瓦之用，而有助于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誠衷心所祝，殊不願抑鬱困死，徒負您臨別相期的至意。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諸希諒察。謹致

最敬仰的敬禮！

王造時上

就象我們可以“預報”準確昨天的天氣一樣，我們充當事後諸葛亮可以判斷周恩來決不會給他回信，相反，倒會去問一問他信上所說的“劉述周部長”：“王造時這棵大毒草鋤得怎麼樣了？”

可憐的著作等身的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博士，成了被人奚落為“檢討”等身的王博士。最終死于上海第一看守所。

當七君子住國民黨的監獄的時候，宋慶齡去解救他們，神氣十足地斥責庭長道：“我們有事要找院長，他為什麼不見？就是蔣，我要見，他也不敢不見。你們的院長為什麼不出來？”

王造時被釋放出獄時，帶着他在獄中翻譯出的他老師拉斯基的名著《國家的理論與實際》一書。

當他住共產黨的監獄的時候，宋慶齡啞吧了。他至死也未被釋放，死時還帶着手銬一副。

倒是周恩來總理“有情有義”，《沉重的1957》寫道：

一份關於王造時病危的報告，終於送到周恩來總理手中。

人民的好總理馬上打來了長途電話，要求盡力搶救王造時先生。王造時被送往上海瑞金醫院搶救……

然而，王造時此刻已危在旦夕，氣息奄奄，帶着手銬躺在病床上。聽說周總理打來電話，他胡須邋邋的嘴角漾起笑意。（第79-80頁）

三天後他死了。

他的小女兒王海容，因不與父親劃清界限，也劃了右派，剛在醫院動了乳房癌大手術，現拖着沉重病體邊哭邊奔，趕往上海龍華火葬場。

說了半天，還沒說王造時的右派言論是什麼呢！

1957年3月20日《人民日報》第五版上，載有他在全國政協大會上的“放毒”，題目是《我們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趨豐富美滿》，還配發了他發言時笑容可掬的照片。他說：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道理，大家當然

懂得，實行却不太容易。拿一個或許是不倫不類的比喻來說，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徵更難。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養，難得虛懷若谷；做魏徵的非對人民事業有高度的忠誠，更易憂讒畏譏。我想，現在黨內各級幹部中象唐太宗的可能很多，黨外象魏徵的倒嫌其少。

這作為他右派言論的根據，就使他獲得了“自比魏徵，向黨進攻”的罪名。

#### （四）“龍陳聯盟”胎死腹中

大約三年以前，在香港的一本《華人世界》刊物上，我讀到了徐鑄成先生的一篇文章，題目忘記了，裏面寫到的一件事情令我至今難忘：

反右鬥爭初期，周恩來還召見過一次時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和民革中央副主席的龍雲，要他承認和時任民革中央常委兼全國政協常委的陳銘樞，結成一個“龍陳聯盟”。如果他能答應下來，周恩來保證他的生活待遇一切不變。

盡管自己已在報紙上的一篇篇批判聲中岌岌可危，却没有片刻的猶豫，龍雲當時就拒絕了，他說：這真成了天大的笑話，國人衆所周知，過去我是雲南的土皇帝，土軍閥，而陳銘樞做過國民黨廣東省政府主席，代理過偽行政院院長，算是蔣介石的嫡系。將我們兩個風馬牛地捏在一塊，這事怎麼能行呢？

軍人出身，戎馬半生的龍雲，比不得多愁善感的章伯鈞，祇要他第一次不肯答應下來，那就永遠不會答應，即便如渾身都是外交細胞的周恩來，也就祇有徒勞而返；或許，這事終究讓始作俑者覺得了某些荒唐，周恩來召見之後也就不見有新的動靜……

徐鑄成先生還在文章裏提供了這段史實的出處：

他是聽一位在國務院參事室任職的老人講的，這位老人是龍雲生前的好友。龍雲在雲南當土皇帝的時候，前者則在雲南省參議會做事。我想，無論是徐鑄成，還是那位老人，大約不會也風馬牛地捏造出這一段情節來，他們直到行將就木前說出來，寫出來，無非是要為歷史保留一點真相……

顯然，不經十分警惕黨內黨外有人結成聯盟、可又偏偏嗜好於在歷次運動中炮制出種種“集團”來的毛澤東的授意，周恩來是不會有這麼大的動作的。

（胡平《禪機：1957 苦難的祭壇》，第 462 頁）

我所以寧肯逐字逐句照抄，而不轉述，也不引用原件，一則，由於我是首先從胡平先生這裏看到的。二則，我也很尊重胡先生的看法。這叫做“一



功兩得”。

不過，我們由此看到，毛澤東真是個黑心肝，爛肚子的人，始而把兩個“反貼門神不對臉”的人，硬着手肘打成“章羅聯盟”；繼而又要風馬牛地捏出個“龍陳聯盟”。前者，陰謀得逞；後者，陰謀流產。盡管毛的陰謀已玩得臻于爐火純青；但你就相信吧：大凡陰謀家之成功，斷然祇能是“得逞”于一時；試問：“章羅聯盟”于今安在哉？伴隨着“章羅聯盟，天下奇冤”的結論，陰謀家的嘴臉原形畢露，一同載入史冊。由中共左手捂、右手蓋的大陰謀家毛澤東的險惡、醜惡、凶惡、邪惡、罪惡的被全部、徹底揭穿，被全部、徹底清算，雖已拖過了上世紀末期，但決躲不過本世紀初葉。這是中國人民定要，也定能做到的事情！空口無憑，《誰是新中國》和“九評”在中國大陸引起的巨大反響，即為實證。

當然，人們也愈益認清了周恩來助紂為虐的角色。

### （五）李富春、陶鑄、王任重看誰招數高

毛澤東把陰謀定為國策，人們生活在陰謀的籠罩之下，邁步在密布的陷阱之間。

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在重慶向4000多名黨內外幹部發表講話時，要求打破“五怕”思想。這“五怕”是：

1，怕黨員不許放，不許鳴。李富春說，黨和毛主席都表示要大家大膽放，大膽鳴，用不着顧慮什麼；

2，怕整。他說這大概是因為“三反”、思想改造運動和其他運動時，有些人被整過，感情上還有影響。但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現在社會主義改造已基本完成，情況已不同了；

3，怕說錯。他說共產黨還常常不免犯錯誤，錯了大家可以討論、糾正。要是大家都怕說錯，怎麼鳴得起來爭得起來呢？

4，怕“圍剿”。李富春說，黨中央對“圍剿”小說《組織部來的年輕人》的情況，已經提出了批評。王蒙的作品有缺點，也有正確的一面。是真理就不會怕圍剿，真理總歸是真理；

5，怕得罪人。他說那更不必顧慮。大家鳴大家爭論，都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以求得共同的認識。

5月18、19兩天，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在中山大學、華南師範學院，

共計聽取了 13 個小時的意見。

大家反映最強烈的是：黨群關係緊張，在於有些黨員對知識份子看法不對頭。人事部門祇知道政治歷史，不知道學術歷史，有了什麼事情就去翻檔案袋，查老帳。黨群關係不好，還因為中間隔了一層年輕的黨團員和所謂的積極份子，他們中的不少人，根據領導的胃口逢迎領導。又根據自己的利益去使領導偏聽偏信……

陶鑄就此說道，今天沒有誰是舊知識份子了。舊社會過來的知識份子，經過這七年，黨和大家已互相了解，急風知勁草，大家都是擁護黨和社會主義的。他要求教授們打消一切顧慮，大膽講話，堅決揭開這兩校的蓋子來。（《禪機·上》第 170 頁）

中山大學全體師生學習毛澤東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停課五天進行大鳴大放，鳴放倒出了知識分子鬱積的苦水：

老教師認為，解放後我們一路挨打，如舊時大戶人家的老奴，上有老太太，下有少爺小姐；

老教授認為，專家學者不被重用，現在是老教授要看助教、講師的臉色，因為他們中不少人是積極分子，懂得“匯報”（指打“小報告”）。

專心治學者認為，工作能力低者反而步步高升——“黨”顯威風，一些積極分子盛氣凌人，視自己比眾人高出一等。

……

在這天的座談會上，董每戡教授最引人注目，因為陶鑄對董教授說，知道他“寫了幾首詩，很好”。陶鑄甚至背出了其中一首詩的兩句：“書生都有嶙嶙骨，最重交情最厭官”。下面的兩句是：“倘若推誠真信賴，自能瀝膽與披肝。”

由於陶鑄的肯定，董教授提了兩條意見：其一，高等學校是學術機構，應重學術。現在學校重視職務官銜，不重學術。這種社會風氣與黨對學術的看法有關，要趕上國際學術水平，必須扭轉這種不重視學術的風氣。其二，一些黨員有兩副面孔，平時冷若冰霜，面笑心不笑，運動一來凶惡異常。云云。數月後，董每戡教授就成為“大右派分子”。（中山大學《學習情況簡報》1957 年第 5 號。）

5 月底 6 月初，有一天下午，中共北京市委負責同志找了清華、北大、師大、北農大四所重點大學的黨委書記去談話，聽取了學校鳴放情況後說：

你們幾所大學老教師多，反黨反社會主義、翹尾巴的專家、教授、民主黨派成員多，有影響的人物多，要用各種辦法，制造適當氣氛，“引蛇出洞”，讓他們把毒都吐出來，以便聚而殲之。你們幾所大學鳴放得還不够，因為黨委力量強，黨委書記要示弱……讓他們敢于盡情鳴放，無所顧忌。最後着重交代說，時間不多了，很快就要發動反擊，反擊開始後就沒有人鳴放了。（施平《六十春秋風和雨》；上書第260頁）

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對於中央關於大鳴大放的通知，是贊成的，他更歡迎知識界的人士能給政府提意見。

在聚集的高級知識份子中間，他真誠地請求他們說：“我們黨員中有一些人，說打通思想時是我打你通，談說服教育時是我說你服，沒有想到自己也有不通之處和必須教育的地方。

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武漢地區最近“放”了一點。但很不够；“鳴”了一些，但很沒勁。為何放不開，鳴不起來？有人說，黨群之間隔著一堵牆。這堵牆是鋼筋水泥的，磚的木的，還是紙扎的？我們要研究它，且不管是什麼，都要打倒它，用整風的辦法打倒它。我們省委對科學、教育、文藝是外行，今天向大家請教打倒牆的辦法。”

王任重的講話，在二十多個高級知識份子之間，產生了極大的反響。紛紛把心裏想說的話抖出來，對國家的熱愛，對政府的信任，使他們說話無所顧忌。

馬哲民，這位中南財經學院的院長更是如此。當然，他的發言也就更加尖刻。他慷慨激昂：

解放以來，知識份子有進步靠攏黨是事實，但與黨有距離也是事實。解放以來，知識份子遭遇上有些苦水。老幹部對知識份子不信任，不尊重，看不出與反動派的分別，或者根本看不起，所以在運動中常把人民內部的問題與敵我問題混淆起來，而不少運動又是以知識份子為重點。所以人人自危，覺得國家有前途，個人沒前途，活下去沒意思。現在我們要改變這種現象……

這是一次座談會，一次由早晨到下午六點多的座談會。報紙評論說，人們去拆“牆”了，去拆黨和非黨之間的牆了。一件無法估價的重大工程在武漢地區也開工了。（1957年5月13日《文匯報》）

春華秋實。與這次會議相應的是，三個月後，為反擊右派而召集的一次省人代會議，會議對馬哲民口誅筆伐，在“華中右派的主帥”頭銜下，羅織

種種罪名。

最後，撤消了他的中南財經學院院長，民盟中央委員會常委、委員、湖北省主任委員，政協湖北省常委；但保留委員。

### （六）趙紫陽家鄉的“釣魚記”

上行下效，直至農村，也都處處在搞“引蛇出洞”。我到全國劃右派最多的河南省做過調查研究。

滑縣是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家鄉，窮得很。1958年初，全縣幾千名教師集中在縣城第一中學進行整風反右學習大會。

第二天，縣委王書記作動員報告，主席臺上坐有文教局長宋立業和公安局長等人。

王書記說，我們這次大會的目的是，幫助黨整掉三風，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要用大鳴大放大字報的形式給黨提意見。為讓大家暢所欲言，縣委提出三大保證：第一，保證不打棍子；第二，保證不扣帽子；第三，保證條條有答復。保證的目的是為了達到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那樣一種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幾天過去了，沒人貼大字報。王書記又作第二次動員報告，批評思想不解放；對幫助黨整風的態度就說明你是否跟黨一條心？後來又要求各個學校鳴放也要放衛星，每人每天至少要貼 100 張大字報。這就貼出很多大字報。一看內容，全是揭發誰跟誰有男女關係，幾乎有一半還畫着有男女生殖器的漫畫。

一中黃校長是個嚴肅正派的人，當然不來這一套。他原是縣報社負責人，因看不慣縣委領導的裙帶風，被調到學校來。他的大字報是一副對聯：

唯命是從之謂德

吹牛拍馬之謂才

橫聯是“人事制度”

他找語文教師尚建遂（地區著名的書法家）揮毫；又找圖畫老師蕭然畫了個漫畫：採用了齊白石畫的頭戴烏紗帽泥半團的官僚形象；黃很滿意。還有個歷史老師也在上面簽了名。

貼出以後，縣報社記者立即給拍了照。校長跟他們說：“我們的大字報質量最高，記者都照了象，他們的大字報質量都不怎麼樣，幫助黨整風幫不

到點子上。”

這樣鳴放了一陣，就又召開大會，主席臺上還是那些人，不過，身上都帶了槍。周圍由公安局設崗，包圍了整個學校。

還是由王書記講話：“我們經過一個多月的大鳴大放，放得好！但也暴露了一部分敵人。他們趁黨整風之際，惡毒攻擊黨的領導和各項政策。爲了幫助黨整風，保證大鳴大放辯論的順利進行，我們鄭重重申三大保證：第一……第二……第三……但別有用心的人他們出圈了，向我黨發起猖狂的進攻，是屬於資產階級右派，我們必須立即向他們實行反擊！……”

當天夜裏就有十幾人自殺。被訪者目睹一個教師從塔頂跳下來（在學校東南角有一個隋代建造的古塔），喊聲很大，直聲直氣，全校都能聽見，聽了毛骨悚然。他摔死了

另一個是住在隔壁教室裏的一位老教師，用刮臉刀片割斷了喉管……領導威脅目擊者：“誰說出去，找誰說事！”就這樣封鎖了消息。

農村的鳴放，大都是 1958 年才開始，城市的反右，已使他們風聲鶴唳。所以領導要想讓他們鳴放，比蹬天還難！河南省西陝縣有個區委書記跟副書記、區長劉漢昌說：“現在人都成了驚弓之鳥，你動員的態度再誠懇，再大的保證，也沒人鳴放。你說這任務還怎麼完成呢？咱們都是黨的老同志，老戰友了，誰還信不過誰？你能不能帶頭鳴放，來個以身示範？這樣一來大家就有可能解除疑慮，打開‘三軍不發無奈何’的僵局。”

“好！爲了黨的事業，我就來當當這個‘綫’。”

大家知道當年唐明皇是用綢子勒死了楊貴妃，解決僵局的。長話短說，反右一開始，上前就把劉漢昌區長打成了右派。他當然不服；最後落了個態度惡劣，從重處理，勞動教養。

如果要研究反右運動，你就到左得出奇的河南省，河南省對你的任何荒謬的問題都能提供出荒謬的事實來回答。再順舉一例：

俗話說：“猴不上竿祇敲鑼。”但是，不管他怎樣敲鑼，你就是不上竿，他能奈你何？

這個省有一位張挺老師，是學校教職員工工會主席，思想作風正派，聯繫群眾人緣好。領導動員他向黨提意見，他說：“黨的知識份子政策英明，我時常心懷感激還感激不過來呢！哪裏還會有意見？”

“你這個說法就不是唯物主義的，黨再英明也還會有缺點的。黨有缺點

黨就不英明了？毛主席說，什麼事物都是一分爲二的嘛！幫助黨整風就是給媽媽擦去臉上的黑。”

“媽媽的臉上哪有黑？媽媽的臉是白白淨淨的，很漂亮的。我恨章羅同盟右派集團給咱們的媽媽臉上抹黑。”

這時候他還有辦法劃對媽媽如此有感情的張老師右派嗎？有辦法或沒辦法，都是無所謂的。“辦法”並不是必需品，祇要黨“想辦”就會用“莫須有”三字橫行無知阻的。

共產黨和知識份子的關係，就像我前面說的，是伊索寓言裏“狼和小羊”的關係。狼總是能吃掉小羊的，而且吃得振振有詞：

“張挺雖無右派言論，但內心歹毒，確系資產階級右派份子。”

難道還有比這更厚顏無恥，蠻不講理的嗎？“你講我陰謀就陰謀，但是，誰也無法阻擋我陰謀得逞。”

### （七）陸定一、周揚、夏衍哄死人不償命

章伯鈞的女兒章怡和說：

6月8日，《人民日報》刊出了《這是爲什麼？》社論，毛澤東發出了反擊右派進攻的號令。

父親捏着報紙，讀之再三。他也在想：這是爲什麼？

吃午飯的時候，接到儲安平的电话。他說：“伯老，我下午兩點鐘，去你那裏。”父親想再說上幾句，電話已掛斷。

兩點整，儲安平跨進了父親的書房。他神色嚴肅，又顯得有些匆忙，連茶也顧不上喝，便說：“昨天，報館有人貼大字報批評我，我當時還很遲鈍，以爲祇是個人意見罷了。讀了《人民日報》社論，我看情況已不容許我在《光明日報》工作了。”隨即，從公文包裏掏出“呈章社長”的信函遞上。

接過一看，是親筆辭職信，父親啞然。

“老儲，辭職信我留下，但我一個人，特別是現在，也決定不了這件事。”父親說完這話，儲安平立即起身，告辭。

父親執意要送至大門。烈日下，二人淡然一笑，握手言別。

整個下午，父親心情煩悶。家中的氣氛，陡然大變。晚飯後，父親去了史良的家。在那裏，對《人民日報》社論和第一個站出來反擊右派言論的國務院參事室參事盧鬱文發泄不滿，並對史良說：“盧郁文不過是小醜，而胡

風、儲安平將來要成為歷史人物。所謂歷史人物是幾百年才有定評……”

父親歸來，已近深夜。人剛睡下，忽然，電話鈴聲大作。寂靜之中，尤覺急促刺耳。接過電話，方知是浦熙修打來。

她的第一句話是問父親：“儲安平辭職的消息是真的嗎？伯鈞，你的態度怎麼樣？”

父親答：“辭職是真的，但權不在我。將來要由社務委員會議論決定。”

浦熙修說：“《文匯報》的情況要比《光明（日報）》好些。因此，還想約你寫一篇關於聯合政府的文章。”

父親說：“我不能寫了。”

“你能不能推薦一個人？”

“我一時想不出來。總之，要請對中國政治有些研究的人，像王鐵崖那樣的。”

接着，浦熙修在電話裏向父親傳遞了兩個消息：一個是說，她在南斯拉夫大使館見到了周揚和夏衍。在大廳問他們二人當前的形勢到底是怎麼回事？還搞不搞鳴放？他們兩個人都說，現在仍然是鳴放，政策沒有變。另一則消息是講她看了《這是為什麼？》社論後，立即給陸定一打了個電話，不容氣地問現在是繼續“放”？還是“收”？陸的回答也是，我們還是“放”，沒有變。

浦熙修在電話中的講話，語言雖簡練，情緒却激動。彼此都有不祥的預感。父親非常理解，她關心“光明”，是因為“文匯”與“光明”血脈相通，都是民主黨派的報紙。她關心老儲，是由于她和儲安平命運相連，都是報社的主編。然而，父親還沒有意識到：毛澤東打擊的目標乃是浦熙修身邊的羅隆基、儲安平背後的自己，和章羅所代表的中國自由民主派知識分子及他們的政黨。（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

像共產黨這種比黑社會還黑得鐵的組織，在它的陰謀家黑老大的領導下，嘍囉們你不管想不想，都得昧着良心撒謊，步調一致地實施陰謀。就以周揚說吧，他至遲是在5月18日就得知毛5月15日寫的《事情正在起變化》，而今天已是6月8日，他却竟能欺騙浦熙修，說：“現在仍然是鳴放，政策沒有變。”致使她被黑老大封為“能幹的女將”而憂鬱終生，命送癌癥。

我評說周揚的根據，是作家黃秋耘的回憶錄《風雨年華》，其中說到5月18日晚在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那裏得知毛決定要反右了：

“我們正在談得起勁的時候，桌上的電話鈴聲響了，邵荃麟連忙走過去接電話。不到兩分鐘，他登時臉色蒼白，手腕發抖，神情顯得慌亂而陰沉，祇是連聲答應：‘嗯！嗯！’最後祇說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馬上就來。’我看了一下表，已經是9點20分了，肯定是發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開緊急會議。他放下了電話，沒頭沒腦地說了一句：‘周揚來的電話，唔，轉了！’至于究竟怎樣轉法，他沒有說，我自然也不便問。沉默了好一會兒，他又叮囑我一句：‘咱們今天晚上的談話，你回去千萬不要對別人說！暫時也不要採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這樣會引起懷疑的。’……要是我早兩三天就知道了‘轉’的消息，像《刺在哪裏》那樣的文章是絕對不會發表出來的。不過我總算還來得及從《大公報》和《光明日報》抽出了幾篇措詞尖銳的雜文，稍稍減輕了我的一點‘罪行’。”

“這個‘急剎車’的措施可能已經醞釀一段時間，直到5月中旬才決定下來。周揚那一級的高級幹部（他當時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宣傳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至早也到5月中旬稍晚一些時間才確知這一消息。我相信他知道以後，一天也沒有耽擱就通知了邵荃麟。邵荃麟當天（5月18日）晚上就暗示給我。”

周揚得知“轉了”以後，仍然積極實行“引蛇出洞”。5月25日，他在邀請文藝工作者提意見的座談會上仍然說：“希望大家意見提得尖銳一點。你們太客氣了，你們的批評祇是一分，可是我體會到我們的缺點有十分。”這裏充分地體現出劉賓雁在80大壽後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時所指出的共產黨的三大突出特點：“殘酷、卑鄙、虛偽！”

### （八）王若望舉證

著名文學家、思想家、右派分子王若望先生說：

再舉另一種引蛇出洞的陽謀，就在我的故鄉武進縣施行過。由于黨政部門没法湊足上峰頒下的右派份子的指標，有位熟悉政治運動的“智叟”獻計曰：如此這般，縣委書記覺得此計甚妙，便挑選在端午節前夕，由教育局出面招待所有的中小學班主任和語文老師，大擺筵席，說過端午節，請大家聚餐。

當時正逢外面大鳴大放空氣高漲，右派帽子還沒有出籠，來賓在酒足飯飽之餘，就很自然地議論反右的消息，什麼人是右派等等作為談助。



教育局在每一桌上安排一名心腹，暗暗記下張三李四發議論的精彩部分。宴會散席，他們的右派論點也就編織停當，於是這些人上了一百多位規定的名額。

爲什麼挑選班主任和語文教師呢？據告知我的老師解釋道：祇有教師中的尖子，發起議論來才有骨頭，至于把教師中的骨幹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必然影響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縣委書記和教育局長哪裏會顧及它的後果呢？

令人不勝驚異的是：爲了湊指標向上邀功，連安排做記錄的心腹，也有幾人上了右派黑名冊。

浙江省省長沙文漢，在反右鬥爭中被打成大右派，他是右派中等級最高的。沙的妻子陳修良，曾任中共地下黨南京市委書記，日後成了我的朋友，她避免談沙文漢的挨整，却談了另一位極右份子楊兆龍的故事：

楊兆龍曾任國民黨政府司法行政部司長，他妻子沙瀚因和妹妹沙軼因皆是沙文漢一族的小姊妹，1949年1月，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總統，陳修良誤以爲發覺李宗仁比蔣介石有其開明之處，那時在上海監獄中關着三十多名政治犯，陳修良便通過瀚因去說服楊兆龍，曉以大義，趁早釋放中共的政治犯，將功折罪，幾經轉折，在解放軍在山東取得大捷後，楊兆龍設法將全部政治犯釋放。應該說，楊是有功之臣，祇是爲了他響應大鳴大放，在發言中講了“應將政治和法律分開”等語，就把楊劃入極右派，沒收其家產和存款。他的妻子沙瀚因自殺而死，子女3人同時劃爲右派。楊本人判無期徒刑，他在獄中身患重病，至1975年特赦出獄，祇剩孤身一人，眼睛昏花，滿頭白發，至1979年死去。

如果說，三反五反運動成了自殺的高潮，連陳毅市長都說：“跳樓自殺者就象降落傘部隊！”那麼反右運動引起自殺事件肯定超過三反五反。（《黃花崗》總第11期，頁90）

## 乙：溯流

關於毛澤東反右派的起因，我分析了遠因、近因，內因、外因。至于，

反右運動的性質、過程及其歷史影響，這將是我在以下：“從反右到文革”和“反右派運動的慘痛歷史教訓”中，要展示和研究的内容。在這篇“右派言論及其歷史定位”裏，我祇能囫圇吞棗地說上一句：“鳴放的中心内容，是具有民主個人主義理念的知識分子，要共產黨兌現自己的民主承諾。”不管右派是自覺還是自發，是居心反黨還是不曾有反黨的動機，但中心内容就是要毛澤東實現他說的甜言蜜語。而這些人士是衝着這些甜言蜜語才追隨共產黨的。比如，毛澤東再三散布的美麗的政治幻景：“中國共產黨在抗戰勝利後的主要任務，就是‘建立一個自由平等的民主國家’。在這個國家內，‘有一個獨立的民主政府，有一個代表人民的國會，有一個適合人民要求的憲法’；‘經濟是向上發展的，農業、工業、商業都大大的發展，並由國家與人民合作去經營，訂定八小時工作制，實行統一的累進稅，對外國和平通商，訂立互利的協定’；‘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種優秀人物的天才都能發展，科學與一般文化都能提高，全國沒有文盲’；‘軍隊不是與人民對立的，而是與人民打成一片的’。毛主席說：‘這就是中國的現代國家，中國很需要這樣一個國家。有了這樣一個國家，中國就離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變成了自由平等的國家；離開了舊中國，變成了新中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24頁）。

像這樣意思的話毛百說不厭，在共產黨的報紙上可以說是連篇累牘，甚而至于在《解放日報》社論《切實保障人民權利》中，說了如此決絕的狠話：“革命與反革命的分野，祇在于要不要民主、給不給人民以民主自由。”這句話中的“祇”字，就意味着不給任何其他選擇，也不允許有任何的動搖，表明政治態度的決絕。社論接下來說：“而民主與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權、政權、財權及其他自由權利是不是得到切實的保障。”（1941年5月26日）如果以此來衡量中共八年來的執政；不來拐彎抹角那一套，干脆地說：“中共就是反革命！”——這是在客觀事實上，與他自己的邏輯上，會一致地得出的結論。在這一點上，劉賓雁也是這樣認為：毛澤東“把1949年那場革命變成了反革命。所以，用毛澤東的邏輯來重新來一次定性的話，反革命就不是胡風，而是毛澤東了。”（《誰是反動派》）右派之所以為右派，撇開具體的表現形式，就其言論的本質功能而言，就是會提醒人民認識到這個“一致地得出的結論”。

八年來共產黨執政的事實，說明共產黨歷來的所作所為，相對於他的民

主承諾來說，完全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騙局。它廣為宣傳的“人民‘選擇’了共產黨”，是不打折扣的謊話，按實情說，不是“選擇”得遲了，而是“欺騙”得遲了；對於大多數右派來說，也是如此。如果說共產黨，或者說毛澤東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值得人們“驚佩”，那就是，其欺騙之能量竟能如此之大！能使受騙者舉着拳頭要打倒揭露事實真相者。這也就是反右運動能夠轟轟烈烈地展開，工農能夠愚昧到不可救藥地反擊自己真正利益的代言人，全國能夠一致地起來自掘墳墓的根本原因。

因此，通過反右我們有一個發現：毛澤東騙人（包括對他的戰友和政敵，知識分子和工農大眾）的絕招，是讓你自掘墳墓——你自己先去打倒你的朋友，然後他再來收拾你。就像舒蕪出賣胡風以後，在反右中被打倒那樣。雖然大鳴大放是毛澤東自鳴得意的一場最卑鄙無恥的陰謀詭計，但畢竟又提供了一個全國規模的，也可以說是陰（謀）差、陽（謀）錯而造成的最後一次的、大講特講實話的大好機會。到 21 世紀回頭看，將會證明那時的歷史性前瞻：

這是最後的實話！

睜開眼來看明天，

一個謊言帝國，

就一定要在中國實現！

而這些實話作為不祥之言——後來在鄧小平時代與時俱進、統統換成一頂新帽子，叫做：“資產階級自由化”。實際上就是對共產黨做的歷史判決。共產黨的所有作為，都是一步步地時而直接、時而曲折地，時輕時重、時疾時緩地向這個墳墓進軍。我絕對相信，共產黨最終會在這裏葬身。在這裏，中國的斯大林，蘇聯的斯大林，以及所有大大小小斯大林分子都被釘在了歷史的耻辱柱上。

鄧小平遮遮掩掩地、所指出的“制度不好”的方面，早在 20 多年前右派就以大實話，比他更廣泛、更正確、更有高度和深度，更由於指出得一針見血便更振聾發聵。如果中共不錯斬華佗，治病趁早，絕不至於讓癌細胞在全身擴散，到今天成為不治之癥。當時的實情是這樣的：右派從宏觀上講，還不是要反天，而是要“補天”，正如王造時被打成大右派後給周恩來總理信中所說：“以唯恐天下不治之心，招致唯恐天下不亂之譏。”

又如原載于北大校刊 123 期姚仁杰同學的文章題目所示：“黨啊，我們批評你，是真正愛你！信任你。”也如被保留下來證明“反右正確”的五個

大右派樣板之一的彭文應，當時表明心迹說的：“例如反革命分子，他處處找大廈的岔子，目的是推翻大廈；我也來談談這裏有缺點，那裏的窗子破了，我是來為大廈補缺的，為的是使大廈更好……”直到死前，他還堅持：“那不行，這是重要的原則問題，一定要講清楚。絕不能把幫助救火的人，說成是趁火打劫，這是完全錯誤的，我一定要講清楚。”更如劉賓雁，祇是出于為了中國好和中共好的單純動機，才給毛澤東寫了信：“請您注意：一，黨內高級幹部中，一個特權階層已經形成。他們已完全脫離了黨組織與群眾的監督，成為新的貴族……二，在多數工礦企業中，黨的組織處於癱瘓狀態。東北的一些工廠中，黨員起好作用的不到四分之一……在機關中，黨內健康力量不得伸張，占優勢的仍然是教條主義與宗派主義的思想。有些機關黨員領導幹部政治熱情衰退……者竟達三分之一以上……關於黨與群眾關係的普遍惡化，就無須寫了。”

毛澤東在半年以前，也曾發出過“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的警告。但這類話祇能由毛澤東本人說，別人要議論這樣的可能性或現實性，就意味着對黨的“誣蔑”，犯了“攻擊”罪。

劉賓雁後來才知道：就在寫這封信的前十三天，即1957年5月12日，《中國青年報》發表了他寫的關於上海鳴放情況的報導《上海在沉思中》，毛澤東看到，當即批示：“看來，有的人不是想把事情搞好，而是想把事情搞亂。”已經下決心發動反右運動的毛澤東，顯然是把劉賓雁看作是“要在中國煽起匈牙利式的暴亂”的“右派”代表。但毫不知情的劉賓雁却還要如此多情地進言，這就真是毛澤東後來嘲笑的“自投羅網”了。（高伐林《我怎樣自投“右派”羅網：劉賓雁回憶半個世紀的往事》）

但是，凡是稱得起“右派言論”的意見，都的確是擊中了要害。他們的悲劇大多是，本想給惡狗治好狂犬病，却被毒汁四濺的惡狗反咬了一口。你若用前瞻法，讓時間順延，你就會看到毛澤東這祇惡狗，瘋狂到何種程度？彭德懷政治把脈後的診斷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瘋犬諱疾忌醫，首先下口咬得彭德懷鮮血直流；然後，它自己越來越狂，越狂越熱，任意逞瘋狂，瘋狂到天不收、地不留，直到瘋死；直到死後，尸體上的瘋毒，瘋菌仍在中國大地上傳播着像“猩紅熱”瘟疫一樣的“毛紅熱”，掀起一陣陣的崇毛狂。

反右取得“偉大勝利”之後，大躍進給神州大地帶來國家規模的發神經：成群的狂犬，和被它們裹挾着的成群結隊的患上狂犬病的瘋人，發狂啊發狂！

還有更大的滾滾狂流在後頭。上帝讓一個人滅亡，先讓你發狂；包括每一個人及其集合。民族應該記住：要是聽取了右派的警世良言，避免一場精神的和物質的浩劫該不會成為問題。今天，這個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的國度，也不用在浩劫的廢墟上，對着男盜女娼來講“八榮八恥”了。正如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提出：“一心一意搞四化！”一個老知識分子向我傾訴：“如果當年早聽了右派言，別說四個現代化、八個現代化也早化成了！”

## 一，右派言論大觀

要翻出當時的右派言論，讓現在人看了也不能不浩嘆其真知灼見。可惜這些警世良言不但未被採納，而且遭致了人身家國的大災大難。從而，我們也看透共產黨遠不僅是不堪造就，不可救藥的問題，而是你要打死瘋狗還是要讓瘋狗繼續成千上萬地咬死人的問題。直接了當地說就是，除了打倒黨天下，別的說法和做法都是自欺欺人，自誤誤國，繼續自掘墳墓。

現在，讓我掛一漏萬地列舉出當時右派言論的主要之點，供人們撫今追昔，以史為鑒，使打倒黨天下的民主運動，能够前見古人，後見來者。

### （一）聲聲聲討“黨天下”

儲安平指出的“黨天下”三個字，不僅找到了萬惡之源，而且將毛澤東關於國家民主化，聯合政府等等一系列誘人上當的謊言及其搞專制復辟的真實嘴臉，置于光天化日之下。作為歷史人物的儲先生之所以偉大，是今天的人們仍受他的啓示，認定，如不廢除黨天下，不僅目前的一切弊病如貪污、特權，發展權貴資本、對群眾巧取豪奪，鎮壓異議人士（包括群眾上訪），壟斷一切媒體並強迫媒體造謠，取締宗教信仰自由，群體滅絕法輪功……這些浩劫將會持續下去，並且日益表明，胡錦濤上臺，不僅在作惡上江規胡隨，而且又創糟蹋人權的新紀錄。

反右前後，大半個世紀的時間提供的確鑿無疑的歷史結論是，毛澤東是民主的死敵！共產黨是民主的死敵！“死敵”也者，不是民主死，就是共產黨亡。有民運人士與虎謀皮，說：“祇要實行民主，還是讓你們共產黨來領導。”這無異于告訴使人患破傷風的厭氧菌說：“祇要人民能吸到充分的氧氣，保證把你放進氧氣裏讓你大活躍而特活躍！”

儲安平提出“黨天下”，祇是他的政治理念，主觀上並不要打倒共產黨。但在毛澤東思想裏，既然“革命”就是開倒車，那麼，在“不斷革命”裏，自然也會革“黨天下”的命的，但不是朝着民主的目標前進，而是朝着“家天下”的目標後退。這就是下一步要到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實質：“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倒退）”。

儲安平提出“黨天下”，對現實是一針見血，既具有歷史觀的深度，又具有世界觀的廣度；有的放矢，言簡意賅，句句珠璣，天下傳誦，先睹為快。由于越雷池、犯禁忌，明星隕落，然而其奇文益彰，天馬行空，不廢大江千古流日夜！所有右派的言論，都是對萬惡的“黨天下”的有力舉證，病理解剖，沉痛控訴和嚴正審判；激情一點的，便會聲聲血、字字淚，甚至喊“打”，喊“殺”！也就是鄧小平後來迭次喋喋的所謂“殺氣騰騰”。意見間的相互呼應，協調補充，使意見的總體宛然形成了一個滴水不漏，美玉無瑕的完整系統。無怪乎歷史學家翦伯贊說：右派言論好像是“集體創作”。（《文匯報》1957.6.16）但這祇是不謀而合，而不是鬥爭會上聲討的那樣，每個右派的言行都是有陰謀，有綱領，有組織，有計劃地向黨進攻。事起之因，很可能是共產黨的一句口頭禪——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回想當年，安平先生話音一落，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老先生立即喝彩，直呼：“very good！very good！”

“解放”後，曾任中共把儲先生的《觀察》、改頭換面為《新觀察》的主編的戈揚女士，如今憶起該文，仍是不勝感嘆，贊不絕口：“現在重讀‘黨天下’，真是句句珠璣，不忍釋手啊！”（《爭鳴》2000年4月號）我上面曾說過的“句句珠璣”，其權威性即源于此。這便是右派言論中的核心觀點，是對“老和尚”致命的當頭一棒！儲文發表後，使毛澤東“一連幾天沒睡好覺”（據胡喬木兒子透露——見儲安平，維基百科）。請看儲安平發言原文：

儲安平：《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

解放以後，知識分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於“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有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為

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政權，黨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單位大小，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

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們所擔當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麼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樣的想法。從而形成了今天這樣一個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義突出，黨群關係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些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係？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個例子，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導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象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祇有一個，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被搬到了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沒有一位黨外人士，是不是黨外人士沒有一個人可以被培植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上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

祇要有黨和非黨的存在，就有黨和非黨的矛盾。這種矛盾不可能完全消滅，但是處理得當，可以緩和到最大限度。黨外人士熱烈歡迎這次黨的整風。我們都願意在黨的領導下盡其一得之愚對國事有所貢獻。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黨的力量是這樣強大，民主黨派所能發揮的作用，畢竟有限度，因而這種矛盾怎樣緩和，黨群關係怎樣協調，以及黨今後怎樣更尊重黨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樣更寬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國無論是才智之士抑或子子小民都能各得其所，這些問題，主要還是要由黨來考慮解決。

儲先生決不是逞一時之興，逞口舌之快，想發驚人之語，或是為一時，一事所激怒而發出的憤激之言。否。這是儲先生的思想本色。有人寫文章揭出“‘黨天下’的原版”，指出儲先生于幾年前，1949年3月8日發表在

他主辦的《觀察》雜誌上的專論《中國的政局》，其中第四節寫道：

坦而言之，今日的共產黨大唱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黨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的意志。

在今日中國的政爭中，共產黨高喊“民主”，無非要鼓勵大家起來反對國民黨的“黨主”，但就共產黨的真精神而言，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共產黨的對人祇有“敵”“我”，跟他們跑的，他們可以承納，不跟他們跑的，他們一律敵視。一切都以實際利害為出發，不存在任何人情與友誼。

要捧一個人，集體地捧起來；要攻擊一個人，集體地把他打下去。

公平的反面就是極端，共產黨的極端作風，實在大大地限制了他的同情的範圍，亦減少他獲得成功的速度。

老實說，我們現在爭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個“有”“無”的問題了。

是不是這樣呢？不僅中共，包括蘇共在內的百多年國際共運所提供的史實，可以斬釘截鐵地回答：“是。”這個回答是對上述關鍵詞“無”和“極端的有力肯定。”毛澤東，斯大林的一己之私，共黨的一黨之私，都是極端的；其殘酷暴虐，殺人如麻，無民主，無自由，無人權，無恥謊言也都是極端的。

鄧小平回答得也够斬釘截鐵：“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沒有什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改。”（《鄧小平文選》三卷，頁182）這不等於是鄧小平公然申明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制度與“自由”是不相容的嗎？這不就是“六四”大屠殺的理論依據嗎？可惜，至今仍有眾多改良主義者的熱面孔貼着這個專制的冷屁股在自作多情。對比之下，我們就更加珍視，更加懷念儲安平先生這位不是政客，而是不可多得的偉大的民主政治家了。正如章伯鈞在《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後與史良談的：“有人對我說，儲安平的話擊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着寫社論的。而且一再掬出盧鬱文來，盧鬱文這種人不過是一個小醜而已。我看，胡風、儲安平倒要成為歷史人物，所謂歷史人物要幾百年後自有定評。”

二年後，1959年9月8日《人民日報》揭發說，農業科學院研究員陸欽範，“污蔑共產黨‘已成爲一個權利集團’，惡毒地說共產黨是‘世襲’，‘比



起土地私有制來更是真正的封建’；詛咒黨‘終究會被時代的車輪所拋棄’。”

《人民日報》6月6日（凡不注明年份的，即1957年，下同）載，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人說：“每個黨員並不等於黨。有的機關學校中有人給黨員提意見，竟被批評為反黨、反組織，這不是比‘朕即國家’還有過之嗎？……在省裏還好點，愈到下面愈成問題，區委書記和鄉支書就可以命令一切。”

《人民日報》6月11日載：6月10日在民盟的座談會上，候補中委陳新桂仍然說他完全同意儲安平所說的共產黨的“黨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義的根源。他以為不足的是儲安平不曾進一步指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根源是什麼，他認為“黨天下”的思想根源是無產階級專政。他說，從蘇聯無產階級專政中發生斯大林錯誤，從匈牙利無產階級專政中發生的匈牙利事件，證明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政治制度是有問題的。他還說，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就是共產黨的專政。這樣，共產黨在貫徹政策的時候，首先要信任共產黨員，再就是信任青年團員，再就是信任靠攏黨的人。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如果不產生宗派主義，不產生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是不可想象的，不形成“黨天下”是很難想象的。

《光明日報》6月25日載，《中國青年報》記者詹寰說：“共產黨就是黨天下，沒辦法，這是根本制度問題，我完全同意儲安平的意見！”“共產黨不僅是以黨代政，而且有黨無政。”

《人民日報》6月25日載，湖北省中南財經學院院長、民盟湖北省主委馬哲民說：“中共不少領導同志……認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他們儼然為‘天生的聖人’。這就等於基督教說‘我代表上帝’了。”

浦熙修約樓邦彥和彭子岡一起去找費孝通談“黨天下”的問題，她問道：“黨究竟該在國之內還是國之上？”（《大公報》7月8日）

《人民日報》6月28日載，山東青島民盟成員曲北韋在市政協會議上發言：“我十分懷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呢，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力屬於共產黨？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呢，還是奴隸？”

《人民日報》，6月29日報道《南開大學反擊右派的鬥爭》：“在小組和班的會上，歷史系一年級一班的學生姚安全，口口聲聲說葛佩琦、儲安平說的是‘事實’，統購統銷就是搞糟了，人民生活水平就是下降了。他認為‘三害’是主要的敵人，而‘三害’的根子則是‘黨天下’，要反對‘三害’，要想不動搖黨的領導是不行的。”

《人民日報》，6月22日登載南京大學中文系講師劉地生的文章中說，消滅“三害”的根本方法就是消滅其產生的條件。這些條件是“僅允許從命令，而不尊重人權，不倡導獨立思考。”並說：“共產黨是國家的領導黨，但這不等於說共產黨就是國家。因為中國有六億人口，而共產黨祇有1,200萬黨員。決不能說一千二百萬黨員的利益就是六億人民的利益……我覺得應該改變以往把黨放在國家之上，以黨的利益代替甚至超過國家利益的做法。今後制定政策方針應該先從六億人口的利益出發，不應該先從黨的利益出發。任何一個黨派的委員會或支部，除開對那個黨的機關或黨員之外，沒有權力對黨外的政府機關或行政人員發布命令或指示。”

蕭子超是華南墾殖局的一個科員，1957年他曾提出這樣的建議：

1、建設社會主義是可以通過不同的道路來達到的。如南斯拉夫就是走的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不同的道路；在中國，全國要建成社會主義是必須經過相當長的時間，但是，具體地區却不一定需要那麼長。因此，他以為，“以廣東的人力物力條件，如果單獨搞，在時間上可以縮短很多。”

2、他認為廣東土改中的偏差主要是由於南下幹部對廣東的情況不了解所造成的。

3、他認為：“廣東第一個五年計劃中以發展農業為重點的方法是不恰當的，應以工業為重點，根據廣東目前情況應着重發展輕工業，尤其是輕工業中的農產品加工和食品工業。”他認為，現在所以搞得這樣糟，是由於領導幹部系外來幹部，而廣東本身又不是一個獨立政權組織的緣故。”

4、他認為在語言系統上廣東自成格局：“以廣州話為基準的廣東語言，在語言三要素上和北京語系都有很顯著的區別”。

廣州近二十年來的發展，證明這個科員的思考是非常有價值和遠見的，建立經濟特區的想法，也就是這個思路。但在1957年，提這樣建議的人却被說成是要建立“廣東人民共和國”，而成了“右派”。（謝詠《1957年知識分子民間的言論活動》）

中國共產黨聲稱自己不是農民的黨，也不是小資產階級的黨，更不是資產階級的黨，雖然這些階級在社會上是合法的，但作為階級的思想在黨內是非法的。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思想是屬於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政治上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的利益代表全人類的利益，所以共產黨的階級利益就是無產階級的利益。怪事就出在這裏：領導全國工會組織的李立三之

所以下臺，是因為：毛澤東提出“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他便提出：“生產長一寸，福利長一分。”他主張工會要為工人階級謀福利，就犯了“福利主義”的錯誤，據說正確的方針應該是“把工會辦成教育工人階級的共產主義的學校。”等等。到反右時，被劃為右派分子的高元，是中華全國總工會辦公廳檔案處處長，有16年黨齡的共產黨員。據報紙上說，他認為“工人並不是為了社會主義建設參加工會，也不是為了學習共產主義參加工會，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切身利益參加工會的。因此工會的本性就是保護，至于共產主義學校作用，無產階級專政支柱作用，黨聯系群眾紐帶作用，都不是工會的本性，而是黨強加于工會的。”高元認為，工會存在的客觀基礎，是國家有官僚主義分子，違法亂紀分子，國家不可能不犯錯誤，國家可能會侵害工人的利益。資本主義對待工人的一套，在我們國家中都有，祇是分散而不集中罷了。所以需要工會和政府唱對臺戲，需要工會來保護。這篇報道說，“今年4月，國家調整某些消費品的物價，高元在同志中間散布他的謬論：國家對工人一方面增加工資，一方面又提高物價，這是國家對工人耍手腕。全國總工會應該對此發表聲明，表示遺憾。”高元還說：“黨祇注意長遠利益，不能代表工人群眾的目前利益，或切身利益。有了黨的領導，工會就不能很好地保護工人群眾的切身利益，黨就成了礙手礙腳的東西了。”他還提出：《工會法》規定全國祇有一個工會，是否合適可以考慮。工人可以自己組織工會，不一定參加全國總工會。”（11月11日，《人民日報》）。

可見“黨天下”是要專一切人的政的。工人階級自己的組織，工會不是為自己謀福利和保護自己利益的，反而是共產黨用來專工人階級政的紐帶，給自己成員洗腦的共產主義學校！成立工人階級獨立工會的思想，這時已被提了出來。

## （二）“三害”應向毛澤東那裏挖

《人民日報》轉載《陝西日報》6月12日刊登的陝西師院講師王尊一的文章，題目是《“三害”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裏挖》。開宗明義：“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不是存在在個別機關或個別學校裏，是在目前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普遍地存在着。那麼我們要根除‘三害’是不是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裏挖掘一下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共產黨的確有偉大的功勳，但從此共產

黨驕傲起來了，以為天下是我們打的，政權應由我們掌握，好官我自為之，人民祇能聽從共產黨的命令、指揮和擺布，人民哪有憲法上賦予的思想、言論的自由？”

“元朝時候，把全國人民分為四等……當時統治權在蒙古人手裏掌握，其次才是色目人掌握，漢人和宋人祇是處於被統治的地位罷了。我們把這種政治叫做‘民族壓迫’。再如清朝入關以後，政治要職都設復職，如內閣大學士和六部尚書，滿、漢人各擔任一職，滿人官品高，漢人官品低，滿官有職有權，漢官有職無權。這種政治我們也把它叫做‘民族壓迫’。但是，反觀今天，全國人民也可分為四等……國家機關，學校，企業的首長，也是多復職。正的總是由黨員擔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職無權……這種政治制度，應該叫它個什麼名字，我也不知道。”

“……另外，一切討論變成了形式，嚴肅認真的討論根本展不開。領導上對待恭維，奉承，吹牛拍馬的人認為是積極分子，認為政治上可靠，可以得到提拔或升官。對待在政策、號召上稍存懷疑，或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便認為是思想落後，不進步，保守頑固，甚至戴上反黨，反人民和反革命的大帽子。這樣一來，誰還敢對黨提出一個字的批評呢？”

### （三）黨外人士有職無權

說到有職無權，此乃“黨天下”題中之義。別說副職，有一位正科長，有些政策文件科員（黨員）已經知道了，可對他仍在保密。試想，這怎會有職有權呢？無怪乎——

章伯鈞說：“我這個部長，就是守靈牌。”

民盟中委彭文應說：“民主黨派是電話總機，客人，眉毛，尾巴，包打聽，拍馬屁。”他認為中共的幹部政策是“大材小用，小材大用，優材劣用，劣材優用，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用非所長，用非所願，有才無德，有德無才，德才俱無，有罰無賞，賞罰顛倒。”（《人民日報》，8月25日）

教育部副部長林漢達說：“我不是講我個人有職無權，而是說整個教育部都是有職無權。很多事情，教育部不知道。教育部發通知下去，不靈，加上國務院，還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國務院發聯合指示才行。政府部門有什麼用？肯定你有成績，就有成績，說有偏差，就有偏差。”（《人民日報》5月21日）

8月6日北京師範大學舉行全體大會，揭露和批判文學家黃藥眠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有人揭發他在中文系整風會議上的反動言論：

“藥眠說他當系主任是有職無權，是被人當玩具玩，並說這與黨的整個領導和制度有關。他說有職無權的根源在於黨把知識分子看成是不可靠的小資產階級。他認為不能死記住列寧的個別詞句，像念經一樣，一提到知識分子就對他們有對抗情緒，總是把知識分子當成異己分子。”（8月7日，《光明日報》）

民盟中委，河南省副省長王毅齋說：“有職無權使你等于是個花瓶，招牌，牌位；這是黨外人士最感痛苦的事。”（《河南日報》，5月18日）

投靠中共的民盟陝西省委宣傳部長張性初揭發民盟中常委，陝西省副省長韓兆鶚：“他造謠說‘有職無權’，是‘被人牽着鼻子走的’，‘作副職是給人拾遺補缺的’，是‘點綴品’！”（《陝西日報》，8月20日）

時輪已滾動進21世紀，我插問一句：如今中國政壇上的人大、政協、民主黨派、群眾團體（如工會等）以及無黨派民主人士，是否仍是眉毛、點綴品、紙花、花瓶、招牌、位牌、玩具、泥菩薩、電話總機、客人、尾巴、包打聽、馬屁精、狗腿子、應聲蟲、留聲機、助紂為虐、被人牽着鼻子走的出賣靈魂者？

有另一種人物，如李慎之等，作了難能可貴的堅持，秉持良心說話、辦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應該說是我民族優秀文化的杰出載體，卓越的傳人，樹一代風範，在右派中也屬鳳毛麟角。1956年波匈事件發生時，他任職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毛澤東派秘書林克去徵求他的意見。他一針見血地指出，蘇聯東歐出問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沒有在革命勝利後建立起一個民主的制度。結合中國的情況，他認為“我們的大民主太少”，“應當成立憲法法院”，“我們應當搞大民主”。

祇有讓人民對國家大政方針有討論的權利和自由，才能免蹈蘇聯覆轍。這可惹火了民主死敵毛澤東，劃右派自然是没有跑的了。毛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就曾說：“有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幹部，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習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他們這種主張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缺乏階級觀點，是錯誤的。”這是李先生終生與專制主義所打的遭遇戰犖犖大端之一。之二是與鄧二世在血洗天安

門所遇，他憤而掛冠：“決不在刺刀下做官。”之三是，他一篇文章《風雨蒼黃五十年》，不僅給小人得志的江三世舉辦的國慶盛典大潑冷水：“就為準備這次大慶，據說花掉了起碼是上千億的錢，一切的一切都是踵事增華。希特勒死了，斯大林也死了，世界上追求這種壯觀的場面的國家應該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也許祇有金正日領導下的朝鮮才有這樣的勁頭。”指責他們是一樣的小醜，一樣的跳梁。而且為中共掌權 50 年的歷史定論為：“歷史剩下的竟是謊言。然而，據說我們一切的一切都要遵從的原則是‘實事求是’。”文章引用了蘇共 20 大以後意大利社會黨總書記南尼提出的一個公式：“一個階級的專政必然導致一黨專政，而一黨專制必然導致個人專政（獨裁制）。”

實在是，英雄所見略同。據《光明日報》7月1日所載，羅隆基私下曾對浦熙修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個人獨裁政治。個人崇拜的根源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對知識分子來說，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總比社會主義制度好些。”

北京師範大學一級教授武兆發說：“在抗戰時搞統一戰綫曾罵國民黨一黨專政，然而今天又把各民主黨派放在什麼位置上呢？民主黨派在工作中能起什麼作用呢？起的是木偶作用。結合我們學校也是一樣，過去系裏一切由誰決定的？如留蘇，進修，留助教，教授的去留等等，說是由人事科決定，其實連系主任都不知道，都是由幾個年輕黨員決定的。可以不客氣的說，這些年輕黨員在業務上是沒有條件決定的，然而在高等教育機關竟然這樣。”他還說：“對待民主黨派該讓它有一定的地位，不應使人感到自己是牌位，是傀儡。”（《師大教學》124期）

#### （四）對“黨天下”摻沙子

6月10日的《沈陽日報》刊出了沈陽師院張百生，黃振旅七千餘字的長文《社會主義建設的新課題》。主題是挖掉“三害”的根子。它用了二分之一的篇幅，分析肅反運動擴大化是在主觀主義思想指導下，寧左勿右，打錯了好人，破壞了法制；從理論上是受了斯大林的社會主義事業越發展敵人越多的錯誤理論的影響。肅反幹部祇是執行中央的指示，所以，“根子在北京”。他們質問：“胡風問題已過了兩年，為什麼還不公開審判？我們要求黨中央，如果打對了就立即公開審判，如果錯了就馬上開釋，並恢復其名譽。”

文章還具體批判了“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全面冒進。”對於“黨天下”，

他們認為中共使自己變成了特權者，陶醉于自己是開國元勳、有汗馬功勞，應當有權有勢的泥潭中，陶醉于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自我欣賞裏，總以為自己是最優秀的，非我不可。自吹自擂地宣傳自己偉大，光榮，正確，把自己擺在國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黨即國家，國家即黨”的氣派。由于黨對一切問題有最後決定權，從組織上又不信任非黨人士，就會把黨外一切逆耳的忠言拒于千里之外，這就使黨從思想上到組織上開始脫離群眾。黨雖擁有一千二百萬黨員，但這僅是占全民總數的百分之二弱而已……難道百分之九十八的非黨同志都無德無才，應當絕對服從百分之二的人的主張，當這百分之二人的“順民”麼！

黨所以喪失威信，黨員腐化，是由于“有了特權，漸漸忘記了革命的意義，喜歡奉承，作威作福，思想硬化。解放以後很有些人看到入黨是攀登仕途的拐棍，有權有勢，官高祿厚，步步高升。于是蜂擁而至，‘爭取’入黨，在黨員和黨組織面前，極盡其拍馬的能事，偽裝積極，唯唯諾諾，唯命是從，歪曲事實，欺上壓下……以博取黨員和黨組織的歡心，達到入黨之目的。”

“解放後這幾年來是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民主的，有的也祇是形式，不僅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民主，連資本主義的假民主也沒有，憲法成了一紙空文，黨可以不遵守它。實際上是一黨專政，是黨中央政治局少數人獨裁。黨內也沒有民主，下級組織和黨員祇能貫徹黨中央的指示，決議。黨外人士做領導工作是有職無權，祇有執行決議的義務，沒有參與決策的實際可能。黨是太上皇，威武神聖的。一手托着馬列主義的聖經，一手拿着國家政權的寶劍，誰敢提出異議，不是被扣上反馬列主義的鐵帽，就是被帶上‘莫須有’罪名的手銬。選舉祇是變相的任命，代表祇代表個人，誰也不知道自己選的人是怎樣的，他代表自己說了些什麼。至于集會，結社，出版等，都必須在黨領導下進行，不能逾越雷池一步，這怎能體現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是對人權的侵犯，嚴重破壞法制，必須改變。”“應該實行直接，普遍的競選，讓代表們能夠真正代表本選區大多數選民的意見，對本區選民負責。應該讓人民自由組織新的黨派，社團出版報刊，以便廣開言路，監督政府……”

“國家大事誰說了算？在憲法規定是‘人大’說了算，而實際上，‘人大’不過是個泥菩薩而已，全權都操在黨中央手裏。‘人大’祇是走形式，舉手通過，完成立法手續。幾年來很少看見‘人大’對國家大事進行過真正的討論，很少看見委員提出重大動議，却偶爾看見他們一些無關疼癢的考察記在

報上發表……‘人大’和‘政協’就像兩朵紙花一樣點綴民主的門面。當然，錯不在‘人大’和‘政協’，責任在黨中央。黨對‘人大’與‘政協’說來，成了超政府，超憲法的太上皇。不祇是以黨代政，而且是以黨代憲法，以黨代‘人大’……這樣少數人的專斷，肆無忌憚地發號施令，不發生錯誤倒是不可思議的了。要改變這種獨裁誤國的現象，必須把黨從‘人大’與政府之上拿下來，把政府置于‘人大’之下，使‘人大’成爲真正的權力機關。‘人大’代表必須經普遍的競選產生，一定要選出才高德劭者，才能起到真正的代表的作用，不要按各黨派‘政治分贓’的比例瓜分席位。要設立各種專門組織，集中最優秀的各種專家參加工作。‘人大’常委會應該是專職的。人民代表不應兼任政府之職務。應該創辦‘人大’的有關刊物，向人民宣傳政策，刊登消息和討論的重大問題，監督政府工作等等。至於黨對‘人大’怎樣起領導作用？我們認爲這就要靠黨員代表的作用。祇要共產黨代表人民利益，黨員在人民中享有威信，人民一定選他進去。”

共產黨把人民，特別是青年要求民主，都歸結爲要的是資產階級民主，而對資產階級民主又長期地加以詆毀、醜化。從張百生、黃振旅的文章看，人們對資產階級民主還是向往的。馬哲民說得很形象：共產黨對青年說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不好，其實這好有一比：過去有個大和尚同小和尚上山，小和尚看見一位姑娘，問大和尚這是什麼，大和尚說這是老虎。大和尚問小和尚愛什麼，小和尚說我愛老虎。共產黨和青年說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是老虎，其實青年還是愛它的。（《長江日報》6月26日）

《天津日報》，5月27日報道了中共天津市委教育工作部召集的中學教師座談會，會上第三女子中學的民盟盟員、歷史教師黃心平提出了一個根除“一黨專政”的政治主張。他說，“我有一個觸及共產黨利益的意見，祇要不殺頭，我就提出來。是甚麼意見呢？我認爲，現在既然允許民主黨派存在，各民主黨派的黨綱又都要求走向共產主義，同時各個黨派又都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爲甚麼不可以實行各政黨輪流執政的辦法呢？一黨執政有害處，像共產黨已經整過三次風了，但如今仍然有嚴重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通過這次整風是不是能够徹底消滅這些缺點，還使人懷疑。如果不要共產黨一黨執政，而要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通過競選來輪流執政，由各黨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綱來，由群眾自由的選擇，這就好得多。因爲這樣做可以刺激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點，來博得選民的選票，爲



人民服務。問題是共產黨肯不肯放棄政權。我本來打算將這意見寫成文章投給報社的，祇怕不給刊登。”

《天津日報》發表了幾篇文章，批判他的言論。6月23日，又登了黃心平的一篇長文——《談“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通過競選輪流執政”》。他寫道：

我的意思是，現在不能實行各黨派通過競選輪流執政，是否將來可實行。如果主張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輪流執政，就是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就是取消社會主義，此話從何說起？又是根據甚麼事實而得出這樣的論斷？

我懇告發表與我不同意見的諸位先生們，你們的意見盡可與我不同，可以從理論上駁斥我，以理服人，但切勿用帶有誣蔑的話對我人格橫加污辱。

章伯鈞對“一個上帝，九百萬清教徒（那時黨員數），統治着五億農奴”的黨天下局面早有所預期：“非造反不行”。他向往資本主義表現出的活力：

爲什麼還有活力？就因爲有多黨制度，有民主制度，有衆議院和參議院，有在朝黨和在野黨。光緒皇帝爲什麼完蛋？就因爲沒有民主。資本主義爲什麼還沒有完蛋？就因爲有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的辦法是：你不行，我來；我不行，你來。在朝的罵在野的，在野的罵在朝的，這在我們叫做批評和自我批評，在他們就叫做‘哇啦哇啦’。所以說，資本主義也有好的地方，也就是說，有互相抑制，互相監督的作用。（《人民日報》，6月19日）

他內心深處有一個“輪流執政”的政治理念，但不曾明說。因爲他跟中共交道打多了，早知“和共產黨合作不容易，共產黨是老虎”。他祇是試探着提出一個增加決策民主性的方案：

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給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現在大學裏對黨委制很不滿，應該展開廣泛的討論，制度是可以補充的，因爲大家都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樣搞，民主生活的內容，就會豐富起來。

他特別指出，“國務院開會，常拿出成品，這種形式主義的會議可以少開。”這便是被批鬥的三大右派理論之二：政治設計院。

盧鬱文批判過諸多右派言論之後，反駁章伯鈞說，章伯鈞先生不讓把成品拿上去，他是希望在國務院會議上大討論而特討論，他說一通，我說一通，

然後表決，這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方式，表面看來是民主的，實際上並不能取得一致。他說，章先生這個意見我不能同意。他認為事先把文件經過各方充分協商，準備成熟，拿出來討論通過，這正是社會主義民主的特點，是它的優越性。（《人民日報》，5月26日。這時毛正在引蛇出洞——紫丹）

如果說，拿出成品再“充分發揚民主”，讓與會者這個表示“衷心擁護”，那個表態：“揭誠擁護！”……這就是社會主義民主的特點的話，倒也是的確符合事實的。但要說是它的優越性……這不禁使人想起，被毛澤東奸污並傳染給她滴蟲病的女孩，對李醫生說的：“主席真偉大，樣樣都偉大，真使人陶醉。”左派之所以為左派，誠如是也。

《人民日報》6月28日載，武漢華中師範學院教授、民盟成員艾瑋生說：“當前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一個領導，一個被領導……互相監督是解釋不通的。”“民主黨派祇能在共產黨提出的成品上提意見，譬如共產黨提出一個文件，民主黨派便在文件上改幾個字，像‘之’改成‘的’字，‘我們’改成‘大家’等。民主黨派祇能施工，不能設計。所以‘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帽子是扣不上的。所以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之間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應該改變。”

《師大教學》129期：《黨群關係不好的根本原因是“家天下”思想（武兆發在6月1日生物系全體教職員座談會上的發言）》：

這幾天參加了整風運動的第一步前奏曲，在各方面看到一些情況，反映出黨群關係的確不妙，但沒人把根本原因談出來。恐怕主要關鍵是“家天下”思想。老黨員說“天下是老子打的”，小黨員說“黨是領導人民的，我就代表黨”。家天下的好處是大多數的黨員都努力幹，家天下的壞處是“一切老子包辦，你，愛作也作，不愛作也作”。我是有意的把話說得尖銳一點。在座有不少黨員，老黨員沒有，有中、小黨員，大家可體會一下，在過去的運動中上面如何布置，你不相信群眾，你如何使群眾相信你。自己不能做，讓別人做又不放心，派個副職來監督，替人家出主意，在我們系系主任就成系秘書的助手。崔恆顧同志到系裏來，很客氣地徵求我的意見，我以老先生自居說：“希望你能真正作到系主任助手，而不是系主任作你的助手，當你二人意見不一致時，提出理由，不能說服時，應聽系主任的。”究竟如何，汪主任知道。據我看來，可能比一般要好一些。究竟包辦好不好？大家都說黨的領導是偉大的，革命成功，黨誠然功績很大，但並非一切都好。毛主席說

凡事有好有壞，從哲學的觀點來看可如此說，但從工作看，作事應該盡量作好，應消除壞事，以至於到零，作工作不應發這話來掩護自己的缺點，不能說偉大的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肅反，我祇認為抗美援朝才是偉大的。

肅反運動搞錯了十分之九，還能說成績是主要的嗎？學校工作中經常出些偏差，有人問：“學校這樣大，如沒黨來辦誰來辦？”我曾提到別的國家裏一個多到四萬個學生的大學也不慌不忙地辦得一切都上軌道。一個系僅有一個系秘書，連管圖書的事情都辦了。有一個校長，沒有副校長，同時校長也是教授。好像學校沒有黨組織就不能辦學，這個說法是如把一個人綁住手脚放在車上，一抱下來，不解繩子就寸步難行。我們的全部事情就是這樣生出來的。有一個學生已在我校6至8年，現在還是二年級，這個學生的功課壞到極點，這也是包辦的結果，是生出的事。現在對每一個學生都用說服教育，談何容易，如說服好了今天不會出這麼多的牆報了。一切都是因為沒有法制，我們的憲法祇是一紙空文。在公布憲法時全國人民歡欣鼓舞，上面明文規定保證人身自由，但肅反中有無保證？在肅反運動中以黨組織為首作了許多亂紀的事情，由于沒有法制，可以一方面反對自由主義，一方面滋長自由主義。“百家爭鳴”政策提出後，有的學生就不要聽課了，有的半夜唱歌發揮天才，這就是沒有學生章規的結果。學生章規從前是有的可是我們不要。留助教、升講師、學生留級、入學等等現在都無一定之規，教研室副主任可以走私進來。所以別的大學一個系中有一個秘書就把事辦好了，我們有幾個秘書也辦不好。

如果我們真正按規章辦事，許多事都沒有了。“天下本無事，”“有”人自“找之”。我建議整個國家應根據憲法制定各種法：民法、刑事法等等來保證人民的自由和權利。絕對自由會妨礙別人，我們說的是相對的自由。一直到現在留蘇黨外人士是無份的，假若是人人有權報名投考，錄取不上的人沒意見，但把他連報名投考的自由剝奪去，就不同了。我建議學校一切要按法制辦事，否則路易十四秦始皇，朕即國家，家天下的思想，下至黨委上至支書都如此，真乃危險之至。一個小黨員才入黨幾年就這樣想，他就代表黨了，這是荒謬的思想，這是“土皇帝”思想。應該承認多數黨員都是忠心想為國。但出力不討好，要包辦是不行的，黨群問題都是包辦出來的。

關於辦校問題，最近各方面提出有三個辦法：黨委制、民主辦校、教授治校。我不贊成黨委治校，學校中起主導作用的是教師，他們心裏複雜，是

有專長有見解的人，領導者必須懂得他們的心理，能用道理說明他們。現在我們的學校領導過去打游擊，出溝平原，20餘年，沒有辦過現代高等學校，不懂業務，到了學校也就把打游擊戰的本事帶來。這些老黨員同志在學校裏不是黨委，就是什麼長，他們究竟對辦大學懂多少，方向是什麼，什麼是國際水平？如何達到？你去問他們，回答“沒意見”，他們祇好依靠蘇聯專家，專家說東就東，說西就西，偏來偏去，朝令夕改，雖然黨委制去年才宣布，而一直是這樣做，未宣布也一樣。辦現代的高等學校好比指揮海陸空立體戰爭，各方面的知識都需要，比打游擊復雜得多，高等學校問題很多，幾個蘇聯專家不頂事。我系來過三個專家，在蘇聯有多大的地位？來我校真了不起，一個蘇聯講師到中國來比100個中國的教授專家還高明。大家體會體會，中國專家不是沒出息，不過是條件差，在美國的楊振寧、李政道等，最近獲得愛因斯坦獎金，這說明他們的科學成就說已經超過國際水平。但請問是我國培養的嗎？不是、是美帝培養的，我們應當向各方面學習好的經驗。目前，國內很多畢業七、八年的助教、講師，在科學研究上有困難沒有，恐怕是相當糟。這和外行領導有着密切的關係。我贊成民主辦校，與教授治校結合起來，應當在黨的思想領導下，用民主辦校的形式達到內行治校精神。我們都贊成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這還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因此黨的思想領導是不成問題的。民主辦校主要就是反對包辦。連教授也不能包辦。

大學裏應當有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全國最高的權力機關一樣的機構，這樣一個學校行政機構應當包括校長、教務長、系主任、教授代表、講師代表、助教代表、學生代表、工會以及各黨派（包括共產黨）的代表，這裏共產黨是與其他黨派平等的身份來參加的。在這最高的學校行政機構中，所有的代表都是平等的。那麼如何保證黨的领导？在這裏得到貫徹的必然是正確的思想，參加的都是有判斷能力的，人人都心向共產黨，共產黨的思想領導必然能夠得到這些有腦力會分析的人的支持的。假若說這是篡奪領導權，那就是“家天下”思想。我認爲這會督促黨以正確思想領導。校長、教務長、總務長、系主任都應當是教授，副校長、副教務長、副系主任可以是副教授，教研組長是教授或副教授。這樣就能貫徹教授治校的精神。常言道，老馬識途。

在高等學校中教學的問題上，教授總有些經驗。可以在大機構下成立各種不同的專門委員會來解決專門性的問題。祇有這樣才能領導起來。外國的大學校長都是教授、舊中國的大學校長也常常先有教授聘書，而行政職務往

往是兼職。今天這一點我們就沒有向蘇聯學習。莫斯科大學校長是一個數學專家，他同時是數學系的教授並兼職教研室主任，他講課並領導科學研究，還帶有研究生。一個有法制的學校裏經常的事情全由教務長、總務長分別負責。我們國家裏常使民主與集中分家，討論可以民主，集中我自作主，你們討論，我要如何辦就如何辦。現在我們學校何副校長很可以做一個教授。何副校長經常參加高級會議，他掌握頭號材料，能作很漂亮的政治報告。他如講政治課要比小助教照章宣讀不曉得好多少倍了。其他不够教授資格的領導人應當好好學習。我們學校好些領導懶于學習，忙得不堪，而毫無成績。過去的總務長張重一教授是個有名學者，為什麼換了，是不是為了好包辦？我所提的辦法不是空想，而是世界各國現行的辦法，請青年助教們考慮一下，你們能不能搞研究？為什麼資本主義國家大學能够在三年中培養出博士？是不是我們的教育領導錯了？是不是中國共產黨一定要打倒老知識分子，使老教授，翻不起身，豎不起旗幟？把他們踢在地上打滾，叫學生整他們，使現在老教師抬不起頭。

北京醫學院寄生蟲科趙振聲教授，解放時四十來歲精神充沛，三反鬥一下，肅反再搞一下，現在頭發白了，中年人變成老年人了。我們的動研班的寄生蟲課原來想請他講，因為肅反改變了計劃。現在看看，過去老教授不是病就是衰，每次談到三反肅反運動，祇有青年鼓掌。現在到了批判那些運動的時候了，最高領導應當對肅反這些運動重新估值，不然就很難令人服氣。肅反中十個鬥錯九個，這能說是偉大的肅反運動嗎？希望最高領導作合理總結。分別道歉不解決問題。如報上一個笑話，一個洗染店員把顧客的衣服燙個窟窿，說聲道歉之後又理直氣壯地說顧客沒有政治修養。這怎能完事？應當認真承認錯誤，祇有這樣才能建設社會主義。

《師大教學》130期《黨委制已形成了包辦，黨委治校既不合理又不合適（武兆發在6月1日生物系全體教職員座談會上的發言）》：

陳先生說教授治校要打架，我剛才所說的是“達到教授治校的精神”，也就是內行治校。這不同于過去的教授會。請問教學人員中教授內行是講師、助教學生內行？黨的領導我是指黨的思想領導，不是黨的具體領導，黨委制已經形成了包辦。所以要求校長、總務長、教務長也是教授，就是要體現內行治校的精神。總務長也要教授或副教授，因為祇有他懂得教學，才能做好輔助教學的工作。學校有制度就不需要那樣多的人，如莫斯科大學校長也有

時間進行教學的研究。法制對於辦學很重要。中國舊大學原來有辦大學的種種條例，可以作參考，加以適當修改，有了辦事條例，各種有關教學的事情教務科人員就可以辦了，不一定校長、教務長、事必親躬，一切應當有職有權，層層負責。像陳校長祇需參加幾個大會議，小的委員會可由其他長領導、校長、教務長、各系主任都可輪流任職可以由教育部任命，也可以民主選舉。陳先生說有的民主人士經過鬥爭使自己有職有權了。試問這樣做到的有幾個？有多麼難？“篡奪領導權”和“反黨”的帽子可是好戴的？這樣做不行！我們還是爭取法律保障，全國一致好一些，否則給“反黨”的帽子戴可吃不消。

黃月華先生問：照武先生的辦法，黨委會要不要？

武先生接着說：黨委會是黨的組織，學校委員會是行政組織，黨領導全國人民革命成功，應當受全國人民的感謝。但在建議社會主義的偉大工作中，黨能完全包辦嗎？我認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領導全體人民的是建議社會主義的思想不是教條，而是結合中國實際的東西，家天下思想，應當永遠取消，它不是人民希望的，也不是黨最高領導希望的。

陳昭熙先生接着說，剛才武先生說黨是思想領導，那麼黨做麼具體工作？感到抽象。

武先生說：黨委治校是既不合理又不合適，共產黨最高綱領就是通過社會主義達到共產主義。我所說的領導思想就是這個，這個共產黨的領導思想，各民主黨派都接受，思想領導很明確了。

### （五）清算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中的罪行

章伯鈞是從源頭上對“黨天下”來一個“摻沙子”；而被毛澤東包辦的“章羅聯盟”這場婚姻中的另一角色羅隆基，則是用“平反委員會”來清算黨天下罄竹難書的罪行。對於右派理論，儲安平 and 章伯鈞是無獨有偶，再加上羅隆基便形成鼎足而三：黨天下；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九三學社副秘書長李毅說，我們社會主義學院現在就有好幾個同志睡不着覺，心裏打鼓，放吧不敢，不放吧，悶在心裏難受。有人說，領導上應該從政治上，組織上作出進一步的保障，有人希望毛主席撐腰，公開講講不準打擊報復。

據此，羅隆基說：“要毛主席出來講話保證，那是笑話。要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具體方案，就是由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委員會成立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過去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偏差，它還將公開聲明，

鼓勵大家有什麼委屈都來申訴。”他認為這樣做有三個好處：“一，可以鼓勵大家提意見，各地知識分子就不會顧慮有話無處說，而是條條道路通北京了；過去的‘三反’、‘五反’、‘肅反’雖然有很大的成績，但是也發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講話。有人擔心在這次的‘鳴’和‘放’以後，還會有‘收’和‘整’。在過去運動中受委屈的，要給他們平反，就可以使他們減少同黨和政府的隔膜。”“二，平反的機構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肅反’的原領導機構分開。這幾個運動過去是共產黨領導着搞的。平反時，除了領導黨以外，還應該由各民主黨派人士參加，說明運動有成績，也爲受了委屈的人解決問題。受委屈的人，不祇各民主黨派的，其實共產黨內也有。三，現在誰都不能保證在下級機關裏不發生打擊報復事件，有這個機構，敢打擊報復的人，知所畏懼；受到打擊報復的人就有路可走，他們可以提出控告。”“地方人代會和政協也應該成立這樣性質的委員會，使它成爲一個系統。”（《人民日報》5月23日）

這個問題是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過的；搞錯了的要平反。毛祇是想抓幾個典型，平平反做做幌子，以收到殺也英明、放也英明，吾皇萬歲萬萬歲之萬民擁戴。如果來真的“有冤伸冤”，那麼，斯黨也而有斯領袖也的黨天下能還得起這筆錢債、物債、血債、淚債嗎？祇說殺人一項，不說更多的勞改、勞教、管制、批鬥……毛就像按比例劃右派一樣，搞的是按比例殺人。1951年4月30日毛親手所寫的《轉發西南局關於鎮反問題給川北區黨委（胡耀邦）的指示的批語》：“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不應超過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有特殊情況者可以超過這個比例，但須得中央局批准，並報中央備案。在城市一般應少于千分之一。例如北京人口二百萬，已捕及將捕人犯一萬，已殺七百，擬再殺七百左右，共殺一千四百左右就够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頁267）

那時報紙上正在猛批“寬大無邊”的右傾思想，幹部都是以殺人不眨眼以示其革命堅定性的。我家那個八百多人口的村莊，殺了一個“偽鄉長”，兩個“投敵民兵”，兩個“地主狗腿子”（他倆的罪行是，揚言“國軍打回來再說”。）定比例本已非法，何況從來都是超額有功，下面總是超額殺人、爭相立功呢！當年羅隆基斥責國民黨：“如今的黨治，在內政上以黨治國，以黨亂國；在外交上以黨治國，是以黨亡國。”（《新月》第3卷第12號）這是公開發表在《新月》上的，所以蔣和毛對他反對一黨專政的政治理念都

很摸底細的。這就是他雖然反蔣，蔣介石還給他部長當，國防部、外交部之外任他挑；而他擁毛、擁共，毛共却没有讓他當部長，出于無奈，才從林業部分出個森林工業部讓羅當部長，隨後他劃右派，這個部便也撤消了。

《新聞日報》編輯部揭露王造時透露給該報副總編陸詒的訊息：羅隆基聽完毛在最高國務會議的報告後，說：“到現在再來提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足證共產黨統治中國這幾年到處都是錯誤。”《人民日報》7月5日對鬥爭會的報道，標題是《羅隆基說：足證共產黨統治中國處處是錯》。當然，這也“足證”：成立“平反委員會”系統是絕對必要的；而所有當時的鳴，放，總括地說是“足證”了“足證”。同時，所有對“足證”的反駁，你找不出一件不是虛偽的、強詞奪理的、能經得起歷史檢驗的。

盧鬱文，小醜一個，固不足掛齒。吳晗，歷史學家，飽學之士，就是他能把不存在的東西巧飾成“事實”，胡說一起：“章羅兩人原來是兩個把頭，爭名奪利，勾心鬥角，互不相下。過去，他們之間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在盟內爭地位，爭各自黨羽的安排，建國以來，章羅在民盟中央，除了鬧人事糾紛以外，從來也沒想到要替人民辦點好事。突然一年多以前，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之後，在匈牙利事件之後，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口號提出之後，他們對國際和國內形勢的估計，以為要變天了，共產黨站不長了，民主黨派大有可爲了。章羅兩個多年冤家突然變成‘章羅聯盟’了，兩個人此唱彼和一鼻孔出氣了，一個腔調說話了。”（《人民日報》，7月16日）

可是，當迷霧澄清，真相以“章羅聯盟，天下奇冤”載入歷史時，歷史學家吳晗又該怎樣向歷史作交代呢？早在毛捏造“章羅同盟”罪名前20天，吳批“平反委員會”：“這個意見涉到兩個問題：一個是他對黨領導的三反、五反、肅反等機構是不信任的。一個是他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樣一個最高權力的立法機關、全國政治協商委員會這樣一個協商機關，下降或者改變爲司法行政機關，這和這兩個機關的性質是不符合的。”可是，即便在被毛背信棄義地篡改後而正式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仍然寫着：“我提議今年或者明年對於肅反工作全面檢查一次，總結經驗，發揚正氣，打擊歪風。中央由人大常委會和政協常委會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員會和政協委員會主持。”試問：毛澤東的意見涉不涉到這兩個問題？這不啻是吳吃了毛一記耳光。“不啻”還非真的，真的是毛通過批《海瑞罷官》一耳光打得他命歸西天。因爲他死前頓悟到“悔不當初”，咬破舌頭寫了這



四個血字，所以能“立地成佛”。佛說，縱有彌天大罪，也抵不住“悔改”二字。

史良的賣友叛盟，比吳晗有過之無不及，她的發言可以說是司法部長對“章羅聯盟”下的判決書：

章羅聯盟的反動綱領是什麼呢？主要是：一，他們宣揚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主張民主黨派和共產黨輪流執政，反對我們國家政治體制和基本政策，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制；二，他們反對黨對國家事務的領導，首先是反對黨對知識分子和科學文教事業的領導，要黨的領導退出高等學校，退出科學文教機關；三，他們反對黨對民主黨派的領導和監督，篡改民主黨派的政治方向，利用民主黨派組織作為向黨向人民向社會主義進攻的工具；四，他們抹殺社會主義建設的輝煌成就，否定黨所領導的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和肅反等歷次革命運動的偉大功績，煽動反黨情緒，企圖倒算翻案；五，他們在知識分子中間宣傳資產階級的民主個人主義思想和資產階級的科學文化，反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阻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以及和工農相結合；六，他們篡改《光明日報》、《文匯報》等報刊的政治方向，作為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宣傳陣地，鼓吹資產階級的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七，他們宣揚帝國主義侵略陣營的強大，誹謗社會主義陣營，散布國際局勢緊張的空氣，反對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八，他們實行排斥打擊左派、欺騙蒙蔽中間派、拉攏擴大右派的組織路線，安排爪牙，控制組織，奪取民盟的領導實權，反對民主黨派長期以來發展組織的正確方針，破壞重點分工的協議，招兵買馬，搜羅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參加民主黨派，在民主黨派建立和擴大反動組織基礎等等。”（《人民日報》，1958年1月26日）

她在文革中雖苟活下來，但也受到猛烈批判和人格羞辱。1981年12月15日，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史良在中國民主同盟成立四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在反右派鬥爭中批判的‘章羅聯盟’，在組織上是不存在的，各級組織的所謂‘章羅聯盟分店’更是沒有根據的。”“反右派鬥爭擴大化造成了不幸的後果，民盟中央是有責任的，我們將從這裏以及從其他的‘左’的錯誤中，吸取必要的教訓。”（《中國民主同盟盟員手冊》第44頁，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編，1982年5月）

《光明日報》6月3日載：陳新桂說，政治運動，成績的取得，是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所以，僅以“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個別的難免的”這個公式

來作結論，未必一定正確。過去幾次運動產生的副作用太大，最嚴重的是助長了唯心主義。比如，不從調查研究出發，事先擬定打擊的對象的數字，對運動採取寧左勿右、否定一切、大膽懷疑的辦法，等等，都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不相符合，與實際情況大有出入。歷次政治運動還產生一些副作用，如人爲地製造了“牆”和“溝”；把人分爲“積極分子”和“落後分子”。運動中涌現出的“積極分子”有的是以片面地反映和密報別人的問題而獲得這個稱號的。所以，有的老教授說，他們是“靠運動吃飯”。另外，在運動中也有的人養成看行情辦事。有人這樣說過，在運動中“要避免挨打，就得打人”。這些人簡直是敗壞社會道德。

在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編《右派言論選集》中，載有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程千帆的言論：

總說三反、思想改造的成績是主要的，偉大，偉大個屁！我在北京碰到很多人一說起思想改造就搖頭，什麼“成績是主要的”，趕快收起吧！三反思想改造的時候，要我作檢討，撤我的職，都是當衆搞的；徐懋庸（黨委書記）撤職，若干黨員在這件事上作檢討，却是悄悄地搞，待遇太不公平……三反，思想改造的檢討是苦打成招，我不承認，要重新寫過。

我們歷次運動中常常捕風捉影，就去搜家，結果祇道個歉。但有教條主義和特權思想的人，是不知道思想有創傷是不能一下子磨滅的。

法規定人民權利不受侵犯，但民法，刑法都沒有公布，人民無權，憲法沒有保證，這是肯定的違法，是不能保障憲法的實現的。

知識分子迫切要求信任，老是像民族資產階級一樣改造，改造，什麼時候才信任我們。

（毛整人的陰謀爲什麼總能得逞？除了應用毛吃人哲學《矛盾論》加以解答外；被整的對象包括後來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林彪等，都是要把禍水引入別人田。我們尊敬的教授也未能免俗；難道民族資產階級就應該永享“改造，改造”嗎？他們遭遇的災難還不够沉重嗎？同是天下受害者，應同聲譴責害人蟲！）

劉真（徐懋庸的繼任）問向誰爭自由民主，他自以爲問得很巧妙，其實這問題很好回答。向誰爭人權？向侵犯人權的人爭人權。向誰爭民主？向不民主的人爭民主。向誰要自由？向不給人自由的人要自由。現在事實如何呢？選先進工作者，選人民代表都是指定的，這民主麼？三反時 xxx 教授被

叫做 x 犯 xx，隨便把人關起來，這自由麼？

《長江日報》，7月3日載楊展時致毛澤東主席的“萬言書”中說：“我承認，我們黨執政七年，總的來說，成績是主要的。可是，在知識分子政策這個個別問題上，如果不照公式說話，那我就不能不說，缺點是主要的。不！更恰當點說，是失敗的。”“也由於缺乏了解，對知識分子的估計當然也就不能恰如其分。這使我們對知識分子出現了或冷或熱，不知究竟如何措手的情況。有時（這是主要的），感到知識分子思想落後，歷史複雜，政治態度‘不明朗’，心裏一煩躁就扎扎实實整他們一家伙；有時（這不是主要的），感到他們還有點知識，有點技術，對社會主義還可以起到一些作用，則又不免寶貝長、寶貝短的對他們‘統戰’一番。知識分子們被我們一時放在火裏，一時放在水裏，一時打入十八層地獄，一時又捧上三十天。入地時，滿肚子委屈牢騷，深悔當時自作聰明，‘沒聽朋友的勸告到國外去看看風色’，痴心妄想跟着共產黨跑了一場，還是不免頂着一個‘反革命分子’的下場。不但自己死了不清白，連妻子兒女也抬不起頭。上天時，心驚膽戰，不知何年何月‘龍顏大怒’又一個倒栽蔥摔了下來。7年以來，他們像童養媳婦在阿婆手下過日子一樣，提心吊膽，戰戰兢兢，說起來是‘一家人’，實際上却不得不小聲小氣，輕手輕腳，處處看顏色行事，憑這樣還惟恐自己出差錯，惟恐被家裏人抓住小辮子。”“按照我們黨的估計，知識分子似乎祇是一個愛國者。他們愛祖國，可是留戀自己在舊社會的地位，向往着資產階級民主，而對我們黨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並不熱心，有距離，甚至反對。”“這個估計是很不正確的。”“正是因為這個估計錯了，才使我們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全部都錯誤了。”

“在一種強烈的、莫名其妙的、十足十足的宗派情緒的支配下討厭他們，冷落他們，處處用懷疑不信任的眼光看待他們，甚至一足踢開他們。而尚以為未足，並通過歷次社會改革運動一次、加次、三次殘酷地打擊他們，惟恐斬殺不絕，千方百計地從精神上加以折磨：農民所不忍施之于地主的，我們悍然施之于知識分子；工人所不忍施之于資本家的，我們悍然施之于知識分子。在這些運動中，知識分子因不勝精神摧殘，不勝鬥爭之辱，不勝我們的‘董超薛霸式的幫’，跳樓、赴水、仰藥、勿頸、投環、切腹而死的，擢發難數！毫髮無逃，孕病不免（華南師範學院在肅反運動中有五尸六命的事），天神共憤，道途咨嗟！把我們這種屠殺的方式和法西斯強盜奧斯威辛的方式相比，我以為奧斯威辛的不但顯得拙劣幼稚（無論如何，總還得劊子手親自動手），

且倒還幹脆仁慈！如果說，斯大林同志不免因為他對同志殘酷屠殺而逃不過歷史的斥責，我看，我們黨也很難不因對已經‘歸順’了我們的知識分子的屠殺而受到歷史的斥責。我黨之屠和暴秦之坑終將同成為歷史上兩大無法湔滌的污點，不能不使人萬分痛心！（于此，我們却聽見臺灣的熱烈的掌聲！）”

“可是，我們還居然心安自得地說：成績是主要的！”

范樸齋說：“有人說：‘一系列的運動、改造，有的人把人性也改掉了。’這豈是我們改造的目的？但他們不敢分辯，說道理也說不通，祇好忍受。許多人由此逐漸產生了消極情緒，這也錯，那也錯，感到人性喪失，見人低頭，還有什麼生活意趣呢？”（《光明日報》，6月5日）

大連工學院講師彭聲漢在中共旅大市委宣傳會議小組會上說，民主的實質在於思想應絕對自由（表現在我憲法上就是言論，結社集會的自由），組織上則少數應服從多數（投票選舉政府）。有人說：“過去有些事情民主少了些，集中多了些，並不是不民主。”又說：“今後應在民主與集中之間尋求一個適的比例”——這是在玩弄名詞，在耍花樣。過去不民主，就應該老老实實承認錯誤。肅反是對自己人專政。所謂“肅反走的是群眾路線”，群眾是誰呢？我把它大致分為四種：打手；走上風的；走下風的；被鬥的。如果硬把它說成是群眾路線，那亦不過是“打手”路線而已。肅反鬥爭拆散了多少個幸福的家庭，摧毀了多少堅固的友誼。在和平時期發生這些事情是很反常的，它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遼寧日報》，6月8日）

北大俄語系教授魏荒弩批評道：“中央決定肅反對象有5%，這是太主觀了……這樣就產生了超額完全任務的現象……許多人被迫自殺，但還被扣上畏罪自殺之名……肅反是集反憲法之大成。”“肅反運動是歷史上最大的文字獄。”

北大哲學系李華榮同學在大字報《重新估價肅反》中說：“肅反有如下缺點：1. 侵犯了一些公民的基本權利，如鬥錯了人，關錯了人，迫害了人，迫死了人；2. 破壞了法制，損害了憲法，損害了民主自由，如限制一些公民通訊自由、人身自由、無根據的搜查、看禁和逮捕。3. 促使了黨員與非黨員之間的牆更高、溝更深，少數黨員在肅反後，在人民頭上高視闊步。4. 摧殘了人們應有的感情，破壞了多少家庭幸福，拆散了多少鴛鴦，損害了多少友誼……”

有人揭發浙江省文聯主席宋雲彬跟他說過：“土地改革搞得糟，文化事

業慘遭破壞，許多民間藏書幾乎被燒光，這等于始皇焚書坑儒政策。龍泉拆塔事件後，說這是共產黨破壞文物作風的沿襲。他還對我講過：肅反中出了許多亂子，到處逼死人命，在溫州我的一個朋友被逼自殺了！”（《浙江日報》6月27日）

鑽屁股蝨郭沫若，無孔不入，連宋雲彬也不放過。他發言的效應應是刺激別人的嘔吐神經：“革命的破壞在在所難免的。經歷一次像土地改革這樣偉大的革命運動，古書文物哪能沒有一點損失！中國地方大，文物多，保護起來，很有困難。而且是否一切古物都碰不得，也值得研究。譬如城牆，在中國幾乎到處都有，往往一個小市鎮也有城寨。除了必須保存，可以保存者外，我看有很多城牆是可以不必保存的。凡是古物一律都動不得的思想，是一種封建的拜物狂，偶像崇拜的思想。宋雲彬把龍泉拆塔事件誇大起來，好像天下文物都被共產黨破壞了，這樣看問題是不合邏輯的。”（《人民日報》，9月30日）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歷史和邏輯是一致的。文革中文物遭到浩劫是歷史事實，但却不合郭氏“邏輯”。反倒郭的談話合乎了毛澤東夫子自道的邏輯：“祇有不要臉的人們才說得出不要臉的話。”（《毛澤東選集》四卷本第677頁）

## （六）呼喚法治

如果在一個政黨內，在一種情況下你通過陷害別人就能撈到甜頭，在另一種情況下就輪到另外的人通過陷害你來撈甜頭了。例如賀龍，據傳說是他殺掉王實味的；而他維護的這個說殺就可以隨便殺——用周恩來說毛澤東的話：“把殺人當兒戲。”——的吃人制度和吃人毛王，却讓他死得那樣悲慘，殘無人道。劉少奇也然。毛澤東的“總管”葉子龍，由于宣揚毛的桃色新聞，讓劉知道了。劉說：“這是污蔑我們黨，把他拘捕，槍斃。”（《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322）難道毛不是淫棍嗎？再說，劉個人有權一句話就槍斃葉嗎？這就涉及到法治的問題。

1958年，毛在總結反右經驗時說，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的一套。不能靠法治多數人，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韓非子是講法制的，後來儒家是講人治的。我們的各種規章制度，大多數，90%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劉也說：到

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法律祇能做辦事的參考。（馬齊彬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第138頁；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65頁）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劉少奇主席殘酷迫害，直至慘死，“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恐怕是，對法律連“做辦事的參考”也沒參考。

從人類的歷史和我個人的經歷中，屢試不爽的是：歷史的戲劇性在於“請君入瓮”。許多人在制“瓮”，燒“瓮”，滿以為祇供別人入哩！海外就有這麼個人，他胡充八當，顛倒是非，想通過誣陷正直的李志綏先生，把《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誣陷為毒草，來作政治投機生意，想讓中共視他為香“花”；但他沒有想想：你有什麼資格否定那本《回憶錄》？你想了沒有：最有發言權的張玉鳳為什麼沉默不言呢？你還是好好照照歷史的鏡子吧：瓮正在燒得火紅！料你也比不過劉少奇的功高望重，吳晗的真才實學和對中共忠心及貢獻大吧！祇憑你拍拍馬屁，扯扯謊，撩撩炮，為醜惡的毛澤東做的那些男盜女娼、鷄鳴狗盜的醜事遮遮醜，就想投機取巧撈到稻草嗎？你恐怕到入瓮時都不配學吳晗的醒悟：悔不當初！你也許可以醒悟過來這一點：“原來這個‘瓮’就是我想當香花的焚尸爐！”

一個真理，對好人壞人都是一視同仁的，“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的。本·拉登這隻“瓮”，本是美國燒紅它對付蘇聯的，現在讓美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還在受着付出更大代價的威脅。這就是“客觀規律”又叫做“必然規律”的道理。任何人，好人和壞人，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必須考慮進去這一點。

左派們，作為黨天下的既得利益者，把呼喚法治的右派打翻在地，當年是何等地興高采烈！當風水輪流轉到他們入瓮時，血色恐怖又是何等慘烈！喲！法制這個東西原是如此地必要！原北大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成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打倒對象。大難未死，文革後他對劉少奇被毛整得慘死一事感慨系之，說：“社會主義沒有法制不行啊！”說完眼淚奪眶而出。但連劉少奇在內，都是贊成“人治”的呀！“治”別人時是無所謂的，你陸平是因江隆基在北京大學當黨委書記祇劃了6.5%的右派，中央嫌他反右不力，讓你取而代之，你是寧左勿右，草菅人命，劃了700極右派，800中右，合計占到15%，拿着老年學者、少年學子的鮮血染紅頭頂的。過去的事權且既往不咎，都算拉倒，念你總算認識到：“沒有法制不行啊！”這比起“悔不當初”來，還差一個臺階，望能繼續加勉。

衆所周知，毛死後鄧小平、彭真在法制建設上做了許多亡羊補牢的工作。但當人們歌頌“英明”、“開明”的時候，却忘記了當年右派們為建議他們曲突徙薪而付出了“身敗名裂”、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何等慘痛的代價！

民革中常委譚惕吾（至今我還憶起林希翎口口聲聲贊佩這位民主人士是個真正愛國的老太太）在民革中央小組擴大會議6月5日的發言，從法治的觀點，比較系統地提出四個問題：

第一個是共產黨領導國家的方式問題。現在政府有套機構，黨內又有一套機構，這是雙軌制度。原說黨是抓思想和政策的，實際上已超過這個範圍，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政府部門却没有權。黨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指示，是由于國務院單獨發指示不管用。既然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為什麼自己專政的機構不用，而要削弱其職權，另在政權之外來搞一套黨的系統呢？第二個問題是黨的政策應如何體現。黨應該把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會制成本法律，再由國家管理機關根據法律制成各種法令，通過法律、法令的實施，體現黨的政策。不應在法律、法令之外，再發內部指示，以指示代法律、法令是不可以的。第三個是黨遵守憲法和國家制度問題。黨制定政策，應在憲法範圍之內。中共中央應檢查在制定的政策中是否和憲法中有抵觸的！如上海將私營房產商和私營經租公司及屬於資本主義經營性質的房屋納入社會主義改造範圍是完全正確的，是符合憲法的。但是在工作中把個別的作為生產資料的房屋和作為生活資料的私人住宅納入公私合營是和憲法第十一條的規定不符合的。關於國家制度問題、司法、律師，檢察是對執行國家制度起杠桿作用的，這三者在一黨委領導之下是不好的。黨可以派黨員到司法、檢察等機關去擔任負責工作，但這些部門不應該由一個黨委領導。第四個問題是怎樣使共產黨接受全國人民的監督。政府受人民代表大會監督，但是共產黨不受什麼監督；應該建立制度使人民監督共產黨。

當年共產黨把這些意見當成是惡毒進攻，現在再也無話可說，不！倒是要把這些話從自己口中重復一遍，拿來炫耀自己開明，自己與時俱進！

另一位民革中常委劉斐早在5月30日就談到黨政不分和法制建設問題。

黨和政是兩個性質不同的系統，黨是領導國家事業的核心，但是，黨領導要通過國家機器去實現，黨不應該代政。黨政不分現象產生的原因，主要是建國不久，法制尚不完備，某些高級幹部和許多中下級幹部法制觀念薄弱，以及缺乏民主作風。黨中央對這方面的情况重視不夠，也不無影響。要改變

## 還原 1957

---

這種情況，除進行思想整風之外，還必須加強法制思想教育，迅速制定必要的法律，健全各種必要的制度，尤其是人事制度，以劃清黨政關係。黨員應以身作則，尊重國家的職權，不然，整風雖能收一時之效，却缺乏經常的法制保證。

這些話說得何其正確！讓現在的年輕人看了，一定認為是“鄧小平語錄”，哪裏能想到這就是“罪該萬死的右派，猖狂進攻的謬論”！這裏說明三個問題：一是資產階級右派是促進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先進分子；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是倒退派、反動派；反右派運動對知識分子的血腥鎮壓，是一場絞殺真理的運動，是阻擋歷史前進、開歷史倒車的反革命運動。二是鄧小平原是反右急先鋒，現在又成了右派的不孝子、不賢孫。在他大量剽竊右派的聲聲含血、字字含淚的各種觀點後，反咬一口說：“反右是正確的，必要的。”你祇用看看他關於體制改革的講話，看看有幾句話不是 1957 年右派曾說過的？三是說明，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個什麼世道？一位沒有劃為右派的明哲保身老教授教訓我：“你認為是真理，在心裏相信就可以啦；何必說出口呢？有一張大字報是反對蘇聯侵占中國大片領土和抗戰結束進入東北大肆奸淫擄掠的。我何嘗不知道？但我就是不簽名，結果簽名的 30 位師生都劃了右派！我為什麼不簽名？堅持真理是要付出代價的呀！要批你！要鬥你！要你入監！要用火燒死你！即便我有勇氣付出這樣的代價，我的妻子，我的兒女，我的兄弟姐妹，我的老爹老娘也決不答應！中國啊，人心世道！不光你一人，還要株連一大堆啊，何止十族！”所以，在我對“犬儒主義”反對之餘，我也常想：是不是應該首先考慮消滅掉那個讓人們祇要堅持說出哪怕祇是一句政治常識性的真話、就得堅持“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才行的社會呢？這個社會除了毛澤東思想的光焰無際外，要想看到任何別的思想的光焰，恐怕就祇能從右派言論中尋寶，或從專政機關的判決書及其證詞中連泥帶血挖掘了！

《人民日報》，7 月 19 日專門發社論《黨不能發號施令嗎？》批駁黃紹竑 5 月 16 日所作黨政關係的發言。他實在是很尊重中共的，他說所以提黨政關係，絕不涉及黨的領導權問題，而是領導方法問題。黨直接向人民和政府發號施令，各地方或機關黨委五人小組在肅反運動中直接處理案件，黨政共同發布決定，這樣對於動員全國人民完成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是有妨礙的。



這次會上他還談到法制問題：

我們的立法是落後于客觀形勢的需要的。刑法，民法，違警法，公務員懲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經濟方面法規更不完備，五年計劃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條例還沒有制定。公務員懲戒法和各機關的組織條例辦事規則是與整風最有密切關係的法規，必須早日制定。

最後談了兩個具體問題，一是受勞動教養的據說有兩萬人，大多數是機關幹部，知識分子，他們既够不上刑事犯罪，已經教養了一年多，應該定出一個整個的解決辦法，不宜拖下去。另一是有些國民黨人對革命出過一些力，但因歷史的關係被懷疑，判了重罪，希望徹底檢查，無辜的平反，歷史上有罪的應酌情處理。

1949年4月25日，由毛澤東、朱德簽發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茲特宣布約法八章，願與我全體人民共同遵守之。”其中第五章宣告：“除怙惡不悛的戰爭罪犯和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屬國民黨中央、省、市、縣各級政府的大小官員，‘國大’代表、立法、監察委員、參議員、警察人員、區鎮鄉保甲人員，凡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者，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虜，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責成上述人員各安職守，服從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負責保護各機關資財，檔案等，聽候接收處理。這些人員中，凡有一技之長而無嚴重的反動行為或嚴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準予分別錄用。”（《毛澤東選集》四卷本 P.1347）這個約法就是法律。

黃紹竑說的國民黨人是對革命出過力的，都判了重罪，一般的情況之慘就可想而知了。鎮反中，一汽車、一汽車拉出去槍斃的，大多屬於約法八章中所謂三“不加”的，據說是一共槍殺了500萬反革命分子；而判刑，管制的更是不計其數。這些是明牌。1955年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所謂歷史反革命分子，即便無任何“罪惡”，祇要是達到某一任職（軍隊連長、警察巡官、憲兵尉級以上，縣政府科長、鄉長、縣參中議長以上，國民黨區分部委員、清團區隊長以上等）便是。肅反運動中凡是符合這樣標準的，皆屬正確；另有鬥錯的，朱正先生在《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一書中，通過官方資料推算，錯鬥率大致是超過94%。你就可見，肅反成績不是毛澤東說的“九個指頭”；他說的生瘡的、爛掉的即所犯錯誤，倒是占九個多指頭，成績祇占半個多指頭。毛澤東憑借着身後的幾百萬“解放軍”和幾百萬“公安局”，就可以大放厥詞，他在上海幹部會議上洋洋得意地說：“我們

有許多話他們不聽。所謂不聽，是什麼人不聽呢？是許多中間人士不聽，特別是右派不聽。中間人士將信將疑。右派根本不聽，許多話我們都給他們講了的，但他們不聽，另外搞一套。比如我們主張‘團結——批評——團結’，他們就不聽。我們說肅反成績是主要的，他們又不聽……”（《毛澤東選集》五卷，446頁）誰聽這些拉屎放屁的話呢？中間派和右派都不聽，唯有左派聽。當然，許多左派也是耳聽、心並不信的。左派之所以是左派，必須具備的第一個條件就是徹底昧良心。如果你在哪一點上不昧良心，那麼，你在那一點上就不是左派，就有可能栽跟頭。請對證歷史，看是否全是這樣？

12月12日，《人民日報》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賈潛的右派言論：“政策是政策，法律是法律，我們是司法不是司政策。”打着“法律科學”的幌子販賣舊法觀點，片面強調“有利被告”，“無罪推定”，“自由心證”等主張，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減輕或開脫罪責。他們在審理案件時，對於有罪的人首先要求從“無罪”方面來考慮，對於有嚴重罪行的人首先要求從“減輕情節”方面來考慮，對於犯有死罪的人首先要求從“可以不死”方面來考慮。該報12月24日又揭露他說過：“黨對法院工作的領導是通過制度、法律來實現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黨的意志，審判員服從了法律，就等於服從了黨的領導。因此，審判員祇需服從法律，再不必有什麼黨的領導了。黨具體過問人民法院審判工作就是違法。”

復旦大學法律系教授楊兆龍在5月9日《新聞日報》發表的《我國重要法典何以遲遲還不頒布？》指出：社會主義的建設，並不是單純的物質建設，非物質建設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社會主義的法治和社會主義的民主。其中第三節寫道：

我們過去在立法方面的努力實在跟不上實際的要求。例如，平常與人民的基本權利的保障及一般社會關係的調整最有密切關係的刑法典，民法典，民事訴訟法典等至今還沒有頒布。什麼是合法的，什麼是違法的，什麼不是犯罪，什麼是犯罪，以及應如何處罰等等，在好多場合，一般人固然無從知道，就是偵查，檢查，審判人員也沒有一明確的標準足資遵循。這就使得我國法律制度的建設，在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中，變成了最薄弱的一環。上述這些法律的不及時頒布使大家不能于事前在這方面得到應有的教育。因此就發生一些無根據的控告和不應有的錯捕、錯押、錯判的情況。無論在刑事或民事方面都難免使壞人感到無所顧忌，好人感到缺乏保障，因而引起不必要的

矛盾。在過去的七、八年中既沒有及時地頒布過一部完整的法典，又沒有設法彌補這個漏洞（如由主管部門頒布一些有系統的條例規程等，使許多事情長期沒有法規可以遵循，因而造成某些混亂現象，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嚴重的事態。這種情況，如果繼續存在下去，很可能成為制造不安與矛盾的一個重要因素。

他認為，領導上錯誤的指導思想是造成立法進度遲緩的原因：

如，一位高級幹部曾說過，誰主張立法，尤其主張及早系統地立法，就是“舊法”或“六法”觀點，甚至於就是立場有問題。又有人認為，“祇要懂得‘政策’，有了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就可以解決法律問題。”又有人認為如果制定一套完密的法律，難免限制政府機關應付事情的靈活性。

楊教授認為這種無明確的法律限制的辦事的“靈活性”有時足以破壞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治，因而影響人民對政府的信仰。

《人民日報》6月26日載，老記者、九三學社北京分社宣傳部長顧執中的言論：“憲法自1954年通過以後，有的被徹底破壞了，有的有名無實。”“第89條規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經法院決定檢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而肅反時的行動證明這一條全被破壞了。第87條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事實都沒有得到保證。”“集會結社的自由更少，許多人民團體幾乎都是官方包辦。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黨派？憲法沒說不行，但事實却沒有人敢大膽的做。”“大家都把憲法當做一張紙，通過後也就算了……現在從劉委員長到一般公民誰也不提保護憲法了。這樣下去，把憲法當成了手紙，亂關人、亂捕人、拆（私人）信等等，都可以為所欲為，將來何堪設想？”

《人民日報》6月29日的社論《再論立場問題》，是專為顧執中的兩句話而寫的：“廣大群眾對於右派分子的態度是堅決的，立場是明確的。他們看了本報在本月八日以來的一系列反擊右派分子的社論，覺得久旱逢甘雨一般地高興，因為這些社論支持了革命的正氣，打擊了反社會主義的斜氣。但是有一部分人的論調却完全不同。他們看到報紙上的讀者來信、工人座談和反擊右派分子的社論，馬上大驚小怪起來，說什麼報紙的態度變了呀，恐嚇信值不得小題大作呀，恐嚇信和讀者來信還不知是真是假呀，葛佩琦祇是態度偏激、儲安平無非是想出語驚人呀，就是反社會主義也不該一棍子打死呀，如此等等。在這類論調中，顧執中先生的兩句話特別有意思：‘群眾有些左，《人民日報》又有些右。’這兩句話所以特別有意思，因為其中所說的‘群

衆’，所說的‘左’和‘右’意思都同一般人的了解截然相反。在這裏真可以說是没有共同的語言了。”“在顧執中之流看來，什麼是‘群眾’呢？那就是一小撮反群眾的右派分子，還有就是一時分不清是非而跟了右派分子走的少數人；至于起來批判右派分子的人民群眾，那是被取消了稱爲‘群眾’的資格的。至于什麼是‘左’，什麼是‘右’呢？在顧執中之流看來，儲安平、葛佩琦等人的言論就是‘左’，而批駁這些言論就是‘右’，或者叫做‘氣量不大’。顧執中接着說的一段話可以作爲注脚，有些人‘雖然知道大鳴大放不應越出擁護共產黨和建設社會主義這個軌道，但在講話時，控制不住感情，不免有越出軌道的地方。’……那麼，顧執中所說的‘控制不住’的‘感情’，難道不是指着反社會主義的感情嗎？然而他說這就是‘左’！”

是非顛倒，錯作對時對也錯。像其他右的言論一樣，這些法律觀點受到蠻橫無理的糟踏。北師大武兆發教授說：“中國缺乏法制：在三反時有的被拷打逼供，這是什麼行爲？簡直是國民黨的特務行爲。固然在三反時還未制定憲法，這些可以不必深究，但在憲法制定之後的肅反運動中出現大量侵犯人的自由的情形，這不是犯法嗎？”（《師大教學》124期）

6月26日，周恩來在一屆人大四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們在頒布憲法前後，已經制定了許多重要的法律。”——用“事實”批駁了“有些人所說‘完全無法可循’。”

10月4日《人民日報》載，中國政治法律學會理事會副會長吳德峰在中國科學院召開的座談會上發言：“建國以來，我們國家先後頒布了數件的法規，這些法規，曾經有效地指導和保障了我國各項工作的勝利開展。而右派分子硬不承認這個事實，叫囂什麼‘無法可依’，‘有法難依’，那又是什麼原因呢？原來我們的法律是保護人民，鎮壓反革命分子的，而那些自命爲‘黃文正’（黃紹竑）和‘譚青天’（譚惕吾）所要的却是壓迫人民，保護反革命的法律，自然，這就難怪他們說什麼‘無法可依’，‘有法難依’了。我們應該正告右派分子，你們要求的那種法律在人民的國家裏，是永遠不會有的。”“值得嚴重注意的是，有些右派分子竊據了專政機關的工作崗位，他們不僅到處散播什麼‘無罪推定論’，‘審判有利于被告論’以及繁瑣的‘證據論’等荒謬的有害的觀點，而且還公然以這些論點作爲審理案件的‘理論’根據，利用職權，以各種借口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種刑事犯罪分子開脫罪責，輕縱罪犯（這種事例在不少地區均已發現）。這種情況不僅說

明法學界反右派鬥爭的嚴重性，而且還說明這種鬥爭的更直接、現實的重要意義。”

10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在政法戰線上還有嚴重的鬥爭》：“右派分子爲了抗拒我們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還提出了所謂‘司法獨立’，‘審判獨立’等口號，企圖把司法系統同人民民主專政對立起來。他們說，如果不讓司法獨立就是違反憲法。其實，我們現行的司法審判等制度是完全符合憲法的；倒是右派分子要在我國搬用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的所謂‘三權分立’的做法，這才是真正違反憲法。右派分子自認爲祇有他們懂得法律，他們自稱‘專家’，並且公然說，‘現在誰够條件就由誰來幹’。事實證明，他們除了死守住反人民的舊法觀點以外，對於人民的法律根本無知。”

幾十年前反右，共產黨無理取鬧；到如今，不大打自招得比右派“污蔑”的還惡毒：官方像說順口溜似地說：“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糾”，同時又把“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定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裏。誰能說清楚，這到底玩的是什麼鬼名堂？過去把陰謀說成是“陽謀”，這個騙術已成爲歷史的笑柄；現在，陽的一套：明文上攔了《人民日報》社論和一些極左分子的耳光，規定“獨立”云云；而陰的一套：相對於作爲法律太上皇的各級中共政法委來說，不是完全獨立，也不是部分獨立，而是絕對不獨立。搞陰謀的必然性在於，右派雖然打倒了，但黨主與民主的矛盾非但沒有消滅，而且日益尖銳。而中共既要堅持黨天下（四個堅持的核心），又要冒充“三個代表”；除了乞靈于毛的陰謀之魂，絕對沒有第二個法門。總之是，中共做壞事必用陰謀手段；反之亦然，用陰謀手段所做之事，全是壞事。江澤民鎮壓法輪功，以妄加莫須有的“邪教”罪名，到迫害修煉者；從逮捕入勞改營，勞教所到進洗腦班洗腦；從活着受虐待，侮辱，慘害，到死後焚尸滅迹；整個過程貫穿着陰險毒辣，陰謀詭計，使國人受害的受害，受騙的受騙。其中，偽造的所謂“法輪功天安門自焚事件”，其惡質天理不容！其手段乃希特勒國會縱火案大陰謀之翻版！在這一點上，跟毛澤東無視法律，肆行人治所搞的歷次政治運動是一相承的。

《南方日報》報道6月5日廣東省人民委員會舉行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以《羅翼群說：人民生活已“接近餓死的邊緣”》（如果不是把羅先生打成

右派，而是採納他的意見，就可能避免把“接近餓死的邊緣”發展到成為餓死 4600 萬人的悲慘現實！——紫丹）為標題，摘登了羅的言論。

由於過去黨員執行政策，偏向西天取經中的“大膽懷疑，殘酷鬥爭”來硬套，而太忽視中國原有的社會道德，政治哲學，歷史習慣等優良部分，因而不少將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當做敵我問題來對待。在“三反”、“五反”、“肅反”期間，被鬥的人因受不了當時的痛苦，明非事實，而被迫承認者有之；有些自稱為積極分子的人，違背良心，歪曲事實，或出頭作證，或非刑拷打，不惜犧牲他人的名譽，地位或生命，企圖取得黨的信任，為爭取入黨入團的捷徑的亦有之。因此，在過去各種社會改革動動中，確不免發生多少偏差案件。

至於他說的“接近餓死的邊緣”，是建議政府學古人省刑罰薄稅斂。現在政府對於徵糧及各種稅收是否過重，徵購農產品價格是否有偏低，國營商品利潤是否過高，這些都是人民生活切身的問題。幾年來究竟有沒有餓死人？可以說沒有餓死人，也可以說有餓死人。算不算接近餓死的邊緣呢？是值得檢查研究的事情。如果中共聽羅輩建言，停止“急躁冒進”，從“邊緣”後退，自能少餓死或不餓死人。反右的結果是大躍進，排山搗海地向死亡進軍！喪心病狂的老毛啊！踏着四千六百多萬餓死的屍體，妄想登上“世界革命導師”的寶座！

現在中共中央對大躍進的檔案，剛剛解密，請參看官方公布的死人情況：

1959 年至 1962 年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

1959 年全國 17 個省級地區，有 522 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 958,000 多人。

1960 年，全國 28 個省級地區，有 1155 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 272 萬多人。

1961 年，全國各地區有 1327 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 2,117,000 多人。

1962 年，全國各地區有 7,518,000 多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 1,078,000 多人。

1959 年至 1962 年的人口增長率

1959 年人口增長率為負 2.4%；1960 年為負 4.7%；1961 年為負 5.2%；1962 年為負 3.8%。

全國 12 個縣在 1959 年至 1962 年間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過 100 萬人以上。

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肅省、貴州省、安徽省、青海省等七個省，在 1959 年至 1962 年，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使人口下降了 10% 至百 12.5%。（2005 年 11 月《爭鳴》雜誌）

總計死亡人數為 37,558,000 人。這裏祇有 1961 年和 1962 年的統計數字包括全國各地區；1959 年少統計 12 個省級地區，按當年的省級地區死人的平均數是 307,000 人算，本年少統計 8,904,000 人，故本年度總計當為 14,124,000 人；同理，1960 年度當為 11,963,000 人。這樣算下來，全國總計的準確數目該是 46,875,000 人。（我前面所舉大饑荒期間死人數，來源于此。）

河南省民盟副主委杜孟模揭發主委王毅齋，一說到肅反中的缺點就憤憤地說：“罪惡滔天”。對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十分不滿，謾罵：黨團員帶頭賣餘糧，現在沒啥吃，餓死這些孬孫，活該！”又有人揭發他說過：“統購統銷後農民都吃不飽，人人面帶菜色，說够吃都是瞎話！”謝瑞階揭發王曾說：“我在杞縣認識的熟人都鎮壓完了。”還曾說：“肅反中你們師範學院打人最嚴重，把沈東浦快打成肉醬了，還有一些人，都整得很厲害……”還鼓動張仲魯說：“沈東浦在開封師範學院工作，每次動動都是重點，肅反時打得直不起腰，現在還彎着腰走。”還說：“打人打病了，治好再打……”還說：“匈牙利人民很勇敢，有傳統的民主習慣。唉！中國人就不行，中國的民主黨派也算怪，祇會死心踏地跟着共產黨走。”（《河南日報》7 月 26 日）

北師大教授武兆發說：“過去幾個運動中對知識分子了解不够。尤其是三反肅反運動，不論如何偉大，但所造成的偏差、錯誤至今無法彌補。知識分子最要緊的是自尊心、臉皮子，這些運動給老教師挑破了臉皮，尤其像陸志偉先生那樣，要向學生下跪。像他這樣的人在解放前也是知名人士（燕京大學校長——紫丹注）。”（《北師大反右資料匯編》）

耿伯釗當時是湖北省政協副主席，畢業于日本士官學校（與閻錫山同學），是辛亥老人，參加過武昌首義，在地方上很有威望，當時已經 74 歲。1957 年 6 月 1 日和 3 日下午，他和當時新華社記者曲一凡有兩次談話，前後共六小時，這次談話後被曲一凡整理出來，全文發表在新華社《內部參考》上。他在談話中特別批評了黨政不分問題。他說：“長時期內，以黨代政的現象普遍而嚴重。領導黨有責任對國家大事適時提出正確的政策，和檢查政策

的貫徹執行情況，但是它不能代替政府發號施令，發號施令是行政部門的事。我們常常看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共同署名發布某一指示和文件，于是上行下效，就出現了省委與省人委、地委與專署、縣委與縣人委等一系列的黨政聯名發號司令的事情。實際上，這樣做法必然助長黨政不分，其結果則是以黨代政，削弱了政府的作用和威信。”

耿伯釗還特別提出了要“加強法制工作”。他認為，開國八年，國家的法制工作搞得很差，遠遠跟不上形勢發展和人民需要的迫切要求。他說：“憲法有了，但憲法不能代替具體的法律和法規，法律不是幾條精神、原則能代替的。現在，除了婚姻法，幾乎沒有別的成文的法律。民法、刑法是必不可少的，你把舊的否定了，就得拿出新的東西來代替……必須建立法制，使人人都懂得法，樹立了守法的觀念，就不會盲動而犯法。”耿伯釗還在他的談話中提出了要反對“大黨主義”，他認為，儲安平向毛主席、周總理提意見，提得很好，是給新聞界增了光。他認為，共產黨英明偉大，這是有目共睹的。但“如果每個共產黨員，個個以領導者自居，以戰勝者自居，盛氣凌人，忽視民主，人民都受不了的。”（謝詠《1957年中國民間知識分子的言論活動》）

哲學系羊華榮在大字報《重新估價肅反》中說：“肅反有如下缺點：①侵犯了一些公民的基本權利，如鬥錯了人，關錯了人，迫壞了人，迫死了人；②破壞了法制，損害了憲法，損害了民主自由，如限制一些公民通訊自由、人身自由、無根據的搜查、看禁和逮捕。③促使了黨員與非黨員之間的牆更高、溝更深，少數黨員在肅反後，在人民頭上高視闊步。④摧殘了人們應有的感情，破壞了多少家庭幸福，拆散了多少鴛鴦，損害了多少友誼……”（丁抒：《北大在一九五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網上文庫”）

### 束星北的“右派”言論

（原編者按：束星北，浙江大學物理系教授，是李政道先生在浙大時最敬重的老師。1952年後院系調整，束星北到山東大學物理系任教授。1954年政審遭批判，調離物理系。1957年4月在中共山東省委鼓勵下鳴放，因言獲罪，被下放勞動改造。1972年，已經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李政道回國，周恩來會見他時請他為解決中國科學和教育人才斷層問題做些工作。李政道說，謀求國外高水平的人才或教師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啓用中國自己的人才和老師，比如我的老師束星北就在國內。周李會見，使困境中的束星北



的處境有所改善。1983年因為患慢性氣管炎、肺心病而去世。東星北老師當年的所謂“右派言論”，充分體現他在政治上的遠見卓識和他的力持正義的高尚品格。）

同志們：

我感覺到我們可能面臨着一個新的時代，一個文化經濟蒸蒸日上光明燦爛的黃金時代，我們必須做好準備工作，不能使它流產；這次會議可以說是準備前的工作之一，我今天先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能貫徹的障礙和原因揭發檢查一下。

“鳴放”的問題其實在3年前就已經解決了，憲法，就是1954年黨領導人民制訂的根本大法，第八十七條上明白的寫着“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國家供給必需的物質上的便利，以保證公民享受這些自由”。即使在革命動蕩時期，毛主席也早就提出：“知無不言，言者無罪”的方針。但是為什麼到現在還是“不能鳴、不敢鳴”、“不能放、不敢放”呢？還要一再強調這種方針呢？什麼原因？什麼障礙？我認為主要的關鍵在於我國一向沒有“法治”的習慣，因之當有些人不尊重憲法甚至公然破壞憲法的時候，群眾也並不以為奇怪，不及時制止；也因為這樣，這些違背憲法的人就能得到官僚主義者的包庇和縱容，這樣問題就不能解決了。

例如憲法上明明規定“公民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但是在“肅反”中這一條憲法不幸被粗暴地破壞了，而破壞的並沒有聽說有何處理，人民群眾似乎熟視無睹，還替這種違法的事加以形形色的解釋。更嚴重違背憲法的事發生了，憲法上明明寫着“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在“肅反”中就有打人罵人的現象發生。青島的中學老師在1955年“肅反”時，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只要是老師，就全部“集中學習”，不準出入，母子不能見，夫妻不能見面，一兩歲的孩子也幾個月不能見母親的面，祇因為母親是中學教員！對這些侵犯人身自由的事，除“打人”之外，其他似乎並未引起群眾的憤慨，領導上也未重視，這說明我們對“憲法”絲毫沒有認識。

據說青島九中有一個物理教員被關進牢房好幾個月，糊裏糊塗地被關，糊裏糊塗地被放，問是什麼罪？公安局不知道，檢察院不知道，法院不知道，到現在還不知道是誰關的，為什麼關的。你推我賴，沒人負責。這說明即使

像“逮捕”這樣一件大事也被視同兒戲！人身住宅和信件의 搜查，更不談了。

在“肅反”時，任何人（尤其黨外人士）都有可能被劃為“鬥爭”的對象，甚至株連牽累到幾十人。“憲法”即便不懂，難道“一人犯罪一人當”的一句老話也忘記了麼？結果往往又是全部推翻。固然我還沒有“錯就錯到底”的，不過就那一次苦頭也够人瞧的了，有嚇瘋的，有嚇死的，把這些責任推到當時“頭腦發熱”。固然當時確有頭腦發熱的“狂熱”現象（這也不全面）。但是上級領導不予處分，誰敢相信下次不再來一次“發熱”呢？問題不在於違反憲法沒有保障，問題在於違反憲法的人受到諒解和包庇。

當人身自由還沒有保障的時候，誰能相信有言論自由呢？因之要讓人們敢于揭發矛盾，揭發三害，第一個必須的條件，就要“憲法”得到保障，違反憲法的必須處分。（《山東大學右派言論集》）

有人揭露林希翎，看到石家莊法院判錯一個農民，人民大學肅反運動中鬥錯了個別人，她馬上就得出了我國肅反擴大化的結論。甚至捏造了所謂無辜殺了72萬的聳人聽聞的數字。（《教學與研究》1957年第7期）

7月23日《人民日報》，批判對外貿易部行情研究所歐美研究室主任嚴文杰向中共中央提交的長篇意見書，“不僅一般地反對黨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的領導，而且對黨的領導和組織形式提出了荒謬的主張。他把黨的領導局限于‘應是社會主義方向和道路和重大方針政策問題’。‘同時黨政各有一套系統，同級政法，監察，團體，企業又聽同級黨的；造成重複’，也就形成了‘以黨代政或黨政不分’……”

“嚴文杰對三反、五反、肅反等運動大肆誣蔑。他說：‘親身經歷過這些運動的人，想起來就感到心驚肉跳，毛骨悚然。’‘一到此時，是人人自危，社會大恐怖。傷人不謂不深。’‘不管什麼人，祇要領導手指一下，就可以鬥的，鬥爭場面，比坐牢難受多了。’‘想想看，在反霸鬥地主的時候，一個受害的農民起來鬥的時候，那些如瘋似狂的氣勢，當以後有一個變化的時候，那些受過傷的人會怎樣對付我們！’‘我覺得，反會把一些本不一定是反革命的人逼着去反革命。’‘不管成績怎樣，這種運動不能再搞了！’‘要求政府規定：除非監察院同意，並由法院接受和主持外，一般機關，團體不得開鬥爭會。’他還公然提出要對領導肅反鬥爭的同志進行報復，什麼‘冤死人者死’，‘冤人坐牢者囚’。露骨地表現了他仇視革命的情緒。”

這裏令人想起，當鄧小平宣稱今後不再搞政治運動，知識分子歌功頌

德：“小平同志真英明啊真英明！”的時候，却忘光了早在 20 多年前右派付出了血淚的代價，發出了瀝血的呼喚：“不管成績怎樣，這種運動不能再搞了！”而當時，鄧大人正在豪飲着知識分子的冒着泡沫的鮮血升官晉級哩！

嚴文杰也是共產黨員。這篇報道揭露了他反對《人民日報》反右派的宣傳。“《人民日報》比人家粗暴得多，厲害百倍。”對《人民日報》的標題：《人民沒有委托葛佩奇說這樣的話》，他發問：這是否經過公民投票了？我看葛佩奇也代表社會上的一部分人。葛佩奇說要殺共產黨人並沒有說現在就殺呀！如果共產黨真不好，為什麼不允許別人殺你呢？當他看到黑板報宣布李泰華是右派分子，即以中共黨員的名義向黑板報提出強硬抗議，質問這是誰的主意，為什麼。當他因此受到攻擊的時候，還說，“對不同意的事抗議一下也不可以，我要問成什麼世界。”

“成什麼世界？”成共產世界，成黨天下。在這個世界中，“知識分子遭受了一次浩劫。”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陶孟和在 6 月 8 日中國科學院黨召開的座談會上用“浩劫”二字來說明知識分子的歷史遭遇。自然的，他會受到圍剿。不過，圍剿他的各路英雄們，在九年後也嘗到了“浩劫”的滋味，相當多的人用生命給“浩劫”作了注腳。

李志綏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中說：“這次是由鄧小平負責反右派運動……我許久之後才知道鄧在推行反右派運動，風聲 3 年後，也就是 1960 年，當時中國的外交部長陳毅元帥告訴我，反右運動中，有 50 萬人被打成右派，其中大部分都是被誣陷。最令人不安的是，許多工作單位被指定要找出若干配額的右派分子……造成冤獄遍布，誣陷氾濫。”（頁 204）

這裏說明，中共內部，從上到下，並非人人在事上都是喪盡天良。那麼，誰才是呢？這就有必要建立一個科學的政治範疇——“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反動派”——來定性、定量了。劉賓雁在《誰是反動派》一文中說：“經過 50 年歷史進程，是非是更加明顯了。錯誤的不是胡風，而是毛澤東。正是毛澤東的那套完全違反文藝本性的思想和政策，把後來 30 幾年中國的文藝變成一片沙漠。同時，排除了胡風以後，他就把《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裏的反人性、反人道、反知識份子和反對批判精神的思想推而廣之，把 1949 年那場革命變成了反革命。所以，用毛澤東的邏輯來重新來一次定性的話，反革命就不是胡風，而是毛澤東了。”可見我說“毛澤東是反革命”和“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反動派”，不是沒經過深思熟慮和實踐檢驗，信

手拈來的了。因為劉先生是被視為中國的良心的，而且他是不反共的老共產黨人，他一再跟我說過：“我是不反共的，我祇是想要共產黨好。”

### 劉賓雁這篇文章要談的是兩個問題：

第一件事，就是 1955 年 5 月，毛澤東親自動手，揪出來一個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胡風是魯迅最信任的弟子，文學理論家兼詩人。20 年代在日本留學期間就加入了日共，始終沒放棄馬克思主義。魯迅去世後 20 年，他繼承魯迅的傳統，大力培養新人，同時以他的文學理論，批判五四以後中國文學界的歪風邪氣，為中國文學的正常發展，做出很大貢獻。他始終是中共的朋友，並不知道他的文學理論走上和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裏所宣揚的理論相反的方向。同時，他又得罪了當時文學界的一些權威人物。但是，即使是胡風長期以來的對手，也沒有認為他是敵人。毛澤東為什麼要對胡風狠下毒手，在短短一個月裏把他的問題的性質從文藝思想上的‘反黨’連升兩級而變為政治上的反革命，至今還是一個謎。

二，緊接著打擊“胡風反革命集團”，毛澤東又發動了一次肅清反革命運動。經過五十年代初期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和其他相關的運動，反革命已經基本肅清了，這是大家的共識。但是毛仍然堅持己見，結果是運動規模很大，而絕大部分都打錯了。

不僅這兩次運動是無中生有，後患無窮，它們還違反了一年剛剛通過的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給胡風定性，就完全是毛澤東以胡風和他的朋友們之間的信件裏的文字得出的結論。而按照憲法，私人信件屬於個人的隱私，應受到保護。憲法裏規定人民享有思想和言論自由，而胡風和他的朋友和弟子們假如說有錯誤，那也屬於言論和思想範圍，並無反革命行動。根本沒經過審判就定罪，也是違法的。胡風是關了 10 年以後才判決的，“集團”裏的別人，有的是 20 年後才判決。在批鬥胡風和肅反運動中，完全照搬了延安時期所搞的“搶救運動”那套做法，隨意監禁和刑求逼供，這當然也是違反了憲法規定必須保護的人權。所以，憲法從此名存實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也就變成無法無天的歷史了。

這兩個問題也是 1957 年鳴放得很激烈的話題。下面是北京大學物理系四年級學生劉奇弟（譚天榮的同班）貼的一張大字報，並附了一副對聯：“鐵窗鎖賢良，天昏地黑；忠臣血撒地，鬼哭神號。”這位青年，為這張大字報被

判15年徒刑，被殘酷拷打而逼瘋、而致死。

偉哉大學生右派分子劉奇弟，《為胡風招幡胡風絕不是反革命》內容如下：

反胡風運動已過3年了，胡風及其“集團”被當作反革命分子遭到鎮壓，今天舊案重翻，我要為胡風說話，更精確地說，我要為真理說話。胡風絕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釋放胡風。

作為一個公民，我來過問法律，這是正常。我的行動有憲法支持。

胡風是怎麼一個人？

凡是正視事實的人都會清楚，在解放前胡風是一位進步的作家，是民主戰士。他辛勤地追隨着魯迅；在那萬惡的社會裏，他向人們揭露黑暗指出光明，他為青年所愛戴，尊敬。正因為這樣，正憑着這點，在解放後他才被選為人民代表。解放後他更不懈惰，帶頭高齡跑這跑那去鄉下參加土地改革；在朝鮮抗美援朝，勤勤懇懇體驗生活，從事創作。他們（胡風分子）寫的作品有血有肉，最為讀者所喜愛。這類人不是為人民服務，是為什麼？世上還會找到這樣一種邏輯，把他們說成反革命。

看！這種控告和判決到底有沒有理？

關於對於控告胡風的內容，不外就是那三次反胡風文件，大家都很熟悉。今天我們再來看一看，它到底有沒有理由？回答是：“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斷章取義，牽強附會，毫無法律根據的書。反把閑人聊天、侯寶林說相聲的邏輯和推理搬進了法庭。像這樣的辦法，祇要他說過話寫過東西，都可以按這種斷章取義牽強附會的辦法，用說相聲的邏輯推演成反革命。

請問，這能當作控告嗎？

因此，自勉為要作個正義的維護真理的人的我是不能不大聲疾呼！

胡風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釋放）胡風！

同學們，你們認為怎樣？讓我們徹底搞清楚吧，假如你們也認為胡風被冤枉，那麼讓我們一道來要求釋放胡風吧！

要知道救人命不但勝造七級浮屠，而更是為了支持正義，維護真理。

偉哉胡風分子呂癸先生：唯一敢公開為胡風申辯的是呂癸。一位當過20年右派的老師不無感慨地對我說，“在中國，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直至80年代初，在政治高壓之下，知識份子可謂集體大變節，丟失了自我……舒蕪變節，馮友蘭投機，梁漱溟委曲求全，熊十力賣論求生，楊樹達、吳宓都

不同程度地感冒，沈從文 60 年代也不甘寂寞，寫了有愧于其文格和人格的詩……”

聞敏的《呂癸——惟一敢為胡風申辯的人》讓我震驚，在那個知識份子自相踐踏、一敗塗地的年代，呂癸的存在，為這個苦難的民族挽回了一點點尊嚴。呂癸這個名字將和陳寅恪、顧準、張中曉等人的名字一起刻在歷史的紀念碑上。呂癸是一面鏡子，在胡風被欽定為“反革命”、遭千夫所指的 1955 年，呂癸的作為照出了那些形形色色的文人的嘴臉。即便近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在場者接受採訪時的不同回答，同樣在不經意間露出了各自的靈魂。

許覺民、塗光群、李希凡、藍翎等衆多在場者的回憶都提到了張光年，當呂癸發言：“胡風不是反革命，他的問題是理論上的，不是政治上的。”話未說完，“張光年很凶的，高呼口號：‘不許為胡風反革命分子辯護！’”對此，張光年盡管不無輕描淡寫（“我突然站起來，向正在發言的呂癸同志提出質疑。”），但也承認“整個兒是個人迷信，執行上面的決策……呂癸同志我不熟，很對不起他……”舒蕪則是另外一種態度，他稱呂癸站出來“不過是個小插曲。蠻有戲劇性的。”顯然帶有“看戲”的心態。在場的文人無不認為呂癸是個“書呆子”，“離現實太遠”。

在那些聰明人看來，隨波逐流、見風使舵乃至落井下石才是識時務者，呂癸祇是個“笨拙的”異類，是個不合時宜者，是個遠離現實的“書呆子”，也正因為如此，他成為惟一為胡風辯護的人。“胡風不是反革命，他的問題是理論上的，不是政治上的。”

1955 年的中國，祇有他公開說出了這句話。這不是甚麼學問，不是甚麼創作，但這句話的份量遠大于呂癸作為學者、美學家、翻譯家的全部作品，僅這句話就足以載入史冊，激動後人。那是人格的力量，在歷史的天平上，一頭是呂癸一個人，他讓另一頭其他的文人失去了重量。我由此懂得歷史往往不是“聰明人”書寫的，中國不幸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聰明人”太多了，“書呆子”太少了，一個祇有“聰明人”的民族是無望的，一個不會反省的民族是無藥可救的。令人遺憾的是，直到今天，曾親聆呂癸發言一幕的知識份子們，仍鮮有人為自己當年的附和、沉默或助紂為虐感到羞愧、可耻，反而言語之間不無幸災樂禍。呂癸的出現彷彿閃電撕破了無情的夜空，照出了一個可耻的時代、各色文人的面目。（傅國涌）

《人民日報》,7月31日載,對外貿易部法律顧問室董士濂說,為胡風辯護的呂燮“顯示了中國人的骨氣”。在報上刊登胡風“反革命罪行材料”,是《人民日報》社“犯了誹謗罪”。

對於胡風事件,當年是四川大學生物系四年級學生的馮元春也提出了自己的懷疑。馮元春在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組織的辯論上以《毛主席是偽馬列主義者,共產黨是三大主義武裝的最巧妙的最殘酷的剝削集團》為題目,做了長篇發言:“毛主席經常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為什麼胡風上書二十萬言就成了罪人了,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馮元春還指出,毛澤東的特權思想和歷史上一切統治者的特權一樣,毛澤東是中國再次出現的劉邦。“共產黨這個剝削集團是巧妙的,殘酷是空前的。”“他們就這樣靠吸取別人腦汁而生活,他們對待老教授是那樣橫蠻、無理,是最卑鄙的一種人。”說:“我校湯教授,為人忠誠,是個忠于客觀事實的自然科學家,就因為他愛提意見,在肅反中就認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會上進行鬥爭,說他是美國派來的間諜。湯教授確是一個忠于事實的人,他曾經對我說,美國工人生活水平相當於我國的大學教授,一個月二、三百美元,每三個美國人就有一輛汽車,這些足以說明美國生產力高。而剝削集團的宣傳機器却歪曲事實宣傳說美國有多少工人失業,經濟危機又多麼嚴重。而湯教授忠于事實,却受到迫害。”馮元春指出毛打到高崗、饒漱石,是“違反憲法”的,“是斯大林思想在做祟”;還對當時的外交政策一邊倒提出了意見,她說:“我們黨和毛主席沒有一點民族氣節。”

1957年,中國最有骨氣的幾個學生“右派”如林昭、林希翎和馮元春都是女性,這很讓我們為中國女性的思想力量感到驕傲。(謝泳《1957年中國民間知識分子的言論活動》)然而他們的下場却是如此悲慘:林昭、馮元春被殘酷殺害,林希翎不予“改正”,讓她老死他鄉。

1957年6月,成都鐵路管理局職員李昌明以“民主先生”和“自由女士”發表了《為胡風鳴不平》的長篇演講。

他的這個演講,從常識理性出發,以現代法律精神為基本標準,逐條為胡風案辯護。在當年為胡風案鳴不平的文章中,就我個人所見到的,以這篇最有水平,比林希翎的文章更具現代法律精神。李昌明從五個方面為胡風辯護。

第一,他舉出了大量的事實,說明胡風沒有反革命身份。

第二，說胡風參加過“反共政治工作”，理由不能成立。如果成立，郭沫若（19）37年作國民黨中宣部三廳廳長及大部分起義人員將同罹此罪。

第三，與陳焯之關係僅為一般社會關係。不是反革命組織及工作關係。李昌明說：“衆所周知，周總理與蔣介石集團中多人往還，宋氏三齡見解各殊，均未認作反革命關係，何獨胡風別有看待。

第四，胡風集團祇能是一些偏見的學派，五四運動前後的創造社、新月派、語絲派，互相攻擊，極盡詆毀、污罵能事，郭沫若攻擊魯迅所用辭匯其惡意不在胡風之下，魯迅與梁實秋論戰作用語詞亦尖銳之極，可見文人相輕，歷史皆然，不能對胡風有所偏頗。

第五，從法律觀點看，胡風集團的行為並不構成對國家有形的損害。李昌明說：“我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上無一條對胡風集團適用，全世界任何一國民法、刑法（包括蘇聯在內）均未載有以文藝形式對文藝問題上的意見或攻擊足以構成的叛國罪或危害國家安全罪。美國的斯密斯法（Law of Smith）對國內進步人士與共產黨員的迫害均未在學術領域或文藝範圍內引用，也未有這種事實。”

我所以在“反胡風”上傾注筆墨，是因為：一，毛反胡風的意義、性質、手法和不得人心，完全等同于反右派；二，相當多的知識分子是由于對反胡風及其延伸——肅反運動的強烈不滿而被劃為右派的。1955年“肅反”和1957年“鳴放”期間，對於剛剛發生的胡風事件，在全國範圍內出現了強烈反彈的勢頭。僅據中共中國人民大學委員會編輯的《高等學校右派言論選編》和復旦大學校刊編輯的《毒草集》和《明辨集》中，因“胡風問題”憤憤不平而被打成“右派分子”者有：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林希翎，新聞系學生潘俊民、朱維民、韓洪棣，計劃系學生韓楓，財政系學生陳祖武，歷史系學生張藝文、蔣濟良、張可治、劉平、楊汝栩、朱福榮、羅旭暢，計劃系講師朱澄平，歷史系講師章起，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佟駿，新聞系譯員徐京安，檔案系助教馬馨，出版社編輯曹達夫，該校職員濮仲文等人。北京鋼鐵學院章萼航、徐滌如、賈恩光、盧一安，四川大學龔鰲、潘英懷、鄭尚可、馮元春，北京礦業學院洪念祖，山東大學楊學孝，同濟大學張雅微，北京大學崔德甫等人。（萬同林：《殉道者——胡風及其同仁們》，第302頁）



### 請參看中共中央最近解密的關於反胡風和肅反的檔案：

1955年1月20日，毛澤東批覆中共中央宣傳部提出的《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報告》，指出要以“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一個重要鬥爭來對待”。

同年5月13日、24日、6月10日，《人民日報》分三批刊登了《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毛澤東寫了序言和27條按語，在按語中斷言：胡風等人是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勢力派別，一個地下獨立王國。

同年6月18日，毛澤東作出指示：“要旗幟鮮明，從政治上、組織上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展開運動”。

同年6月20日至27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定胡風為“反革命”、“反革命集團”及“展開運動”，出現了嚴重分歧。經五次表決，在13名政治局委員中，7名同意、4名反對、2名棄權，獲得通過。7名同意者為：毛澤東、朱德、董必武、康生、林彪、林伯渠、張聞天；4名反對者為：周恩來、陳雲、彭真、彭德懷；2名棄權者為：劉少奇、鄧小平。

宋慶齡、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等黨外民主人士致信中共中央、毛澤東，反對接連展開社會政治運動，不利于國家團結、振興、建設、統一。

同年7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展開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運動》的指示，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運動。

7月15日，毛澤東再作指示：要堅決肅清反革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強化無產階級專政”。陳雲在會上認為：“不應當對敵情估計過于嚴重，使政策界限不清，社會人心很緊張不安”。毛澤東在會上問陳雲：“什麼不清，誰緊張？誰不安？你代表了什麼階級利益？”會上劉少奇提議進行表決。毛澤東說：“要表決，召開黨中央全會；否則，請老蔣返回南京表決。不要搞那種假民主！”

肅反運動到1956年底結束，運動中逮捕了214,470人，判死刑21,715人，非正常死亡53,230人。

注：本文提到的“非正常死亡”是指被迫自殺，在鬥爭會上或刑訊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監獄、勞改中折磨致死。（《爭鳴》2005年12月號）

其實，法學界受批判的“右派言論”，大都是近現代法治的一些基本常

識性的原則、規則、觀點、概念，乃至通用的法學名詞，有的還是三年前剛為我國憲法所確認的基本原則。如“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也被批判為“敵我不分”。“法院獨立審判”被批判為“同黨鬧獨立”。主張法有繼承性，則是“為反動法律招魂”。主張尊重法律的科學性，就是“反對法律為革命的政治服務”。主張完善人大制度，就是“吹捧資產階級議會制度”。主張實行法治，不能以黨代政，反對“以政策代法律”，竟然被批為“企圖篡奪黨對國家的領導”。著名的老法學家楊兆龍教授因為提出要“及時立法”，制定法典，也被斥之為“舊法觀點”或國民黨的“立法觀點”，是“企圖篡奪黨在立法工作中的領導權，以便從根本上推翻人民法制，而使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他主張法律應當體現社會正義，要實行“罪刑法定主義”和“無罪推定”原則，也被質問：這些所謂的正義“究竟是便利誰，對付誰？是什麼用心”？這位曾經是哈佛大學法學博士、柏林大學博士後，“解放”前擔任過多所著名大學教授、法學院長，並曾在上海擔任過上訴法院法官、律師和審判日本戰犯的罪證調查室主任的正派老專家學者，在肅反中就因他曾在國民黨司法界任要職，“解放”後留在大陸不走，竟懷疑他是“潛伏特務”！反右中他因上述言論被打成右派，1963年又以莫須有的反革命罪逮捕入獄。1971年判處無期徒刑。

另一位政法界的名家、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王造時教授，1957年在上海市政協會上提出了必須“進一步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法治秩序”的目標，指出“社會主義民主是法制的指導原則，而社會主義法制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體現與內容。我們要擴大民主，就必須健全法制。”這是最早最完整地闡明了民主與法制的辯證關係，與現今的提法幾乎完全一致，却被誣指為“大肆宣揚資本主義民主和法治，實際上就是企圖用資本主義制度來代替社會主義制度，從而達到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結果被劃為右派。文革中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病死獄中，彌留之際還在喊着：“毛主席救救我！”（郭道暉：《五七風雲》：從憲政運動到政治打壓）

### （七）反對崇蘇媚蘇的“一邊倒”

《人民日報》，6月20日載，章伯鈞說：“蘇聯一定要變，中國也不能讓許多小斯大林統治下去。”

《右派分子彭文應的反動言論摘要》中有：“學習蘇聯不一定好，學習

美國不一定壞。”

數學家，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傅鐘蓀在本校刊物《師大教學》上發表了題為《中共失策之一》的文章，說：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也許這是中共近幾年來最大的失策之一。

每一個政治運動起來，雖然這個運動名目不叫鬥爭，不管它叫學習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肅反也好，每一運動起來，知識分子就心驚膽戰。對於統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這是史無前例的。我想不起來有那一個興朝盛世是這樣糟蹋知識分子的。我也不曉得這些知識分子究竟造了什麼孽而致會遭這麼大的禍殃。地主之所以為地主，資本家之所以為資本家，必然是有剝削行為，有罪過。我們能夠說知識分子必然有罪嗎？我們來看看中共是怎樣來對待知識分子的。所有的報章雜誌上所寫的，報告會，討論會上所說的，祇要一提到知識分子，必然戴上帽子“舊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很少單獨提知識分子而不戴帽子的。

知識分子所感受的待遇與中共所標榜的知識分子政策幾乎完全反。這能怪知識分子得福不知感嗎？中共中央可以深切反省一下，這能把責任完全委于下級嗎？下級的普遍偏差與上級的領導無關嗎？中共可以檢查一下，這幾年來四海之內有那一個地方知識分子不寒心。我不相信知識分子對中共離心離德而中共能夠達到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目的。現在的知識分子與中共既無冤又無仇為什麼不利用？知識分子願為中共效勞，因為為中共效勞也就是為祖國效勞，為人民效勞……自然中共會說，我現在是用了……但打着用，罵着用，叫知識分子成天用眼淚洗臉，這是何苦來？難道這也是一種政策？“就知識分子說，養着他而不聽從他的意見，就是所謂“交獸”的待遇，是知識分子所不甘受的。知識分子的氣節是從古以來所勵的。共產黨在歷次運動中聲色俱厲地說：“要把舊知識分子臭架子打掉”，對士氣毫不顧惜。認為這是很大的隱憂，無形的損失。

經過中共對知識分子政治上打、騙，經濟上贖買，傅先生所說的“隱憂”已成“顯憂”，“無形的損失”已現形得令人觸目驚心。君不見“士可殺而不可辱”，“不自由勿寧死”，分別代之以“既可殺又可辱”，“能活着寧跪着”！君不聽，被强奸後的知識分子在叫喚：“現在是歷史上XXX最好的時期！”這裏的“XXX”，代表人權，民主，自由……總之是“樣樣都最好，真使人陶醉！”

我素來是很尊敬老前輩傅鐘蓀教授的。在我劃右派的前一個月，他所主編的《數學通報》雜誌上，還發表了我一篇論文。當時共產黨對他，出于統戰的需要，在表面上還是很尊重的。他在文章中所表達的對共產黨對知識分子人格侮辱之義憤，我認爲是屬於“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的不平之鳴。而知識分子們在自身難保的逆境中，仍念念不忘憂國，憂民，憂國格，憂個人人格。夫人格者人權也。在不同學科上又有各自的表述：哲學上是指主體，人之爲人的資格；教育學，心理學上指個性；倫理學上是指道德品質；法學上是指一個人法定的權利和義務……共產黨在“人格”的所有意義上，都對知識分子進行了全面的糟蹋。傅先生所指出的不堪忍受的如上種種，共產黨却以更加倍的惡劣還給他，如他說的戴在知識分子頭上的帽子，是“舊”，“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現在加給他老人家的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這頂定性爲反動派的帽子。

這位傅先生就着國格寫道：“毛主席號召學習蘇聯之後，請來許多蘇聯專家，中國知識分子不論老少都虛懷若谷，參加學習。這在中國知識分子說來就算是很難得的了。因爲知識分子都有自尊心，都不免有‘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的想法。但是，近幾年來，高等學校請求聘請蘇聯專家時，高教部都責成學校要有計劃，有準備，其中一條，要準備好繼承人。爲了學得快，有的學校就指定教授作培養對象，作繼承衣鉢的人，以便蘇聯專家回國之後，還能傳授蘇聯專家學業。對這辦法我曾提出過異議。我認爲，我們也是一個國家，既然稱這個人爲教授，那培養他的人勢必要比教授高，即使這個中國教授非常謙恭，有雅量，蘇聯專家也許不好意思吧！再說在國際上往來，也要替中國教授留體面，也就是替國家留體面。”

說實在話，當時在“一邊倒”的國策下，還講什麼人格，國格！中國在蘇聯面前完全是奴顏婢膝，一副洋奴相，漢奸相。說蘇聯一句不好，是反蘇、反共、反人民。一位中學教師對實行五級記分法（所謂蘇聯先進經驗）想不通，說：“還是百分制好。”就這就打成了右派。實際上，用也可，不用也可，記分制和政治是絕對的兩碼事。據說，五級記分法是從沙俄時代遺留下來的。一點也不沾“蘇維埃”的邊，中共竟奴性十足，趨之若鶩，不分青紅皂白。共產黨罵蔣介石是洋奴、賣國賊、美帝的走狗，是絕對地無耻造謠；說給毛澤東，倒是符合事實的。中國的任何一個朝代對待外國，都沒有像共產黨對待蘇聯那樣，一切以蘇聯的是非、利害爲轉移；用蘇聯今天的模子，來鑄造

自己的明天；劃右派的六條標準中，祇要有對蘇聯不利的言行，就得宣布爲自己國家的敵人——右派分子；祇要對外國洋人馬恩列斯學說稍有懷疑，就要定罪；有當走狗、當洋奴，當得如此下作的嗎？

昆明航空工業學校兩名學生許其武、童幼卿寫大字報：“今日新中國向蘇聯一邊倒”，“飛機以及各種武器皆是自蘇聯買來的，專家顧問也是蘇聯人……我們覺得一個國家的重要事件，操在外國人手裏，總是不好的，遲早要出問題的。不問同主義不同主義，人種土地是不同的。不管蘇聯是如何的好，他總是外國人，絕不是中國人……共產黨昏迷沉醉，死投于蘇聯懷抱中，必有亡國滅種之一日。”（《陽謀》第143頁）

上海第二醫學院的學生在黑板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爲《中國人的呼聲》的文章，文章說：“今天已解放八年了，中國人民應該站起來了。應該由中國人來管理自己的國家！遺憾得很，現在哪一個地方沒有蘇聯專家和顧問！那些所謂中國幹部們……把蘇聯專家捧得七丈高，把中國專家看作飯桶！蘇聯專家什麼都好，即使放一個屁都是香的。中國專家被排斥得透不過氣來……發表與蘇聯專家相反的意見，就要大禍臨頭，一連串‘反蘇’、‘反共’、‘反動’等大帽子暴雨般地打下來……在中國境內，中國人沒有說話餘地，這是什麼樣的社會？”文章還喊出了“精簡全國蘇聯專家”的口號，呼吁“需要者留下，斃腳貨叫他們回去！”

《光明日報》，5月19日載，華中工學院副院長劉幹才批評高教部：“曾這樣強調：‘百分之百學習蘇聯’、‘不折不扣學習蘇聯’……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東西，一概加以否定……鬧了不少笑話。譬如有些東西蘇聯沒有的，而資本主義國家却有的，我們就閉着眼睛加以批判，結果現在蘇聯也有了，我們就祇好解嘲一番。”

在大鳴大放中，很多人提出蘇聯損害中國利益的問題，例如，抗戰勝利後，連我都參加過的反對蘇聯在東北掠奪財物，強奸婦女的大游行，其中光是搬走的機器，價值就有數十億美元。誰提就是反蘇，就符合了毛定的劃右派六條標準中的一條。

《人民日報》，7月14日載，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71次會議上，常務委員龍雲發表了這樣幾點意見：

1，抗美援朝戰爭經費，全部由中國擔不合理。2，第一，二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借款給盟國，又實施租借法案，後來他們有的賴了債，有的

美國不要還了。蘇聯對我國借款，十年以內還清，時間過短還要付息。建議延期二三十年歸還，借以緩和國內緊張。中國為社會主義而戰，結果如此。

3，蘇聯解放我國東北時，拆走了工廠中的機器，有無代價？償還不償還？

4，我國援外預算太大，主張抓緊壓縮對外援助。

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批評龍雲“企圖抹殺蘇聯對我國真誠援助的巨大意義，這顯然是有意挑撥中蘇友誼，破壞國際團結，從而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廣播事業局局長梅益在大會的小組討論中對龍雲進行了批判，其中的大話，空話權且置之不理，單就他對蘇聯運走我國的機器，來看這類事件辯護者們的賣國嘴臉。他認為蘇軍當時這樣做是必要的，當時國民黨正在進攻東北，蘇聯運走的機器多是軍火工廠裝備，龍雲是不是主張把這些軍火廠留給國民黨權制造槍炮來屠殺人民呢？

我們撇開個第一個問題：如果假定蘇軍單是有選擇地運走軍火工廠設備而不是運走所有工業設備，那麼，是否就是應該的和必要的？

我們倒要問：當時蘇軍運走什麼和沒運走什麼，是否中共授權你當場進行了清點？否則你怎麼會知道得如此清楚？夏衍在他的《懶尋舊夢錄》第559頁寫道：“蘇軍運走了所有日僞留下來的工業設備，則是連塔斯社也不能否認的。”夏衍面對群眾反蘇大游行，說：“這一次蘇聯對盟友的掠奪行徑，却給了國民黨以一個反蘇，反共的機會。說實在話，即使在當時，我們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當娘都不否認自己養漢的醜事時，其中一個共黨黨員還沒有被賣國主義搞得鬼迷心竅，還知羞耻，“心情也是很矛盾的”。梅益却拍着胸脯作偽證：我保證娘進行的是正當的性行為！這裏，我要批駁右派對中共人事政策的指責，我要為中共辯護：中共是知人善任，讓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的，難道你能找出一個人比梅益更適任廣播事業局局長的職務嗎？

另一個是關於“新民會”(淪陷區的漢奸組織)——不，現在已換了新招牌，叫做“中蘇友好協會”，它的幹實事的總會秘書長的任命，也是打着燈籠才能找到的幹練之才。錢俊瑞秘書長直斥龍雲“放肆地挑撥中蘇關係”：“龍雲先生，你參加多少次的人大會議，人大常務會議，政協會議，最高國務會議，以及各種各樣的會議和座談會，你難道連蘇聯對我們的貸款是幫助我國的建設，利率很低，甚至沒有利息，這一點還不知道麼？……而且，你難道不知道，解放以來，蘇聯政府給我們的工業設備，不論在數量上和技術上不

知要超過那些（白拿走的）舊有的裝備多少倍麼？”

這裏我們先不辯白是否“超過”；而是首先弄清“給”是否像“白拿”一樣“白給”，即媒體上大吹大擂的所謂“無償援助”呢？

秘書長為蘇聯大唱贊歌，什麼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呀，什麼沒有壓迫，剝削，窮困呀，什麼人民享有最大的自由呀，什麼平等對待各個國，民族並扶助弱小民族和被壓迫者呀！並歷數對我國長期的、全面的、無私的援助。我們的秘書長不勝感激涕零之至：“蘇聯政府和人民長時期來對我國革命和建設這樣真誠無私的援助，真像天一般大，難道右派分子果真是一手遮天麼？”（《人民日報》7月16日）

大約是在1964年2月底，這時我已被解除了勞動教養，交農村監督勞動，這天晚上，有綫廣播喇叭裏播出“中共中央”，是的，是中共中央，《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的信》”：

我們不能不指出：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不是單方面的，更不是無償的，並且主要是通過貿易的形式進行的……還應該提到，我們從蘇聯進口的東西，比起國際市場價格來說，是貴得多的……至于蘇聯對中國貸款，必須指出，其中的最大部分，是我國用來從蘇聯購進軍事物資的。這些軍事物資的大部分，都已使用和消耗于抗美援朝戰爭之中……長期以來，我們每年都在為蘇聯的這些貸款償付本息，它占去我國對蘇聯出口的一個相當的份額。這就是說，連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向中國提供的軍事物資，也不是無償援助。

這封信雖表達的是龍雲的意見，但肯定不是龍雲起的稿，因為他早已“輕于鴻毛”了。是否錢俊瑞起的稿？不得而知。不過，中共中央應向人民實事求是地交代一句：“本黨過去關於中蘇友好的一切宣傳，完全是忍痛撒的彌天大謊，讓它就像狗屁一樣一風吹掉吧！至于錢俊瑞，撒中蘇友好之謊，可移作它用，繼續發揮撒謊的一技之長。”

罪在大巫。毛把“一邊倒”定為重要國策，誰敢不跟着起舞？現在毛跟蘇共鬧翻了，暴露了自己過去賣國、媚蘇的醜惡罪行，也暴露了反右派是“一手遮天”，實屬於豬狗不如的破鞋罵別人：“蕩婦”。要知道直到網路時代的今天，中共仍在垂死掙扎着要堅持“一手遮天”。最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在海外竟有人把毛的反蘇（實際是反赫魯曉夫要改革的“蘇”，死心踏地僵持擁護斯大林主義的“蘇”）視作民族主義英雄。其實這頂桂冠是理應贈予右派分子龍雲們的。

歷史事件的本質是，蘇共君臨中共，蘇聯壓迫、掠奪、敲榨中國的斯大林時代，斯大林不僅是殘暴統治本國的罪行犯，而且是侵略中國罪魁禍首。如果在蘇聯清算斯大林令人發指的罪行時，毛澤東有動于衷，起而反對斯大林的大國沙文主義，社會帝國主義，歷史將功過分明地給毛記上一筆：“毛澤東曾愛過一次國。”可惜毛澤東在斯大林生前，吹捧有加，即便斯的“決策”對毛大大不利，毛也祇能陽奉陰違，把氣出在“中國同志”身上。斯死後，毛還專門為文《最偉大的友誼》（很容易使人聯想起他另一篇文章的題目《“友誼”，還是侵略？》）來紀念這位“當代最偉大的天才”，吹捧斯大林“一直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人物。我們圍繞着他，不斷地向他請教，不斷地從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並且表態，堅決支持以斯大林制定的接班人馬林科夫為首的蘇共中央。說明他不是要反蘇的侵略，而是認侵略為“最偉大的友誼”，認侵略頭子為“最偉大的天才”；“我們圍繞着他，不斷地向他請教，不斷地從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學斯大林向人民開刀的血腥統治。他極力反對的是蘇聯丟了斯大林這個殺人魔王的“刀子”，是赫魯曉夫清算“個人迷信及其後果”和要進行的改革。他反赫魯曉夫對共產暴政、專制獨裁要動一根毫毛，即搞修正主義。這和他在國內搞文化大革命反中國的赫魯曉夫是一個動機，一個本質。這能說他是民族主義英雄嗎？祇能說他是最極權的死硬派，要逆歷史潮流，抱着斯大林的僵尸扛住抵擋民主的開門。

毛處處都是：兩“壞”相權取其“最”！根本說不上是什麼英雄，連狗熊都不如！難道你見過民族英雄在異族主子的尸體面前，如喪考妣，大表忠心，又給尸體厚施脂粉，進行如此肉麻地吹捧、頌揚的嗎？後來與蘇鬧翻時，中共中央揭露的蘇聯的種種侵略罪惡，主要都是斯大林幹的。毛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知道斯大林的罪惡：“蘇聯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下於歷史上任何最專制暴虐的統治。”可他還要頑固地捍衛、瘋狂地揮舞斯大林的這把刀子——斯大林主義、斯大林制度，而且以“中國斯大林”自居，做出超過世界“歷史上任何最專制暴虐的統治”。同時，更是把揭出這毒瘤的赫魯曉夫當做是挖了他祖墳的不共戴天的死敵，足見其堅持倒退、反對前進，堅持黑暗、反對光明，堅持法西斯、反對民主化的反動立場是至死也不會少加鬆動的。



### （八）改造資產階級的問題

《人民日報》6月2日載有被毛澤東後來稱爲“右派分子老祖宗”的章乃器的言論，摘要如下：

現在公私合營企業情形嚴重，生產水平不如前，工作效率比過去還差，這是是非不明，輕才重黨的許多不合理的人事制度造下來的惡果。官僚主義，其害處比資本主義還要危險。

何以有些社會主義企業的工作效率反不如現代化的資本主義企業呢？理由很簡單，資本家除了要圖利外，還有一種企業心。爲了圖利，爲了搞好企業，他們自然要用人才。像我們現在某些企業暴露出來的偏差，在現代的資本主義企業中是很難存在的。因此對於資本主義生產上和經營上的經驗和知識應該接受下來。

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是兩個不同的階級；但資本家和工人都是人，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工人可以發展爲資本家，資本家也可以作工人。何況，中共對民營工商業的改造已近八年，公私合營後他們的生產資料已全部交出。空無所有，還說他們是資產階級，還要進行改造，要他們“脫胎換骨”，這是不公平的。

工商業者現在已經沒有剝削，定息也不是剝削，資產階級帶了生產資料進社會主義，比赤手空拳喊口號，貼標語的人還光榮……要給工商平等的人格，不是給幾頂大帽子，不是“壓服”而是“說服”的方法來幫助他們改造。（博訊）

### 定息不是剝削而是不勞而獲的收入

新華社1957年5月31日訊，在今天繼續舉行的中國民主建國會全國工商改造輔導工作座談會上，中國民主建國會副主任委員章乃器談了話。

他首先談到這次座談會開得很好，因大家都說了真話，把問題擺了出來，這樣就有利於解決。接着他說工商改造輔導工作的出發點應該是：從消滅民族資產階級過程中間，千方百計地想辦法提高工商業者的政治覺悟，發揮他們的積極性，以作到妥善地消滅資產階級，祇有這樣才對社會主義有利。

他認爲祇要明是非、除三害，就能發揮私方的積極性。

他說，對工商業者的改造，不能採取形式主義，有些人自認爲立場很穩，口號喊得很響亮，給工商業者“扣帽子”，甚至用打擊嚇唬的辦法，壓服他

們，結果，使工商業者縮手縮腳，不敢做工作，還有的不敢接近工商業者，生怕玷污了自己。這都是形而上學，沒有真正從工人階級利益考慮問題，因為這樣就談不到團結改造工商業者了。

接着他就如何發揮和提高私方積極性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這祇有六個字，就是明是非，除三害。因為宗派主義者是不願明是非的，他靠顛倒是非來弄權，祇講親屬、裙帶關係，祇願聽恭維、奉承。主觀主義者不可能明是非，因他脫離了客觀實際，完全憑主觀想像處理問題。官僚主義者不敢明是非，他們心裏雖有是非，但怕講出來會影響自己的地位丟掉紗帽。他們祇知唯唯諾諾，唯命是從，或做群眾尾巴。這三者是互相統一的。

他說：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

他認為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因資本主義在中國不可能復辟，但官僚主義時時刻刻會在人們思想中復辟。如果社會主義企業加上官僚主義，那它的效率就將比資本主義企業低。我並不是留戀資本主義。但資本主義也有好有壞，我們應該吸取對社會主義有益的東西。他說，為什麼有些社會主義企業經營得反而不如過去的現代化私營企業呢？這是因為資本家為了圖利，善于選用人才，並且對人才的培養、提拔，還要盡量表示公平，不這樣，他就很難和別人競爭。而有些社會主義企業却不能做到這點。他說，祇有做到是非分明，按功、過提拔安排，才能真正發揮工商業者的積極性。光“重德輕才、以資代德”就會造成是非不明，調動不起來積極因素。

他說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黨與非黨，則工作永遠做不好。

他說，關於公私合營企業裏幾種關係問題，應該明確以公私共事關係為主，階級關係是殘餘，因階級已基本上消滅。在工作關係中，不應該分公方、私方，黨與非黨；要按職責和分工辦事。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黨與非黨，則工作永遠做不好，祇有在思想改造的學習中，可以提醒工商業者還有階級關係殘餘的存在，但也不能千篇一律，要因人而異。如果一個私方很進步，和公方、職工的關係搞得很好，就不能強調階級關係。另外，不能把階級關係當成一種壓力，去改造工商業者，祇有通過說服教育，才能達到改造的目的。

他認為不應該把定息說成剝削，而應說是不勞而獲的收入。

接着他談到定息的性質。他說，有些人認為定息的性質是剝削，我認為很值得研究。因為照剝削字面講，被剝削者應該是很痛苦的，但我們又說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當前的矛盾，並不具有對抗性，這就說不通了。我認為不

應該把定息說成剝削，而應說成是不勞而獲的收入，這樣，工商業者才能心平氣和。他還說，2000元的杠子，也有重新考慮研究的必要，因為這個數字太小了，很難劃分2000元以上的都是資產階級；2000元以下的都是小資產階級。

他還談到群眾觀點問題。他說，不關心群眾疾苦的人，儘管每天都和群眾在一起，也不會了解群眾的情況，這是假的群眾路線。他對大家說，對資產階級要恨，但對資產階級分子要愛護，要抱着與人為善，熱愛群眾的精神去團結改造工商業者。

他認為：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有本質的不同，但這兩個階級的分子沒有本質的區別。他還說，目前我國所有階級的特性已基本消滅。

最後，他談到工商業者兩面性的問題。他說，關於這個問題，已專門寫了文章，即將發表出來。他認為，必須辯證地看待這個問題，經過“五反”和全行業合營高潮，工商業者交出了生產資料，如仍教條主義地強調兩面性，這對工商業者自我改造的信心有很大影響。他說，哪個階級都有兩面性，工人階級也有，祇不過積極、消極兩面的比重大小不同，這是一個先進和落後的問題。他說，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有本質的不同，即一是剝削階級，一是不剝削和反剝削的階級。但這兩個階級的分子不能說有本質的區別。資產階級的剝削是與生俱來，至死方休，祇能消滅，不能改造；而資產階級分子是可以改造的，因他的剝削不是與生俱來的。他認為目前我國所有階級的特性已基本上消滅，大家正在向人類的共同本性過渡。

在工商界批判章乃器，是反右派的重頭戲。當時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是我的第一要務，看“右派言論”是我的關注中心。對那些批判章先生的左派的狂吠，總是從人格上引起我對言者的鄙夷，唯有章先生說自己是“心安理得”；大快我心，深得我心！“到處宣揚右派分子章乃器‘心安理得’。”為後來劃我右派的言行根據之一。在鬥爭我的八個月中，我從未像某些人那樣，磕頭如搗蒜，繳槍投降求饒命，也沒有對任何人揭發任何一句話以求立功。相反，我倒是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給他們拍過桌子。有一次，在教室鬥爭我時，聽到一個學生在教室外高喊：“面不改色”。我的這些表現很可能與章先生那股浩然正氣的熏陶有關係。而其沉重的代價是：“情節特別嚴重，態度特別惡劣，開除團籍，開除公職，勞動教養。”支部書記宣布時還特別加了一句說明：“這是對右派分子的第一號處分！”

至今我仍不認為批章先生的話有一句不是胡說八道，包括後來毛澤東說的“右派中間那些不願意改變的，大概章乃器算一個。你要他變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就不幹，他說他早已變好了，是‘紅色資產階級’，自報公議嘛，你自報可以，大家還要公議。我們說，你還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資產階級。”（《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489）毛澤東自食其言，已成惡習。如果說你忘了，章先生是在中國民主建國會第一屆中央常委會14次會議上，又公開講過的：“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曾指着我說：‘我很同意你的紅色資產階級的說法，難道我們還允許白色資產階級存在嗎？’”多見不怪，對毛自無必要提出質問：“你為什麼說話老不算數呢？”整個的批判會上，全是毛式的無理取鬧。

### 李康年重申贖買20年的主張

李康年1957年6月5日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工商界座談會上說：

我是上海工商業者公私合營鴻興織造廠董事長，中國鐘表廠總經理，萃衆織造廠經理李康年，就是最近報上標題所謂“定息20年”或者“贖買20年”的建議者。

我提出了三個建議。

第一個建議，我主張請政府發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工商企業改造贖買存單22億元，收回資本家所擁有的股票或合伙議據，使資本家與企業脫離關係。存單每年到期四次，每季到期2750萬元，除1956、1957兩年已發2.2億元外，對資本家祇發19.8億元，多餘2.2億元，作為對資方代理人、董監事與需要照顧的資產階級分子，給予一次酬勞或慰籍金，如再有餘額，即撥交全國工商聯，作為私方生活互助基金。

前項工作，擬請指令交通銀行辦理，有不願得此項贖買存單者，得聽其自便，交通銀行得代為暫時保存，或按贖買存單應得人之意旨，代為捐獻，或轉贈他人，或繳納國庫。

贖買存單應得人既已放棄贖買存單，即是放棄剝削之表現，應得人于取得捐獻收據，或繳納國庫之憑證後，即可將此收據或憑證，作為放棄剝削之憑證，而向工會爭取入會，爭取勞保待遇，經工會審查核準，給與工會會員證後，資產階級帽子，即已摘去了。如上述建議不能採取，則請研究第二個建議。

第二個建議，請政府指令交通銀行，增辟信託部，代民族資產階級保管股票，出席股東會，董事會，代收股息紅利定息，代辦儲蓄投資或建造房屋，或代為捐獻轉贈他人，或繳納國庫，按如上所述，摘去資產階級帽子。上述建議如再不能採用，則請研究第三個建議。

第三個建議請政府指令交通銀行增加代領定息業務，同時亦得代管股票，及儲蓄投資，或建造房屋，或代為轉贈捐獻，或繳納國庫。按以上所述摘去資產階級的帽子。

此外如資方家屬的勞動就業，應責成勞動部門及專業公司妥為安排，在贖買存單發行基本上完成後，國內公私合營企業一律改為國營私方人員職務，即蛻變而為公家職位，公私關係既已基本消滅，此時資產階級分子手中，祇多了一些贖買存單，其性質與國家公債大同小異，期限且較公債為長，大多數人已經必須自食其力了，與勞動人民距離更近了階級基本消滅了剝削基本消滅了，贖買政策基本完成了，工商業企業改造基本完成了，資本主義生產資料，已完全成為全民所有了。

自從我的建議書提出後，所受到的，多半是無理的謾罵，而得不到真理的幫助與批評。這一次到京以後，讀了千家駒同志的發言，他是中央經濟理論權威，也是我們工商界行政管理領導，他談到了李康年主張定息 20 年就是消極性的表現，定息 20 年除了想吃剝削飯一輩子的思想以外，同時還包括一個對贖買政策認識錯誤的問題。對這，我不得不提出一些意見與他商榷。

我的答復是：我沒有想吃剝削飯一輩子的思想。我今年 60 歲了，難道我一定能活到 80 歲麼，孩子們多已大學畢業做醫生了，他們也不會要的，況且我的定息每月不過二三百元，目前都已買公債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難，何必要計較這些呢，千家駒同志認為我想一輩子吃剝削飯未免武斷。

至於我建議贖買存單年期分 20 年，贖買金額應為人民幣 22 億元，定息兩字應該更正，我是有根據而不是捏造的。當全行業合營前夕，1955 年 11 月 22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統一認識，全面規劃，認真地做好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工作”的社論。這篇文章，我認為是黨和國家對贖買政策的方針，亦是黨和國家對工商業者昭示了贖買政策的信條。

第一段“我國在大約 3 個 5 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完成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的變革，而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這說明大約需要 15 年之期建成社會主義社會。

第五段第一節“對於我國工人階級說來，最適當的正是向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實行贖買，並且不是一下子贖買，而是在十幾年的時間裏，逐漸贖買。”“分給資本家的不足四分之一的股息紅利，資本家所得，看來不算很多，但是就全國統計，一年就有幾億人民幣，積十幾年之久，就有人民幣幾十億之多，用來作為購買民族資產階級的全部生產資料的代價，是完全足夠的了”，這說明國家將幾十億人民幣，來購買民族資產階級的全部生產資料。

第五段第二節“贖買是對物的，即贖買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除這以外，還有一個對人的問題，即對資本家進行教育改造，適當地安排他們的工作等等的問題”。這說明贖買是專對生產資料的，至於對資本家教育改造安排乃是另一回事。這是對人的和平改造。

從此可以見得黨和政府，在事先是有準備，即是需要15年之期，用幾十億人民幣，來購買民族資產階級的全部生產資料的。黨和政府採取這個和平改造的方針，是從1949年立國之初就確定了的，這個道路是和平的，倘然客觀需要，再拖一個尾巴，也是未嘗不可的。如果15年再拖一個尾巴，豈不是20年嗎？我的建議與黨和政府原定計劃步驟相對照，恐怕不是相距太遠吧，恐怕不是無的放矢吧？（《人民日報》6月6日）

復旦大學物理教研室助教、劃右派時22歲的李梧齡，說：“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不要臉的掠奪。”

### （九）破除對馬列教條的迷信

右派對各個方面所提的意見，現在綜合起來看看，就是一部建設現代化國家的建國方略，並且具有歷史證實的正確性和超前的高瞻遠矚。所有的反擊右派的批判文章，有的屬於昧良心的胡說八道，有的是糊塗得不可救藥。

上面所談，側重於政治法律，下面我們再就學術思想、新聞出版、文學藝術、人口社會、科學教育、財政經濟等方面，進行舉隅。

章伯鈞說：“生活上有二個東西，一個是物質的，一個是精神的。僅僅叫他穿西服，住高樓，吃西餐，而不叫他獨立思考，這就好比西郊園裏的獅子和老虎，吃的雖好，可沒有自由。”（7月4日，《人民日報》）這正好可用來批判今日中共之人權即生存權理論的荒謬性。何況連所謂的“生存權”，起碼也有四千六百多萬被剝奪了去；苟活下來的，也僅僅算是“生存”，在“二個東西”上，却稱不起是“生活”。

吳景超教授說：“這些人遇到一個理論問題或實際問題，不是去搜集，分析事實，從事物的客觀聯系中去尋求答案，而是去查經據典，看馬、恩、列、斯對這些問題是怎樣說的。例如，說民族問題的，並不去認真地研究中國有哪些少數民族，分布在什麼地方，有些什麼特點，而祇會背誦斯大林所講的四個基本特徵……教條主義對於馬、恩、列、斯所沒有說過的話就不敢說，離了馬、恩、列、斯就什麼文章也寫不出來。而且還迷信馬、恩、列、斯以為他們所說的任何一句話都可以施諸四海而皆準。”（6月6日，《北京日報》）1954年3月，他便在《新建設》上發表《中國人口問題新論》，尖銳地指出：“中國人口的龐大，是中國大多數人民貧窮的主要原因。”“中國的財富本是有限的，現在都要供給這許多人的衣食，安能不走上窮困衰弱的路上去。”1957年第三期《新建設》上有他對中國經濟發展很深刻，很超前的見解。“如何在最短期內，消滅國民經濟中的技術落後現象，使所有勞動者在高度技術基礎上生產，都能够創造出很高的勞動生產率，則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沒有一個大家滿意的方案。我們對於每一個勞動者所配備的生產資料，如果比理想的水平少一些，低一些，生產還是可以照舊進行的，但是這種生產，就不是在高度技術基礎上進行，而可能是在落後技術基礎上進行，那是不符合于社會主義經濟規律要求的。”

吳先生是著名的社會學家，但，“1952年院系調整之後，這些社會科學系都一概取消了。過去搞社會學的人大部分都改業了。”他呼吁恢復社會學，也被算是大毒草而成右派罪行之一。據他的學生劉佳有的回憶，他被安排講《計劃經濟學》。人所共知，計劃經濟乃蘇聯一黨專政，個人獨裁下以主觀意願取代客觀規律的產物，現在居然命一向以研究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社會的市場經濟的大教授去開講這門課程，不但強人所難，而且還有着穿小鞋的味道。劉佳有，課堂筆記三百多頁猶存身邊，記錄着吳老師的話：“計劃經濟，既包括工農業，更要考慮教育事業，尤其人口問題，不容忽視，控制生育，應列入國民經濟計劃。”這一提法被視為與潘光旦優生學一脈相通，鼓吹馬爾薩斯人口論，跟毛主席“人多好辦事”的偉論唱反調。最具諷刺意味是人民大學一位批吳最力的青年教師，後來搖身一變，撫拾吳先生的餘唾，在講計劃生育的重要性，到處吹法螺，做報告，成為國內數一數二的人口統計專家，收入可觀，是改革開放後的學閥大富。

其次，吳老師提到現代化需要原始積累時說，二戰後殖民主義時代已成

過去，人權高漲，靠掠奪落後地區，戰爭索賠和榨取工農都已不行了。中國可走的道路，除了自力更生之外，亦可考慮國際間的公平貿易，發展全球通商和合理互利的條件下適當引進外資外技。這個觀點被當做新殖民主義和賣國論，是替帝國主義鳴鑼開道而大受撻伐。

其三，現代化首先要解決的是通訊，能源和交通運輸。交通運輸方面，不宜過分強調鐵路，水運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較鐵路不遑多讓，忽視水運是錯誤的。尤其中國，除北京外，有哪一個大城市不是靠江河湖海發展起來的？即使如鐵路四通八達的美國，十大工業城市仍然是水運交通的樞紐。可見鐵路並不能取代水運，亦證明到處攔河築壩，與江湖爭田不足取。這個論點十餘年後才由美國經濟學家福格爾（R.Fogel）發現並整理出一套理論而獲得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金，名重士林。作為這方面的先知，中國學者吳景超被劃為“反動學術權威”予以打倒。對照現在中國社會實況，他有哪一點說錯了？究竟誰反動？誰先進？歷史已作了公允的裁判，也給了現在還活着的學人以莫大啓示：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是多麼崎嶇坎坷啊！”（《世界日報》2003年11月25、26日）

這裏又提出了“誰反動？誰先進？”的問題。作者自問自答說：“歷史已作了公允的裁判。”打開天窗說亮話就是：“共產黨反動，右派先進。”

清華大學教授徐璋本說，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一定要產生教條主義。《人民日報》5月25日，發表了他的言論摘要，對馬克思主義作了最精辟透徹的剖析。

他說：任何學說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種比較固定的學說作為指導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要犯教條主義。為什麼說馬克思主義決不能拿來作為中國和人類的指導思想呢？徐璋本認為，這要從整個人類歷史和宗教信仰來看。

第一：馬克思着重提出經濟上沒有人剝削人的、沒有階級的共產社會，在部分的理想上是正確的，但完全以唯物經濟基礎來闡明這個社會理想便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和離開人性的“危險性”，這就是馬克思的學說和主義同他所提出來的高度理想口號不能配合的基本原因。

第二：馬克思根據“唯物的”、“生產工具和經濟制度的”、“社會階級鬥爭的”立場宣布說，這種哲學、社會制度和方法，便可以達到大同共產社會的理想，人類地上的天堂，顯然是包含着嚴重矛盾性的一種學說。從人



生自然哲學的一體性來看，馬克思忽略了“人”的關係而把人看做經濟制度的產物，這種倒因為果的學說不能做為“人生哲學”的指導思想。另外，強調“階級鬥爭”的方法，與黑格爾的“戰爭進化論”同樣是脫胎於人類自私仇恨和殘忍本能的極端表現。這至多祇能用于被壓迫民族抵抗外來侵略過程，比如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

正是出于這樣的理論自覺，徐璋本認為，共產黨人掀起“階級鬥爭”、“思想鬥爭”的法寶，以為非此不足以鞏固“政權”，樹立“威信”，實行經濟建設，一切以馬克思學說聖典規範，嚴格奉行教條主義公式，結果使人民由感激愛戴變為畏懼沉默；由萬分積極和全民振作的奮發自新的景象一變而為奉行政府指令聽天由命的消極心理。而由于漠視人民情感，政權剛剛建立就唯恐被人反對，對人民講威信，這又是馬克思的錯誤哲學和教條公式。到處發生“擾民”，摧殘人民的積極心，鼓勵消極自私心理，而事後補救辦法又是根據中國傳統的美德，勇于認錯改錯，將“人”與“人”的關係加以考慮，也就是不自覺地承認了馬克思唯物和經濟生產決定人生的錯誤！徐璋本認為，難道救國救世必須迷信式地奉行馬克思忽略人類特徵的知識寶庫和兩種矛盾的片斷哲理，然後再以中國的傳統美德來補救嗎？這並不是真正辨證法的矛盾統一必經過程，而是由于迷信馬克思教條公式的“人為矛盾”！徐璋本說，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須要有更大勇氣來認清：“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並不等於馬克思學說和主義。如果拿馬克思學說和主義來作人類的指導思想，至多祇能在政教統一的專政下，使人民不思想，決不可能啓發創造性的思想活躍，更談不上什麼百家爭鳴。

第三：徐璋本認為，馬克思治學態度一方面承受了德國學術界的嚴謹詳盡有條理的優良傳統，一方面也承受了德國普魯士的“絕對性”和“不相容”性。這種宗教色采的絕對性和不相容性，應用在他的忘却人類兩種矛盾生物本能的“行動政治哲學”上，就產生了他的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祇講目的、不講方法的、矛盾的人生政治哲學觀。在一個被壓迫被剝削的國家民族，在長期受各種各樣的侵略，在心疲抑鬱之餘，將這個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配合的政治哲學灌輸到人民心目中去，立刻可以燃起火花，用憤怒的心情來作不畏犧牲不怕困難的解放獨立運動。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士掌握了這個“行動政治哲學”，並巧妙地付諸實行，使中國在短時間內站起來。這不得不感激馬克思所開的這付特效藥。不過馬克思並不是萬能無所不包的聖藥，這付猛烈的

特效藥在環境尚未成熟和特效已經成功之後，用以煽動人類仇恨心理是萬萬不可的。

第四：徐璋本認為，東方印度和中國特有的對人生本能的深刻體會，和毫無宗教迷信和教條主義的“大同人道主義精神”、“人天一體觀”大徹大悟，這個人生自然哲學思想是包括有關經濟生產的唯物論的部分的。“不生不滅”“無所不在無所在”是真正徹底的辯證唯物論的“人天一體觀”。而“無我無他”、“同生同滅”才是對人生兩種矛盾生物本能的徹底解脫，才是實現大同共產社會理想所必備的條件，而不需要煽動仇恨心理來推動人們的行動和積極心，這是一種最高的境界。同時他還認為馬克思所謂“階級矛盾現象”的來源並不是“自然物質能”和伴隨着的生產工具和經濟制度，而是基於人類與生俱來的兩種生物本能——自私利己與互助利他。

根據以上的理論，徐璋本認為，能真正作中國人民和人類的“指導哲學思想”的。合乎人情的，祇有中國的大同人道精神和“愛和恕”的平易人倫哲學思想，以及基督教義中以愛和恕為基礎的宗教信仰。而其最高造詣是釋迦牟尼所宣示的超人的大解脫：“無我無他”“同生同滅”“同不生同不滅”“無所不在無所在”完美辯證的“人天一體觀”。徐璋本認為，這些看法，是他幾十年來學術研究的結果，不可能全是對的，他希望大家展開討論。

徐璋本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可以說達到了非常深刻的地步，也是解釋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能與中國社會相結合，以及為什麼二十世紀初，共產主義得以在全球盛行的原因，這樣的認識，今天對於我們深刻了解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歷史都非常具有啓發意義。可惜像徐璋本這樣的思想，多年來被歷史塵封，以至於人們根本就不知道，在 1957 年，許多民間知識分子在理論認識上達到的高度。在 1957 年，多數有價值而深入的思考，是由那些自然科學的教授和學生完成的，特別是物理系和生物系的教授與學生。

《我們對於當前經濟科學工作的一些意見》一文發表於《經濟研究》(1957.5)上，作者是陳振漢、徐毓柵、羅志如（三位都是北大經濟系教授）、谷春帆（郵電部副部長）、巫寶三（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寧嘉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幹部學校副校長）等六人。文章的內容涉及面廣泛，分析深刻，很中肯綮，但文章太長，就不正面引述了。反正它的主要論點可以從批判它的文章中得以窺見，這樣，既可免去重復引證，又可觀賞馬戲團小丑滑稽，荒唐的表演。

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批判說：“陳振漢秉承章羅聯盟的意旨，首先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工作大肆攻擊，說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工作，其中包括計劃工作，財政工作，金融工作等等，都是‘盲目的’，根本沒有遵循什麼客觀經濟規律，以致偏差頗大，錯誤很多，損失不小。其所以如此，據陳振漢說，一方面是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已經成為‘過了時’的‘敝屣’，不能指導當前的經濟工作，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的國家經濟部門的負責人員不懂得經濟學常識，是一些教條主義者，官僚主義者和宗派主義者。這個局面豈不是糟糕透頂嗎？那末怎麼辦才好呢？陳振漢代表資產階級右派回答：這好辦得很！他的辦法的第一條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既然早已過時，‘是敝屣就應屏棄’，干脆把它扔掉，改用資產階級的經濟學，特別是現代壟斷資本的辯護人凱恩斯的經濟學說，把它作為國家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好了。辦法的第二條是：現在的國家的經濟工作的指導人員，既然不能擔負領導工作的重任，那末幹脆請他們下臺，讓這批資產階級右派的‘經濟學家’的人上臺就好了。經濟方面的工作應該如此這般，經濟科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方面，也應該如此這般。陳振漢的《意見書》數易其稿，洋洋數千言，其主要內容，事實上就是這樣。”（《人民日報》9月19日）

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金融研究所楊培新說：“陳振漢說馬列主義沒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方案’是毫無事實根據的。《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以及中國共產黨關於對工業，農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都說明馬列主義經濟學在這方面是有一套完整的理論的。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工業國有化，農業集體化，有計劃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文化，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準備條件向共產主義過渡，這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恩格斯在1877年在《反杜林論》中提出的理論，已預見到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80年來，這個規律已為實踐所證明。陳振漢把馬克思主義嘲笑為‘和尚念經’，這祇能證明陳振漢的反動立場。馬克思主義指導了九億人口的國家完成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這些國家的經濟建設的速度遠遠超過資本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偉大的勝利，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生氣勃勃的行動的指南。”

北大教授樊弘揭露陳振漢以主張“競爭平衡論”來宣揚資本主義的優越性，說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通過競爭可以使生產中偏差得到平衡，而社會主

義制度下的經濟建設却會產生嚴重的偏差，並且因為社會主義必然產生官僚主義，所以這種偏差不可能消除。

經濟研究所嚴中平揭發說，陳振漢在十多年前就主張：在中國的外國資本和外國工廠增加的結果並不阻礙而且幫助民族資本的積累。說是因為外國資本輸入或外國人在中國辦工廠的結果，與民族資本一樣，是增加本國人民的生產能力，也就是增加他們的所得。這是陳振漢由來已久的買辦資產階級的反動觀點。（《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29號）

民盟中常委，上海市主委沈志遠說：“在學術界，由于教主義的長時期以來的統治，使我們的學術思想，自由的思想，幾乎遭到窒息而亡的命運，因此解放八年來，我們的學術界顯得非常的沉寂。我們的學術界是沒有生命，沒有生氣的。由于黨政領導管得太多太死，妨礙了群眾積極性的發揮。我們今天各部門的管理制度恰恰不足以鼓勵群眾的積極性。在某種程度上倒反把可能調動的積極因素變為消極因素了。”（《文匯報》7月26日）

劉思慕以《剝掉沈志遠的畫皮》為題，系統揭批他的右派言行：“沈志遠以全盤抹煞新中國的偉大成就來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他把光明燦爛的新中國塗成漆黑一團，把學術思想界說成死氣沉沉……要黨對‘我們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每一個部，每一個單位，每一個單位的具體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的個別環節全面地大檢查。’因為他認為滋長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重大原因’是‘屬於制度性質’，他強調要把‘滋長這三種歪風的一些不合理制度大刀闊斧地改革一下’。在政治制度方面……在經濟制度方面，沈志遠露骨地反對計劃管理，集中管理。他責罵我們的黨政管得太多太死，集中得太龐大，太沉重。他一方面嘲諷這種制度把我們黨和政府壓得‘滿頭大汗，寸步難行’，另一方面說什麼連‘草紙，牛奶都要管到’，‘一切都要國營，一切要管起來，包下來，把人們的積極性都管光了，包完了’。他用極其惡毒的語句污蔑，醜化整個黨。他把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說成是一個結黨營私的宗派集團，把黨員以至各級領導幹部說成是嚴重脫離群眾的特權領導階級，把人事部門說成是‘鬼鬼祟祟，關起門來包辦政治’的特殊人物。”

剛從日本回國的經濟學家吳半農說，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某些經濟現狀，與馬列主義的經典分析嚴重脫節了，比如經濟危機在西方世界已經20多年沒有發生，這個問題怎麼看？（《禪機1957》，頁171）

### （十）要求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

上面，劉思慕揭批的那些，是沈志遠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工作會議上，以《黨和政府不應管得太多太死》為題作的發言。他說這樣就出現了一系列反常的現象：好些演員長期沒戲演了，好些教員整年沒有書教了，好些名醫常年不看病了，好些著作無法出版，祇好藏之名山了，好些學術工作者無法從事研究工作了。在我們這個文化落後，知識分子異常缺少的國家而出現這樣一些現象，這豈不是糟得很嗎？他對學校黨委制的作用，認為是形成了以黨代政，非黨校長無權，校務委員會形同虛設，在系裏是系秘書領導系主任的反常現象。為了改正過去的高等學校領導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他以為可以考慮學校黨委制的改變問題。他還談到出版的專業化制度，即把某一種性質，某一門學科的書歸一個出版社出版，以為這是壟斷，是一家獨鳴，就是排斥矛盾，掩蓋矛盾，取消競賽，保護懶漢，獎勵不上進，阻礙積極性創造性的發揮，它會使思想僵化，企業衙門化，出版事業的生命枯萎下去。為了消除這種弊病，他說：“今後出版事業應向社會開放，允許志同道合的人開辦像同人出版社，同人雜誌社，書刊出版發行合作社之類的機構，政府祇要掌握一些大的政策方針措施，負起監督檢查之責，其他事情是少管為好，何況你事實上要管也管不了那麼多呢。”（《解放日報》5月17日）

5月18日，《人民日報》以《老報人批評現在報紙的缺點》為題報道了新聞工作者座談會上的發言。陳銘德說：“報紙是人民的精神食糧，新聞工作者是廚師。廚師要是光注意營養價值，不注意色、香、味不行。趣味性和思想性不矛盾，正像色、香、味和營養不矛盾一樣。”他建議：一，增辦非黨報紙，能不能倡辦同仁報？二，北京應有晚報。

張友鸞說，舊社會有一句話：“記者不坐牢，不是好記者，報館不封門，不是好報館。”現在呢？他變為可以這樣說：“記者不討厭，不是好記者，報館不鬧禍，不是好報館。”

蕭離說：新聞常被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壟斷，他們想競賽也無從競賽。《大公報》社長王雲生說，現在的報紙是報喜不報憂，隱惡揚善。新聞工作者勞動生產率低。

新華通訊社的鄒震說，新聞工作的鳴放問題，就是徹底實現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問題。過去這三大自由，被管僚主義，宗教主義和教

條主義給限制在極狹窄的範圍裏去。我們的自由被“三害”給剝奪了。我們要向三個主義索還被它蹂躪了的新聞自由。我覺得今天應該喊出“民主辦社”和“民主辦報”的口號來，使中國出現更多的非黨的報紙和通訊社，出現更多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的或民營的報紙和通訊社。

中國新聞社的鄭白濤說，我們中國新聞界的單調，枯燥，是這些教條主義者造成的。一個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官僚式的社長總編輯，比個檢查官更妨礙新聞工作的發展。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的莫如儉說，我國目前報紙的性質和作用根據列寧1901年定義：“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者和集體的鼓舞者，而且還是集體的組織者。”……而目前我國報紙受那個定義教條的束縛，報紙祇限于指導性和思想性。因之不能滿足他們（廣大讀者），產生矛盾。

《人民航運報》記者趙琪，把當時占多數的報紙即共產黨的黨報稱為“領導機關所有制的報紙”，認為它的特點是：一，公文指示多二，教訓口吻多，三，首長言行多，四，有些話不便于講，五，有些話不敢講，六，有些話不準講。他認為“人民群眾所有制的報紙”新聞多，服務周到，新聞人物活動多，什麼話都可以講。單純代表機關意見而不為讀者服務的機關報，它的生命已經危險了。

《中國青年報》總編輯張黎群不贊成社會主義報紙指導工作法，認為現在的報紙是布告牌，留聲機。

這些右派言論在6月24日舉辦的第二次新聞工作座談會上受到批判。中國新聞社孫殿偉批判鄭白濤說，鄭在社內就有許多反動的謬論，同意章伯鈞的言論，主張中國要實行兩院制，主張辦反對派的報紙。在章伯鈞，章乃器，儲安平等人的反黨活動被揭露後，他仍然替他們辯護，說“黨天下”的說法是對的，定息不是剝削，而是和銀行裏存款的利息一樣。他認為目前對右派分子的駁斥是官僚主義，教條主義的作法。同志批評他，他說這是共產黨愚民政策的成功，並把這些人稱作打手。（《人民日報》6月26日）

北大新聞系方漢奇批判顧執中所說的：憲法有的被徹底破壞，有的有名無實，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事實上都沒有得到保證。（按說這是無可反駁的事實，但直至如今，無恥的投機政客們竟然仍能彈舌如簧——紫丹。下面是6月26日《人民日報》所載顧執中先生的原話全文，請讀者與今天的情況作一對照。——紫丹）

### 顧執中：《憲法有的被徹底破壞，有的有名無實》

憲法所規定的條文，有些是有名無實，有些被破壞而沒有受到制止。例如憲法第 85 條規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實際許多現象却不是這樣。第 89 條規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經法院決定或檢察院批准不得逮捕，而肅反時的行動證明這一條文完全被破壞了。第 87 條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事實都沒有得到保證。例如有些批評人民日報的文章，至今仍未被登出。報社祇登風平浪靜的東西，揭露人民內部矛盾稍微聯系到某些人物、部長等便不予發表表集會結社的自由更少，許多人民團體幾乎都是官方包辦。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黨派？憲法沒說不行，但事實卻沒有人敢大膽地做。第 94 條規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但高教部和教育部却在叫請大家原諒，說因為學校少，生育沒有節制，人太多了，不能人人入學，這樣憲法也被破壞了。

憲法自 1954 年通過以後，有的被徹底破壞了，有的有名無實。也很少有人執行憲法中所規定的統戰政策和民主集中制。大家都把憲法當作一張紙，通過後也就算了。想當年，在討論憲法草案的時候，大家都願為保護憲法而鬥爭，現在從劉委員長到一般公民誰也不提保護憲法了。這樣下去，把憲法當成了手紙，亂關人、亂捕人、拆信等等，都可以為所欲為，將來何堪設想！？

中宣部的宗派主義情緒很濃厚，解放後對老新聞工作人員很少照顧或者沒有照顧。解放後仍允許續辦的一些報紙如文匯、新民等報也沒有得到政府的照顧，讓非黨的報紙自生自滅。黨報與非黨報、黨報記者與非黨報記者的待遇都不同，非黨報記者採訪時受到輕視，許多的機關還不讓他們去採訪。

解放前有許多通訊社，現在名義上有兩家——中國新聞社和新華社，實際國內新聞祇有新華社一家，包辦了全國的消息，肚子吃得太飽撐不下。

我建議：一、民主黨派宣傳方面的負責者應該參加中宣部的宣傳會議，頗如“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不是句假話，即使不參加宣傳方面的領導工作，也應該讓我們知道會議情況。二、新華社應像塔斯社、路透社等那樣，成為國際性的通訊社，國內則開放讓民主黨派、團體、地方辦通訊社。

參加了許多座談會，感覺有兩種偏差：群眾有些左，《人民日報》又有

些右。在過去運動中受到整的，雖然知道大“鳴”大“放”不應越出擁護共產黨和建設社會主義這個軌道，但在講話時，控制不住感情，不免有越出軌道的地方。

民主黨派成員講話很苦，稍微講得厲害點，報紙上便批評，和風細雨一點，又會挨罵，所以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很難做到恰如其分。

儲安平的發言，意思可能是好的，但用詞不當，有刺激性，建議九三學社領導加以討論，以免引起混亂。（《人民日報》1957年6月26日）

安崗批判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王中模糊了報紙的戰鬥方向，說報紙同讀者是“五分錢”的關係，祇是在商品基礎上才能發生作用，說不注意報紙商品性的黨報是“一片教條主義”，“寡婦臉”，“官報”。右派分子彭文應認為，斯大林的錯誤發生原因之一，即報紙長期沒有揭露錯誤。報紙要敢于揭露錯誤，不要報喜不報憂，也不要祇打蒼蠅蚊子。

可贊可嘆！彭文英同章、羅、儲、陳作為“反右是正確的，必要的”的人證，而被定為中央級的五名終身右派！

自從毛澤東把這種生動活潑的自由辦報思想的鳴放，惡狠狠地定為“黑雲壓城城欲摧”，直到江核心，直到胡溫新政，中國的新聞自由被國際公認為最糟而跟北朝鮮一起敬陪末座。

出版界的意見，曾彥修具有代表性。他認為蘇聯的出版機構，組織制度是落後的，而我們把自己的傳統完全革掉了，一切照抄蘇聯。“解放後基本上停止了學術著作，而讓蘇聯的小冊子泛濫于市場。”對於隨便砍掉專門刊物，他認為：“把出版局砍掉中國不會亡，把這些學報砍掉，中國沒有科學，却要亡的。”“解放後幾年來，光出了一些教條主義的小冊子，連環畫，沒有真正的出過一些有分量的東西。”“難道我們單靠一些教條主義的小冊子就能立國嗎？”“過去搞七，八年，結果出了不少三，四流的翻譯書，反特小說。著作出不了，而對外國人的胡說八道的小冊子却浪費了不少紙張。”“出版工作去搞些沒有味道的事，也是不行的，如為了規定《毛選》在全國同一天發行的組織工作花了不少力氣，實在是無聊。”事情是人辦的，對領導，對同志，對組織處於執政地位受到的腐蝕以及廣大群眾已經“怨聲載道”，他認為“八年來相當大的一部分黨員沾染了骯髒的腐朽的東西……因為他已得到某些東西了，官方身分，統治者一分子，生活職業有保障，有東西可保守了……人社存在黨員享受特權現象。”



《人民日報》7月18日載，首都出版界反右派鬥爭會上有人質問他：爲什麼要硬說解放以來沒有出版什麼有分量的學術著作，難道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和毛澤東同志的著作算不得有分量的學術著作嗎？有人分析說：曾彥修主張辦“同人出版社”，就是不要黨的領導，要恢復資本主義的所謂出版自由。

文化部副部長陳克寒，在10月9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出版工作必須實行計劃化》，說：“出版界的右派分子曾彥修、藍鈺、子崗等人，都竭力反對出版事業實行社會主義的計劃化。他們認爲：計劃化‘把個人的積極性限死了’，‘選題計劃根本不必要’。藍鈺故意把解放以後的出版工作描繪成‘矛盾百出’，‘笑話百出’，並且把它歸咎于出版事業的計劃化。他們特別攻擊紙張的計劃供應制度，提出所謂‘自由買賣’，‘自由出版’的荒謬主張……其目的，是要否定黨的領導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指導，使出版工作處於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無政府狀態，以便傾銷資產階級的私貨，爲資本主義復辟開辟道路。”

### （十一）發出“救救科學家”的呼聲

可以看出，阻礙各項事業發展的基本關鍵在於，政治上獨裁壓制民主，或專業上外行領導內行。特別是，表現在科教文藝方面。毛澤東這個災星，在這裏創造了兩個重災區，他說：“大學裏，一個中文系，一個歷史，唯心論最多。”（《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44頁）唯物論大史學家翦伯贊著文《右派在歷史學方面的反社會主義活動》，批判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雷海宗：“雷海宗用一本《雅典憲法》作武器，向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科學進攻。他發表了荒謬絕倫的馬克思主義停滯論，過時論和不符合國情論等等陳腔濫調。他誣蔑地把社會主義國家的科學說成一錢不值，而在另一方面則把他心愛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社會科學’捧上了天。他說：‘整個社會主義的社會科學太薄弱，太貧乏。’‘蘇聯歷史科學水平之低是驚人的，蘇聯學者的著作，在資本主義學術界看來連評論的資格也够不上，可以說不是科學作品。’甚至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寫歷史的書很少，僅有幾本也是趕任務的書。’而在資本主義國家則‘可以清楚地指出它有那些學派，那些代表性的著作。’又說：‘最近六十年來，世界（資本主義世界）的社會科學仍在不斷的有新的發展，不斷地增加新的材料，對舊材料不斷地有新的認識新的解釋。但這

些對我們社會主義陣營的社會科學界來說是等于不存在的。我們今天仍滿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當時的認識條件和資料條件下對問題所說的個別的語句’。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真是極盡誣蔑之能事。雷海宗的謬論，主要的是說馬克思主義過了時，實際上過了時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資產階級的所謂科學方法。慢說資產階級已經臨于沒落的時代，就是在這個階級的青年時代，資產階級的所謂科學方法，也是像馬克思所說的，‘好像是一匹笨重的馱馬，面臨本質與現象，結果與原因，就一籌莫展了。’而雷海宗却說這匹‘笨重的馱馬’到了垂死的時候反而出現了一日千裏的奇迹，豈不是神話。”

他還批判榮孟源“主張復古主義，企圖用主要是封建主義的歷史學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說孟在《建議編撰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資料》一文中“沒有一個字提到馬克思主義。”這個邏輯被戚本禹繼承下來，給中國的赫魯曉夫扣上“背判無產階級專政”的帽子，理由是“《論修養》祇字不提無產階級專政。”這裏的論據也是“祇字不提”。這時候，大歷史學家，言必稱馬列的翦伯贊將面臨滅頂之災。如果說楊家將楊敬業是一頭碰死在李陵碑上，嘲諷雷海宗“把他心愛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社會科學’捧上了天”的翦伯贊却一頭碰死在“他心愛的社會主義祖國的所謂‘毛澤東思想’”的豐碑上。他如此飽學，祇是沒有學到：“歷史的戲劇性在于請君入瓮。”

章怡和的文章《歷史學家翦伯贊之死》，這樣寫道：“翦伯贊却已有輕生之念。他大惑不解的是：毛澤東說要給他出路，事實上的生路又在何方？原來都是假的，虛的，空的！絕望之心，生出決絕之念。

“第二天，人們發現翦伯贊夫婦服用過量‘速可眠’，離開了人世。他（她）倆平臥于床。二人穿著新衣服，合蓋一條新棉被。在翦伯贊所著中山裝的左右口袋裏，各裝一張字條。一張寫著：‘我實在交代不去（出）來，走了這條絕路。我走這條絕路，杜師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張則寫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戚本禹接見一個叫“反到底”的造反團時，裝大蠟地說：“你們知道什麼叫‘反到底’嗎？反到自己身上才算是反到底。”戚本禹這個史痞後來的下場，當然祇是為此命題“歷史的戲劇性在于請君入瓮”，添一實例而已。

這時候還不知此後瓮之將入的翦先生還在燒瓮，使勁地批判另一位右派歷史學家：“向達在很多會議上的發言中對科學院的黨的領導大肆攻擊。他

說科學院的領導是外行領導內行。一些行政領導的黨員幹部都是外行，‘根本不懂業務’。他說科學院的黨的領導‘有如張宗昌帶兵’，把共產黨比作北洋軍閥。向達說：‘現在史學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範文瀾的宗派主義分不開的。’又說：‘這幾年史學界的人意氣消沉。’他閉着眼睛問：‘歷史界解放後這樣不行，黨裏負責的人要不要負責？’請問向達：你從哪裏看出現在的史學界是‘奄奄一息’，‘意氣消沉’？又從哪裏看出是和範文瀾的宗派主義分不開？”“對於黨的領導雷海宗也放射了毒箭。”翦伯贊的批判並不限于學術領域之內。“他誣蔑‘中國知識分子一言不發的本領在全世界的歷史上可以考第一名’。他說解放後知識分子‘一般地是一言不發的，或者祇能希望他們發的一套假言’。大家請注意雷海宗在解放以後所說的都是‘假言’，沒有一句‘真話’。大家都知道歷史學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真實性，一個言不由衷的專說假話的人，怎麼能給學生以正確的歷史知識。我們希望他把心裏的真話說出來。雷海宗在文章中還談到不要黨‘發號施令’，並威脅地說，不然，知識分子就要說假話，或者‘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地消極怠工了。”（《人民日報》10月4日）

致公黨中央副秘書長嚴希純說，有的在科學機關作領導工作的黨員，自己不懂科學，又不虛心學習，尤其不好的是不懂還要裝懂。有些黨員還把領導科學技術機關看成帶軍隊一樣，把科學家、教授、工程師，一律當成自己的下級，不尊重他們的意見，也不給以應有的禮貌。他還說，科學技術工作在研究過程中是允許失敗的，但現在却一遇失敗就要追查科技人員的責任，甚至懷疑有政治問題加以逮捕。這樣專家們如何敢于負責呢？（《人民日報》5月16日）

《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是民盟中央推派曾昭掄、千家駒、華羅庚、童第周、錢偉長5人成立“臨時研究組”，廣泛徵求和收集了各地盟內科學家的意見而提出的一份較全面，系統的報告。內容包括五個方面。郭沫若以《駁斥一個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為題進行了批判，隨後根據運動的深入發展又作過補充發言。

第一，“爭取12年內使我國最急需的科學部門接近世界先進水平，必須‘保護科學家’，就是採取具體措施保證科學家，特別是已有一定成就的科學家有充分條件從事科學工作，扭轉目前科學家脫離科學的偏向，首先要協助他們妥善地解決時間，助手，設備，經費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問題，使他

們真正能够坐下來，好好安心工作。”

郭沫若批判說：“這個意見書中提出了所謂‘保護科學家’的口號。這顯然是企圖造成一種印象：我國科學家受到一種威脅，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護’。事實上有人說過這樣的話：‘解放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遭受了一次‘浩劫’。他們這樣不顧事實危言聳聽的目的，不外是想離開科學家同黨和政府的關係，引誘他們走上錯誤的道路。”

第二，“目前科學院、高等學校和業務部門之間存在的問題，主要是本位主義，大家都想保存本單位的幹部，不願外調，甚至怕談合作，怕這樣會拉走了人，影響了自己。有些單位對於少量的必要的人員調動，也張大其詞，互相埋怨，因此，在單位與單位之間逐漸形成了一堵牆。”

第三，“要發展社會科學，首先要改變對待舊社會科學的態度。有人認為資產階級社會裏沒有社會科學可言，因為那些過去被稱為‘社會科學’的東西都是不科學的，對於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祇有批判，談不到接受，對舊社會科學不是改造，而是取消，這些做法我們認為是不妥當的。對待舊社會科學應當是改造而不取消，因此應當恢復的應即採取適當步驟予以恢復，應當重視的就應當重視起來。在社會科學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當成客觀規律。我們認為應該鼓勵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重視調查研究工作，根據實事求是的精神，對政府的政策法令提供意見，政府部門應主動地將有關資料盡量供給有關的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並幫助他們創造研究工作的條件。”

郭沫若批判說：“在我看來，今後為了發展社會科學，首要的任務就在于繼續擴大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的隊伍，提高馬克思主義的水平，而不是什麼發展資產階級社會科學。那種‘恢復’資產階級科學的主張，實際上是開倒車，反對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社會科學。如果按着這個主張去做，其結果是削弱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領導，而使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重新泛濫。”

郭後來又補充批判說：“他們在這裏，一方面污蔑共產黨和政府的政策措施等等都是盲目的，而不是依據客觀規律的，另一方面又污蔑共產黨和政府不準‘學者們’從事科學研究，祇準他們作些政策方面的‘宣傳解釋工作’。事實是這樣嗎？暫且不說許許多多的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是把宣傳解釋黨和政府的政策，作為自己光榮的職責的，現在我祇問問右派先生們：黨和政府究竟在什麼時候禁止過‘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對客觀經濟規律進行研究

呢？”

第四，“科學研究工作應該有領導的進行。我們希望科學規劃委員會的工作進一步加強，並建議有條件的省、市也設立相應的機構，以加強領導。至于學術領導和科學研究的‘火車頭’，我們認為應在實際工作逐漸形成，不要主觀地先行規定誰是領導，誰是‘火車頭’。”又說：“科學研究工作除少數必須集中外，應盡可能把研究工作去‘就人’，科學家在那裏，研究工作就放在那裏。”

郭沫若批判說，“反對有計劃有重點地發展科學工作，反對對科學工作的統一領導，其結果就是要使我國不能充分利用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來發展科學事業，就是要使我國科學工作長期停留在落後的狀態。”

第五，“過去在升學，升級，選拔研究生，留學生時，有片面地強調政治條件的偏向。我們認為今後應當業務與政治並重。人民內部在培養機會上應一視同仁。對於有培養前途的青年都應當平等地看待。”

郭沫若批判說：“企圖以資產階級虛偽的‘平等’觀，在青年中進行挑撥和煽動，指望造成一部分青年對黨和政府不滿。”他認為，“如果要‘一視同仁’，那倒真正是不平等了。先說工農學生吧，大家知道舊中國在反動統治之下，工農子女被剝奪了受教育，特別是受高等教育的權利。現在，反動統治已經被推翻了，對於這個不合理的不平等的狀況，難道我們不應該盡最大力量加以改變嗎？”

這位郭大院長把這份“意見書”批得體無完膚，然後扣上了如題目所示的大帽子：“意見書是一個徹頭徹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科學工作綱領。”——

“黨和政府的方針是，科學研究工作要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意見書中對於這點一字不提。”他說：“這不是一個孤立的文件，而是章伯鈞等右派分子企圖奪取國家領導權，首先是文教工作的領導權的陰謀的一部分。”（《光明日報》6月9日；《人民日報》7月6日和9月19日）

跟常識水平的是非開玩笑，瞪着倆眼說瞎話。用共產黨自己的標準來衡量，郭沫若的馬屁也拍得太過火，太傷天害理。1980年5月8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關於愛國人士復查問題的請示報告》中說：“在批判‘章羅同盟’時，曾經把民盟中央的《對於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和《我們對於高等學校領導制度的建議》，說成是‘章羅同盟’的反動綱領，事實上，這份意見書不是章、羅二人提出的（就是章羅提出的又如何呢？——編者），

而是民盟中央分別由曾昭掄和黃藥眠負責的兩個小組起草的。在這次復查中，我們和有關部門及民盟中央都認為，這兩份意見書的基本內容是可取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不是‘章羅同盟’的綱領。”這當然不是專門針對着郭沫若一個人的胡說八道而發的，但却揭露了郭沫若寡廉鮮耻、喪盡天良的奴才嘴臉。以他的接觸和了解，絕不可能把毛捏造的‘章羅同盟’（明白的事實，是章羅連有“同盟”的可能性都沒有）信以為真；無需他那樣的通古博今，就該會認識到《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和《我們對於高等學校領導制度的建議》，完全是個合理化建議。不管怎麼說，他竟能顛倒是非，曲意逢迎，振振有詞，逐條把它們批得體無完膚，確實證明“四大不要臉之首”對於他是當之無愧。而“首上之首”毛澤東才是無耻之尤，制造“章羅同盟，古今奇冤”的罪魁禍首。作出這樣連自己也明知是純屬捏造，並且相信別人也同樣明知他老毛在捏造，他還要在兩個“明知”的情況下，涎着臉皮在在光天化日之下捏造；而郭沫若却是在四個“明知”的情況下，硬說：“公鷄會下蛋”。別說這兩個人還號稱是“大人物”，即便是小癩三，也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小癩三。

### （十二）反對奴化教育，發展學生的主體性；取消黨委制，實行教授治校

現在再來看看由黃藥眠、費孝通、吳景超、褚聖麟、侯在幹、李西山、陶大鏞、陸近仁組成的工作組並由黃藥眠執筆寫成的《我們對於高等學校領導制度的建議》。

“目前高等學校中存在有好多問題，問題之所以產生，我們認為主要是由於：一，有許多黨員同志對黨中央的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認識不足；二，有許多黨員同志沒有掌握到學術機關的特點，錯誤地把它和一般的政權機關等同起來；三，有許多黨員同志的民主作風不夠，高等學校中的重大措施很少和群眾商量，甚至有些人錯誤地認為一切由黨員包辦，才算是實現黨的領導；四，有些黨員同志沒有充分認識到知識技術力量在近代國家建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五，有些黨員同志對於目前要辦好高等學校，究竟應該依靠誰，沒有明確的認識。

“除了這些有關思想認識的原因以外，學校的領導機構也的確存在一些問題。在解放初期，各高等學校是用校務委員會來執行領導的。後來學習蘇

聯，採取一長負責制（實際上也並沒有執行過）。黨‘八大’以後又改為黨委負責制。最近人們對於黨委負責制表示了不少意見。但究竟什麼是學校黨委負責制，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看到黨中央對這方面的具體規定。比方黨委負責制和普通機關裏的‘黨組’有什麼分別，它和校長，校務委員會之間的關係如何？我們也很難說出一個輪廓。既然對於這個制度，我們還沒有研究，因此我們也就很難對它表示意見。不過就目前的領導機構的情況看，的確已經顯露出好些毛病。如嚴重的以黨代政和黨政不分的現象，如校務會議多流于形式，如非黨幹部有職無權，如群眾意見很難通過一個組織系統反映上去，發揮監督作用，如秘書實際上領導系主任，如在教師中占相當大的比重的民主黨派，直到現在還沒有有一定的地位等等”。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胡錫奎批判說：“在這個以‘建議’作為幌子的徹頭徹尾的反動綱領的第一部分裏，右派對黨，對黨員進行了惡毒的攻擊，把在高等學校裏工作的黨員刻劃為‘不懂政策’、‘不學無術’而又‘專斷獨行’的‘獨夫’。把黨委制描寫為產生‘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的東西。右派分子捏造了這些莫須有的罪狀，正是為了給從各個大學裏趕走共產黨員，消滅黨委制的這個陰謀提供論據。綱領的第二部分，窮凶極惡地干涉了黨的內政，擅自規定限制黨在各大學的活動範圍的清規戒律，甚至限制共產黨開會與說話的自由，這種限制有些類似國民黨反動派的《防止異黨活動辦法》。綱領的第三部分、第四部分、第五部分中，右派更是挖空心思地製造了種種委員會，其目的是通過他們的活動，使共產黨的領導權化整為零，全部消滅。其中最狠毒的是右派企圖設立以教授、副教授占絕對優勢的校務委員會，作為高等學校的最高領導機關，表面上是要擴大民主，而實際上他們的校務委員會是不要校長參加的，他們規定‘黨的校長或副校長對於校務委員會的決定持不同意見時，他可以有否決權，但如果這個決議第二次被通過時，則決議仍必須執行。’這就是資產階級右派否定黨委制代之以校務委員會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實行篡奪領導權的明目張膽的陰謀計劃。這個陰謀計劃是要保證右派可以在高等學校中橫行霸道，為所欲為，把高等學校變成資本主義復辟的根據地。”（《人民日報》7月30日）

在教育問題上，右派的主要觀點是，在領導體制上反對黨委制，黨員特權，力爭“民主辦校”，“教授治校”。在課程設置上，主張恢復社會學（如吳景超等被批為“實質是要擴大資產階級思想影響進一步奪取思想陣地向馬

列主義進攻。”)。當然，同時也反對一切照搬蘇聯，對蘇聯所表現出的前所未有的洋奴思想，以及反對罷黜百家，獨尊馬列。

在教育思想上，主要表現在錢偉長所提出的培養目標上。他認為，高等工業學校把培養目標設定為工程師是不現實的。如果培養目標是工程師，那就必須把有關的各項知識全部傳授給學生，可是事實上是辦不到的。他說，必須把培養學生具有獨立工作能力和把全部知識傳授給學生二者嚴格區別開來。高等學校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把全部知識傳授給學生，但是高等學校必須給學生打下一定的理論知識基礎，訓練學生在一定範圍獲取新知識的能力，為將來成爲一個工程師作好準備工作。錢偉長認為，當前高等教育的特點是繁瑣。課程門數花樣繁多，又是基礎課，又是專業課，又是專門化課。學生一學期要學十多門課，每周學習時數在 30 小時以上，一天到晚在教室裏換班子，上了這堂課，又是那堂課，以致走馬看花，學得不深不透，更談不上工作能力的培養了。他說，西德的高等學校每周祇上 17 小時，美國有的工業大學每周連上課帶實驗在內祇有 20 小時，它們也同樣培養出了相當水平的人才。他還說，中國學校的專門化設置是采用蘇聯的，可是蘇聯的工業水平要比中國大 20 倍，運用人才的靈活性也比中國大 20 倍，按中國目前的工業水平來看，分工還不可能過細，對於人才的需求還不可能算得十分精確。因此，專業不宜分得過專過細，以免產生“學用不一致”的傾向。（《光明日報》1 月 7 日）

《人民日報》7 月 4 日載，在清華大學批判錢偉長的會上，張子高教授發言，說 1 月 7 日《光明日報》發表錢偉長關於教學計劃，培養目標的談話，實質上在總的方面否定了學習蘇聯的方針和教學改革的成績，在教學環節方面是否定了學習，畢業設計，忽略了專業課和專業設置的意義。他離開社會主義教育制度，即有計劃有目標地培養高級技術幹部，而企圖轉回到資本主義教育制度，即通才教育。章名濤教授說，錢偉長說現在五年制的學生不如解放前四年制的學生。這就是說過去的英美制的教育制度比現在學習蘇聯的教育制度要好得多。難道說英美的教育制度是適應社會主義國家的麼？

對錢偉長的所有批判，幾乎都是有意、無意地在說廢話。比如，說他的主張是這個，是那個，一則有很多“不是”錢的主張，是硬加在他頭上再予批判的；二則，“是”，爲什麼就不對？其實，他是在一黨專制下，旗幟鮮明地提出教育要發展學生的主體性，特別是在《中國青年》雜誌（1956



年1月5日)上發表的《過嚴地管教青年是封建教育思想的反映》，更是一篇反對黨的奴化主義，倡導個性解放的民主教育宣言書。“幾千年來封建社會殘留下來的封建教育思想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封建社會對青年的‘教育’，有一整套，現在我們雖然已經不用那一套‘老成持重’，‘溫文典雅’的字眼，但是這些字眼的某些內容却在‘服從’，‘虛心聽取群眾意見’等另外一套字眼內借尸還魂了，有許多對青年的不合理的要求，是借助於‘服從祖國需要’這樣的光輝的字眼裏混了進來，新名詞混進了舊內容，確實迷惑了不少青年。”(何止青年？由革命名詞包裝起來的最腐朽的封建主義糟粕，不是也讓壯年、老年、其中不乏飽學之士，奉若神明嗎？——紫丹)

“約束和管教太多，終究是和發揮青年積極性和創造性的要求不相符合的。”(人之所以成爲人，以及在什麼程度上成爲人，是由他的主體性的性質，及其發揮的程度所決定，所表現的。主體性就是一個人自我實現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共產黨的教育就是要千方百計扼殺人的主體性的奴化教育、愚民教育。——紫丹)

“我也曾見過活潑的青年漸漸地變成沉默寡言，青年自小在一起的好朋友因爲怕被檢查‘小圈子’而漸漸疏遠了，正當的生活愛好和業餘特長受到了限制，一切好像都有顧慮，甚至像吃根冰棍都可以算做生活浪費。這樣動輒得咎的生活，顯然祇會傷害他們的銳氣，是無益於青年的教育的。”

“批評和自我批評在主要的原則性問題上友愛地進行是有好處的，如果是爲了‘批評’而‘批評’，沒有‘對象’找‘對象’，則就會產生消極的作用。在目前，這樣代表着友好和關心的字眼，像‘幫助’和‘批評’，都變成了‘管教’的代名詞，實在指出了我們的封建殘餘是根深蒂固的。”(因爲你錢偉長是國際知名的自然科學家，共產黨需要你，暫時還算尊重你，所以你還有人格尊嚴，還能說出有人格尊嚴的人才能說出的話。一年之後你給劃了右派，再來嘗“幫助”和“批評”的滋味，就知道遠甚於“管教”了。——紫丹)

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何東昌說：“錢偉長在校內已成爲右派的首領了，一切消極因素，都和他混在一起去了！”(《人民日報》7月21日)與你同爲清華副校長的張維說，錢偉長等人炮制的“這個綱領是章伯鈞的政治沒計院中科學的部分。他策劃着用這個綱領首先在文教和科學部門打開缺口。這是他們這個集團在長期內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的活動！”之前還說：“依我看，錢偉長他們的意圖就是：(1)醜化黨，借以收買人心，達到對

科學的領導權，(2)煽動挑撥，(3)抓人事權，(4)反對科學院的領導。”(光明日報，7,6)你們“三錢”之一的錢學森說你已經墮落成爲“最惡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吳晗說你是在政治上向黨“敲詐勒索!”(《人民日報》7月6日)梁思成稱你“索興撒賴”，“無賴到了極點!”(《爭鳴》10月號)

“在學生升學的問題上……在不少地方……硬性地過多地限制了學生的志願。有一位愛好農業而有一定基礎農業生物知識的青年，在今年偏偏把他‘動員’到師範學院去了，而且限制在祇能在某某省的師範學院去了，才算是‘服從了祖國的需要’。”

“大學畢業後，學非所用的人也不在少數。如有意見就給你扣上大帽子。我們強調了服從需要，很少照顧到個人的志願和專業的培養，使青年在這些問題上受到了不應有的過多的限制。積極爲這些問題提出意見的青年，總是被認爲落後分子。”

“總之，對青年的清規戒律是太多了，管得太緊太厲害了，我們反掉了自由主義，而讓封建主義的殘餘從後門鑽了進來。清規戒律就是不相信革命群眾的積極性，就是封建社會教育思想的殘餘。”中國封建社會的傳統教育中也有優良的部分，如學思並重，舉一反三的啓發式，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主體精神……可惜，中共這時的教育繼承了其中重教輕學，重知輕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貶損自由，壓抑個性等糟粕部分，並使之與列寧的“從外面灌輸”的教育思想相雜交。這便是錢偉長以現代教育的目光所審視的這個赤色殖民地的教育怪胎。在教師中重視政治，思想改造，輕視業務提高，即反右之後才叫出名堂的，所謂批白專道路，而在業務中，更是輕教研和科研。費孝通在《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中寫道，周總理號召“向科學進軍”，有的學校祇是刮起一陣風，“吹皺了一池春水”。當教師的科研和教學發生衝突後，學校領導“不去分析怎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更不自覺到這正是缺乏具體領導的結果，反而大叫教學與科研有矛盾，教師名利心重，輕教重研……我想，強調知識分子搞科研是爲名利雙收，是個人打算是不好的，因爲和事實不符。”

“中國民俗學之父”鐘敬文先生導致被劃右派的在5月16日校部領導幹部座談會上的發言，把“三害”斥之爲：《“三條老虎”橫衝直撞給教育事業帶來損失》

### “黨外人士應有職有權，不要以秘書、助教干涉我”

黨委制是需要的，但是黨的神經系統（組織系統）如何搞須要研究。黨對黨外人士既然政治上與業務上是信任的，就應有職有權，讓年青黨員領導黨外人士是不妥當的。我在很早就靠近黨，我的覺悟與水平都不比新黨員差，不要以秘書、助教來干涉我，讓預備黨員來領導我就不服。

### “過去公安工作做的太多了，高級知識分子中是教育、統戰與宣傳部門的工作。”

我始終認為我校黨群關係不好，高等學校黨委對高等學校的特殊性沒抓住，在高級知識分子中屬公安部門的問題不多，是教育、統戰、與宣傳部門的工作，過去好像認為黨外人士不可靠，這道牆防範得太厲害，鬥爭一個人容易，要挽回就難，感情不容易恢復，過去公安工作做的太多了。有朋友問我：“究竟師大黨群關係怎麼樣”？我說以我為例是很好，但這在學校方竟是特殊的。外面對我校統戰工作印象不好，對我們的黨群關係有一定的看法。校內有些負責同志缺乏自我批評的勇氣，我曾幾次進言。如評薪工作，黃藥眠、蕭璋不了解情況，李筠雖好但不懂業務，黨委除了兩個老頭都是年青的，情況不了解，決定級別不準確，何副校長告我有四人不滿。實際不如此，我現在半官半民，我了解情況，告訴何副校長能改就改，不能改就應吸取經驗教訓。

### “我身邊的老虎推倒了莊稼，撞倒了房子，吃掉了小孩，剩下了骨頭”

毛主席在八大開幕詞中指出宗派主義、官僚主義、主觀主義，我聽了非常高興，老虎一捉就捉對了，這三條老虎橫衝直撞給教育事業帶來損失。

知識分子不會造反，學校裏不祇是公安工作，而問題是宣傳、教育、統戰部門的工作，要團結、教育。我校工作做的不好，在我身邊的老虎推倒了莊稼、撞倒了房子，吃掉了小孩，剩下了骨頭，捉住了老虎真是很高興。

### “實際是客人地位，有主人翁感是假的”

我校三個主義都存在，嚴重的官僚主義籠罩一切，教條主義充滿教研組，

現在有些教師談虎色變，這些人不是反革命，要依靠這些人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教育事業，這樣的壓力怎能發揮他們作用。這一年來情況好些，但基本情况未改。如教育系教條主義的統治從領導起解除了一些（董渭川插言說不見得是解除了一些），基本未變。主人翁的感覺是從主人翁的地位而來，實際是客人地位，有主人翁感是假的，沒有什麼用處，虛偽的東西沒有價值。

### “牛皮浸水拖不動，不會出大民主，出了大民主也會解決問題了”

學校的三條老虎，首先是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在教研組中的統治最囂張，據馬特反映：邏輯學寧可請人大年青人來給政治教育專業教課，而讓馬特去教外系本科學生。官僚主義在高等學校為害最小，我與方銘說黨委應利用八大文件好好學習，使三條老虎收斂一下。黨團員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非常突出，如政治經濟學和哲學教研組有宗派主義，主觀主義應從黨員先檢查，根據中央精神在群眾面前檢查自己。後來黨委布置學習八大文件時說要體會精神，不要聯系實際，這說明黨委不正視工作上的缺點與錯誤，黨委常對錯誤做解釋，這樣工作方法不好。我近半年在學校不愛講話了，牛皮浸水拖不動，不會出大民主，出了大民主也會解決問題了。

### “黨政負責人發現錯誤應拍胸承認，怨有頭，債有主”

校黨委在貫徹與高校有關的政策不夠及時，瑣碎小事做得周到，有時很細致，這是思想作風與工作作風問題。做事不敢負責這是不好的，黨政負責人對自己要做的事考慮要細致，與群眾商量後再做，如發現錯誤應拍胸承認，“怨有頭，債有主”，封建社會的正派人也有這種道德。黨委一般同志對問題愛解釋，如我向張斧提出百家爭鳴政策在我校的貫徹問題，張說：“我們沒抵觸。”但實際我校漠然無聲，這是否抵觸？中央政策不執行就是抵觸，不願承認錯誤，這是對中央政策的態度，黨組織不貫徹政策應負什麼責任？可能黨委意見不一致，戰鬥性不夠，疲踏。

“黨委整風應行動起來，不要人家‘將軍’、中央鞭策才搞。”

整風道理已不用再說，應行動起來，做為黨組織這樣疲踏不應該，要人家“將軍”才搞，我向張剛說這樣疲踏不行，學校有些同志誠懇為黨工作，但有缺點：①群眾路線走的不够；②未變外行爲內行；③政治敏感不够。

黨中央非常有決心，通過整風運動來調整人民內部矛盾，我黨委等中央鞭策才動，應用種種辦法如大會、小會、個別談，打開道路，爭取主動，體現中央政策，聽取群眾意見，黨委個別同志決心不大，老一套想過關。黨委是否下最大決心貫徹中央指示精神還值得注意。

### “政治上沒問題，業務好的排出去，這是自私自利”

我三大主義是存在的，如人員錄用、留助教問題上，中文系去年留20幾個助教，祇有一個非黨團員，有的業務很差。分配出去的有些是業務很好的，沒有反動的，但因為這些不是黨、團員，這些人很有意見，留下的助教也認為不公平，這是完全的嚴重的官僚主義。我們做的是人民的事業，不是黨的家務事，政治上沒問題，業務好的排出去這是自私自利，是不合理，我很氣憤，團員也不平，黨委應查清這件事。

黨委要下最大決心來改變作風，群眾是我們的，如一意孤行則會脫離群眾。（《師大教學》146期）

中小學的情況可以從《解放日報》（5月10日）邀請的22位中小學教師座談會中看出一二：

上海第一師範學校王浩川說：我們的校長（也是黨支部書記）站在雲端上，祇顧作經驗介紹，而不抓學校內部的教學工作。在“評優”工作中也缺乏民主氣氛。群眾認為一位蒙領導百般偏愛，事事出風頭在先，吃苦頭在後的教師，不應該享受優秀教師的榮譽，校長不但不考慮這些意見，還批評大家文人相輕，還在區裏介紹本校“評優”經驗，說得頭頭是道哩！很多教師對工資改革預先定好級別，討論時草草收場不滿意。在評級中，全校黨員除一人外，都是評的最高級，而工作質量與教齡都超過他們的非黨員教師却大都偏低。在生活福利方面，不公平的事情也很多。如房屋分配，真正困難的人得不到照顧，而暴跳如雷的人，或者是人事幹部，却可以搬進新屋。校長搬進了新屋不算，還花了公家一百多元的裝修費，據說這是有關組織同意的。

上海建築工程學校林炳彰說：大家對領導偏聽偏信，造成了“牆”，很有意見。一個教師說，我有話不願在小組會上講，情願在大會上講，怕匯報的人走了樣。一位教師說：一個黨員的假話勝過十個群眾的真話。（這決不是個別現象，黨員和積極分子就是專門吃這碗飯的——紫丹）

第三師範學校過唯一說：我們這裏有這樣一個黨員，一開口就是“我是

吃過苦的。”他對待群眾的態度是怎樣呢？有一次他同教研室同志吵起來，那同志哭了，我就跑進去同那同志談了幾句。當晚這位黨員就找我去談話說：“你在外面講我壞話。”接着就兩手插腰，眼睛一瞪。他生病了，有位教師說：“還是他生病的好，可以不發生什麼事情，我情願替他代課。”他和群眾關係的壞，可見一斑。（反右之後，同事之間連這類的真話——共產黨叫做是“落後話”或“反動話”，都已經聽不到了。能聽到的，連夫妻之間都清一色是共產黨如何、如何地好！）

控江中學趙寶禮說：我是畢業班班主任。初三有 12 門功課，有些教材又重又深。每門課又抓得很緊，差不多每天有測驗。這學期還要考全年的課程。學生的擔子已經很重了，跟隨畢業來的是升學、自學、勞動等問題，於是又得進行思想教育等工作。這些工作教育局要管，青年團要管，管得學生更忙了，一聽大報告就是半天，大會之後又是小組討論。有些團員和幹部還要先開幹部會，弄得學生功課學不好，缺了課又無時間補，身體也累垮了。我們班上就有兩個學生有嚴重的神經衰弱癥。醫生讓他們休息，有一個還死不肯休息。做班主任的對此感到很沉痛，我要叫：“救救孩子吧。”……他還提到了校捨問題。他說，我們榆林有些小學的校捨條件實在太差了，白天開電燈上課，60 個人擠在一間陰暗的小教室裏，鼻子都碰得着黑板。應該照顧孩子們的健康。

以上這些意見，是教育者的反映；受教育者也反映出了問題。

5 月 19 日，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沈澤宜和張元助用大字報的形式發表了他們的詩《是時候了》，在首都高校迅速傳頌開來：“青年人放開嗓子唱，把我們的痛苦和愛情一齊都寫在紙上，不要背地裏不平，背地裏憤慨，背地裏憂傷，心中的酸甜苦辣都兜出來，看一看天光，批評和指責，急雨般落在頭上，新生的草木從不怕太陽照耀，我的詩是一隻火炬，燒毀人間的藩籬，它的光芒無法遮攔，因為它的火光來自‘五四’，昨天我還不敢彈響沉重的琴弦，我祇能用軟和的調子唱和風和花瓣，今天我要唱起心裏的歌，作為一支巨鞭，鞭笞死陽光下的一切黑暗，是時候了，向着我的今天，我發言，為什麼有人說集體沒有溫暖，為什麼有無數牆壁在我們中間，為什麼你和我不能坦率交談，為什麼……為什麼……我含着憤怒的淚向我輩呼喚，歌唱真理的兄弟們，快將火炬舉起，火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

三天之內就貼出了幾百張大字報，提出了團委會無權向學生發號召，反

對必修政治課，取消黨委負責制，徹底開放一切禁書，言論集會結社絕對自由，黨委不能以教育者自居，開辟自由論壇，對肅反被鬥錯的人要道歉——即以肅反鬥錯的人為例：

西語系顧文選原在杭州公安局工作，1955年由反“胡風反革命集團”開始，在全國搞肅反運動，他在公安局裏親眼看到了大量無辜的人受牽連而遭迫害。他看不慣，替人說話，結果也被打成反革命並受到嚴刑拷打。他說：1949年他15歲，他在杭州“參加了革命”，入了團。1955年6月中旬開始肅反，“當時我對肅反並不在意，因為我沒有問題，在國外也沒有什麼親友，我的親友中也没有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肅反無論如何也肅不到我頭上來，頂多我和大家一起學習。可是想不到當天下午，我們機關裏的領導人就布置人鬥爭我了。他們掌握的材料主要是：誣蔑打擊領導，拉攏小集團，文藝思想反動。”連續鬥他幾天，他仍不認罪，一天晚上遭到一群鬥爭他的同事的毆打，打得非常厲害。他回手保護自己，結果，他的同事指控他“打人”，用手銬把他反銬，又用麻繩把他捆綁起來。這些人報告了“五人小組”之一的副局長後，就把顧文選送到杭州市監獄。在那裏把他上了腳鐐手銬關起來，關了四個月。他認為逮捕他是違法的。理由之一是没有逮捕證，以後也未補發，逮捕後36小時內一直没有提審，完全破壞了逮捕條例。他還說，監獄內伙食很差，蚊子很多，獄規很苛刻。他給出了種種細節，包括打他的人的名字，時間，地點，還一一告訴了監獄裏吃的東西。他說他說的都是事實，不會有一分造假，可以調查。他在大鳴大放中申訴了肅反中自己的冤情，相信毛主席的“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鬼話，結果，回答他的是，又劃為右派，又一次打入監獄，屢經曲折，于文革中被槍斃。（王友琴《並非一個人的遭遇》）

在這一點上與筆者的經歷有一部分類似。筆者在前面已點到在肅反中所受迫害，到反右時被劃為右派的理由之一是：“他說，肅反中的積極分子很陰險。”所以，我在勞改中要從垂死中掙扎過來，就是為了能到後來給控訴中共的罪惡多留下一個活口。這就成了我後半生的人生意義。我和別人所經歷的事實表明，共產黨為了證明他錯打你第一巴掌是正確的，如果你不服，他必然用更重的第二巴掌來捍衛第一巴掌的成果。但我硬是如有人所說：“不服教師挨死打。”當我的“錯劃”右派得到“改正”後，有一次領導跟我談思想問題，說“別的右派得到改正後，都表示感謝黨給了他第二次政治生

命，要再努力為黨工作幾年。沒有人像你一樣耿耿于懷，憤憤不平，像是黨欠你幾百大錢！”

我說：“鄧小平，胡耀邦都說過，‘要講兩句話。’‘我感謝黨給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這是第一句話。”

“第二句話呢？”我看到他目光逼人。

“第二句話是：‘我的第一次政治生命哪裏去了？’”

“你這個人，右派本性未變。”

上海戲劇學院學生文徹赫恩的劃右派及其整個一生的遭遇，是上述論點和事例的再版。他是清朝皇帝的後裔，上中學時就跟隨共產黨鬧學潮。他是這樣反思自己一生的：“我覺得國民黨腐敗，人民起來反對它。共產黨是代表人民的，所以有希望。特別是共產黨提出的口號我最為贊成，共產黨的最高目標是解放全人類！我想我為共產黨坐過牢，是對革命有貢獻的有功之臣，共產黨一定不會虧待我的。”“我有幾次去臺灣的機會都自動放棄了，堅決留在北京，等待解放，迎接共產黨的到來。（後來他又參加解放軍，賣命為共產黨打天下。）誰知，這竟成了我終身遺憾的大錯。”（《苦難的歷程》頁 29。下面的敘述，都是根據他的這本回憶錄。我在這裏附帶向臺灣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從大陸去的知識分子提出奉勸：要借鑒文徹赫恩的慘痛教訓。我在前面曾談到“輕信”和“投機”。如果說他的教訓是“輕信”的話，那麼像現在一些媚共之流的作為，便是十足的“投機”了。至於後果麼，請記取：“前面有車，後面有轍”。）文徹赫恩的遭遇是這樣的：

首先，在反胡風運動中，他被無中生有地栽贓個小集團“105 樂團”。

“某天中午吃飯時，廣播開始，首先播放東方紅歌曲，然後，廣播人——我班同學曹宇文說：‘請大家注意，今天有重要廣播，請大家不要離開飯廳，聽完廣播再走。’接下來是正文：‘我院表三（表演系三年級）文徹赫恩是胡風反革命集團在我院的代表人，他是暗藏的潛伏的反革命分子。他們一伙在學校散布反動言論，煽風點火，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攻擊社會主義，反黨反人民。他們組織反革命集團，罪行累累……’最後一句話：‘文徹赫恩是皇帝子孫，快快坦白！’……每個人都盯着我看。”（頁 37）

“軟硬兼施，逼、供、信、誘供，什麼手法都用盡了”。鬥他“小集團”，他始終沒有承認，但後來劃他右派時仍算一條；鬥他的“反動言論”，後來也又都算作右派言論：



第一個問題：攻擊蘇聯和蘇聯紅軍的問題。我的原話是：“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蘇聯紅軍趁機侵入東北，拉東北的機器、物質和糧食。比如鞍山鋼鐵公司，本來有九個高爐，被蘇聯拉走七個。蘇聯紅軍不但搶老百姓的財物和酒，並且強姦中國婦女。當時東北的大姑娘都剃了光頭，白天不能出門，怕碰上紅軍，甚至有的蘇聯紅軍女兵還強姦中國男子。”我承認講過，但不是造謠誣蔑，是事實，不信可以問問東北的父老鄉親。而且文人郭沫若1949年4月在南下工作團一次為我們作報告時也解釋過這個問題，地點在北京朝陽大學，是清華大學的學生提出的，說：“領導叫我們一面倒，倒向蘇聯，那為什麼蘇聯紅軍強姦中國婦女。拉我們工廠的機器和物質呢？”郭沫若回答：“是有此事，但那不是蘇聯紅軍幹的，是被紅軍俘虜的白匪兵幹的。機器是拉走了不少，但那些機器有毛病壞了，是蘇聯老大哥拉回去幫我們修理的。”而事實上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但是，郭沫若如果不這樣回答，他就知道什麼叫做“羞耻”了。

第二個問題：關於一邊倒的問題。“我對蘇聯有看法，從歷史上看，在沙皇時代，俄國人對東北三省就有野心，占領旅順港和中東鐵路不走。雖然蘇聯是我們的老大哥，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但我們也應該提高警惕。”至于蘇聯專家援華，我也有想法：“蘇聯專家在我院教學的列斯裏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唯一沒有去世的學生，我看也沒有什麼特別的高招。列普斯卡婭和古裏涅夫並不比中國人高明多少，可他們的待遇超過我們的老師幾十倍！我認為太不公平了，是不是我們有崇俄媚俄的思想……”

第三個問題：關於污蔑黨團員和醜化黨團幹部問題……（頁42）

（被打成胡風分子或集團的人，很多給鬥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文徹赫恩是單身一人，他也吃盡了苦頭。但于1957年春，總算平反了。一個普遍的現象是，肅反中被誣陷的人，即便平了反，躲過了初一，在反右中也難于躲過十五。）

其次，共產黨整風，號召對黨提意見，“後來竟規定每人必須寫20張大字報。我心裏琢磨着：共產黨覺悟了，改過了，講民主自由了。他們過去一貫強姦民意，一言堂，獨斷獨行，剝奪了群眾的言論自由和一切個人權利。這回來爭取群眾意見，看來態度倒是虛心誠懇。許多同學都叫我提意見：‘你受過那麼多委屈，也該出出氣了。提！有毛主席撐腰。’我回答：‘以前有些意見早就提過了，而且都寫在檢查裏了，我没有新的意見。’其實我剛被

鬥完没多久，才平穩下來，哪還敢再提意見？還是少說話為妙。隨便他們怎麼動員，我就是一言不發。大字報的紙都擺在我的書桌上了，我就是一字不寫！”

“不久全體教職員工和學生在教學大樓排練廳開反右動員大會，由黨委書記蘇坤作反右報告。會上點了許多人的名字，都是在鳴放時提意見和寫大字報的人。我心裏想，當時你們去徵求意見時，稱贊這些人是好同志，是愛黨愛社會主義的，怎麼今天一翻臉就什麼都不認帳了？共產黨說翻臉就翻臉，給這些人扣上階級敵人的帽子，說他們有意向黨進攻，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反革命右派分子。沒想到最後還是把我點出來了：‘別看有的人大鳴大放時一言不發，一張大字報也不寫。那也不行，他內心是仇恨共產黨的。在肅反的時候，我們已經把他揪出來了……這種人不但是右派而且是極右派的反革命分子，是雙料的反革命右派分子！’（頁 54-55）

最後，他勞改了，詳情請看《苦難的歷程》。這裏僅再提一提他的第三件冤案：他勞改期滿後，結婚過日子，勞改隊的管教員強奸了他妻子，“反而被他們誣陷說是夫妻倆合伙預謀拉幹部下水。”為逼他承認，白天要命地加重他的勞動量，晚上還要開會鬥爭他，作“噴氣式”，打得遍體鱗傷，打掉牙齒，打昏過去，“一共鬥了我八個月，240天，一天沒拉。他們像餓狼似地失去人性，每天晚上把我的臉打得變形，遍體鱗傷，全身無處不痛。”（頁 119）

在北大學生的鳴放中，物理系的譚天榮是被毛澤東稱為“英雄”的人物。5月20日，他貼出題為《一株毒草》的大字報：“我是從物理學本身發現辯證法的，不久我就看到，現在哲學已經江河日下，一切科學在形而上的統治下面已經面臨毀滅，一些著名的學者，例如周培源、錢學森、華羅庚、郭沫若、艾思奇等，在哲學科學常識方面存在多麼可怕的空虛和混亂啊。緊接着，我意識到，全世界面臨一次空前的變革，反對殖民主義和反對教條主義的兩支大軍在不同領域內顯示了自己的力量，北大的學生運動不過是一次世界規模的民主運動的序曲而已。全世界注視着中國，中國注視着青年學生，青年學生注視着我們北京大學，所以我們沒有權利放鬆自己的戰鬥。”

這篇署名為“一個強壯而又懷有惡意的小伙子”的大字報，說馬克思主義從 1895 年起就開始走向“自身的反面”，說《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是赤裸裸的唯心主義，說《人民日報》是“封鎖真理的長城”，說三好學生是白痴。（《人民日報》6月28日，7月4日）在那些日子裏，北京

大學每天晚上都有數百人甚至上千人的辯論會，辯論的題目有“要不要必修政治課”、“新社會人與人的關係”、“胡風是不是反革命”等等。還開了一些控訴會，有兩個在肅反中被錯鬥的學生（顧文選和周鐸）的控訴，據費孝通在6月6日六教授會議上說：‘現在各大學的學生都起來了，情緒激烈。從這暴露出來的問題看，情況是十分嚴重的。聽說北大有兩個學生控訴在肅反中被錯鬥，有人聽了流淚。這種事情在我們知識分子看來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在解放以後還有這些事，簡直是太黑暗了。今天在我心中產生了一種新的感情，我對學生所揭發的這些事實是同情的。學生搞起來，事情很容易擴大，當然要收也容易，300萬軍隊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也就完了。又說，今天的問題主要是制度造成的，非黨人士有職無權，黨團員掌握大權，作威作福，我看不是個人的作風問題，而是制度所造成的，我已聲明不參加共產黨以表示態度。’（《人民日報》7月4日）

王書瑤寫的《從斯大林的錯誤中應得到的教訓》大字報，實際上就是抨擊“黨天下”，他說：“任何時代，權力的高度集中，不論是集於個人，還是自稱為一貫光榮正確偉大的集團，都是極大的危險，而當人民被麻痹、被愚昧，就有更加百倍的危險。因為如果這個集團犯有嚴重錯誤或變質，就沒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斯大林錯誤的原因是甚麼呢？——無論是蘇聯共產黨，還是中國共產黨都未能作出令人滿意的答復。因為他們都不免有統治者的共同弱點，他們害怕說出問題的原因，是由于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控制，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這種高度集中的權力，才使斯大林後期可以膽大妄為，犯出一切錯誤。”（對這個問題，年輕的王書瑤比年邁的鄧小平看得更正確、更徹底，更早20多年！如果共產黨不反右，你鄧小平就可以避免兩次被打倒，也不會餓死4600多萬中國人，也不用經歷一次空前大浩劫，也不用英明領袖華主席的“一舉”，“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當年你口出爛言：“較量了，他們失敗了。”你勝利了嗎？毛勝利了嗎？黨勝利了嗎？如今你又說“必要的”，還要反資產階級自由化20年！真是俗話不俗：“虎走千裏總吃肉，狗走千里總吃屎。”）

楊路說，“對民主的看法——你們把民主當作手段，愛怎麼使用就怎麼使用。而我却認為民主是神聖的權利，真正的民主自由是一個人在不妨礙別人的前提下愛怎麼生活就怎麼生活，愛說什麼就說什麼。你們是祇知道有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而不承認還有一般意義上的民主原則。”

正是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定稿中，把民主規定為手段的。雖然他原來是說“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但翻雲覆雨，乃是毛澤東的家常便飯。

王存心說：在我們國家裏選舉流于形式，人格沒有保障。“三害”到處都是。當然不是社會主義所固有的，為了我們社會主義更好，不少有認識的青年人投身于“五·一九”這樣的運動中。他們要求擴大社會主義民主，不滿足于用思想改造的方式來除“三害”，主張在理論上作一些必要的修正，制度上作一些徹底的改良。（《略談“五·一九”》）

王國鄉的一份大字報：《有頭腦的人，不要那樣想！》把民主與法制的關係說得簡明扼要而中肯綮；在 20 多年後鄧小平才也這樣說，可當年他却是把如下言論都當成了反動的右派言論的：“民主，不能是空頭支票，必須有法律的保障。而如今，我國尚未頒布刑法、民法等必要的法律。人民的民主祇是領導者的恩賜，這怎麼會沒有‘三個主義’？”

“我們要求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擴大民主，保障人權和人格獨立——這就是我們的鬥爭的目的。”

學生鳴放的刊物《廣場》的發刊詞，這樣寫道：

人與人的關係要重新調整，一些過去習以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東西要重新進行肯定和否定，對於現代的一些論點與觀點要重新進行估定、評價和探索——總之，這裏整風運動為主流的大變革是一次偉大的社會主義思想意識的改造運動，或思想意識的大革命，對一切都要勇敢地再認識。

大鳴大放成為這次運動的精神實質。毫無顧慮地發言，為真理而作好爭論，以及為證明一些新生的主張、觀點、天才的創造，都將如雨後春筍般地誕生！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林希翎在北大的辯論會上發表了演說（連在本校，共講了 5 次）。她說，原本對斯大林看法是通過看電影、書報，是很崇敬的，看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簡直是毛骨悚然，怎麼肅反能對自己的戰友濫殺 500 多人呢？怎麼社會主義能發生這樣的事情呢？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我們必須接受教訓。對斯大林的評價，不能歸到個人崇拜，要從制度本身去找。斯大林事件所以能產生在俄國，要按歷史條件看，蘇聯沒有典型資本主義基礎，這和中國有共同之處，在一些封建主義制度上建立社會主義。這些錯誤大部分受封建主義之害，如“三害”就是這樣。又說“三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上層建築的某些政治制度不好，不適合公有制經濟基礎，

如等級制度，人事制度與保密擴大化。說到胡風，她說，胡風向黨中央提的意見書，郭沫若說是“反社會主義綱領”，實際上那些意見是對的，現在這些鳴放都是從胡風處抄來的，如反對宗派主義，反對庸俗社會學皆是。她認為，祇憑《人民日報》公布的三批材料，說胡風是反革命證據蒼白無力。她的演講，不時為師生的陣陣掌聲所打斷。

6月30日，《人民日報》所發表的新華社長篇通訊《毒草識別記——中國人民大學學生駁倒了林希翎的謬論和謊言》中說：“她說：‘胡風的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黨現在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同胡風所提的基本一致。’”

當時我在中學教書，一位比我稍大點的王姓青年教師，告訴我人民大學鬥林希翎的會場情況：“林希翎提出要跟他們辯論，他們哪裏是她的對手？不光是知識、才華、口才不是對手，她指出的違法亂紀、‘三害’事件都是經過調查的，無可置疑的事實。下面一再往上遞條子：‘林希翎：支持你！’他們辯論無詞，場面尷尬，光憑嗓門高，亂起哄：‘打倒林希翎！’”王老師眉飛色舞，我認為他有正義感，不料，到反右時他上前就揭發我說過：“劉書記是菜包。”我校劉書記的確是個不懂教育的菜包子，但王當時却接着說的更凶：“什麼菜包？是熊包！”他說給我的所謂“右派言論”多了。當他一直揭發我，氣得我不行時，我冷靜地想：“你要虧心你虧心，我不來這一套。共產黨要的正是知識分子都來這一套，他好漁翁得利。”所以我對他是來而不往，讓他倒是僥幸踩過了這一劫。

還來說林希翎的演講，她說“基本一致”，“從胡風處抄來的”也好，說“證據蒼白無力”也好，說明文藝界，甚至各界知識分子都當真把實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當作美好的遠景。毛澤東看準了這點，就把雙百方針當作給知識分子的誘餌拋了出來，又怕你不去吞食，特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明：“胡風的文章還是可以寫的，他住班房是因為他搞秘密團體。”大家都想：“我又不搞秘密團體。”雖然心存怕釣魚的顧慮，但經不起毛的“猴不上竿祇敲鑼”，終於連餌帶鈎一並吞進魚腹。之後，你再“腹誅”，說“毛澤東你不仁！”也祇是徒喚奈何了。

與此異曲同工的是，大學之間的串聯很叫校長感到頭痛，人民大學副校長鄒魯風作報告，要求同學不要與外校聯系。林希翎反駁說：我校學生未患流感，為何要隔離？主席講，學生鬧事要鬧個痛快，而現在還沒有鬧事就這樣封鎖。根據筆者的記憶，當時傳達毛主席的講話大意是這樣說的：共產黨

要得到教訓的。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志們要看作好事。學生要鬧事，就要讓他鬧够，問題暴露了，領導的問題由領導負責解決，暫時沒條件解決的，要解釋清楚，學生的問題，要說服教育。對鬧事的頭頭，不要開除……我當時直覺到，毛主席的胸懷，氣量，多麼仁慈，廣闊！

誰知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單用指出處理湖北漢陽縣一中學生因為畢業後大部分不能升學，發生了 800 多學生罷課游行的事例，足可說明。8 月 5 日新華社報道：湖北省漢陽縣最近在蔡甸鎮舉行了群眾大會，揭發和控拆了反革命分子（學校師生）王建國、楊松濤、鍾毓文、胡斌、余心平等利用漢陽第一中學學生的升學要求，煽動和組織近千名學生舉行罷課游行的暴亂事件。9 月 6 日在蔡甸鎮舉行了有一萬群眾參加的宣判大會，當場處決了王建國、鍾毓文、楊煥堯三人。楊松濤等四人被判處了有期徒刑。

### （十三）文藝界的矛頭指向《講話》

毛澤東用陰謀和公安手段，背信棄義，濫殺無辜。我說的“無辜”，是中共自己都承認的。如漢陽縣“小匈牙利事件”，他們為此事作出決定，正式平了反。但死者已矣，祇能感謝黨的平反之恩于地下了。從教育思想講，這是推行他“階級鬥爭為主課”的，把受教育者培養成階級鬥爭工具的奴化主義教育思想。他要消滅的是要民主、自由、人權的和尊重主體性的教育思想。他以同樣的思想來對待文學藝術。這在反胡風及其之後的反右派鬥爭中得到了惡性地展開。胡風文藝思想的核心是“主觀戰鬥精神”，是一種很強烈的主體精神。毛澤東說他有“可殺之罪”，祇是認為“殺了不利”，才刀下留人。他到底何罪當斬？“胡風分子”詩人綠原在《胡風與我》中這樣概述他與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互別苗頭：反對將文藝當作政治的附庸，不同意“政治標第一”，反對文藝脫離歷史真實，不同意“以歌頌光明為主”，反對把作家藝術家當作宣傳政策的工具、傳聲筒，主張以群眾喜聞樂見作為審美標準。（《新文學史料》1989.3）

右派在大鳴大放中對文藝方面所發表的意見，是和胡風一脈相承的，大多是或明或暗地，有意識或潛意識地把矛頭對準《講話》，認為它是扼殺文藝生機的利刃。例如，反對公式化、概念化、教條主義是具有普遍性的意見。什麼公式化，概念化？就是《講話》提出的工農兵方向（用瞞與騙唆使工農兵去賣命），服從一定時期所規定的任務的文藝工作一元論定位（即作“齒

輪和螺絲釘”），政治標準第一的文藝批評（甚至瘋狂到，有時是“政治標準唯一”），杜絕“人性論”（否認人類統一的人性，祇承認“階級性”），對共產黨祇能歌頌光明（對資產階級才能刻劃黑暗，不歌頌共產黨的功德就是革命隊伍中的蠹蟲），要文藝工作者進行思想改造；什麼教條主義？就是把《講話》拜作圖騰。所謂右派文藝觀點，基本上是反《講話》的觀點。這表現在文藝思想理論，創作實踐和組織工作三方面。

讓我們從電影的鑼鼓敲起。中國的大鳴大放是在 1957 年的春末夏初，鍾惦棐的文章《電影的鑼鼓》却是在 1956 年 12 月 15 日發表于《文匯報》（《文藝報》同時轉載）。所以，也可以說它是鳴放的開臺鑼鼓。鑼鼓是這樣敲起的：《文匯報》爲了貫徹雙百方針，準備就着電影没人看，70% 以上收不回成本（有的連廣告費都收不回）的問題展開討論，記者姚芳藻採訪了鍾惦棐。他立即表示：“電影問題非常多，完全值得討論……電影題材狹窄，故事雷同，內容概念公式化，看了開頭就知道了結局，誰愛看呢？”在展開討論中，《文匯報》發表了近 50 篇文章。導演陳鯉庭提出：“導演應該是影片生產的中心環節。”實際上，導演也祇是按着《講話》照本宣科的演員，真正的導演是黨委書記（毛是總導演是用不着說的）。導演孫瑜要求尊重觀衆，尊重導演，尊重藝術。他說：“今天的觀衆在走進戲院的時候是以主人翁的姿態走進去的。他們不能容忍乏味的，公式化概念化，沒有思想性和藝術性的作品，我們不能不尊重他們。他們要政治，但不要政治口號。”導演吳永剛在文章中指出：“政論不能代替藝術。人們花了時間和金錢，但是得到的不是藝術的欣賞，却是像在聽一個報告，讀一篇政論，這樣的電影怎麼能使廣大的觀衆接受呢？”經過兩個多月的討論，鍾惦棐，作爲中宣部文藝處負責電影的幹部，被《文匯報》約請寫一篇總結性的文章，這便產生了不同凡響的《電影的鑼鼓》：

電影的鑼鼓先從上海方面敲起來，是有道理的。這裏是我國電影的發祥之地和我國著名電影藝術家的匯集之處。經過七年的歲月足以辨明，電影——這一群衆性最廣泛的藝術，究竟怎樣才是。按照過去的經驗，無疑應該丟掉一些東西，但亦需要保留一些東西，而其中最主要的是電影與群衆的聯系，丟掉這個，便丟掉了一切……

上海《文匯報》在 11 月份發表的 24 篇文章，就問題的性質看，可分爲兩類：一是屬於電影的組織領導的，即以行政的方式領導創作，以機關的方式領導

生產；一是屬於電影的思想領導的，這便是中國電影的傳統問題，題材偏狹問題，與所謂“導演中心”等問題……

我們有許多領導人對列寧所說的：“電影是教育群眾最強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藝術中，電影對於我們是最重要的。”理解得很不正確。因為它重要，深怕它搞不好，也就出現了像《祝福》電影中魯四老爺教阿牛描紅的情景。關心過多也就往往變成干涉過多……

目前有許多有經驗的電影藝術家不能充分發揮出創作上的潛力，而祇能唯唯聽命于行政負責人員的指揮，尚未進入創作，已經畏首畏尾，如何談得到電影藝術的創造？沒有創造，如何談得到電影事業的繁榮！

藝術創作必須保證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須充分尊重藝術家的風格，而不是“磨平”它。所謂“導演中心”乃是指為了克服當前導演在攝制組工作時感覺婆婆過多而且過嚴，某些藝術描寫的細節都要遭受干涉的情景而言。祥林嫂手中的魚掉不掉？何時掉？這完全是創作人員，首先是導演自己的事。如果這樣的事都須由行政決定，要導演幹什麼？……

這番鑼鼓聲聒噪火了毛澤東，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出批判：“共產黨裏也有右派有左派，中宣部有個干部叫鍾惦棐，他用假名字寫了兩篇文章，把過去說了個一塌湖塗，否定一切，這篇文章引起批評了，引起爭論了，但是臺灣很欣賞這篇文章。”

“成績是主要的”這是一個鐵定的公式，誰也不能違反。1956年鍾惦棐違反這一點，受到毛的批判；1957年誰違反這一點，誰當右派。從毛澤東，劉少奇（他後來否定這一點，就被打倒了）直到鄉村基層幹部，從上到下，衆口一詞：“成績是主要的”。毛澤東時常扳着手指說教，成績與缺點相比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即便餓死幾千萬人，成績仍然是基本的。彭黃張周們違反這一點，他們就株連了300多萬幹部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分子。農民用幹部開會作報告的腔調，耍貧嘴道：“成績是雞巴（基本）上的！蛋（但）有缺點，是屎染（必然）的嘛！”我真是不理解，當時面對的是包括他們親人在內的餓殍遍野，村裏餓死的人沒有人去埋了，面對如此悲慘世界竟還能發出這種黑色幽默！難道這就是阿Q們發泄憤恨的方式？

在全國正式反右派幾個月之前，鍾惦棐已被欽定為右派了。《文匯報》8月4日發表了後來成為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革委會副主任的徐景賢的文章《否定成績改變方向篡奪領導——揭露〈電影的鑼鼓〉一文的右派論點》：



“和所有的右派論調一樣，《電影的鑼鼓》首先從根本上否定電影的成績……總之，鍾惦棐之故意把工農兵方向和教條主義，宗派主義串在一起，決不是爲了幫助我們克服缺點，而正是爲了把工農兵方向連根拔掉……”

在右派的文藝理論方面最爲有系統、有份量的、要數秦兆陽的《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這篇文章的思維方法是上前就與《講話》唱對臺戲的。因爲它是從審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定義所規定的“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必須與用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這一點出發的。可是，在《講話》中毛是這樣說的：“我們討論問題，應當從實際出發，不是從定義出發。如果我們按照教科書，找到什麼是文學，什麼是藝術的定義，然後按照它們來規定今天文藝運動的方針，來評判今天所發生的各種見解和爭論，這種方法是不正確的。”而我則認爲，別的什麼事如果可以“不是從定義出發”的話，那麼，“我們討論問題”則是絕對地應當從定義出發的，這是一條邏輯規則。即以毛上述的話爲例，是他先從“實際”，“定義”，“文學”，“藝術”的定義出發之後，才說出“不是從定義出發”的。否則，說者和聽者就都將陷于五裏霧中——“應當從X出發，不是從Y出發”，如果你不首先對X、Y加以定義的話（當然，“心照”就甬“宣”了），那麼，你所云者何？一句話說絕，理論思維必須從定義出發。但，如果定義是錯誤的，則應首先把錯誤糾正過來，這還是從定義出發。因爲正確的定義就內涵着“合乎實際”這一規定。不緊扣從正確定義出發的討論，必將引起混亂；雙方對同一概念作出不同定義的討論，一定會是“褲襠裏放屁——到兩叉裏”，鷄同鴨講，無共同語言；違背正確定義的討論，一定是胡說八道。

民諺說得好：“先明後不爭”。這一句話可理解爲，先明確定義，在討論問題時就不會引起無謂的歧義的紛爭了。像毛這樣的違反邏輯常識的錯誤，不但沒人敢指出，而且還必須當作圖騰來崇拜；這使我想起，鄧小平爲吳晗碑亭書寫的“吳晗亭”中的“晗”字，多寫了一點，把口上的“今”字寫成了“令”字。我在報上看到時，脫口而出：“怎麼旁邊的人就不隨時指出這個筆誤？”“誰敢？”沒有人敢，於是這個錯字，便象徵着鄧小平的威風而百世流芳了。有興趣者可前去看一下，是否今天“威風”依舊？

秦兆陽說：

首先，如果認爲“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裏沒有“社會主義

精神”，因而不能起教育人民的作用，而必須要另外去“結合”，那麼，所謂“社會主義精神”到底是什麼呢？它一定不是存在于生活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之中，而祇是作家腦子裏的一種抽象的概念式的東西，是必須硬加到作品裏去的某種抽象的觀念。這就無異於是說，客觀真實並不絕對地值得重視，更重要的是作家腦子裏某種固定的抽象的“社會主義精神”和願望，必要時必須讓血肉生動的客觀真實去服從這種抽象的固定的主觀上的東西，其結果，就很可能使得文學作品脫離客觀真實，甚至成為某種政治概念的傳聲筒。

其次，這所謂“社會主義精神”既是作家主觀上的一種觀念，那麼，它必定是作家的世界觀的一部分……作家的思想——世界觀，是探索，認識，反映客觀真實時，伴隨着形象思維，起其能動性的作用，因此，這種作用是有機地表現在藝術的真實性裏面，是無須乎在藝術描寫的真实之外再去加進或“結合”進一些什麼東西去的……

在我們中國還跟另外一些庸俗的思想結合起來了，因而更加對文學事業形成了種種教條主義的束縛。這些庸俗思想，就是對於《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庸俗化的理解和解釋，而且主要表現在對於文藝與政治的關係的理解上。

首先，必須考慮到，文學藝術為政治服務和為人民服務應該是一個長遠性的總的要求，那就不能眼光短淺地祇顧眼前的政治宣傳的任務，祇滿足于一些在當時能夠起一定宣傳作用的作品。其次，必須考慮到如何充分發揮文學藝術的特點，不要簡單地把文學藝術當做某種概念的傳聲筒，而應該考慮到它首先必須是藝術的，真實的，然後它才是文學藝術，才能更好地起到文學這一武器的作用。即便是一篇雜文，一段鼓書，一篇特寫，也不能忘了它的文藝性。此外，還必須考慮到各種文學形式的性能，必須考慮到各個作家本身的條件，不應該對每個作家和每一種文學形式作同樣的要求，必須要盡可能發揮——而不是妨害各個作家獨特的創造性，必須少用行政命令的形式對文學創作進行干涉。

說“政治標準第一”，是因為，自古以來沒有無傾向性的文學，是因為人民所需要的是那種為自己的利益服務的文學。但是，並不能由此得出結論，以是否配合了每一個臨時性的政治任務為文學作品的最重要的標準，也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是藝術標準並不重要。政治和藝術標準必須統一。（我認為，祇有在政治理論與政治行為中，才是“政治標準第一”，如果你要求劉少奇在“

八大”上作的《政治報告》有藝術性，是可以的，但你如果硬堅持必須“藝術標準第一”，那麼，你就是混蛋。如果你要求文學藝術作品，比如齊白石畫蝦，不是“藝術標準第一”而是“政治標準第一”，而且對違反者嚴懲不怠，我說，這就遠甚于混蛋了！——紫丹）……

正因為我們在這些問題上有一些糊塗觀念，於是，就發生了多種多樣的，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的混亂思想，例如：不應該寫過去的題材呀，過多地從是否配合了任務來估計作品的社會意義呀，出題目作文章並限時交卷呀，必須像工作總結似的反映政策執行的過程呀，以各種工作方法為作品的主旨和基本內容而忘記了人物形象呀，不應該寫知識分子呀，不應該以資本家或地主富農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呀，作家最激動和最熟悉的“過去的題材”不要寫而硬要去寫那些不激動不熟悉的東西呀，生活本身就是公式化的呀，離開了形象及其意義去找主題思想呀，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去領導創作呀，政治加技術（藝術）呀……還有：你說描寫新英雄人物才是“社會主義精神”呀，而他又說人道主義精神才是“社會主義精神”呀……

姚文元為批秦兆陽，雲裏霧裏寫了三萬多字，不見真貨色，唯有帽與棍。什麼“修正主義思潮”，什麼“不要馬克思列寧主義”，什麼“沒有政治立場的‘寫真實’的虛幻性”等等帽子。同樣，他對江蘇省一些青年作者陳椿年，高曉聲，葉至誠，方之，陸文夫，梅汝愷，曾華想組織一個《探求者》文學月刊社所草擬的“章程”和“啓事”，也是批之為“反動”，“夢想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他說：“《探求者》們的反社會主義綱領中，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他們是國內外修正主義思潮無保留的狂熱的擁護者……他們在理論上是秦兆陽的弟子，他們手裏揮舞的也不過是從秦兆陽的修正主義那裏搬來的破刀爛槍而已。然而當這種修正主義思想被他們剪貼起來湊成一套主張時，就成為非常完整的一個反社會主義的綱領。”（《論文學上的修正主義思潮》頁247—272）

《探求者》文學月刊社啓事和章程中說：

我們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張，自己的藝術傾向，我們把編輯和作者混同一起，稿件的主要來源就依靠同人，我們將在雜誌上鮮明地表現出我們自己的藝術風貌。目前，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剛建立不久，如果說建成社會主義的道路還在探索，需要不斷地積累經驗，吸取教訓，那麼，在建成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人生的道路就更為複雜，更需要多方面進行探討。舊時代遺

留下來的思想意識中間，有壞的，也有好的，必須加以辨別。近幾年來，把一切舊東西看成壞的，把一切新東西看成好的，這種教條主義的觀點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危害。教條主義把浩瀚統一的社會生活歸結成支離破碎的教條，僵化了人們的正常生活。

再者，我們過去在長期的階級鬥爭中，由於當時的需要，把政治態度作為衡量人的品質的主要標準，往往忽略了社會道德生活的多方面的建設。在階級鬥爭基本結束，社會的主要矛盾表現在人民內部的今天，我們看到了人們道德面貌上存在着各種缺陷，也看到了階級鬥爭給人們留下了許多陰影，妨礙了人們之間正常關係的建立。人情淡薄，人所共感。鑒於以上種種，我們將勉力運用文學這一戰鬥武器，打破教條束縛，大膽幹預生活，嚴肅探討人生，促進社會主義。文學創作有過漫長的歷史，積累了多種多樣的創作方法。我們不承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最好的創作方法，更不承認這是唯一的方法。

刊物不發表空洞的理論文章，不發表粉飾現實的作品。大膽干預生活，對當前的文藝現狀發表自己的見解。不崇拜權威，也不故意反對權威，不趕浪頭，不作謾罵式的批評，從封面到編排應有自己獨特的風格。本刊系一花獨放，一家獨鳴之刊物，不合本刊宗旨之作品概不發表。（《雨花》1957.10）

有一些作家點明叫響地要“修正”和“發展”毛《講話》的精神，少的如劉紹棠，認為其中“策略性理論”不應守舊地，片面地，機械地執行；老的如姚雪垠，認為《講話》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歷史條件在不斷變化，許多真理也要跟着發展。”《長江文藝》1957年10期上有篇文章這樣揭露和批判姚雪垠：

他歪曲地說“今天除了提到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外，也提到為知識分子服務。這就是發展。企圖偷天換日地以“為知識分子服務”來代替“為工農兵服務”的根本方向，他誣蔑執行毛主席的方針是“原地踏步走，背去年的皇歷”。姚雪垠攻擊毛主席提出的文藝批評的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的正確原則為“不僅是簡單的，而且是死的”，一個“總原則”而已，說“如果有人企圖拿着一個總原則認為是找到了萬能的鑰匙，隨便使用，他難免不跌進教條主義的泥坑。”從這一根本的反動前提出發，他把黨對文學事業的政治，思想的領導，誣蔑為教條主義的統治。說什麼教條主義“上有領導，下有群眾，

形成了一種巨大的，沉重的社會力量。”認為教條主義已成為“一種時代空氣，或者像流行性的感冒，散布在我們日常生活的環境中”。因此，“作家在進行創作時，不能不縮手縮腳”，“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於是姚雪垠以反對教條主義為幌子，進而提出了資產階級“百無禁忌”的文學自由的主張代替黨的文藝方針。

黃藥眠在政治上被批為“章羅聯盟的參謀長”，但他畢竟是個文藝理論家。他在《文藝報》1957年第6、9號上分別發表了兩篇文章講了自己的意見。一篇是《由“百花齊放”所想到的》：

有些人處理問題時，硬要把黨的事業的文學部分，和黨的事業的其他部分刻板式地等同起來，來一個機械同均化，而無視文學的特性。還有人處理問題硬要來一個標準化，要以少數人的文學趣味服從多數人的文學趣味，或甚至相反。這樣就抹殺了在為工農兵服務的總方針下個人愛好的廣大原野。甚至有些人神經過敏，一談到個人的藝術愛好，就說你是個人主義，一談到幻想，就說你是唯心主義或違背現實主義，一談到應講求形式，就說你是形式主義。文學固然要反映出現實的本質，反映出社會生活中人的本質。但不應忘記，文學要通過生活本身的形式來反映現實的，因此對於“本質”也不能了解得過於死板。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同時又是多種關係交錯着的，因此，它是豐富的，多彩的。文學的描寫就是要具體反映出人的各個側面，和人和人之間的交錯着的關係，寫出細節，而描寫的方法可以不同，描寫的風格和情調也可以多種多樣。因此，文學裏面所表現的東西，是通過生活現象來表現本質，但它不限于本質，某些方面它可以比本質多些，同時某些方面又可能比本質少些。有些人忘記了文學是要通過生活現象本身來反映現實的，所以就要求文學要按着決議案來創作，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要根據他是不是表現了本質去檢查。這樣一來，作品自然就失去生活的豐富性，而人物也就失去了個性。文學不是生動的，動人的宣傳，而成為簡單的說教。有人說，文藝是生活的反映，生活裏面本身就有着美，作家的任務就是對生活中的這些美加以集中概括，使它比生活更高，更有典型意義。但我們應認識到，人們的主要任務在於改造世界。在實踐中，人們認識了世界，也產生了自己的態度，有時還帶着強烈的情緒色彩。有些人忘記了這些，認為作家的任務祇是在檢集生活現象並加以組織。甚至有人還把作品中所描寫的故事，人物去一一加以核對。認為生活裏有的，就是現實主義的，沒有的，就違背了現實主義的原則。照這樣的看法，創作就不可能有，文學祇能是資料

的搜集和堆積，想象就不可能有，文學祇能是已有事實的記載，同樣，作家不是在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去體驗生活，而祇能是消極地感受生活，客觀世界給我們刺激一下，而我們也就認識它一下……

另一篇是《解除文藝批評的百般顧慮》：

當前文藝界的主要矛盾，在於我們的文藝創作和廣大讀者的要求不相適應。我們印出來的作品，中學生讀起來，大體上說還認為可以，但大學生就覺得不夠味，不滿足了。他們的興趣是讀外國小說。近年來，存在着一種不好的風氣，那就是對於名作家的作品，照例是捧。如趙樹理的《三里灣》就是這樣。這種風氣也影響了讀者。一般說大學生本不十分喜歡中國現代作品，但你問他，他還是說好。為什麼呢？因為《文藝報》說好。批評家與作家的關係不諧調。批評文章有時並沒有體會出作品的味道，就來分析它的優點和缺點，有時則沒有把握住分寸，太重，因而引起了作家的輕視和不滿，這是一個方面。另外，如果作家不服氣，寫了個反批評，但刊物又往往以“不宜討論”為由拒絕刊載。挨了批評不能反擊，這也是造成了雙方關係惡化的原因。在領導思想方面，對世界觀與創作的關係有簡單化的理論。我們的創作質量不高，和簡單化的理論也不無關係。世界觀指導創作，這是無可懷疑的，但世界觀對創作的直接指導作用，祇限于作者看事物的立場觀點和基本的態度方面。至於作家對人物的心理狀態，情緒等等的體驗，世界觀就不能直接指導、解決這個問題，要靠積累生活知識，有豐富的生活體驗。根據我們很多同志的理論，仿佛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有了，就可以解決創作問題。強調思想改造，這是對的，必要的。但思想改造是長期的事情，我們不能等到作家思想改造好了才能讓他們創作，而且思想改造也決不止是讀幾本理論書。這幾年來作家們總是讀了些書了，但為什麼有些人還是寫不出作品來？如果說，思想進步了，他就可以寫出作品，那為什麼這七、八年來，作家的思想進步了，而還是寫不出作品呢？我認為世界觀對創作的影響有一部分是間接的曲折的，可是過去我們恰恰忽略了這一點。領導把理論與創作之間的關係看得過于簡單化，因此領導的方式就必定會是生硬的，反過來又影響了創作的發展……

作家常常埋怨批評家給創作制定了不少清規戒律，但文藝批評所受的清規戒律何嘗就少呢？幾年來我寫的文章很少，但就這一點點經驗來說，也不難體會到寫批評文章之難！不能粗暴，不能諷刺，不能說俏皮話，要照顧到

權威，要照顧到大作家，要照顧到新生力量，要照顧到領導首長，要照顧到老先生，要照顧到統戰，要考慮將來政策轉變時為自己留退步。腦子裏這樣許多“照顧”，許多“考慮”，于是自己的主意越來越少。文章力求委婉，力求面面俱到，力求不致引起別人的反駁。許多重復了不知千百次的，為人所熟知的大道理，大原則，也不妨假定讀者有“百讀不厭”的精神再來一次重復。肯定之後，必須來一個“但是”，否定之後必須來一個解釋。文字上力求多加一些“在一定條件下”，“在某種程度內”等等……

以前我寫文章，好不好是另一個問題，但寫起來，心情有舒暢之感，現在我寫文章，往往是為了完成任務，時間又催得緊，以至有些文章，連自己也不滿意。

《人民日報》8月14日登了一篇《打碎黃藥眠的賣藥葫蘆》，其中說：這裏所謂“以前”者，解放前之謂也。沒有共產黨領導的那年頭，對他真是“海闊憑魚躍，天空任鳥飛”，不要說“百般顧慮”，那真是一點顧慮也沒有，自由得很。他所謂的“影響了創作的發展”的根源，一找，就找到了“領導思想”。

北師大中文系文藝理論組編寫，登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57年第2期上的《黃藥眠的文藝思想是反黨反馬克思主義的》，全文2萬多字，詳述了他在文藝為工農兵服務，作家的思想改造，黨對文藝事業的領導等方面“反黨，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這些也是對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反對。”

戲劇家吳祖光可以說是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以他的性格，他才不管你“言者有罪，聞者不戒”哩！5月31日，他在文聯第二次整風座談會上說：

文藝界的“鳴”“放”之後，陳其通同志的文章表示了怕“亂”，他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我的看法是：事實上早已亂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是為了平亂。我活到40歲了，從沒有看到像這幾年這樣亂過。遇見的人都是怨氣衝天，不論意見相同或不相同，也不論是黨員或非黨員，領導或被領導，都是怨氣衝天，這說明了“亂”。黨中央提出整風是為了平亂，使今後能走上合理發展的道路。過去從來沒有像這樣“是非不分”，“職責不清”，年青的領導年老的，外行領導內行，無能領導有能，最有群眾基礎的黨脫離了群眾。這不是亂，什麼才是亂？

解放後有一個現象，那就是組織的力量非常龐大，依靠組織，服從組織分配，已成為人民生活起碼的道德標準。組織和個人是對立的，組織力量龐大，個人力量就減少。過去作家藝術家都是個人奮鬥出來的，依靠組織的很少。馬思聰之成為馬思聰是他個人苦學苦練的結果。現在一切“依靠組織”，結果，變成了“依賴組織”。個人努力就成了個人英雄主義。

作家，演員，長期不演不寫，不作工作，在舊社會這樣便會餓死，今天的組織制度却允許照樣拿薪金，受到良好的待遇。做了工作的會被一棍子打死，不做的反而能保平安。聽說一個文工團的團長寫了一個劇本，其中寫了一個反面人物，結果受了批評，把立的功也給撤銷了。鼓勵不勞而食，鼓勵懶惰，這就是組織制度的惡果。解放後我沒有看到什麼出色的作品。一篇作品，領導捧一捧就可以成為杰作，這也是組織制度。

組織力量把個人的主觀能動性排擠完了。我們的戲改幹部很有能耐，能把幾萬個戲變成幾十個戲。行政領導看戲，稍有不悅，藝人回去就改，或者一篇文章，一聲照應，四海風從。這是因為黨有如此空前的威信。政府如此受人愛戴。但是聲望應起好的作用，現在却起了壞的作用。過去搞藝術的有競爭，不競爭就不能生存。你這樣作，我偏不這樣作，各有獨特之處。現在恰恰相反，北京如此，處處如此。北京《白蛇傳》，《十五貫》，於是全國都是《白蛇傳》，《十五貫》。

我感覺到的威信太高了。咳嗽一下，都會有影響，因之作為中央的文藝領導就更要慎重，小心。當然，不可能有永遠正確的人，有些作家藝術家兼任行政領導，他們自己也口口聲聲說不願作，但是作官還是有癮，作官跟作老百姓就是不同，政治待遇，群眾看法等都不一樣，所以有些作家，他們打心裏還是願意作官的。很多作家，藝術家原是朋友，但現在却成了上下級了。

組織制度是愚蠢的。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電影工作搞得這麼壞，我相信電影局的每一個導演，演員都可以站出來，對任何片子不負責任，因為一切都是領導決定的。甚至每一個藝術處理，劇本修改……也都是按領導意圖作出來的。一個劇本修改十幾遍，最後反不如初稿，這是常事。

吳祖光說過文藝工作又對肅反提了意見：“肅反是搞重了，面搞寬了，北大，戲曲學校……都很嚴重。肅反很欠思考。有些人解放前對革命忠心耿耿，做了很多工作，而肅反中却狠狠地鬥了他，這是不公平的。如電影局，在肅反時，有位同志被鬥，她的愛人因之便和別人結了婚，後來證明她是被鬥錯



了，結果却拆散了人家的夫妻。”

吳祖光還發表文章《談戲劇工作的領導問題》：

我們誰都會談所謂“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可是他在培養文學藝術人材這方面表現了什麼呢？對於解放以來，工，農，兵的每一條戰線上都是人材輩出，蓬勃前進，而文藝戰線上獨獨新人寥落的具體現象我們又該如何具體解釋呢？

解放以後的新社會產生了新的生活習慣，這種新的生活習慣形成了新的制度，我感覺到這種制度可以叫做組織制度，革命的成功正是把全國人民的力量組織起來的結果，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但是就文學藝術的角度看，我以為組織力量的空前龐大使個人力量相對減少了。

從黨中央提出黨內整風以來，在這短短的時期內，僅從報紙雜誌上看到的一些被壓制，被埋沒的人材的事實就足以使人觸目驚心。我們今天的生活制度由于組織一切包幹的結果，竟使不勞而食成為合理合法的事情，因而恰巧有許多辛勤勞動出來的作品反而受到無情棍棒亂敲亂打，于是索性不寫不做反而落得平安無事。可惜的是藝術家們和剝削階級不同，他們對於不勞而食並不認為是幸福，而認為是恥辱與痛苦。

“服從組織分配”在革命鬥爭當中，在軍事行動當中，我想它應當是屬於鐵的紀律。但是到了今天，在我們文藝園地裏施行組織分配的辦法就使人很難理解了。無論如何，寫作、演、唱總是屬於個人的行動，一個口齒不清的人總不能由于集體力量，大家幫忙而能使他變得伶牙利齒起來，但是在我們的工作當中，由于萬能的組織分配的結果，却是什麼樣顛倒因果，亂點鴛鴦的事情都做得出來。我想在文藝工作的安排上，“組織分配”決不能絕對化。如果“組織分配”祇占五分（而且是經過深思熟慮，公平合理的分配），自願也占五分的話，事情便會變得好一些的。所謂“組織”亦就是指的領導。領導的權限無限擴展的結果，必然是日深一日的目空一切，自以為是。從主觀主義開始，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必然接踵而來。從文藝工作說來，誰都懂得“為人民服務”的道理，但是今天無數的藝術團體的領導，偏偏就從不估計人民群眾的需要，認為群眾渾噩無知。對群眾需要的東西，用無數清規戒律斬盡殺絕，把群眾不喜愛的東西塞給群眾作為對群眾進行教育。

我們的傳統戲曲藝術有着悠久的歷史，我們的優秀的表演藝術家們代代相傳，每一個都身懷絕技。作為新文藝工作者得到與民間藝人合作的機會正

應該好好地抓住機會向他們學習一下，但是絕大多數的同志們却是頤指氣使，發號施令，還沒有摸到傳統藝術的規律，便神氣活現地以改革者自居，把自己的一知半解硬去套人家的脖子。中國的傳統戲曲節目之豐富是盡人皆知的，但是這些年來把擁有幾萬齣戲的古典戲曲生生擠兌得只剩下廖廖幾齣戲在舞臺上苟延殘喘，這種大殺大砍的手段真是令人驚佩。“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真是這些戲改幹部的活活寫照。

對於文藝工作者的“領導”又有什麼必要呢？誰能告訴我，過去是誰領導屈原的？誰領導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魯迅？誰領導莎士比亞、托爾斯泰、貝多芬和莫里哀的？

他被劃為右派分子是無可挪移的，對他的這些無可反駁的金玉良言進行批判，自然盡是些由衷的和不由衷的胡說八道，不值一提。倒是他的妻子新鳳霞不為“領導”的威脅利誘所屈服，把愛情堅持下來，被傳為佳話。這是他、她，兒輩和家庭的驕傲，這是右派分子、知識分子的驕傲，這是美好人性的僅存碩果！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文化部劉芝明副部長逼她離婚，她堅持不離，一心要等吳祖光回來。

“你能等多久？”

“王寶川等薛平貴等了 18 年，我能等 28 年！”

吳祖光“改正”後，仍是在公開場合仗義執言。1988 年 4 月 5 日在全國政協小組會上，吳祖光以《要信任知識分子》為題作了發言：

新中國成立以後，進入 50 年代，黨和知識分子的关系逐漸發生了變化。對《紅樓夢研究》，對《武訓傳》，對“胡風”的批判一步步轉入政治問題的範疇。到 1957 年的反右鬥爭，以號召向黨提意見為名而向數十萬響應號召提出各種意見的知識分子進行了殘酷的政治迫害，罪名提到反革命的高度，迫使千家萬戶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八個字可不是空洞的詞句啊！對於所有右派，都是血淚深仇），成為歷史上罕見的人間悲劇，盡管在幾十年後大部得到“平反”和“改正”，但巨大的創傷却是永遠難以彌補的。而發生在 6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却又是從迫害知識分子開始，十年浩劫，幾乎使國家民族瀕于毀滅……再三再四殘酷踐踏中國知識分子的尊嚴以至生命，真是使人痛心，使人傷心……

中國的歷史可以說明，知識分子是建設國家的主要力量。秦始皇焚書坑儒，不過二世而亡。漢高祖也知道“馬上得天下”却不能“馬上治天下”。

宋太祖治天下也得依靠半部《論語》。到了近代，推翻滿清政府的國民黨人孫中山先生和他的大批戰友，壯烈犧牲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絕大部分都是知識分子。再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哪一個不是知識分子？古今中外一切的生活現實都得出仇視知識分子的結論。

寫戲的不滿，演戲的火更大。在不得不服從指揮棒轉了數年之後，中國京劇一團團長李萬春終於有了說話的機會：“中國戲劇本來就是人情法理、善惡因果的社會反映，是好的教育，是寓教育于社會人生的，也是促使改變不善的人心。凡一詞一句，經過了文學家審慎的鑒定，一排一演，經過了許多藝術家設計指導。如此而成爲劇，流傳數百年……這是它的價值，也是中國戲劇的歷史光榮。”“中國劇的重點反映‘忠奸功罪’四個字，當然離不開帝王將相、富貴貧賤。也有呼帝王萬歲，那是表徵實情事實，何謂封建以及資產階級？要以這是‘封建餘毒’，那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皆是封建餘毒。”（《陽謀》頁173）

不管話說得直接了當還是委婉曲折，你仔細看吧，筆鋒都是指向黨天下，指向毛澤東思想，指向《講話》。在文藝創作中，也出現了一批離經叛道的“寫真實”，“干預生活”，揭露陰暗面，反對“三害”的右派作品。著名的有劉賓雁的《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姚文元批判道：“他用自己反黨的眼光把陳立棟醜化了，他恨陳立棟執行黨的指示，所以他把陳立棟醜化成一個沒有任何優點的人。作者在竭力假造出這樣的一個公式：執行黨的指示 = 官僚主義 = 獨斷獨行 = 教條主義和黨八股。同其他右派一樣，他在這裏攻擊的不是官僚主義，而是黨的領導。作者把黃佳英當作英雄的先進人物來表現的，在黃佳英身上寄托了他反對‘官僚主義’的全部理想。然而黃佳英是怎麼樣一個人呢？那是一個被美化了的‘反現狀’的個人主義者。但儘管作者想把她寫成娜斯嘉型的人，在劉賓雁的筆下，在階級鬥爭十分尖銳的中國，黃佳英却不是娜斯嘉，而是反黨的個人主義者。”“整個報社的氣氛十分暗淡。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如同一塊大石一樣壓在每一個人的頭上。總編輯陳立棟……是一個壓制任何合理的政見的獨斷獨行的專制主義者……作者帶着深刻的嘲諷描繪這一切。”（《論文學上的修正主義思潮》頁207—211）

南有姚文元，北有李希凡。李希凡在《從〈本報內部消息〉開始的一股創作上的逆流》中說：“絕不能低估《本報內部消息》在一部分青年中的影

響，尤其是在有着濃厚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的青年中間，黃佳英起了極大的煽動作用。在反右鬥爭中，很多青年右派分子，正是披着黃佳英的外衣出現在群眾的面前……難道林希翎之流不正是劉賓雁的黃佳英的模特兒嗎？……早在劉賓雁的第一篇特寫《在橋梁工地上》裏，就已經流露了陰暗的反黨思想，如把老幹部寫成不學無術，思想僵化，不能領導復雜的現代化工業的人，誣蔑我國建設進度緩慢，並武斷地說我們建設中的缺點不是由於缺乏建設經驗等復雜的原因造成的，根源好像全在領導上的保守無能等。不過，這篇特寫的缺點究竟還非常隱蔽，劉賓雁在當時也不敢露骨地大膽地宣傳他的反動思想。祇有在他的《在橋梁工地上》發表，並受到《文藝報》，《人民日報》等大肆吹捧以後，劉賓雁才敢寫《本報內部消息》這樣露骨的反動作品。自從這篇作品又受到某些報刊的贊揚以後，所謂‘揭露生活的陰暗面’，和歌頌黃佳英之流的‘青年勇士’的作品，就大量出現了。《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裏的林震，實際上是黃佳英的男性翻版。”（《中國青年報》9,17）

李希凡批判王蒙抨擊北京某中共區委機關官僚主義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認為“這種官僚主義滿天飛的……黨的區委會，在離開中央較遠的地區……還有若干可能性，但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這是不能相信的。”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有些同志批評王蒙說他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寫得不真實，中央附近不該有官僚主義。我認為這個觀點不對，我們要反過來問：為什麼中央附近不會產生官僚主義呢？中央內部也產生壞人嘛！”（《文匯報》2月9日；2月16日）狗比主人狂吠的調門高，純屬正常現象。

青年詩人流沙河寫了一篇散文詩《草木篇》，遭受到圍剿。批判者對詩中寫了“糾纏着丁香，往上爬”的藤是罵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說是對“人類歷史上最民主最先進制度的污蔑”。（原詩是：他糾纏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終於把花掛在樹梢，丁香纏死了，砍作柴燒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氣，窺視着另一株樹……）說詩中的梅花把自己給了“冬天的白雪”，被批為“變天思想”，盼望國民黨卷土重來。（原詩：在姐姐妹妹裏，她的愛情來得最遲。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誘蝴蝶的時候，她却把自己悄悄地許給了冬天的白雪。輕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別的花不配被白雪撫愛一樣。在姐姐妹妹裏，他笑得最晚，笑得最美麗。）“有的文章說“《草木篇》是極少數不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分子感到一個階級滅亡，充滿了沒落的情緒，要唧唧唔唔

地為舊社會的滅亡唱挽歌！”本省文聯一位領導說：“我一看見《草木篇》就想起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對這種反動腐朽的東西，一棍子打死也未嘗不可！”（《文匯報》5月16日）根據我的記憶，好像傳達的毛講話是說，作者與共產黨有殺父之仇，一有機會就《草木篇》。《草木篇》中的其他篇章是：

《白楊》：她，一柄綠光閃閃的長劍，孤零零地立在平原，高指藍天。也許，一場暴風會把它連根拔去。但，縱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誰彎一彎！

《仙人掌》：她不想用鮮花向主人獻媚，遍身佩上刺刀。主人把它逐出花園，也不給水喝。在野地裏。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兒女……

《毒菌》：在陽光照不到的河畔，他出現了。白天，用美麗的彩衣，黑夜，用暗綠的磷火。誘惑人類。然而，連三歲的孩子也不去采它。因為，媽媽說過，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對《草木篇》也有另一種評價。6月4日，在四川文聯舉行的座談會上，張默生教授提出“詩無達詁”。何劍熏教授說道：“我認為，《草木篇》反映了一部分知識分子在歷史運動，尤其是在肅反運動以後的痛苦、失望和一定程度的恐怖的情緒。《草木篇》所反映的那種現實是存在的。尤其在肅反運動以後，一部分知識分子，是懷着一定的痛苦、失望，甚至恐怖的情緒的。”但這些人們，也大都劃了右派。

開封師院（即解放前的和現在的河南大學）的“蘇聯文學”教授李白鳳，在《人民文學》（7月號）上發表《寫給詩人們的公開信》中說：“我感覺到詩歌的創作被限制在如此狹窄的領域裏，詩人們替自己限定了寫作範圍，就在這樣的小天地裏回旋着。你們，從你們中間最優秀的詩人裏選定不那麼太多的詩歌的寫作方法，把它看成衡量一切詩歌的尺度，有時甚至很少考慮到文學史上曾經不斷出現的一些現象——風格的多樣化，像希臘神話故事裏的柏魯克拉士那樣，把一切詩歌都放到自己的床上，加以‘拉長’或‘截短’。”他還引用馬克思的話，反對壓抑寫作的創造性和獨特的個人風格：“每一滴露水在太陽照耀下都閃耀着無窮無盡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陽，無論它照耀着多少個體，無論它照耀着什麼事物，却祇產生一種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誰能說這樣的見解不切中肯綮呢？但他却因此劃了極右派。我和他在一個農場勞動教養，受盡迫害折磨、勞困饑餓。一次，我們去貼標語：“高舉三面紅旗奮勇前進！”“大躍進萬歲！”……他端着半碗糲糊跟在後面，當要

用糰糊粘的時候，發現他快把糰糊喝光了。我們急中生智，又給碗裏續了些水，把標語“胡弄”在牆上。隨後被風刮掉，雖然心裏害怕，但又奈之何呢？可見，即便是像他這樣的大詩人、文人學士，在久餓之下，肚裏也就沒有詩意，甚至連人格尊嚴的影子也沒有了。1962年解除勞動教養歸家，要說無業也有業，死前的職業是拉板車。可他在農場時，有時還要向我們數說他當年的“威風”：“柳亞子、臧克家拍着我的肩膀，‘白鳳、白鳳’的；無話不談。”

雜文以其鋒利深刻，最適宜於反映事物的時代變化，人物的知情意行，而且可收短平快的效果，所以許多報刊都發表了廣受歡迎的雜文，而且有的設了專欄，如《中國青年報》的“辣椒”，《河南日報》的“蒺藜草”等。在鳴放中的雜文，論質論量，首推徐懋庸。他有很高的馬列水平，我們在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時，都學習他的文章《〈矛盾論〉在思想改造中的應用》。在他的雜文中，被用得得心應手，文筆流暢，意蘊深長，以馬列之矛，攻馬列之盾，揭出人人心中有之之社會弊端，讀後令人驚，令人喜，令人思。他出手很快，短期內即寫有上百篇。姚文元就其中兩篇，《不要怕不民主》和《苦悶》進行批判：

徐懋庸之流高喊“不怕黑暗”，“揭露黑暗面”的人，却把我們社會說成似乎沒有“民主”，要“享受民主”，就要向“官僚主義者”爭取。徐懋庸的腦子裏，其實是裝滿了資產階級民主，他所要“享受”的，是一種不要集中的絕對民主。“我們就不能等到他們自己放手”，這“我們”和“他們”，就表示在根本立場上他是把自己同各級領導幹部（他們當然可能有某些缺點）處於對立地位，同黨的領導處於對立地位，既然“他們”不肯“自動放手”，那就祇有“鬥爭”了。於是，當社會上右派猖狂進攻，“言論一放，意見紛紛”之時，徐懋庸也就挺身出來作右派的喉舌，他大呼“這是好現象”，“現在的人愈多的感到社會的苦悶”，“苦悶多極了”。怎麼擺脫這不是個別事件而是整個“社會的苦悶”呢？就是要在社會主義思想之外“生出更好的思想來”。這“更好的思想”是什麼……我們在某些“揭露陰暗面”的作品中所看到的，不就是徐懋庸所推銷的反對領導，反對民主集中制的“更好的思想”嗎？（《論文學上的修正主義思潮》頁200—201）

徐仲年在鳴放中發表了雜文《烏“晝”啼》。反響很大，不光文筆好，且反映了知識分子當時所焦心的一種真實存在。摘抄1、5小節如下，以供今人觀賞。

## 徐仲年：《烏“晝”啼》（摘錄）

### 1、烏鳳和鳴

葉元龍教授在上海市共產黨宣傳工作會議上，提出了“鳳鳴”與“烏鳴”的問題。“風鳴”指的是“報喜”，“烏鳴”指的是“報憂”。葉先生勸共產黨黨員：

鳳鳴要聽，烏鳴也要聽；尤其不要因為不喜歡烏鴉叫，當烏鳴的時候，就一槍開去。因為一槍開去，烏鴉固然没法再鳴，可是連鳳凰也嚇得不敢開腔了！

我不知道從何年何月起，烏鴉變成了“不吉利”的動物。我沒有在這個問題上用過考證功夫，因此作不出結論。不過可以肯定：①烏鴉是益鳥，——向人“報喜”的喜鵲反而是害鳥；②古人以為烏鴉是能“報喜”的（可查：“樂府古題要解”中關於“烏夜啼”的解釋）。

一般人以為鳳凰是很美麗的鳥，其實不然！它是：“鱗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頷鷄喙，五色備舉”（“說文”），實在沒有什麼好看！何況還有假鳳凰，為數相當的多！

因此對於鳳凰和烏鴉的估價，應當辯證地看。能够烏鳳和鳴，那是最好的好事！

我摹仿“烏夜啼”，作“烏晝啼”。

是否提防獵人的槍？不在考慮之內！

毛毛雨下個不停，和風細雨……

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矛盾，因此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時候，用不着大張旗鼓，祇須和風細雨就够了。

在原則上，這是對的。

然也要看具體情況，不該以不變應萬變！

毛毛雨下個不停是有害的：下得久了，秧要爛，棉不結鈴。田初濕時是軟的，容水過度就會變硬。“清明時節雨紛紛”，尚且要：“路上行人欲斷魂”；不幸而淫雨一半載，老百姓就得餓死不少！

和風細雨自有他的妙處，但迅雷烈風也有掃蕩陰靈之功！某些時候，錯誤嚴重，態度頑強：那就用得着迅雷烈風了；在這種情況下，和風細雨不足

以息民憤！

尤其不希望對自己和風細雨，對人迅雷烈風；對黨外人士要求自我的批評，對黨內人士則要求批評別人！

我聽了許多代表所反映的內容，有些事真令人發指！小民主解決小偏差，大錯誤就得用大民主來糾正，正如對癥下藥，有些病該用霸藥來治。

## 5、小論帶坑臭

有那麼一種說法：舊知識分子在舊社會裏生活得久了，難免有股“帶坑臭”！

話是對的。

但是有一點，我不太明白：據我所知道，共產黨黨員不是從太上老君的八卦爐裏煉出來，確確實實也是從舊社會中來的。那麼，在他們的身上，難道就沒有一絲一毫的臭氣麼？

有人說：他們早就參加了革命，不論是“地下”或“地上”，因此他們身上的臭氣早已拍掉了：這就叫做“發展觀點”！

我回答道：承教了！發展觀點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據我所了解，所謂：“發展”有“縱”的發展（時間上的發展）和“橫”的發展（空間上的發展）：二者缺一就不行的。“帶坑臭”這頂帽子祇往舊知識分子的頭上戴，而且幾乎在任何運動中，對於知識分子的“評定”都是斷章取義，不問發展，不問聯系，——要不然祇追究“壞的”聯系，——這樣就造成了：我發展，你不發展的嚴重偏差！于是高牆聳立起來了，嗚呼！（《文匯報》1957年6月18日）

由于此文遭受到張春橋潑婦罵街式的批判，遂使此文更形轟動，以至毛澤東也曾給予“垂青”（《毛澤東選集》第五集頁446）。張春橋寫道：

“烏鴉”徐仲年，曾對“烏鴉”做過一番高深的考證。考證的結果，認為“可以肯定”：“烏鴉”是“益鳥”，而且能“報喜”……為了“學習怎樣研究分析”，我倒要給徐仲年的考證，試作一點粗淺不堪的注釋。注曰：

“烏鴉”徐仲年，系政治動物，在臺灣“四大家族”的屋檐下，華爾街老板們的圍裏……均有“益鳥”之譽，“烏‘晝’啼”者，向主子們“報喜”也……

“烏鴉”又是“食腐肉”為生的動物。根據我們的常識，哪裏發生戰爭或饑荒，哪裏就有“烏鴉”盛集，斜飛怪叫，以搶食死尸的腐肉為樂。因此，在



“烏鴉”身上，“臭氣”衝天，令人掩鼻。也許就是這個緣故，在勞動人民的心目中，“烏鴉”便成爲“不吉利”的“害鳥”。（徐仲年身爲“烏鴉”，居然說“不知道從何年何月起，烏鴉變成了‘不吉利’的動物”，足見“烏鴉”還是一種善于撒謊的動物。）證之徐仲年，他把共產黨比作“牛鬼蛇神”，比作“閻王殿上戴着‘一見生財’的帽子的活寶”，深仇大恨，不共戴天，切齒之聲，發自內心。而徐仲年畢竟是個“知識分子”，不像葛佩琦“少將”那樣的“武藝高強”，動輒喊“殺共產黨人”。但是，這又恰好顯出了“烏鴉”的本性，他既要不勞而“食”，祇好和葛佩琦“少將”來一個分工：你去殺人，我來啃死尸。論殺人，葛佩琦當然不如蔣介石。那麼，什麼是“烏鴉”的“發展”“觀點”？也就“昭然若揭”的了。“烏鴉”就是這樣無耻，這樣狠毒的動物。社會主義時代，勞動人民的天下，決不許“烏鴉”猖狂！徐仲年如果甘心永遠做“烏鴉”，那末，“烏鴉”的命運就是這樣：自取滅亡！

《人民日報》9月4日載，《丁玲的伙伴李又然的老友江峰的手足吳祖光的知心艾青長期奔走于反動集團之間》。我這裏單單是介紹報“揭露”的，艾青是“吳祖光的知心”：

艾青和吳祖光在一起是“無話不說”的。在吳祖光面前，他誣蔑黨內陰森恐怖，說“黨內沒有民主”，“黨內沒有溫暖”，並說：“你不是黨員還好點”，“黨是無情的，專整人。”他向吳祖光表示：後悔入黨，入了黨不自由。還說：“入黨有啥好處，入了黨還不是被人家指着鼻子罵。”……艾青甚至在黨的會議上，也散布“黨內做人難”，“一批人整人，一批人挨整。”等荒謬言論。

《人民日報》9月24日載，徐遲的文章《艾青能不能爲社會主義歌唱？》，批判艾青及其詩作《黃鳥》等：

這些年來，艾青的情緒是非常陰暗的。由于犯過錯誤受到黨的處分，他認爲自己是處在逆境之中了。但是，和丁玲一樣，他也經常把外國出版的他的翻譯詩集和關於他的詩論文集捧來捧去給人看，並以之作爲處於逆境中的安慰以及對黨驕傲的資本。

《黃鳥》一詩是作于1953年，發表于去年8月26日《北京日報》，內容是：喜鵲怒了，向黃鳥挑戰似的衝去……黃鳥飛走了……喜鵲占領了樹枝……小麻雀跳到他身邊，流露諂媚的神氣。喜鵲對小麻雀說，“她長得怪模怪樣，歌聲裏有妖氣，我們雖然吱吱喳喳，說起話來却有條有理。”小麻雀說：“對，對，對”。……很久很久沒有聲音……微風……黃鳥又在歌唱了。

這是首諷刺寓言詩。無論如何是在諷刺什麼人的。艾青顯然自比為黃鳥，那麼喜鵲和小麻雀呢？倒要問問他指的是誰？

《養花人的夢》講一個人祇養月季花，養了幾百種。夜裏他夢見牡丹、睡蓮、牽牛、石榴、白蘭等花來訴苦。石榴說：“冷淡裏面就含有輕蔑”；仙人掌說：“祇愛溫順的人，本身是軟弱的；而我們却具有倔強的靈魂。”最後所有的花都說：“能被理解就是幸福。”

月季花說，其實她們也很寂寞。

養花的人從夢中醒來了，感慨起來，不滿于自己的偏愛，說“我自己也越來越覺得世界太狹窄了”。這句話實際上就是說詩人覺得他很不自由。這是艾青的“草木篇”。其惡毒不亞于劉沙河的。

《蟬的歌》寫一隻八哥，聽蟬早晨就“知了知了”唱早晨的歌，中午還“知了知了”唱熱的贊美詩；傍晚唱夕陽，夜晚唱月亮也是同一的“知了知了”的歌，八哥說：“我一聽你的歌，就厭煩極了，原因就是它沒有變化；沒有變化，再好的歌也會叫人厭煩的。你的不肯休息，已使我害怕，明天我要搬家了。

這篇寓言裏，艾青對我們的詩歌的估價，和右派分子李白鳳的“狹隘的領域”等說法豈不一樣？而“明天要搬家”則又和流沙河相似，不知艾青要搬到什麼資本主義的自由世界去！艾青忽然也愛上了寓言這形式。這和馮雪峰的寓言，和臭名遠揚的流沙河的《草木篇》等，是形式內容上，思想感情上都十分一致的。

艾青是一位詩人，去年七八月裏他忽然寫起寓言了。寓言這種文藝形式，在過去反動統治的時代裏，作家受着壓迫不能暢所欲言地直接表現個人的思想，往往取這種借物寓意，指桑罵槐的表現形式，去諷刺打擊反動的壞東西，但艾青的諷刺對象却是正面的新事物。

這是臧克家著文《艾青的近作表現了些什麼？》對艾青的大批判。

《養花人的夢》，這篇寓言等于一篇宣言，鮮明地表現了艾青對“百花齊放”方針的惡意諷嘲。艾青首先諷刺了那位院子裏“種了幾百棵月季花”的養花人，說他的“院子裏呈現出了一種單調的熱鬧”。于是，在艾青的筆下，出現了“自尊”的牡丹，“冷淡裏就含有輕蔑”的石榴，“能體會性格美”的白蘭，“帶來了信念”的迎春，說着“祇愛溫順的人，本身就是軟弱的，而我們却具有倔強的靈魂”的仙人掌……他的思想，他的情緒，表現了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主導力量的不滿，對毛主席所提出的文藝農工農兵方向的

抵觸。他覺得月季花雖然“專寵”，但“實在寂寞”。艾青對我們的新社會制度（月季花就是它的象徵）是不滿意的。他覺得它“太單調了”，“太窄狹了”。對於各種各樣的花他付以最大的熱情。他贊美她們的“輕蔑”，“性格的美”，“倔強的靈魂”……而為她們不“被理解”而憤憤不平。艾青不是站在黨的立場，社會主義的立場，對於一切非工人階級思想的東西去進行鬥爭，說服，反倒以極度熱情去鼓吹資產階級思想化身的東西向社會主義制度進攻。艾青近兩年來，由於政治熱情的衰退，由於遠遠的脫離群眾，由於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情感的濃重，他對於新社會的事物，不但不感興趣，有時發生抵觸情感。最近被揭露的他的反黨言行，就是他寫這類反社會主義作品的根源。（《文藝學習》1957年第10期）

這個詩人藏克家，在大鳴大放時期，在《人民日報》（5月3日）上發表了一篇雜文《六親不認》。望題而知其要寫“新社會”的人情炎涼。他在後來寫的反悔之作《從交心談起》中說：“這篇文章寫作的目的，是想提出同志之間情感交流，心和心交通的問題。這篇文章發表以後，引起了人們的注意，許多人同情它，喜受它。事後證明，這些人的思想情感都存在着問題。我當時祇感覺到它的階級觀點不大對頭，決沒想到，在右派向黨進攻的時候，它被利用為射擊的子彈，起了嚴重的破敗作用，給黨造成了很大的損失。同志之間的情感交流，過去的確存在着一些問題，提出來商討是可以的。我的重大錯誤，是在把‘友誼’的不能建立的原因說成‘多半是由于氣候的關係’，把知識分子的不敢‘熱情率真’的傾心，說成是由于幾年來的‘一些運動’的關係。這顯然是歪曲了，誣蔑了政治運動的重大意義和它的成果。”

我讀了那篇文章，特別是其中提到：許多朋友之間的促膝談心，都進入了檔案，成為肅反的材料。這在當時，于我心有戚戚焉，至今思及，仍會出一身冷汗。這是中共，國家向人民施行的政治上、心理上的恐怖主義。大多數人是不得已而生活在恐怖之中的，藏克家則認為生活在恐怖之中是應該的，正常的，正確的，因為，“不講統一意志祇談個人心情舒暢，不講批判清掃，祇講什麼話都講，這樣講友情，是純粹個人主義的，不但沒有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講話，在這情況下交談出來的話是會不利于社會主義集體的。”根據藏克家這種認識，你若是他的好友，在私下與他交談中，如果被 he 發現你的話是“落後的”，他用毛主席的“六條標準”或鄧小平的“四項堅持”衡量之後，會不會打小報告，裝入你的檔案，在運動中整你或讓公安局抓你的“現

行”？說實在話，與現在相比，那時候這個情況可是嚴重地存在的，甚至這個問題存在于夫妻之間。所以他寫的《六親不認》反映了客觀的真實和主觀的良心，而《從交心談起》却是曲意奉承的昧良心之談。何謂“統一意志”？領袖意志也。如果他不是昧着良心，怎能在文革之後，毛的罪惡已經非常昭彰，大白于天下之時，還要興風作浪掀起一陣陣擁毛熱？擁毛個什麼勁兒？是擁他鎮壓了幾百萬“反革命”、“右派”，餓死了幾千萬老百姓，迫害絕大多數“老幹部——走資派”？還是他禍國殃民把中華民族推入瀕臨崩潰的邊緣？藏克家掀擁毛熱是不遺餘力的，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當然不能指望他對艾青態度公平了，連良心都昧了還講什麼“公平”？如果誰不知道“洗腦”或“思想改造”是什麼玩藝兒，臧克家這個模特兒告訴你：就是泯滅良心，泯滅得越多、改造得越好，喪盡天良就改造徹底了。但任何人都可能喪盡天良，所以便有“活到老，改造到老，臨死還有三分沒有改造好”的說法。

多數祇能做到昧良心，昧良心還是有良心的，祇是昧着而已。這裏，為中國民主運動提出一個重大的“啓昧”課題。民運的一個迷思是認為祇要把毛、共令人發指的罪惡讓世人皆知，把民主，自由，人權的理念讓國人皆知，然後由曠世英雄登高一呼，群起響應，揭竿而起，風起雲湧，一杆到底，大功告成。事實並沒有這麼羅漫蒂克，相反，已具備上述要素的留學生却仍粉飾罪惡，歌功頌德，甚至有民運人士回國助其建造防火牆，以助紂為虐，為虎作倀。探其因果，實乃昧良心所致。相對而言，宗教雖也受中共打壓，但仍能屢壓不衰，其原因就在于它在搞靈魂工程。我說的“啓昧”就是促其良心發現，也是靈魂工程。這一點，是民運要在自己原有軌道上再吸收宗教（如法輪功的“真善忍”）的成功經驗之處。反右派運動，唯“心”而論，便是一次昧良心運動，所以在運動中能稱得起左派而不昧良心者，未之有也。對被劃為毒草的從維熙的小說《並不愉快的故事》，老舍在《北京文藝》上著文時竟說：“叢維熙寫《並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動農民造反。”（《走向混沌》第35頁）可見，連老舍也必須作昧心之談。

《北京日報》記者、叢維熙的夫人張滄，16歲參加革命，因提意見：“五一勞動節搞大規模慶祝，實屬勞民傷財”，和在辦公室寫陶行知式打油詩：“大老倌坐小汽車，小老倌坐大汽車，沒車坐的吃灰。”成為夫妻右派，受到嚴酷懲處。（同上，第21頁）

被批判的名篇還有：鄧友梅的《在懸崖上》；張賢亮的《大風歌》；被姚

文元批為“明顯地看到這種修正主義思潮影響”的“具體作品”宗璞的《紅豆》、李國文的《改選》等；徐遲的相聲《開會迷》；公劉、邵燕祥的詩；丁聰、廖冰兄、李濱聲、沈同衡、王復羊等的漫畫……

在鳴放中還出現了巨量的漫畫，諷刺小品，詩歌（還包括古雅的填詞，下裏巴人的打油詩，快板），見報的有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黃萬里的《花叢小語》，自稱是小說，反映的問題是北京新修的馬路質量太壞，到處翻漿。文章說：“盡說美帝政治腐敗，那裏要真有這樣事，納稅人民就要起來叫喊，局長總工程師當不成，市長下度競選就有困難！我國的人民總是最好說話的。你想！沿途到處翻漿，損失有多麼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霉的總是人民！”這篇“小說”的開頭，他填了一首《賀新郎·百花齊放頌》：

綠盡枝頭蘂。怎當他春寒料峭，雨聲凄切？記得梅花開獨早，珠蕾却曾迸裂！盼處士杳無消息。桃李臨風連影擺，怯輕寒羞把嫩芽茁。靜悄悄，微言絕。

忽來司命護花節。乘回風撥開霾氣，宇清如沕。人間烏烟瘴氣事，一霎熏銷燼滅。翻激艷芬香洋溢。好鳥百花叢裏翠，這當兒鼓起笙簧舌。心自在，任翔逸。

在文藝界，聲望顯赫的右派要數丁玲和馮雪峰。很多回憶反右的文章，都把這歸結為是由于周揚與他們的宗派鬥爭，並且揭示出許多寶貴的第一手材料，說明這是確鑿可信的。但是，許多人又是祇知其一、不知其二。現在又有新的出土文物：

### 周揚是按名單抓右派

1957年，文藝界的許多著名人士被打成“右派分子”，每隔兩三天便有轟動效應。當時主其事者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第一副部長、中國文聯黨組書記周揚。後來文藝界對周揚自然是怨氣聲聲、怒氣衝衝。“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共產黨的老幹部中，陸定一和周揚是大徹大悟、痛改前非的。周揚在思想解放運動中大聲呼喊，為平反冤、假、錯案也出力甚多，但當年的“右派分子”對他在1957年的所作所為仍不能原諒。70年代的“右派”如丁玲等人後來變成了“左派”，而八十年代的周揚在反自由化運動中卻變成了“右派”，前者對后者依然耿耿于懷。

### 周揚是代人受過

我曾聽到周揚透露文藝界反右派的一個重要情節，公諸于衆，以存史實。

1979年胡耀邦主持的理論工作務虛會期間，周揚是我所在的第三組的召集人。那時他已有70好幾了，而且因患肺癌動過大手術，主持會議，帶頭發言，却未嘗懈怠。有一天，他沒有來。次日，問以故。他說參加（馮）雪峰的追悼會去了。他一進靈堂就痛哭流涕，見了雪峰的照片深感“愧對故人”。

我們小組有人直率地問：“那麼當年你怎麼下得了手呢？”

周揚這才說出：“抓右派之前，主席給我一個名單，名單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匯報‘戰果’。我說，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麼辦？主席說，翻延安的老賬！我當時常常說‘在劫難逃’，許多人聽不懂。”不知內情，誰能聽得懂？

周揚是有自我批評精神的，他說：“在中宣部，陸定一和我都‘左’的不得了。即使沒有主席的這個名單，恐怕也好不了多少。”

以前祇知道按“指標”抓右派，居然還有按“名單”抓右派！

有人問：“這個名單是哪裏來的？”周揚說不知道。

有幾位自作聰明的同志說：“一定是江青那個壞女人提供的。”

我說：“不一定。江青不過是看家狗一條！”後來審判江青時，果然她說：“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叫我咬誰就咬誰。”

我相信周揚的為人，但所說的這件事沒有證據。我私下對周揚說：“這叫死無對證。”意思是提醒他，可能有人會懷疑他推卸責任。

他說：“你去看看1958年1月份的《文藝報》。”

我有印象，說：“好像專門登了幾位作家在延安時代寫的作品。”

“那就是爲了翻老賬。你再仔細看看《編者按語》，是不是主席的話？”

我把1958年1月26日出的《文藝報》第二期找了出來，《編者按語》的題目叫做《再批判》。確實，那口氣非毛莫屬，印證了周揚所說的情節。

後來我又從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內部發行）第七冊找到了這個《編者按語》，那就是鐵證了。注解中說：“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文藝報》準備在第二期出一個特輯。《文藝報》擬的按語，毛澤東不甚滿意，改寫和加寫了許多段落。”

《再批判》的全文如下（【……】中的文字就是毛澤東改寫和加寫的文字）：

【再批判甚麼呢？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節有感》，蕭

軍的《論同志之“愛”與“耐”》，羅烽的《還是雜文的時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還有別的幾篇。上舉各篇都發表在延安《解放日報》的文藝副刊上。主持這個副刊的，是丁玲、陳企霞。】丁玲的小說《在醫院中時》，是在1941年發表在延安的文藝刊物《谷雨》上的，次年改題為《在醫院中》，在重慶的《文藝陣地》上重新發表。

王實味、丁玲、蕭軍的文章，當時曾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當做反共宣傳的材料，在白區大量印發。蕭軍、羅烽等人，當時和丁玲、陳企霞勾結在一起，從事反黨活動。丁玲、陳企霞等人在此後的若干年中進行了一系列的反黨活動，成為屢教不改的反黨分子。

【丁玲、陳企霞、羅烽、艾青是黨員。丁玲在南京寫過自首書，向蔣介石出賣了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她隱瞞起來，騙得了黨的信任，她當了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的主編，陳企霞是她的助手。】羅烽、艾青在敵人監獄裏也有過自首行爲。

【這些文章是反黨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戰爭處於艱苦的時期，國民黨又起勁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實味等人的文章，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派。】

上述文章在延安發表以後，立即引起普遍的義憤。延安的文化界和文藝界，針對這些反黨言論展開了嚴正的批判。15年前的那一場鬥爭，當時在延安的人想必是記憶猶新的。去年下半年，文藝界展開了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鬥爭和批判。許多同志在文章和發言裏，重新提起了他們十五年前發表出來的這一批毒草。

【1957年，《人民日報》重新發表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其他文章沒有重載。‘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許多人想重讀這一批‘奇文’。我們把這些東西搜集起來全部重讀一遍，果然有些奇處。奇就奇在以革命的姿態寫反革命的文章。鼻子靈的一眼就能識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騙。外國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許想要了解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們重新全部發表了這一批文章。】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這兩句陶淵明的《移居》詩，從此就有了新的含義。如果哪篇文章成了“奇文共欣賞”，經批判家們“疑義相與析”，必定是“毒草”，對作者則發出“打倒”的信號。故流行的成語詞典都要特別注明：“現常用于貶義”。隱逸世外的陶淵明，決沒有想到他的詩句會成

爲毛澤東進行階級鬥爭的武器。請繼續看《編者按語》：

【謝謝丁玲、王實味等人的勞作，毒草成了肥料。他們成了我國廣大人民的教員。他們確能教育人民懂得我們的敵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開通起來，天真爛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許多世事。】

爲了幫助讀者理解這些文章對於我們有些甚麼教育作用，毒草何以變成肥料，我們發表了林默涵、王子野、張光年、馬鐵丁、嚴文井、馮至同志的六篇文章，而把每一個批判對象的原文附在批判文章的後面。當然，這個批判還是不夠的。我們希望文藝界利用這個材料，在各地的文藝刊物上發表深刻的批判文章，給讀者以更多的幫助。

馬鐵丁是郭小川。上述六位批判別人的人，後來也遭到批判，有的被打倒甚至受迫害至死。

丁玲、陳企霞早在反右之前已被打成“反黨集團”，“再批判”之後又加上“右派分子”帽子。（《動向》2003年11月號）

上面就是我說的“其二”，下面我再來把“其一”說一下：

簡單說來，可以說是一言而盡。周揚作爲丁玲的頂頭上司對她進行宗派鬥爭，無中生有，栽贓陷害，把她和陳企霞打成“丁陳反黨集團”。

復雜起來，又可以說是一言難盡。他把馮雪峰也拉進“丁陳反黨集團”來，把時間追述到30年代。詳情可參看參與處理此事的當事人、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李之璉的回憶錄《我參與丁、陳“反黨小集團”案處理經過》（《炎黃春秋》1993年3月號）和《不該發生的故事》（《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3期）以及機關黨委副書記兼作協機關黨總支書記黎辛的回憶錄《我也說說“不應該發生的故事”》（《新文學史料》1995年第一期）從他們的回憶錄中可以看出，共產黨內部勾心鬥角的鬥爭是多麼殘酷無情！是多麼喪良昧心！是多麼漆黑一團！什麼狗屁“左”呀，“右”呀的！看看李之璉是怎麼說的？——“對揭發的問題無限上綱是‘左’；無中生有的，顛倒是非的，就不祇是‘左’了。因爲處理每個案件都是由一定的人主持的……這個主持人如果經常說了不算，或朝秦暮楚，毫無定見，或以個人好惡來認定是非，或感情衝動……他就不可能處理人的是非曲直。”周揚具體主持處理“丁陳”案件是如此；毛澤東總體主持處理一切案件也莫不如此。把剛到延安的丁玲誇成一朵花的是毛澤東，有詩《臨江仙》爲證：

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



出牢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今日又把丁玲親手打成右派的，還是這個毛澤東。

要說丁玲“右”，可大大地冤枉了她，直到“改正”後，她還聲稱《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是對毛的獻媚，而且自作多情地慶幸毛沒對她落井下石，其實毛對她是“推落井再下石”。不過，《三八節有感》倒可以說是她思想上民主底色的最後閃現。

同樣，馮雪峰也是周揚搞宗派主義的受害者，不過，變受害者為“害人者”，這種顛倒是非乃是共產黨內政治運作的常規。共產黨總是把事情搞得與事實適得其反；請看，宗派主義受害者馮雪峰迫不得已所作的檢討：“我對於周揚同志等，在1933年的時候，已經形成宗派主義的成見。1933年底我離開了上海，1936年4月底回上海時聽了胡風、周文等人的一面之詞，立刻又加深了我的宗派主義的看法。因此，我沒有事先同周揚同志等商量，而倒是聽了胡風的意見，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這首先是違背了黨的組織原則的做法，是撇開了黨的做法，是我的反黨行為。1936年7月至9月之間，我的宗派主義、狂妄自大、我個人就是黨的那種最惡劣的態度和作風，發展到極端的地步。我竟至於懷疑周揚同志等，要調開周揚同志和停止黨團活動，都沒有成功，我就從外面對周揚同志等加以打擊，也就是對上海黨組織加以打擊，這就是魯迅先生的《答徐懋庸的信》和我以呂克玉筆名寫的那篇文章。這是我給同志以宗派主義的打擊和違背黨組織原則的反黨行為登峰造極的表現。”（9月4日《在作協黨組擴大會第25次會議上的檢討》）他這個老布爾什維克本可以不必自己誣蔑自己，而讓周恩來、張聞天等當時作此決策的領導人出面作證，自會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但他卻捨此途而取給自己身上潑污水的“下策”，足見他已看穿了黨和領導人，以及黨的任何“組織原則”，而對之不抱任何希望了。他不是一般的說假話，而是整個顛倒了“是”和“非”。這樣做祇是為了苟且偷生。如果誰責備他這樣做法“可羞耻”，還不如說，一個參加過共產黨打腫臉充胖子的所謂“兩萬五千里長征”的高級知識分子的下場實在是“可悲可嘆”。至於“兩個口號”之爭，一方是魯迅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另一方是周揚、夏衍等提出的“國防文學”，這已廣為人知，無需我再來贅述。

正如所有“運動”，都是一場競賽。共產黨的所有運動，上前就是比賽

“誰在昧良心上表現得更無恥”？四大不要臉之首的郭沫若在會上批判道：“20年前在上海分裂文藝戰綫，鬧出兩個文藝口號之爭，完全是馮雪峰在作怪，今天被揭發了，而他却把責任全推到魯迅身上去了。”（《人民日報》9月28日）魯迅之妻（準確說是妾）猛地站起，對馮雪峰怒氣衝衝地說：“馮雪峰，看你把魯迅搞成什麼樣子了？！騙子！你是一個大騙子！”（黎辛《我也說說“不應該發生的故事”》）。對這樣一個當年深受魯迅本人信任，如今年高德劭，令世人敬重的文學家，她竟能潑婦罵街似的用如此污言穢語大張撻伐，實在是令人無法設想！無奈，她這是一貫的，她曾前此也利欲熏心地對遭受文字獄大禍的胡風，也是昧于事實，落井下石：“魯迅愛人民，胡風反黨反人民。劃清界限，胡風絕無絲毫似魯迅。胡風祇不過是魯迅的叛徒。”（《文藝報》1956年2月號）如果她作為愛徒和愛妾，真的就是魯迅的傳人，也就是說，魯迅跟她是一路貨，那麼，我們對人們廣為存在的下述疑問：“先生若在世，當在反右運動中作何表現？”倒可以察知一二了。

在對丁玲的批判中，瑪拉沁夫在出賣靈魂方面，決不在許廣平面前示弱。在所有對丁玲的栽贓陷害中之一，是說她曾提倡過“一本書主義”：“一個人祇要寫出一本書來，就誰也打他不倒，有一本書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事實並非如此，她是這樣對青年作家說的：“作為一個作家，首先是要寫出書來，有作品；一本書也寫不出來，還算什麼作家呢？”前後兩種說法，意思迥然相反。瑪拉沁夫是清楚明白這一點的，但他却要以她的學生的身份，來作“公鷄能下蛋”的“親眼見”的見證人。他在《文藝報》第22期發表《清除靈魂裏的垃圾》，賣師求榮道：“據說，前年批丁玲的‘一本書主義’時，她不服氣，申辯自己沒說過‘一本書主義’這五個字，其實問題不在于是否說過這五個字，而在于丁玲是否有這種思想。記得丁玲在1954年左右，突然到處強調作家最主要的是寫出來作品來，寫出好作品來。初聽起來，或從字面上看來，這句話本來沒有什麼錯誤，但是一次、再次老是聽她講這句話時，就使人感覺到這句話還摻雜着旁的一些情緒。（我也是老師出身，要是碰上你這號惡意地從雞蛋裏挑骨頭的學生，老師還怎樣開口？還怎樣打發日子？——紫丹）……她給我們講過這樣一個故事：在她發表作品以前，請也頻參加什麼聚會時，請柬上總是寫‘也頻先生及其夫人’，她說，一看見這幾個字就生氣，她說不當別人的附屬物，因而拒絕出席。後來當她發表了作品，轟動了文壇，出了名時，那些過去瞧不起她的人，都開始向她巴

結了，新聞記者們也蜂擁而來，要求拜見，可她以拒絕會見來給以報復。有一天，忽聽有人扣她家門，她開門一看，原來又是那些記者，于是她祇說一句‘我對你們說過，我不接見你們’，便‘啪’的把門一關，把他們頂了回去。在舊社會，拒絕那些庸俗無聊的新聞記者的訪問，並不是什麼值得指責的事。在這裏我引了她這段話，是說在30年後的今天，丁玲對前去拜訪她的青年作者們，津津有味地大談這些話，不能說是‘不過隨便談談而已’。這話裏顯然包含着這樣意思：當你一旦寫出好作品來，身價即刻提高百倍，腰板也就硬了。將這話再與最近報刊上揭發的丁玲所說的‘一個人祇要寫出一本書來，就誰也打不倒你’以及她對許廣平先生所說：‘你現在不管做多少工作，都算得什麼呢？寫東西才是自己的。’等等言論聯繫起來，就不是一般的‘家常話’了。”

從這裏可以體察到極權社會的師生關係是多麼令人毛骨悚然！同時也透露出，許廣平也沒放過在丁玲身上爭取立功的大好機會。人呀人！“壞”的甜頭，勾引人在“施壞”中互相撕殺、你死我活。這對男女，一個在施壞中爬到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另一個更高：全國人大常委、全國婦聯副主席、全國文聯副主席都當上了。經我加上這一結尾，文章才算言之有物，放矢有的：《清除靈魂裏的垃圾》。

但是，你壞他壞，千壞萬壞，任誰也比不過總的壞根毛澤東更壞。他以一貫的潑皮無賴、蠻橫惡霸、鐵石心腸、窮凶極惡的刀筆，宣判了馮雪峰的死刑。馮雪峰任《文藝報》主編時，據說“壓制”了“小人物”李希凡、藍翎批判“權威作家”俞平伯對《紅樓夢》研究的文章，毛澤東借題發揮，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其他有關人員寫了一封信，說：“這是30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30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綫，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毛澤東選集》五卷，頁134）袁水拍聞風而動，1954年10月28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質問〈文藝報〉編者》：“《文藝報》在這裏跟資產階級唯心論和資產階級名人有密切聯系，跟馬克思主義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新生力量却疏遠得很，這難道不是顯然的嗎？”（據《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一書說，這句話是毛澤東在

審稿時加上去的；以下毛批馮的話，也是引自本書。363頁）

馮雪峰挨了批評，就在1954年11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從毛澤東對這篇檢討作的一些批語可以看出他對馮的意見有多麼大了。例如，馮在檢討中說：“我犯了這個錯誤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長期地統治着的事實，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沒有認識這個事實和它的嚴重性。”這裏“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顯然是從毛澤東的原信中引來的。毛批道：“限于古典文學嗎？應說從來就很注意很有認識，嗅覺很靈。”毛的原信中有這樣一句：“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綫，甘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馮即據以檢討說：“我對於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失去了敏銳的感覺，把自己麻痹起來，事實上做了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的俘虜。”毛批道：“一點沒有失去，敏感得很。”馮檢討說：“我感染有資產階級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風，缺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鬥精神。”毛批：“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資產階級泥潭裏了。不是‘缺乏’的問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馮的檢討裏說他自己“不自覺地在心底裏存在着輕視新生力量的意識”，毛批：“應說自覺的。不是潛在的，而是用各種方法向馬克思主義作堅決鬥爭。”

經殺人毛王這樣不講情理地一“批”，馮在政治上還有活路嗎？毛真是個狠心賊，鐵石心腸。說起“鐵石心腸”，平常人就根本想象不出毛鐵石心腸得一點也不近人情。當毛岸英在朝鮮被美機炸死的時候，他對兒媳封鎖消息二年半。這期間，兒媳逢上周末或節假日，往往要到他這裏來。他和她幽默風趣地談着“岸英，岸英”的，甚至拿“岸英”開玩笑、鬥樂子，好像岸英還活在人間。為父的一絲也流露不出愛子已死的氣息，為妻的一毫也覺察不出丈夫已命歸黃泉，兩人談笑風生，摟抱撫摸，其樂也融融。尤有甚者，他們的作派曾為江青撞見，後者便像倒了醋瓶似的罵出最難聽的話，並採取防範措施，通過侍衛長，吊銷了兒媳的中南海特別出入證，使公爹與兒媳的過從，中斷一時。像毛澤東這種人，對自己的妻兒都能這樣禽獸般地無耻，鐵石般地冷酷，那就別怪他對親密戰友劉少奇、林彪那般絕情了；更別提對一般老戰友、老幹部了；當然馮雪峰這樣的“革命”知識分子就更不在話下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特別是資產階級右派，自然是都有“可殺之罪”，祇是“殺了不利”才讓他們作為賤民，得以苟延殘喘，苟且偷生，或者生不如死，或者饑餓、勞累、折磨而死。當然，如“殺了有利”，則格殺勿論。

## 二，右派言論的歷史定位

關於右派言論已經寫了這麼多，但仍祇是如前所說“掛一漏萬”。在世界共運史上，從來也沒有人像右派們那樣，翻箱倒櫃，把毛澤東、共產黨的醜惡和罪惡作如此廣泛、系統、深刻的揭露。當然不是說，從此以後共產黨的謊言再無市場了，相反，有些中共用以騙人的謊言，至今仍有許多人聚集于其旗下，就像蒼蠅聚集在中國農村露天廁所起哄那樣，嗡嗡嗡！嗡嗡嗡！嗡嗡不停。

以“殺氣騰騰”而聞名的右派，1938年加入中共的老布爾什維克葛佩琦先生，早已說得斬釘截鐵，一清二楚：“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中國，包括反革命在內，不是共產黨的中國。黨員有主人翁的態度是好的，但是，你們認為‘朕即國家’是不容許的。你們不應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別人……搞的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不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因為，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以上言論登在5月31日的《人民日報》上，6月5日第二次報道他“繼續發表反共言論”：

“群眾對共產黨的話不敢信任，共產黨對這一點應特別重視。因為，‘民無信不立’。我還要重復一遍，群眾是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腐化下去，那必走這條道路，總有那麼一天。”後面這段話不是和陳雲等發出“亡黨亡國”的警告一樣嗎？祇是右派之言在先就是了。我所以列出如上的右派言論，就是要證明，現在很多人的“英明見解”，右派早已有言在先，右派曾進言克服弊端的辦法，從健全法制到取消黨天下，每個字都是右派的一滴血。今天的人們祇有接力下去，從1957“大鳴大放”，到1959“廬山風雨”、到1960年代“燕山夜話”、到1976“四五運動”、到1979“民主牆”、到1986“自由化”、到1989“六四”、到20世紀末以來海外民運、國內維權、法輪功修煉者維護真善忍、直到現在追求共和的“黃花崗精神”光照大陸。試看目前形勢：風吹樹、風滿樓、前僕後繼，風起雲湧；指日可待：揭竿而起、立竿見影、鏗而不捨，一杆到底！我們將以完成共和大業告慰孫中山、儲安平、王炳章之夙願；同時也庶幾乎不負林昭、劉奇弟、馮元春之青春血、少年頭。

### （一）誰敢太歲頭上動土？唯我資產階級右派

可以當之無愧地稱爲向共產黨、毛澤東猖狂進攻的右派言論的，其炮火之密集、其太歲頭上動土之猛烈，其維護憲法、法律之旗幟鮮明，在整個大鳴大放中，首推爲胡風翻案；反對個人崇拜、反對黨天下等等，雖也具有這種性質，但畢竟不够“猖狂”。

大致情況是，知識分子作爲人民的代言人，在政治、經濟、法律、外交、學術思想、科學、技術、教育、人口、社會、新聞、出版、文學、藝術等等方面，不僅大大擊中時弊，而且在正確診斷的基礎上提供了許多療救的治國良言。

“難道‘殺共產黨人’一類的話也是良言嗎？”正如當時另一個右派所作的辯解：“葛佩琦說‘殺共產黨人’，他並沒有真殺，也不是說今天就殺，而是說如果繼續腐敗下去，總有一天會發展到這一步。”我們今天來看，多少省部級（還有更高職位的國家領導人），司局級，縣處級……越往下自然是數量越大的貪腐幹部被殺！難道這些被殺的幹部不是“共產黨人”而是“國民黨人”嗎？當年葛佩琦祇是發一通憤激之言，可萬萬估計不到真的會殺這麼多的共產黨人！更估計不到：“民以爲少也。”群眾說：“全部槍斃，可能有冤枉的，隔一個槍斃一個，就會有漏網的。”這班兒替死鬼向毛澤東訴苦道：“你老人家當年要是聽了右派的話，怎麼能發展到如今無官不貪，形成制度性，結構性腐敗呢？你看殺的這些共產黨人官位多高，數量多大呀！幸虧你的傳人，江核心采取‘該保就保’的政策，否則……”說他們是替死鬼，決不是想像出的比喻，而真的是替死鬼。他們既是被“黨天下”害死的，又是作爲“黨天下”的替罪羊而死的。有一天，黨天下因多行不義，惡貫滿盈，終將會由歷史法庭審判，驗明正身，給它的頭上打個“X”號而立即執行的。右派的每篇言論都是遞上去的狀紙，其中對罪魁禍首毛澤東本人的指控，也爲毛生前歷次運動所僅見——誰敢太歲頭上動土？唯我資產階級右派。

儲安平反對“黨天下”的意見，在題目上就點着“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名字，是直接提給“老和尚”的。

曾彥修先生在鳴放會上直接斥責：“出版工作去搞些沒有味道的事，也是不行的，如爲了規定《毛選》在全國同一天發行的組織工作花了不少力氣，實在是無聊。”

王尊一先生鳴放的題目是《“三害”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裏挖》，有理有據地提出質問：“那麼我們根除‘三害’是不是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裏挖掘一下呢？”而且在6月12日的《陝西日報》上更載有他的大聲疾呼：

我要向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呼吁：1、開放政權，建立一個真正的人民民主國家；2、真正給人民以思想言論的自由，解放人類個性；3、把民主的尺度放寬些，給人民以真實的民主生活；4、我要求毛主席，我要求你走下你的寶座，深入農村，看看農民的生活情況。

在獄中，林昭給《人民日報》的信中寫道：“長期以來，當然是爲了更有利于維護你們的極權統治與愚民政策，也是出于嚴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雙重影響下的深刻奴性，你們把毛澤東當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盡一切努力在黨內外將他加以神化，運用了一切美好辭藻的總匯和正確概念的集合，把他裝扮成獨一無二的偶像，扶植人們對他的個人迷信。”

肯定是：對着毛“有人說，這是陰謀。”否則，毛何需詭辯：“我們說，這是陽謀。”呢？九三學社副秘書長李毅說，北京也還有許多人顧慮重重。歸根結底，都是怕打擊報復。他們說：鳴，放三部曲，一放，二收，三整。“誘敵深入，聚而殲之。”他希望，領導上應從政治上，組織上作出進一步的保障，希望毛主席撐腰，公開講講不準打擊報復。（《人民日報》5月21日）他當然不知道毛澤東已決定要打擊報復，但這在客觀上是將了毛的軍，戳穿了他的陰謀花招，主觀上也提醒人們要防患于未然。上面提到的王毅齋在會上的發言，曾說過：“毛主席的威信是否太高了？”

林希翎說：“在胡風反革命集團第三批材料中，張中曉對毛主席的延安座談會的報告做了批判，是否惹主席大怒了，冒犯了。”人民大學歷史系講師許微帆批判林希翎道：“她又一口咬定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成員之所以被逮捕，是因爲他們竟敢于批判《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句話就是把我們敬愛的領袖，勾畫爲胸襟狹窄，意氣用事，無法無天的‘小人’。這還不够狠毒嗎？對毛主席進行這種人身攻擊，我們是絕不能容忍的。”（《教學研究》1957年第7期）問題是，這些所謂“人身攻擊”，是否恰好符合事實呢？

林希翎在北大演說中還說：“他（胡風）反對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主席的話又不是金科玉律，爲什麼不能反對呢？”“現在看來，胡風假如偵察中沒有其它新的材料，祇是提意見，這是好的呀。所以我同意趕快解決，這方面我向主席進一言（主席這裏是有錯的，但也沒關

系。)” “我們沒有法制，法院量刑是審判員說了算。如肅反問題，是否擴大化，我感到是擴大化了，主席說沒有，我不同意。”

對毛一手制造的胡風冤案，張百生說：“胡風及胡風集團是反革命分子嗎？根據前些時候公諸于世的材料看來，說他們是反革命分子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偶語者棄世’的做法，仁人志士誰還敢開口！這樣祇能堵塞言路，助長‘三大主義’，葬送革命。胡風問題已過了兩年，為什麼還不公開審判？我們要求黨中央如果打對了就立即公開審判，如果打錯了就馬上開釋，並恢復其名譽。”

對胡風定案提出批評，還有當時是四川大學學生的馮元春，她直斥毛澤東“是偽馬列主義者”、是劉邦一類的獨裁暴君。

戴煌之所以劃右派，是由于反對對毛澤東的神化以及反對毛澤東要犧牲一半中國人進行世界革命的荒謬而反動的政治野心；前面已有詳細的論述。

陳銘樞對鄧小平左手捂、右手蓋的毛的品質，進行了揭批：“凡是舊創造者，執國政治者，是公平正直，絕無偏見，明察秋毫，謹慎將事，精誠坦白，亦不裝假，豁達大度，為國家而不為名利。並有功成身退者，如美國華盛頓然。偉大的毛主席不是如華盛頓然，而是與德國的俾斯麥，日本的伊藤博文相似。政治修養上熱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難寧，察而不周，自然為黨見與感情所沸動，喜功好大，難以制止……好好的一個優良的國家，純樸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鬥爭，三反五反，弄到中國八年來混亂不清，天天忙于鎮反肅反，已不成為國家政治。”“光榮的、偉大的毛主席，還沒有搞清楚歷史文化和本國的地位、民性的風格，硬去尊夷，鬧了一些什麼總路綫的新名詞，無產階級專政的什麼經驗……這些多餘的新名詞，在愚民的蘇聯用得着，在文化高度的中國不會有人重視。”

屈武曾以《駁斥陳銘樞給毛主席的信》為題發言道：“右派分子政治野心家陳銘樞，在今年5月28日寫了一封信給毛主席。陳銘樞的這封信雖然不過三千來字，却構成了一個十分完備的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政治綱領和行動綱領。他攻擊毛主席‘好大喜功’，在個人修養上‘熱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難寧，察而難周’，‘輕信幹部的虛偽匯報與教條主義的分析方法，未經鄭重細致的研究，即作過激的決定。’在察人聽言，決策定計方面缺乏‘睿斷’，在政策措施上是‘畸輕畸重，失緩失急’。陳銘樞說：‘我深感于黨的領導諸同志，一般都缺乏個人師友的關係……對人的精神生



活，總不免于失之單調……’陳銘樞在信裏向毛主席說：您所常接觸的黨外人士‘仍多趨附之輩，耿耿不苟者實屬寥寥’至于能犯顏敢諫者，我尚未見其人。’他說：‘建國後，黨化敵為友，對來自舊社會中某些人士的使用多從效用出發，少能兼及其品格與能力的遴選，不次拔擢，累累若若，闖茸滿目，修潔潛光，至于貪天功者有之，不虞之譽者有之，爭名獵位，祿蠹充斥。我感到你有時尚不免為喜怒所乘。在一個浪潮下，輕易挫傷高級幹部的自尊心和他們固有的地位，同樣有時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際，俟隙混淆黑白，投其所好。俾斯麥曾對威廉第一說過：‘對相隨日久的人，因念其汗馬勛勞，縱有不肯，不忍也不能去之，繼起所說，新硯初試，必能割此癰疽’。”李濟深說：‘陳銘樞是張牙舞爪，喪心病狂的右派野心家。他幾乎逢人就咬，醜詆擁護共產黨的民主人士，醜詆黨員，團員，甚至詆毀毛主席這樣不好那樣不好……’（《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整風辦公室，《揭露批判右派分子陳銘樞反動言行大會發言匯輯》，1957,12）

吳茂蓀揭發陳銘樞用“好大喜功，喜怒無常，偏聽偏言，鄙夷舊的”四句話批評毛。“陳銘樞污蔑毛主席‘好大喜功’，並要毛主席‘更加深入體察，以求究竟’。他認為毛主席‘過分鄙夷舊的’，‘對古典文學尚有不尊重之處’。”（《人民日報》7, 15）與陳銘樞相比，章伯鈞、羅隆的評價，就更一針見血了。“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流氓。”“毛主席這個人很厲害狡猾，比歷代統治人物都凶。”

章乃器曾說過：“不要神化任何個人。大家都是人，沒有哪個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內。”在鬥爭他的大會上，他還非常含蓄地指責毛澤東言而無信、自食其言。你可以查一查當年的《人民日報》，他反駁別人的批判時，往往引用“有人說”。雖然大家全都心知肚明，但還是有自作聰明的左派出來戳穿這層窗戶紙：“我知道，你說的‘有人’是指‘毛主席’！”毛說話不算話的不要臉的嘴臉上蒙的一層紙，經傻孩子左派一揭，不但挑明他娘明鋪夜蓋，偷養漢子的事，而且還是平添了些許黑色的幽默，白色的尷尬。

清華大學一個署名“一個清華人”的，題為《我控拆，我抗議》的大字報，其中寫道：“皇上喲！秦始皇與你相比，也祇能是個無名小卒了，無怪乎你說：‘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你在鎮壓人民的這方面，是勝過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多少倍了……老祖宗啊！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像你這樣，從1949年以後殺了70多萬人民！（還不算一些自殺的呢）殺吧！把中國人殺絕

吧！胡風哪一條子構成反革命分子的罪狀呢？還不是由你將‘莫須有’的罪名加在善良人們的身上！……他要殺你時，還不用自己動手，還可以動員你的妻子，你的骨肉孩子翻臉不認你，親手殺你死！這是理性的社會乎？這就是毛澤東式的階級鬥爭啊！這就是我們時代的精神面貌啊！獨裁者，你們已經是殘暴成性了。在延安 12 點鐘一聲炮響，你殺了多少所謂可疑分子呢？這就是你們的所謂‘純潔內部’，‘三查’和‘整風’啊！所謂什麼聖地延安，王實味不過在《野百合花》中說了一聲大竈、中竈、小竈而挨整了。下落呢？不知道。抗大的學生他們在前綫拚命，而你們在延安呢？花天酒地。甚麼窑洞生活，什麼棗園清苦，抗大學生看到這些令人不能容忍的事實後，在一個晚上打死了 20 多條豬吃掉了。而你們利用了‘純潔內部’，活埋了多少人，這不是事實嗎？你們自己也發現這樣做會有根本的動蕩時，你們的沒有人性的理論出來了：委屈是應該的，爲了黨的利益委屈以至犧牲是光榮的……有多少人死在自己人手裏，他們遭活埋了，他們遭自己所依靠的和所相信的人活埋了。這就是‘同志’的涵義呀！”（《陽謀》第 185—186 頁）

針對毛澤東說的：“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祇是一種手段。”（《毛澤東選集》五卷，頁 368）北大學生王國鄉在《有頭腦的人，不要那樣想》中說：“我認爲民主不僅是一種手段，而且也是目的，它是共產主義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如果祇是方法，那末建成社會主義後，就不再要民主了。——這多荒謬！”……

矛頭直指毛澤東的批評，遠遠不止這些。就憑這些，他的罪惡就不在斯大林之下，如果能得到清算，中國人民可以避免的、能够量化的浩劫，則是至少少死半億人以上。

### （二）右派言論是呼喊人權的最強音

現在已經是什麼時代了？21 世紀了。可是中國仍在實行着最落後、最腐敗、人權紀錄非常糟的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要想改變這個制度，改良主義的辦法是從變革共產黨的性質着手，讓黨內民主派占上風；要變革共產黨，就要對共產黨有個透徹的了解；要了解共產黨，絕對首要的是先認透毛澤東。毛澤東是什麼？毛澤東是個極權政治的符號，其形式就是“暴民運動”（他說是群眾路綫）。“暴民運動”就是毛澤東本質的展開式。你祇要認透各個運動的性質，就認透了毛澤東。所以，認識“運動”和認

識毛澤東是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是一個彼此推動、相互深化的過程。例如，通過毛大殺 AB 團，認識到他“以殺人為兒戲”的陰險毒辣、凶殘的本性；在許良英（另大有人在）未認識到毛此一本性之前，對毛發動反右，“使人感到昨天還是笑嘻嘻的，今天突然變了臉，不道德，連起碼的民主也沒有，太粗暴了。”（《人民日報》7.29）

反右運動，所以會在中國歷史上具有深遠的影響，是因為它涉及的內容兼具了延安整風的深邃性和文化大革命的廣泛性。延安整風雖具思想鬥爭的深刻性，但是是在小範圍內進行的，遠未波及到全社會上；文化大革命雖席卷整個社會，但正如群眾所說，是廁所裏的蒼蠅亂哄哄。如此說來，祇有“反右”在共產黨發動的所有運動中，才是最兼具闡揚民主自由思想的深刻性和面面俱到的廣泛性。這次運動是民主自由在毛澤東時代的最後一戰，也是共產極權的政治本質一次頗具深度的充分展示。內中人物，涉及“老和尚”和“小和尚”；問題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科學、藝術、文化、教育、體育運動、衛生、國家、民族、社會、人口……從宏觀到微觀巨細不漏；地域波及東西南北中，直至老（老解放區）、少（少數民族區）、邊（邊界區）、山（山區）、窮（窮鄉僻壤）；部門橫跨黨政工農兵學商，各行各業；而且右派們所提問題，其尖銳性、其科學性、其超前性，至今看來，在大陸上，仍是無有出乎其右者——政見是當時的政治家和政治學家鳴放出來的；如何辦教育呢？則是教育家和教育學家發表的高見；法學家談法治，經濟學家談經濟，文學家和藝術家談文藝，社會學家談社會；新聞出版界、醫藥衛生界、學術界都是名報人、名醫藥專家、名流學者們懇切陳詞。

在中國，儲安平、羅隆基最先指出“黨主”、“黨天下”；章伯鈞第一個看出毛是歷史上最大的流氓：徐璋本頭一個如此深刻地批判馬列主義；林昭第一個把共產黨政權定性為“極權”，“奴隸社會”，林希翎定性社會主義為封建主義；劉士弟、馮元春等右派發出為胡風翻案的最強音；譚天榮、劉地生首先提出“人權”；蕭子超先生提出按廣東的條件，給特殊政策就可加快發展的思路是開“經濟特區的先河”；以及吳景超先生那時就提出“發展全球通商和合理互利的條件下適當引進外資外技。”是何等地超我們的總設計師之前啊！錢偉長首倡教育的主體性；劉賓雁、秦兆陽、流沙河、王蒙等首破公式化、概念化的堅冰，從文藝理論和創作實踐上反映陰暗面、干預生活；右派份子楊兆龍提出要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的建言，是振

興中華民族的必由之路，是關係中國之命運的最佳選擇。它反映了中國法學家的學術良知，代表了當代中國法學界的最高水平（陸錦碧《讀〈滬上法治夢〉隨想》）……這當然不是說右派的高度是不可超越的，但是必須說，研究反右派這一課是不可逾越的。逾越了，對於研究中國問題，對於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包括民主憲政事業），便相似于小學生跳過加減法學乘法。現在中國當局正在重金聘用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楊振寧就是在教沒有學過加減法的小學生學乘法呢！

從時間上，包括從“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到處理“小匈牙利事件”的數聲槍響，歷次運動的是是非非，而且，不僅針砭時弊，找到病源，同時還提出療救的設想。因而可以說，研究這個運動，就為了解中共，了解毛澤東，了解其他運動找到了一把鑰匙。例如，對於所謂“史無前例”，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你如果是不了解反右運動，那麼，你就祇能看個“熱鬧”，你就不能看出“史無前例”不自當日始：反右派運動對 100 多萬知識分子下毒手，其數量、其殘酷、其反人類文明，不也是在世界史上“史無前例”嗎？同時你也看不出其中的“穴道”；更無從對共產黨的種種罪惡都一言以蔽之：全做到了“史無前例”，而達到這樣一種全面性的認識，以及其所以如此的本質性的認識。右派言論（不限于我的列舉）反映出對中共，對毛的認識與揭露的全面性、深刻性，不僅為中共歷次運動所無法企及，而且也為世界共運史中所絕無僅有。

從毛澤東主觀來說，自稱“陽謀”；就事態發展的客觀進程來說，則是將計就計，一代精英（包括大學生，也都屬才華橫溢的高材生），得以乘機傾巢而出。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們的見解代表了當時的最高水準。無怪乎深入人心、香火不斷。法學家郭道暉先生說：“在我主編那本《中國當代法學爭鳴實錄》時，讀到當年的受難者與知情人一篇篇用血和淚寫出的文字，不能不為之唏噓嘆息！一位資深的憲法學家吳家麟教授在寄來思憶文稿時，還附上 1957 年 6 月《人民日報》發表他的所謂‘右派’言論全文的復印件。我從頭至尾讀了一遍，若不是上面印有該報當年出版日期，完全可以誤認為是 40 年後的今天寫的。字字瓊珠，可圈可點，在現今已是法律常識，但早說了 40 年却是反動言論！歷史的‘誤會’竟致如此！難怪有的年輕人讀了當年由法律出版社作為反面教材出版的《法學界右派言論集》，覺得要是當年共產黨認真聽取了這些‘右派’言論，我們早已建成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了。”

（《“陽謀”背後的權謀——以親身經歷剖析整風反右運動》）

後生晚輩們諸如《北京之春》主編胡平先生說：“我發現，和文革中出現的各種所謂異端思潮相比，57年的右派言論所含有的自由民主理念要豐富得多，清晰得多，也純正得多（這並不是說文革一代人的素質比右派低下。這祇是因為文革一代的成長環境更惡劣）。我從57年右派言論中所獲得的啓示，要遠遠超過從文革中異端思潮所獲得的。”（胡平：《反右運動與言論自由》，反右50周年學術討論會《反右研究文集》，頁107）

八九民運學生領袖王丹說：“可以說，不了解‘反右運動’，就不能深入了解中共的政治本質和中國的當代史……今天的民主運動，從‘四五’到‘思想啓蒙’，從‘八六學運’到‘八九民運’，所提出的政治主張，其實都沒有超出‘五七一代’人的思想框架太多。”（王丹：《重新認識“五七一代”人》，BBC中文網）

著名記者高瑜說：“毛澤東的反右運動企圖將20世紀上半葉中西文化培養出來的精英人物一網打盡，主要要消滅知識分子批判社會的功能。而89一代，作為57一代的兒子，又經歷了六四一場大屠殺，專制暴君打算‘殺他20萬，換得20年的穩定’。現在20年就要到來，中國知識分子追求憲政民主的精神仍然在不斷成長，而且信心百倍。”（高瑜：《從反右到六四——89是57的兒子》）

吳國光教授研究反右問題的結論是：“可以說，從宏觀的歷史眼光來看，‘反右’運動不僅決定了中國知識分子在毛時代的命運，而且決定了毛時代的中國的基本政治走向。在這個意義上，‘反右’運動是理解毛時代中國政治的樞紐事件。”（《中共“八大”與“反右”運動》，《當代中國研究》2007年第3期）

所以，研究“反右”問題，就成為研究中國的當代史和展望中國未來所必修的一課了。

天安門母親丁子霖教授把歷史和現實聯繫了起來，從她這裏我們就可以領略到，追憶和研究反右派運動所具有的現實意義。她就着她的右派同學林昭說：林昭的“冤”不僅僅屬於她個人，而屬於一切不甘為奴的人們；她所控訴的是殘酷地絞殺人性的現代奴隸制。林昭是我的同代人，又是我的同鄉人。在上世紀40年代末那個改朝換代的日子裏，我們先後從同一所學校裏走出。我們都曾歡呼過新政權的建立，我們都曾對未來充滿着很多很多幻想。

在以後的年月裏，殘酷的現實粉碎了林昭的幻想，她從短暫的狂熱中覺醒了。而我，却繼續渾渾噩噩地做着用美麗謊言編織起來的“天國夢”，而且一夢就是 30 年。

林昭是她那個時代的先知先覺者，也是共產中國最早的殉道者。林昭的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屬於異端。他們殺害了林昭的肉體，還要封殺她的思想。

迫害林昭，以至整個的反右運動，共產黨所用手法、步驟、過程、邏輯及其思想內容，在在顯示出他已把看家的本領，吃奶的氣力，理虧耍賴的撒潑，蠻橫耍霸的狠毒，糟踏天理、國法、人情，破壞遊戲規則……無所不用其極。在這裏，展示出毛澤東是一切歷史糟粕之集大成者。從此，有人是懾于無情鬥爭、殘酷打擊，有人奉逢拍馬、邀功請賞，都學會了昧着良心說假話。如果說反右之前，毛指鹿為馬還有很多人不以為然，甚至有人拍案而起敢于大聲疾呼：“不是！”而在反右之後，毛指王八蛋為馬也無人敢說半個“不”字，甚至動物學家會用自己的專業知識來論證：馬有無角之馬，也有有角之馬，其角之長堪與鹿比者，往往令人誤以為鹿也。他可以用他的專業知識作證：此非鹿也，實乃馬也。這就是接踵而來的大躍進運動，為什麼會鬧出違反常識的畝產萬斤、土法煉鋼的大笑話？你有什麼辦法？人家世界級大科學家錢學森以科學的數據確證可以畝產幾萬斤嘛！大躍進中，大幹促大變，日夜連軸轉，寧掉十斤肉，也不落人後。誰要喊累叫苦就要掃他的暮氣。所謂“掃暮氣”，就是“辯論”他，就是“拔白旗”。如果你還不懂，你就拋開詞句去看現場，你會看到毛主席“群眾路綫”的生動畫面：一個人站在中間，周圍的人對他推搡，擤鼻涕、吐唾沫，拳打腳踢，然後讓他頭頂一塊重石，跪在那裏認罪反省。這時我正在勞教，一個勞教人員告訴我，他縣的縣長體恤民力，被公安局長批為“白旗”，縣長被拳打腳踢而致傷殘。可氣憤的是，報紙上醫學家為大躍進寫的鼓氣文章，說人身上都有備用器官，比如說腎，人有兩個，但一個就夠了，即便用壞一個，人照活不誤。所以說人體蘊藏有巨量的“大躍進潛力”！

剛才，我說過，“無人敢說半個不字”。彭德懷不是說“不”了嗎？可彭是在“基本肯定”的大前提下說“不”的，所以就不夠半個“不”字。就這，都不見容于毛，可見毛霸氣到何種程度！問題是，所有人，甚至柯慶施之流也知道彭是正確的，更別說劉少奇，周恩來……了，為什麼竟能作出決議定彭黃張周為反黨集團呢？這祇能說明共產黨是一個昧良心集團。昧良心使得

在中國假戰勝真，錯戰勝對，野蠻戰勝文明，瘋狂戰勝良知……而且暢行無阻，無往而不順利。至于在文革中，彭的遭遇，老幹部的遭遇，地富反壞右、一切牛鬼蛇神的遭遇，都是慘不忍睹，有的場景不亞于“南京大屠殺”。在打砸搶抓抄下過日子，真的連亡國奴都不如。人怎麼能變成如此殘無人道？這就要聯系到毛發動的歷次運動，哪一次是人道的呢？特別是反右運動，《反擊右派不能溫情主義》，你作社論我轉載，全國反對溫情主義，黨內、黨外一視同仁。大詩人郭沫若在《人民日報》發表詩《反溫情》：“右派猖狂蠢動時，溫情哪許一絲絲！已將率土成公物，竟有么魔倒大旗。毒草必須成糞壤，爭鳴方好咏新詩。勿忘二十年前事，起舞中宵共振衣。”把右派比作二十年前人侵中國的日本鬼子，當然都是死有餘辜。呼吁肅清溫情主義，在全國惡浪翻滾。

9月16日《人民日報》載，史良在民盟全國整風工作會議上作報告，說：“現在基層還有不少右派分子沒有被揪出來。有些人說，別的地方有右派，我們單位中間不會有右派，用不着進行鬥爭。這種想法是十分有害的，也有一些人害怕打擊右派的面太廣，時間拖得太久，主張草率收兵。”她大聲疾呼：“必須認識，對右派分子姑惜寬容，對鬥爭採取旁觀或保留態度，就是右傾思想的表現。我們必須克服右傾思想，克服一切溫情主義，積極勇敢地投到戰鬥中去。”由于組成爲反右運動一部分的反溫情主義，掃除了人們的溫情，郭沫若的兩個兒子在文革中遭慘害而慘死；人們，不管對誰下毒手都變得毫無心理障礙。郭沫若本人，一天到晚嚇得屁滾尿流，大概這個時候，他才能體會到，如果一個社會，“溫情哪許一絲絲！”該是多麼恐怖！祇要對反右派的問題弄通，觸類旁通，一通百通，鄧小平的反自由化、鎮壓“六四”，江澤民、胡錦濤的鎮壓異議人士，迫害法輪功，從目的的卑鄙性到手段的卑鄙性便成爲一目了然的了。

北大教授錢理群著文《不容抹殺的思想遺產》，稱：

如果說“五四”新文化勝利了，從而開啓了中國思想文化，以至整個民族現代化的歷史新紀元；那麼，1957年的這一次悲壯的努力，却是以所有參加者的“一網打盡”而宣告失敗（這是爲什麼？想，大家想！我們不難看出其中主要差別是，一個發生在孫中山創建的中華民國時期，一個發生在毛澤東締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或者說，一個在解放前，一個在解放後。這裏就凸現出“解放”的反動性與殘忍性。無怪香港人民拒絕解放，一定要“祖

國”跟他定條約，保證資本主義制度 50 年不變，即，保證 50 年不“解放”，他才回歸祖國；也難怪臺灣人民寧肯選擇他決非情願的“臺獨”陳水扁當總統了。但是，我要說給臺灣同胞：“獨”善其身的道路是走不通的，絕對唯一正確的道路是：兩岸携起手來，推翻共產主義專制制度，重建三民主義民主制度，先民主，後統一。古人說過：“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紫丹），但他們的思想與精神却事實上在 80 年代以來的思想解放運動與改革運動中得到延伸，儘管後者未必自覺意識與承認這一點。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當年提的問題與任務（主要是反“黨天下”——紫丹），仍然是今天的改革者需要繼續解決與完成的，他們當年的思考今天依然保持着新鮮的生命活力，他們思考的成果，以及思考過程中可能有的不足與失誤，對於後來者，都是極其寶貴的啓示，遺忘、不承認、漠視、拒絕這份浸透着鮮血的思想遺產，不僅愚蠢，而且有罪——其實，那些《廣場》的犧牲者在光榮地倒下的一刻就曾預言過“明天將屬於我們”的（譚天榮：《給沈澤宜》），他們毫不懷疑：“‘五一九’和‘五四’一樣，將明顯地留在我們弟弟子孫腦海裏，永遠鼓舞着後來的年輕人。”（譚天榮《救救心靈》——現在更應該“救救心靈”了——紫丹）他們直接呼喚：“歷史學家們，重視這樣偉大深刻的社會思想變革吧！”（姚仁杰《黨啊！我們批評你，是真正的愛你！信任你！》）坦白地說，讀着這些帶血的期待的呼叫，我的心情沉重羞愧難言。因為我們真的長時間地（甚至直到今天）把這些先驅者，犧牲者遺忘了！我們的歷史學家（也包括我自己）失職、失責了！1957 年這段歷史的書寫，如此地蒼白、稀薄，如此地充滿迷誤，致使“後來的年輕人”（這正是先驅者所寄予希望的）無從了解也無法理解，這是我們每一個有良知的過來人、學者的恥辱啊！欠帳總是要償還的，為正在進行的“中國人與社會的改造”提供思想資源。——現在“是時候了！”（牛漢、鄧九平主編：《思憶論叢——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

的確，現在“是時候了！”我即刻想到的，是 1957 年青年右派、學生領袖人物譚天榮提出的：“救救心靈！”共產黨、毛澤東倒行逆施，勞民傷財，惡性破壞生存環境，大量浪費物質資源，土躍進、洋躍進再加上毛為爭當世界霸主而支援亞非拉拋金如土，讓國人勒緊褲腰以至餓死，對於這種罄竹難書的罪惡，我們假定（祇能假定）能“饒！”對於共產黨毛澤東通過土改、剿匪反霸、抗美援朝、鎮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胡風、肅反，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反右、反右傾、狂舉三面紅旗、



四清、文化大革命等運動受迫害的數以億計，害死的數以千萬計。我們仍假定（假定就不是真的）能“饒！”但對於共產黨、毛澤東把人心糟蹋得卑鄙無恥，虛偽狡詐，冷酷殘忍，同類相食，另一方面，祇要能苟全性命，就可以昧着良心出賣父母親友；士可殺又可辱，人人拼比着自辱；有奶就是娘，見奶不認娘，爲了奶抓住鼻子不顧腮；毛指着“鹿”，全國齊聲喊叫：“馬！”鄧理論又導致世風日下，笑貧不笑娼，官是貪官、吏是污吏、商是奸商、民是刁民；總之是要全國人人無恥、人人昧良心、人人變小人，才能讓共產黨的“千秋大業”、穩定壓倒一切！而讓我民族以最惡劣的民族出現于世界之上，這才是應當千刀萬剮、罪不容誅的！而這話是在“殺人都可饒恕”的假定下，發出的傷心帶血的無奈。

“是時候了！”我們要從說出現實各個方面和歷次運動的罪惡真相做起，還原歷史；從“救救心靈”做起，喚起民衆。這就是消滅共產主義災難的實際步驟。我是林昭、譚天榮、沈宜澤的同齡人、同命人，被共產黨投進勞動教養和農村監督勞動共22年，在我一息尚存，定要決絕地實行錢理群教授倡導的——“我們應該有勇氣正視歷史的血腥氣，有膽識衝破權勢與習慣制造的種種障礙，以科學的實事求是的精神，重新收集原始材料，認真整理、研究先驅者的思想遺產，總結歷史經驗，建立起‘1957年學’，作爲現在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知識分子心靈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爲此工程添磚加瓦，直到最後一口氣，便是我死能瞑目的此生所求：上對得起林昭、馮元春、儲安平們，中對得起我們這一代活人，下對得起後人。否則，我將死不瞑目。我活了這把年紀，深知“天下無易事”。更知“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憑費工夫”。所以我自然會知道，建立“1957年學”決不會一蹴而就，祇有寄希望于“衆人拾柴火焰高”、“衆志成城”：有經歷的獻經歷，有資料的獻資料，有史識的獻史識，有使命感的獻一份心和力……總之是不要使青史入灰，更不要讓御用學者喝着右派的血滋養出紅潑潑的笑容以諂媚當今！

50年後的今天來重新評價1957年的右派思想，許多學者認爲當時的許多觀點堪稱中國近代思想史的頂峰。宋永毅認爲，“關於中國政治改革50年後的藍圖，在1957年的時候都系統的細緻的描繪過了，1957年的思想高度甚至也高過八九民運。”經常有人把1989年的六四民主運動與反右運動相比較。錢理群教授說：“反右和六四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1957年學生提的口号，是民主，法制和反特權，而這三大口号，實際上六四運動也就是這三

大口号。”

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高級研究員、被鄧小平稱爲“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之一的郭羅基認爲，由于歷史的斷代，六四民運並沒有承接 57 思想。“譚天榮 1957 年提出民主人權萬歲（其實，通讀右派言論即可發現，其核心觀點是反對“黨天下”，其核心價值在于“爭人權”——紫丹）超越了五四，但是並沒有爲六四所繼承；五四運動提出的口號是愛國民主運動，中國民主不能實現，我認爲就是把民主和愛國連在一起。愛國可以是不民主的，民主的根源是人權，爲什麼要民主？歸根結底是要追求人權。所以在譚天榮之後 30 多年，八九民運還是提愛國民主運動，所以六四和五七是斷代了。”

歷史斷代導致的結果，是後來的民主追求者從零開始的摸索。陳奎德說：

50 年前，這批人被打下以後他們發不出任何聲音，中國有一段非常悲哀的歷史斷代的這麼一個過程。所以使得後來人必須從零開始，從頭摸索，慢慢發現現代的國民社會是如何遵循哪些法則的，包括八九年學生的抗爭，幾乎是從零開始；摸索出來的結論，有些甚至還沒有達到 1957 年的深度。所以說這個情況是中國社會的悲哀。我想 1957 年是作爲中國現代的思想的精神源泉，會對中國將來的社會變革起到重大的激勵的作用。（BBC 反右 50 周年特別節目第七集：《反右對當代中國民主法制的影響以及 1957 思想評價》）

### （三）王丹是一位對反右派研究最下苦心的青年人

許良英教授在《我有責任讓世人了解王丹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一文中說：“他第一次找我是在 1988 年秋天。他當時祇有 19 歲。已在北京大學政治系讀了一年，剛轉到歷史系，打算寫一部反右運動史，知道我：1957 年因公開反對反右而被劃爲‘極右分子’；1986 年 11 月與方勵之、劉賓雁三人聯合發起召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因遭當局禁止未開成，隨後方、劉被開除黨籍），想同我討論如何寫反右運動史問題。我告訴他，反右運動很複雜，你年紀太輕，一時難以全面了解，等你歷史系畢業後再考慮也不遲。他接受了我的意見，並開始留意收集資料。”（王丹文集：《我們在寫歷史》第 215 頁）

王丹是個有心人，在《獄中回憶錄》中說：

在北大歷史系讀書的時候，我就已經開始對中國共產黨 1957 年發動的“反右派運動”這段歷史發生了興趣並着手進行研究。我仔細閱讀了當年的《人

民日報》和一些大批判小冊子，並採訪了一些當年的“右派”分子，比如方勵之先生的夫人李叔嫻老師和中國科學院的許良英教授，進而準備將這一段歷史作為我的專業主攻方向，廣泛搜集資料，寫出一本全面反映“反右”運動全貌的著作來。這個工作同許多其他工作一樣，極為可惜地被“六四”的槍聲打斷了。

現在在監獄裏，我有了充裕的時間結合有關資料，認真思考這個問題。我從家裏要來了一套《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參考資料選輯》，一共四本，是中國人民大學黨委下屬的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辦公室編印，1957年12月出版發行的。裏面收錄了大量“反右”運動中的有關文件和批判文章，尤其珍貴的是，還有一本專門輯錄了所謂“右派分子”的言論及文章，比如章伯鈞關於所謂“政治設計院”的發言，儲安平關於“黨天下”的發言，吳祖光關於“黨不要插手文藝工作”的講話，中南財經學院教授楊時展寫給毛澤東的萬言書等。這些都是具有史料價值的資料，從中不難看出“反右”運動的概貌。為了加深印象，這厚厚四大本書共兩千五百頁的內容我都一字不差地出聲朗讀了一遍。這是我自己發明的學習方法。我發現出聲念一遍，其印象深刻的效果要遠遠大於默讀。從書中我看到，不少當時的“右派言論”與前幾年的所謂“自由化人士”提出的意見大同小異，有的甚至連措詞都一致，比如對新聞自由和創作自由的呼吁。這表明，30年過去了，但是中共在政治民主方面仍舊徘徊不前，而人民却為此付出了一次又一次的代價。從書中寫下的1957年的歷史，聯想到我親身經歷的1989年的現實，看到歷史已進入20世紀，而我們仍然要為追求和捍衛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基本尊嚴與權利而付出代價，我不能不為中華民族的多災多難感到悲哀。1957年的歷史即使在今天，仍然是歷史研究的禁區。但是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把它的真實原貌寫出來，告訴人民災難是怎樣降臨到我們頭上的，告訴人民所有的苦難我們都不應淡忘。一個遺忘歷史的民族注定要被歷史拋棄。（同上，第63—65頁）

從政治血緣上講，章怡和、章立凡、王丹等，接的是右派的第二棒。我是按鄧小平劃“代”的方法劃“棒”的。右派的第一棒是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林昭等，反對的是共產黨的第一代，毛澤東時代的極權暴政；第二棒是從“七九民主牆”魏京生、胡平、陳子明、任曉町和天安門母親等，中經資產階級自由化人士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胡績偉等，到“八九民運”，反對的是共產黨的第二代鄧小平專制獨裁，貪污腐敗和第三代江澤民的繼承

其衣鉢，並屠殺鎮壓法輪功等。這種民主運動，海外還有王炳章等的《中國之春》等等，都屬於第二棒。第三棒應該是方興未艾的維權運動，工人農民律師相結合維護自身利權的鬥爭，知識分子維護言論自由的鬥爭，例如最近反禁書風波等，特別是章詒和的言論和活動，從政治思想實質着眼，則是與右派的鳴放言論有絕對的血緣關係，是一脈相承的。

更準確地說，是 1957 年那場“較量”的繼續。從理論成果說，法輪功團體的《九評》對共產黨的本質作了全面、徹底、系統的揭發，之所以能令人信服，是由于它材料翔實、論證嚴密、擊中要害。它吸收了《誰是新中國》中的大量研究成果；而《誰是新中國》又滲透了廣大大陸史學界歷史反思者的勞績和聰明智慧、求實精神。這部書在海外和大陸的深遠影響，已使中共中央宣傳部夜不安枕，遂組織了一個叫“田雨”的御用寫作班子，無理光憑詭詐，蜀犬對日狂吠；其出言之粗俗、質量之低下，不屑于鄭重地置評，祇配用一句民間的歇後語：“桌子上放夜壺——沒有水平（瓶）”。

我認為，“最根本的是，從內容上講，《誰是新中國》是以翔實的史實、無可反駁的邏輯、精確無誤的語言、實事求是的態度、標示出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中華民國是孫中山先生倡導的共和革命所創建的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專制復辟所帶來的舊中國’，從而使自己的立論立于不敗之地，從而也把中共永遠釘死在‘開倒車的反對共和革命的專制復辟’之歷史耻辱柱上。”（拙文《〈為新中國辯〉是打着紅旗反紅旗》）僅此重要的一點，就展現出它在更高、更徹底的層次上，使 1957 年的右派言論得到發展和升華。

當然，“棒”對“代”也不是一一對應的，是錯綜的，王若望一枝筆橫掃三代獨裁。共產黨的第四代胡錦濤心狠手辣，不分青紅皂白地以黨性消滅人性，先不說他咬牙切齒地、不分“棒”地反對西化、分化、自由化，即使對他的老上級趙紫陽，祇因趙身上尚存的那份人性，就要使他受到終生軟禁。也祇有在他死後，他女兒才得以說：“他終於自由了！”並且，第四代還要以“犯有嚴重錯誤”的定性讓趙帶進棺材裏。用歷史眼光看，將把趙紫陽“犯有嚴重錯誤”作為一份殊榮載入史冊。另外，前時逝世的劉賓雁是 40 年代的老共產黨員，也該算是“團派人物”，死前以 80 高齡，身患絕癥之軀，撫摸着胡錦濤的頭頂，向他請求落葉歸根，竟遭他裝聾作啞，冷酷拒絕！

至于右派的第三棒的接棒人，已初試鋒芒，勢不可擋，喜看如雨後春筍，萌發勃勃生機。第三棒的鬥爭內容，將較多地重復第一棒，這是由于，共產

黨的第四代要更多地向第一代返祖，他從金正日身上發現了第一代的基因，所以號召要向金正日學“正宗”，學“提純”！許多人認不清第四代的真面目，說什麼“胡溫新政”、“胡錦濤新思維”，寄予幻想。須知，新乃是與舊相比，與舊不同之處；豈不知胡錦濤的所謂“新”，與“舊”不同處之處，正在于比“舊”還要舊。說怪，也不怪，胡錦濤先天不足：他在接觸共產黨之前，沒趕上蒙受西方自由主義和國內三民主義之熏陶；後天失調：他又未能如王丹、胡平等曾下工夫攻讀西方人文學說和重溫 1957 年右派言論那樣，補上這一課，相反，他全盤接受的是非常濃重的極左毒素，滿肚子狼奶。他的經歷和學歷，決定了他視野的封閉性，除了目不轉睛盯着毛澤東思想，對這個東西情有獨鍾外，對其他是鮮知而又不樂知的。正因為如此，他才能“慧眼”識“英雄”，發出高論：“管理意識形態，我們要學習古巴和朝鮮，朝鮮經濟雖然遇到暫時困難，（好輕鬆的“暫時困難”！中國為此餓死 1/20，朝鮮却餓死 1/8！——紫丹）但政治上是一貫正確的。”這就是他對你希望他搞“新政”的回答。難道世界上還有比胡錦濤“要學習”的，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政治上是一貫正確的”榜樣——金正日的“政”，更“舊”的“政”，更反動、更腐朽、更流氓的“政”嗎？正如本篇起始所指出的，毛澤東曾撒下許多美麗的政治謊言，雖然純粹是偽善，但他們那一代人，畢竟還知道什麼是“真善”，才能造出“偽善”。而這些“真善”，胡錦濤根本就沒有接觸過，所以他才祇認金正日！

中國的情況，直至今日，祇用將王丹的話：“30 年過去了，但是中共在政治民主方面仍舊徘徊不前，而人民却為此而付出了一次又一次的代價。從書中寫下的 1957 年的歷史，聯想到我們親身經歷的 1989 年的現實，看到歷史已進入 20 世紀，而我們仍然要為追求和捍衛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基本尊嚴與權利而付出代價。我不能不為中華民族的多災多難感到悲哀。”中的“30 年”乘以二，“20 世紀”加上一即可。胡錦濤在刻舟求劍，舊地重游，原地踏腳踏！對這人的惡行，祇需採取艾未未的嬉笑怒罵式。至此，一首打油涌上心頭：

“章”家有女傳“反動”；（注：指《往事並不如烟》等）

不“混蛋”怎是“儲”血統？（注：指儲望華等與其父劃清界限）

方興未艾艾未未，

不負父輩名艾青。

現在立志和獻身于民主事業的人們要學王丹從右派言論中汲取精神營

養，接過這個民運的傳家寶。這可是不可或缺的一課啊！王丹誓言要把反右運動的全貌寫出來。我認爲，這是一個有爲青年的雄心壯志，它體現了孫中山先生說的“要立志做大事……”

“六四”之後，全國通緝王丹，媒體作踐王丹，我不知王丹是個什麼樣的學生，後來有一次問及北大丁校長。原話已記不住了，大意是，他要像媒體上說得那樣，北大學生會跟隨他嗎？他會有號召力嗎？我聽了之後，甚感欣慰。于今又甚爲感慨，當年在學界“臭名昭著”的王丹，現在在國內已是無聲無嗅；據章怡和說，現在民盟中央機關的人竟然有不知道章伯鈞是誰的；實在堪憂。共產黨在縱橫兩面封鎖信息，做得真叫絕。所以，爲了不使青史入灰，不使每一代的鬥爭都從零做起，爲“記憶”而鬥爭！這是和共產黨作鬥爭並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方面和重要保證。

不說全國，也不說北京，單說北大就有許許多多的優秀大學生，爲什麼偏偏涌現出王丹作爲學運的領袖呢？除了別的原因，如上所述，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這樣，王丹便找到了學運，學運也找到了王丹。如果都能掌握右派對共產黨的認識，特別是掌握右派精神，那麼，民主運動定將展現新的局面。“九〇後”著名北大生孫宇晨，“他說，他心目中還有一個精神領袖，是在他出生前一年已成名的北大師兄——王丹。”（張潔平：《網絡下的蛋中國 90 後先鋒改變中國》，《亞洲周刊》25 卷 26 期）

什麼是右派精神？就是林昭精神，就是認識的真切，信仰的執着，靈魂的美好聖潔和生我所欲也，所欲有甚于生者，捨生而取義者也。她是和秋瑾一樣，與日月同輝，是我們的民族女英雄，是我民族精神的當代最高典範！我在書裏會對她的精神大加發揚的。我將把林昭與毛澤東作爲中國人的兩個極端，說明中國人最好能夠好到什麼樣，最壞能夠壞到啥程度？我這部書《還原 1957》，可以說是一篇《中國右派宣言》。我決不會去理睬什麼“主旋律”，也不會讓鄧小平對右派的定性捆住手脚，相反地我讓鄧小平的鬼話早點兒去見鬼！因爲要是讓鄧爲反右派定性，那就等于把秦香蓮的案子交陳世美處理，更正確地說，是把一件殺人的案子交給犯案的劊子手處理！相反，我要讓反右劊子手鄧小平同首犯毛澤東一起，坐在歷史法庭的被告席，接受嚴厲的審判。

我認爲，右派的大鳴大放是世界共運史上空前絕後的壯舉。右派指着執政黨中共的鼻子進行批判，對中共執政以來各次運動所犯血腥罪行，和現行

政策的各個方面，一一給予徹底揭露、控訴和清算；內容上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法制、外交、社會、人口、文學、藝術、科學、教育、新聞、出版、廣播、體育、宗教、醫療、衛生、學術、思想，總之是有關世界、國家、民族、政黨、自然、人文、工農商學兵的諸多方面的理論與實踐，應有盡有，無所不包；組織上，包括從中央毛澤東、周恩來直到最基層的黨支部，黨小組的每個黨員，老和尚、大和尚、小和尚，可以說是一網打盡，無一由特權造成的為非作歹的惡行，能逃過人民的批判。而這個“廣度”又是具有“高度”和“深度”的。這在世界史上也是史無前例的。

把一切的批判，一切的罪惡之源，歸結為“黨天下”。這是鳴放中的一件歷史偉績。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反對黨天下”仍是擺在全中國人民面前的一項嚴重的歷史使命！我所說的“接棒”，就是接的這個棒，一棒一棒地把“黨天下”送進歷史博物館。

就像王丹做的那樣，你也去“仔細閱讀”一下當時的右派言論，大概你也會為它的深度所折服。它不僅就着血淋淋的現象，進行道德譴責，也不是祇指出問題，揭出弊端，而且是與世界民主潮流相接軌，條分縷析，闡明原理，按着政治學評政治，按着經濟學評經濟，按着法學評法制，按着教育學評教育，按着社會學評社會……可以說，他們代表了當時中國的最高水平，指出了糾正錯誤，擺正航向，擺脫災難的正確道路。怎奈他們面對外行領導內行的倒行逆施，充其量也祇是發發憤慨而已矣！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他們是遇見了兵匪，而這個兵匪的名字，又同于趙樹理小說《三里灣》人物中的一個外號，叫做“常有理”。這樣一來，謬論戰勝了真理，野蠻戰勝了文明，老粗（愚昧）戰勝了老細（科學），專制戰勝了民主……遂致史無前例的浩劫降臨中華大地。

王炳章提出的“重建中華民國”就使“反對黨天下”目標明確，由破壞達到重建；同樣，辛灝年的《誰是新中國》就使認識更進一步深化，深化了對歷史真相的認識，指明了重建的政治綱領；而實踐更為理論開創了道路，這就是國內的先知先覺們已經起而行動，在大陸重建中國國民黨！從邏輯上講，共產黨對孫中山創建的中華民國，是否定了共和，復辟了專制；重建中華民國對共產黨也是否定，否定了專制，光復了共和。有人可能從“量”上指出中華民國 100 條缺點，但從“質”上講，不過是在“已被定性為民主這個質”上談論程度（即“多”與“少”）的問題；而共產極權制度，如果它的

辯護士能够編造出 100 條優越性，也不能睁着眼睛把“民主”的“無”（大家，包括辯護士在內，都身受過這個“無”的滋味）說成“有”。讓我們的認識和實踐相輔相成，昂首並進，在重建共和，重建孫、蔣精神的中國國民黨，重建大中華民國的道路上大踏步前進，一步一個腳印地得寸進尺吧！

### （四）不排除細節上改良；但在宏觀上，革命之外無出路！

毛澤東陰魂一日不散，黨天下就一日不會完蛋。我們意識到的歷史使命，唯一的是打倒黨天下。祇有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反動派拼死維護黨天下，他們才是民主的死敵。共產黨的口頭禪“你死我活”，用在右派與黨天下不共戴天這一點上是唯一的結論。而打倒黨天下，就要從驅散毛澤東的陰魂做起。

毛慣用的策略是“誘敵深入，聚而殲之”和“分化瓦解，各個擊破”。體現在反右運動中，前者就是“引蛇出洞”，後者就是在各個單位搞左、中、右排隊，揪出占總人數 5-10% 的右派分子。在右派中還要分極右派，一般右派，中右，對於極右是置之死地而後快。這個事實，對於我們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毛澤東思想（包括策略思想）作為軟件已輸入進每個共產黨人（特別是幹部）的腦中，他們在與你打交道中就必然會施展出來，你如不設防，則必受其害。例如毛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提出“兩個 95%”：群眾和幹部中 95% 是好人，5% 是壞人。劉少奇是 5% 中之最壞者，是第一號走資派。但劉少奇在文革初期，却將毛之故技重演。1966 年 6 月 11 日，劉少奇、鄧小平在文化革命匯報會上指示李雪峰、吳德，打右派學生“不定框框，有多少定多少”。13 日，劉少奇批轉中南局和西北局《關於文化革命的情況和意見》，指出：“當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于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着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高中應屆畢業生“經過市委批准，可以鬥爭和戴帽。”這和九年前毛反右派的自稱“陽謀”，一模一樣。劉少奇與毛朝夕相處還不能免于中他的陰謀，料不到毛會對他“請君入瓮”。在毛一面是由于招數高，在劉一面是由于有利己害人之心。試想，如果不是黃烏逮住螳螂，那麼螳螂將會用陰謀詭計，心狠手辣地捕捉蟬。毛的“誘敵深入”，用什麼“誘”呢？曰：利誘。毛的“各個擊破”是什麼意思呢？就是逐個擊破，就是 5%，5% 地擊破，你切勿認為祇擊破他，不擊破你。例如舒蕪出賣了胡風，想得到利



益，但到了反右派時仍被劃了右派，打成敵人。吳晗反右時想從出賣知識分子，出賣民盟盟友中得到利益，結果，在文革中賠上了自己的一條命。應了那句諺語：“你想他的利，他想你的本。”當你和中共打交道時，應把這句話貼到你的座右。吳晗等不可勝數的人，不是坑了老本兒嗎？這就是我說的兩方面意義中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毛澤東在全國各個單位按左、中、右排隊，結果就弄清了陣綫，營壘分明。這是一項寶貴的資源，若非毛澤東作，我們是沒有能力作到這一點的。這樣，他知道了，我們也知道了：誰是左派？誰是右派？誰是中間派？同時，通過反右派，使我們學會了，掌握了用“派”的觀點去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看中共時，不能囫圇吞棗，一定要按他們的表現，把毛賊及其一小撮從整個共產黨中提取出來。所謂“黨的政策”其實是黨內占支配地位的“極左派的政策”。例如，他們對孫中山民主革命採取“掛羊頭，賣狗肉”政策的，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的復辟派；陳獨秀就持有異議。在抗日衛國戰爭時期，堅持“讓日本多占地”政策的，是以毛澤東為首的賣國派的主張；彭德懷反對過，王明更主張真心擁護民族統一戰綫。勝利後，搶城市，奪地盤，在全國興風作浪而又以“和談”為烟幕的，是以毛澤東為首的內戰派；劉少奇提出的是“和平，民主新階段”。奪得全國政權後，實行激進政策的是以毛澤東為首的冒進派，劉少奇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周恩來提出反冒進，鄧子恢實行“堅決收縮”、大批解散合作社。反右派鬥爭是以毛澤東、鄧小平為首的極左派搞的，據李志綏的回憶錄中說，陳毅對反右派就持否定態度。更別提黨內也存在有大量的右派了。歷來如此，于反右派中看得尤為清楚：共產黨看黨外人士，有的為敵、有的為友，可在黨內看不同派別則一律視之為敵。例如，一位普通的老共產黨員王若望被劃了右派，祇因他堅守着良心，就成為了“專制獨裁”派不可調和的敵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都對他進行了嚴酷的迫害，直到驅逐出國，客死異國他鄉。王老從未從民主陣地上後退一步，成為民主運動中最堅定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毛澤東為首的自稱“無產階級司令部”，實際已成為孤家寡人，一小撮的專制獨裁極權派，他在共產黨內也是極端脫離群眾，與大多數黨員、幹部為敵的，跟隨他的，幾乎屈指可數。他何以能以寡敵眾呢？就是長期以來灌輸毛澤東思想，造成了對他的個人迷信，捆綁住了人們的心靈、手足。也就是王若望先生指出的：“人人心裏有一個小毛澤東。”

文革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代表改革派，他遇到了文革派與保守派的反對，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則代表保守派，遇到改革派的抵制。鄧自己說：“國外有些人過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別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錯，如果要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

爲什麼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因爲四項基本原則是脫胎于毛反右定的“六條標準”，其靈魂是“黨天下”。這和他後來反對自由化是一脈相承的。他受到胡耀邦的抵制。他說：“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至少在本世紀剩下的十幾年，再加上下個世紀的頭 50 年，都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去年 9 月召開的黨的六中全會上，有的同志主張在《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中不要寫反對自由化。胡耀邦同志實際上就持這種觀點。”（《鄧小平文選》三卷，頁 211）至于他搞“六四”屠城則更暴露了他毛派原有本質的猙獰面目，衆所周知，他受到趙紫陽的抵制。他有罪惡，也有功勞，大概可作倒三七的評價。

至于他的接班人江澤民，則純粹是一個頑固的“黨天下”派。他拉幫結派排除異己，他鎮壓民運人士從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同人等）到全國，他承認與俄國訂立的不平等條約，割讓祖國領土，他從自己做起，扶持太子黨，他包庇貪官污吏，他迫害法輪功，犯群體滅絕罪……對他評價倒較簡單：功無寸分，罪莫大焉。

這些分析說明，不管是文革前，還是文革後至今，所謂“共產黨的政策”全屬派的政策，並且，一條基本紅綫貫串下來的，是毛澤東思想，所以實際上都是毛派戰勝了別的派。但名堂甚多，相對於改革派，則名曰：保守派；相對於要求實行多黨制的，則名曰：頑固的“黨天下”派；相對於反個人迷信，則名曰：斯大林主義派；相對於走資派，則名曰：無產階級司令部或文革派；相對於保皇派，則名曰：文革派；相對於右派，則名曰：左派；相對於穩健派，則名曰：冒進派（後美其名曰：躍進派）；相對於民主革命派，則名曰：專制復辟派。而這些鬼名堂有一個共通的性質，則是後者對前者的“反動”。故名曰：以毛澤東爲首的共產黨反動派，則名至實歸。名正而後言順。很多人不明真相，說民主運動“反華”或說“逢中必反”，其實，不但不“反華”，不“逢中必反”，而且也不囫圇吞棗地“反共”或“逢共必反”。可以毫不含糊地說明，民運運動主流是旗幟鮮明地反對以毛澤東爲首的共產黨反動派，集中于一點就是反對黨天下。

對中共黨內的改革派，民主派，自由主義者……則要引以為朋友的，甚至要引以為良師的，如王若望、李慎之、李銳、蔣彥永等。劉賓雁也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呀！他就說，“毛澤東是反革命”，是“中共黨內的反動派”，並且我在美國之音中文網上看到：“劉賓雁說，毛澤東思想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反人道、反人性的。沒有這種反人道、反人性，中國的革命也不可能勝利。”這裏，他還深刻地揭示了“中國的革命”取勝的本質原因，即：“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是反人道、反人性的勝利。”

我們相信，中國人民的大多數，共產黨人的大多數，從貪污腐敗、特權橫行、糟踏法制、鎮壓民衆、剝奪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宗教信仰的自由等等中，都看到了“黨天下”為患之烈，是萬惡之源。取消“黨天下”的歷史條件已經爛熟，踢開國家現代化道路上的絆腳石——“黨天下”，是我們的歷史使命。讓我們從批毛開始，徹底驅散毛的陰魂，連根拔除，並用烈火焚毀這棵毒木——黨天下，這便是完成我們的使命所要進行的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的工作。我們既不能放鬆使命感，又不能熱鍋上爬螞蟻。須知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故需既要從長計議，又要祇爭朝夕！

打倒黨天下，當然是打倒這個黑暗、腐朽的反動制度，但堅持這個制度的是中共反動派。所以就一定要打倒中共反動派。誰是中共反動派呢？你總不能說祇有毛澤東一人。因而要有個標準，就像毛澤東反右派定了六條標準。我們就用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為標準：凡是個人相信四項基本原則的，算是信仰自由；凡是自己頑固堅持而又強迫別人堅持，並加害於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人，劣迹斑斑，則為中共反動派。“如果是非黨幹部呢？”“必為黨外布爾什維克；往往比黨內的還惡劣。”

右派分子林昭他們，在其革命組織“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的刊物《星火》上，發出召喚：“共產黨已經腐朽，需要一次革命。號召黨內健康的力量組成‘中國共產黨革命委員會’，起來革命。”

民族英雄林昭在前！我們要把她“怕死不反共產黨”的革命精神，貫徹在“打倒黨天下！重建新的大中華民國”的行動中。

### （五）右派分子林昭：中華民族的開路先鋒——為紀念林昭 76 忌辰和殉難 40 周年而作

反右——那腥風血雨、慘厲倍常的 1957 年，在許多人，也在這個年青

人的生命史上，深深地刻下了一道烙印，劃出了一道鴻溝！

每當想起那慘烈的 1957 年，我就會痛徹心肺而不由自主地痙攣起來！真的，甚至祇要一提到、看到或聽到這個年份，都會立即使我條件反射似地感到劇痛！這是一個染滿着中國知識界與青年群之血淚的慘淡悲涼的年份。假如說在這之前處於暴政之下的中國知識界還或多或少有一點正氣流露，那麼在這以後則確實是幾乎已經被摧殘殆盡的了！（林昭）

今年是紀念世界人權日 64 周年，喜看中國人民人權覺悟今勝昔。此時此刻，不由得不令人思念起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女兒、維權運動的先烈林昭女士。她是近現代史上最堅決的、毫不含糊的維權戰士之一。她的維權精神感天地，泣鬼神。4 月 29 日是她為維護人權、反對極權殉難 44 周年；（2012 年 12 月 16 日），是她 80 歲忌辰。光輝而短促的一生，享年共 35 歲零 4 個月 13 天。

### 1、林昭是一個為人權抗爭的自覺的殉道者

一個人，他是為什麼而死，就最終地表明他是為什麼而生。他為之奮鬥的目標如果至死尚未達到，就會“死不瞑目”。這就說明，一個人的“人生觀”就是他對人生在主觀上的終極關懷，在客觀上的最終定格，也即他“人生觀”最徹底的表現。所以評定一個人說要“蓋棺論定”，就是這個道理。一般胸無大志的平民百姓，大致如俗話所說：“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有人說：“大丈夫可以一日無錢，不可一日無權。”不管是誰說的，祇說明人各有志就是了，假如有人誤會成是毛氏語錄也絕非異想天開。也有的是為了子女，也有的是為了愛情，也有的是為了信仰，也有的是為了興趣或事業……總之，為什麼的都有。有人不明白林昭的人生意義，就會既景仰其人格之偉大、崇潔，又慨嘆其没能策略地委曲求生。豈不知“生命”與“生命權”不完全是一回事。被槍斃前一分鐘的犯人尚有生命，但他早已喪失了生命權。林昭是為了捍衛人的，包括自己的，但又及於全民的“生命權”以及作為人之異於動物的生命的全部意義而九死不悔的。她的難友勸她：“何必這樣赤裸裸地反抗？這不是把自己推到絕路上去嗎？”林昭回答：“血流到了體外，總比凝結在心口裏要舒暢得多吶！”這是藝術性的表達，作為政治表態，林昭始終用生命捍衛着自己的生命權、獨立思想和人格尊嚴。她說：“作為人，我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幹淨的生存權利而鬥爭那是永遠無可非議的。”這不僅是她的言論，而且也是她一步一個腳印的行動，真的，是毫無例外的每

一步行動，包括直至流盡最後一滴血，都完全是在維護自己或別人的、或大家的人權、自由。

人權是自然的，是人人應有和必有之權，那爲什麼還需要維護和捍衛呢？在中國，自從毛澤東在天安門上五音不全地喊出：“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中國人民就從此在靈魂上再也站立不起來了，不僅靈魂上如此，而且在肉體上也還都被判處了“死緩”，苟活待斃於倒計時中。所有的中國人，每個人都無生命權，通過“在樓梯上打架”（林昭對“階級鬥爭”的戲稱），腦袋隨時可以搬家。說成文縷縷的“朝不保夕”或說成大老粗的話：“晚上脫了鞋還不知早上穿不穿？”都能表明內心充滿危機感。誰能說“我的生命是有保障的”，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元首、元帥、內閣大臣在內？林昭仰天長嘯，壯懷激烈：“彼蒼昊天！始祖軒轅！哀哀我中華民族寂寞在極權高壓統治之下的正氣，如今是祇不過維持在這一輩於慘重苦難滔天血淚中，以無比凌厲的殺身成仁的勇略毅力爲還我人權、自由而作殊死決鬥的青春代身上呀！”

林昭發出了“還我人權、自由！”這個時代的最強音。這個“我”，並非第一人稱、單數，而是岳飛“還我河山”中的“我”。她不是僅僅坐而論道，而更是以身殉道。“而當時先生們的貴黨又造成了何其悖謬何其慘痛的鮮血淋漓的現實呵！面對着那樣沉痛的政治現實，面對着那些慘痛的家國之苦難，面對着那樣汪洋巨涯的師長輩和同代人的血淚，作爲一個被未死滅的良知與如焚如熾的激情折磨得悲慟欲狂的年青人，除了義無反顧地立下一息尚存除死方休的和反抗者的誓言，並竭盡一己之所能，將這誓言化爲行動而外，還有什麼是她更應該做的事情呢？！”“假如上帝需要我成爲一個自覺的殉道者，我也會發自衷心地感激施賜于我這樣一份光榮。”

我們後死者應該繼承先烈林昭的精神，努力使“還我人權、自由！”成爲當今中國輿論的主旋律、家喻戶曉的人權覺醒以及全民統一維權步伐的行動目標！雖然我們都沒有林昭那樣偉大崇高的智、仁、勇（古之所謂“天下之達德”），但我們無論如何總應該和總能夠去推己及人地維護的人格尊嚴吧！憲政學者李鐵先生說得好：“生爲一個人，每一個人要把尊嚴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能把人的尊嚴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人，才能做到威武不能屈，士可殺不可辱。人的尊嚴比生命更重要，就是人以有尊嚴爲天。不論我們有多麼貧賤，多麼無知，與一切作爲人的有尊嚴的生命之外的一切身分、地位

無關，任何個人和組織不能剝奪人的任何應有的權力，與生俱來的權力。”

### 2、她，為維護右派的人權，被劃了極右派

她劃右派並不是因為她大鳴大放、“猖狂向黨進攻。”不是的，連小鳴小放都沒有。在反右之前，林昭是個熱愛共產黨、熱愛毛主席、追隨革命、比較“左”的青年。她非但沒有鳴放，而且對別人的某些過激鳴放都不以為然。當《紅樓》編輯部舉行會議，宣布開除張元勛與李任《紅樓》編委會時，林昭批判他們說：“我有受騙的感覺！”意思是平常親近相處，想不到他們會發出這樣的右派言行而使自己畢露原形。但當黨自食其言，左派跟屁蟲張牙舞爪、無限上綱、粗暴地整人時，她又質問：“今天晚上的會是什麼會？是演講會還是鬥爭會？鬥爭會是談不上的，因為今天不需要鬥爭。鬥爭誰？張元勛嗎？他有什麼地方值得你們一鬥？我們不是號召黨外人提意見嗎？人家不提，還要一次一次地動員人家提。人家提了，怎麼又勃然大怒了呢？”林昭在日記上寫道：“黨啊！您是我們的母親，母親應當最知道孩子們的心情，對母親不必要歌功頌德，母親最愛聽的是她的毛病。因為愛的深沉，才恨得更狠，對爬在母親身上的病菌更不能容忍。為了母親能更好地領我們前進，母親的病就是我們自己的病，讓我們幫助母親清除毒菌，儘管孩子過於偏激，說錯了話，怎麼能說孩子懷有敵意？甚至一脚把孩子拋入‘反革命’的泥坑。我要吼叫，決不允許！可悲的事終於發生，《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社論兩天來的局勢，是在全國範圍內有意識地收縮這次民主運動了，組織和號召開展所謂的反右派鬥爭。看來，熱愛真理、民主、自由的人們將大難臨頭、在劫難逃了。悲劇，歷史的悲劇！”她一面痛心疾首、心懷強烈不滿，但還一面仍是“我把黨來比母親”。

她曾在在大會上坦誠揭示自己的內心矛盾：“我一直覺得組織性與良心在矛盾着！”

林昭思想發展的分水嶺就在這裏：從時間來說是 1957 年，從性質來說是組織性與良心在矛盾着！以前種種錯誤、惡行都是受“組織性”之驅使；以後種種嘉言懿行以至堪稱為崇高、偉大的英雄主義的膽識，都是來自良心的驅使。

“當我加冕成為‘右派’後，你是無論如何也不能體會我的心情的，我認為我熱愛黨的程度是壓倒一切的，沒有任何事物可以與之相比擬。我不能忍受它對我的誤解，而且誤解得那樣深。維系我的一切全跨了，比牛虻不信

蒙泰里尼還慘……”

“青少年時代，思想左傾，那畢竟是一個認識問題。既然從那惡名遠揚的反右派運動以來，我日益看穿了那偽善畫皮下猙獰羅刹的嘴臉，則我斷然不容許自己墮落到甘為暴政奴才的地步。”

“真的，無論在何時何地何種情況下，我攻擊反右那回臭名遠揚的醜劇，都從不強調什麼個人的委屈之類。個人縱有天大地大無大不大的委屈，總不過是中國大陸知識界與青年群那冤恨滔天的血淚汪洋之中一滴水罷！這場醜劇並不是專對林昭個人的。在我說來，倒更習慣于把自己這一滴水放在那個滔天的汪洋以內，不管怎麼地吧，事態的發展總是已經到了逼得人們不能在根本的政治態度上有所抉擇的地步。——既然我不能容許自己墮落到甘為暴政奴才的地步而跟着共產黨去反右，則祇好做定了所謂的右派而來反共了！問題就是這麼尖銳而更嚴峻得絲毫不容回避，因為已經絲毫不存在回避的餘地！”

可見她是由于不“跟着共產黨去反右”，才劃為右派的；她表明自己“祇好”“反共了”。她以浩然正氣、氣壯山河地宣稱：“怕死不反共產黨！”

“組織性與良心的矛盾”這是當代中國人思想的主要矛盾。由于取捨不同，各人走了殊異的人生道路。當她在會上拋擲出這一觀點時，有反對的，也有支持的。後者中有人說：“你吐露出了真心的懷疑”，並引發了更深刻的反省：“同志啊，我知道你那欲言又不敢的苦衷，多少人和你一樣，有着這種復雜的心情。捫心自問，在過去，我們曾多少次說出了違心的話，做了它（組織）馴服的奴隸。多少次壓抑了自己，傷害了別人。如今事過境遷已悔之莫及；有的事使我們如此羞慚、痛苦，有的事將使我們遺恨終身”。根據陳愛文的回憶：人家說：“你把你的觀點講出來！”林昭說：“我有觀點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藹，不要這樣咬人。如果你們一定要這樣幹，那你們就幹去！象這樣的社會有什麼好的，當然不好嘛。”

以林昭而論。她也曾受騙、受組織性驅使作了一些違背良心、良知的事。如，在景海中學高中畢業後，林昭不顧母親反對，于1949年7月考入了“革命搖籃”蘇南新聞專科學校，決心“與家庭生不來往，死不吊孝”，投身到革命中去，甚至曾經無中生有地揭發過自己的母親，多年後，林昭對此感到很不安：“他們要我井裏死也好，河裏死也好，逼得我沒辦法，寫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東西，我不得不滿足他們……我没存心誣陷你。”又如，與父親

彭國彥劃清界限，連姓“彭”都不姓了，祇留下名字“令昭”，“令、林”在她家鄉是同音，于是她便成了林姑娘林昭。同時，她把家庭成分報成“反動官僚”。但是，後來她就覺悟了，跟醫生說：“我父親曾對我講，利用青年人純真熱情搞政治是最殘酷的。政治是騙局，爾虞我詐。過去我一直不信，覺悟出真理時已太遲了，現在我已超過受騙的年齡，但尚未達到騙人的階段。歷史將宣告我無罪。”

她憤怒控訴道：“我們這苦難的青春代是更有理由要向共產黨來索討血債！怎麼不是血呢？！陰險地利用着我們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們善良單純的心地與熱烈激昂的氣質，予以煽惑，加以驅使。而當我們比較成長了一些開始警覺到現實的荒謬殘酷開始要求着我們應有的民主權利時，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慘毒無已的迫害、折磨與鎮壓！怎麼不是血呢？我們的青春、愛情、友誼、學業、事業、抱負、理想、幸福、自由……我們之生活的一切，爲人的一切幾乎被摧殘殆盡地葬送在這個污穢、罪惡而更偽善的極權制度恐怖統治之下！怎麼不是血呢？！這個玷污了祖國歷史與人類文明的罪惡政權可謂完全是以鮮血所建立、所鞏固、所維持下來的，而滋養着、灌溉着、培植着它的這一片中國人的血海裏我輩青年所流的血，更是無量無際汪洋巨涯！”這明顯是接受了父親的影響。父女剛剛離而復合、心心相印時，女兒被捕了；“我們家完了！”受盡迫害而仍堅持活下來的父親，絕望了，服藥自殺了。父親是個留學英國、很有見識的憲政學者，林昭從父親那裏獲取了哪些現代民主政治的思想資源？——這是需要尋找新的資料、繼續進行研究的課題。

當她受組織性驅使時，在土改中看到地主在冬天被泡在冷水裏，凍得發抖、嗥叫，她沒有惻隱之心、悲憫之懷，而是感到一種“冷酷的美”。當牧師在被趕出教堂，他以《共同綱領》裏的宗教信仰自由相辯護時，她竟以中央有通知，土改期間停止宗教活動勸牧師走開。又如，對指責張元勛“我有受騙的感覺！”等等等等，反省起來令她痛徹心扉。她在獄中告訴張元勛說：她從前對他說的“受騙”，這本身就是真正的受騙！“不要忘了告訴活着的人們：我最恨的是欺騙，後來終於明白，我們是真的受騙了！幾十萬人受騙了！”

“組織性”是個什麼玩意兒呢？就是黨性，就是階級性的最高形式，就是人性的大敵。良心呢，是人性之本。極權如不泯滅或蒙昧人的良心，是難以建立起來的。監獄裏所以會盛行着慘無人道，就是黨性發作的原因。再質



地純潔的人，即便如林昭，一旦在他身上黨性占上風，就會麻木不仁，甚至能從對地主喪失人性的殘忍中感到一種“冷酷的美”。可見黨性殘毒之劇烈，實在令人毛骨悚然！它是大陸人間種種慘不忍睹的罪惡之源！

毛澤東竟厚顏無恥地跟他的中央大員們說：“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很沒有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有那麼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在這方面，良心少一點好。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麼馬克思主義。”（《毛澤東選集》五卷，頁198）這裡所謂的“在這件事情上”、“在這方面”，其實已經是無所不包了。如果不按毛澤東的要求，不把馬克思主義貫徹到這個份兒上，不讓走資派劉少奇被迫害致死時白發二尺長，死前身體疼痛得使他把一個塑料瓶捏癟；不讓張志新這位黨內同志死前遭輪奸，臨死把頭墊在磚頭上割去喉管；不讓林昭長期被殘酷地蹂躪，最後從病床上拖去秘密處死，然後向家庭討5分錢的子彈費；那麼，這就是：“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麼馬克思主義。”也就是良心尚未徹底泯滅、黨性還不純粹的表現。

在她的所有論述中，使用頻率較高的是這類詞匯：自由、民主、人權、人格、人性、人情、人心、良知、良心。舉例如下：

“自由，這個人類語言中最神聖、最美麗、最高貴的名詞永遠燃起人們特別是青春心靈之最強烈的愛戀與追求的感情！”

“因為這一份該死的‘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劇的根本原因！”

“正確地說是：計劃集合昔年中國大陸民主抗暴運動的積極分子，在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紀遺址上掀起强有力的、劃時代的文藝復興——人性解放運動！”

一貫地不尊重客觀，不把人當人“的制度，我懷疑它還會有任何的人情與人性的存在。”

“我倒並不怕被別人罵幾句該死，祇經常心懷惴惴地惟恐到了什麼時候會弄得自己要罵自己該死。存在着這樣一份惴惴之心很有好處，它促令我隨時隨地——即使是在最艱難困苦的鬥爭條件之下——（都做到）應該做的事情一定要做，應該說的話一定要說！”“成敗利鈍在所不計，任多少人罵我該死也得，祇要我在上帝的真理和人類的道德面前，保有一顆經得起審判的堅而不滯，磨而不磷的良心！”

“當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長時，曾慨然向北洋軍閥政府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現在他們（指北大領導）却把學生送進去，良知何在？”

“這個年輕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是為你們索取的，却又是為你們付出的。先生們人性，這就是人心吶！”

“為什麼我要懷抱着，以至對你們懷抱着人性呢？這麼一份人心呢？歸根到底，又不過是本着天父所賦予的惻隱、悲憫與良知。在接觸你們最最陰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權利中樞、罪惡核心的過程中，我仍然察見到，還不完全忽略你們身上偶然有機會顯露出的人性閃光。從而察見到你們的心靈深處，還多少保有未盡泯滅的人性。在那個時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極權統治者所慣用的偽善語言，其顛倒黑白而混淆視聽可謂至矣！這句話正確地說，應該是：1957年在青春熱血與未死之良知的激勵與驅使之下，成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運動的積極分子！”

“假如那所謂的社會主義只意味著對於人的凌虐、迫害與污辱，那麼，反社會主義或進攻社會主義就決不是一種恥辱！”

有一位看過《尋找林昭的靈魂》的人，發表觀後感說：“人，可以不懂任何政治、也可以不了解任何理論和主義。人，祇要有未泯滅的良心和正義，就能在一片混沌裏分辨出善與惡、美與醜。”

如果把具體形式撇開，林昭與共產黨的鬥爭，放在靈魂的領域，就是良心與黨性的生死搏鬥。是的，是生死搏鬥，她為此自殺四次，最後被殺。

擴而大之，自從世界上有了共產黨，所有它進行的黨內、黨外的一切鬥爭，都具有這一性質，祇是中共，特別是毛澤東，把它惡劣到無以復加的程度罷了。以此用來定性1957年的反右運動也是正確的，不過需要加以補充，這就是表現在制度的層面上，“知識分子和青年群”以民主主義反對極權主義的“黨天下”。

共產黨反右派運動的歷史及其種種罪行，都可以集中地濃縮在林昭身上。所以，研究反右運動而不了解林昭，就蓋難以避免本質性的缺陷。

### 3、她，為維護公民的人權，被處以極刑，褫奪公權終身

自從林昭劃右派後，“組織性與良心的矛盾”就進一步表現為“極權與公民人權的矛盾”，為己為民，大聲疾呼：“還我人權、自由！”她用“怕人的眼光”死死盯住極權、極權政治、極權暴政、極權統治、極權制度、極權寡頭、恐怖制度、奴隸制度、奴役制度……

夫極權者，乃對權力之運用、達到無所不用其極之謂也。弗裏德利克認為，極權主義是一種制度，它有六個特徵：1、一個官方的意識形態；2、一個受寡頭控制的群眾政黨；3、政府壟斷軍隊；4、政府壟斷大眾傳播工具；5、一個恐怖主義的警察系統；6、集中管理的經濟。（《極權主義》，1954年出版）沒有任何資料說明林昭看過這類書，可他卻能在中國獨一無二地首先指出毛共是“極權統治”，是“搶光每一個人作為人的一切的恐怖組織”，；實在是又“難能”、又“可貴”的。而她反極權的言行，正好與這六條不謀而合。分述如下：

### （1）一個官方的意識形態：

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祇取了它四個字：‘階級鬥爭’。”

林昭就此指出：“假如先生們能夠跳出你們那個自欺欺人的所謂階級觀念也者的圈子而發為那怕一句通達平允之論，則這原是個不成其為問題的問題。假如先生們為愁骨灰盒子裝不滿而非得要抱住了那個樓梯上打架的‘階級觀念’以當隨身殉葬之具的，那麼即待來日一聽天下人公論公斷！”

“但是，罷了，這些話本不該寫在此地因為它們已經忒含着人性氣息而頗越出了樓梯上打架的的範疇，但或許也不妨寫上以為後人他年研究林昭提供某些旁證，因為這一份該死的‘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劇的根本原因！”

林昭又指出，極權體制是“以血與仇恨來維持統治權力”的。這就是作為治國之道的“階級鬥爭”的實質。林昭把這樣的階級鬥爭稱之為“在樓梯上打架”，它並不是以客觀存在的利益分野為基礎——恰恰相反是要掩飾這樣的分化與衝突；它是按照統治的意志，人為製造的。其要害就是要煽動人與人之間的“仇恨”，誘發人性之惡，動物式的嗜殺性。這正是以追求人性的真、善、美為鵠的的林昭最感痛心的，她不惜以最激烈的言詞批判這樣的煽動“血和仇恨”的階級鬥爭邏輯，是包含着一種隱憂的：她已經敏感到新的空前的大殺戮的逼近和來臨，她自己最後犧牲于這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血與仇恨”之中。（錢理群：《“殉道者”林昭》）

### （2）一個受寡頭控制的群眾政黨

她對共產黨的認識與撻伐，鞭辟入裏，擒賊擒王。她指出：“長期以來，當然是為了更有利于維護你們的極權統治與愚民政策，也是出于嚴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雙重影響下的深刻奴性，你們把毛澤東當作披着

洋袍的‘真命天子’竭盡一切努力在黨內外將他加以神化，運用了一切美好詞藻的總匯與正確概念的集合，把他裝扮成獨一無二的偶像，扶植人們對他的個人迷信。”

她通過批毛“言志”的歪詩，來批判毛的陳舊、落後、反動的政治思想。她在監獄醫院牆上寫下的《自由吟》五章也被他們判為“反革命詩詞”，“生命似嘉樹，愛情若麗花；自由昭臨處，欣欣迎日華”就是其中之一，她的批註說：“他日倒也請天下人評評看，這算那一道的反革命詩詞！？作者自己看到至少是並不見得比‘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盡折腰’更陳舊、更落後和更反動的！”

“祇應社稷公黎庶，那許山河私帝王。汗慚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滄桑。”

“貴中央委員會主席具有着一個極其可怕的冷酷而刻毒的靈魂！在這個羨‘江山如此多嬌’的野心家的貪婪，‘欲與天公試比高’的不自量的狂妄，‘龍蟠虎踞今勝昔’的自鳴得意，‘六億神州頌舜堯’的自我吹噓，以至屁股入文、蒼蠅入詩的輕浮，死掉世界人口一半的殘忍等等而外，我懷疑它還會有任何人情與人性的存在。”

“當我們深受暴政的奴役，我們不願做奴隸的同時，我們自身作為反抗者，但我們不能建立新的形式的奴役制度。”在她參與的《中國自由青年戰鬥同盟》，其施政綱領的“八項政治主張”（後簡稱“政綱”）裏：“一，國家應實行地方自治聯邦制；二，國家應實行總統負責制；四，國家政治生活實行民主化；七，國家應對負有民憤者實行懲治。”

### （3）政府壟斷軍隊

尚未發現她在這方面的論述，但“政綱”第三條明確規定：“國家應實行軍隊國家化。”

### （4）政府壟斷大眾傳播工具

要維護這樣的極權體制，就必然實行“愚民政策”，培育“奴性”，實行精神欺騙與控制。這就是極權體制下，極為發達的另一套組織機構，即宣傳、輿論部門。其重視程度及重要性，恐怕也是歷史上空前未有的。也許因為林昭是學新聞出身的，因此，她對中國的新聞、報紙的實質有更多的關注、思考，更為尖銳的批判。她指出，中國的報紙是“整套特務恐怖統治機構的組成部分”，就其功能而言，除了“裝飾門面”，不斷向國人散發“那些空

虛、偽善、廉價而更為無聊的‘萬歲’呼號和愚民叫囂”之外，還是“御用的情報中心”，通過所謂“內部（參考）資料”而提供國內情報，以“供捉風捕影”的內部整肅和發動“階級鬥爭”之需要。

儘管林昭在書信中一再表示她的藐視：“你們的招牌甚至都不能獲得你們黨內秘密特務之下情上達的那麼一點最起碼的尊重，還怎麼能指望獲得廣大國人民眾的尊重呢？”（錢理群：《“殉道者”林昭》）

### （5）一個恐怖主義的警察系統

她指出，這是一個“極權統治的警察國家”，“首先以秘密特務系統監視、控制，從而統治全黨。然後進一步‘以黨治國’，而將這特務化了的黨來監視、控制，從而統治全國”。也就是說，社會、國家的極權，不僅體現為“以黨治國”，更是以在“集中統一領導”即所謂“民主集中制”旗號下的“黨內生活的極端專制”，層層監視和控制為基礎的。林昭說：“我所在的並非書齋，我既不需要一般地討論歷史，甚至也不需要一般地議論現實”，她正是生活在這樣的“非刑殘害”的極端“暴行”，而又嚴密有效的“恐怖制度”中，這裏“不談法律，不談人權，不談公義，甚至不談‘盜德’”，如林昭所說，是把專制的邏輯，推行到了“幹淨，徹底，全部”的極端，而這樣的秘密特務的“恐怖制度”正是極權統治的“物質基礎，或組織基礎”。

“先生們，你們的秘密特務為着企圖‘制服’這個年青人，可是不止一次地把我逼到了九死一生的地步上哩！倘若不是因為多少沾染了一些政治氣味加以多少熏陶了一點宗教氣質——懷抱了一點基督精神，則莫說其它家仇國恨等等，即使僅祇根據着自己個人的遭遇，我也已經就完全有理由對中國共產黨立下血的復仇之誓言。”

警察制度固然制造恐怖、使人人自危，但相當多的情況是首先自己嚇自己，自己內心裏首先就住進了公安局派出所。而林昭，她正好是首先砸碎了自己內心的公安局派出所，先安內爾後攘外，所以他總是心無怯懦，面無懼色，理直氣壯，心安理得。

### （6）集中管理的經濟

在她的視野裏，獨立思想、言論自由、公民權利等等，大多表現在文化、教育方面，這本是她關切的中心。但當“共產黨瘋了”的時候，不惜民力，勞民傷財，大躍進，大折騰，大兵團作戰，大辦鋼鐵，大搞食堂，衛星上天，

元帥升帳，大話空話假話滿天飛，弄得民不聊生，餓殍遍野，特別是對廬山會議彭德懷按照組織原則如實反映了情況後而受到批判和撤職一事更覺得是非顛倒。她傷時憂世，滿腔孤憤，愛國之情、反黨之心益熾，與自己有共同看法的蘭州大學歷史系右派學生張春元、物理系研究生顧雁、徐誠一起創辦了一本名為《星火》的地下刊物。稱贊彭德懷為民請命，抨擊毛澤東倒行逆施。其中一文《當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指出：農村正在大量餓死人，這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直接後果。共產黨已經腐朽，需要一次革命。号召黨內健康的力量組成“中國共產黨革命委員會”，起來革命，糾正極左路綫。

1962年，他們成立了“中國自由青年戰鬥同盟”，在提出的“八項政治主張”裏，關於經濟的有三條：“五，國家實行耕者有其田制度；六，國家允許私人開業，個體經營工商業；八，應當爭取和接受一切友好國家援助”（黃政：《林昭被捕前後的一段往事》，《走近林昭》）。

她說明：“這個青年對於執政者一貫所抱之又誠懇又堅決的態度到底根由着什麼？先生們，根由着的是個人對於祖國政治現實之比較清醒、冷靜、客觀而且公正的估計；次則是對於人類世界文明公義的確定的認識與深切的信任！”

就這樣，1960年10月她以“陰謀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罪，反革命罪”被捕，長期關押於上海提籃橋監獄；1962年3月準予“保外就醫”回家，同年12月以擴充反革命組織罪再次收監，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1968年4月29日改判死刑。

林昭實現了自我，對得起自己和自己的民族。她把劉胡蘭“怕死不當共產黨”改為“怕死不反共產黨”，她才真正是“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張元勛探監，讓我們看到她——一個驕人、感人的真實形象。她占有精神上的絕對優勢，居高臨下地怒斥那般極權小醜殘暴不仁的惡行和卑鄙無恥的勾當；她是多麼地大義凜然呀！小醜當場出醜，膽戰心驚，無地自容，他們是多麼地害怕她呀！就算他們有槍杆子，可以槍殺她，但仍用橡皮塞子塞進她嘴，不讓她發出聲音，因為她每句話都是對極權統治的判決詞和維護人權的宣言書。直至她死後40年的今天，人們去上墳祭奠她，仍遭到監控，甚至審問。“你為什麼要去祭奠她？你想到這樣做的後果嗎？”“你們為什麼這樣害怕，她不就是個死人嗎？”天底下竟有這樣的事：一個武裝到牙齒的龐然大物，怕一個它肉體消滅了的弱女子、“還我人權、自由”的幽靈？！

這就意味着，極權者告訴維權者說：“宣揚林昭精神，對於我們是最致命的。”

## 丙：流毒

### 一，大躍進是反右派運動的第一個惡果

從反右到文革的中間環節的特點，表現在反右派、反右傾與文革三者的關係上：反右傾居中，它與反右派的關係，要比文革與反右派的關係具有更多更大的相似性；換一個說法：反右傾更像反右派。同樣，反右傾與文革要比反右派與文革具有更多更大的相似性；換一個說法：反右傾更像文革。所以說，反右傾是前承反右派，後啓文化大革命。有了這類中間環節，反右派與文革的關係便能一目了然：文革並不是反右派的直接結果；大躍進才是反右派的直接結果，但中共也並不是爲了大躍進才反右派的。所以，文革的發動也不是爲了要維護反右派的成果，雖然文革給右派帶來的是“再踏上一祇腳”。甚至，反右傾也不是反右派的直接結果，反右傾是大躍進失敗的直接結果；所以，大躍進才是反右派與反右傾的直接中轉站，再經過“反右傾，鼓幹勁，繼續躍進”、“七千人大會”、“四清”運動，幾次中轉才到達終點站：文化大革命。外在地看，文革與這些運動——其主題均是毛澤東要建立毛的“家天下”，是“親兄弟”的關係；而與反右派——主題則是鞏固“黨天下”，就是“同父異母”的兄弟關係。所以文革對二者的態度是親疏有別的。對親兄弟，則不僅維護反右傾鐵案不許翻，而且更要置彭德懷於死地；對七千人大會，則聲稱它是對反右傾的反撲，是修正主義要搞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直接點出“1962年的右傾”；對四清，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還專門發布了一個紅頭文件，要堅決保護四清運動的成果。這是我們外在地看到的一個輪廓。至于內在地看，毛澤東的悶葫蘆裏到底裝的是什麼錦囊妙計，這個問題還是要讓我們先從大躍進中，次從反右傾中，再次從七千人大會中……直至文化大革命中，層層剝筭，逐步展開。

### （一）反右派與大躍進的直接因果關係

《人民日報》在 1958 年 2 月 12 日的社論中說：“全民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的勝利，給我們創造了極其有利的政治條件。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的勝利，不僅粉碎了資產階級右派對黨對社會主義的猖狂進攻，進一步鞏固了全國人民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團結，鞏固了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而且進一步提高了全國人民的社會主義覺悟，鼓舞了廣大幹部和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幹勁。經過整風運動，許多人過去認為根本辦不到的事情，現在很快地就辦好了；許多過去長期不能解決的問題，現在很快地解決了；許多原來想不到的好辦法，現在群眾都想出來了；許多過去沒有被發現的潛在力量，現在不斷地被發掘出來了。在黨的領導下，我國人民正在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把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推向一個新的高潮。這種無堅不摧的力量，是我國國民經濟新的躍進發展的基本動力。”

這種因果關係，毛澤東于 1958 年 9 月 5 日在第 15 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作了明確的肯定：“幾億勞動群眾，工人農民，他們現在感覺得心裏通暢，搞大躍進。這就是整風反右的結果。”先不說心裏通暢不通暢，祇說下面一點：搞大躍進的確是反右派的直接結果。經過 1957 年的反右派鬥爭，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人都認為反右派鬥爭開放的“燦爛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要結成“大躍進的經濟之果”，這樣地看待它們的因果關係，就決定了從大躍進的領導人到躍進的指導思想，必然是與反右派一脈相承的。1958 年 4 月 5 日，毛針對各行業間的分散主義的現象，強調權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我為正帥、鄧小平為副帥”。毛的秘書李銳先生說過大意是這樣的話。綜觀鄧小平的一生，他是和毛澤東一樣的左。所以領導大躍進的正帥和副帥，正好是原先領導反右派的正帥和副帥。這絕不是偶然性的巧合，而是本質性的現象，必然性的體現。

1958 年的另一個規律性的呈現是，遠非一般所說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是代表“道”的右派，低頭一尺；代表“魔”的，即整風中說的“三害”（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現在成了“精”，也就是“魔”，氣焰萬丈。所謂“成精”，是指“三害”作出了橫行無阻、淋漓盡致的表現。全國規模的共產風、浮誇風、高指標、瞎指揮、強迫命令、打罵成風……興妖作怪，興風作浪，刮得神州大地天昏地暗，日月無光，哀鴻鳴天，餓殍遍



野（實際上不全是“遍野”，因為不準離家，所以絕大部分是餓死“在家”）。而所謂“淋瀝盡致”，是因為都是上面壓下來的，全是正帥和副帥壓下來的，所以下面執行得特別凶猛，肆無忌憚，窮凶極惡。而這個“上面”也是明目張膽，毫不掩飾的。不像1957年右派所說：“三害”要從毛主席和黨中央那裏挖。現在不用“挖”了，已成了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着了！正帥和副帥就是“三害”的化身，他們每天一跳八丈高，茲以“趕超”為例以明之：

1958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提出要在15年左右趕上英國，再用20年到30年趕上美國；5月，八大二次會議提出了7年超過英國、16年趕上美國的口號；6月，毛澤東在薄一波的《匯報提綱》上批示：“超過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祇需兩到三年，兩年是有可能的。”9月2日，毛澤東在一封信中說：“為5年接近美國，7年超過美國這個目標而奮鬥吧！”

關於人民公社，1958年8月30日，毛澤東對“一大二公”做了這樣的解釋：“大，就是地大物博，人口衆多，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人多勢衆；公，就是社會主義比合作社多，把資本主義的殘餘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養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實行工資制度，搞農業工廠，破除了資產階級法權制度。”

北戴河會議關於公社的決議說：“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人民公社實行公社所有，統一核算，分配推行供給制，導致窮富隊之間和社員之間的平均主義；把自留地、家庭副業、集體貿易、小商小販統統做為“資本主義尾巴”割掉，公社化運動刮起了“共產風”。（宋連生：《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始末》，頁140）

我再舉副帥的一例：鄧小平麾下之中央書記處屢次磨軍前進，規定高指標的進度。1958年9月5日，中央書記處電話會議強調，北戴河會議確定和下达的鋼鐵工業指標祇能超額完成，不準完不成；不但一噸不能少，少一斤也不行。9月24日，中央書記處又召開電話會，要求要達到日產鋼6萬噸、鐵10萬噸。（同上，頁141。）他們以“一天等於20年”的速度在發瘋發狂。毛陶醉得飄飄然，忘乎所以，並假惺惺地“謙遜”得讓人嘖飯：“如果我們先到共產主義的門口，也先要等一等。等蘇聯趕上來，然後一起進入。如果我們先進去了，對他們不太尊重。”好像歷史的進程如同棋手擺弄棋子那樣隨心所欲。

說“趕超英美”，實際上含有“超蘇”的意思。中共黨內指出的這一點，點明了毛澤東搞大躍進的野心，這就擊中了大躍進的要害，揭示出大躍進的靈魂所在，也明察到大躍進中“共產風”的風源。毛澤東所有的政治行爲，從動機到效果，都是遵循著從形成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到促成毛澤東的一人化專權的路綫。離開毛澤東的這一動機，談什麼：“第一，長期落後挨打的歷史與遭受包圍封鎖的現實，使黨的領導人急于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面貌。第二，過分誇大了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和社會主義制度對生產力發展的促進作用。第三，在缺乏經驗的情況下，不切實際地套用了革命戰爭年代的成功經驗。”（李偉：《“大躍進”的起點與起因》）都是官方口徑下的掩耳盜鈴的手法。和下面的欺人之談如出一轍：“毛澤東一開始提出整風是好心好意，真心誠意，祇因為右派猖狂進攻才急轉彎，起而反右；廬山會議，毛本意要反左，彭德懷的一封信迫使毛改變了主意，總之是要歸罪于右傾機會主義集團的猖狂進攻。”

### （二）反右派與大躍進之浮誇風及其後果的關係

我們再來從後果上考察反右派與大躍進的關係。從這些關係中自然可以暴露出反右派運動的反民主、反民生、反人民、反歷史、反科學的極端反動性。因為從探明反右派的起因，到看清反右派的後果，就能充分地證明他們是倒行逆施的反動派。

首先我要談談“瞎指揮”與反右派的關係。這裏，我不是僅僅指責他們是一群瘋子，一堆傻瓜，一群冥頑不化的家伙，而是如朱正指出的那樣：“大躍進是反右派鬥爭的直接結果。能看出點問題、敢提點批評意見的人這時多已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剝奪了發言權。那些沒有被劃為右派的知識分子和幹部眼看到不久前別人是怎樣成為右派，落到怎樣的境地，當然不敢再多說一句話。土法煉鋼、打麻雀、高產衛星田、吃飯不要錢、對於這些層出不窮的新事物，沒有誰敢說一個不字，大躍進就這樣沒有遇到一點抵抗，開展起來了。”（《反右是流產了的文化大革命》）

我必須指出的是，反右派以後，把知識分子打倒在地，毛胡說什麼“外行領導內行，這是客觀規律”，結果把經濟搞得一塌糊塗，讓李銳先生們無限感嘆：“我們都感覺主席對經濟建設太外行，去年不到前臺來指揮就好了。”（《廬山會議實錄》，頁46）又如在大躍進中號召：不要迷信科學家，不要

怕教授，對科學技術要又信又不信，往往是没有學問的人勝過有學問的人。結果把破除迷信變成了破除科學。

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在講到水利問題時，他專門講了“水利化與外行內行問題”，指出：“外行解決問題來得快，還是內行跟著跑。內行跟外行跑，恐怕是個原則，許多事外行比內行高明”。（李銳《“大躍進”親歷記》頁189）

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又指出，外行領導內行，是一種規律。他說：“右派、中間派說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祇有內行才能領導內行，可不可以這樣說呢？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處於被動地位，大多數共產黨員、工人、農民都不是專家。過去報紙在這個問題上，批駁右派不系統，講得不透。為什麼說外行領導內行是一般規律？因為人人既是內行，又是外行。世界上一萬種行業，一萬門科學技術，每人祇能精通一行一門。一萬行中每人祇精一行，所以說人人是外行。做領導工作，除了本行以外，把其他行摸一摸，熟悉一下，有點常識，是必要的。但是要熟悉得很，成行家，是不可能的。因為有許多工程師、教授看我們不起，我們也覺得自己不行；硬說外行領導內行很難。要有點道理駁他們，我說外行領導內行是一般規律，內行領導外行是很難的。（同上，頁355～356）”

在這個反科學的蠻幹思想指導下，就產生了許多瘋狂的口號：

“無煤也煉焦，無焦也煉鐵”；

“開展小麥雙千斤縣、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積豐產田、萬斤高產豐產田運動”；

“掀起一二五（即日產一萬噸鐵、二萬噸焦、五萬噸礦石、十萬噸煤）運動”；

“兩年內建成一個像樣的共產主義”；

“一天等於二十年，共產主義在眼前”；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

“主觀能動性無限，巧婦能為無米之炊”；

“螞蟻啃骨頭，茶壺煮大牛，沒有機器也造火車頭”；

“共產主義就是一切生活資料歸大堆”；

“共產主義就是吃大鍋飯”；

“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

“公共食堂萬歲”；

“傾家蕩產大搞鋼鐵”；

“全省七天實現煤氣化，三天實現超聲波化”；

“貫徹指示不過夜，推廣經驗不過宿”；

……

據說河南省小麥畝產量放 7,300 多斤的衛星，用的小麥品種是碧瑪一號。而培育這個品種的科學家趙鳳章却說這個品種祇能畝產 400 斤。省長吳芝圃聽說，下令所有農業科學家，扛起鋪蓋卷，統統下放農村，向農民學習去。（這是在勞動教養時，另一位農業科學家右派告訴我的）。這個吳芝圃在反他的上級——中共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右傾機會主義”之後，就取而代之，鄧小平表示支持他，說：“真理在你們這一邊。”（徐明：《吳芝圃與河南大躍進運動》，《二十一世紀》1998 年 8 月號，頁 47。）

其次，談談“浮誇風”與反右派的關係。浮誇就是誇大成績。誇大農業產量，叫做“衛星上天”；誇大鋼鐵產量，叫做“元帥升帳”。據新華社的公開報道，水稻畝產量最高達 130,434 斤 10 兩 4 錢，小麥畝產量最高為 8,585 斤 6 兩，玉米畝產量最高為 35393 斤，其他農作物也都創造出了各自的高產記錄。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衛星”，是由徐水縣人民公社發射的：畝產山藥 120 萬斤，一顆白菜 500 斤，小麥畝產 12 萬斤，皮棉畝產 5,000 斤，全縣平均畝產糧食 2,000 斤。

在《工作方法 60 條》中，毛澤東曾指出：“要使幹部學會善于區別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或者多數指頭和少數指頭……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個別、主流和支流的區別。我們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錯了一定翻跟頭……我們的工作，除非發生了根本路線上的錯誤，成績總是主要的……攻其一點或幾點，盡量誇大，不及其餘，這是一種脫離實際情況的形而上學的方法。1957 年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他們用的就是這種方法……”

在這種觀點指導下，結果就是祇能講成績，不能講缺點和錯誤。誰講缺點和錯誤，就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在“大躍進”中浮誇風猖獗，却受不到抵制，就是這種觀點造成的後果。

在反右鬥爭前，還有人敢對毛提出批評和建議，如張奚若、陳銘樞就曾批評他偏聽偏信、厚今薄古、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迷信將來、鄙視既往；在反右運動後，言者無罪變成“言者有罪”，並且“罪不容誅”。這就造成

再也沒人敢講真話，尤其是不敢講與領導人意見不符的真話。“彭老總不是照樣講真話嗎？”他那一封信是在肯定大躍進的大前提下提的意見。就是說，在講假話的大前提下提的意見。就這也不見容於毛澤東；就這，他後來還得用更大量的假話作違心的檢討。我敢說，共產黨內找不出一個敢講真話的。黨外呢？有，但也不多見，右派女英雄林昭算一個。遍及全國，更多更多的幹部是風馬牛（跟風，拍馬，吹牛）。其中的官僚左派康生、柯慶施、李井泉、吳芝圃等輩，罪惡昭彰，國人皆知；左派知識分子如錢學森之流的投機主義者也是助紂為虐，坑國害民，罪不可恕。

### （三）反右派與大躍進後違法亂紀成風的關係

在反右派鬥爭中，凡是主張依法治國、司法獨立、法律至上的政治家，法學專家，都被劃為右派。在國家機關中，司法系統，法院系統，監督系統中劃的右派最多。法制建設本來就是薄弱環節，現在又遭到嚴重摧殘。毛澤東從此以後，用以黨代政、以黨代法、靠政策治國、運動治國的做法，就成了他實施大權獨攬的基本途徑。

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開的協作區主任會議上，毛澤東說：“法律這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的一套，還是‘馬青天’那一套好，調查研究，就地解決問題；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民法刑法那麼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了；我們各種規章制度，百分之九十是司法局搞的，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護秩序；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開會有他們那一套，我們還是靠我們那一套。”劉少奇插話說：“到底是人治還是法治？看來實際靠人，法律祇能作為辦事的參考。”（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設四十年》，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頁）

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時，毛又說：“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多數人要靠養成習慣。軍隊靠軍法治人治不了，實際上1,400人的大會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開會有他們那一套，我們還是靠我們那一套。”（〔美〕斯圖爾特·施拉姆：《毛澤東的思想》頁181）到了1959年，毛澤東更明確地強調說：“要人治，不要法治。”（張慶福《憲

政論叢》第一卷，頁 11）1959 年廬山會議期間，《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建議加強法制，毛澤東對他說：“你要知道，法制是捆住我們手脚的。”（李世濤：《知識分子立場：激進與保守的激蕩》頁 231）

他還曾直言不諱地說：“我就是秦始皇加馬克思。”（《李銳反“左”文選》頁 7）

1959 年 4 月，毛澤東在八屆七中全會上再次強調權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最終要由他掛帥。這樣，黨對國家和社會各方面的一元化領導體制趨于強化。1957 年 9 月，中共中央在批轉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黨組的報告中提出：“今後在不違背中央政策法令的條件下，地方文教政法部門受命于省、市、自治區黨委和省、市、自治區人民委員會。全部審判活動，都必須堅決服從黨委的領導和監督，黨委有權過問一切案子。凡是黨委規定審批範圍的案件和與兄弟部門意見不一致的案件，都應當在審理後和宣判前，報請黨委審批。任何借口審判‘獨立’，抗拒黨委對具體案件審批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錯誤的，必須堅決給予糾正。”（張晉藩：《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大辭典》頁 298）這個指示，公開正式提出要以黨代法。毛澤東不適當地照樣搬用了大搞群眾運動這個經驗，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加上群眾運動將是萬能的武器。”（胡喬木：《中國為什麼犯 20 年“左”的錯誤》。中共黨史研究，1992，頁 3）

上世紀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就指出：“許多問題的解決，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條文，是誰也不怕的。大字報一貼，群眾一批判，會上一鬥爭，比什麼法律都有效。”（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頁 290）

所以，毛才要在大躍進中，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推翻一切束手束腳的清規戒律，肆無忌憚地破壞法制。

上海郊區各縣遂掀起農業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運動中普遍出現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在一些地方發生了黨員幹部嚴重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有的基層黨員幹部以不給飯吃懲罰沒有完成勞動任務的社員；有的濫扣社員工分；有的批鬥不經常出工的社員；有的甚至私設公堂，拷打群眾。1959 年 1 月，市監委對奉賢縣嚴重違法亂紀案件進行了檢查，這個縣的縣委書記、副書記等人，在人民公社化和農業“大躍進”中，不顧群眾疾苦，提出錯誤口號和措施，強制幹部執行，造成基層幹部發生亂關亂鬥亂

罰、捆綁吊打群眾、燒毀房子、逼死人命等一系列嚴重違法亂紀事件。市委決定開除縣委書記、副書記黨籍，重組縣委領導班子。

1960年12月，市委監委會同市委農委、市委政法部、各縣縣委，對人民公社幹部的作風問題進行了一次普遍檢查。1960年1-11月，各縣發生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案件2,474件，犯錯誤幹部2,964人，占農村幹部總數的2.52%，其中黨員幹部1,783人，占農村黨員總數的2.6%。（《中共上海黨志·檢查和處理違紀案件》）

1959年10月，中共晉中地委委員王之一調任壽陽縣委第一書記。他上任伊始，就主持召開了縣、公社、管理區、生產隊四級幹部擴大會議，大搞“反右傾、鼓幹勁”，並於10月29日和11月16日連續舉辦了基層幹部和縣級黨員幹部整風訓練班，在“反右傾、鼓幹勁”的口號下，不顧實際，對當年糧食生產的計劃產量再次加碼。本來，由于深翻土地攪亂熟土層，又加上旱災，當年的計劃產量15,840萬斤就難以完成。反而向上級謊報，當年實產為22,000萬斤，而最後核實的產量祇有11,900萬斤，僅為上報數的一半。按原計劃全縣當年應交征購任務9,800萬斤，實際完成9363萬斤。這樣，在上交任務後，全縣實際僅留2,537萬斤。按16萬人口計算，人均口糧僅有158斤，還不包括籽種、飼料。由于糧食出現極大虧空，王之一等人把希望寄托在挖糧上，他們懷疑生產隊普遍存在瞞產私分，社員家裏至少隱藏有1,200—1,500萬斤糧食，祇要挖出這兩部分糧食，就可以彌補因謊報產量而出現的虧空。不僅如此，王之一等為了“幹出一番成績來，一鳴驚人，揚名天下”，不顧災後人民的承受能力，以興修水利、大辦工業和城市建設等為由，決定在全縣集資100萬元。結果各級又層層加碼，最後總計集資指標竟高達418.3萬元。羊頭崖公社這年人均收入僅為46元，而集資任務竟每人達到50元。上湖公社收入總計80萬元，而給各村分配的集資任務却高達百萬元之多。于是集資有了新的內容，凡是“糧油草菜蛋、金銀銅鐵錫、磚瓦石頭木”都在可集之列，當然，“現金更得力”，一些生活日用品，如自行車、手表、縫紉機、座鐘、衣物甚至毛巾、肥皂都列入集資的範圍。宗艾村有一戶什麼也拿不出來，祇好把祖墳“獻出”。當時社會上流傳的民諺就說：“無產階級就是一鋪一蓋、一碗一筷，還有身上的穿戴，除此而外，其餘都是禍害。”

這些嚴重脫離實際、嚴重傷害群眾利益的錯誤做法，理所當然地引起了

黨內外幹部群眾的不滿和抵觸。王之一等人拒不接受群眾意見，既不認真調查研究，也不向上級黨委請示匯報，堅持錯誤，獨斷獨行，強行硬派，勒令完成。爲了保證此項工作的“躍進”，以“反右傾，鼓幹勁”爲借口到處插“紅旗”，拔“白旗”，把對他們的命令執行遲緩的人視爲“白旗”，進行批鬥，誰有不同意見，就給誰扣上反對“三面紅旗”的“右傾”帽子。廣大幹部群眾敢怒而不敢言，致使搞浮誇者受到表彰和鼓勵，實事求是者遭到批判和打擊。爲了使這場運動能夠普遍展開，王之一親自上陣，在縣委內部開刀，搞所謂“二張對比”，表揚了積極執行他旨意的書記處書記、宗艾公社黨委書記張俊文，批判了他認爲右傾的另一位書記處書記張存銳和鞏佩璽，批判中採用了推擁和站板凳升級的做法，美其名曰“一看二幫”、“幫助幫助”。這種典型示範很快在全縣推行開來，推人打人之風甚囂塵上，一浪高過一浪。

宗艾公社是縣委書記王之的“點”，是全縣八大公社中搞得最凶的一個公社。他們挖糧集資的花招最多，逼供的刑罰也最殘忍，群眾拿不出所集物資和糧食，公社就派搜索隊強行搜家，翻箱倒櫃，挖地刨牆。有的幹部竟私設公堂，拷打逼要，公社辦公室主任王維就是一例。他把學校一座二層樓上的教室辟爲鬥人場所，此樓被人們視爲是好上難下的“黃鶴樓”，全社的企業幹部和農村主幹，多數在此挨鬥。批鬥中還組織有 130 人的專業隊（打人隊），刑法多達二十餘種，最常用的是“推擁”和“升級”。所謂推擁，就是一群打手圍成一個圈，將“幫助”對象擁在圈內，推過來，推過去，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所謂升級，就是在桌上放張凳子，然後放磚，讓“幫助”對象站上去交待，若交不出東西，就把凳子推倒，將人摔下，有的當場摔死。據統計：該公社在運動期間摔死 4 人，鬥後死亡 24 人，鬥後自殺 19 人，畏鬥自殺 16 人，餓死 24 人，因缺糧造成浮腫便秘死亡 69 人，共計 156 人，占全縣死亡總數的一半。

太安是宗艾公社的重點村，在王維的直接插手下，殺氣騰騰，烏烟瘴氣。全村 952 人中，有 121 被鬥，占成年人的五分之一，致死者達 36 人。該村當年實產糧食 66.7 萬斤，征購任務竟達 74.9 萬斤。對此王維還要再加 40 萬斤。爲了完成任務，王維等人以“抵抗統購統銷”、“對黨欺騙隱瞞”爲借口，對幹部群眾嚴刑拷打，逼要糧食，原任支書被打傷撤職後，指定了打人凶手梁某爲新的支部書記，並和學校教師蘇景雲等人狼狽爲奸，操縱全村



運動，同時還組織起40多人的打人隊。社員趙義元夫婦，被他們捆起來摔打，打壞胳膊，打掉牙齒，口鼻流血，還不罷休，最後被逼上吊自殺。在摔打副隊長張信時，將張幾次高高抬起，摔在地上，又用拳頭猛擊胸部，抓住頭髮在地上猛磕腦袋，張已奄奄一息，還大罵“打死你，哪裏還在乎一半個人”，接著又是一陣腳踢，直至氣絕身亡。蘇景雲還將一個剛滿月的婦女，脫掉衣服拉至院裏挨凍，一個幹部乞求，他竟慘無人道地吼叫：“不怕，凍死我負責。”僅他就親自打過86人，推打後死亡6人，畏鬥投井服毒死亡4人。被指定的新任支書梁某也打過82人。

這年，宗艾公社在凹兒修建一座小型水庫，800多民工都是離家在外，又沒有什麼糧食可挖，但揪鬥打人之風也十分猖獗，被鬥者達121人，致死10人。這個工地上有一個專設的“執法隊”。一次，一個叫張四姐的婦女被摔打後，子宮出血不止，她央求說：“我還有一個吃奶的孩子。”但人稱“母老虎”的執法隊長任XX根本聽不進去，還大喊大叫：“死一個算什麼，死十個也沒人頂。”還有一位五十多歲的勞動標兵王狗小因勞累過度休息時被“母老虎”發現後活活摔死。二十多歲的民工任文厚被摔死後，水庫派人直接將屍體拉到該家墳地埋葬，父母想看上一眼都不允許。

在“挖糧集資”運動中，死人事件接連不斷，縣委書記王之一等置若罔聞，不予制止，却說：“不要大驚小怪”，“死人不可避免”，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聲稱“不能給群眾運動潑冷水”。他們經常在電話中三令五申：必須限期完成任務。所以下邊蠻幹的人氣焰更加囂張。叫嚷什麼“死人算什麼，死是他不願意過社會主義的關，把資產階級思想帶到棺材裏去啦”！

壽陽的“挖糧集資”運動從1959年10月底發動，到1960年1月被中央制止，經歷三個月時間，據運動後統計，全縣283個管理區中，有259個管理區發生違法亂紀，造成人身傷亡，在435個生產隊中，有11,159戶被抄家搜查，24,063戶被集資，3,116人遭到殘酷鬥爭，打死、逼死、嚇死及缺糧餓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數達349人之多。在和平建設時期，在一個縣內，因個別領導的錯誤決策，在短短三個月內，造成如此巨大的人為死亡事件，不僅在全省，就是在全國也是絕無僅有的。（壽陽縣志辦公室郭志珍、武代玲：《1959年壽陽事件》）

### （四）反右派與“大躍進”暢行無阻的關係

雖然大躍進證明了“反右”的荒謬性，但大躍進爲什麼得以暢行無阻？說到底，就是因爲“反右”砸碎了人的脊梁骨，砸碎了民族的英雄主義。全民族原先都崇拜英雄，還敢說“敢把皇帝拉下馬”——海瑞就敢罵皇帝，敢直指皇帝爲昏君。現在呢，都在唾棄英雄，都成了膽小鬼，連大隊書記也不敢罵，更不敢“拉下馬”，祇要黨不點頭，也“拉不下馬”。從而使機會主義發展到無以復加、寡廉鮮耻的境地。

大躍進開始于農業的大躍進。從成立初級合作社，到最後人民公社化，基本上是所向披靡，勢如破竹。雖曾發生過一些零星的抵抗，但都是弱不禁風。這除了是由于共產黨的欺騙宣傳外，還由于農民的力量在于家族；在對抗來自上下左右的壓力時，家族就是他們的靠山。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特別是在土改中鎮壓地主富農之後，農民中的共產黨的走狗……痞子們掌握了大權，家族從觀念上到實際上，遭到沉重打擊，基本上處於土崩瓦解狀態。而共產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如賣餘糧、統購統銷、合作化、公社化，都是與農民的根本利益相違背的。但是，由于痞子們的帶頭擁護，無耻出賣和充當打手，所以造成農民的無力無助，任人欺凌，即便到最後關頭，他們成千上萬地被餓死，也形不成反對的統一力量，甚至于會把最後一口氣變成爲向“大救星”的呼救。

更重要的則是，由于在所謂“舊中國”敢罵政府、罵國民黨、罵國民政府的知識子份，如羅隆基、梁漱冥之流，到了“新中國”，挨了整的想好好改造還來不及，沒有挨過整的，嚇得早已全把自己的嘴巴封得死緊。所以，就是看見了農民的非人痛苦，也沒有人敢說。若是碰上一兩個敢說的，如右派分子羅翼群，就喊出了“農民處於餓死的邊緣”，立即受到受共產黨打擊不說，廣大農民竟對他也是到處“喊打”。結果，便是4,600萬農民，就這樣都被共產黨從“餓死的邊緣”，猛地推下地獄。特別是反右後，右派份子作爲“鷄”被“殺”，那些極少數鬧過事的學生，罷過工的工人，鬧過退社的農民，作爲“猴”，早已被“做”，有的更已經被“殺”，這就造成任何的反抗都不復再現了。于是就祇好由著毛澤東信口雌黃：我們的人民多可愛呀！走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多麼高啊！“我們的人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精神振奮，鬥志昂揚，意氣風發！”

但是，到底人民還是看出了問題。全國的“躍進”典型安徽亳縣，在

1959、1960 兩年中餓死 30% 的人口，兩萬多家庭絕戶，人吃人現象發生於多處，60% 耕畜死亡，房屋倒塌十萬間以上，80% 的林木被砍光。當地民謠唱道：“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員吃人肉。”（《炎黃春秋》2003 年第一期：《亳縣農業“衛星”經驗官修記》）應該說，對反右派與大躍進的關係，這個民謠道出了浸透了血淚的民間理解。反右派時《人民日報》有一篇社論是《工人說話了》，內容作假、荒謬，乃此時言論之共性，不值一駁。我的意思是說，應該以這個民謠為中心思想，再寫一篇反右的社論《農民說話了》。我還可以提供當時一位農民，得知我是右派時說的話：“比作蟲鳥，你們右派對於莊稼人來說，是益蟲益鳥；他們左派是害蟲害鳥。”真是一針見血。

張大軍先生寫的《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餓得啃磚頭——我母親所親歷的河南信陽大饑荒》等等無數揭露農民餓死慘景的文章，都同樣證明了上述的血的真理。這個真理，就是“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員吃人肉”這樣一個因果關係。

還有，就是“政治掛帥”的口號是反右派以後提出來的，用以規定它與業務的關係。但它的真意，却是林彪後來在文革中挑明摺疊的：“政治可以衝擊其它”。政治對毛澤東來說，祇是“抓權”的代名詞。階級鬥爭是他抓權的基本手段與途徑，祇要不抓階級鬥爭，毛便失魂落魄。他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推翻“八大”的決議，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重新確定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毛澤東認為，地主階級已經搞臭了，不占主要位置，不好說是主要矛盾了；經過反右派鬥爭，階級矛盾主要是三千萬資產階級、四千萬小資產階級（富裕中農）和他們的知識份子，這七千萬人是主要矛盾。兩條道路鬥爭指的就是思想上、政治上的鬥爭。毛的這個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後來被寫入了總路線的基本點。

階級鬥爭在大躍進中的表現，主要是運用反右派中的“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為武器，批白專道路、拔白旗、掃暮氣。這時的“四大”不僅僅是污蔑、聲討，而且是文武帶打。例如，“辯論”的本來意思是，平等地有 you 說的，也有我辯的，真理越辯越明。可那時的新式語言是：“辯論辯論他！”就是對沒有完成躍進任務的進行批鬥。如有人說，“煉出的不是鋼，是一堆煤渣”，於是為了掃他的“右傾”或暮氣，就幹脆把他打個鼻

青眼腫，少皮沒毛，然後還要讓他頭頂一塊石頭跪下。爲什麼要這樣做？這是爲了要讓中國人都聽從毛的指鹿爲馬，樹立“正確的個人崇拜”。爲此，中國人付出了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巨大代價。

當四清、文革前後，共產黨讓人民“憶苦思甜”的時候，人們說著說著，就涕淚並流地說到大躍進後大面積餓死人之慘狀，訴起共產黨的苦。而原來却是要他們說“解放”前的苦日子的。凡是經歷過大躍進歲月的人都知道，那些年，基本上是風調雨順，按常理應該是好年樂景，但却發生了全國規模的大饑荒，即便是沒餓死的幸存者，也是都成了《國際歌》中第一句唱詞所說的“饑寒交迫的奴隸”，總體情況比“解放前”的災害年還要苦得多。農民對此會說，說：“那時候，你還有地方去逃活命哇！”

在共產黨統治下的生活，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精神和肉體上遭受慘無人道的折磨……所有被他們說指罵爲如何壞的“敵人”，都要比共產黨好得太多。

鄭義先生《從“環江右派集團”之復滅解讀反右》一文，提供了從反右派到大躍進的這一段歷史的一個很清晰的縮影。有了他的論述，我們就不用再多置一詞了。

有一位受難者是歷史永遠不會遺忘的。他的名字叫王定，是中共廣西環江縣縣委書記兼縣長。

王定青年時代參加共產黨，曾任東山游擊隊副大隊長、桂西北游擊隊副團長，妻子在殘酷的內戰中慘死。他是一個堅定忠誠的共產革命者。中共建政之後，任環江縣（原宜北縣）縣長兼縣委書記。

1956年，強制性的合作化運動席卷中國大地。在“一根牛繩還沒有用斷”的時間裏，環江縣全部高級社化。很快，生產下降、分配不公、分紅不兌現、口糧不夠吃的種種弊端顯現，農民們紛紛要求退社，哪怕不給土地，寧願上山開荒也要單幹。王定遂帶領一批幹部下鄉調查。展現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幅與宣傳機器開足馬力所鼓吹的“大好形勢”完全相反的景象：原來在農民手中生機勃勃的土地荒蕪了，連春種秋收的農時都混亂了——一個生產隊的土地，隊長跑一遍要幾天。山區地塊之小，有一句諺語可證：“螞拐（青蛙）一跳三塊田”，如此分散的土地和農舍，耕作、記工、開會、管理極其困難。王定和他的同事們漸漸發現，農民們已經暗地裏創造了一種對付合作化的辦法：明合暗不合。隊長無法派工、管理，干脆把土地包給了農民，反正最後

納稅交糧。有的地方幹脆秘密分田單幹。回縣後，他總結了合作化的教訓及農民創造的新形式，迅速制定了一個對合作化運動大膽修正的新政策：“包工、包產、包資和超產獎勵”的“三包到戶”。不久，報告得到中共柳州地委的肯定，並批復環江進行試點。

1957年1月16日，《廣西日報》載文對環江縣“包產到戶”的經驗給予肯定。王定不曾料到，由此發端，他竟然成就了一個豐功偉績：在中國當代史上首倡“包產到戶”。從此，這個“包產到戶”的幽靈便如影隨形地困擾著共產主義烏托邦，無論怎樣的高壓，都無法將它從數億農民心中驅走。20年後，最終衝破公有制的禁忌，成為中共用改革開放來救社會主義和自己命的大好政策！

但在那個時候，王定同樣也不曾料到：實事求是的“包產到戶”竟然成為一項嚴重的反黨罪行。

在《廣西日報》肯定“包產到戶”四個月之後，毛澤東力主在全國展開了“整風運動”，公開號召全國民眾“提意見”幫助黨“開門整風”。在廣西省黨代會上，環江縣黨代表王定慷慨陳詞，一口氣向省委提了十條意見，對壓低農民口糧、大量餓死農民、浮誇虛報糧食產量、壓制民間批評、黨內缺乏民主等問題表示了極大的義憤。這個敢說真話的為民請命的發言剛剛結束，全場掌聲雷動，黨代表們紛紛圍攏來和王定握手：老王啊，你說出了我們想說而不敢說的真話、心裏話！

不久之後，翻手為雲復手為雨的毛澤東一百八十度大轉彎，開始了聲勢浩大的反右運動。響應號召而說了真話的王定，成了廣西的典型。

省委某書記說：“不過是一個小小縣委書記就敢提出‘包產到戶’，查一查是不是右派！”

地委書記定性道：“王定搞‘三包到戶’，是廣西的納吉（匈牙利事件領袖）。”

對王定的迫害轉移到黨代會的發言。但王定毫不認帳：“省委領導動員大家發言，號召整黨，把問題擺到桌面上……在黨的會議上行使黨章規定的批評的權利，我錯在哪裏？”

但毛澤東的“陽謀”已經展開，一切膽敢說真話的人都在劫難逃。王定遂被打成“環江右派集團”的頭目，追隨他首倡“包產到戶”的副書記、部長、區委書記們也紛紛被打成右派。

## 還原 1957

---

以王定爲首的“環江右派集團”遭到了徹底復滅。障礙一經鏟除，環江縣果然意氣風發地邁入了“大躍進”的偉大時代！王定的繼任者也創造了一個全國乃至世界第一：水稻單產最高紀錄：畝產 13 萬斤！

1958 年 9 月 9 日上午，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的一塊 1.13 畝的中稻“衛星田”即將驗收，各級黨政要員、農業專家和奉命到場助興的百姓共 6,000 餘人圍聚在那塊馬蹄形的稻田周圍，猜測著它的產量。然而大家更感興趣的還是禾苗的密度，有人問社幹部李鈺金同志這塊田有多密？她的回答是請大家坐到上面去試一試。於是，自治區林墾廳陳副廳長、民政廳張副廳長、民族事務委員會秦副主任和兩個社的幹部，先後坐上禾面；六、七個人已經够重了，可是七、八個電影攝影師和攝影記者爲了搶上這個動人的鏡頭，也紛紛踏上禾面，但是這十幾個人的重量，並沒有給禾苗帶來多大影響。”（高產頌《廣西日報》1958 年 9 月 12 日）

偉大的時刻到了。祇見旗門開處，閃出一位北方大漢，威風凜凜。他就是王定的繼任者，中共環江縣委第一書記洪華。洪華躊躇滿志地將系著紅綢的鐮刀授給領導開鐮的一位縣委幹部，四百名社員手執鐮刀衝進那塊懸旗結彩的稻田。緊張收打近十二個小時之後，產量出來了：1,075 畝（尚有 0.055 畝留作參觀）中稻田，收獲稻谷 142,174 斤，折算畝產 134,340 斤 10 兩 4 錢！——一個改寫了人類稻作歷史的紀錄誕生了！參加驗收的科學院院長、作物栽培學教授、遺傳選種學教授和水稻專家瞠目結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9 月 12 日，《廣西日報》以整版篇幅報導，社論的通欄大標題爲《環江創全國水稻豐產最高紀錄》，號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鼓吹“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祇要我們站得高，看得遠，敢于理想，勇于實踐，糧食增產的前景是廣闊無垠的，增產的潛力是永遠不會枯竭的”。

正在勞改的右派頭子王定對這顆特大“人造衛星”死不相信，于是被鬥爭一氣。他和另一位因不信畝產 5,000 斤而被打成右派遣返原籍勞改的大學生一起估算了一番：畝產 13 萬斤，鋪在地上該是……

餓死人之後，謎底才被揭穿：關鍵的是移苗，在收割前 38 天，出動 800 多人，把附近幾個大隊 140 多畝好田裏即將成熟的禾苗連根帶土移進“衛星田”，密到沒有行距株距，無法通風透光而萎黃。于是用鼓風機日夜不停地送風降溫，並打樁拉繩，以經緯密集的繩索將禾苗扶直，防止倒伏。盡管如此，據事後人們考證，那塊“馬蹄形”不過畝產 26,000 千餘斤，離 130,000

斤還差得很遠。謎底最重要的部分是過磅：過磅前安排挑糧隊進城誇功游行，其路線途經四個生產隊倉庫，早已安排好的人馬混進挑糧隊，一起到縣委院內的球場上過磅上賬。但四個倉庫的糧祇有 6,700 多斤，還不够，就把已經上了賬的糧食趁混亂再過一次磅。

環江成了全國聞名的紅旗縣。洪華成了“大躍進”時代的大英雄。在中共柳州地委的三級幹部會議上，洪華披紅掛彩，上臺接受了一面數丈之長的特大紅旗。紅旗到縣那天，鑼鼓喧天，人潮旗海，事先安排好的八個大漢把洪華抬起，一直抬進縣委大院。歡迎的人群向洪華和大紅旗拋撒五色花瓣，陶醉在“環江奇迹”之中，誰也沒有料到，今天迎紅旗，抬洪華，明天就要餓肚皮，抬死尸。

那位首創“包產到戶”的王定，正在勞改農場裏掙扎于死亡線上。幸好場長是昔日戰友，囑令勞改隊長說：“王定是為人民犯錯誤的，你要保證他活著進來，活著出去！”王定這才奇迹般的活下來。可怕的是，有關餓死人的消息不斷傳進勞改隊，不久，“殺牛犯”們也不斷押進勞改隊——大批餓死人之際，百姓們央求隊長殺牛救命。但牛是人民公社的，任何情況下殺牛都是破壞生產的犯法行為。往往是百姓們跪地求救，並全村具保，承擔責任，一定不讓隊長進監獄。許多生產隊長祇好冒險殺牛救命，然後被抓進勞改農場。僅鹿寨縣石榴河農場便進來一百七十多個“殺牛犯”，其中生產隊長一百五十多。

在那場人為的大饑饉中，環江縣 16 萬人口餓死 4 萬，整整四分之一！

其原因概出于浮誇虛報而引起的高征購。請看 1958 年的幾組數字：

廣西全區上報糧食總產 229 億斤，而實際產糧 117 億斤，謊報二倍；

柳州地區上報 55 億斤，實際祇有 16.9 億斤，謊報三倍多；

環江縣上報 3.3 億斤，實際不過 1.05 億斤，謊報三倍多；

浮誇虛報必然引來高征購。放了那麼多“糧食衛星”，不正是為了邀功嗎？

于是，廣西自治區給柳州地區下達了 8.6 億斤的征購任務，比上年實際徵糧數增加 2.14 倍；

柳州地區給環江縣下達了 0.71 億斤任務，比上年實際徵糧數猛增 4.8 倍！

雖然環江最後祇交了 0.268 億斤，還是造成了餓殍遍野的慘劇。

為了完成征購任務，洪華便橫下心來勒索農民本來就不多的口糧，一個極為殘忍的“反瞞產”運動開始了。批判、鬥爭、掘地三尺……至 1959 年 2 月，

環江存糧告罄，開始斷糧、死人！

此時，全國都在死人。中共“鄭州會議”試圖扭轉危局，糧食開始緊急返銷農村，環江也得到 100 萬多斤返銷糧，嚴重的局勢稍有緩和。本來，區區一百萬斤糧食，全縣 16 萬人口，人均不過 7、8 斤，不過杯水車薪。但緊接著一個晴天霹靂自九霄之上炸響：廬山會議扭轉方向，開始“反右傾”！會議還未結束，柳州地委便連夜召開電話會議，向每一位縣委書記先行“吹風”。得了風氣之先的洪華立即在環江掀起了更為猛烈的“反瞞產”運動。洪華爲了在“反右傾”運動中再扛大紅旗，把刀架在百姓脖子上逼糧食。最後全縣口糧僅留下 0.31 億斤，16 萬人口，每天人均口糧 0.5 斤以下；30 萬畝耕地的種子和近 10 萬頭豬、牛的精飼料，僅留了正常年景的 45.5%。洪華高舉“反右傾”的大旗，對基層幹部殘酷逼糧，城關公社陳雙大隊是洪華挖後手糧的試點。他把大小隊幹部、黨團員、積極分子集中到大隊“核產”，以鬥爭、“小勞改”、輔以“饑餓療法”，連打帶餓，死了 13 人。洪華滿不在乎，說“這些人是社會主義逃兵，鬥死幾個不要緊。”

洪華命令全縣封倉。幹部膽敢開倉，一律開除黨籍。群眾膽敢偷糧，一律開槍打死。龍岩公社有個幹部抓到一個偷糧的小學生，竟將他按到偷糧處開槍射擊。槍不響，硬是換了三次子彈，扣了八次扳機，才把這個年僅十二歲的孩子打成重傷，三天後死去。全縣因偷糧被打死的有數十人之多。據事後統計，當時刑法計有六十餘種之多，鐵絲穿手和坐水牢都使上了。

當大批死人開始之後，洪華要求“一定要以鮮明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觀點來觀察、分析和解決問題，辯明是非，識別真偽，這樣才不爲假象所迷惑。”還若無其事地說：“死幾個人值得什麼大驚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這是自然規律。”

走投無路的饑民開始逃荒。環江縣委不僅不開倉放糧，救民于水火，反而動用公安和民政部門四處追捕。

餓死的人也有罪：洪華祇要見到死人就大罵。死在縣城中心的，罵：“大年初一來這裏死，他媽的，死也不會找對地方，偏偏來人多的地方死，真是歪風邪氣上升！是不是有政治問題，想擴大影響？要查查他的出身成分看！”看到有人死在街上，他罵“以後有病的人不準出來！”死到無人埋尸時，他還罵：“現在死人不埋，是一股妖風，是富裕農民不滿的表現！”

這個以說謊爲生吃人不吐骨頭的惡魔，在餓死 4 萬人民之後，仍然榮升



柳州地委書記處書記。1961年春，才被當做替罪羊清除出黨，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二十年後，柳州地委竟然本著“處理歷史遺留問題”應“宜粗不宜細”的原則，貫徹“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方針，復查洪華案件，最後發文“撤銷原判；黨內給予撤銷職務，恢復其黨籍，按一般縣級幹部待遇。”

靠謊言起家的洪華光榮平反，而敢說真話的王定却歷盡坎坷。因為反右運動是鄧小平指揮的，不能否定，他得到的不過是“改正”右派。他想到地區信訪部門工作，為至今還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們申冤雪恥，但黨不放心。他想下縣做實際工作，黨不願他官復原職，也不放心。到地區工作吧，怕影響不好，還是不放心。最後干脆打發到農村去當校長。

王定不甘就此沉默，將他半生對“環江慘案”的思考寫成文章投寄報章，但無人敢於發表。但這些用人民鮮血和死亡寫成的文字是不應當永遠被埋沒的：

有史記載中，有哪一次瘟疫致死的有如此之衆？！古今中外諸國，又有哪個殘暴的君王，能在一次屠殺中把自己屬下的人民斃殺如此之多，如此之慘？！

國家的刑法規定，殺死一個公民的凶犯，往往要被判死刑的。然而，說也奇怪，如果當官的假報產量，把農民的口糧作為增產糧強行搜刮去，將成千成萬的農民餓死了，是不會償命的，而且還發明更高級的假話“三年自然災害”之類，作為擋箭牌。

大講假話，大幹假事的頭目們，大都成了大躍進的幹將，個個升官晉爵，至今有的當了省級要員，有的當上地、專領導，名利雙收，出入轎車，錦衣玉食，威風抖抖，眩人眼目。而說真話、做實事的一些幹部們，則被打成右派、反黨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削官、坐牢、開除黨籍，株連親友妻兒，甚至整死，給人們的印象，倒是不寒而栗，令人駭怕。這豈不是與報上的社論相反，成了說真話者戒了！

反右運動可以從多種角度加以反思，王定根據自己的經歷和直覺，選擇的角度是“謊言”。這無疑是極深刻的。

### （五）反右派制造了一個可怕的“謊言中國”

從“環江慘案”裏，我們可以看出，反右運動是一條明顯的分界綫。在此之前，關心民間疾苦的王定尚可以說真話，也還有人支持他說真話。但是，

在最高統治者言而無信，把自己親自倡導，並發誓“言者無罪”的整風運動定性為“向黨進攻”，而且殘酷鎮壓之後，事情發生了帶有根本性的變化。如果說，在此之前，尚未大規模地因言“殺人”，謊言世界尚未達到明目張膽、指鹿為馬之囂張，那麼，在獨裁者赤裸裸自食其言，甚至公然無耻到自稱“引蛇出洞”之後，中國已再無一句真話存在的餘地！上百萬右派的可怕下場，向全體民眾明確地宣示了一條前所未有的禁忌：說真話者殺。從那時起，中國變成了一個謊言的國度。在中國，不說慌話一天也活不下去，沒有一個人能例外。人為饑饉要說成自然災害，倒行逆施要說成英明決策，被迫害致死要說成“非正常死亡”，內政困難要說成“帝修反”聯合反華，經濟崩潰要說成“形勢大好”，國際孤立要說成“我們的朋友遍天下”，饑寒交迫要說成幸福生活，赤裸裸的專政要說成“最大的民主”，專政無產階級要說成無產階級專政，減產要說成增產，享有自身權利要說成“黨的關懷培養”，心懷不滿要說成“心情舒暢”，反對要說成“擁護”，政策失誤要說成“交學費”，好人要說成“壞人”，極權要說成“共和”，政治反對派要說成反革命……在數十年如一日的謊言塑造下，我們先是反感，然後麻木，最後說謊而不自知，說謊成為習慣，成為深入肉血的集體無意識。其結果是，我們所有的謊言最終都反過來成為加諸我們的鎖鏈，成為我們所有災難的根源。

反右運動的直接後果是數十萬知識分子橫遭迫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但是事情並未到此為止。反右運動所確立的不準說真話的特大禁忌，不僅造成了普遍的道德淪喪，而且迫使我們一次又一次付出慘重代價。付出這種代價的不僅僅有數十萬知識份子，還有上百萬黨內較為正直之士和全體人民，特別還有農民。幾千萬條餓死者的生命，更是“反右運動”血淋淋的祭品。然後是四清、文革、一打三反、清理階級隊伍、鎮壓民主牆……直到最近的六四屠殺。可以說，中共的專制統治，離開了謊言一天也存在不下去。如果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從自己作起，即使不敢說真話，但至少決不說謊話，都不在會議、電視、廣播、報紙上附和謊言，請想像一下，這將是怎樣的景象！

社會性的集體說謊，是四十年前那場反右運動留給我們民族的最深刻的創傷。人人講真話，反對生活在謊言中，應該是對受難者最好的紀念和對極權政治根本性的顛復。

## 二、對比反右派與反右傾

整個大躍進，是毛澤東在浸透着百萬右派血淚的中華大地上，用以農民為主體的全民的赤血白骨堆起一座標志着個人野心的“豐碑”。反右傾則是毛澤東不承認大躍進的失敗，在廬山舉起屠刀，從彭黃張周開刀，殺向那說穿“皇帝光着身子”的300多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然後自欺欺人地宣稱大躍進取得了舉世罕見的“偉大成績”；接着又是一意孤行，“反右傾，鼓幹勁，繼續躍進”，使中國人民承受累累的惡果。當時留下的民謠為證：“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產黨說假話”；“奪高產，放‘衛星’，餓死的社員填滿坑”；“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員吃人肉”；總路綫成了腫路綫，全民皆浮腫，連紅太陽都浮腫了……“打腫臉，充胖子”，便成了大躍進惟妙惟肖的象徵。

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就是對廬山這場腥風血雨的見證，就是對這段歷史的“實錄”。（後面除特別標示外，都引自該書，祇標明頁數）

該《實錄》中，對反右傾與反右派相提並論的地方，達三、四十處之多，如，在該書的第2頁上就指出：“他（毛澤東）還認為反冒進使右派鑽了空子”。而毛在廬山的每次講話，幾乎都要掛上一筆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作為陪綁，一則用以說明過去反右派的必要性，再則是用過去殺死的右派之“鷄”，做今日仍存活的右傾之“猴”。我們從中就可以察覺到兩個運動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系。

我的論述，將以《實錄》作為論綱，側重于談反右傾，並在此基礎上與反右派做比較，以期呈現其相關性與相似性，進而洞察歷史事件的本質聯系，即規律性。

### （一）兩個運動起因的同質性

毛澤東說：“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好不好？有沒有成績？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右派否定人民事業的成績。這是第一條。第二條，走哪一個方向呢？走這邊就是社會主義，走那邊就是資本主義。右派就是要倒轉這個方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第三條，要搞社會主義，誰人來領導？是共產黨領導，還是那些資產階級右派來領導？右派說不要共產黨領導。我看這一回是一次大辯論，就是在這三個問題上的大辯論。”（《毛澤東選集》

第五卷，頁 443）

“這三個問題上的大辯論”，套在反右傾運動上就是：

第一條，大躍進好不好？有沒有成績？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彭德懷、張聞天等說的“有失有得，得不償失”，還是毛澤東說的“得多于失，失少得大”？（頁 216）

毛澤東對《李雲仲的意見書》批示說：他“認為從 1958 年第四季度以來，黨的工作中，缺點錯誤是主流，因此作出結論說，黨犯了‘左傾冒險主義’，機會主義的錯誤。而其根源則是在 1957 年整風反右的鬥爭中沒有‘同時’反對左傾冒險主義的危險。”“他幾乎否定一切。他認為幾千萬人上陣大煉鋼鐵，損失極大，而毫無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錯誤的。對基本建設極為悲觀。對農業他提到水利，認為黨的‘左傾冒險主義，機會主義’錯誤，是由大辦水利引起的，他對前冬去春幾億農民在黨的領導下大辦水利，沒有好評。他是一個得不償失論者，有些地方簡直是‘有失無得’論”。（頁 63）

林彪批彭德懷說：他還說“有失有得”，哪裏是有失有得呢？他說的其實主要是失。我們說主要是得，部分損失。所以他這樣倒過來說，是有文章的。（頁 279）

毛澤東說對《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如何正確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一書的批語說：“但是據說你們都是頭號的馬列主義者，善于總結經驗，多講缺點，少講成績，總路線是要修改的，大躍進得不償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都不過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的表現。”（頁 27）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公報》說：“他們對於在黨的領導下，幾億勞動人民轟轟烈烈地進行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污蔑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運動’，這是完全錯誤的，他們看不見黨領導下的一切人民事業，成績是主要的，而錯誤缺點則是第二位的，不過是十個指頭中的一個指頭而已。”（頁 353）

不少工程師說：“煉鋼損失了 23 億，這筆錢可以建設幾個鞍鋼。”“如果拿這筆錢向外國買鋼，能把全世界年產鋼都買來。”一機部的工程師說：“去年接近了精神第一性，有人說產量可以翻一番，兩番，甚至七番，八番，祇要群眾說行，群眾是多數，你說不行也不行，走群眾路線的結果走錯了。去年發生的錯誤，沒有經驗是一半，另一半是思想問題，有些人不懂裝懂。”輕工業部副部長王新元說：“不說真話，怕說真話，都是怕戴帽子。”章伯鈞，

羅隆基，龍雲等，發表了許多尖銳的，諷刺的意見，即許多“右派反動言論”。章伯鈞說，58年搞錯了，煉鋼失敗了，食堂辦不起來了，大辦水利是瞎來。羅隆基說，物質供應緊張是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的。私營工商業改造有毛病。現在人民怨憤已達極點。共產黨說唯物，實際上最唯心。龍雲說，解放後祇是整人，人心喪盡。內政還不如臺灣。全國幹部數量，比蔣介石時代成百倍增加。陳銘樞說，供求相差驚人，幾年之內也難恢復正常供應。要是過去發生這種情況，早就該“下詔引咎”了。他們實行的不是列寧主義，而是斯大林主義。于學忠說，共產黨的政策或冷或熱，大躍進的成績全是假話。天安門的工程，像秦始皇修萬里長城。”（頁59-60）

廣州軍區據42軍政治部報告，“少數團營幹部對經濟生活有抵觸情緒”。他們認為，“去年不僅是工作方法上有問題，而是帶有路綫性質的問題，中央要負責任。”在少數連排幹部中，也有類似情況，有位排長聽戰士唱《社會主義好》（是頌揚“反右派”的歌）這支歌時，不耐煩地說：“算了，不要唱了，我看這支歌非改不可。”海南軍區一個指導員說：“什麼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我看社會主義建設倒是一年不如一年！”有位排長講怪話：“在公社勞動，還不如給地主幹活，給地主幹活有飯吃，還給錢。”講這些話的人，都有名有姓有職稱。匯報材料中說，這些人“政治上一貫落後”，“有一人是反右派鬥爭時的重點批判對象。”（頁57-58）

長沙一個郊區公社的調查報告：“目前農村中（閑話）較多的是哪些人？”說主要是一些新、老上中農，對“拉平”意見多，要算帳；沒錢用，嫌工資少；懷疑大躍進成績，真正反對我們的是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毛）8月6日的批語說：“這同目前在廬山講閑話較多的人們是有聯系的。”（頁269）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7,23”和“7,26”講話中說：“現在黨內外都在刮風。右派講，秦始皇為什麼倒臺？就是因為修長城。現在我們修天安門，一塌糊塗，要垮臺了。黨內這一部分意見我還沒有看完，集中表現在江西黨校的反應，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論都出來了。江西黨校是黨內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動搖分子。他們看得不完全，有火氣……例如廣東軍區的材料，也認為一塌糊塗。這些話都是會外講的話，我們這一回是會內會外結合，可惜廬山地方太小，不能都請來。像江西黨校的人、羅隆基、陳銘樞、都請來。”（頁165）

就在張聞天將要發言的早晨，得悉風聲已緊的胡喬木，打電話關照，要

他少講些缺點，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煉鋼和得不償失的問題。可是，作為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張聞天以鮮明的態度、科學的語言，冒險犯難，極言直諫，完全支持已遭非難的《議定記錄》稿和彭德懷的信，作了長達三個小時的發言。後來批鬥他時，說他的發言對彭德懷的信作了“全面系統的發揮”，是“進攻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反黨綱領”。小組會的發言，《簡報》一般祇刊要點。這個“副帥”的《發言》，記錄稿就全文印發下來。批判時，有人讓秘書作了統計：全文8千多字，而講成績祇有270餘字。用了39個“但”字（“‘但’字以前虛晃一槍，以後便大做缺點的文章”），13個“比例失調”，12個“生產緊張”，108個“很大損失”（或損失），以及“太高”、“太急”、“太快”、“太多”等一大批“太”字。（頁157）

《發言》指出：比例失調是指標過高，求成過急；“共產風”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勞分配兩個問題；浮誇風和強迫命令是不允許講話，不允許懷疑所致，否則就扣“懷疑派”，“觀潮派”等帽子。將計就計缺點還應講具體後果，這樣才能取得經驗，針對後果提出糾正辦法。如鋼鐵指標過高，其他指標也被迫跟着上，造成全面緊張和比例失調；基建戰綫太長，“三邊”（邊勘測，邊設計，邊施工）做法，浪費太大，工程質量也太差；新增工人太多，招兩千多萬，人浮于事；企業產品不成套，任務朝令夕改，不能實現價值；原材料缺乏，經常停工待料；產品質量下降，技術水平下降，不注意設備維修，等等。從而造成大量資金和物質浪費，積壓，市場供應緊張，物質儲備減少，財政節餘用光，外貿出口不能完成，等等惡果。“全民煉鋼”不單賠了50個億，最大問題還在9000萬人盲目上山，使農業生產受到損失，豐產也不能豐收。去年什麼事都提倡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寫詩”，搞得老百姓不勝其煩。（頁158）“主席常說，要敢于提意見，要捨得一身刮，不怕殺頭等等。這是對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殺頭還不行。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所以問題的另一面，是要領導上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使下面敢于發表不同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能够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面。”（頁162）

問題在于，這些話是不是實事求是？是不是真知灼見？和1957年的右派言論一樣，這些1959年的右傾言論，也都是濟世良言。可惜他們都遭受了滅頂之災！你可以不怕殺頭，或怕殺頭而緘口不言——這就是毛澤東給你的自由。但你可不能妨礙他“殺頭”的自由。從個性上說，他是鐵石心腸，嗜殺

有癖；從政治上說，“肉體消滅”是他對待異己，對待異議的得力手段。這就是他總是親自下達殺人批量、殺人數字、殺人指標的根由。古今中外，殺人之多，無如毛澤東者。周恩來了解這一點非常透徹，他深知毛是個食肉動物，所以他在毛面前就像是老鼠見了貓，總是顫抖着忍忍忍：對，也忍；錯，也忍；忍至“忍無可忍”時，平平氣重新再忍。即便是這樣，他也仍未能逃脫毛利用癌細胞置他于死地的最終命運。（《晚年周恩來》）

毛澤東不僅大會批、小會鬥了張聞天，還給他寫了一封尖刻嘲諷，耍盡無賴的信；之所以稱他“無賴”，茲舉一例以明之：他不用他“倡導”的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指明人家哪裏說得對，哪裏說得錯，而是胡攪蠻纏什麼：“你這次安的是什麼主意？那樣四面八方，勤勞艱苦，找出了那些漆黑一團的材料。真是好寶貝！你是不是跑到東海龍王敖廣那裏取來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覽，盡是假的。”（頁267）說這樣下三賴都羞于啓齒的話，一般人都會感到有失身份，更何況是領袖對自己的高級幹部呢？

毛澤東對大會還說了如下的話：他們還不是右派……他們重復了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錯誤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祇差30公里了。現在他們這種論調，右派歡迎。（頁171-172）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科學院昌黎調查組，說食堂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頁173）我們不怕右派猖狂進攻，却怕這些同志的搖擺。（頁197）

我劃右派後，下放農村（包括在農場勞動教養）20多年，似乎是證實了一句諺語：“要知朝綱事，鄉下問農民”。農民把毛“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比喻，用來戲說毛本人：“毛主席的十個心眼九個好，祇有蓋在上面的一個心眼歪，所以，每逢一遇事，上前總是用上面的那一個，蓋在下面的九個總也用不到。”至于對毛說的成績是主要的，是基本的。農民的戲謔，簡直是“謔而虐”，庸俗之至了：“成績是雞巴（基本）上的，蛋（但）有缺點，是屎尿（必然）的。”

第二條，“走哪個方向？”右派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右傾也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說：“他們本質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參加我們黨的一部分資產階級革命家的代表。”（頁357）毛澤東說：“現在黨內外出現了一種新的事物，就是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這表現在此次會議印發各同志的許多材料上。這種情況遠沒有達到1957年黨內外

右派猖狂進攻那種程度，但是苗頭和趨勢已經很顯著，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了。這種情況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頁 196）

林彪說：“無論從他（彭德懷）的思想意識上，思想方法上，還是政治綱領上，都有另外的一套，而這一套是隱藏着的，沒有暴露的。他的世界觀就是一種經驗主義的世界觀，狹隘的經驗論的世界觀。經驗主義表現的另外的一種形態，就是實用主義。少奇也講他有另一套綱領，另一套作法。社會主義他是幹的，革命也是幹的，但是他有另外一套。共產黨他也是要搞的，但他是家長式的黨。他要用自己的面貌來改造黨。他自己的面貌是資產階級體系的反映，是要用資產階級思想體系來改造我們的黨，改造黨的路綫，改造黨的作風。”（頁 281-282）

第三條，“誰人來領導？”在 8 月 16 日通過全會公報和兩個決議的會上，毛作了長篇講話，其中說道：“在王明毛澤東之間，彭大約會投我的票；如果彭德懷跟毛澤東較量呢，就會覺得與其是你，不如是我了。”（頁 350）

《決議》指出：“黨的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勝利，雖然注定了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的最後滅亡，在這樣的條件下，彭德懷同志為首的高崗集團殘餘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就迫不及待，利用他們認為‘有利’的時機興風作浪，出來反對黨的總路綫、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反對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頁 358）

毛澤東指斥彭德懷：“講‘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你主要是向着中央領導機關，並非向省，更不是向群眾。這是我的觀察……鋒芒是攻擊中央。你不承認，也可能承認。我們認為你是反中央，信是準備發表的，以爭取群眾，組織隊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黨和世界。”（頁 236）“去年八大二次黨代會講過，準備對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頁 237）“你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照信的後一部分講，領導與黨就不行了，你要打無產階級的旗幟。”（頁 240）“而且（說我）‘有些像鐵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講話了，祇有你們的領袖才有講話的資格，簡直黑暗極了，似乎祇有你們出來才能收拾時局似的，如此等等，這是你們的連珠炮，把個廬山幾乎轟掉了一半。好家伙，你們哪裏肯聽我的那些昏話呢？”（頁 272）

康生說：彭德懷和張聞天“他們的言外之意，是否有改換中央委員會的領導或改換主席之意呢？令人懷疑。”（頁 295）

以上三條是按着毛澤東反右派的思路，分析綜合出來的與反右傾在起因



上具有同質性的幾個焦點。另外，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因素，就是表現在反對個人崇拜上。這一點和反右派所涉及的國際背景是相同的。主要是蘇共20大所帶來的政治風潮：

“周小舟和我（作者李銳）一樣，比較激動。他懷疑主席的這篇（7.23）講話，是否經過常委會討論。按照講話精神發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沒有真正集體領導，祇有個人獨斷專行。這樣，終將導致黨的分裂。我們都同意這種看法。周惠也感到主席對一些問題的決定，反復變化太快。談到斯特朗的談話，當面稱贊主席超過馬恩列斯，而主席沒有答話。感覺多年來的順境，毛主席驕傲起來了。我認為主席確是喜歡高指標的，祇喜歡柯慶施那樣一些吹牛說大話、奉承迎合的人（柯是個手拿大棒，隨時準備整人的人）。”（頁178）

彭德懷說：“第一書記說的算，別人說的不算，不建立集體威信，祇建立個人威信是不對的，是不正常的現象。”還說：“什麼都是第一書記掛帥。”（頁203）

彭德懷在一次中央常委會和赴廬山的火車上，他都談過匈牙利人均每年吃40公斤肉，還出了匈牙利事件。在火車上他還隨意跟人講過這樣的話：要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也會要請紅軍的。（頁126）

彭真批評他，“這次在火車上講匈牙利事變。”毛澤東馬上插話說：“思想之混亂可觀，我們怎能同匈牙利比？”（頁253）周恩來等也這樣說過。但是，“在主席處召開的大區負責人會上，有人說彭德懷就是納吉。”（頁204）既然不能同匈牙利比，那麼，說“彭德懷就是納吉”，這又是同哪個國家相比？這又說明，是誰的“思想之混亂可觀”？

在8月1日的常委會上，毛澤東說彭：“從打擊斯大林後，佩服赫魯曉夫。”

林彪說：“拋掉個人過分自信，拋掉個人英雄主義。祇有毛主席能當大英雄，你我離得很遠，不要打這個主意……這樣大局面，理論知識、精力、威望，祇有毛主席有。”（頁252）

劉少奇接着說：“兩個歌子，反對唱《東方紅》。認為中國也有個人崇拜。中國很需要反對個人崇拜。黨章中毛澤東思想領導一條，七大有，八大沒有。原起草時，就不贊成寫毛澤東思想領導那一條。八大決定不要，又反對。”

彭真說：“反對個人崇拜，有無此想法？你有大功勞。但一切功勞離不開黨和群眾。否則，頂多當個唐生智、程潛。毛澤東的路綫已經得到證明，

基本上已證明路綫的正確，也應服從。”劉少奇彭真一唱一和：“彭的功勞也是來自這條路綫。”（頁 253）

毛澤東說：“共產黨內的分裂派，右得無可再右的那些朋友們，你們聽見炮聲了嗎？打中了你們的要害沒有呢？你們是不願意聽我的話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專橫獨裁’，不給你們‘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錯誤一定要錯到底才知道轉彎’，‘一轉彎就是一百八十度’，‘騙’了你們，把你們‘當作大魚釣出來’……”（頁 272）

在全會閉幕的第二天，還開了一個中央工作會議，劉少奇作了主要發言：

我們中國黨、中國黨中央的領導、毛澤東的領導，是不是最好的領導，最正確的領導？我看是可以這麼說的。

在蘇共 20 大以後，我們黨內也有人要在中國也反對個人崇拜，彭德懷同志是有這個意見的。在西樓開會的時候，幾次提議不要唱《東方紅》，反對喊“毛主席萬歲”，這次又講什麼“斯大林晚年”，什麼沒有“集體領導”，毛主席沒有自我批評，把一切功勞都歸于自己，等等。實際上，20 大以後，他就一貫在中國搞反“個人崇拜”的運動。我想？

我是積極地搞“個人崇拜”的，積極地提高某些個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澤東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黨章上就寫上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這一條。黨要有領袖，領袖就要有威信。劉少奇引用了恩格斯《論權威》的文章，恩格斯說了“革命無疑問就是天下最有權威的東西”，而反對權威的，“要麼是散布糊塗觀念，要麼是背叛無產階級的事業”。

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運動，赫魯曉夫搞這一手，我看也有很多不正確的地方，不應該那樣搞。所以 20 大以後有人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上是對黨、對無產階級事業、對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活動。（頁 359-360）

劉少奇順從毛澤東的意圖，極力頌揚個人崇拜，使毛反右傾的陰謀得逞，這就鑄成了一個自掘墳墓的歷史上的大錯。使得個人崇拜，從延安整風、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直至文化大革命，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達到登峰造極。而這個“自掘”和“他掘”的墳墓，埋葬了從國家主席到平頭百姓，成千上億的生命財產，和留下慘不忍睹的良知廢墟。

## （二）兩個運動過程和手法的相似性

過程與手法是什麼關係呢？前者就是後者的展開式。反右派所施的陰謀詭計，毛澤東的流氓語言叫做“陽謀”，就是“誘敵深入，聚而殲之”。反右傾竟然與之相似到驚人的程度：神仙會相當於大鳴大放；彭德懷的信作為運動的“引信”，相當於那封給盧郁文的匿名信；對於彭黃張周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與章羅聯盟右派集團的劃定與栽贓，也是如出一轍，都是千古奇冤，都是絕對的憑空捏造。當代哲學家郭羅基說：“想來羅隆基也找不到箭了，祇好以手杖作代用品；折杖為誓，決不同章伯鈞聯盟。硬是拉郎配，把這兩個冤家結成‘同盟’，完全是毛澤東一手操辦的。這是毛澤東的軍事原則在政治上的運用，他總是將他所要反對的政敵趕到一起，‘聚而殲之’。在黨內亦然。1959年整‘彭、黃、張、周軍事俱樂部’，1966年抓‘彭、陸、羅、楊反黨集團’，都是這種策略的運用。”（《鄧小平和反右派——兼為章伯鈞、羅隆基翻案》）同時，他不僅都要強迫人家認“罪”，而且要承認四個“有”：“是有目的，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決議》）。而後來的歷史又都被確鑿無疑地證實那所謂的“罪”和四個“有”，乃是毛澤東違背了自己親口吐出的“實事求是”和“不許放屁！”的準則，而作出的血口噴人。至於會上會下呈現的“一犬吠聲，十犬吠影”、“落井下石”、“牆倒眾人推”的政治景觀，那是群眾運動與運動群眾中既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結果，無論在反右派還是在反右傾中，往前推，肅反、反胡風……皆然。

在廬山會議上毛的故伎重演，使我們看到：“似曾相識雁歸來！”著名報人右派分子徐鑄成在《“陽謀”親歷記》中說：“鬥爭的方法，也非常講究‘技巧’。當集中鬥爭章、羅的時候，除積極分子外，已點過名的，也用種種方法威脅鼓勵他們參加批判、揭發，予他們以‘立功贖罪’。這種一步步深入的方法，後來就成為‘文革’時‘揪出、火燒、油煎’直到‘徹底打倒’的藍本。所以，我和巴金同志回憶文革的遭遇時，在好友葉以群被迫害致死後，他也不得不隨眾舉手，高喊‘打倒反黨反社會主義自絕于人民的葉以群。’到後來，他自己也被揪出來了。這個滋味，我在1957年反右派中已嘗够並深有體會的，經常有一把刀架在脖子上，逼你說出‘供詞’，以便他們擴大鬥爭面。”

我在國內，聽到的幾乎是衆口一詞：“廬山會議，毛主席本意是要反左的，

可彭老總的一封信……”這和整風轉向反右，人們的歸因又是何其相似乃爾！

首先我要據理力爭，我把神仙會比作大鳴大放，絕非牽強附會，而是毛澤東本人就是這樣做和這樣說的：“現在黨內外都在刮風。右派講，秦始皇爲什麼倒臺？就是因爲修長城。現在我們修天安門一蹋糊塗，要垮臺了。黨內這一部分意見我還沒有看完，集中表現在江西黨校的反應，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論都出來了。江西黨校是黨內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動搖分子。他們看得不完全，有火氣……例如廣東軍區的材料，也認爲一蹋糊塗。這些話都是會外講的話。我們這一回是會內會外結合，可惜廬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們都請來。像江西黨校的人、羅隆基、陳銘樞，都請來，房子太小嘛！

“不論什麼話都讓講，無非是講得一蹋糊塗。這很好。越講得一蹋糊塗越好，越要聽。‘硬着頭皮頂住’，反右時發明了這個名詞。”（頁 165-166）

這裏再明白不過地把“江西黨校的反應”、“廣東軍區的材料”和羅隆基、陳銘樞的言論，統統一鍋煮，曰：“現在黨內外都在刮風”，“所有右派言論都出來了”。下面，還有幾個懸念：爲什麼還想“把他們都請來”？來幹什麼？我想除了是大鳴大放，不會是別的。再則，爲什麼“越講得一蹋糊塗越好”，越趁你（毛）的心？難道要是不一蹋糊塗，你還會大失所望嗎？在反右之前，你在黨的會議上也是這樣說的。“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得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 355）“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我們越有利益。”（同上，頁 425）“他們越做得不合理，就會越快地把他們拋到過去假合作，假裝接受共產黨領導的反面，讓人民認識他們不過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時他們就會把自己埋葬起來。這有什麼不好呢？”（同上，頁 427）“凡是放得徹底的地方，鬼叫一個時候，事情就更好辦了。”（同上，頁 486）

“1957年，毛澤東談大鳴大放，說鳴放就是放屁，越臭越好。劉少奇後來發揮說，大家都聞到臭味，自然清醒。毛說，反右就是引蛇出洞，不是陰謀是陽謀，有些人三天不打屁股，就翹起尾巴了。劉加以發揮說：‘賤嘛！’劉少奇並說，他本來是反對大鳴大放的，認爲鳴放的後果不可收拾，後來也覺得放屁放得好。”（司馬璐《中共歷史的見證》頁 557）“我在這裏說過，

人家批評起來，就是說火一燒起來，豈不是疼嗎？要硬着頭皮頂住。人這個地方叫頭，頭上有一張皮，叫頭皮。硬着頭皮頂住，就是你批評我，我就硬着頭皮聽，聽一個時期，然後加以分析，加以答復，說得對的就接受，說的不對的加以批評。”這時候毛澤東說的“加以批評”是什麼意思呢？就是這篇在上海幹部會上講話的題目：“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換成在廬山的語境，就是：“打退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現在再來看看，毛要他的狂熱派們“硬着頭皮頂住”，即：“打退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實錄》在“神仙會”一節中寫道：“研究黨史的人，一般以7月23日毛主席講話批彭德懷為界，將廬山會議分成前後兩期，前期是神仙會，後期為反右傾，也有將會議分成三個段落的（各半個月）：7月2日到16日彭德懷信印發，為真正的神仙會；16日到8月1日，從糾‘左’與反右的對立交鋒，突然轉到大反右傾；8月1日前為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2日到16日為八屆八中全會，大批彭黃張周，最後通過保衛黨的總路線和反黨集團的錯誤兩個全會決議。為反右傾主義而奮鬥。”（頁19）這裏最值得引起注意的問題是：作者所說的“真正的神仙會”，是否“真正的神仙會”？

且聽毛澤東說：“一條是要講，一條是要聽人家講。我不忙講，硬着頭皮頂住。我為什麼現在不硬着頭皮頂了呢？頂了20天，快散會了，索性開到月底。”（頁172）讀者：你現在可以從夢中猛醒了！毛澤東“硬着頭皮頂了”幾天？——“頂了20天”。那就是說，從一開始就“頂”的。並不像許多人（包括李銳）講的那樣，7月16日彭德懷的一封信，使毛澤東由反左轉變為反右。如果不看假象看實質，那麼，在廬山，一天也沒有過那個欺世盜名的“真正的神仙會”的生活，有的祇是你美麗的夢幻和毛澤東心裏的“我不忙講，硬着頭皮頂住”。神仙會祇是，也正是相當於反右前的大鳴大放。至於隨後的發展，詳見我寫的《毛澤東“引蛇出洞”考》。這裏就不再重復了。

### （三）兩個運動惡果的遞增性

所謂“惡果的遞增性”，是指社會政治經濟、世道人心，每況愈下，一步比一步壞，壞壞相因，愈演愈烈。其表現，除了發表在上面的“大躍進是反右派運動的第一個惡果”中已表述過的“經濟上大躍退，赤地千裏，餓殍遍野”外，還有如下三個方面的表現：思想上，個人崇拜的惡性發展；政治上，

階級鬥爭的惡性膨脹；道德上，黨性獸性化的惡性發作。

## 1, 思想上, 個人崇拜的惡性發展

中共八大上, 劉少奇作的政治報告和鄧小平作的修改黨章的報告都表明了反對個人崇拜, 加強集體領導的態度, 甚至毛澤東也還假惺惺地說過: “赫魯曉夫同志打開了我們的眼界, 擦亮了我們的眼睛, 增強了我們的視力。他終於把事實真相告訴了我們。我們也要進行改革。”(《赫魯曉夫談毛澤東》)

右派在鳴放中, 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是一致的, 分歧在於一部分認為個人崇拜是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產物, 並且矛頭直指中國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種種惡果; 另一部分則認為中國在這方面尚不嚴重。但是, 祇要你涉及反對個人崇拜這個話題, 就觸動了毛澤東擔心秘密報告會在中國重現這根神經, 最輕微的條件反射也是, 認為你是在指桑罵槐, 是同着和尚罵禿驢。所以, 凡是有反對個人崇拜言論的, 不劃右派就很難了。反右派之後, 毛就正面地提出, 肯定個人崇拜的必要性, 不過這時候對個人崇拜的最高發展, 也祇是要維護毛澤東說的: 從名義上講是“正確的個人崇拜”; “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 不加分析, 盲目服從, 這就不對了。”也就是說, 這個時候提倡的個人崇拜, 表面上還不是無限制的, 而是前面有個限定詞: “正確的”。至於“三忠於, 四無限”, 那是反右傾之後, 60年代才行時的口號。

在廬山會議開始時, 大家都本着對事不對人的公正態度, 但求弄清事情的是非曲直, 總結經驗教訓, 不是跟誰過不去。但毛出於要打擊和打倒“人”的目的, 就提出了“事是人做的, 對事, 也要對人。要劃清界限。問題要講清楚, 不能含糊。”(頁196)

“黨內右派在猖狂進攻!” 毛主席一聲令下: “要劃清界限!”

於是不管過去有沒有表過態, 或講得重、講得輕的, 都起而踴躍發言, 大家直接對着彭德懷、張聞天等開火。(頁202) 所有這些“開火”, 50多年後的現在, 都已經大白於天下: 對事的, 全是是非顛倒; 對人的, 全是人妖顛倒。

——百團大戰是無組織無紀律, 還有人提到會理會議。反對毛主席的軍事指揮問題。

——彭德懷、張聞天、李雲仲等共同特點, 都是說黨內不能講話。

——彭德懷說, 他批評的具體對象是冶金部、農村工作部和宣傳部。這三個部恰恰是主席抓得最多的。張聞天說“好大喜功”, 這指的是誰? 還不

是毛主席。

——猖狂進攻已經到來，不僅是立場問題，動機不是為了黨的利益，而是別有用心，是要在黨內掀起一場鬥爭，反對總路綫，攻擊毛主席。彭、張等看到氣候已經適合，認為抓住了辮子。要向毛主席和中央算帳。

——而且還有個組織問題：此次彭德懷是元帥，張聞天是副帥。一封信、一個發言，都帶有反黨綱領性質。鋒芒指向黨中央和毛主席，是向黨的挑戰書。

——“第一書記說的算，別人說的不算，不建立集體威信，祇建立個人威信是不對的，是不正常的現象。還有‘什麼都是第一書記掛帥’。彭德懷這些話是講毛主席的，他對毛主席攻得厲害。他在小組會上還講過‘脫褲子’，‘要脫大家都脫。’”

——周小舟、周惠的思想與彭德懷是一根紅綫串起來的。有的人還質問周惠：你是擁護總路綫、毛主席，還是擁護周小舟？因為這時人們對周小舟的檢討很不滿意。周惠還為之說了公道話。

——“是否同國際朋友的影響有關係？”“是否到國外取了什麼經回來？”這一類所謂“裏通外國”的問題，也開始有人提了出來。

最為嚴重的是小組會外的種種議論和傳言，“湖南集團”和“軍事俱樂部”的說法傳開了。總之，空氣越來越緊張，人人都在磨拳擦掌，投入戰鬥。（頁 202-204）

所謂的兩個“顛倒”，一個是“是非顛倒”：明明彭德懷作為政治局委員，所提的意見從內容到上書黨主席的方式，全然是正確的；大躍進是錯誤的，確實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不僅是得不償失，而且是一場大災難。但結果呢？不但沒能糾正錯誤，反而是“錯誤的打擊正確的”。讓巨大的錯誤，釀成全民的災難。

“錯誤的打擊正確的”（頁 346），這句話乃是出自毛澤東之口，如果他在說他自己，那就不存在“是非顛倒”了。問題在於，他反而說彭德懷是“錯誤的打擊正確的”。以此一斑，便可窺見“是非顛倒”之全豹。如果僅僅說廬山會議“把正確的說成是錯誤的”，那還不行，必須再補充一句話：“把錯誤的反而被說是成正確的”。這樣才能表明其“顛倒”得非常徹底；同樣的兩句話應該這樣說：“把被打擊的說成了是打擊者，打擊者反被說成是被打擊的。”祇有如此，才能把廬山會議“是非顛倒”的性質說明白、講透徹。

另一個“顛倒”，是“人妖顛倒”。林彪、康生、柯慶施、彭真、甚至

包括劉少奇、周恩來等，都妖魔化彭德懷，向他身上潑脏水，說他是陰謀家、野心家、偽君子、投機分子等等。閒話少說，讓林彪一類哈巴狗靠邊站，由其主子毛澤東親自出馬，來與彭德懷作一比較。試請讀者諸君來做一道選擇題：彭德懷和毛澤東，誰是陰謀家、野心家、偽君子、投機分子？

所有對彭德懷的批判，都沒有指出他說的哪句話與事實相違，哪句話與道理相背，大致都是像彭真這類意見：“信是個綱領，一條路綫，重點在後部分，目標是主席。”（頁 253）林彪說：“他有很清楚的句子：‘計委雖然有安排，但由於各種原因，難於決斷。’這個話就有伏筆。計委之上還有誰呢？領導經濟建設的當然是毛主席，所以他這裏很顯然是影射毛主席。”（頁 279）影射毛主席怎麼啦？問題的關鍵在於，他說的對不對？如果說的不對，不管影射不影射誰，都不對；如果說的對，影射誰也就無所謂了；別說是“影射”，就是“明說”又有何妨？毛不是說：“事是人做的，對事，也要對人。要劃清界限。問題要講清楚，不能含糊。”（頁 196）嗎？可見，事態又有了新的更加惡劣的發展，祇要把問題歸結到“目標是主席”。往下就萬事大吉了，再也不用分青紅皂白了；事態的惡劣在於，對個人崇拜的發展已到“對人，不對事”的高度。祇要對毛的個人崇拜有絲毫不利，你的意見即便是對國家、對人民、甚至對共產黨有百利而無一害，那也是錯誤的，甚或是罪惡的；更有甚者定你為“十惡不赦”。這不是抽象的思辯，而是發表了正確意見的彭德懷的具體遭遇。至此，“對人不對事”就在全國蔚然成風；風吹樹，風滿樓，風起雲湧；直至舉國上下蠻不講理，祇認定：“誰反對某個人，就砸爛他的狗頭！”

### 2, 政治上，階級鬥爭的惡性膨脹

中國經過鎮反、土改對國民黨留下的黨政軍警人員的血腥鎮壓和對地主富農的圖財害命；經過三反五反，對農業手工業和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巧取豪奪，使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農民喪失了經濟手段和獨立人格，祇有服服貼貼，別無出路。再加上接受斯大林的“社會主義越勝利，階級鬥爭越尖銳”的教訓，中共八大決議宣布：現在“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



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頁341）就是說，不再搞大規模的階級鬥爭。毛澤東對此耿耿、頗為不滿。“八大”剛散會兩三天，“國慶節那天在天安門城樓上，毛主席對少奇同志說：八大《決議》關於我國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確。少奇說：‘喲，《決議》已通過公布了，怎麼辦？’當時毛主席祇是提了一下，沒有說要改變或者採取什麼措施，所以中央將八大《決議》等文件照常發出了，事實上也沒辦法改了，來不及了，而且剛剛通過就改也不合適。”（《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夫人王光美訪談錄》<http://book.sina.com.cn>）

但是，毛澤東在1957年2月27日講《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時，甚至直到五一節前夕，在天安門城樓邀集黨外人士座談，邀請他們幫助整風。他還執意騙人地宣稱：過去做的是階級鬥爭，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都是如此，是人與人開戰，人打人，花了幾十年的精力……從共產黨成立起，已有36年，精力都軋在這上面。現在進入另一種戰爭，就是向自然界開戰，要懂得自然科學。不懂怎麼辦，要老老實實學。可能要同過去學習階級鬥爭一樣，需要花幾十年的時間。

經過反右派鬥爭，毛澤東借題發揮，對主要矛盾的看法發生了逆向轉變。毛澤東在1957年7月提出，“單有1956年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並且是不鞏固的”，“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432、425）10月，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他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432、425）達到他從根本上改變“八大”方針的目的。

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說：“當前我國社會存在着兩個剝削階級：一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國民黨殘餘及右派分子；二是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一部分上層小資產階級和農村富裕中農。”這種說法，即便相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說，也是胡說八道。就以我這個教書匠來說吧，難道我的剝削行爲就是在課堂教學時吞吸了國家的粉筆灰嗎？

在毛澤東看來，既然“當前我國社會存在着兩個剝削階級”，他們的反動思想必然要反映到黨內來；雖然經過1957年反右派鬥爭，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受到清算，但他們並沒有從歷史舞臺上消失：通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他們時刻在制造輿論，準備復辟；他們必然要在黨內尋找其代理人。基于這樣的認識，從大躍進運動一發動，毛澤東就把對階級鬥爭的注意力逐漸移向黨內。在運動中開展的“插紅旗，拔白旗”的政治鬥爭，把社會上的種種對黨不滿、同黨內不同意見聯系起來（當時在幾十個省的省級幹部中，都揪出了“反黨集團”和“右派集團”）。（頁 368）

廬山會議的嚴重政治後果，首先表現為“階級鬥爭”理論的升級。毛澤東發動了對彭黃張周等的批判，並對這場錯誤的批判進行了理論概括：“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鬥下去，至少還要鬥 20 年，可能要鬥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舊的社會鬥爭止息了，新的社會鬥爭又起來。”（頁 366）

1962 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他進一步指出，在整個社會主義社會，始終存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路綫的鬥爭。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必須年年講、月月講。1963 年 2 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在總結湖南、河北等地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經驗時，提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他還號召全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自 1957 年之後，把對敵的鬥爭，用于“朋友”，用于人民內部，全黨全國的各項工作從根本指導思想上說均以“階級鬥爭為綱”。廬山會議以後，鬥爭的範圍逐漸以黨內為主，指向“戰友”。“四清運動”中提“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且踢開黨委搞扎根串聯；“四清運動”尚未結束，文化大革命便馬頭接着馬尾，脫繮狂奔而來。

### 3, 道德上，黨性獸性化的惡性發作

毛澤東言而無信，自食其言，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累累重重，比比皆是。就以他號召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來說，是他信誓旦旦，一再強調“言者無罪”，經過千呼萬喚，“黨外朋友”才出來的。可他一翻臉，上百萬人就成了向黨猖狂進攻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而他却厚顏無恥地強詞奪理，說：“資產階級右派”“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他們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毛澤東選集》第 5 卷，有頁 438）先不說他說的“行者”，也祇是男盜女娼式的欲加之罪的說詞；權

且“硬着頭皮”接着往下讀：“另一種右派，有言論，無行動……”（同上）我要責問後來發表過名詩句“不許放屁”的毛大詩人：怎麼“無行動”，不是“行者”，“言者無罪”按說該對他們完全適用，他們也成“另有一種右派”了呢？這不是自打嘴巴嗎？同時也證實，我剛剛說的你“厚顏無耻地強詞奪理”，是實實在在的情況。在反右傾中，這種厚顏無耻，一如既往，甚至變本加厲。跟隨劉少奇參加過廬山會議的王光美回憶說：“後來會議上就開始批判彭老總了，說他是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小集團。因為黃克誠同志（當時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解放軍總參謀長）、張聞天同志（當時擔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周小舟同志（當時擔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支持彭總的意見，所以他們也在被批判之列，說他們是反黨集團的成員。張聞天等同志曾來找少奇同志，說：這些情況我們上山後都給毛主席談過，毛主席還稱贊我們談的好，現在怎麼又批我們呢？少奇不知說什麼好，祇說：‘你們好好聽一聽大家的意見吧！’事實情況是，許多發言並不是討論他們發表的意見，而是算起歷史舊賬來了。”（《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夫人王光美訪談錄》）可見，以“修養”而聞名于世的“少奇”，也是個沒有正義感的偽君子。但主要地講，從這裏你就看出了毛澤東是在搞什麼卑鄙齷齪的鬼名堂！他就是如此地對人對事施展詭計，坑蒙拐騙、陰狠毒辣，無所不用其極。他根本不，因而也把他的黨徒教唆成根本不把人之所以為人的起碼的道德準則放在眼裏！“林彪，陳伯達，柯慶施，康生這類“風馬牛（看“風”駛舵，拍“馬”屁，吹“牛”皮）幹部”（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1037）小人得勢，飛揚跋扈，覆蓋全黨，使毛澤東思想無往不勝。

他們把反右派的手法，變本加厲地用在反右傾上。是非顛倒、人妖顛倒、憑空捏造、落井下石，這便是對會議的寫照。這不禁使參加會議的《實錄》的作者，喟然浩嘆：“我想，這是中央委員會，這是我們黨最高領導層的會，怎麼竟沒有一個人敢于出來講半句公道話呢？”（頁319）我對這一句話作如下解讀：

“怎麼竟沒有一個人敢于出來講半句公道話”？不出來講半句公道話，是由于不敢。為什麼不“敢”？是由于上層領導不講公道話，也不讓下面講。為什麼“我們黨最高領導層”也不敢？這就要歸咎于“我們黨最高領導層”之上的那個最最高領導了。這樣的領袖，這樣的黨，大家都昧着良心，不講公道話的嚴重的後果，就造成全國在反右派後出現的道德沉淪、世風日下、

見死不救、落井下石的黨風、民風，雪上加霜，每況愈下。可是，會場上的實況，並非都如林彪、康生等的血口噴人，張牙舞爪地落井下石，而是還有另一種，是出于“關心”的落井下石：

爲了促動彭作檢討，主席讓聶榮真、葉劍英去進行勸說。7月30日上午，兩位元帥來到彭的住處，在彭德懷後來寫的筆記中，記下了這件事和他自己當時沉痛的心情：“他們來勸我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評不完全合乎事實（爲什麼對不合事實的批評不能進行反批評，而使它首先起碼要合乎事實呢？——紫丹注，下同），祇要于黨于人民總的方面有利（爲什麼不合事實就會對黨和人民總的方面有利呢？如果爲了維護這樣一個黨和人民的利益，就需要歪曲事實，或讓彭元帥把不是事實的東西硬要承認是事實，那麼，這個黨和人民又是什麼玩藝兒呢？），就不要管那些細節（恐怕這要算是鄧小平實用主義的“宜粗不宜細”的先聲！真是居心叵測。），他們說，你不是常講‘一個共產黨員要能任勞任怨，任勞易任怨難’嗎？今天當着自己作檢討時，就要表現任勞任怨的精神。大約談有兩個多小時，最後熱淚盈眶而別，感人至深。我非常感謝他們對我的幫助，決心從嚴檢查自己，但他們走後，我內心還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勞任怨的問題，而是如何處理才會有利于人民和黨。反右傾機會主義的結果，不會停止‘左’傾，而會加深‘左’傾危險，比例失調會更加嚴重，以致影響群眾生產的積極性。我給主席的信不懂事與願違，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這是我的罪惡。”

8月3日在小組會上，聶榮真談到這次勸說時的情況：“我們都提到他的桀傲不馴，劍英同志說，毛澤東同志健在時，你就這樣，將來黨內誰管得了你。劍英同志說時，都激動得掉淚了。”（頁205—206）“說時”，葉元帥“掉淚了”，自然這不會是“惡鬼的眼淚”；但不知，在文革中當“毛澤東同志健在時”，把彭元帥迫害得悲慘致死時，葉元帥是否也“掉淚了”？

可別大意了這位元帥，僅僅是在這次廬山會議上，毛就不止一次表揚他：“那時靠劍英，不要忘記（劍英大功勞）這一條。否則，中央當俘虜。”（頁256）

關於“劍英大功勞”，司馬璐是這樣寫的：

9月9日，右路軍參謀長葉劍英，說是截獲一則電報是張國燾給徐向前和陳昌浩的，電文中說：“望勸毛、周……南下，如他們不聽勸告，應立刻監視其行動，若執迷不悟，堅決北進，則以武力解決之。”這份電報的真實性，

我當面問過張國燾，他說絕無其事，徐向前晚年答復廖蓋隆也說，他絕未見過這份電報。

真實的歷史情況是，當時徐向前、陳昌浩率部進擊鬆潘以北，打開了北進的通路。毛派認為這是一個擺脫張派控制的最好機會，決定逃跑，要逃跑就得有個借口，否則毛派要承擔分裂紅軍的責任，因此葉劍英編造了上述的故事。

毛派逃跑前，毛澤東故意去看了陳昌浩，說了些張國燾的好話，葉劍英也對陳昌浩說：“我們同意南下，但在開拔前部隊需要收割糧食。”以此為借口，使張派放鬆警惕。

9月10日黎明3時，毛派以收割糧食為名逃跑了……張國燾說：毛澤東玩的是“金蟬脫殼”之計……毛派逃跑時，彭德懷臨危受命，擔任陝甘支隊司令員。毛澤東曾有詩贊彭：“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中共歷史的見證》頁509-510）

如果說在這裏我們看到毛澤東玩陰謀詭計是一貫的，那麼，時隔24年，這位一貫昧心以邀功的元帥，在這次掉眼淚中，“劍英大功勞”立得又是何其膈膿尿血啊！

你既然當了共產黨人，又想向上爬，幹這類膈膿尿血的勾當以立功，就成為中共黨員黨性的體現和晉升的必由之路了。再看陶鑄是怎樣勸黃克誠去揭發彭德懷的：

陶鑄8月5日寫給黃克誠的信，勸說他站出來揭發批鬥彭德懷。信中寫道：“德懷同志的錯誤已明若觀火，你為何不斷然站出來與之劃清界綫，幫助德懷同志挖掘思想，切實認識錯誤，改正錯誤！我以為這種幫助即使你與德懷同志友誼決裂，也並不表示你對德懷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愛人以德’，真正站在黨的立場上給他以同志式的幫助。你我都讀過一點所謂古聖賢之書，一個人立身于世，不講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們作為一個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一樣，一定要‘從一而終’，決不可‘移情別戀’，否則便不能稱為‘貞節’之婦。”接着，《實錄》作者李銳先生評說道：“這種要有封建道德所要求于婦女貞節般的政治操守，當時確是絕大多數人的共同心態！為保衛毛澤東主席、黨中央，什麼事不能做呢？”（頁300）可惜這位“舊社會”的“女人”，“‘貞節’之婦”陶鑄小姐（當然非一人也，乃比比皆是也），“嫁了”一位“移情別戀”的負心漢，

毛郎君。她雖然“講求操守”，可她的命運仍“是很可悲的”。在文革中，作為中共的第四號人物的陶鑄，和作為被“落井下石”的“錯誤已明若觀火”的“德懷同志”，却是殊途同歸于被殘酷迫害而死。我勸讀者：暫且別說“活該”。因為說“活該”祇是譴責了受害者同時也是迫害者的一面，說他罪有應得，就放跑了罪魁禍首的罪大惡極。罪魁禍首就可以逃之夭夭了；是別人“罪有應得”嘛，關我屁事！

陶鑄（實際是黨文化）把“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的包辦婚姻，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從一而終”的一套封建倫理也拿來了。足見他們欺世盜名，喊破天的“共產主義道德”：毛澤東在會上說什麼“社會主義同志式友愛”（頁331）；葉劍英的擠眼淚；統統是什麼貨色，什麼鬼名堂了。也無怪乎文革後出現信仰危機，現在無論共產黨內外，還是上下，都幹脆把它棄之如敝屣了。還有誰會信這套鬼話連篇？

劉賓雁把共產黨總的特點歸結為虛偽、殘酷、無耻三點。從道德層面，我把它歸結為偽善和真惡兩點。偽善集中表現為謊稱：“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是共產主義精神；真惡集中表現為實際行動是“原則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頁235）這是一個事物的兩面，即道德的兩面。因為道德就是要解決利己與利人的關係的。我還記得幼年上私塾時老先生的教導：“我不知：孰為君子？但見與人相處肯于吃虧者便是；我不知：孰為小人？但見與人相處總要沾光者便是。”

毛澤東在批判彭德懷推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一道德信條時說：“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在同一階級朋友之間適用，對立集團不適用。蔣介石與馮玉祥之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互相消滅，軍閥混戰一場，有什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一資本集團與那一資本集團之間，也是你我互相整垮，這一公司與那一公司之間，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無不如此。同蔣介石抗日聯合，是暫時的，同國民黨兩次合作（第一次是同孫中山）是暫時的，互相利用，暫時同盟。原則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求生存、擴大，這是己之所欲，難道要資產階級也擴大？恰恰相反……不願國民黨擴大，準備條件消滅之。”（頁235）

這裏我要提醒汪藍諸君：“同國民黨兩次合作（第一次是同孫中山）”，就打着“不願國民黨擴大，準備條件消滅之”的主意；現在你們熱衷于搞所謂的“第三次國共合作”，是否要幫着共產黨消滅你們“國民黨反動殘餘”呢？或者是，

你們得到了說話算話的保證：“保證你們偏安臺灣，永遠‘殘餘’下去”呢？這對本題是題外話，但對泛藍却不是多餘的話。

言歸正傳。這個問題就是毛澤東的基本道德觀，我們分作兩方面來說。他的道德主張的頭一方面是：“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在同一階級朋友之間適用。”而其道德主張的另一方面是：“對立集團不適用”，“原則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首先我要說明，這個“頭一方面”和毛澤東說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一樣，是一貫騙人的假話，可劃入“偽善”的範圍。彭德懷直到受到處分後，仍是政治局委員，而且他的家庭出身又是貧農（就不提你毛澤東是富農了），與他這個“同一階級朋友之間”，應該是適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則了吧！我們來試加論證。

要想公道，打個顛倒：假如你毛澤東是彭德懷，他是你毛主席。你向他提出合乎實際，並且是很中肯的批評：“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大煉鋼鐵得不償失”；如果他不但承認你是正確的（當然，他後來出于布置陷阱的禍心，才說：“也許真理在你一邊。”），反而席卷僕羅，對你大興問罪之師。這是你之所欲嗎？當然不是。但你現在做的，正是“適用”于對付敵人的原則：你所不欲，要施于他。大會對他的批判也都是昧良心之言，大的原則性的誣蔑，已如前述。現舉一細微末節，如指責他：“你看風使舵。”（頁249）我不知道，在指責他的中央大員中能否找到一個比他更不“看風使舵”的人？哪怕僅僅是一個！自己一身白毛尾（讀YI），反說別人是妖精。即小見大：你們對朋友也來“己所不欲，要施于人”這一套，實屬偽善其外，真惡其內，喪盡天良，不識人倫的豬狗之所為。當然這也並不意味着對敵人就可以來這一套。這就涉及到這一問題的“另一方面”了。

這裏有一個正義標準、遊戲規則、公德和公法不容抹殺的問題。例如在抗美援朝（實際是援朝侵韓）的戰爭中，你不願敵人對你搞細菌戰，那麼，你之不欲，是否就應該“要施于人”呢？這是其一，其二，前蘇聯的檔案解密，已證明誣蔑美國搞細菌戰是徹頭徹尾的無耻造謠。不僅此例，所有作為共產黨、毛澤東起家、發家法寶的造謠，都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的具體實踐。對內騙內、對外騙外，多少人受騙和繼續受騙啊！就算反右派與反右傾，如從道德層面說，還不都是一場騙局？

如果，按毛澤東的論證：“對立集團不適用。蔣介石與馮玉祥之間己所

不欲，要施于人，互相消滅，軍閥混戰一場，有什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一資本集團與那一資本集團之間，也是你我要互相整垮，這一公司與那一公司之間，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無不如此。”那麼，這一原則將再也無任何存在的空間了。所謂“在同一階級朋友之間適用。”也成一句騙人的空話。而“原則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將要獨霸一切空間。例如，兩隊賽球，甚至兩男爭愛一女也是這樣：你想贏不想輸，必然要對方不要贏要輸。問題是還有沒有遊戲規則？甚至在“兵不厭詐”的戰場，你也不能搞細菌戰，或施放毒氣彈以冒天下之大不韙吧！本來用毛如上舉例來論證孔子這個命題，已屬荒謬可笑，但對毛來說，事實早已如此，早已司空見慣；這裏祇是再指出他荒謬的邏輯和他荒謬絕倫的行為的一致性而已。

1975年8月的一個晚上，毛在住所看香港電影《雲中落綉鞋》。電影故事是：某員外小姐，失足跌進後花園的枯井，井下又黑又潮，空氣稀薄，小姐生命危在旦夕。員外貼出布告，誰能搭救，就將小姐許配為妻。兩個青年同時應徵，商量好合作，一個下井，另一個在上面接應；救上來後，由小姐選擇一個結婚。下井的青年把氣息奄奄的小姐放入筐內，井上的青年拉繩，把小姐救上來了。井上的青年當即用一塊大石頭將井口蓋上，抱着小姐去見員外，聲稱小姐是自己一個人救上來，于是得以和小姐成婚。誰知小姐上來時把一祇綉鞋落在井裏了，一日做夢，夢見天上落下她那祇失落的綉鞋。以後果然是井下的那位青年死裏逃生，以拾到的綉鞋作為搭救小姐的證物使真相大白，和奪回了小姐，而那個邪惡的青年則被趕走。陪毛主席看這部電影的有張玉鳳、孟錦雲、李師玲。毛看後問他們：你們說說看，兩個救小姐的青年，哪個好些？幾個女青年異口同聲地說，那個陷害別人，欺騙小姐的井上青年太壞了。然而毛澤東的看法確是驚世駭俗的，他覺得井上那個青年更好些。“那個井下青年，對問題考慮太簡單，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早就應該想到井上的青年會使出這一招。他太愚蠢了，還是井上的青年更聰明噢。”張玉鳳反對說，他太狡猾了，不老實。毛爭辯說：“老實，老實是無用的別名。這是魯迅先生的見解，我很同意。”小孟說：“那他也不應該為了自己的利益去害別人呀！”毛堅持說：“就有一個小姐，他不去害，他能得到嗎？看來，他是太愛這個小姐了。這叫愛之心切，恨之心狠噢。相反相成。”——這是我從王若水書裏讀到的，這位哲學家曾與毛直接接觸過，並受到表揚和批評過。他就此評論道：“那些虔誠學過《老三篇》和《毛主席語錄》的人讀到



這裏，一定會感到震驚：毛澤東曾諄諄教導別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要做老實人；可毛澤東的真實思想原來是這樣！”（《新發現的毛澤東》，上卷，頁25-27）可王若水尚有一個問題沒有想過：如果毛澤東是井上的青年，他會把事情做得如何地斷子絕孫！

對於毛澤東來說，“權”就是這位“小姐”，彭德懷就是那位“井下青年”，祇是“井上青年”毛澤東太“勿毒不丈夫”了，他不是把石頭蓋在井口，而是“落井下石”！所以彭德懷再也沒有機會“死裏逃生”，以綉鞋為證了。當然劉少奇、林彪、陶鑄、賀龍……田家英，無一不是被落井下石的井下青年的下場。如此之多而沉重的事實，確證了我的兩點論：毛澤東在道德上的“偽善”與“真惡”，兩點並存，狼狽為奸。上面王若水提到《老三篇》，“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一語，出自《紀念白求恩》。

《為人民服務》則是為了紀念“死重于泰山”的張思德。可是，史料證明張思德是死于煉鴉片烟中。抗日期間，毛澤東和共產黨不搞抗日戰爭，却對國民黨，實際是對中華民族進行亡國滅種的鴉片戰爭。他們必將以“民族的敗類，社會的蠹賊”被釘在歷史的罪惡柱上。非但此也，且在廬山會上對彭的抗日義舉，累次大加撻伐。毛澤東竟如此振振有詞，寡廉鮮耻地用賣國主義統一全黨思想：“一些同志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志。”（頁223）這可是毛澤東不打自招，暴露了自己的賣國嘴臉。江澤民、胡錦濤繼承、捍衛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讓俄國多占地才愛國”，一家伙把15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眼眨也不眨地割給了俄國。當然這絲毫也無妨他們厚着臉皮大喊大叫“愛國主義”以行騙于國內外華人世界。賣國賊喊愛國，喊得自己血脈噴脹，這和貪污犯講廉政，講得聽眾掌聲雷鳴一樣，都是共產黨特有的政治景觀。這也就是我在上面把毛澤東釘在“罪惡”柱上，而不是常說的“耻辱”柱上。因為，毛澤東是不知道耻辱為何物的。

若就事論事，也就是就毛在婚姻愛情問題上貫徹落實“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的原則，那麼，楊開慧這位“員外小姐”，就必須淪為恰似彭德懷式的“井下青年”的命運，而死于1930年；1928年的賀子珍小姐，1938年又淪為“井下青年”，雖得以“死裏逃生”，却得了精神分裂癥。至于江青，雖然她曾狐假虎威，權噪一時，但在夫妻關係上過的却是“共產共夫”的生活。說到這裏，

還得提起彭德懷對毛荒淫無度的反對。黃克誠這個舊社會嫁給毛澤東的棄婦，揭發彭德懷“對各地修房子不滿；反對唱《東方紅》歌；對喊‘毛主席萬歲’不滿；調文工團，他罵蕭華和羅瑞卿同志，說是‘選妃子’，實際是罵毛澤東同志。”（頁342）這就說明，根據黨性原則，爲了捍衛“毛澤東同志”“選妃子”的戰略需要，就必須對彭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置之死地而後快。

具有良知的老共產黨員學者李慎之先生的“結論是：古今中外幾千年，除了最無耻、最殘忍、最不講信譽的特大暴君，誰能够這樣幹？

“他年年、月月、日日地祇想着‘其樂無窮’地‘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毫無仁善之心，這祇有從‘土匪——軍閥——暴君’這個梯階爬上來的人才會這麼幹！這種人，不管對國家對人民犯下了何等的滔天大罪，他們也決不下‘罪己詔’。

“慎之兄問我：你聽說過毛主席下過‘罪己詔’麼？

“我冥想了好一會，祇得搖搖頭。

“‘是的，他從來也沒有認真地檢討過自己。’慎之兄說。

“接着，他用馬克思的話來解釋爲什麼會出現這種令人極其痛心的現象。馬克思的這幾句話是：‘專制制度必然具有獸性，與人性是不相容的。獸性的關係祇能靠獸性來維持。’”（戴煌《以李慎之爲榜樣，無鞭奮蹄至暝赴！》）實在地說，黨性本來就是獸性，其所以說它“惡性發作”，是因爲發展至今已經獸性“化”了。毛澤東給出定義：“化者，徹頭徹尾，徹裏徹外之謂也。”

總之：一個思想上，個人崇拜的惡性發展；一個政治上，階級鬥爭的惡性膨脹；一個道德上，黨性獸性化的惡性發作。祇要具備了這三條，別說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即便是，發動一場世界大戰，也會在全黨、全軍裏挾下，全國人民聞風而動，高呼：萬歲，萬萬歲！高唱：“世界革命就是好！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呼號着“爲了世界領袖毛主席，衝啊！”前僕後繼，勇當炮灰；爭先恐後，去“重于泰山”！去讓中國死一半人！

中共官方修史，謂“反右派”與“反右傾”有本質的不同：前者是有少數右派分子發動向黨，向社會主義制度猖狂進攻，所以“反擊右派進攻”是有必要的，祇是擴大化了；後者，是彭德懷等同志指出大躍進中發生的問題，意見是正確的，所以反右傾是錯誤的。此中荒謬不經之處，不值一駁。我要着重指出的是，二者的本質不同在於：前者是以民主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反對一黨專政（共產極權主義）；後者是以極權民主主義反對一人專權。“極

權民主主義”是個什麼概念呢？表面價值是，領袖集體領導，實行黨內分贓。實質是：在中共的詞典上叫做“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猶如法西斯指導下的民主，說白了就是：水指導下的火。它的運行機制如下：“意見完全相同的時候，毛主席走群眾路線，完全服從大家的意見；意見不相同的時候，你就要完全服從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還要執行，並且還要興師伐異”。我們見到的，自殺或被殺者，臨死前喊：“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和蘇共布哈林死前喊：“斯大林萬歲！”這就是極權民主主義者的典型示範。因為，“極權民主主義”導致“一人專權”是必然的邏輯。你要民主就要在集中指導下，所以你祇要承認“一”，就要接受“二”。祇要承認馬克思，就不能反對秦始皇。

另外，不管是官方還是民間，還對現實存在一個共識，這就是，反右派和反右傾之後，黨內黨外都不敢講話了。這個話對是對，但不夠徹底，因為它忽略了一個現存的邏輯：不說話就是消極抵抗，說明你並沒有不講話的自由。所以人們，特別是共產黨員，更特別是幹部，更更特別的是左派幹部，都得變成毛澤東肚裏的蛔蟲，摸清他在想說什麼，就更加“甚焉”地投其所好！例如張春橋，從柯慶施那裏得知毛反對資產階級法權，他就寫了《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發表在1958年9月16日出版的上海《解放》雜誌第6期上，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報》加上了毛澤東寫的編者按，予以轉載。從此一路飛黃騰達，文革時接近權力頂峰，堪與林彪爭奪接班人地位。

毛澤東說：“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毛澤東選集》合訂本，頁1375）反右前，為本文的“文前時期”，我不去說它。從反右開始到大躍進，毛澤東經歷了“搗亂，失敗”的過程；從大躍進到反右傾，毛澤東又經歷了“再搗亂，再失敗”的過程……直至文革，人民在“四五”運動中喊出“打倒當代的秦始皇！”毛澤東身敗名裂，人雖死，却死不瞑目——這就是毛澤東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

### 三，“反右”與“文革”

“反右”與“文革”，這兩件關係到中華民族命運的政治運動，有緊

密的內在與外在的聯系與區別，弄清它們之間的聯系與區別，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的、歷史和現實的意義。因而也才能認透毛澤東與共產黨的本質，進而對於推翻一黨專政，對於實現普天同慶的民主大業，就是不可或缺的一課。同時我還認為，對這兩個運動進行“相提並論”的研究，可收到“相得益彰”之效；反之，對反右與文革二者，如果不兼知其二，那麼，絕不可能真知其一。讓我展開來說：

### （一）“預演”說與“序幕”說

關於“反右”與“文革”，二者的聯系與區別，學者們曾就此發表過很多意見。我把主流的意見綜合為兩點：一曰“預演”說，一曰“序幕”說。

章立凡先生說：“‘反右’在某種意義上是‘文革’的預演，祇不過後者的破壞規模和烈度更加廣泛和嚴重。”（《毛澤東“反右”動因及後果的再研究——對李慎之先生遲到的紀念與商榷》）這是沒有看到兩者本質之迥異！

朱正先生說：“反右派鬥爭可以說是文化大革命的彩排或預演。”（《反右派鬥爭是流產的文化大革命》，《北京之春》2006年7月號）“彩排或預演”，說到底還是一回戲。

邵燕祥先生為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一書作序說：“有人說反右派鬥爭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預演，我以為不如說是序幕。”又在本書《香港版序言》中說：“‘反右’云云，1957年當時稱為反右派鬥爭，後來也稱反右派運動，是1949年後針對知識分子的第一次規模最大、影響至深的群眾性‘政治運動’，開其後造成民族大災難的文革之先河。”這裏說得好！既是“序幕”，下一幕就會是別開生面；既是開“文革之先河”，當然祇能是“開先啓後”。

李也改先生說：“50年來多種社會弊端，都可以在‘反右派’災難中清楚地找到它們的源頭。如果沒有‘反右派’，就不會有它的姊妹篇‘文革’。”（《“反右派”半世紀祭》）說“姊妹篇”也對。

最說得清楚的是李慎之先生的“下一章”說：“反右派鬥爭的勝利提高了毛主席的雄心壯志（這裏可能是指“把地球管起來”——紫丹按），直接孕育了大躍進。以後就是農業大放衛星，工業大煉鋼鐵，人民公社紅遍全國。大躍進的失敗給毛主席平添了猜疑恐懼，不但直接導致了反右傾的鬥爭，

而且促使他到處搜索‘躺在身邊的赫魯曉夫’，終於在1966年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過這些都是中國歷史的下一章了。”（《毛主席是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說是“歷史的下一章”，再恰當不過了。

我說：毛澤東心懷鬼胎。反右派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心中孕育的一對雙胞胎，也就是說不是一個胎兒，所以他們的呱呱墜地就會是兄兄弟後，先後有序。這將形成一個或長或短的時間差。而其誕生決不可能是不分兄弟長幼之序，不分“反右”與“文革”之別，祇是或“流產”或“成活”的同一個胎兒（“流”了的是“文革”，“產”了的是“反右”）。我之所以說是“雙胞胎”，就是集內因、外因、遠因、近因之大成，致使毛澤東在謀取政治霸權的道路上出現了兩隻攔路虎，都必須搞掉，並不是祇用搞掉一隻，或搞掉這一隻就等於搞掉另一隻：一是必須搞掉中國的匈牙利式的反革命，他說：“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毛澤東選集》五卷，頁323）所以毛要再一次搞肅反，這回的名堂叫“反右”，主意是搗毀中國式的“裴多菲俱樂部”，抓出“小納吉”。後來，毛在和來訪的匈牙利領導人卡達爾會談時說：“我們的右派相當厲害，右派在你們那裏就是納吉的群眾，是小納吉。”這個無形的俱樂部不僅在知識分子中有廣泛的基礎，而且由於共產黨搞的五大運動（土改、鎮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肅反——貫穿於各個運動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三大改造（對農業、手工業和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罪惡滔天，激起土農工商天怒人怨，所以危機四伏，一觸即發。毛要搞一次肅反運動，肅清的對象，黨內外都有，主要在黨外。這一點可從薄一波的回憶錄中得到印證：“反右開始後，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指出，‘反右派就是肅反’，‘新式肅反’，是‘清黨清團的好機會，也包括各民主黨派。’”（《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622）又可與毛自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相印證：“鎮壓反革命，極有必要。1957年右派進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來了。”（《廬山會議實錄》頁223）

另一個是要搞掉中國出現的反斯大林主義、反個人崇拜的，如果說得更具體的話，就是會在他生前公開指出其錯誤（彭德懷），或身後作“秘密報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這一點李慎之說的已經是再清楚不過了。因為毛“認為自己就是中國的斯大林”。（《胡喬木文集第二卷》第147頁）；這個名堂叫“反修”，主要在黨內。正如李銳在《我對中國的情況不悲觀》中所說：

“但是問題在什麼地方呢，兩件事情，一個是趕跑蔣介石後，老子天下第一，對國內的事他倒也無所謂了，有人問他，假如魯迅在世，打右派的時候會不會活捉魯迅，會不會給魯迅打右派，他說照打不誤。這是國內的情況，在國外有列寧有斯大林，中國要依靠蘇聯幫助，第一個五年計劃是 156 項，斯大林的影響力可大得多了。但是問題在赫魯曉夫一作報告之後，毛澤東就覺得不同了，老子世界第一，天下第一，他領導世界革命，打游擊也好，搞文化大革命也好，都有他一個要搞世界領袖的這麼一個來歷。當然對於斯大林倒臺，他是又高興又猶豫，他知道自己爲什麼搞文化大革命，是因爲赫魯曉夫……”

黨內黨外，內外有別。這就必須用兩個戰役來消滅兩隻老虎，畢其功于一役是絕對不現實的。因爲這個時候搞文革需要做的準備工作，“八”字還沒一撇：從國際上說，一是還沒有與蘇共撕破臉皮，社會主義陣營還存在；甚至是正處在表面的短暫的蜜月期中。這時毛把“反蘇”列爲割毒草，即定爲劃右派的六項標準之一。二是在實質與赫魯曉夫爭奪對斯大林的長子繼承權上，也還沒邁出決定性的一步，還沒有在中國把赫搞得臭而不可聞也。當然，更重要的是在國內，即便在反右之後，也仍然不具備發動文革的條件：一是劉少奇與周恩來尚未被離間開。二是黨政文武大權，毛尚未牢牢在握：這時候的國防部長是與他“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彭德懷而不是“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也執行”的親密戰友林彪；“三家村”一類“外圍”還沒有清除；對劉少奇的心腹幹將，“四家將”彭羅陸楊（彭真是政治局委員、首都市長，羅瑞卿是解放軍參謀長、公安部長，陸定一是宣傳部長，楊尚昆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首先需要打倒，做到“打虎先扳牙”；三則，需要進行輿論工作：一個觀點，一條路綫，祇叫少數人知道不行，要使大家都受騙；四則，對劉少奇雄厚的政治資本，要逐步“剝笋”，予以剝蝕、剝奪。毛終日盈于耳的是，舉國上下都在津津樂道：“毛主席說，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這也是他必須打倒又不能馬上打倒，而要真正打倒劉又必須把中國攪個底朝天的原因；五則，從最近解密的林彪日記披露，毛需要策劃于密室，組織自己的人馬，並搜集對方材料，羅織罪名；六則，在反右前，重中之重的是國際波匈風潮的波及和國內工人罷工、學生鬧事、農民退社、知識分子滿腹牢騷，當務之急是鎮壓，是“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此舉一則可濟燃眉；其次，殺鷄給猴看，可收快刀斬“亂”麻之效；其三，

從此造成萬馬齊喑，進而達到指鹿為馬，毛便可最後做到真正 100% 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任意妄為、橫行無阻。難道毛在沒有做這些必備的工作之前，就率爾發動文化大革命，那不是“一頭碰到閻王爺的鷄巴蛋上——冒失鬼”嗎？所以毛澤東是吸取列寧搞的“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的經驗，有先有後地掃除“兩堆垃圾”。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在 1957 年一舉掃除“兩堆垃圾”。就連打虎英雄武松一次也祇能打死一祇老虎。何況毛澤東研究和處理矛盾的思想方法一貫是，必須注重矛盾發展的階段性呢？以及，又何況他一向的陰謀策略都是“分化瓦解，各個擊破”呢？再說，如果按“流產”說，毛要整黨內那些“反冒進”的領導，本意不是要反右；就是說，如果文化大革命不是“流產”，將發生在此時。那麼，由此會產生出一個簡直不可思議的問題：毛澤東的本意此時不是要反右，還要利用右派整“反冒進”的那些領導，一則這有可能嗎？二則，那他要到什麼時候才反右？或是，永遠也不反右了？

所以我認為，說“序幕”或說“預演”，決不是兩個簡單的比喻之爭的問題，也不是樞字眼，而是標志着對歷史事件的兩種不同的質的規定性之認可。說“序幕”、說“先河”、說“雙胞胎”（或“兩隻攔路虎”、或“兩堆垃圾”、或說“姊妹篇”、或說是“一根藤上的兩個苦瓜”），這都是說反右派與文革是兩個回合，是章回小說中的兩回；這樣說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準確的。說“預演”、說“彩排”，按其本意，說的是和正式演出的是一回事，全同的一齣兒戲；一般說是，劇本不變，祇是改進表演。但反右派與文革，却是劇本的不同部分，是不同的場或幕；比作折子戲，是相互關連中的兩個折子；比作文章，是上下篇；總之，不是像“預演”或“彩排”之與正式演出那樣同出一轍。所以，說“預演”、說“彩排”，不僅不準確，而且不能說是正確的，甚至可以說是荒唐的；因為，它混淆了兩個運動的聯系與區別，更由於它扭曲了反映反右派鬥爭本質的“起因”問題，這就會誤導出一個極其有害的謬論，無意中把毛的陰謀詭計粉飾成“真心真意”要整風。正如朱文中自己所述：“李慎之在致胡績偉的一封信裏批評了我寫的《1957 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他說：（朱正）認為毛本來是好心好意地號召鳴放，沒有料到右派分子如此猖狂，他才不得不反擊。這是我（李慎之）完全不能同意的”。“說毛的本意是要黨內整風（如果不流產，就成為後來文革中的鬥黨內走資派）。黨內整風之所以流產，是由于右派的猖狂進攻，所以祇得先反右，

把文革推遲十年。——這些正是李志綏先生的論點：“今日我的後見之明是，如果當時民主人士提的意見未涉及到毛，那麼文化大革命一定會提早十年，在 1957 年，而不是 1966 年發生。我們今天祇記得反右派運動時對右派人士的恐怖行徑。其實毛開始時是想借用民主黨派人士來替共產黨整風，目標是‘反冒進’的那些領導。”（《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 195 頁）而這又成爲朱正等先生“預演”說、“彩排”說、“流產”說（“反右派鬥爭是流產的文化大革命”）立論的基本依據。他說：“毛澤東決定開展整風運動的目的……還有一個在《整風指示》裏沒有宣布的目標，就是要跟黨內那些“反冒進”的領導人算賬。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澤東知道，黨務系統在劉少奇手上，行政系統在周恩來手上，這些黨政機關的幹部都是他們的下屬，由誰出頭來向他們提意見呢？毛澤東想到了讓民主黨派來充當衝擊的力量。”這個意思是否說，如果不是“流產”，“毛澤東想到了讓民主黨派來充當（紅衛兵之類，成爲文化大革命的）衝擊的力量”呢？這雖有點滑稽，但，倒也“復萌”了反右前、右派們一廂情願、自作多情的“故態”。

### （二）整風目標是衝擊“反冒進”的那些領導嗎？

朱正先生在爲參加紀念文革 40 周年而寫的《反右派鬥爭是流產的文化大革命》一文中，過細地、反復地論證了他的此一看法，而且流傳很廣。但因爲“基本依據”——“整風目標是‘反冒進’的那些領導”，與事實相去甚遠，遂導致“讓民主黨派來充當衝擊的力量”，也即文革就會發生在 1957 年這一看法，打根兒就失去了立足之地。對此，我將從兩個方面來進行探討：一方面是就着右派對“反冒進”的態度；另一個方面花開兩枝、各表一朵：一朵是表“反冒進”的周恩來，另一朵是表“反‘反冒進’”的毛澤東。他們各自對於反右派與反冒進二者之間的關係之認識。

我認爲，說話一定要依據資料，不能祇憑在腦子裏邊“如果、那麼”地推演。所以我惟恐言之無物、收集資料就盡力求全，甚至有羅列堆砌之嫌，也寧濫勿缺。

“反冒進”是什麼性質的事件？《人民日報》社論和周恩來本人都認爲是對右派做了“可耻的內應”。毛認爲是“離右派祇有 50 米”。當時的實際情況是，民主黨派、知識分子，都是“反冒進”的，而不是擁護毛澤東“反‘反冒進’”的。切勿勿忘，這是當時的主旋律。



《人民日報》載，全國工商聯主任委員陳叔通 1957 年 5 月 16 日發言：“希望領導上認真總結一下是保守思想對社會主義造成的損失大，還是盲目冒進造成的損失大。”大概你不會誤會陳叔通的意思是想說“保守思想對社會主義造成的損失大”吧？

22 日，羅隆基就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保守”還是“冒進”這個問題發言，他認為，從 1956 年以來主要是冒進，而不是保守。這不是哪個人的問題，也不是哪個部的問題，而是全部的冒進。張奚若、陳銘樞等指責毛澤東“好大喜功”更是使毛長久地耿耿于懷。毛說，好大喜功，看是好什麼大，喜什麼功？是反動派的好大喜功，還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裏也有兩種：是主觀主義的好大喜功，還是合乎實際的好大喜功？我們是好六萬萬人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這種胡攪蠻纏的跪辯，令人難辨他是厚顏無恥而可惡，還是理屈詞窮而可憐？千萬別讓我們聽到如法炮制的狡辯：“是革命派的厚顏無恥，還是反動派的厚顏無恥？我們厚的是無產階級之顏，無的是馬列主義之耻。”

6 月 10 日《沈陽日報》刊出張百生、黃振旅的文章《社會主義建設的新課題》，說：“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全面冒進”。例如農業合作化，“我們的農具同兩千年前沒有什麼兩樣，就這樣一窩蜂似的組織起來，很多是變相的強迫命令，幹部水平低、工作混亂、非生產人員增多、生產積極性降低（比單幹時）等毛病就在所難免。”

1958 年 5 月 17 日《人民日報》載：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發言說：“黨內外的右派分子利用我們工作中的個別缺點，大事向黨進攻。說‘500 萬畝水地是人命換來的’，是‘秦始皇磨民’；說 1956 年各項工作都‘冒進’了，這些‘都是領導上的腦袋發熱造成的’；說批判‘甘肅落後論’是‘無的放矢’；說 1956 年春召開的區委書記會議是一個‘冒進’會等等……經過全民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特別是經過了傳達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在黨內清除了孫殿才（原省委常委、副省長）、陳成義（原政法黨組書記、副省長）、梁大均（原省委委員、銀川地委第一書記）為首的右派反黨集團，情況大變，一個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一日千里地向前邁進。1958 年的水利工程 6 個多月的成績就等于 1957 年的十倍。原來準備十年基本上擺脫幹旱威脅的願望，現在看來，祇要苦戰 3 年就可以實現。”

## 還原 1957

---

1958年7月15日《人民日報》載：廣西反出的黨內右派集團，從1956年6月開始，“就打着‘反冒進’、‘反主觀主義’的旗幟，極力詆毀農業合作化和農業生產取得的巨大成就，攻擊黨的領導，進行破壞團結的活動。1957年6月，中央宣布處理因災餓死人事件時，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發展到最高峰。硬把因災餓死人事件說成是合作化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所帶來的惡果，並進而全盤否定廣西的工作成績，認為黨在農村工作上‘犯了路線錯誤’，要求‘重新估計農村工作’，要省委‘肯定錯誤’。”

1959年，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在和毛澤東的一次談話中問及“你說‘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話對嗎？”毛答：“一切事物都有兩重性，這話也有兩重性，對，怎麼樣？不對，又怎麼樣？”李說：“如果說‘對’，那就意味着精神的力量是無限的，就是主觀唯心論。”這時毛看到旁邊有人在暗暗制止李達，便氣呼呼地說，“不怕，說吧，不劃右派！”由此可見，把反冒進的人和觀點，毛是將之劃歸于右派的。

毛澤東“認為反冒進使右派鑽了空子”。（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2）“反冒進也促進了右派的進攻”。周恩來順着毛的思路，作檢討說：“反‘冒進’的錯誤是嚴重的，幸而由于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及時糾正，還由于這些錯誤受到黨內外幹部和群眾的抵制，同時，也由于資產階級右派從反面教育了我們。因此，才使這個錯誤能够在比較短的時間得到糾正，沒有繼續發展成爲更嚴重的錯誤。1957年春天，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黨猖狂進攻的時候，他們利用反冒進的錯誤，全面否定1956年的建設成就，把1956年躍進中的某些缺點，擴大爲‘全面冒進’，並進一步否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成就，在這個嚴重的階級鬥爭面前，我開始覺悟，因而在1957年6月政府工作報告中，徹底拋棄了對1956年建設‘冒進’的錯誤估計，堅決肯定了1956年的建設是躍進的發展。這是一個認識上的轉折。這是從敵對方面得到的教訓。”（《周恩來與毛澤東》第398頁）。

這在說明，民主黨派、知識分子是反毛澤東的冒進的。不管是工農業生產，還是農業合作化上的急躁冒進，還是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上的草率、粗糙，實在都不得人心，受到右派極力反對。起碼是在我的視野內，右派言論一面倒，都是“反冒進”的。是與反冒進的領導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更具有實質意義的是，右派才是反冒進的急先鋒，毛澤東怎麼會利用他們、他們又怎麼會去整“那些‘反冒進’的領導”——自己在黨內的“內應”呢？

再說，毛認為，反冒進是右傾機會主義，冒進才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怎麼會利用右派去反右傾、把馬克思主義的殊榮給予右派，而右派又怎麼會是當之無愧、去反右傾呢？這恐怕正好是把事情說了個相反。毛澤東對這一點很清楚：祇有反右派才是對反冒進的釜底抽薪，才是掃除了反冒進的社會基礎，唯其如此，反“反冒進”才能奏功；同時，他對反冒進的人，也以“右派”相預倣，相歸類——毛是說，兩者相距祇有 50 米。這也是借殺右派之刀，殺向“反冒進”者，而且使後者無還手之力。

朱先生說：“毛在發動整風運動之時確實想要同時解決反冒進的問題；爲了反擊向共產黨猖狂進攻的民主黨派人士，毛澤東不得不把反冒進的問題暫時擱置起來，以求得黨內的團結一致。李志綏的回憶錄裏記下了當時林克（毛的秘書）的看法：‘在當今這個局勢下，毛不得不在黨內求和解，以一致對付黨外人士。’”

據回憶錄中說的事實是，李志綏當時離開了毛身邊。這些情況是他回來後林克和毛澤東告訴他的。所以他的“今日我的後見之明”這個誤斷，是在受了林、毛的誤導的基礎上作出的；而是林、毛，才是這個讓世人迷惑的謬論的始作俑者。但李在回憶錄中把林說的這個話——‘在當今這個局勢下，毛不得不在黨內求和解，以一致對付黨外人士。’公之于衆，林給嚇得魂不附體，急忙作出聲明，矢口予以否認：

“李志綏還造了我的謠。他說：‘我不在時林克跟毛接觸最多，他跟我談起他對毛的政治評估。林的看法，在當今這個局勢下，毛不得不在黨內求和解，以一致對付黨外人士。’這完全是憑空捏造出來的。我從來沒有對李志綏說過這樣的話。在我的頭腦中，過去沒有，現在也沒有對毛的這種‘政治評估’，因爲這是違反事實的。”（《歷史的真實》頁 64）

爲什麼林要否認這句話呢？林是爲了向黨表明他是絕無違反黨性原則，揭露毛的嘴臉的，他的公開聲明，維護了毛的這一最基本的謊言（反右中的其他謊言，都是源于此而加展開）：

“毛澤東鼓勵民主黨派和其他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最初的目的是要用黨內黨外的批評互相結合的方法解決執政黨脫離群眾的問題，決非像李志綏所說從一開始就是搞‘政治圈套’，借民主黨派解決共產黨內‘權力鬥爭’。”（同上，頁 60。）

不管真假，連林克自己都不敢承認的東西，你朱先生怎麼能引以爲據呢？

雖然，即便他承認也不見得就正確。

再者，就着朱先生認為，“他（毛）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反冒進問題。這筆賬直到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之中才得到最後的清算。”我要問：難道文化大革命是管“清算”“反冒進”的嗎？王若水在《發現的毛澤東》一書的第八章中說：

“毛找了九省二市的第一書記參加，後來加上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會議的重點是反冒進。會上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條》，印發了周恩來（!!! ——三個警嘆號是魏紫丹加的，是爲了引起讀者特別注意，下同）、李先念（!!!）的反冒進言論作爲反面教材供批判用。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更加嚴厲地批評反冒進，批評周恩來和陳雲（!!!）。”

再奇怪不過的是，爲什麼這些我加上警嘆號的、毛澤東指名道姓批評的“反冒進”的掛帥人物，竟然在文革中一個都沒有被打倒？不止于此，還可由個別及于全面：作爲文革綱領的1966年5月16日公布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簡稱“516通知”裏，有提到“反冒進”的問題嗎？沒有。它倒是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明文規定爲右派，說明文革具有反右派的性質。但關於走資派，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哪個是右派？都不是，都是左派，左得流油！在反右運動中都是打右派不眨眼的英雄，否則，早就輪不到他當“當權派”了。所以當時的右派（我是其中之一）是很樂于看到當地的走資派被打倒的，雖然自己的處境不但沒有減輕，反而由于文革，更給帶來“再踏上一祇腳！”但總覺得自己是死豬不怕熱水燙了：“你們這些對毛澤東喊爹叫娘的左派，居然也有今日！”而當時的右派心理，基調是：“太陽曷喪？予偕汝同亡。”很希望人們能從反右派到文化大革命數以億計的人們受害中，認識到毛的作惡多端及其本質，確認毛澤東就是你、我、他、她——黨內的、黨外的、大家的、全民的、國際（起碼是匈牙利和柬埔寨人民）的公敵。

“預演”說、“彩排”說、“流產”說，以及虛構的“讓民主人士衝擊”說，都是在實質上在美化毛澤東的居心，把歷史的責任由迫害者轉嫁給受害者，讓人們糊裏糊塗，從認識中放跑了罪魁禍首。

朱先生的結論是：“可見從這個意義上看是有理由認爲反右派鬥爭是流產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已證明：“可見”，從“整風目標是爲了衝擊那些‘反冒進’的領導”這個意義上看，是根本無法成立的。因爲“這個意義”簡直

是空穴來風，我實在莫名其妙朱先生到底是怎麼想出來的；所以這樣建立起來的“流產”說，便不能不淪為“破產”之說了。

### （三）反右派與文化大革命的因果關係

文革不是反右派的直接結果，大躍進才是反右派的直接結果。這是有目共睹、衆所周知、不爭的事實。

“結果”往往是具有直觀性的，不像“原因”那樣、總是潛藏在事實背後。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原因，是如一位右派分子說得那麼直白和精辟：“自己頭腦發熱、超英趕美，骨子裏想當地球球長。”

反右傾是大躍進的直接結果。朱文指出的這一點是正確的：“毛澤東知道：大躍進的失敗使自己在黨內的威望大大降低，於是決心開展一場新的運動，打倒有可能向他的權威挑戰的黨內對手，重建自己的絕對權威。這時他就在準備這一場文化大革命了。”所謂“正確”，是他指出了：“這時(!)他就在準備這一場文化大革命了”，而不是1957年。其次是，“大躍進的失敗使自己在黨內的威望大大降低，於是決心開展一場新的運動，打倒有可能向他的權威挑戰的黨內對手，重建自己的絕對權威。”但，從時間上講，從大躍進的失敗到文革的爆發，中間隔着六、七年；從史實上講，當時直接“向他的權威挑戰的黨內對手”是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所謂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所以說，“決心開展一場新的運動”，是1959年廬山會議展開的反右傾運動而不是文革。1967年，毛澤東在接見阿巴尼亞代表團團長巴魯庫時曾說：“7000人大會的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早在1957年毛是否“已經看出問題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他還沒說，我們怎麼能斷定在1957年就發生文革呢？

從運動的目標、任務、條件、動力來說，這是兩個運動，不是一個運動。我們必須從“立異”上來確立二者各自的“質”的特性。當然我們還要注意到它們的聯繫，並且看到這種聯繫的因果性；儘管這種因果性不是直接的。形象地說，像是一團亂麻繞過很多圈子才將二者內在地聯繫了起來。概要地說，歷史的列車從反右派、這個始發站開出；一路顛簸、搖擺、闖紅燈，經過許多中間站：大躍進、反右傾、繼續躍進、七千人大會、八屆十中全會、意識形態大批判（政治上反“三風”、經濟學上批“物質刺激、利潤掛帥”、哲學上批楊獻珍的合二而一、文學藝術上批周谷城的時代精神匯合論、邵荃

麟趙樹理的寫中間人物論、楊翰笙的《北國江南》、夏衍的劇本《早春二月》（根據柔石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等等由城市的五反運動和農村的小四清運動而後匯合成全國城鄉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最後才到達“終點”站：文化大革命；直至老毛一死、大亂方止。

毛澤東自認爲一生中幹了兩件事：一件是打倒蔣介石，黨內贊成的多，反對的少；一件是發動文革，黨內反對的多，贊成的少。何以如此？從“立”講，前者是建立共產黨的“黨天下”，大家都可以分一杯羹，後者是建立毛澤東的“家天下”，毛要獨吞一切權力；從“破”講，前者是“打倒反動派”，後者是“鬥黨內走資派”。毛和斯諾談話中說得很明白。斯諾說：“對於人們所說的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須由一位個人把國家的力量人格化。在這個時期，在文化革命中間，必須由毛澤東和他的教導來作爲這一切的標志，直到勝利的終止。”毛澤東說：“這是爲了反對劉少奇。過去是爲了反對蔣介石，後來是爲了反對劉少奇。他們樹立劉少奇、蔣介石，我們這邊也總要樹立一個人啊！”當然，“家天下”絕對必須以“黨天下”爲基礎，但二者却有不同的目標、任務、動力和條件。

討論任何一個問題，首要的和必要的，是明確概念，否則就會出現歧義，出現鷄同鴨講。範疇是最高概念。所以，我們首要的和必要的是明確：反右派鬥爭是屬於哪個範疇？我認爲，反右派仍是毛澤東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倒蔣介石而不是劉少奇，是消滅反動派而不是走資派。毛澤東事先清楚，我們事後明了：反右派再徹底，也祇能建立和鞏固“黨天下”，爲“家天下”打基礎；毛澤東就算把右派殺個鷄犬不留，也絕不能建成他的“家天下”；祇有搞文革，把黨內的對手打垮，才能建成毛氏家天下。所以，文革和反右是不容混淆的兩個政治範疇。許多史家，缺乏分清範疇的史識，做起學問來往往如墜烟海。朱正先生的“預演說”（或“流產說”），正是把反右派與文革混淆了起來，祇見其表，不見其裏；祇見其同，不見其異，尤其不見其“大異”。其原因就在于混淆了上述“兩個範疇”。有了不正確的事實評價，其價值評價的錯誤也就在所難免了。比如對整風反右的“價值評價”，就是說：毛澤東是不是要真心實意、搞整風運動？是不是右派破壞了整風運動？到底誰是罪魁禍首，誰是受害者？“流產說”有嫁禍于受害者、而爲罪魁禍首解脫之嫌。

有了上面這些對前因後果的分析，現在再來對“文革與反右派”兩個運

動進行比較就一目了然了。

### 1, 一個目的, 兩個任務

至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毛澤東在1967年5月1日, 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的談話中說: “在這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們說: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麼? (當場有人答是鬥爭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鬥爭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主要任務, 絕不是目的, 目的是解決世界觀問題, 挖掉修正主義根子問題。”這是他的真正目的嗎? 他說的“挖修根”仍不是目的, 而是手段。難道是為“挖修根”而“挖修根”嗎? 為藝術而藝術, 藝術本身可以是目的, 因為這已經滿足了藝術家的藝術需求。為挖修根而挖修根, 就像為反右派而反右派一樣, 祇能是政治運動“形于外”的東西; 而政治目的却是那“誠于中”的心懷鬼胎。他之所以發起各式各樣的大運動、小運動, 並且, 運動之中套運動。這是毛不達目的、誓不甘休的表現。這是由于他直到嗚呼哀哉, 也仍是“壯志未酬”, 欲壑難填。對於毛澤東一生來說, “運動似乎就是一切”, 其實這僅僅是表面現象; 實際上, 可把伯恩斯坦的話反過來說: “對毛來說, 目的就是一切, 手段盡可以殘酷、欺詐、無恥的。”毛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麼呢?

#### (1) 鬥爭的“目的”, 就是鬥爭的“本質”

把反右派與文革比作先河後海, 比做姊妹篇, 比作一根藤上結的兩個苦瓜等。尤其這後一比喻, 它更完美的地方在于進一步指出: 兩者的連系是一根藤。“一根藤”又是指的什麼呢? 這個問題就是王若水先生遺著《新發現的毛澤東》第八章的題目所示: “誰將是國際共運的領袖?” 這個答案也就是李銳先生在《我對中國的情況不悲觀》中所說: “都有他一個要搞世界領袖的這麼一個來歷。”也如前引張顯揚所說: “有的祇是赤裸裸的、血腥的權力鬥爭。”盡管可以有不同的表達方法, 但如前所說的, “要當地球球長”, 却是一句最直白的大實話。還有, 如陳奎德先生寫的《毛的晚年悖論及其遺產——文革三十年祭》一文中說的“鑰匙”: “而成爲‘世界歷史上第一人’的幻覺目標在這種心態下是順理成章的。我以為, 這是理解毛在文革中一系列矛盾怪誕行爲的鑰匙。”

行了。我想讀者一定可以明白: 所謂“一根藤”就是指的貫穿毛一切行動始終的“目的”。祇有抓住這根藤, 才可以洞悉藤上所有的瓜; 祇有掌握這把鑰匙, 才可能打開所有的鎖。許多認識不到、或不願正視這一點的

人們，結果都無法自圓其說、或幹脆自欺欺人。

毛澤東說過：“……戰爭的目的就是戰爭的本質，就是一切戰爭行動的根據，從技術行動起，到戰略行動止，都是貫徹這個本質的。戰爭目的，是戰爭的基本原則，一切技術的，戰術的，戰役的，戰略的原理原則，一點也離不開它。”毛澤東搞的所有政治鬥爭（戰爭祇是其中之一個形式），“都是貫徹這個本質的”。反右派是貫徹這個本質，文革是貫徹這個本質，大躍進和反右傾是貫徹這個本質，老早的大殺 AB 團、延安整風也仍舊是貫徹這個本質。人們祇見現象，如大躍進轟轟烈烈，風風火火，甚至連領袖在內都走火入魔。彭德懷以生命作代價，也祇是揭示出：所謂“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個亂象。毛爲什麼對彭德懷竟然如被挖祖墳那樣大發其火呢？陳奎德先生在《文革前奏》中揭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本質：“他（毛）發動大躍進就是想自己自辟蹊徑，走出一條新的路，從而確立自己在世界歷史上共產主義運動霸主的地位。我想這個是他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國之音中文網》）

當年赫魯雪夫對此也有所覺察。他說，什麼東風，東風從哪裏來？東風是不是從你們中國來，是不是中國的風壓倒我們蘇聯的風。

### （2）鬥爭的“任務”，就是鬥爭指向的“目標”。

在延安整風的時候，總目標很明確，就是爲了取得並鞏固毛對黨的絕對領導權，整風就是整教條主義王明和經驗主義周恩來，實際是抹掉王明的領導權。這是主要任務。可是，還有個分目標，開始尚不明確，這就是知識份子，特別是來自國統區的，他們懷抱民主自由、個性解放的理念，來到“民主聖地”延安，却發現這裏恰似一個封建小朝廷；而毛澤東也同時發現，這班知識份子，特別是文藝界的，對共產黨的專制心懷異趣，是一種腐蝕劑，對毛澤東的個人專權之路無寧也是一群攔路羊。當他看到王實味的《野百合花》時，說道，思想鬥爭有目標了。至於寫了《三八節有感》的丁玲，寫了《論同志之“愛”與“耐”》的蕭軍，寫了《還是雜文的時代》的羅烽，寫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的艾青；丁玲是發表這些文章的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的主編，陳企霞是她的助手。對當時這些文藝界的次要目標，這次放過，但在十幾年後的反右派中，周揚却按照毛定名單劃他們爲右派。

反右派的總目標，是民主黨派、知識份子、資產階級，前面我已作過系統論述。這是爲了實行一黨專政而早已訂出的既定方針。這個目標具體到人，



比如落實到章、章、羅、儲……諸君頭上，在奪取全國政權前後也許心裏早有個大譜，但也未必盡然。但是，有一點是必須明確的：僅祇是反右派，達不到毛的最終目的。祇有發動文化大革命，“挖掉修正主義根子”——內反走資派，外反蘇修，代表人物是中外的赫魯雪夫。這樣才能覬覦國際共運領袖、世界革命導師的地位，達到“毛天下”（毛天下的“天下”是世界，黨天下的“天下”僅限于中國）的目的。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發言時說：“毛主席在全國、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過了三天，周恩來的發言更善解毛意，明白無誤地把毛澤東的狼子野心道了出來。他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這個偉大時代的頂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與列寧一樣是天才的領袖，是世界人民的領袖。”1967年1月11日，《人民日報》的通欄大標題是：讓毛澤東思想紅遍全世界。5月23日，《人民日報》“歡呼世界進入毛澤東思想偉大新時代”。10月4日，《人民日報》報導毛澤東接見來自世界五大洲的客人時，稱毛澤東為“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

毛澤東先後在廬山會議中提出“兩個司令部”或“反對派司令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提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文革中更明確提出“資產階級司令部”——這清楚地表明，反右傾與文革是同一個目標體系，具體目標包括彭、黃、張、周、三家村、四家店、劉、鄧、陶；與此殊途同歸的，先有小爬蟲關、王、戚、後有陳伯達、林彪、黃、吳、葉、李、邱等。比作下棋，每吃一個子，就是消滅一個目標：反右派吃的是車馬炮。文革吃的是士相帥。吃帥就叫做“將軍”，所以也可說，前者為“吃子”；後者為“將軍”。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不把文革前的三大運動、五大改造、反右派或其他豐功偉績，當成終生的打倒蔣介石、建立黨天下後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因為，即便是反右派也沒跳出第一件大事（鞏固黨天下）的範疇。而唯獨把文化大革命，建立毛的個人天下，當成是第二件大事。所以，反右與文革，是屬於同一目的下的兩個目標、兩個任務、兩個步驟、兩個範疇：前者歸類為第一件大事，後者屬於第二件大事。

## 2. 一個陰謀，兩套路數

毛澤東在運用“引蛇出洞”于反右派與反右傾中，和運用于文革中，其兩套手法，這在前面“引蛇出洞考”中已有過細的說明，這裏不贅。祇說

明一下毛對“學生”陰謀的兩套路數：把前者作為右派引蛇出洞，並使之盡量激怒左派；把後者作為左派予以挑唆，與劉鄧按反右故伎鎮壓相對比，一討好、一激怒，火上澆油，“革命”學生一跳三丈、高呼“砸爛劉少奇的狗頭！”

有人據此現象便推論：假如 1957 年的學生不反到毛主席頭上，本來是叫他們衝擊老幹部的，就像當今的紅衛兵一樣。這從哪一方面說都是胡說八道！除了上述我已做過的事實充分的條分縷析外，我再來引用筱敏在《素質何為？》一文中，對此問題所作得很清楚明白的講述。作者認為“用來作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衝擊力量學生”！歷史被扭曲了。須知，“1957 年這些娃娃們……認準的‘理’”，正好不能用來發動文化大革命，甚至是要堵塞此路的——

五十年代的學生寫道：

“世界上沒有什麼不允許懷疑的問題；任何人都有探討一切問題並堅持自己見解的權利。”

“為民主運動而鬥爭是作為黨領導的必備條件，是黨的責任，任何人都不能也不配恩賜人民以民主，民主是人民自己的。說民主是黨的恩賜與說生命是上帝的恩賜是同等的愚蠢。所以民主不能是給多少算多少，而必須充分而完整。”

“胡風決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釋放胡風。作為一個公民，我來過問法律，這是正常。我的行為有憲法支持。”

“由於過分強調了階級矛盾、仇恨，所以一些絕滅人性的東西無阻地發生了……學生開始以無人性的方法，以得到領導對其階級性強的信任。無人性成了得到信任的强有力的工具了！”

“我們要求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爭取民主，保障人權和精神人格的獨立——這就是我們鬥爭的目的。”

“正義萬歲！真理萬歲！民主萬歲！人身自由萬歲！”

“我們都要走自己的路！”

……

這些 50 年代的青年學生，幾乎無一不是衷心擁護社會主義的，然而他們少有偶像崇拜，反對“大救星”的頌辭，反對愚民政策，拒絕盲目追隨，呼喚人道主義……這些都是做人的優秀素質，更是知識者應有的文化素質。

然而，到了60年代，我們再難從青年學生那裏看到這種素質了。

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被稱之為規模空前的“大民主”運動，在這個巨大得令人眩目的舞臺上，紅衛兵一代以他們自身的素質能演出什麼樣的活劇來呢？我手裏有一本《文革大字報精選》，隨手翻開，滿目皆是這樣的文字：

“毛主席是統帥，我們是他的小兵。毛主席給我們撐腰，我們什麼也不怕！”

“我們的領導是黨中央和毛主席！我們的武器是戰無不勝的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我們祇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造反！你們膽敢造反，我們就立即鎮壓！這就是我們的邏輯。反正國家機器在我們手裏。”

“你們要把我們反擊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的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還要‘引導’到哪裏去呢？鄧拓和他的指使者對抗文化革命的一個主要手法，不就是把嚴重的政治鬥爭引導到‘純學術’討論上去嗎？你們為什麼到現在還這麼幹？你們到底是些什麼人？”

“我們要把一切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東西統統打倒，砸它個稀巴爛！”

“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旗幟下，積極行動起來，萬箭齊發，萬炮齊轟……不把劉、鄧拉下馬，誓不甘休，不挖掉修正主義的總根子，死不瞑目！”

“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

這就是毛為什麼把這些 silly boys？（流行的俗稱是傻逼青年，簡稱sb）用來當炮灰，而把50年代的青年劃做右派！到今天，令人咄咄稱怪的是，竟仍有人把sb與具有“北大519”精神的青年相提並論、同日而語！

後來的事實證明，凡是在運動中覺悟到受了騙，因而才又認準了1957年“娃娃”哥哥們的“理”的，隨後就都變成了“現行反革命”，遭到殘酷鎮壓，甚至槍斃。其中有造反派，也有保守派，有“一、二、三……號服務員”（即頭頭們），也有無名小卒。”

### 3、重新掀起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

從中共“八大”到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對階級鬥爭大作文章。和其他事物發展的辯證法一樣，它也經歷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八大”，以及毛自己都否定了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宣布要向自然開戰；反右派一來，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不僅重新掀起，而且愈演愈烈。這個過程突

現出兩個特點：1，階級鬥爭對象，即階級敵人越來越多，多到人滿為患，卒致造成自己反而成了一小撮，陷於階級敵人的汪洋大海之中；2，階級鬥爭的手法，集過去之大成，並且，比狠鬥凶、大發獸性、五毒俱全、十惡不赦、駭人聽聞而慘絕人寰。

### （1）第一個特點：鬥爭對象成汪洋大海

首先，把朋友、盟友變成階級敵人：從中共“八大”結束階級鬥爭，重新確立國內主要矛盾，到反右派重提階級鬥爭，是起始階段，其標志是，推翻八大決議，又把階級鬥爭定為國內主要矛盾，而且階級敵人不是越來越少，而是越來越多，從四類分子發展成五類分子，新增加了一個“右派分子”，把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前的革命陣營（統一戰綫）中的朋友、盟友，原來當成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成百萬的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成員，劃為敵人，加入專政對象的行列，要與他們作你死我活的鬥爭：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從數量上與素質上，壯大了“階級敵人”的陣容。

其後，戰友、親密戰友，也都成了階級敵人，也都是對之從名義到實質，作極其殘酷的“你死我活”的鬥爭：對右派的階級鬥爭，提的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在黨內對戰友，除了是上述鬥爭的繼續外，又加了個“兩條路綫”的鬥爭，如對劉少奇的鬥爭是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這裏引起思考的是，如果劉不搞那 50 多天的反資路綫，是否文革的目標就不是他了呢？當然仍是他。宋永義說得好：“實際上工作組在北京也好，在全國也好，這個工作組是毛澤東批准派的……對毛澤東來說，他是有意讓劉少奇上鉤。如果說劉少奇不派工作組，他可以說‘你放棄黨的領導’。他 8 月份回來就整你放棄黨的領導。那麼劉少奇派工作組，去搞反右派，控制局面呢，他就說你是鎮壓群眾運動。不管怎麼樣，劉少奇一定要被打倒的，一定要被整死掉的。這個是不可避免的。祇有劉少奇自己，以為可以避免，他抱幻想。我們今天回過頭去看，劉少奇實在是不了解他的老板就是這個毛澤東。”更何況毛澤東 1970 年 12 月 18 號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就說過，打倒劉少奇的決心就是在 1965 年 1 月那次（定 23 條）會議期間定下的。

在文革中，毛和江青都表示過，是 1962 年七千人大會使毛暗動殺機的。到現在為止，還未發現毛決意搞劉、在時間上比這更早的資料。

毛澤東放的文革第一炮，是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遂使兩軍對壘，

陣綫分明：他和親密戰友林副統帥組成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當“無產階級司令部”內、統帥要抹副統帥的權時，這可是個驚天動地的大轉折！毛澤東還是把“兩條路綫”的鬥爭當作擋箭牌，並且煞有介事地胡謔出，到此為止、黨內共經歷了十次“路綫鬥爭”。

在文革中的階級敵人的隊伍，毛把它擴充再擴充，就成爲了洋洋大觀，既有黨內的特務、叛徒、走資派，又有黨外的牛鬼神蛇、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合起來是九類：地、富、反、壞、右、特務、叛徒、走資派，還有知識份子臭老九。

至此，我們得知：什麼“路綫”不“路綫”！祇是打出一個旗號而已。就像前引司馬璐所說：“‘以派系爲核心，以路綫爲旗幟，以權力爲目標’的鬥爭，貫穿一部中共黨史。”對階級鬥爭，也可作如是觀。在中國誰是什麼階級，全憑毛的一句話。可見毛對階級鬥爭的理論如不是狗屁不通，也絕對是兒戲到狗屁不如的程度！這僅是說的國內的階級敵人；國際的階級敵人也是水漲船高，毛澤東也予以擴大編制，除帝國主義外，把修正主義也招兵買馬進來，尾隨其後。對敵人的統稱，從前叫：“帝官封”，現在擴充爲“帝修反”。詩人毛澤東讓一切都富有了詩意，包括對階級敵人的命名；也包括把九千萬人上山大煉鋼鐵，說成是“兩小無猜”、“小土群”，讓“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富有了詩意；還包括對全民挨餓，叫做“低標準，瓜菜代”，讓全民餓肚皮也羅曼蒂克起來。當然他不會說“餓肚皮”、那樣索然寡味的話，而說的是“鶯歌燕舞”、這般詩意盎然的詞句。

## （2）第二個特點：鬥爭手法集過去之大成

其一，具體作法鬥狠逞凶、殘無人道打砸搶抓抄是文化大革命中具有標誌性的作法。

“打”是共產黨開天辟地以來，所有運動，對敵我通用的家常便飯。至于在“打”中比狠：文革中把人捆綁吊打，打得皮開肉裂，剃陰陽頭，戴高帽，掛黑牌，坐噴氣式，推入屎尿坑裏淹死或活活打死，成批量殺人，滿門抄斬，人吃人；其廣度，遍及全國。土改中地主富農戴高帽，用牲口拖死，用亂石擊死，上望蔣臺摔死；毛澤東反 AB 團，派遣親信李韶九等肅反人員發狂似地連續捕捉、審訊，使用地雷公、綫香火、拷打、鐵烙、割乳、燒陰戶等各種殘酷、卑鄙的刑法（1930年12月段良弼《給中央的報告》）。李韶九大搞逼供信，不但下令打人，還親手掌刑。當時曾任中共安福縣縣委

書記的汪安國回憶李韶九抓他 AB 團後審他的情況：“他擺出一副關公似的臉孔，大聲吆喝說，你是 AB 團嗎？快把你們的組織說出來！當時，桌上放了好些木棍、長竹片、烙鐵、繩索等刑具，我知道這是用來對付我的。當然我不能誤供我是 AB 團，於是，兩個大漢把我的上衣脫光，繼之李韶九親自動手，燒紅烙鐵在我背上腿上烙呀、燙呀，這我怎麼能受得了呢？我觀此情形知道，供認是死，不供認也是死，與其不供認受苦遲死，不如供得早死個痛快，就在這個思想支配下，供認了我自己是 AB 團。這樣李韶九才把我放下來。”就是這樣，李韶九在五天五夜刑訊逼供，屈打成招，在省委、省蘇（維埃）兩機關及政治保衛隊共破獲 AB 團 120 多名，要犯幾十名。槍斃省委交通和技術書記 17 人。第二天又槍斃 24 人，其中省行委 7 人。霎時間，江西省行委、省蘇政府機關和整個富田村野，烏雲密布，腥風血雨，到處瀰漫着紅色恐怖！老百姓驚恐不安，竊竊私語：“不得了啦，紅軍在殺紅軍，共產黨殺共產黨，湖南佬在殺江西佬……”

在反右派、反右傾中，據我所知，上層問題不大，下層、特別是反右傾，打得一塌糊塗。所謂“上層問題不大”，就是說，也還是有問題。比如在反右派中，毛在全國的規模上搞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對像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這樣的民主政治家，儲安平、丁玲、艾青、費孝通、錢偉長這樣的文人學士、科學家都給罵得狗血噴頭，分文不值。至於鬥小右派，拳腳相加、低頭罰跪，不如此作倒是例外。又如，“廬山上批彭總的會，毛主席一般不參加。但少奇、周總理他們是在第一綫工作的，不能不參加，還要主持。有時會場亂得都開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總，被少奇同志喝住。”（王光美《王光美訪談錄》）你要知道，這可是最高層的會，都是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一類的人物（？）參加的，他們都“有人甚至要打”，打的又是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彭總”。幸虧“被少奇同志喝住”。可惜到了文革期間，“彭總”，“少奇同志”挨打時，就再也沒有人出來“喝住”了。從這個“打”上也可以看出文革對反右派、反右傾的繼承和發展了：如果沒有在反右派中造成的恐怖氣氛和毛所向披靡的淫威，那麼，隨便就栽贓陷害昨日功臣“唯我彭大將軍”，是可以設想的嗎？同理，打倒那個毛澤東三天不學習就趕不上的劉少奇，又是可以設想的嗎？當然，五類分子的挨打倒是可以設想的了；而不可思議的倒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長謝富治要員警同紅衛兵“取得聯繫”，“供給他們情況，把五類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

幫助他們抄家。有員警問：紅衛兵打死人怎麼辦？謝答道：“打死了就打死了，我們根本不管。”“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針對心有疑慮的人，謝說：“連周總理都支持。”

相比之下，較之以往，文革把這種殘酷地打人的做法更普及、更上下通吃、更肆意妄為、更無法無天了。一切慘不忍睹的罪行，在“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下，在中華大地上顯現出血染的我革你命的風采。毛澤東特別不可輕饒的罪孽是，讓青少年孩子們從打老師做起，幹這種“好人打壞人活該”的罪惡勾當！既害苦了上一代，又毀滅了下一代。

“砸”的對像是“四舊”。我的一位也是右派的老師，是清皇室後裔，家有一些珍藏。他說，他的一幅畫，是鄭板橋的真迹，連同其他所謂“四舊”，都叫紅衛兵一火燒掉，別的再貴重的東西他說也可以不心疼。

每個家庭的損失雖說不小，但國家承受的却是損失之總和。國家損失之大不僅使當代人扼腕巨嘆，而且會使民族後代滴血不止。許多名勝古迹——軍閥大混戰、日本鬼子侵中國，都沒有遭到破壞，可是，都叫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給砸了個稀巴爛。有的是北京來的紅衛兵，如譚厚蘭領着砸孔府孔廟；更多的是當地紅衛兵，他們對一切都是熟門熟道，其破壞性之大，達到了無孔不入，無微不至。我記得當時的一張傳單上寫着，文革顧問陶鑄贊揚紅衛兵破四舊的景象，是把舊世界砸了個落花流水。我記得他說“落花流水”四個字，形象得簡直再現了現場。

現在文革的“砸”，固是罪孽深重，罄竹難書，其實並非今日始，而是一向如此。《浙江日報》1957年6月27日載：有人揭發省文聯主席宋雲彬（右派分子）跟他說過：“土地改革搞得糟，文化事業慘遭破壞，許多民間藏書幾乎被燒光，這等于秦始皇焚書坑儒政策。龍泉拆塔事件，這是共產黨破壞文物作風的沿襲。”

鑽屁股蝨郭沫若，無孔不入，連宋雲彬也不放過。他發言的最大效應是刺激別人的嘔吐神經：“革命的破壞是在所難免的。經歷一次像土地改革這樣偉大的革命運動，古書文物哪能沒有一點損失！中國地方大，文物多，保護起來，很有困難。而且是否一切古物都碰不得，也值得研究。譬如城牆，在中國幾乎到處都有，往往一個小市鎮也有城寨。除了必須保存，可以保存者以外，我看有很多城牆是可以不必保存的。凡是古物一律都動不得的思想，是一種封建的拜物狂，偶像崇拜的思想。宋雲彬把龍泉拆塔事件誇大起

來，好像天下文物都被共產黨破壞了，這樣看問題是不合邏輯的。”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歷史和邏輯是一致的。文革中文物遭到浩劫是歷史事實，但却不合郭氏“邏輯”。反倒郭的談話合乎了毛澤東夫子自道的邏輯：“祇有不要臉的人們才說得出不要臉的話。”

在反右傾中也有“砸”，這就是在全國城鄉發動的砸鍋煉鐵。革命就是“砸”，超出物質的砸，如砸碎國家機器；反右派中有“砸爛右派的舊法觀點”等；文革中砸爛公檢法，砸爛劉少奇的狗頭……

“搶”是文革的目的，在上為搶班奪權，在下為哄搶金銀財寶，文物珍品。它是通過打、砸、抄、抓的過程實現的。我的書籍、衣物櫃箱，桌椅板床，甚至連勞動的工具如平車等，都是在抄家時給搶去的。文革後也沒有歸還。我祇慶幸小命猶存，至于身外之物就無所謂了。

追溯“搶”的歷史，共產黨革命造反，所到之處，無不燒殺搶掠。共產黨的所謂革命，實屬完完全全、原原本本意義上的打砸搶抓抄。這是它的本性，祇用舉出老百姓把共產黨叫做“紅胡子”這一史實足矣。“胡子”就是土匪，“紅”指共產黨。可見國民黨把共產黨叫做“共匪”，是實事求是的，是有民意基礎的。“搶”在文革中出現的新奇景觀是、毛澤東鼓動群眾組織搶解放軍的槍。這是他號召“全面內戰”後，又要為“全面內戰”、搶班奪權提供物質基礎。正是，槍杆子裏出政權。

總計，文革中打砸搶抓抄的結果，葉劍英在十二屆一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有部分性披露：（一）規模性武鬥事件，4,300 多件，死亡 123,700 多人；（二）2,500,000 幹部被批鬥，302,700 多名幹部被非法關押，115,500 多名幹部非正常死亡；（三）城市有 4,810,000 各界人士，被打成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非正常死亡 683,000 多人；（四）農村有 520,000 地主、富農（包括部分上中農）及家屬被迫害，有 1,200,000 地主、富農及家屬非正常死亡；

其二，批鬥策略陰險，伎倆卑鄙，鬼名堂繁多。

據我之見，反右派之後，毛批鬥人的策略基本上是故伎重演，其特點是老一套中耍花樣。反右派和反右傾同用一套“引蛇出洞”的策略；文化大革命仍是這樣，祇是變了個小花樣，在“引蛇出洞”前又加了個“引”字，成為“引'引蛇出洞'”。意思是說，劉少奇所以搞“引蛇出洞”，是毛澤東“引”出來的，毛要用劉引出的蛇來咬劉。但等到毛領導文化大革命也



像劉少奇“老革命遇到新問題”的時候，他會怎麼辦呢？“外甥打燈籠——照舊（舅）”。不過毛可以毫不臉紅地說：“你講我不要臉就不要臉。劉派工作組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派工宣隊和軍宣隊就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盡管工作組與工宣隊和軍宣隊的職能全然毫無二致。”

毛澤東鬥倒鬥臭鬥透階級敵人所用的卑鄙伎倆，是集中共黨史、國際共運史、中外酷吏史之大成。所以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不論從認識上的需要，還是從實踐上的需要，都具有深刻的意義。

由於個人身受，耳聞目睹的不同，在認知上就有不同的側重。例如著名右派林希翎就對“株連法”痛恨有加：

最“致命”的，是株連家人與子女：丈夫無端地受排擠，精神大受刺激，孩子也受“左派”鄰居的孩子的打罵，回家問母親：“媽媽，為什麼人家叫你‘大右派’、‘壞人’，又叫我‘小右派’？‘右派’是什麼東西？”林希翎說：“我這個在各種批鬥和毒刑前從未流過淚的戰士，在聽到我的愛子向我提出這種問題時，忍不住抱着他放聲痛哭了”，“雖然我在政治上從來不吃後悔藥，對我所走過的道路無論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我都從來不感到遺憾和悔恨，然而我唯一感到萬分悔恨的憾事（也是不可饒恕的過錯），便是我悔不該結婚和生育啊！像我這樣當過‘大右派’、‘反革命’的人，乃是這個社會中政治上的‘麻風病人’，不可接觸的‘賤民’，還有什麼資格成家立業？有什麼權利當賢妻良母？！這真是作孽啊！”問題是，這樣的株連，是制服林希翎這樣的不屈的反抗者，維護“專政”的有效性的必要手段：這不僅是體現了一種倫理的殘酷性，更是體現了體制的殘酷性。

#### 右派李蘊輝在《追尋》中寫道：

總括這份（劃地右派的）材料形成的手法和思路是：（1）無中生有。如果是實事求是的，旁證又在哪裏？是幾個人作證？誰作的證？既然是定案，應該與當事人核實，為什麼不與我核實？（2）對某個黨員的意見，去掉其姓名、任職，籠統冠之以對黨的意見；把對局部做法上的意見冠之以對全黨、全局的意見。這與“黨員即黨”的思想方法是分不開的。（3）無限上綱，什麼“乘整風之機”、“分庭抗禮”、“醜化”、“誣蔑”、“攻擊”、“否定”、“庇護”、“進攻”，並據此羅織具體材料。（4）把對一件事的看法和言論割裂成幾條言論，即掐頭去尾，並割斷了言論的背景，因而失去了真實性。（5）定案中把對組織、對個人交談的話，尤其是10月份申訴的內容，也充

實到定案材料中去，作為定罪依據。

### 右派分子萬耀球在《滾爬血腥路》中寫道：

用信件、日記定罪是毛澤東思想的光輝，不僅反胡風集團靈驗，反右亦大顯神通。不僅擴大活學活用，全國皆以查日記、查信，斷章取義、左拼右摘誣以反罪，為每試必靈的抓右法寶，發展與充實了毛澤東的革命“三大法寶”。反右運動中，沒有鳴放，連日記、信件無問題，任何蛛絲馬迹皆無的人，為了湊足毛皇規定的數，被圈入右派另冊的也數不勝數。各地打手找出身不好的，不聽話的，有海外關係的，有舊歷史問題的，志願軍被美國俘虜送回國的等等，加以排隊法，排成一串，再用百分之五或超額乘人口總數，套那串候劃隊伍，綫外者幸免。此法為共產黨慣用，評先進、劳模，漲工資，提職稱，殺反革命，不論好事壞事均是排隊加比例。劃右派，按此法套中者，莫須有罪名，戴右派帽，打入另冊，歸類賤民，或送“絞肉機”監管甚至奪命，或交群眾專政。像作曲家、上海民樂團團長陳歌辛，1950年中共鼓勵他由香港回國，他把長子送到抗美援朝前綫，又獨自捐一架飛機。但後來却以他從香港回來為罪名劃為右派，押送安徽勞改，餓死在勞改農場，尸骨無存。（五七學社出版公司，2009年）

除此之外還有，如我在前面已提到的徐鑄成《“陽謀”親歷記》等，這些都是深受其害的現身說法。但我認為，在這方面作研究的學者所寫的文章，倒更具有綜合性和全面性。我介紹兩位：

一位是章立凡先生，在《風雨沉舟記——章乃器在1957》一文中，指出：

這時的批判方法也頗堪玩味，有不少路數其實是開“文革”中“大批判”之先河，披覽之餘，茲擇其妙者分類列舉如下：

一曰移花接木法。此法源自古代幻術，你的原話是這個意思，經批判者移花接木，就變成了另一種意思。如原意是擔心思想改造要“脫胎換骨”的提法會加重被改造者的思想負擔，並被敵人用來作反宣傳；批判者吳大琨演繹出“抽筋剥皮”四字移接于後，指稱：章乃器說工商界在過“五關”之後，還要有“脫胎換骨”“抽筋剥皮”的最後一關。此話上達天聽，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談到右派抵制改造時也引以為據，並表示不解：“這位先生，誰人去抽他的筋，剥他的皮？”（《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89頁）

二曰斷章取義法。前法是加法，此法是減法，取自古代刀筆猾吏。你的原話本意是完整的，經批判者掐頭去尾，截取一段，曲解成另一種意思。如

前面提到的“紅色資產階級政黨”，“紅色”是形容詞，以修飾“資產階級政黨”，本意是強調民建的進步性；批判中刪去“政黨”二字，變成“紅色資產階級”，就可作為美化資產階級的罪證。又如原話是“定息不是剝削而不勞而獲的收入”，截去後半句就變成“定息不是剝削”，與原來的意思大不一樣。

三曰無限上綱法。此法明清兩代文字獄常用，經過“文化大革命”更加發揚光大，家喻戶曉。你批評教條主義，就把你上綱到反對革命導師的教導；你批評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以黨代政，就扣上“反對黨的領導”的大帽子。大綱彌天，羅織入罪。

四曰整舊翻新法。此法傳自民間工匠，裁縫師傅用之最多。將你幾年來乃至幾十年來的文章翻出，割裂時代背景或曲解原意地加以詮釋，掛聯當前形勢，一番穿鑿附會，就足以證明你的反動立場由來已久。當時民建、工商聯曾為父親編過這樣的專輯。在我為他申請平反和編纂文集的時候，這幾本現成的小冊子倒是幫了我不少忙。

五曰指鹿為馬法。此法襲秦代宦官趙高之故伎，似是而非，偷換概念。例如父親的文章談到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關係，認為：“歷史上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區別都祇是先進與落後的區別，不能設想，一個先進的階級可以領導一個反動的階級”；到批判時就被曲解為：“這就是說，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祇是先進的分子領導落後的分子，並沒有階級區別的存在”。經此加工，一段論述階級關係的話變成了“否定階級區別”。

六曰無中生有法。《老子道德經》雲：“世間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這是一種對萬物起源的哲學思考。而用此法整人者大都不明事理，更無道德可言，或捕風捉影，或憑空捏造。例如“章羅同盟”就是其典型杰作，章伯鈞、羅隆基在民盟內素不相和，被硬拉到一起，株連多人，鑄成冤案。父親與此事風馬牛不相及，但也有人造謠說他參加“章羅同盟”在全聚德的會議云云。

七曰兜頭潑糞法。此法流氓潑皮慣用，祇須將大桶糞穢向被批判者全身潑灑即可，不必多下考據功夫，最適于文化水平不高的批判者使用。諸如個人財產、鄰裏糾紛、夫妻夜話、男女私情之類最宜入選，越是聾人聽聞，就越能達到使被批判者名譽掃地的效果。

八曰亂棍齊下法。此法歷代公堂皂吏多用之。批判者倚仗人多勢衆，棒喝聲威，不容被批判者有辨解的餘地，敢有不服者，亂“棍”齊下，打得

你“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直到誣服為止。

帝王術講求“文武之道”。前面六法皆是文法，深文周納，以謀略取勝。後二法是武法，雖等而下之，但簡單易行，屢試屢驗。但充其量也祇算是文鬥中的武法，有別於“文革”中真刀真槍的武鬥。

此時的人際關係也最富戲劇性，諸如公報私仇、賣友求榮、夫妻反目、反戈一擊之類的例子層出不窮。這似乎也怪不得被毛澤東喻為附皮之毛的中國知識份子，大部分人都近于瘋狂地洗刷自己，與“賣友求榮”相比，“賣友求生”已算不得什麼人格上的瑕疵。其中最可悲者，是那種高壓之下聲淚交加的懺悔，與批判者“打落水狗”以自保的冷酷。批判的聲浪震撼着大大小小的泥塘，隨着鬥爭的“不斷深化”，邊緣的泥土不斷陷落，泥塘的面積不斷地擴大，站在塘邊呼喊的人們也紛紛滾落其中。誰無妻兒老小，一人入圍，全家罹禍。求生的掙扎，足以使人忘却他不久前還為之驕傲的士大夫道德和知識份子人格。在轟鳴狂轉的國家機器面前，人類的生存本能戰勝了理智與良知。

另一位是，郭羅基先生在《鄧小平和反右派——兼為章伯鈞、羅隆基翻案》一文中指出：

要整得人不敢“翹尾巴”是有一套辦法的。例如，說章伯鈞“要成立政治設計院”，用的是加油添醋法。章伯鈞本人沒說要“成立”，《人民日報》社論加添“成立”一詞，就可以入罪了。說羅隆基“要成立平反委員會”，用的是移花接木法。羅隆基的發言一處說要“成立一個委員會”，另一處提到“平反”；《人民日報》社論把“平反”之花接到“委員會”之木上，於是構成罪名。“章羅同盟”，辯之者說無，攻之者說有；毛澤東斷定為有，用的是無中生有法。毛澤東批評《文匯報》編輯部是在“鳴放”期間鬧資產階級方向掛帥的。帥上有帥，就是“章羅同盟”中的羅隆基。“兩帥之間還有一帥，就是《文匯報》駐京辦事處負責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幹的女將。人們說：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就是《文匯報》的這樣一個民盟右派系統。”（《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35頁）這是上掛下聯法。此法在“文化大革命”中廣為應用；上掛劉少奇，下聯走資派，上下一條綫，打倒一大片。羅隆基說：“今年5月間浦熙修到東北視察去了。等到她視察回來，6月3日我又出國了。即使我真有意利用《文匯報》在整風期間擴大右派宣傳，事實上這個時期我也無法利用。”（《人民日報》1957年7

月16日)羅隆基大概沒有聽到周揚的“在劫難逃”的說法。他不懂得,掛不上也得掛,聯不成也得聯,這是階級鬥爭的需要。

整人的法術還有捕風捉影、強加于人、去頭掐尾、本末倒置、穿鑿附會、混淆黑白、偷梁換柱、向壁虛構、無限誇大、含血噴人、一棍打死,等等,等等,總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也是歷來搞政治運動的一套整人術,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更加發揚光大了。武則天的寵信來俊臣所撰《羅織經》,是制造冤、假、錯案的經典著作。用他的辦法來對付他本人,最後也不得好死。成文的《羅織經》已經失傳,不成文的《羅織經》却長行不衰。共產黨的整人術繼承了中國歷史上的骯臟遺產;但共產黨的整人術比歷史上的焚書坑儒、深文周納、羅織經、文字獄都要高明,整了人還要他自打巴掌、自扛枷鎖,並對共產黨感激涕零。

一個人被徹底孤立之後,就對他進行全面揭發,窮追猛打,深入批判。這是第二步。搞運動是群眾性的審判,按照“有罪推定”的原則,先推定有罪,再搜集材料。然後一步一步逼迫批判對象認罪。章伯鈞起初承認“思想上犯了嚴重錯誤”,“為右派分子所利用”。6月15、16日,由各民主黨派組成的《光明日報》社務委員會連續召開會議,檢查《光明日報》的政治方向。李純清質問章伯鈞:“你說你被右派分子利用了,你是不是右派?”章伯鈞被迫承認:“在這個問題上,也可以說是右派。”(《光明日報》1957年7月17日)7月3日,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安徽小組會上,批判“章羅同盟”。章伯鈞承認:“在思想上、工作上是和羅隆基聯盟的,但沒有正式開過會,沒有明確的幾條綱領。”同一天,農工民主黨座談會上又批“章羅同盟”:最後是定性戴帽,由本單位的黨委批准。是不是“反黨”?何以構成“反黨”?都由“黨”說了算。“黨”是原告,却成了立法者,又兼法官。你反對我,我就宣布你是反動派、剝奪你的發言權。這是一種簡單明了的專橫。反右派是一場嚴重破壞法制的運動。“黨”可以下指標,按百分比抓右派,周揚所提供的事實表明還有按名單抓右派。

以上這兩位專家所指出的作法,在後來的反右傾直到文革中,都得到廣泛的應用,並且愈演愈烈。僅以發生在反右傾後、文革之前,哲學家楊獻珍“合二而一”案的株連情況為例,說明反右派的後果之惡劣,流毒之深廣。

在中央黨校受“合二而一”冤案株連就有154人,他們被加上各種莫須有的罪名受到迫害。其中哲學教研室副主任孫定國,被迫害跳入黨校人工湖

冰窟窿裏自殺。哲學教研室講師黎明，下放農村勞動，在文革中被迫害，跳井自殺。那兩位寫《“一分爲二”和“合二而一”》文章的教員，一個被遣返到吉林省長春市，在一個菜店裏賣菜，一個被發配到偏僻的山溝裏勞動改造。

在全國，由于“引蛇出洞”而被株連的人，更是不計其數。他們也都受到了殘酷的迫害。海軍航空兵學校有一教師，因寫了一篇關於“合二而一”的稿子，寄到一家報紙，被報社轉回學校，這個教師被打成楊獻珍的“孝子賢孫”，遭到批鬥，最後被開除軍籍趕回農村。廣東省有一個人寫了一篇同意“合二而一”的文章，投到報社，被報社轉回原單位，這個人就成了“楊獻珍的黑幹將”，被關押了好多年。其中最慘的一例，江蘇省一個五好戰士陳波，就因爲寫過贊成“合二而一”的文章，竟至被處死碎尸，凶惡殘忍，令人發指。事過16年之後，楊獻珍劫後餘生，悲憤地對一位訪問記者說：“歷史上有過株連十族的例子，那就是明朝的方孝儒的故事。所謂十族，就是九族加上他的學生。而“合二而一”受株連的却遠遠超過十族。而那些受株連的人中，很多人同我毫無關係，我也根本不認識他們，不過僅僅因爲寫過贊成“合二而一”的文章，竟也遭到各種各樣的迫害。”這種人數多，時間長的大規模株連，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

#### 4. 反右與文革的來龍去脈，屬於同一根源

我們通過來龍去脈，思前想後，來作一新的總觀察：一點是自反右派後，所有能稱得上“運動”的運動，都是具有反右性質的，而且都是從反左開始的；這使每一個運動的發起，都具有“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陰謀性。另一點是，毛在反右派鬥爭中打倒了右派，取得了在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大躍進旗開得勝，一天等於20年，在世界上出足了風頭；反右傾，彭黃張周應聲倒地；反右傾，鼓幹勁，繼續躍進，以4600萬餓死鬼作代價換來毛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幾句假檢討，然曾幾何時，又掀起反三風（翻案風、黑暗風、單幹風），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毛最終還是反取爲勝；發動文化大革命，毛成了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從表面上看，毛節節勝利，最後已達到自己政治的最高峰；實在地看，却是跌到自己的最低谷；每次勝利都是失敗；小勝小敗、大勝大敗，最後勝利意味着嗚呼哀哉，徹底完蛋。

實在地看，是否如此？例如被毛定爲一生中最後一件大事的十年文革，却被自己黨的《決議》定爲“十年浩劫”；如果一個政客的最後十年所作所

爲定爲“浩劫”，那他還不是嗚呼哀哉，徹底完蛋，甚至死有餘辜嗎？其實哪止十年？反右派，劃100多萬知識份子爲右派，不是浩劫嗎？反右傾，把380萬幹部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鄧小平1962年5月說：這次運動被整的“全國估計總有一千萬，影響的人總有幾千萬”。不是浩劫嗎？大躍進，別的巨大損失不說，餓死4,600多萬人，不是浩劫嗎？往前推，湖南農民運動，打土豪分田地，前前後後的土改運動，圖財害命，不是浩劫嗎？

可以說，自從1921年，特別是自1949年以來的中共黨史就是一部中國人民遭受浩劫的歷史。下面我們來就着反右與文革的比較，來進行追根溯源。關於現實根源，二者同出一轍：國際上是蘇共20大及波匈事件，國內是中共八大及五大運動，三大改造所激起的矛盾。前已詳述，故爾，止于此，而單說歷史根源。現將之分述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的和毛澤東個人的，這樣的三部分。

（1）國際共運的：毛澤東自稱是斯大林的學生，又自稱是是中國的斯大林。事實正是這樣。他在專制理念與實踐上，倒真是源于斯大林而勝于斯大林。就以文革而論，程曉農指出：

早在1928年到1931年，蘇聯就推行過“文化革命”運動。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在其政策話語裏，從蘇聯模仿來的“文化革命”一詞曾頻繁出現在重要的黨政文件裏。從1964年到1966年8月，中共在文化教育領域內採取的一系列政治行動也與蘇聯30多年前推行過的“文化革命”十分相似；但從1966年8月起，毛澤東將一場類似于蘇聯的“文化革命”轉變成了“文化革命”加“政治大清洗”的“文化大革命”，由此產生了比蘇聯的“文化革命”更爲惡劣、廣泛、深刻的後果。

鄧小平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可見毛打內心裏不是不知道英美的民主制度優越于俄國人的共產制度。但，他要的是斯大林的刀子。

所謂“斯大林這把刀子”，就是指斯大林式的共產極權制度，也就是國家絞肉機。因爲，“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領袖個人專政”，所以這個共產極權制度就是毛達到自己個人專政的不二法門。他掌握了這個絞肉機，就可以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上面提到的那些大量的被害人，就是都被投進了這種機器裏。所謂“絞肉機”，就是刀子的機械化，殺人的效率是很高的。毛澤東把它視爲命根子。有些人把毛反蘇認作是他的民族氣節，甚至把他視作民

族英雄，實在是天大的誤會。他反對的不是蘇聯，而是蘇聯和世界共運中的反斯大林主義。毛始終堅持“一邊倒”的原旨；現在的“一邊倒”就是倒向斯大林的尸體，維護他最黑暗、最殘暴的陰魂在中國不散、在毛澤東身上借尸還魂。斯大林的刀子並不是單個一把刀子，而是一臺隆隆作響的絞肉機。毛反的是赫魯曉夫丟刀子，祇恐怕蘇聯比斯大林時代惡劣得次了點，這祇能說明他拉時代後腿、反動透頂，與民族主義毫不沾邊。現在一些文革研究者，由于沒戳破這個“反修”的鬼名堂，竟然把問題給說顛倒了，說文革是毛要反劉少奇所維護的斯大林官僚主義體制。其實毛的“反修”，就是要維護斯大林這把刀子，就是要“反”赫魯曉夫對斯大林主義的“修正”。

(2) 中共黨內的：對共產黨搞領袖個人獨裁，鄧小平的說法是“搞家長制”。不管從國際、還是國內，都非自毛澤東始，也不獨毛澤東然，單說中共領袖，即如鄧所說：“陳獨秀、王明、張國燾等人都是搞家長制的。”讓時間順延至今，你鄧小平是不是搞家長制的？他江澤民是搞什麼制的？問題是這樣做，中共黨既不是根也不是源，而是植根于，或說發源于莫斯科。因為，中共不是國貨，是共產國際、實際是蘇共的兒子黨。是老子黨一手培植起來的，其劣根性源于老子黨的遺傳基因。還是鄧說的：“這種現象……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鄧小平說的“傳統”，在《詞典》上解作：“世代相傳，具有特點的社會因素。”和我說的“遺傳基因”在大意上是不謀而合的。這明明是應該歸咎于“黨文化”的。但許多人把它歸咎于中國傳統文化！難道中國傳統文化還要對“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負責嗎？辛灝年先生一語破的地指出：“他們（包括一部分黨外人士——紫丹）硬要將中華民族的歷史與文化拉來為中共的犯罪現實作替罪羊罷了。”正確地說應該是，歸咎于毛澤東用馬列文化毀滅、篡改、膨脹了中國文化。毀滅、篡改的是中國文化的主體，即優秀部份，如溫良恭儉讓、民貴君輕、諸子百家爭鳴等；膨脹的是中國文化中的落後部份，如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等。為了“膨脹”這一點糟粕，首先把自己打扮為“君”。“毛主席萬歲！”就是他加在慶祝“五一”口號裏的；又是他提倡“正確的”個人崇拜的，並且說，不崇拜不得了。柯慶施幹脆抬轎子：“相信領袖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領袖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至于毛君叫死的，貴至國家元首、賤至黎民百姓，沒有誰會活下來的。就以信陽事件餓死的 105 萬農民說罷！當時因同情



農民、被劃為右傾主義分子的地區專員張樹藩，生前為歷史流下了第一手資料：“從信陽事件中可以看出，我們的廣大人民群眾真是太好了。當時信陽地區餓死那麼多人，並非沒有糧食，所屬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但群眾寧願餓死，也沒有搶過一個糧庫。”（《葉落蕭蕭江流滾滾》，頁466）傷心哉！“寧願餓死”者，有甚于“不敢不死”也。並且把這種人禍歸罪于自然災害。

共產黨對中華文化的態度：一是“膨脹”糟粕；二是對於精華，反其道而用之。以“自然災害”為例，有民貴思想的孟子說：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路上有餓死的人，不知救發濟糧，人死了，還說：“這怪不得我呀！是自然災害呀！”）是何異于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這和持刀殺人後，說“不是我殺的，是兵器殺的”有何區別？）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矣。（王你如不把餓死人、歸罪于自然災害，黎民百姓就會欣然而至。）（《孟子·寡人章》）

孟子善取喻，用這個虛擬的例子來諷喻梁惠王的過錯。不料兩千多年後，毛澤東就真的這樣幹了，一手遮天，欺騙百姓；既視人命如草芥，又把殺人之罪歸于天。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招致毛君要叫他死。今年是大躍進50周年；“自然災害”之說，仍盈于耳，而說“人禍”者，十不及一、二。毛搞“自然災害”之說騙人，能歸咎于中國文化嗎？十分之八、九經久不悟，執迷于彌天大謊，能歸咎于中國文化嗎？“群眾寧願餓死”，也歸咎于中國文化嗎（除非《水滸傳》不算中國文化）？

其實，毛澤東把“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不止是膨脹到這一步田地而已。而且膨脹到“君教臣活臣不敢不活”。如果你自作主張而死，比如自殺，那就是犯罪。罪名曰：“自絕于人民、自絕于黨”；在運動中自殺就是“畏罪自殺”，或是“向黨示威”；對右派自殺還有一種特殊說法，叫做“戴着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所以毛的大秘書、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聽了毛澤東的批評後，很緊張，想自殺。他曾對人說：我查了書，馬克思的女婿、法國的拉法格是自殺的，列寧還紀念他，證明共產主義者可以自殺。他還說：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陳伯達找周恩來談，談話後，陳伯達才不自殺了。後來，有人把陳伯達想自殺的事告訴了江青。江青大罵陳伯達：“你給我自殺，你給我自殺，自殺就開除你的黨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氣自殺嗎？！”可見自殺不自殺，也要從馬列文化中找根據。

辛灝年先生說：“由中國的馬列子孫們專門揀拾我們民族文化中的落後

成份，而制造出來的種種‘先進馬列文化’，它們就不僅是一種文化上的倒退，而且具有相當的欺騙性。如今常常要津津樂道我們民族文化‘孽根性’的所謂文化精英，由于他們祇知馬列文化，根本不知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所以，他們才要將馬列文化之罪，硬說成是我們的民族文化之罪；更要將馬列文化的孽根性，說成是中華文化的孽根性！這不過是一種“對馬列有情、對祖宗無知”的顛倒而已。”（《黃花崗》總5期）辛先生在《誰是新中國》一書和多次演講中，對馬列文化如何害我中華文化，以及中國人如何受馬列之毒這一問題，作了歷史地考察、邏輯地分析、系統而深刻地論述。我在這裏祇是舉了一個例子而已。

即便是“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這一點，也仍有另一點與之補充、抗衡和匡正。“君雖貴，以白為黑臣不能聽；父雖親，以黑為白子不能從。”（《呂氏春秋·應同篇》）還有前面提過，忠臣敢于“罵昏君”。中共治下，在“新”中國的文化裏，祇剩下馬列在跋扈了。

黨文化是馬列文化、對中華文化是擇其劣者而從之，其優秀者批判之。我記不起是哪位左派人物曾說過：“中華文化越是精華，毒素越大。”

就以在批林批孔中批為“黨內大儒”的周恩來說吧！海內外都有人把周恩來死心塌地、助紂為虐的惡行歸咎于中國的君臣文化。可是，作為中華文化主流的孔孟學說，關於君臣之道是這樣說的：“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可見是雙向的。更大膽的是，如君賊仁賊義，則殺之也無妨。“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于傳有之。曰：臣弑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看來，當時林家父子搞的“571工程紀要”如果達成，真的把老毛殺了；代表中國文化的孟子會舉雙手贊成的。

“黨內大儒”周恩來雖熟知這些，但因中馬列毒太深而不能自拔，從這方面看，也正如辛先生所說：“將馬列文化的孽根性說成是中華文化的孽根性。”從另一方面看，作為人類文化糟粕之總匯的馬列文化，它的子孫對中國文化的糟粕特別嗜癩有癖，還以“忠君”來說，不僅周恩來如此，全黨皆然，如對毛澤東的“三忠于，四無限”，就是最好的說明。按孫中山的意思，應該相反，不是人民對領袖，而是領袖對人民應該“三忠于，四無限”。

孫先生說：“我們在民國之內，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國，要忠于民，要為四萬萬人民去效忠。為四萬萬人效忠，比較為一人

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還是要保存。”當有人喊孫中山“萬歲”時，因他對擁戴皇帝的這一套表示深惡痛絕而堅決反對。可你知道嗎？在大陸慶祝五一勞動節的口號中，據知情人說，是毛澤東自己親筆加上“毛主席萬歲！”的。更別提文革時“萬歲，萬萬歲”的聒噪、不絕于耳了！用孫先生的言行對照毛的言行，方信辛灝年言之有物矣：“由中國的馬列子孫們專門揀拾我們民族文化中的落後成分，而制造出來的種種‘先進馬列文化’，它們就不僅是一種文化上的倒退，而且具有相當的欺騙性。”

有人說，文化大革命與文化無關。這話說得不是全不對，而是不全對。文化大革命是大破古今中外優秀文化、大立黨文化（廣義地說，政治也含其內）。如此而已，孰曰非也？這就使人們看清了他們大規模的“焚書坑儒”之浩劫，對於書、儒，即便躲過焚、坑，也躲不過“批”的居心所在。如果說，大陸存活的知識份子躲不過生不如死的洗腦運動，那麼，所有古今中外的書和知識份子幾乎都躲不過挨批、焚、坑、洗、禁，這一切都是為了破壞文化精華，樹立馬列糟粕。許多人呼吁，要復興中華文化；復興中華文化，一不是刻舟求劍，二不是排外主義，而是遵循國父遺教：“發揚吾固有文化，並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期與諸民族並驅于世界，以訓致于大同。”即現代化。

警惕別有用心的人肆意嫁禍于中國文化。試看與中國文化不沾邊的國際共運：被毛奉為教皇的列寧、斯大林，“唇齒相依”的金日成父子，“天涯若毗鄰”的霍查，全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波爾布特……哪一個不是搞家長制的？哪一國的絞肉機不是機器隆隆，血肉橫飛？波爾布特政權，竟能夠絞殺 200 萬人民，包括 20 萬華僑，而柬埔寨人口總共還不到 800 萬人呀！這就是文化大革命要大樹特樹的“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綉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甚至一個名叫“彬彬”的女孩，也親聆最高指示，改名為“要武”，而名實相符的後續行為，便是對老師和黑五類同學大開殺戒），那樣溫良恭儉讓”的血淋淋的黨文化！

還是鄧小平的胡說：“從遵義會議到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一直比較注意實行集體領導，實行民主集中制，黨內民主生活比較正常。”

這首先與眾所周知的事實不合，誰不知道他的專斷獨行的劣根性其來自？跟遵義會議前，肉體消滅江西省委書記李文英及富田事件大屠殺一

脈相承的，遵義會議後的延安整風，殘酷鬥爭，冤殺無辜，不是鐵的史實嗎？其次，又與邏輯相背：說不通、怎麼後來會來一個突變呢？問題的實質是，這段期間劉少奇、鄧小平這些毛派分子掌權，對主子的家長制逢迎有加；周恩來、李立三等這些原非毛派的分子，都已成爲惡婆婆面前臨淵履冰的小媳婦；汝不見毛對周恩來等欺人太甚、至死方休嗎？待中共受蘇共影響，在八大上提出反對個人崇拜，把以他的思想爲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從黨章中去掉，他便一觸即跳；及至廬山會議，彭德懷站在非常正確的一面，又以非常正確的途徑“觸”了一下，他便歇斯地地跳了八丈高。不過，這倒凸現了延安整風，確實是“不與黨外分享政權”的反右派鬥爭，和“不與黨內分享黨權”的文化大革命，此二運動的淵源。

延安整風樹立毛在黨內政治上、軍事上、文化上、組織上、意識形態上的絕對領導地位，使共產黨黑社會化，毛成爲黑社會的黑老大。從此以後，所有毛時代政治舞臺上的紅角都是靠吹捧毛才得以固位和向上爬的。劉少奇、林彪所以能當上接班人，是高舉、緊跟毛極左路線，助毛打倒敵手，制造個人崇拜，在一場全黨全民助紂爲虐的大競賽中、先後榮獲“冠軍”的緣故。你很難找出一個不是這樣的。

鄧小平在反右派、大躍進時都是副帥，是前綫總指揮；他助毛消滅高崗、饒漱石“聯盟”；他誣陷“小腳女人”鄧子恢；他是毛 50 年代瘋狂推行極左路線的最忠實的貫徹者；他爲遮掩毛澤東、江青的醜惡往事制造了“潘漢年楊帆反革命集團”冤案（馮志軍《鄧小平與毛澤東》，頁 209-210）；等等豐功偉績。這才得以爬上去的。

中共七大期間，中共當時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任弼石曾經說：“毛澤東三個字不僅成爲中國人民的旗幟，而且成爲東方各民族爭取解放的旗幟！”

陳雲 1941 年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時，在 9 月到 10 月間的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毛主席是中國革命的旗幟！”

據薄一波記述，1959 年初，毛澤東找陳雲等人談經濟工作。陳列出諸多困難，認爲 1959 年度計畫難以完成。有人不贊同陳的意見，認定爲是右傾。毛傾向于陳的意見，有心降低指標，故要他向下面講話。可是，陳雲沒有理解毛的意思，以爲毛又要他做檢討，于是在 2 月 1 日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會議上，先講自己真實想法，然後重重自我批評，認認真真檢討了一番。

陳雲此番舉動又把毛澤東弄糊塗了。毛說他本是贊同陳的，但不知陳後

來爲什麼要檢討自己。這個事情是否滑稽得讓人啼笑皆非？“啼”者，貴如陳雲這樣的領袖人物，在毛面前都給嚇破了膽；“笑”者，以敢講真話著稱的陳雲，竟被毛耍得像一隻馬戲團的猴子，不講原則，不講是非。

彭真，文革開始鬥他時，他還要醜表功，說“毛主席萬歲”是他第一個喊出的。

柯慶施在廬山會議上提出的“迷信論、盲從論”，這一令人聞之莫不掩鼻的臭論，應該說是文革前造神運動的最高峰。

毛澤東搞的禍國、殃民、毀黨的所有這些政治運動和罪惡行徑，都是共產黨自覺自願或不自覺自願，擁戴着他搞的。對共產黨來說，完完全全屬於“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3) 毛澤東個人的歷史根源：上面我們從內因、外因、遠因、近因、制度的原因，個人的原因等各方面，對事情的來龍去脈作了探討與說明，一般來說，至此足矣。但，特殊地說，毛澤東這個個體太特殊了，其特殊性可用一般細胞與癌細胞相比。劉賓雁一言以蔽之，曰：“毛澤東一手定乾坤！”所以，很有必要再強調一下這一部分。

毛澤東出于“我要大”的動機，使他的一生呈現爲“三步走”，即他要當三次大救星：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他成爲黨的大救星，黨的老大，官方語言爲：“他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1949年，他建立了“黨天下”，成了國家的老大，中國人民的大救星！並於1957年反右派鬥爭，鞏固了這一成果；他發動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建立毛天下，在世界是要當世界革命導師、當世界人民的大救星、世界的老大，官方語言爲：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是當代的列寧！

數之不可勝數的人，稱贊毛澤東少年立下救國救民的大志。但是，這就解釋不了他當上共產黨的領袖後，爲什麼違背着黨內大多數人（上自王明、周恩來、彭德懷等，下至廣大黨員、黨外人士）的意志，不抗日、破壞抗日、在抗日期間“讓日本多占地”，奪得政權後向日本的侵略道謝呢？又，爲什麼大種鴉片不惜讓我民族亡國滅種呢？這用“救國”的動機能解釋得了嗎？至于殺死、餓死幾千萬，而活着的也是處於終歲恐懼、啼饑號寒之中，這用“救民”的動機能解釋得了嗎？人民認爲這是毛澤東的罪惡。鄧小平硬堅持說：這是毛晚年犯的錯誤，並且說：“不必照樣搬用過去的提法，說每個錯誤的根源就一定有三個，一定都有社會根源，思想根源，歷史根源。”

難道鄧認為毛的“錯誤”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嗎？我們追根溯源是爲了弄清毛的獨裁到底是“哪裏來”的？我們每個知識份子，特別是右派分子曾無數次地被迫作思想檢討，並追查自己錯誤的社會根源、思想根源、歷史根源，這一套已經久練必熟，已成一技在身，現在正好在毛身上“以其治人之道還治其身”。

毛恨自己的父親殘暴蠻橫、固執倔強、剛愎自用、是家長制暴君，用巴掌、拳頭、棍棒、打罵、訓斥，維持其統治。這就使毛自幼養成對人不僅缺乏同情、寬恕，而且時常懷恨在心。他雖反對其父，却繼承了其父的全部秉性。這在心理學上講，是氣質具有遺傳性；在唯物論上講，人是環境的產物；在辯證法上講，是對立的雙方又互相滲透。所以他的第一個戀人陶斯咏小姐，發現他的專橫殘忍的性格就離開了他。1940年代，在延安時，他效尤其父執棍棒揍他弟弟毛澤覃，弟弟爭辯說這是共產黨，不是毛家祠堂。但他終於把共產黨變成了毛家祠堂。1950年代，《人民日報》載：右派份子章伯鈞說，毛是歷史上第一個大流氓；羅隆基說，毛這個人厲害狡猾，比歷代統治人物都凶。1960年代毛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1970年代在“四五”運動中，毛在人們喊出“打倒現代的秦始皇！”的餘音繞梁中，一命嗚呼。這該是毛形成個人專制獨裁、稱王稱霸惡習的家庭根源、歷史沿革吧！

1909年他16歲時，“我要大”的衝動，便流露在《咏蛙》一詩中：

獨坐池塘如虎踞，綠蔭樹下養精神；  
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

看這首詩所呈現的神態，是否一個活脫脫的毛澤東？

過了九年，毛澤東25歲，“在致友人的信中提出了研究歷史，最重要的是尋找到代表那個朝代的‘巨夫偉人’，其他不過是其附屬品的看法，表現了他的英雄史觀。”

他一生的政治行爲，是否正好貫徹了“他的英雄史觀”：自己是“‘巨夫偉人’，其他不過是其附屬品的看法”？

他強烈的“我要大”的動機，促使他幹出很怪異的事情：凡是“大”到接近他，成爲二號人物，他都要打倒：劉少奇死時，白發二尺長！林彪死于折機沉沙。林彪死後，周恩來爲毛澤東的灰頭土臉撐腰打氣，毛曾向周表示過交權；但作爲二把手的周、最後還是毛用癌細胞“借刀殺人”，殺人不見血，給殺死了。（《晚年周恩來》）可你不能不佩服周恩來的精明，

他曾為林彪之死、使他失去“擋風牆”而大哭過一場；當毛表示要給他交權時、他竟給嚇得小便失禁。兩起兩落的鄧小平又復出，毛想叫他當接班人，和所有接班人的下場一樣，他再一次被打倒，完成了三起三落的政治鬧劇。在這一點上，毛利令智昏，使得他都趕不上兔子的智商；兔子都知道與窩邊草共存共榮。

反右派和文革的發動，是毛澤東人心不足蛇吞象的表現。如果毛要是以作好中國的統治者，辦好中國的事情為滿足，那他就該想方設法以把中國治理得富強康樂為鵠的。事實相反，他搞得民不聊生，國無寧日；“八億人口不鬥行嗎？”——這是為什麼？這叫什麼話？回答這個問題，長話短說，就是毛當世界領袖的壯志未酬，仍需人民勇當炮灰。

他有多大的野心，就會遭到多大的失敗，中國人民就會付出多大的代價，我們的經驗教訓就會有多麼的沉重！許多人各抒己見，都在這方面進行了探索和總結。我本着“愚者千慮，必有一得”的自信，來略述我對作為個人的毛、一生的意義的看法。

我在拙著中寫道：毛陰謀一世，落了個“贊成的少，反對的多”；一輩子以“運動群眾”為能事，而成就“霸業”；到現在，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全國廣土眾民、山崩海嘯、風起雲湧，兵鋒直達黃龍府。“四五運動”剛過，毛第二天給華國鋒、王洪文、汪東興說：“廣場、外地，都搞得火熱，悼念總理，要鄧小平上臺，這都是針對我的，要打倒我，我是‘豺狼’的後臺。”據說，毛真的變成了他自己說別人的：“向隅而泣的可憐蟲”。他面對着自己過去的“過五關、斬六將”，譬如，對着解放軍的入城式、群眾箠食壺漿以迎王師，他本該趾高氣揚，却是淚流滿面兮、長嘆息！周恩來的秘書說：“毛澤東晚年時，常常落淚，有時不能自己。陳永貴去看他，他握住陳永貴的手，講不出話，淚如泉涌。陳永貴也跟着痛哭不已。毛澤東請常年跟隨他身邊、勞累過度而住院的、護士長吳旭君看電影，看到解放軍入城，痛哭失聲，以致滿場哭聲，電影未能放完……”《矛盾論》上說，矛盾向着自己相反的方面發展。玩弄群眾、運動群眾的毛，發展到了相反的方面，嘗到了群眾運動的滋味。陰謀詭計、作惡多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政治性命。這就是必然的規律。“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帝王豪情不見了；“我們是秦始皇的100倍！”不可一世的驕橫不見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浪漫主義不見了；鎮反、肅反、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的

殺氣騰騰不見了……唯獨剩下了“俱往矣！”一切的一切、都走向了反面；一生的爲非作歹、都等待着歷史法庭的嚴峻審判。

毛澤東在廬山批周小舟時，曾說過這句西諺：“誰笑到最後，誰笑得最好。”如果從他一生中吸取個人人生教訓的話，那就是，要想“笑得最好”，就要爭取做到“與天和、與地和、與人和”，與萬物同笑，“笑到最後”。千萬別學毛，嘴巴說的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實際做的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一心迷醉于在鬥天、鬥地、鬥人中的“其樂無窮”，直到鬥得“不亦樂乎”！最終做了一個“哭到最後”、哭得最慘的孤家寡人。

李銳引用毛澤東的話說：“吾祇對於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負責。非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吾蓋不負責焉。既往吾不知，未來吾不知，以與吾個人之現實無關也。或謂人在歷史中負有繼往開來之責者，吾不信也。吾惟發展吾之一身，使吾內而思維，外而行事，皆達正鵠。吾死之後，置吾之身于歷史之中，使後人見之，皆知吾確然有以自完。後人知吾之完滿如此，也自加吾以芳名。然而非吾之所喜悅，以其屬之後來，非吾躬與之實現也。”李銳緊接着，就此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這一段話，是不是可以看作毛澤東對人生態度的宣言，甚至看作他一生作爲的預言呢？”余應之曰：諾。

汝觀彼之一生，其對何、對孰負責之有？——國乎？自毀長城；民乎？不勝其擾；黨乎？文革癱黨；社會主義陣營乎？鬩牆爭霸以分裂兮！種解體之潛因；家乎？鱷魚淚灑哭驕楊，始亂終棄賀姑娘，選妃神州荒唐事，共產共夫唯女皇。”——此豈非“吾祇對於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負責”之妙諦歟？嗚呼噫嘻！斯國、斯家而有斯賊也。

李澤厚先生說：這樣一來，“以不斷運動、頑強奮鬥、克服‘抵抗’、實現自我爲人生快樂，是青年毛澤東思想和行爲的主要特徵”；“運動、鬥爭成了他的身心存在的第一需要。”

我們在前面已經弄清了他人人生行爲主要的精神動力就是：“一大”；“二公”；“三鬥”。他的動機是一個“大”字，就是終生追求“我要大”，大了還要大，越大越不嫌大：延安整風後實現了“朕即黨”，不行，還要大；全國篡權後又實現了“朕即國家”，但毛欲壑難填，還要大，如普希金《金魚的故事》所講的那樣，人心不足蛇吞象……

他的理想是一個“公”字，就是實現全民所有制，也即國有制。因爲“朕即國家”，所以即爲“朕有制”，連農民手中有幾個雞蛋、碗中的飯稀稠，



也要由朕管起來。但朕念念不忘搞世界革命的最終理想是要實現天下為“公”，即實現“全球所有制”。那時實現了“朕即球”。

他的理性是一個“鬥”字，就是“生命不息，鬥爭不止”。“朕即球”在望，是最高綱領；現實的鬥爭目標是抓緊坐上斯大林的“世界革命導師”寶座，着手領導社會主義陣營和亞非拉，先實現最低綱領：“朕即半球”。世人奇怪，毛澤東為什麼死前最想見的是尼克松？就是，為的以“洋半球”為物證，進行自我心理確認。

蓋棺論定：毛澤東通過政治運動來運動群眾、運動治國、運動治黨，在運動中消滅所有敵人；一人敵一黨、一人敵一國、一人敵一陣營、一人敵天下，堪稱人民公敵。到頭來，機關算盡看今早；志未酬，叱咤風雲全造業！

### 下篇：實事求是，總結歷史的教訓

#### 甲：“實事”（追求真相）：

#### 認清運動的本質是接受教訓之本

#### 一，運動的一方是右派，爲人權大鳴大放，右派就是人權派

1957年5月，北大哲學系四年級學生譚天榮，在大字報《幾句人情話》的結尾喊出：“自由、民主、理性、人權萬歲！”我認爲，這可看作是右派鳴放的一個綱領性口號。

宋永毅說：“我們還可以從歷史的縱向比較。如果看1957年的言論、‘右派’的文章，提倡維護人權，這恐怕是主旋律之一。但是1957年以後，（當局）開始批‘資產階級人性論’、‘資產階級人權論’。然後1958年、1959年一直到1965年不斷批‘人情論’、‘人性論’。例如1958，1959年在文學上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上的批判。50年代末、60年代初對錢谷融先生的‘人情論’的批判，60年代初對巴人先生‘論人情’的批判……結果就變成，你祇要講人權，你祇要講人性，那就是資產階級，就是反動的，就是‘反革命’。”（《人權捍衛者遇羅克殉難四十周年祭》，自由亞洲電臺事實正是這樣的：右派爲維護人權而鳴放，毛共爲反人權而反右派。

有侵權也就有維權鬥爭。這期間也有一些黨內外志士仁人挺身出來，爲捍衛人權而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1957年“反右”前知識界的“大鳴大放”，其中對解放初如“反胡風”、“肅反”等政治運動中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爲的批評控訴，就是一次聲勢浩大的人民維權行動，是人民行使對執政黨的監督

權和言論自由、批評建議權利的合法鬥爭，是知識分子為掙脫文化專制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思想控制的一次公然抗爭和思想解放的嘗試；是中國人民百多年來追求民主自由與人權的憲政運動的一個高峰和一次挫折。（郭道暉《人權六十年：從否定到回歸》，《炎黃春秋》雜誌，2011.4）

武漢大學教授程千帆說：“劉真（注：武漢大學黨委書記）問向誰爭自由民主，他自以為問得很巧妙，其實這問題很好回答。向誰爭人權？向侵犯人權的人爭人權。向誰爭民主？向不民主的人爭民主。向誰要自由？向不給人自由的人要自由。現在事實如何呢？選先進工作者，選人民代表，什麼代表都是指定的，這民主麼？‘三反’時×××教授被叫做×犯××，隨便把人家關起來，這自由麼？”（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編《右派言論選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庶民社”及其系列大字報《庶民報》，批評在學生中搞肅反，侵犯人權，其中有雲：“清華黨委是如此找敵人，殘忍呀殘忍，沒有人權，沒有憲法，沒有常倫，必須以法律制裁肅反中的真正罪人。”物理教研組被錯批鬥的教師訴說肅反中“完全失去人權，把喝水的杯子、香烟全拿走了，不能受到人的待遇。我祇能忍氣吞聲。我曾準備跳樓自殺，但我想，要死祇需要幾秒鐘的勇氣，而活下去要更大的勇氣。我要活下去，看他們是否代表真理。”（《郭道暉：“陽謀”背後的權謀——以親身經歷剖析整風反右運動》）

解放後這幾年來是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的，有也祇是形式，不僅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連資本主義國家的假民主也沒有，憲法成了一紙空文，黨可以不遵守它，表面上有民主選舉，有統戰政策，有黨外人士做領導工作，實際上是一黨專政，是黨中央少數人獨裁，黨外人士做領導工作的有職無權，祇是執行決議的義務，沒有參與實際決策的實際可能。黨是太上皇，是威武神聖的，一手抱着馬列主義的聖經，一手仗着國家政權的寶劍，誰敢提異議，不是被扣上反馬列主義的鐵帽，就是被戴上莫須有罪名的手拷，選舉祇是變相的任命，代表祇代表個人，誰也不知道自己所選的人是怎樣的，他代表自己說了些什麼？至于集會／結社／出版等？都必須在黨的領導下進行，不能越雷池一步，怎樣能體現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是對人權的侵犯，嚴重的破壞法制，必須改變。（張百生、黃振旅：《馬克思主義與國家政權》，1957年6月16日《人民日報》）

“右派分子林健榮就猖狂地向黨進攻，”說什麼“黨員有黨性，沒有人

性，是踩着別人的血迹往上爬的。入黨和個人利益是一致的……”（宋永毅：《反右檔案：告密、學生鬥老師和被遺忘了的父親的“右派言行”》，《中國人權雙周刊》）

針對起訴書說她“妄圖收羅各地右派分子，在我國實施資本主義復活”，她批注：“正確地說是：計劃集合昔年中國大陸民主抗暴運動的積極分子，在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紀遺址上掀起强有力的、劃時代的文藝復興——人性解放運動！”（傅國涌：《新發現的林昭文稿》；《林昭獄中血書節選》，“紀念林昭”網站。）

以上的例舉，雖說祇是“掛一漏萬”，但已足以說明右派的鳴放就是爲人權而吶喊。

## 二，發動反右派運動的一方是極權派，給中國帶來一場人權浩劫

雄鷄鳴而天下白，右派鳴而人權明。毛共反右是執迷于“祇要殺了雄鷄天下就會漫漫長夜無曉時”。殺戒開，東亞大陸鷄飛狗跳，知識分子成百萬地打成右派；工人、農民不打右派，却成千萬地打成反動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壞分子，和處理右派一樣，他們和我們同在一個農場，同樣勞動教養或勞改。

全國劃右派總共是 3,178,470 人，還有 1,437,562 人被劃為中右分子（這個數字最早來自香港《爭鳴》雜誌的“解密的中共中央檔案”，後為郭道暉在《毛澤東發動整風的初衷》〔《炎黃春秋》2009 第二期〕所引用。官方既未認可，也未反駁；以後這個數字就被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所引用）。所謂共劃右派 552,973 人這個數字，是指 1978 年以後“改正”的 552,877 人和不予改正的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和全國各地共 96 人的和。

1959 年 9 月 23 日《內部參考》報道，全國在反右派鬥爭中共揭發出右派分子 463,812 名（不包括軍事系統），其中逮捕 11,997 名，勞教 53,684 名，留在機關、學校、工廠、企業內部監督改造的 197,497 名，下放勞動 68,346 名，在社會上改造的 59,568 名，其他（自殺、逃跑和無職業的頭面人物）32,423 名，不明情況的 40,297 名。（香港五七學社：《右派分子知多少？》）

鍾正（提中正）在所寫的《血淚驚魂夾邊溝》中回憶到：“如此‘借我黨整風之際，充當急先鋒，大肆向黨進攻，用心惡毒，手段卑劣，不定爲右

派何以平民憤！’于是，大會小會晝夜輪番批鬥，讓積極分子唾面、辱罵、推搡、腳踢；惡語中傷，揭私披隱；無中生有，憑空捏造。一時間被剝奪發言權，令我有口難辯，有理難言。我無法‘低頭認罪’，祇得傲然以對。于是停發工資，囚禁臺內，挖豬圈，掄大錘，燒開水，幫竈房，淪為‘賤民’。在臺內，‘左派’人士怒目相待，暗地監視，以示‘立場堅定’；親戚朋友對面相見視為‘路人’，以免‘敵我不分’。如此高高‘掛起’長達一年有餘。”

可恨毛共反右派，“鬥倒”還不算，還要“鬥臭”，即“惡語中傷，揭私披隱；無中生有，憑空捏造。”在我教養時，一個青年醫生右派給我講了“一根頭髮的故事”：因他醫道高明、醫德高尚，備受景仰；群眾說他政治上是毒草，業務上是香花。爲了讓他在群眾中臭起來，就散布說他有“男女關係”（直說就是有通奸行爲）。如果屬實，在中國這個社會他就成了一泡臭狗屎。積極分子對其有罪推定，挖空心思找證據。有一天，在他的床上發現一根漆黑發亮的頭髮。這可是如獲至寶！于是就推理論證：這樣的頭髮祇能是女人的頭髮；他又是單身，怎麼床鋪上會有女人的頭髮？——“叫他老實交代！不要讓他僥幸過關。”他說：“我倒想曲鬥成招，擺脫輪番鬥爭、疲勞轟炸，但想到下一步就不好辦了：對方是誰呢？”所以他無法不“態度惡劣”，因而也無法逃脫“從嚴處理”，結果就來這裏勞動教養了。黨委宣布，對他鬥倒鬥臭的勝利，證明了他和全國所有的右派都一樣，都是政治上反動透頂，道德上腐化墮落，人格上卑鄙無恥。

對鍾正的最後處理：送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夾邊溝是一個閻王殿，在裏面教養的3,000多名右派，在兩年中被活活餓死了2,800多名，僥幸活下來的僅130餘人。

“我們還知道在四川省樂山沙坪縣有座環境更險惡，鎮壓更殘酷的勞改集中營，一萬多名犯人竟被活活餓殺了6,000餘人，而這一萬多名犯人實際都是四川省12萬右派中的1/12。”（《往事微痕》第80期）

文徹赫恩在《苦難的歷程》中反映的情景更淒慘：白浪溝分廠的犯人，見總場場長來了，一擁而上。“幾乎一個不拉的，二千餘勞改犯非常統一、整齊的一下子全都跪在場長面前，齊聲大喊：‘救命啊！場長救命啊！’……饑餓使人變成無理性，好像人們都瘋了。成千的勞改犯跪着不起來，最後劉場長宣布，從今天開始保證大家頓頓吃飽飯。這時大家才慢慢地起來，排隊

去領飯了。這個分場原有 2000 多人，到 1962 年這個分場撤消時，回到場部的勞改犯總數不到 200 人，死掉 85%。”

鄭義為此書寫的序中說：“我游歷青海時，友人告訴我‘八百右派’的故事。說有廣東右派八百餘人送青海苦役，多年後改正時，發現竟無一人存活。廣東方面抱怨說，‘也不能一個也沒活下來呀？’青海方面則反唇相譏：‘誰讓你們往這裏送？不知道這兒是什麼地方！’”

該書總結說：“在那種環境裏，有人性的人，慢慢也會變成沒有人性了。熱血變冷，人變成獸，殘暴又凶狠，甚至連禽獸都不如。”“雖然我没有死，可精神上肉體上的傷痛將折磨一生。我的鼻子被打斷、左耳被打聾、牙齒因營養不良脫落 12 顆，打掉四顆，共 16 顆。腰部被打致殘，成終身疾病，這都是無法彌補的。特別是精神心靈上的折磨摧殘，傷害至深，我將終其一生無法擺脫夢魘。”

右派的大鳴大放是對共產黨執政反人權性質的歷史性總結。毛共用徹底反人性、反人權的方法，侮辱你的人格、剝奪你的尊嚴、摧毀你的意志、傷害你的感情、甚至消滅你的良心，以及超限度勞役、饑餓、懲罰你的肌體，使一部分人死亡，而另外任何一個活着的右派都是暫活、苟活，完全被剝奪了生命權。反右派大獲全勝就意味着人權戰士全軍覆沒。從此，就開始了不僅是在中國史上、而且是在人類史上最大的人權災難，並且，直至今日，中共政權仍是世界上反人權的頑固堡壘。

### 三，這場浩劫使運動發動者的本質對象化、直觀化、展開化

認清本質是接受教訓之本。事情都是人做的，事情的本質就是做事人的本質的對象化、直觀化、展開化。同理可得，反右派運動的罪惡本質，就是那個一言定幹坤的運動發動者毛澤東本人罪惡本質的對象化、直觀化、展開化。反之，毛澤東具有什麼樣的本質，就會像一根脊椎骨一樣，從頭到尾貫穿于反右派運動的始末。毛澤東的本質是什麼？後面會詳加分析，這裏祇做兩點簡略說明，一是強調揭露毛澤東的本質是“還原 1957”題中應有和必有之意，否則，反右運動就成了從天上掉下來的了；二是，所以在“中篇”加入《流毒》一章，直至毛死而後已，這也是絕對必要的，否則，反右的人和事都未能徹底得到還原真相：難道毛反右的野心祇止于建立和鞏固“黨天

下”嗎？文革的實踐和內層人士——如姚文元、張玉鳳的回憶錄都曾揭示毛要建立他的“家天下”。

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以批“凡是”為名把華國鋒趕下了臺。說是“徹底否定文革”，但後來文革却成了禁區。現在所謂的左派組成了“還鄉團”，批鄧、復毛和再來一次文革的呼聲甚囂塵上。同樣，由于鄧的“必要論”，反右真相始終被掩蓋、歪曲着，有人大放厥詞，甚而至于呼喚再來一次反右：“中國社會的進步呼喚中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到工農大眾中找回被別人而不是被毛澤東打折或者收買的脊梁；而中國的現實尤其需要一個工農大眾可以暢所欲言而非由少數知識分子壟斷的輿論陣地。要造成這樣的一個氣氛，毛澤東領導的‘反右’運動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系列論斷，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右而左：《“反右”運動對於現實的若干啓示》）可見，弄清歷史真相，不單純是個學術問題，而且更是清算歷史罪惡，堵塞災難之源的問題。這才是真正的、和右而左之流大異其趣的、所謂“強烈的現實意義”。

研究反右派鬥爭，和研究一切歷史問題的目的一樣，簡單說就是接受教訓。但是，你想接受教訓就能接受教訓了嗎？首先共產黨不讓你接受教訓，不僅把反右而且把一切歷史真相都設為禁區，讓你永遠生活在假象中。如果把真與假、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說成是一場生死搏鬥，仔細體味方知實不為過。其次，是要弄清接受什麼樣的教訓？有的是積極地汲取教訓，吃一塹、長一智，越戰越勇，如北京大學右派分子青年學生們高舉“5·19”民主運動的旗幟，踏着林昭、劉奇弟、顧文選等同學們的血迹前僕後繼，發揚光大“5·19”民主精神，直到人權高揚、極權滅亡而後已；有的是消極地接受教訓，一回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如錢偉長用出賣靈魂去維持好不容易當穩了的奴隸、進而用告密去換取官爵，或學王蒙見奶誤認“娘”，把如此慘重的政治迫害比作媽媽錯打了孩子。與其現在見利忘義，何勝當年及早學乖？

問題是如何才能够做到積極地汲取歷史教訓呢？這首先就要正視歷史，不投機取巧。劉賓雁跟我說：“王蒙這個人太聰明了！”其次就要把握住歷史人物的品質和歷史事件的性質。認清前人、前事的本質，乃是後人、後事正確接受教訓的必由之路。這裏，我們要聚精會神地去研究與揭示關鍵人物和史實的本質。誰是關鍵人物呢？劉賓雁說：“毛澤東一手定乾坤”。毛比黨大，是共產黨服從毛澤東，而不是相反。共產黨祇是毛澤東達到其政治圖

謀的一件工具。別說他後來大大地成了氣候，即便在延安時期，塔斯社記者、莫斯科駐延安的特派員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就在他的《延安日記》裏就有記載：“1945年6月26日。毛澤東的主要目的，是不惜一切代價地要在這個國家奪取政權。他之所以對黨有興趣，祇是因為黨能保證他奪到這個權力。”這個權力，他早已奪到了。所有全國規模的重大事件，無一不是毛澤東把自己的主體本質客體化、展開化的過程和結果。所以祇用剖解了毛澤東，就能抓住共產黨的本質，因為毛澤東就是共產黨的人格化。實際情況是八億人口一個腦袋；一人在思想，全黨、全民在盲動。這一段的歷史是毛澤東一杆筆寫出的文字、畫出的圖畫。而剝去大躍進、文革等等的咋咋呼呼的亂象，顯出其最具深刻內涵的歷史事件便是反右派運動。

雖然反思反右派運動，可以得出一千條教訓，但是，最具現實意義的祇有這麼一條，就是立即驅散毛澤東的陰魂，勿使鬼蜮繼續害人。這是從根本上鏟除黨天下絕對必要的一着。這一點在鄧小平心裏是最清楚、也是最擔憂的。他說：“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鄧小平文選》二卷頁263）說白了就是，揭出毛澤東的本質，共產黨就完蛋。所以，祇要讓人民認清這是一面什麼樣的男盜女娼的旗幟，就能把共產黨邪惡的“光輝歷史”置于光天化日之下，讓子子孫孫、千秋萬世像“罵秦檜”那樣吐唾沫，這尚屬小事；清算它禍國殃民的罪惡，接受慘痛的歷史教訓，讓恐怖的極權制度千秋萬世永別人間，像恐龍那樣作為滅絕的物種、作為化石，陳列在歷史博物館，這才是大事體。

“六四”民運中最為光亮之點是“八九真英雄，湖南三壯士”蛋擊魔像的壯舉，及其發出的時代最強音，《瀏陽報》美術編輯喻東岳說：“中國改革之艱難，中國一切問題的癥結，根源都在毛澤東身上。中國要前進，要改革，要現代化，首先要徹底摧毀毛澤東。”

“徹底摧毀毛澤東”就是徹底驅散他的“陰魂”。他死後的陰魂，就是他活着時的“本質”。讓我們撥開雲霧，用逐步展開的方式，來考察他活着時的**本質**到底是什麼樣的和怎麼樣表現的。

### （一）為一黨之私，犧牲國家、民族

他置中華民族存亡絕續于不顧，乘國家之危，對祖國趁火打劫：政治上一意篡權，對內黨篡權（延安整風），對外與政府大搗其亂；並且在軍事上促



日蔣拼殺，自己養精蓄銳、以逸代勞，以備將來打內戰（毛澤東的說法是打“將來的敵人”），現在也專打友軍；在經濟上大種特種、大銷特銷鴉片，不管亡國滅種，祇顧大發國難財，雄集內戰資本。

### 1，感謝皇軍大大的

1964年7月10日，毛對受其接見的社會黨人士佐佐木對日本過去侵略中國表示歉意時，說：“沒有什麼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了很大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轉引自趙瑄：《北京政府的日本情節》，《世界周報》1995，11，26）

毛澤東的促日蔣拼殺於戰場、日共勾搭（通過潘漢年等）于私下，惡性膨脹共產黨的勢力，一般中國人視此為賣國主義行爲，而共產黨的說法則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問題是，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作狼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時候，中國人民應該面東跪拜，口唱：

膏藥旗，冉冉上，日本護大共產黨！

不是皇軍大大地，呼兒咳啣！

哪來人民挨解放？

### 2，讓日本多占地

毛對蔣委員長領導的抗日戰爭竭力進行破壞，對共產黨內的抗日派將領也堅決進行打擊和壓制。到後來，他反而倒打一耙，由一些民主人士中的投機者幫腔，誣蔑蔣委員長，說他躲在峨眉山不抗日，待抗日勝利了，才跑下山來摘桃子。僅此一點足證毛澤東什麼謊都敢撒。

即在今日，《一寸河山一寸血》這部紀實片和大陸的電影片《血戰臺兒莊》和還原歷史真相的現代史《誰是新中國》等紀念碑式的杰作，所提供的悲壯史實，直使“中共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論者，在這塊紀念碑上碰得鼻青眼腫、頭破血流。連塔斯社記者、蘇共住延安的特派員彼得·弗拉吉米若夫都感到氣憤而予以指責：“毛澤東在侵略者面前向後退縮，却乘中央政府和日本衝突之際為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嘗艱辛並作出了不可估價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時刻，採取這種策略，豈止是背信棄義而已……什麼國際主義政策，跟毛澤東哪能談得通，連他自己的人民也祇不過是他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罷了！千百萬人流血痛苦，災難和憂傷，對他來說，祇是一種抽象的概念。”

彭德懷打了抗日的百團大戰，就成爲毛澤東眼中十惡不赦的罪行，說是

犯了戰略錯誤，暴露了自己的實力。其實，早在 1937 年 8 月 22–25 日的“洛川會議”上，毛就主張紅軍的基本任務是創造根據地、保存和擴大紅軍、爭取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權、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9 月 21 日致電彭德懷，算是有言在先：“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在戰略上有主力部隊處于敵之側翼，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並舉。然而，祇有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地制勝敵人、援助友軍的唯一無二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可言的。目前情況與過去國內戰爭根本不同，不能回想過去的味道，還要在目前照樣做。”（《毛澤東年譜》）就在 9 月 25 日平型關打響的這一天，毛致電劉少奇、周恩來，說：“要告訴全黨，今後沒有別的工作，唯一的就游擊戰爭。”又說，“目前紅軍不宜過早暴露，尤其不宜過早派遣戰術支隊”，“暫時把我軍兵力一概隱蔽並養精蓄銳。”（《周恩來與毛澤東》第 236 頁）試想，正當國家民族處于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也正是“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之際，同時，中日實力懸殊正是中國抗日之大患，而你有實力却“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暫時把我軍兵力一概隱蔽並養精蓄銳。”、生怕暴露實力，那麼，你栽培這個“實力”和留着這個“實力”，並且還要惡性發展這個“實力”，到底是要準備幹什麼罪惡勾當呢？

直到 1959 年廬山會議把彭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頭子，毛還在跟他沒完沒了地算這筆賬，對着彭說：“我同你的關係，合作，不合作，三七開。融洽三成，搞不來七成。31 年是否如此？”（《廬山會議實錄》頁 221）後來又說：“整個抗戰八年，難講是合作。”（同上，頁 238）

林彪迎合說：“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是弼時作的決定。”

毛澤東用賣國主義統一全黨思想：“一些同志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志。”這可是毛澤東不打自招，暴露了自己的賣國嘴臉。江澤民、胡錦濤繼承、捍衛和惡性發展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讓俄國多占地才愛國”，一家伙把 150 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眼眨也不眨地割給了俄國。當然這絲毫也無妨他們厚着臉皮大喊大叫“愛國主義”以行騙于國內外華

人世界。賣國賊喊愛國，喊得自己血脈噴脹，這和貪污犯講廉政，講得聽眾掌聲雷鳴一樣，都是共產黨特有的政治景觀。

由于歷史有意展露自己的真相給人們看，所以它時常出現相映成趣的場景。1974年1月19日，中國與侵入西沙海域的越南，爆發西沙之戰。當時，臺灣海峽在國民黨海軍和美國第7艦隊控制下。中共海軍艦艇往來東海、南海，都要繞道臺灣東南的公海，避免磨擦和衝突。這次軍情緊急，毛指示：“直接走。”

正在陽明山養兵的、被毛共稱爲“賣國賊”而“竊踞臺灣”的蔣介石，對西沙戰事也很關注，看着送來的電報：“海軍導彈護衛艦四艘，清晨抵達東引島一側，企圖穿越臺灣海峽。”看後不加思索，便語重而心長地說：“西沙戰事緊。”親自下令，破例向解放軍海軍艦隊亮起“請通過”的信號。

當天晚上，解放軍東海艦隊四艘導彈護衛艦通過臺灣海峽，“賣國集團”的軍隊不僅沒有開炮，還打開探照燈，助中國人民解放軍艦隊順利通過。（《西沙群島保衛戰：毛澤東決策的最後一仗》）。這是多麼感人肺腑的場面啊！

一面是民族大義，一面是險惡的奸計：清濁分明涇渭水，愛國賣國豈容混？最令人氣憤和悲哀的是，許多經過浴血抗日而幸存下來的將士，躲過鬼子的屠殺，却死于毛澤東的“鎮反”之中。

廬山會議上毛還說：“一個肅反，一個反右，匈牙利事件就鬧不起來，我們黨聯系群衆，不是拉科西，不會出納吉。個別問題一出現，很快解決，我們作風好，反革命殺了100萬，匈牙利沒殺，我們作風好，反霸、鎮反、反右。”（《廬山會議實錄》p.45）

### 3、賣國賊的“愛國”勾當：傷天害理種鴉片

中共的禁書風波，引出中共抗日時期在延安種鴉片的話題。全國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親自拜訪袁鷹，解釋說該署針對的是出版社“違規”而非針對作者個人。鄔書林還提到若干“違規”處理原因，“《滄桑》裏寫到延安時期種鴉片，北京軍區‘幹休所’有幾位老同志看了很氣憤寫信上告。”《滄桑》作者曉劍，接受自由亞洲採訪時說，這叫“掩耳盜鈴”或別的什麼都好，在我的30多萬字的全書中，沒有一個字提到種鴉片，我祇是說種一種“土特產”。曉劍在這些“老同志”面前，實在是有些太毛嫩了。他不知道當年就是採取這種“掩耳盜鈴”的方法，把“鴉片”對外公然謊稱作“土特產”的。你現在把“掩耳盜鈴”故伎重演，這不就成爲文革中的“揭老底戰鬥隊”

了嗎？

關於這點，我在《毛澤東與猴》一文的結尾就着毛澤東說他由于“天天澆水”，所以有權“摘桃子”，寫道：“‘天天澆水’是實話。但澆的不是桃樹，而是罌粟。國難當頭日，國軍抗戰時，毛與共軍却在奮力開展一個亡國滅種的種鴉片的生產大運動”！下面，再聽我細說端詳：

中國的近代史是從鴉片戰爭開始的。我們單以鴉片對國家民族的危害來說，起碼也如當年林則徐一針見血地指出的那樣：“若再聽由鴉片泛濫下去，則數十年之後中原再無可御敵之兵，也沒有可以充餉之銀。”現在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日寇侵華之際，趁火打劫，滅絕人性地向自己的國家、民族發動了一場鴉片戰爭。

有中共黨史活字典之稱的司馬璐在其所著《中共歷史的見證》中指出：中共“在敵人後方開展經濟鬥爭，如搶購銀元、黃金、囤積生活必需品、利用共軍控制區走私，包括向白區推銷南泥灣特產（鴉片），由賈拓夫主持，擴大財源。”（頁 89）

### （1）老紅軍幹部的回憶

據位老幹部回憶，國共抗日統一戰綫形成後，他被派到山西參與掌管一個抗日根據地的財政。1941 年該根據地因為實在窮得揭不開鍋了，不得不向延安方面告急。延安方面答應得非常痛快，沒幾天便派一支部隊護送一批毛驢和騾子馱運物資到了山西。山西方面驗貨時才發現，除了幾百件延安生產的土布軍裝外，還有幾百斤大烟土。押運人員還帶去了陳雲的親筆信，那信要求山西方面用這批烟土向當地國民黨軍隊或日偽占領區換取必需的軍事物資和生活物資。

這位老幹部講到此處，問採訪他的記者曉莊是否會唱那首著名的《南泥灣》，然後又憤憤地說：“什麼‘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說到處是大烟還差不多！”原來，這位老幹部當時因為對販賣大烟想不通，便被抽調回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受訓。根據邊學習、邊生產的原則，受訓期間前往南泥灣，與王震領導的三五九旅一同開荒種地。糧食確實種了一些，但好一點的地都被用來種了鴉片（想想上面的數據，每畝平均產量不過二三十斤，也委實低了點，這說明開荒的土地的確不是全種了糧食）。而且，王震的三五九旅還專門雇來工匠，把收獲的鴉片加工成烟土，然後交由陝甘寧邊區財政廳集中保管，隨時運往山西、河北等地，無論是國民黨軍守備區還是日偽占領

區，誰給錢就賣給誰。事實上，因為日偽占領區很難進入，所以絕大部份邊區烟土都被賣到國民黨守備區，部份賣到民間，部份直接賣給國民黨軍隊。

販賣大烟的行當實在不是什麼體面光彩的事情，所以邊區根據地統一將大烟稱為“土特產”。那位老幹部說，他本人沒有參加過長征。他在抗大受訓時仍然表現出對我黨作販毒生意的無法理解，一些參加過長征的幹部笑他“少見多怪”。那些長征幹部還誇口說：“當年如果我們手裏沒有大烟土，早就餓死困死在長征路上了。”

這種“土特產”交給山西、河北的八路軍經營時，則一律稱之為“特品”或“特種物資”。在筆者看到《第120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史》中曾寫到：“留守兵團駐各地的部隊……積極開展貿易工作，主要輸出一些食鹽和一些土產，輸入棉花、布匹、藥品和一些自己不能制造的日用品”時，還一直納悶那光禿禿的黃土高原有何值錢的“土產”可以換來這大批的物資。看了上文，自然茅塞頓開。

由邊區政府統一進行所謂的“土特產經營”。邊區政府裏一直有人反對經營土特產這種生意，有幾位老同志還給老毛寫了兩封信，歷數經營土特產的弊端。另外，西北局的一些領導，包括司令員高崗在內，都是這個意見：“寧可餓死，也不能做這個買賣。”為此，老毛又召見南漢宸，囑咐說：“我們要向人民說清楚，向全體幹部說清楚，使大家都了解，我們不得不這樣做，完全是為了抗日和革命。為了這個目的，我們必須犧牲一切。”

### （2）革命的生意經

有了老毛的支持，南漢宸便依靠經營“土特產”籌措到錢財，用這些“土特產”從國民黨地區交換過來“革命”所必不可少的軍用和民用物資。一般認為，販賣土特產的收入要占到邊區財政收入的半數以上，個別時候要占到三分之二左右。南漢宸因扭轉邊區財政狀況，“功”不可沒，而得到老毛的特別器重。一次江青見到南漢宸夫人王友蘭，曾拍著她的肩膀，豎起了大拇指說：“你的愛人真行，毛主席誇獎他，說他是這個！”建政以後，南漢宸因有此救黨大功，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首任行長。

### （3）外人日記中的有關記載

《延安日記》寫道：“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茶陵，遠在後方的一二零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制成鴉片後就從這裏運往市場……”“政治局已經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

《延安日記》的記者彼得問毛澤東：“特區的農民往往由于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機關也在公開地生產鴉片——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老毛沒有吭聲，一旁的鄧發代毛回答說：“從前特區祇是把鹽和碱運往國統區。我們一掛掛大車滿載著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却是癟的，而且還祇有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一袋鴉片，就能够帶回滿滿的一車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來收拾他們！……”

下面的幾段均摘自《延安日記》：

“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和貿易……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的各省的市場（叫作對外市場）至少提供 120 萬兩的鴉片……”

“鴉片的事情，就是說罌粟的種植與加工，大部分將由部隊來做管。賀龍的一二零師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鴉片的地區（這個師已長期做這項生意）……”

“毛澤東同志認為，種植、加工和出售鴉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澤東同志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是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此外，彼得還寫道：“解放區出現了一片怪現象。中共的部隊同樣也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他們全都在盡可能地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實際上晉西北各縣都充斥著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日貨都是由淪陷區日軍倉庫所直接供應的……”

從彼得的日記來看，鴉片的種植地區除了陝北外，晉西北也是個很重要的產區，主要還是因為這些根據地比較偏僻，日本人也來打擾得少，便于進行秘密、成規模的生產。其它一些根據地由于情況比較複雜，相對少一些（也不能說沒有，比如後面附件裏的就是冀魯豫邊區的，國民政府檔案中也曾提起浙西共占區也有此行徑）。

#### （4）國民政府檔案中的有關記載

鑒于鴉片的銷售對象主要是國統區，不能不引起國府各有關官員的注意。下面是從國民政府檔案中摘錄的一部分有關記載目錄概要：

1940 年 10 月 29 日，朱家驊、徐恩曾報告：山西共黨合作社公然售賣鴉片等情形。

1941年7月16日，第42軍軍長楊德亮報告：中共迫商人販賣烟土。

1942年7月12日，財政部公債司抄送中共于隴東攤派公債、販運毒品等情報函。

1942年7月21日，傅作義（第8戰區副司令長官）報告：中共以種鴉片籌餉為由，拒絕國軍派隊巡查。

1942年7月28日，中央文化驛站榆林分站主任王廷齡報告：共黨在晉西北廣種鴉片情形。

1942年9月18日，朱紹良（第8戰區司令長官）報告，中共在陝甘擅徵鹽稅及禁止法幣流通與傾銷鴉片。

1942年10月2日，42軍軍長楊德亮報告：中共關中分區以鴉片抵發薪餉，每人二兩。

1942年10月4日，朱紹良報告：中共于隴東推銷鴉片，以慶陽之驛馬關及合水之西華池為中心，分設土膏店。

1942年12月4日，傅作義報告：中共與日軍進行交易的情形。

1943年12月18日，朱紹良報告：中共當前運銷鴉片及強迫人民種植情形。

1944年3月25日，傅作義報告：中共令積極推銷烟土。

1944年4月4日，朱紹良報告：中共于合水西華池設烟土公司，大量傾銷鴉片。

1944年4月4日，朱紹良報告：中共在綏德廣種鴉片，並公開出售。

1944年10月18日，河南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劉茂恩報告：中共在豫鄂皖邊區強迫人民種植鴉片。

1945年5月30日，顧祝同（第3戰區司令長官）報告：中共于浙西擅設出口稅局並大量種植鴉片。

#### （5）《謝覺哉日記》中的有關內容

如果有人不相信國民黨方面的報道或者外國人的記載，那麼在負責邊區政府事務的謝覺哉老先生的日記裏到可以提供一個佐證。謝覺哉在日記中把鴉片一律稱為“特貨”。下面摘錄幾條關於“特貨”的情況：

1）“就是特貨一項得的法幣占政府收入……盡够支用。”（1944年1月18日，從這裏可以看出，僅“特貨”一項的收入就足够邊區政府的支出開銷了。）

2) “特貨多邊幣少，將來不得了。”（邊幣收回，特貨跌價，買特貨的不得了。）”（1944年3月12日，“特貨”之多，都到了跌價的地步。）

3) “領導機關發動一件事，必須十分考慮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錯，在群眾中可鬧出大亂子。‘特貨內銷’即其一例。”（1944年3月14日，“特貨內銷”該不是指就地賣給當地群眾吧？難怪會出大亂子。）

4) “據調查邊區內存的法幣不下二萬萬元，無疑是由特貨補足普通物品入超而有餘來的。”（1944年4月9日，出售“特貨”的收入減去購貨開支，還有大量順差，竟不下兩億元。）

從謝覺哉日記中的上述記載中不難看出，“特貨”的經營幾乎是邊區唯一的大宗收入來源，且使得貧瘠的邊區得以扭“虧”為“盈”，是我黨我軍在八年抗戰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經濟基礎。

謝覺哉的日記裏還記了這樣一件事情：有一個退伍軍人，用其積蓄買了幾兩“特貨”，準備外出出售，結果在關卡被查扣沒收，於是“變窮了”，一貧如洗，回來後向邊區有關政府部門要求經濟補助。從這一事例至少可以說明兩點：1) “特貨”交易的確是賺錢的買賣，當時從事這一行業的人並非個別；2) “特貨”不允許私人交易，而是“公家”的專利，這點和彼得日記中的描述也是一致的。

當年邊區種大烟的秘事也曾得到當地農民的證實，當人們詢問一些上了年紀的陝北老農時，得到的回答是：“那是共產黨讓種的咧。”

### （6）“為人民利益而死”的張思德同志

在中國大陸，年齡稍長者都知道毛澤東有個“老三篇”，一篇是贊揚神話人物的《愚公移山》，一篇是贊揚“國際主義戰士”的《紀念白求恩》，還有一篇是贊揚一個士兵的《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提到中共中央警衛團戰士張思德，在陝北安塞山中燒炭時因為炭窑崩塌而犧牲，他“為人民利益而死”，其死“重于泰山”。

但近來網上有人撰文，揭出張思德原來並不像《毛選》中注釋的那樣，在燒炭塌窑而死，而是在被派到當地一處大烟加工廠參與燒制大烟（鴉片）時，因為烟窑崩塌被活埋而死的。為什麼這種事要讓中央警衛團的人去幹？也不難理解，因為加工大烟的事情既要保密，又要保證參與這項工作的人不會中飽私囊，所以必須安排十分可靠、“黨性强”、“紀律性强”的人去幹。事實上，除了張思德，中央警衛團很多幹部、士兵都輪流參加過加工烟土的



工作。祇可嘆的是，燒烟英雄居然也被立作楷模，還讓全國人民學習了數十年，也真是件讓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 （7）李銳、範元甄提供的史料

李南央編輯的《父母昨日書——李銳、範元甄 1938 年 -1960 年通信、日記集（下）》（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有多次關於鴉片的記載。

範元甄 1946 年 11 月 19 日信“我帶的代金還未動用，這次幹部隊帶大烟的人多極了，夏淑賢等都是二、三十兩。”原注：代金指鴉片。從延安出發時，幹部帶了一些鴉片以代現金之用。（頁 17）

李銳 1946 年 12 月 8 日 -10 日信：“代金不需要用就暫不用它，除非將來要離開東北再換。”（頁 29）

範元甄 1947 年 4 月 30 日信，“這裏家屬隊有不少太太，幾百兩的烟土，我覺得調查一下她們的經濟來源原則可了解一批男幹部的情况。真富得不象話。”（頁 80）

李銳說：“代金聽說熱遼這邊比東北價還高，如有移動，打聽情况後再脫手。”（頁 81）

### （8）堅持六年大種鴉片

辛灝年先生，他在《誰是新中國》巨著中指出：一首歌頌中共開展大生產運動的著名歌曲——《南泥灣》，曾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裏，唱徹中國大陸。然而，善良的人民却根本不知道，“花籃裏花兒香”那花籃裏飄出來的竟是罌粟的香味。因為八路軍第三五九旅的大生產運動不是種的糧食，而是種的罌粟，即鴉片。這對中國大陸人民來說，不啻有石破天驚之感。作者于 1995 年初訪問臺灣時，曾查證了這一說法。（擔任過蔣介石先生侍衛長的孔令晟將軍，曾于筆者訪問臺灣時告訴過作者，他當時就在陝西擔任堵截共產黨向抗戰後方輸運鴉片的任務。）……

這就是中共大生產運動的真正內容，就是那一曲“花籃裏花兒香”的創作源泉。

爲了提高國民素質以準備抗戰，在抗戰之前，蔣介石曾提倡並推廣了新生活運動，中華民國政府則開始了嚴格的禁烟運動，此舉曾深招日本的忌恨。在抗戰中，日本侵略者欲亡我中華的另一番戰略，便是在敵占區大肆出售鴉片，以麻醉和斷送我們民族自立與自強的精神。然而，中共却爲了賺取更多的錢買武器來收拾國民黨和準備內戰，竟將鴉片生產和貿易合法化，竟將鴉

片源源運往國統區和敵占區去坑害他們的同胞，事後又將鴉片生產美化爲“爲了抗日而進行的大生產運動”，這在道德上和行爲上都祇能堪稱是“絕唱”。

#### 4. 長期通敵賣國

塔斯社記者、莫斯科駐延安的特派員彼得，還揭露了比種植和販賣鴉片更爲嚴重的事實。這個事實，就是中共最高領導層曾長期通敵賣國。而彼得指出的事實，亦在中國大陸近年出版的《南京志史》一書中得到了證明。首先，彼得這樣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中共領導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着聯系……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系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因爲，“葉劍英告訴了毛澤東，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發來的電報內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共產黨領導人爲什麼決定與日本占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系。”“中共領導人中祇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寧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于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然而，“中共領導人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樣子欺騙莫斯科。”

其次，“抗戰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從此開始。事情是這樣的，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日本陷於戰綫過長的困境。中國戰場上，國軍仍頑強抵抗。爲了挽救這種極其被動的局面，岡村寧次向新四軍軍部發出了議和信息……新四軍接報，因事關重大，即由中共華東局請示中央。延安方面反應奇快，密電答復：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觸。六月初，日軍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幹兒子，日軍總司令部參謀部對共工作組組長爲首的使團，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並建議中共方面派出負責官員前往南京與日軍總部首腦直接談判……經中共中央馳電批復，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便啓程赴南京。抵寧次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和楊帆開始正式談判，並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以之外，日方還答應讓出八個縣城，新四軍保持中立，也可以將來和日方合作，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國軍和美、英方面……這化敵爲友的第一次正式談判自然未獲實質性成果，但已協商好保持秘密接觸的級別、方式、地點、時間，爲進一步談判做好了準備工作。這一系列賣國勾當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 1945 年 8 月發現的秘密。”

難怪共產國際的特派員氣憤地指責說：“毛澤東在侵略者面前向後退

縮，却乘中央政府和日軍衝突之際爲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嘗艱辛並作出了不可估價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時刻，採取這種策略，豈止是背信棄義而已……什麼國際主義政策，跟毛澤東哪能談得通，連他自己的人民也祇不過是他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罷了！千百萬人的流血和痛苦，災難和憂傷，對他來說，祇是一種抽象的概念。啊，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啊！我們往往是過分地把它簡單化了！”大陸出版的《南京志史》披露了一則被封存了近半個世紀的醜聞。中共當年竟然背着國民政府，背着四萬萬浴血抗戰的同胞，私下裏透過秘密渠道與日本最高軍政總部議和。這篇史料一見光，史學界爲之嘩然。該書揭露：1945年6月，設在南京的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來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報家門：我是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衛兵們大驚失色，緊急通報上去，軍部的長官連忙出迎，殷勤接待……

據《中共歷史的見證》記載：“八寶山的革命烈士，不少都做過漢奸。”（頁158）

除了民族敗類，誰還會作出這種通敵賣國的勾當？除了喪盡民族良心的人，誰還會不把作出如此勾當的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名至實歸爲“民族敗類”？竟有無耻文人學會了毛澤東的嘴皮子功夫，企圖通過玩弄一個字眼就改變事情的實質，諸如：“改陰謀爲陽謀，陰謀詭計就成爲正大光明”；“改冒進爲躍進，盲目冒進就成爲馬克思主義的大躍進”；“改好大喜功爲好社會主義之大、喜無產階級之功，好大喜功就真的成爲豐功偉績”……這次是“改民族敗類爲民族勝類，民族奸賊就成爲民族英雄”！

下一個問題，我們要問：是不是毛澤東賣國求榮、認賊作父不愛國家、民族、人民，祇是狹隘本位主義、一心祇爲共產黨謀私利呢？抱有這種想法的人，還是沒有認清和掌握住毛澤東極端自私自利之本質及其邏輯。

## （二）爲一己之私，犧牲黨組織

一旦他的私利與他所在黨的利益發生矛盾時，他便毫不留情地使龐然大物中國共產黨在全國陷于癱瘓；堅決徹底砸爛共產黨的專政機關公、監、法；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他的衆多的老戰友、老同志、老革命，並且禍及廣大的幹部和群眾，讓上億人受害。經歷過日本和國民黨監獄的好多老幹部說，現在老毛對待我們遠比敵人的監獄都殘暴！這可不是右派給社會主義抹黑，而

是老革命的具體身受。至于黑五類、黑九類本來就是生活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有或沒有圍牆的監獄之中，文革中最嚴重的情況竟是許多地方遭遇到集體屠殺，殘酷到甚至老少無存，斬草除根。

### 1, 一位省委宣傳部長如是說 “文革”

揭露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不是本書的任務，本旨在通過文革就像通過反右、廬山會議等等這些毛的“杰作”，來透視其本質。

《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一書的作者張戎，她的父母親都是意識形態工作者，父親是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母親是市一級的宣傳部長。書中寫道：“1967年2月的某一天，在恐怖氣氛最濃時，我父母曾作過一次長談。當時母親坐在床邊，父親則坐在一張藤椅上，兩人對面。他告訴母親，他現在總算明白了‘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麼回事。這不是真的要搞好‘大民主’。一般群眾說話；也不是打倒幹部的驕氣，取消他們的特權。‘文革’是用血腥的手段來擴增毛澤東個人的權力。

“我父親說這話時說得很慢，字字斟酌。我母親問：‘毛主席不是很寬宏大量嗎？他都能容得下溥儀，為何要把那些與他出生入死，打下江山的戰友置之死地呢？為什麼他對這些人就如此狠心呢？’

“父親很激動，但却平靜地說：‘溥儀嗎？他是個罪人，早已被老百姓唾棄了，留下他，他能復辟嗎？但是……’他停住了，意味深長地看着母親。母親理解他的意思；毛澤東不可能忍受任何潛在的挑戰。不過她仍不解地問：‘為什麼讓我們這些下面的人受大罪呢？為什麼要害這麼多無辜的人呢？又為什麼要造成這麼大的混亂呢？’

“父親說：‘可能毛主席覺得他不把整個世界翻個底朝天就達不到目的……’

“父親沉默了一會兒又說：‘這不能叫革命，跟馬克思主義一點兒邊都沾不上。他為了個人權力，讓國家和人民遭受這麼大的災難，肯定是錯的，簡直就是犯罪！’

“母親一陣揪心，感覺到大難臨頭了，她的丈夫既然這麼說，一定會有所行動。果然他說：‘我要寫信給毛主席。’”（頁266）

他這樣做了，他被捕了，罪名是“炮打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他被殘酷鬥爭，精神失常了……直到粉碎四人幫，都得不到平反，因為涉及到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最終，還是時任四川省委書記的開明的共

產黨人趙紫陽親自批准給他平了反。

作為別的什麼部長猶可說，唯獨作為專門吃宣傳飯的部長，以他這種身份，能在文革運動初期就看穿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所具有的渺小的本質：在政治上、思想上、人格上的極端自私自利、陰險殘忍、虛偽狡詐，為一己的權力欲之驅使，竟不惜亡黨、亂國、置人民于水深火熱之中！這位部長能有這種洞察力，實屬難能可貴。我認為，政治信仰，人各有志，不必強同，但能捨生忘死，堅持良心，則確證其具有令人景仰的偉大人格——這正是毛所缺乏的一個“偉大”；豈但“缺乏”？而且適得其反面：“渺小”。這樣一來，既有“偉大”又有“渺小”，符合了毛澤東思想要求的兩點論。不過，鄧小平又對毛的“偉大”做了補充：“毛澤東同志犯了錯誤，這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犯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犯錯誤。”（鄧選二卷，第271頁）這樣一來，前有林彪的“四個偉大”，後有鄧小平的“兩個偉大”，合起來叫做：“六個偉大，一個渺小。”這樣就又符合了鄧小平理論把問題“說全”的要求。不過，除了“渺小”保持原狀外，尚有兩處需做改正：一是把“偉大”改作“吹糖人”；二是把鄧小平所說的“錯誤”，按張部長的定性，都改為“犯罪”；這樣就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哲學精髓——“實事求是”了。

在張部長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對文革作出定性十幾年之後，鄧小平說：“搞‘文化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願望來說，是出于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但對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同上，第305頁）如果，哪怕這個人是政治低能兒，又如果他不喪盡天良，他也不會說出這種冠冕堂皇而實質上無異于掩耳盜鈴的話。怎麼張部長能看出毛搞文革純粹是為的“擴增權力”，而把“實事求是”當做口頭禪，張口“實事求是”閉口“實事求是”的鄧小平，為什麼竟能如此自欺欺人而又自信能够一手遮盡天下人的耳目呢？這裏又驗證了我開頭說的，共產黨人把“實事求是”當作謊言的總包裝。

看來實用主義者鄧小平不是太在乎歷史的。中國歷來的政治家大都在乎“歷史”，這是富有傳統的。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劉少奇更具有理想主義色彩，他是很在乎歷史的。由于毛想當世界革命導師，國際共運領袖，便瘋狂地倒行逆施，作出種種驚人的傻冒之舉，致使勞民傷財，中國餓死了四千多萬人，劉想要採取一些挽救措施，如搞“三自一包”等，惹火了毛。

劉像是敲警鐘似的，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毛一頭碰到南牆上，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始末》第392頁）。

鏡頭轉到大救星興高采烈地舉着手，面對着尸體遍野，伴隨着五音不全的高分貝喊叫：“我們一天一天好起來，敵人一天一天爛下去。”

問題是，在海外有些人士，吃着自由主義的飯，唱着“極權主義就是好！”我在《世界日報·民意論壇》上看到，有人聲嘶力竭為毛喊冤叫屈，嫌毛禍國殃民做得還不够，說什麼“要正確對待毛澤東”！

這些人：有的屬於即便餓死九成也輪不到他們的人，另有聲稱是黑五類。後者可能是慶幸自己的幸存，抓住機會趕緊表態，以展示其“從人到猿”的改造成績，向黨確證自己不可逆地變成了猿。所有這些人，不管你裝得多麼馬列毛，你還會比以賣狼奶為職業的共產黨人張宣傳部長更馬列毛嗎？

可喜的是，輕舟已過萬重山；可鄙的是，猿聲依稀啼不住。這不禁使我想起魯迅的一句名言：人和人的差別大於人和類人猿的差別。

### 2, 毛是“大奸”

“中共建政之初，有過一個傳說是，毛澤東與劉少奇同看京劇。當劇中人曹操說道：‘寧可我負天下人，不讓天下人負我。’劉對毛說：‘你看，曹操多奸？’毛澤東對劉少奇說：‘曹操不算奸嘛，曹操真是大奸，他這話就不會講了！’（《中共歷史的見證》頁305）那麼，如果曹操是毛澤東，是否會流傳下一句千古佳話：“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呢？可毛澤東却說周恩來是“貌似忠貞實屬大奸”。其實是一丘之貉，難兄難弟，彼此彼此。

人（包括聰明反被聰明誤的“投機”者）所以“輕信”毛，是由于毛是“大奸”，人很難了解他的本質，而往往為他散布的假象所蒙蔽，因而就失之于從主觀願望出發，抱上一個對他不切實際的美麗幻想而受騙上當。所以，為了不受他的徒子徒孫的繼續欺騙，對於今天的人們來說，認清毛的本質，對任何人來說都是絕對需要補上的一課。如上所述，我們已認識到毛的本質是自私。可是，世界上除了毛封的白求恩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之外，還有誰不自私自利呢？不過在剛一解放時，我倒是聽到過一位省裏衛生廳的幹部說起過：“我跟白求恩共過事，他是一個老騷貨，手下的小護士都遭他奸污了。”因我是姑妄聽之，未曾求證，故不便率爾推翻毛論。

我的意思是說，祇有舉出毛的“自私”在程度上和性質上與眾不同之點，

才是他的特殊本質。他的自私具有“極端性”的特點，極端到史無前例的地步。讓事實來說話：作為他絕筆、絕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為了擴增他個人的私權，如張部長所說，不惜把世界翻了個底朝天，其時間、其強度、其深度、其規模、其浩劫性，他自認、人皆曰：史無前例。

他一生殺害無辜之多，史無前例；他倒行逆施，一意孤行，打壓異見，大放衛星、土法煉鋼、實行人民公社化，其瘋狂性、其愚不可及，史無前例；其餓死人數達四千萬之多，也是古今中外，絕無僅有；他對私人醫生李志綏說起會死人，張口就是死他幾千萬不算什麼，中國人這麼多，更有甚者，他為當世界革命領袖，不惜死去一半中國人，然後再在消滅帝國主義的戰爭廢墟上重建社會主義。所以，他不僅在殺人之實上，而且在殺人的狠毒之心上，也是史無前例；他集歷史上權術之大成，養天地邪氣，法古今壞人，所用手段之陰險毒辣，其性質之反現代、反民主、反文化，而造成最落後、最反動、最黑暗、最獨裁之政治，為希特勒、斯大林所自愧弗如，堪稱史無前例；他以知識分子為敵，大興文字獄，開展諸如反胡風、肅反、反右派鬥爭等一系列政治運動，焚書坑儒，自稱是秦始皇的100倍，自是史無前例；他為填欲壑，糟蹋小女子的身心，破壞人家的家庭，雖極為卑鄙惡劣，但與歷代荒淫無耻的皇帝相比，無法確定他已創世界紀錄，但與他假裝正經、偉大，以及被神化的莊嚴形象相比，其落差之大，則是史無前例；而最罪不容誅的是，共產黨自己說，他“搞亂了人心”，“耽誤了幾代人”，實際上，他通過搞政治運動，通過洗腦，把幾代人，把很多中國人，搞得沒有尊嚴，寡廉鮮耻。正如牟宗三大師所說：“什麼叫糟蹋文化生命呢？在這裏所表現的即是人無廉耻……今日大陸上有所謂的‘四大不要臉’，其中領銜的即是郭沫若與馮友蘭。你想，誰願意不要臉呢？誰能沒有一點廉耻之心呢？……大陸上，黃帝的子孫，那能沒有廉耻之心呢？為什麼能夠出現‘四大不要臉’呢？難道說郭沫若、馮友蘭就願意不要臉嗎？這都是毛澤東糟蹋的！這都是共產主義糟蹋的！才使得人無廉耻。這‘四大不要臉’不過是因為他們有名氣，易受注意，而特別舉出來。事實上，豈止這四個人而已，一般人誰敢有廉耻之心呢？”（《從儒家的當前使命說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黃花崗》雜誌第六期第87頁）

現在我民族，民風日下，已到墮落的程度，始作俑者，豈一“殺”字而可抵其滔天之罪乎？！我這才算領會了，西方史學家為什麼把寫史與“憤怒”聯系在一起？同時也足見，毛的自私，專門損人利己，已到登峰造極、無以

復加而致使天怒人怨的地步！所謂“史無前例”的“史”，非但中國史也，猶為世界史也。實際上，這也就是共產黨的“光輝歷史”！

### 3. 毛自私的本質特點

毛澤東的極端自私，有四大本質特徵：極端貪婪、極端陰險、極端卑鄙、極端黑暗。這似乎是在謾罵，其實不然，這跟對着“四大不要臉”說：“你們不要臉！”一樣不是罵人，而是在陳述一件客觀事實。如果你改述如下：“你們有錚錚鐵骨，崇高的人格，頭可斷、血可流，絕不出賣純潔的靈魂……”他們倒要懷疑你在用鐵勺打臉——打得不痛挖得痛哩！

#### (1) 極端貪婪

說他極端貪婪，是指他吃獨食。言是一言堂，行是一意孤行。從動機和結果上而不是從策略上說，他決不與任何人利益均沾。至于他作為口頭禪的所謂“為人民服務”，你祇用不要誤會，所謂人民、黨、無產階級……統統祇是指毛澤東自己，絕對不包含第二個人。我在前面已對此作了充分的證明，任何一個人在毛當政下，都是全被剝奪了任何一個現代民主國家的任何一個普通人的自由權利，包括你貴為國家元首、貴為終身總理！這就說明，毛澤東霸占了所有政治概念中的權力內涵，也就是說，在政治上吃了獨食。聲稱黨和軍隊的宗旨都是“為人民服務”，實即為他毛澤東服務——連這句話都是多餘的。因為他 = 黨 = 人民 = 無產階級；如果他發現，黨竟然不是他自己獨占的玩藝兒，那他就會斷然癱瘓這個黨，毀滅這個黨，叫這個黨滅亡！文革就是這樣做的。

我以為能看透毛澤東在政治上吃獨食的，祇有周恩來一人，劉少奇都不成，劉都有時以平常心看待毛。把毛澤東當“人”看待，這是劉和億萬人民犯的共同錯誤。你可以把他看成是神、是魔鬼、是禽獸，唯獨不能把他看成是人。即以自私而論，他不是一般的自私，而是自私得着了魔，禽獸般的自私。毛為了吃獨食，讓共產黨先吃到獨食（一黨專政）是必由之路，于是他采用“引蛇出洞”的陰謀，把有民主意識的民主黨派、知識分子，一網打盡，讓權利意識斷根絕苗。在毛一息尚存時，把政敵一個個殺的殺、囚的囚、眨的眨，把新黨羽培植起來，把家人——女兒、侄兒、侄女、妻子，甚至情婦也安置在黨的領導核心；機關算盡而千慮一失者，是他“東征于朝，長子死焉！”否則，中國不也有了自家的“金正日”了嗎？國人有的為此而感謝彭德懷，說：“鏟除了那個壞種羔子，是為國除了一害。”



由此審視之，說他一生的所作所爲，是極端貪婪、吃獨食；有一點假嗎？

## （2）極端陰險

說他極端陰險是指他用心險惡，極端毒辣，專搞陰謀詭計。因為他的本質是極端自私，決定了他的動機和目的便見不得天日。比如，他死前遺言如有一句憂國憂民、關心國計民生的話；你看能把“偉大”宣傳得怎樣地山呼海應吧！現在好了，這方面的話一句也沒有，有的却是把自己的家人，甚至是沒法稱呼的人（要是按革命群眾的說法來直呼，就是稱作“破鞋”；他老毛這種行爲，叫做“搞破鞋”）都安排得停停當當。你總不能讓大家知曉，主席奄奄一息，仍念念不忘關心“破鞋”大事。于是，祇好把檔案絕對保密起來，以免“有損”。“有損”一詞尚未入中外詞典，是共產黨許多政治術語中的一個，類似黑社會的黑話，意思是：“有損毛澤東形象，有損共產黨形象……”華國鋒用“有損”一詞造句說：“政治局有過決議嘛！由你、錫聯、登奎三人負責清理，分類解決其中的一些極爲敏感、‘有損’的檔案，可以由東興同志代保管。這是主席健在時，也是這樣做的。”（《汪東興私藏“毛檔案”被抄家》）

保密是中共卷裹膿血的重大措施，雖然他們之間有時狗咬狗兩嘴毛，但爲了得利集團的共同利益，使他們都願意掩住漆黑一團的內幕，而鄧小平的《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鄧選二卷第255-274頁）便是一篇《“家醜不可外揚”論》。至于毛本人，則是既要做最大的婊子，又要樹最高的牌坊。對於這種二者不可兼得而又偏要兼得的人，你還能指望他光明正大、說真話，不搞陰謀詭計、不說假話嗎？斷然沒有可能。仍以他迫害劉少奇爲例：文革初期，他“隱居”起來，跟李志綏說：“讓他們去鬧，我們先休息一下。”劉鄧到杭州向他匯報運動中的情況，劉鄧走後，他心懷叵測地說給李志綏：“讓他們去處理運動中的問題，我還在休息。”（《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p442）

劉鄧趕回北京，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主張派遣工作組。電告毛澤東，毛復同意。

當學生與工作組的矛盾到不可開交時，劉少奇、鄧小平于1966年6月11日，在文革匯報會上指示李雪峰、吳德：打右派學生“不要定框框，有多少定多少”。13日，劉少奇批轉中南局和西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指出：“當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于反擊。

要告訴左派，要硬着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高中應屆畢業生“經過市委批准，可以鬥爭和戴帽。”（《文革大年表》第120頁）他們把毛澤東對右派“引蛇出洞”的惡毒陰謀，來了個東施效顰。他們在“引”學生的“蛇”，却不知道，這樣一來他們本身這條“蛇”正好被毛“引”出了“洞”。

“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火候一到，毛宣布派工作組是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並貼出《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攻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勿毒不丈夫的大巫斥責小巫：“又何其毒也！”往下便是前述《左傾二十年》中提到的毛對劉的貓哭老鼠那一段。不過，該書沒有提到在文革中已傳出的情況：毛對劉自我批評說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立即在私下說：“什麼老革命，老反革命。”祇要有這句話，劉的問題就定了性，就等于判了死刑。其它的鬼話連篇，便祇能顯示毛之偽善、之陰險、之卑劣、之詭詐的醜惡嘴臉了。

看清了反右後發生的事，也就找到解開前事的鑰匙。反右派的手法就是這個樣。他已經為《人民日報》寫好反右派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却仍對隨後就要被劃右派的冒廣生老先生說：“講得好呀！我一定牢記在心上。”並且牙是牙、口是口地保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個方針，一定不變。”

至于他對《文匯報》，剛剛還對該報的社長兼總編輯徐鑄成當面誇獎道：“你們的《文匯報》辦的好，琴棋書畫，梅蘭竹菊，花鳥蟲魚，應有盡有，真是辦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看你們的報，然後看《人民日報》，有工夫再看其他報紙。”同時他還肯定了《文匯報》關於電影的討論，說道：“這次對電影的批評很有益……電影局不理是不對的。這次爭論暴露了問題，對電影局和寫文章的人都有益處。”

前言餘音繞梁，後語接踵而至：“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文匯報在春季裏執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方針，向無產階級舉行了猖狂的進攻，和共產黨背道而馳。其方針是

整垮共產黨，造成天下大亂，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幫助整風’的嗎？假的，真的是一場欺騙。”結果，以羅隆基為帥，下有社長兼總編輯徐鑄成，能幹的女將蒲熙修等等工作人員，劃了一大片右派；當然敲電影鑼鼓的鐘惦棐自是在劫難逃。

他這是老一套，比如從前對胡風，臨逮捕前一兩天還指示周揚派人穩住他。對彭德懷、劉少奇、林彪也都是這樣……

這裏存在兩個問題：一個是，為什麼人們識不破他這個“老一套”的把戲呢？我以為，一開始識破他是不很容易的，但成為“老一套”就不需要多高的政治水平和智慧水平了，問題祇是，你絕對地怎麼也不會料到他作為領袖會這樣壞！這樣不講人格！這樣卑鄙下流！會是這樣像一個死皮癩臉的下三賴！第二，詭計多端的毛，怎麼總是玩弄“老一套”把戲呢？其實，他在具體運用上還是耍了些花樣的，祇是大同小異，萬變不離其宗而已。從哲理性上講，這是由于，反映本質的現象必然具有反復呈現性，這是不以他的意志為轉移的。人們從這裏發現有迹象可尋，尋覓出他行為的軌迹，認識到他行為的規律性，這才會對他作出有力的對應。說句老話：往往兩個歷史過程會出現驚人的相似，驚人的巧遇，驚人的偶合。這種碰巧是常見的，不是偶然的，是必然性的存在形式。

這個“反復呈現性”很重要，如能發現，能緊緊抓住，就會認決：“虎走千裏總吃肉，狗走千裏總吃屎”，“象牙出自象口，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並且還能見微知著，不失時機地掌握事態發展的火候，如麥熟一晌，蠶老一時，立秋18天寸草結子，水成冰于一瞬。這些現象都是千變萬變不離紅綫的。祇是做到事先的諸葛亮不是那麼容易而已。誰都沒有預見到：“20世紀90年代，蘇共亡黨，蘇聯亡國。世界上第一個由共產黨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夜之間灰飛烟滅。”（《蘇共亡黨十年祭》）同樣，今日中共，處處星火，防不勝防，窮于應付，惶惶不可終日，正處於倒臺的前夜；這就是中共今天的處境。中共高官們當少先隊員時的呼號：

“準備着，為共產主義而奮鬥！”

“時刻準備着！”

現在改為：

“共產主義，一夜之間灰飛烟滅！”

“時刻準備着！”

由于毛心太狠、手太辣，雖然把玩弄陰謀詭計搞得爐火純青，進入化境，但隱藏於偽善背後的凶相已逐漸暴露；極端自私的居心已為人們識破，估計不會有多少人從真心裏認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出于公心；自以為得計的鬼把戲已玩得露了餡兒，發生林彪事件後就更玩不靈了，人民群眾大都識破毛的“老一套”。毛陷於孤家寡人，喟然而嘆曰：“是在反對我老毛啊！”

毛倡導的無理纏三分的學風，痞裏痞氣、咋咋唬唬，作為大批判的範文，流毒全國。當年毛澤東批右派的文章，寫得是何其洋洋灑灑、理虧而氣壯、理屈而辭不窮！現在再來看：其中有沒有有一句算得上不是裝腔作勢假大空、男盜女娼裝正經？

是徹底地揭發、識破、批判毛澤東的毒謀詭計的時候了。讓人人皆知、個個喊打，把受到的欺騙、蒙蔽、洗腦、毒害，予以喚醒、清洗、消毒，並增加免疫力，以抵禦他們正在把毛澤東的“陽謀”基因作為傳家寶傳流下來繼續毒害人民。

上面我們揭示了毛極端自私的兩個本質特點：極端貪婪和極端陰險；現在要說的第三個和第四個特點：極端卑鄙和極端黑暗，前面已多所涉及，後面還要作進一步的深刻揭示，所以就不在這裏單獨論述了。

### （3）極端專制

一切統制都是以肉體為限，毛要統制你的靈魂。一切槍斃都是槍斃肉體，槍斃後再檢驗有無漏斃或斃後仍有一息尚存者，再補斃一次。毛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就是要槍斃靈魂，而反右運動就是用“‘陽謀’試劑”來測試一下靈魂漏斃者，再補斃一次，再算上全國後來的“反右補課”實際就是補斃了兩次。

槍斃靈魂就是通過消滅異議、異思來解決思想矛盾，把全國的思想統一在毛澤東思想上。追索起來，最突出、最明顯的槍斃靈魂的事例，就該首推殺害王實味這個貨真價實的右派老祖宗。毛澤東說，要還他一個王實味！這是欺世盜名——貓哭老鼠，鱷魚的眼淚。毛澤東如果說要還他一個王實味——有半點真心的話，那他就無論如何也不會再槍殺幾百萬個王實味（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了；其中就有名副其實的、當年漏網的王實味分子艾青、丁玲、蕭軍等。

而且，即便是對待相同的信仰，也是看重信仰的形式遠超過信仰的實質。也就是柯慶施說的“要到迷信的程度”。如果你用你的思維而不是他的思維

信仰他，那也是他所不允許的。他要消滅你的主體性。

毛時代是，即便是你心悅誠服，但你仍保存着自己的主體性，那也不成，你要想活下去，就必須成爲毛共的客體，毛共起先是黨天下，是一個集體主體。所以，反右之後在政治上存在下來的知識分子，都是毛共的客體，例如吳晗、郭沫若。這時候，毛完成了自己一生中的第一件事，打到蔣介石，建立黨天下；並開始着手幹第二件事，由集體主體變爲一人主體，建立毛天下。此時不僅知識分子，而且他們集體主體中的任一分子，如果不像周恩來一樣由主體迅速變爲客體，你就難免“敵人不投降，就叫你滅亡！”的下場。郭沫若不僅表示要燒掉自己的著作，而且對江青叫爹叫娘、磕頭如搗蒜。吳晗寫《海瑞罷官》本是向毛邀寵，但他邀寵表現出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露出了主體性的尾巴。說明從前“褪褲子、割尾巴”改造得不徹底，所以他需要再補斃一次，讓你死得慘不忍睹。即便如林副統帥，毛發現他仍具有主體性，也要叫他的靈魂裏爆發革命，連同“主體”和“性”同歸于盡。

毛後時代，祇要你當老實的奴隸，堅持“四個凡是”，是允許你貢獻聰明才智的，也就是犬儒們欣逢盛世，迎來了當穩奴隸、特別是奴才的時代。這時，中共已經沒有能力槍斃靈魂了——批異化，異化香；批人道主義，人道主義香；批自由化，自由化香；批誰誰香，批什麼什麼香。他對待靈魂，祇能搬出軍隊、監獄、坦克和衝鋒槍。這就是1989年鄧小平發動的“6·4”流血事件與毛澤東1957年用陰謀詭計發動的反右派運動，具有不同的歷史根據，並非鄧比毛還壞。公平地講，二人的惡毒性難兄難弟；祇是鄧曾做過一些好事，而毛則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

#### （4）極端卑鄙和極端黑暗

總結上面所述，共揭露了毛在兩方面的惡劣表現：當國家民族與他的黨的利益發生矛盾時，他損國利黨，以肥他一黨之私；當黨與他個人權欲發生矛盾時，他竟置黨于癱瘓、瀕于滅亡之地，以肥他一己之私。或者說，他原本就是把共產黨當做是奪權的工具的，就像把女人當做泄欲的工具一模一樣，始亂終棄。

現在我們來談第三方面：看看他是怎樣對待他自己的親人——父母、兄弟、妻子、兒女呢？首先從妻子說起。這就進入了中國固有文化、道德所說的“修身、齊家”的層面。

### （三）爲飽私欲張開血盆大口，親疏通吃

你說毛澤東能自私到何種程度？如上所述，他爲了私利，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可以不抗日、假抗日、與敵私通、破壞抗日，甚至開展種植鴉片大生產，幹這種亡國滅種的罪惡勾當。在他篡權之後，仍倒行逆施——對外：在赤色殖民主義面前喪權辱國、割地、稱臣、做兒子黨；對內：破壞民族經濟、民主政治、民族文化、固有道德……成爲民族敗類第一人。

即如以對文物古迹的破壞爲例，就超過軍閥混戰、日本侵華所造成的劫難。同時他又是黨的敗類：連敵黨懸賞都捉拿不到的中共要人，却都慘遭他下的毒手……他不僅把國家、把人民、把他的黨當作犧牲品，而且把自己的妻子（中共的新名詞是“愛人”），前的、後的、好的、壞的，也都統統當作犧牲品，所以說，他也是家庭的敗類。不知道那位強辯說“毛澤東是民族勝類”的人，會不會再一次強詞奪理說：“毛澤東是家庭勝類”？說來也不必大驚小怪，他的始亂終棄、荒淫無耻，是不可能不如此的，因爲這是他毫不利人、專門害人的極端自私的本質，在這個角落的必然反映。

#### 1. 對楊開慧，鱷魚眼淚竟作傾盆雨

衆所周知，楊開慧無論作爲妻子，還是作爲共產黨員，無論賢德、才能、貌美、體健都是罕見的完美無瑕。她爲了對黨、對毛堅守忠貞，竟犧牲了自己年輕的生命。這是多麼令人肅然起敬啊！可惜負心漢毛澤東在她爲他被捕和犧牲（1930年）之前（1928年），早已把她犧牲了——與18歲的賀子貞宣布“由同志的愛轉變爲夫婦的愛”。開慧正在受苦受難，堅貞不屈，堅挺地捍衛着美好的恩愛姻緣的時候，他却在背信棄義，與新人尋歡作樂。之後，當敵人的子彈使她腦袋開花的時候，他正在與一位黃花姑娘玩得心裏樂開了花。

及至到延安建立小朝廷之後，賀子貞對毛在長征路上體貼入微的關照，便成了過時的黃花。賀子貞變成了楊開慧，毛“訃”新詞強作愁：“我失驕楊又失賀，鱷魚落淚流成河”。他抹了一把眼淚，就又倉促上陣，又把與藍蘋的搞腐化“轉變爲夫婦的愛”。這時他的“愛”路就廣闊多了，還有碧眼金發、洋爲中用。

到了北京，他坐上金鑾殿，那就可以爲所欲爲地選妃子，糟蹋下一代、下兩代，遍及全國。他的妃子中，不乏有夫之婦，被霸爲己有，破壞了別人的家庭，讓這些家庭“榮幸”地演出一幕幕悲劇，榮幸中之姣姣者，幾乎做到

了大管家汪東興說的全家人“一鍋煮”，把姐姐、妹妹和嫂嫂都煮進去了。大管家譏笑說：“她的媽是死了，不死的話，也會來。這一家子真是一鍋煮。”他同李醫生說：“主席年紀老了，是不是覺着活不久了，要大撈一把。否則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興趣，這麼大的勁？”（《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348頁）

裴毅然在《李銳談毛澤東、三峽》中，提到李銳說了下面一段話：

我再跟你們說一個毛澤東的事兒。去世的詩人蕭三，原來也住在這幢樓裏，我們之間有接觸，他說毛澤東是“鐵鷄巴”，很難聽。楊開慧的一些手稿藏在住宅牆壁裏，80年代修故居時發現了，湖南黨內刊物上曾予以刊出。前幾年湖南來人告訴我，有些要害話被刪去，如說毛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她的哥哥楊開智，1929年去過井岡山，楊開慧知道毛澤東娶了賀子珍。她帶着三個孩子住在長沙東鄉60裏的板倉，毛澤東兩次打長沙都經過此處。省長何健為報仇，將楊開慧逮捕，逼她登報同毛離婚，她不應允，於是將她殺害。易禮容這個人知道嘛？易禮容同我談過楊開慧臨刑前押在人力車裏游街，她大喊：“我不要死！我不要死呀！”因為她還有三個孩子呵！毛澤東一生好動喜鬥，人品壞，我最近有一首打油詩，唉，這個你別記……最後兩句是：其樂無窮拼命鬥，家亡國破全由他。”（《開放》2011年第7期）

他霸占一位女機要員，不讓人家結婚。他在她的民兵服相片背面，寫了一首《七絕·為女民兵題照》：颯爽英姿五尺槍，曙光初照演兵場。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妝愛武裝。”這首詩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寫出的。他硬是不允許她結婚，霸占着她窮奢極慾。她怒斥毛將她“作為泄欲器，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玩弄女性，過的是腐朽的資產階級生活。”毛惱羞成怒，一脚將她踹到床下，就此爭吵起來。衛兵聽到，便闖入，一看此景急忙退出。你再也想不到毛不要臉到啥程度！毛竟能指示汪東興立刻開她的批鬥會，也不想汪在會上要批評、要鬥爭她什麼！當然鬥爭是一定要鬥爭的，說辭是她不聽毛主席的話。

毛一貫是把女人當作泄欲器，當作性奴；是的，她說的是真話，一點不假。而叫做“同志的愛”或“夫妻的愛”，祇是毛澤東對自己一慣的男盜女娼所作的“滿口仁義道德”的指稱。被大救星“愛”的那群天真爛漫的少女就更可悲了。一則在心理上變得寡廉鮮耻，如李醫生所述：“毛的性生活、特殊性格和至尊權勢，在在都使這批年輕無知的女孩耳濡目染之後，逐漸墮落。多年來我看着舊戲不斷重演。她們在成為毛的‘女友’後，不但不覺得羞耻，

反而日益趾高氣昂……一個個變得驕縱，仗勢欺人而難以伺候。看了這麼多被毛腐化的女孩後，我才開始覺得，江青走過了相同的道路。在延安初和毛結婚時的江青也許真的和今日十分不同。也許毛也使江青墮落了。”（參見《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344——348頁）

### 2, 生理的蹂躪。

毛陰莖包皮過長，平時又沒有清洗幹淨的習慣，很快受到了傳染，成為滴蟲攜帶者。此時及以後，凡是同他有這種“特殊關係”的女人，沒有一個不受到傳染。她們受感染後，請我治療……但光是治療毛的“女友”無濟於事。有一次毛問我為什麼原因治不好。我說明，需要他同她們一起治療，在治療中不能發生性行為，祇能等待治療完畢，檢查無滴蟲以後才可以。毛嗤之以鼻，根本不相信自己已經受傳染。他說：“你們醫生就會小題大作。我根本什麼感覺也沒有。”我向他解釋，這種病一般在男子沒有什麼癥狀，成滴蟲攜帶者，對自己沒有什麼特殊的害處，但是可以傳染給沒有這種病的對方。毛聽了以後說：“既然對我沒有什麼害處，那又有什麼關係，何必大驚小怪的哪！”我又說，一旦傳給了江青，就會成了一個不好說明的問題。毛笑了笑說：“這不會，我早就同她講，我老了，不行了，辦不了事情了。”我又勸他把局部洗幹淨。他的回答很幹脆又醜惡，他說：“沒有這個必要，可以在她們身上清洗。”我聽了以後，從心裏感到惡心，幾乎要嘔吐出來。（同上，第349頁）

外人知道他是個暴君，嗜殺成性；是個陰謀家，陰險、毒辣、詭詐……可誰會知道他竟然能夠如此庸俗、卑鄙、下流、無賴，簡直是侮辱了傳染傷寒病的虱子！如果不是內中人，無論如何是不知此中情的。被林彪冠以“四個偉大”、被鄧小平評以“兩個偉大”的這個龐然大物，你能想象到竟是個衣冠禽獸！

凌鋒先生在《魔誕：群魔亂舞》一文中寫道：“80年代，中國有一位著名的學者，也是老資格的共產黨員，在香港告訴我，毛看中了毛岸英的老婆，才把毛岸英派到朝鮮，決不是什麼偉大的國際主義精神。”（《觀察》2003.12,P25）在毛給兒媳的信中也透露出這層信息。這實在是另一種意義上的“人不可貌相”。可見一個人自私到了極端，就會私欲猛于虎的。有道是：“虎毒不食子”。斯人也而幹斯事也；實在是鐵石心腸，血盆大口，粗細都下，親疏通吃。令人詫異的是，斯人也而又有斯言也：

“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



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祇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紀念白求恩》）我們不以人廢言，但他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人，是具有極端自私自利之心的人。從這點出發，他便成為相反的“五種人”：一個流氓無賴、荒淫無恥、破壞人倫、卑鄙下流的人，一個陰謀陽謀、兩面三刀、陰險邪惡的人，一個喪盡天良、絕滅人性、嗜殺成性、極端凶惡的人，一個道貌岸然、趣味鄙俗、十足虛偽、極端醜惡的人，一個打倒一切、獨霸一切、賣國求榮、認敵作父、禍國殃民、制造災難、拉着歷史向後倒退的人。

總之，毛澤東之為毛澤東，可以概括為“六個極端”（極端自私自利、極端貪婪、極端陰險、極端專制、極端卑鄙、極端黑暗），“三個敗類”（民族敗類、黨的敗類、家庭敗類），以及上述的“五種人”。毛澤東就是共產黨的人格化，毛澤東的本質就是共產黨的本質。認透本質，對總結經驗、接受教訓是必要條件和必然聯系。具體的教訓可以有無數條，但歸根結底就匯成一條，就是：吃虧在于沒有認透本質。認透了本質，老實人可以克服“輕信”的毛病；不老實的人應該鏟除“投機”的心理；想對中國的民主事業作出貢獻的人既不放棄一點一滴的改良，又要從反右派運動至今的歷史教訓中清楚地看出：共產黨已全然堵死了政治上改良之路。怎麼辦？歷史告訴現在和未來，祇有一條路可走：立下愚公移山志，誓移“黨天下”這座山！

前提：抱定思想、堅定信仰、抓住每個時機，每天挖山不止，一條道兒走到黑；後果：寧信蠶老一時、麥熟一晌、歷史巨變常發生于一夜之間，不是不報是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全報。

#### 四、壞人與壞制度的關係

說他極端黑暗，是指他政治目的落伍、反動，政治過程黑箱作業，思想陰暗，道德淪喪，生活糜爛，造成中國社會比歐洲中世紀黑暗時期還嚴酷、還禁錮、還黑暗。

##### （一）私欲膨脹，人民遭殃

反右派鬥爭的實質，就是毛澤東要扛住歷史的閘門，堵塞民主的潮流，

倒撥歷史的車輪，抗拒世界現代文明的進程。

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推翻了封建專制，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中國掀開了現代史的第一頁。繼續挺舉和捍衛這面三民主義旗幟的，是領導北伐、打倒軍閥的蔣總司令，是領導浴血抗戰、取得中國近代史上反侵略戰爭第一次全面勝利的蔣委員長。從此，中美英蘇並稱“世界四大強國”，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從此才真正站起來！

是治國無能、亂國有罪的毛澤東，反對民主共和，復辟君主專制，推翻了辛亥革命的成果，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從瑞金搬進了北京。從此，大陸同胞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中國人民“站出來”了！（開鬥爭會時，最普遍的程序就是首先喝令鬥爭對象：“叫他站出來！”）

對這個政權的定性，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至今仍未獲“改正”的右派分子林希翎女士，當年把它叫做“封建的社會主義”；林彪副統帥在《571工程紀要》中寫道：“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壓的絞肉機，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的家長制生活……他是一個借馬列之皮、效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相形之下，總設計師鄧小平就說得輕描淡寫多了。奧女士說：“是毛主席選擇了林彪，就像西方的國王選擇繼承人那樣。”他在回答時說：“一個領導人，自己選擇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種封建主義的做法。”他談到“搞特權”時說，“這是封建主義殘餘影響尚未肅清的表現。”（《鄧小平文選》二卷第305、292頁）可鄧小平“自己”（也是自己！）却把第三代和第四代接班人，連兒帶孫一並“選擇”了出來。所以，也就甭單說某人或某事“是沿用了封建主義的做法”或“封建主義殘餘尚未肅清的表現”了。幹脆說：“這是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鄧小平理論發展的就是這個東西。”說是“科學體系”絕非誣指，朱德的秘書提供旁證，說1950年5、1勞動節，是毛親手加上了最後一句口號：“毛主席萬歲！”當年孫中山曾怒斥、力拒別人喊他“萬歲”，認為既推翻了帝制，就要消滅這一套封建玩藝。至于到文革時，“毛主席萬歲！萬萬歲！”更是喊聲震天動地，讓他過足了皇帝癮。

從大學生到副統帥、到總設計師，三個人程度不同地都承認了毛共政權是封建主義性質的。而我則說，它祇承襲了封建主義的糟粕；馬克思說的封建社會的“脈脈温情”；孔子說的“仁者愛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溫良恭儉讓”；孟子說的“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老百姓說的“納了糧，自在王”等等，都叫毛驗明正身，執行了槍決。還有，在經濟上，封建社會還有大量的自耕農和半自耕農，即便按馬列控訴封建社會的說法，農民也還有半獨立人格。

可“解放”後呢，說地主、富農、資本家是剝削者，共產黨要打倒剝削者、解放被剝削者。而作爲被剝削者的農民的遭遇又怎麼樣呢？共產黨搞了借刀殺人、借題發揮、借頭過關的土地改革，農民剛分到土地，不久就來了合作化，土地便又倒手被變相剝奪了去。接着又成立了人民公社，吃飯在公共食堂，組織是軍事化營（生產大隊）、連（生產隊）、排（小組）；生產戰鬥化，勞動是大兵團作戰；生活兵營化，農民成了社員，一切行動聽指揮，完全身不由己，甚至連農民的生活資料如家禽、家畜、樹木梁檁、銅勺鐵鍋……也被無償地收公，屬於他的財產祇有隨身帶的“一雙筷子、一個碗，還有一個鋪蓋卷。”別說你的財產權，即便你自己的身子，也成了“磨道的驢——聽吆喝”，任人調撥。你是個六、七十歲的老人，也得服從命令上山去大煉鋼鐵；有的小脚老太太用手巾包幾個石子搬來運去。農民連封建社會的半人格也沒有了，反而又兼具奴隸社會的奴隸身份了。

當然，不止是農民，而是全民！北京大學才女、當代中國崇高人格的代表、右派分子林昭女士，以“中世紀的遺址”、“奴隸社會”，直接定義這個“極權主義”政權；歷史學家辛灝年說：“中國大陸全體人民，在實際上便成了在奴隸制度下的，無任何人權與民權的奴隸而已。”（《誰是新中國》第567頁）這是何等地準確、透徹、全面、毫不含糊啊！說中共政權是封建主義固然有道理，但它却更具有奴隸制度的特徵：士、農、工、商不就是士奴、工奴、農奴、商奴嗎？黑五類不就是黔面的罪奴嗎？

孫中山先生說他的三民主義是發財主義，爲大家謀發財。這個主義不但不侵犯私有財產，而且增加你的私有量。但是，決不能損公肥私。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任何人、任何黨派皆不可得而私也。革君主的命就是要把天下還給天下人，是謂“天下爲公”，是謂“博愛”。毛澤東反其道而行之，“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很沒有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有那麼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在這方面，良心少一點好。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麼馬克思主義。”（《毛澤東選集》，五卷第198頁）

他聲嘶力竭地教唆不要講良心，不要仁慈；想達到什麼目的呢？我們經過痛苦的觀察、血淚的體驗、科學的分析研究，得知毛的共產社會，是專制社會、奴隸社會、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擇劣組合：極端貪婪地“共”別人的“產”，就造成了“人人為公，天下為私”的局面。天下為最高奴隸主毛一人得而私也，再擴而大之，成為全世界的奴隸主，這就是毛的終極關懷；說別的，都是假的。據別人揭露，右派分子章伯鈞早已對中國這種局面有所覺察，他曾說過：“中國這樣大，一個上帝，九百萬清教徒（當時黨員數），統治着五億農奴，非造反不行。”（1957年7月9日，《人民日報》）

揭示毛政治上的反動落後、開倒車，可以從他的極端獨裁、濫殺無辜、路線鬥爭採取肉體消滅、階級鬥爭為綱，破壞科教、文化、藝術、生產等等數之不可勝數的各個方面；但考慮到中國的主體是農民，按毛澤東思想講，中國革命的主要問題是解決農民問題，而農民又是毛打天下的主力軍。因而，弄清毛是怎樣對待農民的，其他問題自當皆可觸類旁通。

如上述，土地改革，農民分到土地，這是得到的唯一實惠。但也不是白吃的午餐，而是以戰場上農民的兒子積尸如山為代價（當毛主席拿着紅藍鉛筆，在跟解放軍將領笑談“人海戰術”、規劃攻城戰役的時候，說：“我們準備犧牲20萬戰士，拿下這座城市。”這時候就會有20萬個活體，通過毛的筆尖變為尸體）。隨後合作化，土地就又給“共產”了。叫農民繳公糧、賣餘糧，實行統購統銷，用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盤剝農民，用戶口政策使農民淪為二等國民，受到不平等待遇，例如就業、子女升學、衛生醫療、統銷物品及其它緊缺物品憑證、票、券等的供應；特別是在餓死的四千多萬人中絕大多數是可憐的農民。

毛澤東哄騙得他們團團轉的，是讓他們殘害地主、富農及其子弟，平時歧視他們，占他們的光，讓他們幹臟活、累活、得低工分，貧下中農優先幹俏活（活輕工分高，例如培養一種肥料菌種“九二〇”。因他們缺乏科學知識，又不肯鑽研，結果都失敗了。反正祇要高工分拿到手就算。民謠作證：“九二〇，九二〇，養了一班兒寄生蟲。”）；在開會，或運動中，要地富站到或跪到前面挨鎮壓、挨鬥爭，是家常便飯；還要做懲罰性的義務勞動；剝奪一切權利，祇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這就使貧下中農產生優越感，感謝毛主席讓他們翻了身，把地主、富農打倒在地，再踏上一祇腳：“輪到了我們在你們頭上拉屎拉尿了！”到了憶苦思甜的時候，還可以給他們甩一臉鼻涕、唾沫。

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永遠跟着毛主席，世世代代不忘本！貧下中農並且被嚇唬：地富夢裏都在想復辟，一旦地富復辟，我們就要千百萬人頭落地，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然後就言出法隨，就唆使農民鬥爭幾個階級敵人，要他們交代復辟夢、變天帳。這就是為什麼毛把農民害到這一地步，還能受到“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歌頌的原因。

河南省副省長、河南大學老教授、民盟中委、河南省主委、右派分子王毅齋先生，因看到農民受共產黨的害，而又不辨好歹，遂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憤然說道：“黨團員帶頭賣餘糧，現在沒啥吃，餓死這些孬孫，活該！”（《河南日報》1957年7月26日）要說“活該”，不僅是農民活該，知識分子也活該，民主黨派也活該，你王老也活該，我劃右派、住監獄也活該；誰叫我們以擁護邪惡的共產黨為進步、為光榮來？埋怨“活該”無濟于事，不如總結教訓而利于行。但願你、我、他、她，誰也不要再辦“活該”自食其果的蠢事了。

由于毛極端自私的本質，決定了他“寧負天下人”；把“為人民服務”當作“羊頭”掛，而實際上置人民于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走共同貧困的道路。這便是毛所謂“革命”的真諦。和充分體現這個真諦的年年革、月月革、天天革的革命的歷程。請看毛澤東的革命哲學——下面我要原字原句，照抄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封面標明“高等教育哲學教材”，由郭建寧主編的《當代中國哲學綱要》第114頁上的“1，窮社會主義”（無需我指明，作為教材一定是持官方性質的馬列主義觀點）：

列寧說過：“由于歷史進程的曲折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國家愈落後，它由舊的資本主義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關係就愈困難。”60年代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筆記中，明確地否定了列寧的上述觀點。他寫道：“列寧說過‘國家愈落後，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就愈困難’。現在看來，這種說法不正確。實際上，經濟愈落後，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就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難。人愈窮，越要革命。”

毛澤東這段話，反映了他越落後越容易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信念。而這一信念，又集中體現在他對“一窮二白”的贊賞上。

毛澤東最早論述“一窮二白”的意思，是在1956年2月，當時還叫“一空二白”，是他在2月14日聽取34個部委匯報時的插話中提出的。他認為中國工業發展的速度可以超過蘇聯：“中國的好處，一曰空，二曰白，一點負擔都沒有。美國在華盛頓時代，也是白，所以發展起來也是很快的。蘇聯

開始也是白。富了不行。”後來公開發表時，改為“一窮二白”。這是在1956年4月《論十大關係》的末尾，他說：“我們一為‘窮’，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不高。從發展的觀點看，這並不壞。窮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難。科學技術水平高的國家，就驕傲得很。我們是一張白紙，正好寫字。”

1958年6月1日，《紅旗》創刊號發表了毛澤東《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文章說：“除了別的特點之外，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幹，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這裏，毛澤東看到一張白紙沒有負擔，但卻忽略了一張白紙也是沒有基礎啊。（紫丹按：毛未曾“忽略”，祇是白紙更利于他筆意縱橫、肆意揮毫。他說：“唐僧這個集團，豬八戒較簡單可以原諒，孫悟空沒有緊箍咒不行。”可見不簡單即不“白”，就要戴緊箍咒，即戴右派帽子。）

在由衷地贊賞“一窮二白”的同時，毛澤東對“富”表示了深深的擔憂。他認為，現在中國人生活水平低，文化水平低，“中國變富了，有了西方世界的生活水準，她就不需要革命了。西方世界的財富已成了他們的缺點，這些缺點使其不再想革命……他們生活的高水準，還沒有我們的文盲來得好。”

據此，他對農村中富裕中農不敢冒富大加贊賞，認為是好事。他在1958年3月23日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河南的富裕中農有好東西不讓幹部看，裝窮。無人時才向貨郎擔買布。我看很好，這表示貧下中農威力大，使得富裕中農不敢冒尖，這說明社會主義大有希望。”

1959年底和1960年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經過階級鬥爭，搞臭了地主、富農，農民以窮為榮，以富為醜，這是個好現象，這說明貧農已在政治上壓倒了富農，而樹立了自己在農村的優勢。”他還對外國評論“窮是中國躍進的動力”的觀點表示贊賞，認為這話講得好，因為窮就有壓力，就要革命，就要不斷進取。“富了，事情就不妙，中國現在不富，將來富了，也一定會發生問題。”

1964年，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不僅表示了對資本主義“富”的擔憂，同時也表示了對修正主義“富”的擔憂。他說“不要老是掙錢，掙來了錢就亂花錢……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按政策，必要時可以收買，對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什麼要收買？錢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圍的人……”

蘇聯高薪階層，先出現在文藝界。”

文化大革命末期，毛澤東以窮為榮的思想發展得更為嚴重。1973年6月，他說，中國是個很窮的國家，我看，越窮越好，就想革命啊！1975年9月，他在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時還說，中國現在還很窮，窮了好，比你們富好，人一窮，他就要鬥爭。

從以上毛澤東的論述可以看出：窮是光榮，窮要革命，窮比富好，富了，就不妙了，是貫徹毛澤東社會主義觀的一個重要思想。

抄書至此，喟然興嘆：就算是歷史上的暴君加昏君，也祇是暴虐無道、驕奢淫逸，祇顧自己享樂，不管百姓死活，或因昏庸無能搞得民不聊生。有誰像毛一樣，居心（居然是居心！）要讓老百姓掙扎在饑餓綫上以保持其所謂的“革命性”呢？他惟恐人民不窮、不白，他不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畫最新最美的畫圖！相當初，人民跟他鬧革命，流血犧牲，不就是為了過上好時光嗎？現在成了屎殼螂攆屁撲了空：“目的是沒有（？）的，革命，革命，再革命！革命就是一切！炮灰就是革命的價值觀！”

因為我出獄後又在農村監督勞動十六、七年，所以對農村、農民比較了解。農民把這種饑餓政策理解為“餓鷹策略”。他們說：“打魚人祇有讓漁鷹總是餓着肚子，它才有下河逮魚的積極性，一但吃飽，它就懶了，不動了。”他們還有諸如此類的一系列祇有文盲才會有的說法：“社會主義制肚（度）——社會主義是專門制人民的肚的”；“社會主義腫（總）路綫——社會主義是一條叫全民浮腫的路綫”；“社會主義高草（潮）——農民聽幹部宣講毛主席編寫的《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時，說：“合作化前，從沒見過田間的草長這麼高；原來這就是主席說的‘農村的社會主義高草’！”；“人民公社是瞧糧（橋梁），共產主義是天堂——入了公社，瞧着糧食大車小車都繳上去了，恐怕到不了共產主義就全都進了天堂”：另有，農民與布谷鳥對話：

“布谷布谷！你吃的啥飯？”

“菜湯糊糊，菜湯糊糊。”

“你咋不吃五谷？”

“糧食制度！糧食制度！”

爲了革命，必須“餓鷹”。這就無怪乎誰主張發展生產力，毛就給誰扣上“唯生產力論”的大帽子，給予鬥倒鬥臭了。文革時，哪個領導人提倡“抓革命促生產”（本是毛提的左傾口號），他就指責你意在以生產壓革命。

毛澤東思想是主張不斷革命論與革命發展階段論相結合的。這個革命勝利了，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一階段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中國的命革了一個段落，就該由中國的工農用小米加步槍去解放那世界上另外三分之二的仍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洋階級弟兄。假定全世界一片紅彤彤，革命化了，即都過上喝大鍋清水湯和三人的布票够買一條褲子的日子，這時若問：被激發出的“窮則思變，要幹，要革命”的勁頭是否該指向外星球了？以爭當“世界革命導師”爲革命唯一目標的毛澤東，已死不瞑目于陰曹地府；雖然他的徒子徒孫們掀起一陣陣毛澤東熱爲其招魂，但他已變爲分子、原子、電子、質子、毛子……重新組合而成爲不齒于人類的狗屎堆。經過一個輪回，毛澤東總算對農田作出了有益的貢獻，實現了產生于延安整風時的毛澤東說的“狗屎可以肥田”。而後，于1957年又產生了一個同價命題：“毒草可以作肥料”。

### （二）品質惡劣和制度黑暗狼狽互補

我們反對斯大林的極權制度，是當時的右派，特別是北大學生傳出赫魯曉夫的報告後，感到震驚和憤怒，感到過去嚴重受騙。事後才知道，毛澤東曾對胡喬木說：“蘇聯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下于歷史上任何最專制暴虐的統治。”可見對斯大林的罪惡，毛是心知肚明的，可他却要死死抱住斯大林主義、斯大林制度、斯大林的刀子不放，而且以“中國斯大林”自居。與此同時，更把挖出這個社會主義毒瘤的赫魯曉夫當做好像挖了他祖墳似的不共戴天的死敵。

我們衡量是非，根據的是客觀真理，斷然屏棄毛制定的這個主觀的原則：“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比如作爲暴君的他，曾說過：“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難道我們能因此就說“驕傲使人進步，虛心使人落後”嗎？當然不能。所以，我們不僅承認、而且“要永遠記住這條真理”；絕不能以人害言（不管出自何人之口）。問題是：“毛澤東謙虛嗎？”

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



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說：“他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於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致破壞。”他不但不謙虛，而且不簡單是個“驕傲”的問題，而是對黨內、外驕橫霸道，暴虐無道，冷血心腸，嗜殺成性的問題。但這並不能使我們否認：“敵人、壞人也有正確的地方，就像我們也有錯誤的地方一樣”。

因此之故，正確的原則就應該是：“凡是敵人擁護對了的我們就要更加擁護，凡是敵人反對對了的我們就要更加反對。如果真理掌握在敵人手裏，我們就要向敵人學習，如果敵人掌握了大部真理，事實證明是我們錯了，那麼，我們正確的選擇就是舉雙手投降。因為我們在真理面前，是五體投地的。如果敵人仗恃國家機器在手，肆行極權暴政，把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變成絞肉機，我們就會拒絕採取和平的手段與之作針鋒相對的鬥爭，但也不拒絕非和平的激烈的手段，總之是“執兩”而不是“執一”，兩眼緊盯全國全民的總體利益而不是以階級利益為旗號，坑國家、害民族、謀私權。如果共產黨口稱的“實事求是”是實話，那麼這也就是我們所持的態度。

鄧小平說：“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為中央黨校題詞，就是‘實事求是’四個大字，這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精髓。”（《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67頁。）又說：“實事求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同上》，第109頁）我們的意見是兩點：一，實事求是中華文化的本體論，是超越于唯物論和唯心論之上的哲學主張，是走向真理的不二法門；二，鄧小平說毛的這番話是“實事求是”的嗎？我們誰也別徒托空言，讓事實來發言。之前，剛過去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個大不實事求是，而且豈止是一個不“實事求是”的問題嗎？！順着歷史往前推，毛幹的事，有一件不違反實事求是的嗎？是“四清”提出整走資派？是七千人大會上的假檢討？是十中全會上提出反黑暗風、翻案風、單幹風、永遠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是廬山會議反彭德懷？是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綫——三面紅旗？是反右派運動？是一化三改？是肅反？是反胡風？是土改？是三反五反？是鎮反？……？歷史確證了人們總結出共產黨統治的兩大本質特徵，一曰：“恐怖”，一曰：“謊言”，這就規定了共產黨是“實事求是”的大敵。

“實事求是”是共產黨掩蓋一切謊言最華美的包裝、最有效的迷魂湯、幹脆說是一切謊言之集大成。或有人問：“共產黨最大的謊言是什麼？”不

是“爲人民服務”；不是“群眾路綫”；不是“我們一天一天好起來，敵人一天一天爛下去”；也不是“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最大的謊言，登峰造極的謊言、一言以蔽之的謊言就是：“實事求是”。

中共視“實事求是”如洪水猛獸。毛澤東思想就是實事求是的“死敵”。“死敵”意味著兩方面的意思：一是在“他”治下，你要不怕死，你就去堅持實事求是；二是人們果真都堅持實事求是，則“他”就會死亡。鄧小平的說法倒是合乎“死敵”一說的邏輯的。如果鄧說：“毛澤東思想是一個惡毒的謊言體系”，則他所代表的中共就正好是實事求是，而不是把“實事求是”當作謊言的總包裝了。反右不是別的，就是一場消滅“實事求是”的運動。如果用通過反右而帶來的“實踐”，進行一下檢驗，最明顯的事實就是大躍進，它就是跟蹤在消滅“實事求是”之後的一場古今中外、空前絕後的、全國規模的不實事求是——吹牛皮、放空炮的大運動。就像從倫理學上講，反右是不講信義、自食其言、陰謀詭計、引人上鉤，敗壞道德的行爲；從政治學上講是踐踏民主自由、實行極權暴政；從法學上講是剝奪言論自由，實行以言治罪，並且教唆、引誘別人“犯罪”；而“消滅實事求是”，則是毛澤東反右運動“哲學思想的精髓”。

鄧小平聲稱：“我是實事求是派。”（同上，第 209 頁）僅憑他上面對毛說的話，就可證明他不是“實事求是派”。這絕不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如果作系統的展開，你將會看到這一點是他整個思想體系的一個縮影，是他世界觀的一面鏡子。對反右派運動的罪惡進行狡辯、抵賴，說什麼反右是正確的、必要的，祇是擴大化，這樣的鬼話現在已無人相信；唯一的作用是推翻他的“聲稱”。反右派運動，毛是主帥，他是副帥，他手上沾滿右派的鮮血，正像他手上也有高崗、饒漱石的鮮血一樣，所以他也決不允許給高饒平反。例證比比，俯拾即是，別的暫時保留，單就副帥對主帥的評價，進行具體分析，就可一葉知秋。

鄧小平一再申誡：“毛澤東同志的錯誤，決不能歸結爲個人品質問題。”（《同上》，頁 258）這是因爲毛個人的品質太惡劣了，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從政治上說他是個陰謀家，從人品上講他是個淫棍。鄧對這一點不是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嗎？所以他祇有雙手捂住這個裹卷着膿血的包，把毛的“錯誤”歸結爲制度方面的問題；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這樣偉

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致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面，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同上，325頁）從鄧的這段話中，我們窺知在毛鄧的內心中，西方的國家不可能發生如斯大林那樣嚴重破壞法制的事件，而口頭上却振振有詞地大肆宣揚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純粹是爲了愚弄群眾的。

這個“不好的制度”壞在什麼地方呢？他指出五點（用毛制定的、鄧執行的劃右派的“六條標準”衡量，鄧的如下言論，對號入座，正好都是1957年極右派的大毒草——紫丹注，下同）：

1. 官僚主義現象是我們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廣泛存在的一個大問題（也是1957年右派向共產黨集中進攻的目標之一）。

2. 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于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于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于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而變成了個人領導（這等于是浦熙修揭發羅隆基在床第之上說過的右派言論：“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領袖個人獨裁。”）。

3. 革命隊伍內的家長制作風，除了使個人高度集權以外，還使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組織成爲個人的工具。家長式的人物，權力不受限制，別人都要唯命是從，（這一點，北京大學右派學生王書瑤早已深刻指出：“是由于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控制，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這種高度集中的權力，才使斯大林後期可以膽大妄爲，犯出一切錯誤。”）甚至形成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關係。不應把上下級之間的關係搞成毛澤東同志多次批評過的貓鼠關係，搞成舊社會那種君臣父子關係或幫派關係。

4. 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的形成，同封建主義影響有一定關係，同我們黨一直沒有妥善的退休解職辦法也有關係。（儲安平說得更徹底，廢除黨天下，不就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5. 搞特權，這是封建主義殘餘影響尚未肅清的表現。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主義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比較少。（“比較少”也是還“有”。鄧小平也不得不承認從前是多、少的問題，而你們黨却把它變成爲有、無的

問題了。現在已看得很清楚，國民黨時期的民主比你們要多得多！儲安平在解放前就指出了。）解放以後，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克服特權現象，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制度問題（林希翎說你們是封建的社會主義）。

由于鄧小平在文革中受到某種程度的迫害，所以他不像華國鋒那樣，是文革的得利者，而處處搞“兩個凡是”，他是承認毛犯了錯誤。但又由于他的飛黃騰達，也是靠作為重要共犯參與毛罪惡活動的緣故，而且又為今後利益盤算，他就採取了以“逮住老鼠”為目的的機會主義、實用主義態度，僅僅指出和否定一些連他也不堪忍受的弊端，相反，如果他與華國鋒配合，也搞“兩個凡是”，那就要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這樣一來，別說逮鼠了，連貓的本命也完蛋了。這裏，“實事求是”與“兩個凡是”，存在着不可調和的衝突。那麼，不搞“兩個凡是”，祇認“實事求是”行不行呢？不可能的事。因為他和共產黨都是“實事求是”不起的。這就是為什麼鄧要求“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原來講要實事求是，以後加一個要恰如其分，就是這個意思。”（同上，頁293）“實事”是容不得一點打馬虎眼的，正好毛澤東是在“實事”上打馬虎眼。他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對“實事求是”作了一個“割頭”的手術（權術），說道：

“‘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

這樣，毛澤東就在兩點上曲解了班固“修學好古，實事求是”的原意：第一，“實事求是”原本是講治學態度的，毛把它胡謔成哲學理論，既牽強附會，也全無必要，且不說他還別有用心；第二，“實事”的“實”原本是個動詞，是核實、證實、落實、求真的意思，就是“實其事”。毛捨此意，而曲解為天然地明擺着的、不分青紅皂白、真假善惡而唾手可得的“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這樣對“實事”的“實”進行了閹割，祇留下了“事”，解做“事物”，就等于使人在“事物”面前不用做核實、證實、落實、求真的功夫了，可以無所作為了。那麼，不“實其事”，怎麼能“求其是”呢？“實其事”是絕對的，不能由着誰隨便說三道四；“求是”是研究規律、是相對的，可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毛澤東作為公、婆一元化，可以胡謔規律，如規定“外行領導內行就是客觀規律”便是。可見，毛澤東的、鄧小平的、馬列主義的，共同的哲學精髓“實事求是”，其真諦、其妙諦就在這裏。

這一點還能從鄧對毛的評價來說明，他說除了堅持“事實求是”外，“以後加一個要恰如其分”，這就更為主觀隨意性大開綠燈，暢行無阻。什麼是“恰如其分”？就是，以“實事求是”為名、為手段，以“蒙蔽真相”為實、為目的。例如，把罪大惡極祇許說成是普通的錯誤；把長期的錯誤祇許說成是晚期的錯誤；把整個的錯誤祇能承認是三分錯誤（比劉少奇說的“七分人禍”都有所倒退）；錯誤的主要罪責要找替罪羊林彪、四人幫來承擔；留下的，鄧自告奮勇要分擔，並且還要把被毛打發去見馬克思的劉少奇、周恩來等也拉來陪綁：“有些問題我們確實也沒有反對過，因此也應當承擔一些責任。”接着說：“當然，在那個條件下，真實情況是難于反對。”既然“真實情況是難于反對”，那還說什麼“我們也確實沒有反對過”？既然如此，還說“應當承擔”云云，這在邏輯上怎能站得住腳呢？人們不禁要問：“鄧是在自打嘴巴，還是在說廢話！”

鄧小平不是居心要說廢話，而是為了保護毛氏利益共同體，所以居心要說的不是廢話而是謊話，“真實情況”是他居心要騙人。所謂“恰到好處”，就是，該實事求是就實事求是，該撒謊就撒謊；實事求是其外，撒謊其中，撒謊讓人當作實事求是來相信。再想一想，難道真的如他所說，“都沒有反對過”嗎？周恩來、陳雲等反冒進，毛整肅得他們還輕？差一點兒把總理換成柯慶施，有人統計，光是1958年，毛就批“反冒進”13次。後來硬是讓周恩來坐了二、三年冷板凳，比在延安那次整得他還厲害！難道這是屬於“沒有反對過”嗎？再者，毛為什麼要批鄧子恢“小腳女人”呢？劉少奇在“三面紅旗”、“三自一包”、“四清運動”等問題上不也總是與毛“褲襠裏放屁——到兩岔裏”嗎？彭、黃、張、周為什麼被打倒？甚至小人物鄧托、田家英為什麼要自殺？對此，當然還有比這更多、更隱密的“真實情況”；作為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比任何人都了解得更清楚。所以人們會向鄧總書記發問：“你的許多說法，是自欺呢還是欺人？這使我想起，前蘇聯駐聯合國大使維辛斯基本是諷刺帝國主義的一句話，實際乃是共產極權的夫子自道：“誰不願意信誰別信，誰也擋不住我撒謊！”

因為是假話，所以就往往前言不照後語。毛的罪大惡極，本具有陰險毒辣、荒謬絕倫、卑鄙無恥、政治上和道德上全屬流氓的性質，但鄧小平忌諱歸結為毛主席的品質問題，而要拉“客觀”，即歸結為制度方面的原因。可這就與以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官定說法撞了車！要想自圓其說，就祇能把他所

謂的“實事求是”去掉引號，實話實說：魚兒離不開水，瓜兒離不開秧，壞人與壞制度是狼狽為奸、是狐群狗黨。

社會主義是帶着病人膏肓來到人間的，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泄露了這一天機。當時鐵托把斯大林的罪惡歸結為“是一種制度的產物”，“這裏不僅僅是一個個人崇拜問題，而是一種使得個人崇拜得以產生的制度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爲了捂蓋子，發表了兩篇文章，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與鐵托針鋒相對，蠻不講理地斷言：“斯大林的錯誤並不是由社會主義制度而來；爲了糾正這些錯誤，當然不需要去‘糾正’社會主義制度。”

事到如今，出現了難題：是“糾正”毛澤東的私人品質，還是“糾正”社會主義制度？鄧清楚地知道，毛的品質是臭而不可聞也，一揭，臭氣熏天，準會喪盡黨的“歷史光輝”，甚至陳雲說：“我們這些人也站不住腳”。自然的結果，便是毛與黨偕亡。鄧小平根據“貓論”的基本原理，決定不學赫魯曉夫揭露、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品質”，權且對《再論》這個經過政治局正經八百的討論而作出的定調，來個不宣而廢；鄧要來“糾正”社會主義制度，但也並不真糾正，祇是輕描淡寫、吞吞吐吐地說成是“受了歷史上封建主義的殘餘影響”而已。與鄧小平的“殘餘影響論”相比，倒是林副統帥對這個所謂的“新中國”的社會性質，說得痛快，態度老實：“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的家長制生活……他是一個借馬列之皮、效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571工程紀要》）林說的“互相殘殺”是不太對的，因爲絞肉機掌握在毛手裏，祇是他單向地殘殺臣民；林家父子被逼，倒是想“互相”一次，可惜也沒有成功。

鄧小平以毛“晚年的錯誤”劃框框，以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爲遁詞，把罪責推給中國的歷史文化。現在讓我以鄧和林彪的共識——家長制爲例，來進行剖析：

鄧說：“從遵義會議到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一直比較注意實行集體領導，實行民主集中制，黨內民主生活比較正常。”（《鄧小平文選》二卷第290頁）

這首先與衆所周知的事實不合，誰不知道他的專斷獨行的劣根性其來有

自？跟遵義會議前，肉體消滅江西省行委書記李文英及富田事件大屠殺一脈相承的，遵義會議後的延安整風，殘酷鬥爭，冤殺無辜，不是鐵的史實嗎？

其次，又與邏輯相背：說不通怎麼後來會來一個突變呢？問題的實質是，這段期間劉少奇、鄧小平這些毛派分子掌權，對主子的家長制逢迎有加；周恩來、李立三等這些原非毛派的分子，都已成為惡婆婆面前臨淵履冰的小媳婦；汝不見毛對周恩來等欺人太甚、至死方休嗎？待中共受蘇共影響，在八大上提出反對個人崇拜，把以他的思想為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從黨章中去掉，他便一觸即跳；及至廬山會議，彭德懷站在非常正確的一面，又以非常正確的途徑“觸”了一下，他便歇斯裏地跳了八丈高。

事實是，不僅他是搞家長制的，其他中共領袖，如鄧所說：“陳獨秀、王明、張國燾等人都是搞家長制的。”（同上，289頁）讓時間順延至今，你鄧小平是不是搞家長制的？他江澤民是搞什麼制的？問題的嚴重性在於，你們的家長制使你們的國家機器變成了絞肉機。鄧又說：“這種現象……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同上）——這總算是應該歸咎於中國傳統文化之外的因素吧！辛灝年先生曾指出過：“他們硬要將中華民族的歷史與文化拉來為中共的犯罪現實作替罪羊罷了。”（《誰是新中國》第564頁）

試看與中國文化不沾邊的国际共運：被毛奉為教皇的列寧、斯大林，“唇齒相依”的金日成父子，“天涯若毗鄰”的霍查，全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波爾布特……哪一個不是搞家長制的？哪一國的絞肉機不是機器隆隆，血肉橫飛？波爾布特政權，竟能够絞殺200萬人民，包括20萬華僑，而柬埔寨人口總共還不到800萬人呀！

說它是封建主義，不錯，但它更惡劣，它拒絕了封建主義的精華部分；說它是法西斯主義，更對，但它在消滅私有制，把人民剝奪得精光這一點上，在思想控制上，却是德、意、日任何一國法西斯所望塵莫及的。北大右派學生領袖譚天榮在物理系同學的辯論會上發言道：“現在的出版自由還不及資產階級社會，比不上希特勒德國……比希特勒的檢查制度還要糟。”說它是吃人的社會，這是明擺着的事實，成萬、上億地吃！它的領袖是吃人魔王，吃肉不吐骨頭。總之，把它與什麼相比，它總比什麼都壞，所以就別比喻它是別的什麼了，它就是它自己，是讓人人充“公”、領袖化公為“私”的共產極權制度。

毛心黑、手黑，政治操作過程是黑箱作業。最近，張戎的書《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問世，簡直是引起一片驚呼。書名便回答了驚呼的原因。前香港總督、牛津大學校長彭定康在《泰晤士報》上評論道：“誰是 20 世紀最邪惡的暴君：希特勒？斯大林？波爾布特？讀者在讀了張戎的書後都會確信：中共前主席毛澤東是最邪惡的暴君。張戎重寫了現代中國歷史，這是一本具有爆炸性的書。”英國的《每日郵報》評論道：“沒有幾本書是注定可以改變歷史的，但這一本書將改變歷史。”《觀察家報》說：“這本書所揭露的事實，將會把我們對毛澤東的看法全部都推翻。”《每日電訊報》說：“20 世紀犯的最大的錯誤中，西方的左派、政客等對毛澤東的熱情是最愚蠢的。”

左派固然愚蠢，我是右派，右派就不愚蠢嗎？同樣愚蠢。問題是中共的黑箱太嚴密了。張戎夫婦在 12 年中查閱了很多檔案，但是，裹卷着最大量膿血的檔案的大本營，却被鐵封在中國。所以，我以受共產黨半個多世紀迫害的經歷斷定張戎有朝一日仍會感嘆：“事實證明，我的這一想法，還是將共產黨估計得太好了。”——這句話寫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 451 頁上，是與毛 22 年朝夕相處的李志綏說的。我作出這個“斷定”的根據有二：一是每次新的檔案材料解密，都會讓世人再次目瞪口呆；二是，毛澤東、共產黨之壞，是能把人們的想象力考驗垮的。無論你往多壞處想象它，當新的材料暴露時，你仍會重復一次李志綏先生的經驗：“事實證明，我的這一想法，還是將共產黨估計得太好了。”我再舉一個人所周知的例子：許多人，包括林彪、“四五運動”的群眾和民主人士，都覺得罵毛為秦始皇就夠狠了，但毛却恬不知恥地回答：“秦始皇算什麼？他祇坑了 460 個儒，我們坑了 46000 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 100 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够，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這個例子說明，你估計他的壞，祇是他實際壞的 1%。張戎說：“毛澤東的真實人生確實告訴了我，也告訴了人類，其實民族的災難是人禍，中國人是毛澤東要稱霸世界的野心的實驗品。”（《世界週報》NO.1109 第 20 頁）她說的話很平凡，道出了平凡的真理，却揭示出毛最本質的品質，和中共制造的悲慘人禍的罪惡之源。這才真正是實事求是的。

順着鄧小平的思路，便會提出：制度與人是什麼關係？制度是制（約）



人的，又是人制（造）的。共產制度與毛澤東是壞制度與壞人的關係，于是乎，毛澤東選擇了共產極權制度，和共產極權制度選擇了毛澤東，彼此是如魚得水、如虎添翼；毛澤東造就了共產極權制度，和共產極權制度造就了毛澤東彼此是雞、蛋互生，狼、狽為奸。所以說，毛澤東壞多很，共產極權就壞多很；共產極權壞多很，毛澤東就壞多很，互相促進，推波助瀾，惡性膨脹，壞上加壞，卒致壞到“史無前例”。認定這點，就不會為換湯不換藥所迷惑。如果一個領袖人物如陳獨秀，或瞿秋白、彭德懷、胡耀邦等，身上具有某些與共產極權不相容的素質，則必定會被他的同志們所吃掉。所有能如魚得水的飛黃騰達者，皆為一丘之貉。牟宗三當年說：“共產黨要的那些文字魔術，都是沒有意義的話，你聽他那些話幹什麼呢？偏偏有些人利用這個機會，去捧葉劍英、鄧小平，你捧他作什麼呢？其實，說穿了，還不是一丘之貉。當年鄧小平作副總理的時候，還不是順着毛澤東的話轉，還不是一樣地拍馬屁。根本的關鍵在於共產黨的本質即是徹頭徹尾的摧殘、斲喪人的廉恥。”（《從儒家的當前使命說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黃花崗》雜誌，總第六期。）

至于毛澤東與孫中山創建的三民主義、共和制度，則是壞人與好制度的關係。壞人必然要破壞好制度，因為，如鄧所說：“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而他偏偏要“任意橫行”，要“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所以他就要選擇具有奴隸主、封建主，兼具法西斯性質的一人專權的共產制度了。這也就是他為什麼要選擇“一邊倒”的個人政治動機。張戎震撼世界的新書要說明的，歸結為一點就是：“他（毛）的一生從頭到尾就是推翻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復辟了封建君主制。”（《世界周刊》，NO.1109）換成鬼話來表述，就是：“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祇要是生活于其中、秉承良心、敢于正視現實的，都和李志綏先生一樣，認清了所謂的“新中國”是復辟了清朝般腐爛的舊中國：“這幾年的生活，對我的精神是極大的打擊。我所期望的‘新中國’（引號是李志綏原有的——紫丹），已經是《紅樓夢》中的賈府。”（《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340頁）以同樣的鐵的事實根據，以同樣的不可反駁的邏輯論證，運用同樣的精確的語言文字，表達同樣明朗而毫不含糊的科學觀點，得出同樣的如泰山般堅挺不拔的結論的，是辛灝年先生的嘔心瀝血的巨著《誰是新中國》；僅從書名，就可以窺知其論述主題具有極大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而後來的這些認識，是與當年右派反對“黨天下”的命題一脈相承的。

毛爲使這個血腥的制度，社會的腫瘤，不被人民割除，不被黨內修正，他在選接班人上煞費苦心，算盡機關，要留下惡性腫瘤的遺傳基因。他選劉少奇，廢掉；選林彪，廢掉；病中交班，選周恩來，也作廢；選王洪文、鄧小平、還有不知何故胎死腹中的毛遠新，統統作廢；最後選了華國鋒，“你辦事，我放心”。對此，《晚年周恩來》一書揭露真相，說明他並不“放心”：

“鑒於黨內外翻案勢力的公然挑戰，毛澤東決定加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和部署身後的人事安排。他知道江青爲首的黨內文革派不得人心，讓人傳話給張春橋，要他‘讓一下’，轉而點名指定‘老實人’華國鋒出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上迷人耳目；同時以‘生病’爲由，把和周恩來靠得太緊的葉劍英‘掛’起來，改由與毛遠新關係密切的陳錫聯出掌軍權。

“事實上，毛澤東的這種安排，骨子裏打的主意仍是讓黨內文革派掌權。爲此，毛在把華扶上來後，又特意向他交代：‘如有事，找江青。’二月五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將《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擴大傳達到黨內外群眾。”（第604頁）這裏敘述的真相，已爲江青咆哮法庭所證實，她說在六個字後面還有六個字：“如有事，找江青”。

說明毛澤東耍陰謀，活到老，耍到老。本文前已指出，他要在死後要江青作黨的領導人，“抓黨務的要硬，不能含糊、左右搖擺，這一點江青有資本，能管理好。”這就決定了華國鋒祇能是個橋梁人物，華對此也心知肚明，所以他要“一舉粉碎四人幫”，以防他們過河拆橋。但“橋梁人物”是他的宿命，所以終于未躲過鄧小平的過河拆橋。華祭出“兩個凡是”也無法改變自己的政治宿命。毛在政治上爲所欲爲，到了荒唐的程度。他把選定的接班人載入黨章和憲法。可黨章和憲法上都明文規定，黨和國家領袖是要在全國代表大會上選出的。下一屆你毛澤東當不當主席？從法理說，不能鐵定。你都不一定當選，却把你的接班人法定下來，這不太滑天下之大稽了嗎？其實，在黨文化裏，這一點兒都不足爲奇。看一例而知天下烏鴉一般黑：惡貫滿盈的齊奧塞斯庫，被人民處死，却是在此前召開的羅馬尼亞全國黨代會上，全票當選的最高領導人，當然也少不了暴風雨般的掌聲長達X分鐘。這種“激動人心”的場面我們不是司空見慣了嗎？它足以說明：共產制度下的憲章、黨章、代表、代表大會、群眾集會等……統統不過是分文不值的擺設一類的玩藝。不過，毛的做法也太奚落了這些玩藝兒了。在這裏也同時說明，你再

也別把經過導演的所謂的群眾呀、代表大會呀的山呼海擁，看成是得民心的表現了。說不定“激動人心”的下一步就是完他的蛋！我將此命名為“齊奧塞斯庫現象”。赫魯曉夫鞭尸斯大林；華國鋒在“主席尸骨未寒”（江青語）時就一舉粉碎他的文革派；這都有點兒齊奧塞斯庫現象的味道兒。

### （三）思想意識腐朽、落後、反動

制度好壞與好人、壞人的關係，還可以從另一個側面，翻過來說：制度好可以使好人有法充分做好事，成就其好，人們從中會發現好人能好到什麼程度，從而發現和效仿古今完人；制度壞，可以使壞人和尚打傘，任意橫行，而成就其壞，於是，人們在人類中就找出壞到沒底綫的人，最壞的人，即人渣，從而使之遺臭萬年而倣效尤。

造成毛澤東遺臭萬年的，是萬惡的社會主義制度。有無數的人這樣說：“如果毛生活在西方的民主社會，他就再想壞也不能處處得逞。”就連鄧小平說的：“即使像毛澤東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致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這話中也含有難言之隱；總不能指出直入地說：“連毛澤東在內，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受害者。”按鄧小平理論，如果真這樣“實事求是”地說，那這個“實事求是”就不“恰到好處”了。

如果一個制度，可以令一個特權人物享有使壞的充分自由，肆無忌憚地，想怎樣壞就怎樣壞，那樣，這個人就會壞得沒邊、沒沿、沒有底綫。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唯一享有充分自由的毛澤東就是這樣。

毛澤東的壞處誰也說不完。前面我們曾提到一些，後面還會再做些補充。在這裏，單就他在制度方面表現出的去善就惡、嗜痂有癖，略述一二。他要用他極端落後、腐朽、反動透頂的思想，來改造人的世界觀和社會制度。把中國改造成封建主義、奴隸主義、社會法西斯主義之擇劣組合，並根據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原則，把國產的糟粕與“一聲炮響”送來的洋垃圾，攪拌而成馬列主義與中國具體情況相結合的混凝土。中國便成為被混凝土圍起來的大監獄。右派的猖狂進攻，就是把獄中沉睡的人們喊醒。不料，沉睡者沒醒，喊者却被擊斃了。

毛澤東棄善從惡、堅持倒退，讓一切最腐朽、最落後、最醜惡、最反動的沉渣泛起，冒充最光輝、最先進、最美好、最革命的事物對人們進行洗腦，

要人們崇信。毛熟讀二十四史等綫裝古書，深諳各種南面之術、陰謀韜略，善于利用和制造矛盾、各個擊破政敵和戰友，做到大權獨攬，而對現代民主真精神一竅不通，却能把無產階級專政說成是更高的民主、高過資產階級民主千百倍；把社會主義的劣根性說成優越性。這就是他的思想本色。長期跟隨他身邊的李志綏，在回憶錄中寫道：“毛從未跟我用過‘現代化’這個詞。毛不是現代人……”（第 120 頁）

曾對毛澤東有過深入研究的歷史學家余英時教授說：

我特別重視毛絕口不言“現代化”這一事實。李志綏由此而推斷他不是一個現代人，也是毫無可疑的。我想這件事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反映了毛對於現代世界的驚人無知，這個無知表現在 1949 年以後他的所有決策上面，從人口問題、大躍進的畝產萬斤和土法煉鋼到文化大革命中的許多“最高指示”都是明證。他之不具备起碼的現代知識，尤其集中地暴露在他關於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的種種描繪上面……特別值得研究。他的思想基本上未出康有為《大同書》的範圍，有時甚至倒退到漢末張魯的“義舍”、“義米”等簡陋的教團組織上去了。1958 年 10 月山東範縣搞了一場三年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方案，訂下畝產兩萬斤糧食的指標，還附上了一首“吃喝穿用不要錢”的順口溜。任何稍具現代常識的人都祇能把這件事當作笑話看。但是這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竟作了如下的批示：

“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也是可行的，時間似太匆促，祇三年，也不要緊嘛，三年不成，順延也可以嘛。”

舉此一例，即可見毛的知識和思想究竟達到了什麼樣的程度？我並無嘲笑毛之意。特別是我記起了 70 年代海外的中國的知識分子，包括許多著名的學者科學家，對毛的“遠見”曾怎樣崇拜過、歌頌過，我更不能對毛加以譏評了。我故意不提大陸上的知識分子，因為他們不但沒有說話的自由，而且也沒有沉默的自由。

毛雖然屬於“五四”的一代，但是他和“民主”“科學”是無緣的。（金鐘主編《反叛的御醫》頁 105-106）

我再提供一個旁證，說明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毛澤東根本不屬於新文化運動的文人群。在研究《毛澤東的文化性格》的一書中寫道：“一個頗可揣摩的現象是，致力於新文化運動的文人，特別是革命隊伍和黨內的文化人、知識分子，成為毛澤東的私交朋友的却不多。”而他的朋友如章伯釗，自己

就承認：“反動，而不反共。”其實，他的所有狐朋狗友如張瀾、李濟深、張治中、邵力子、程潛、柳亞子等，任誰都可用此言以蔽之。

毛不僅僅是“對現代世界的驚人無知”，而且其性格的剛愎自用與政治上的極端反動相結合，鬧出許多既可惡又可笑的事情。他在國內的倒行逆施就不提了；現在要說，1973年11月12日，毛澤東不解地問基辛格：“爲什麼你們國內，對‘水門事件’這個屁事那麼在乎？”毛作爲權力無邊的帝王，怎麼也不理解“水門事件”：怎麼因爲幾帶膠卷就能把一個總統給彈劾掉？不解還不算，他還要向美國民意挑戰：你們彈劾總統，我要邀請尼克松總統訪華！他的這一舉動，惹得美國人民非常反感。如果美國人民憶起當年毛譏諷他們的國務卿艾奇遜現代史知識等于零，那麼，現在是否會反唇相譏毛的現代民主政治知識等于負數呢？因爲他在現代民主政治面前竟耍起二百五！這個事例倒是能幫助人們理解：爲什麼袁世凱當了大總統還一意要當皇帝？兩個稱呼，標志了兩個政治範疇：共和和帝制。

毛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意思是披着馬克思主義外衣（“冠”不能“披”）的皇帝。其實他對歷史上的許多昏君的暴虐無道、荒淫無恥之處，往往倍加稱贊，如對殷紂王殺進諫的老幹部比干，認爲“當然要殺掉”；李志綏說：“武則天疑心過大，告密過濫，殺人過多。”毛說：“不用告密的手段，怎能知道這些人的陰謀呢？將想殺死她的人殺掉，有什麼不應該？”（《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117-118。）從這一點看，更應該說他是“斯大林加武則天”。我相信將來中共的檔案一旦解密，你就去看揭去假面具的毛周圍的人，包括所有的黨政要人、軍事將領，是如何地互相告密、互相出賣以邀寵于毛的吧！李志綏說毛把侍候他的所謂“一組”的人，都變成小人。這個事實，還應該更加擴大，毛要全國的人經過思想改造都變成康生那樣的小人（康是在毛跟前受寵至死的唯一人），互相誣陷，狗咬狗，窩裏鬥，“八億人口，不鬥行嗎？”單以告密成風，冤獄遍全國，就足以說明毛澤東既是秦始皇的，又是武則天的100倍了。

他對斯大林的態度，像對待一切暴君一樣，總是在使壞方面比高低。他說他要擁護斯大林，肯定斯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有七分功勞，指的正是他殘暴地虐殺本國人民、輸出革命亡我中國的所作所爲；毛不滿意的，所謂“三分錯誤”，決不包括斯大林不執行列寧廢除沙俄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與日本訂的侵犯中國領土、主權的條約，也不包括日本投降後蘇軍進入我東

北大肆奸淫擄掠；倒是包括斯大林爲了自身利益要中共真心聯蔣抗日。斯派王明回國貫徹他的旨意，但遭到毛的抵制，在延安整風中把王整得身敗名裂。可見毛反對好人却贊成好人某些壞的方面；擁護壞人却反對壞人某些相對而言“好”的方面。

我在美國之音中文網上看到：“劉賓雁說，毛澤東思想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反人道、反人性的。沒有這種反人道、反人性，中國的革命也不可能勝利。”這裏，他還深刻地揭示了“中國的革命”取勝的本質原因，即：“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是反人道、反人性的勝利。”

戴煌表示，反右運動的罪魁禍首是毛澤東，他是個大騙子、大流氓。1957年用騙術騙大家講話，是非常可恥的、卑鄙的。

毛曾采取下毒的卑劣手段來害死王明。經弗氏干預，王明改服蘇聯醫生開的藥，才救了一命，毛的謀殺王明的陰謀終於敗露。對此蘇共弗氏說：“毛澤東是沒有感情的，他專心致意的熱情，祇是爲奪取權力，這使他成了一個危險的巧取豪奪的人，沒有一點人性，凡是與他權力相背的事，就當作反對中共的事，這是毛的最終信條。”（顧雪雍：《被掩蓋的抗戰真相（三）》）

### 乙：“求是”（接受教訓）：

#### 人權覺醒是接受教訓的基本尺度

所謂“人權”，就是衡量你做人的分量，說明你在多大程度上有資格稱作是“人”。有道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其實實踐祇是途徑或方法，實踐本身還有個對錯的問題，仍需要有一個標準來檢驗它。所以它並不是標準。什麼是標準？具體說，毛澤東對文藝實踐規定了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鄧小平對社會主義建設確立了“三個有利于”的標準。這是因爲實踐本身相當於小學生做數學作業，答數的正誤，要與標準答案相對正。牽着實踐的鼻子走的是目的，目的是實踐的形成性要素，無目的即無實踐。毛澤東也是如此說的，也是把能不能達到預期目的當做實踐標準的。不過他的論證過程是邏輯混亂的。這是首先要弄清的第一個層次的問題。第二個層次的

問題是，壞人得逞，比如反右大獲全勝，毛澤東大樹淫威，這樣他就達到了目的，難道這也能說是符合真理標準嗎？否。這就說明還必須有個價值標準。所以，在社會科學裏，應該確立：“人權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衡量政治、經濟、文化的是非、善惡、美醜、高低、利害，人權就是唯一的尺度；民主、自由、平等、法治、文明、博愛等，都是從人權出發、通過人權、爲了人權的；極權摧殘人權，是人權的死敵。而在自然科學裏，研究如何利用和發揮大自然養育人類的功能，以及如何克服和限制一切自然災害的副作用，所謂“人類中心”，就是在與萬物和諧共處中，人類念念不忘的中心點，就是是維護人權。

當年的右派分子嚴家偉先生，右派本質未變，如今仍在大鳴大放右派“厥詞”：《炫耀罪惡，罕見的無耻——看北師大女附中與宋彬彬的醜態》、《人權與挨餓——評李肇星的一句“名言”》、《公民意識還是臣民意識？》、《人面仁心與人面獸心》、《我的一首“批毛”詩》、《中國已“全面開放”、“政治進步”誰也比不上嗎？——就中國現狀與茅于軾先生進行一點探討》等等，可謂連篇累牘、垂死掙扎。我真想說他是右派的代言人，但没人授權我可以如此加封，所以我僅僅有權說他是我的代言人。對於我，他的言論句句是真理，一句是一句，擲地有聲也。茲介紹他最近寫的一篇關於“中美人權標準的根本區別”，與讀者共享：

在剛剛結束的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由于美國與世界輿論的壓力，美國總統奧巴馬、副總統拜登與國務卿希拉莉都對中國大陸近來人權狀況的倒退提出了嚴正的批評。對此，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在接受美國彭博通訊社專訪時辯稱：“真正了解中國並不容易，因爲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屬於東方文化”。同時他還反過來稱“美國人民是非常單純的”。王岐山這種官腔官調，人們並不陌生，無非又是中國“國情特殊”的老調重彈。如果說王岐山還有什麼“新意”的話，那就是他用了個似貶似褒、語意含混的“單純”一詞來“回敬”美國人民的輿論，似乎是說美國人太幼稚，你們根本不懂我天朝文明古國及其“東方文化”的“博大精深”，以此爲中國人權狀況的落後罩上一層神秘的面紗。大有“不足爲外人道也”的故弄玄虛之味。

2001年4月1日中共海軍一架殲-8型戰機與一架美軍EP-3偵察機在海南島外公海上空發生相撞事故。中共軍機飛行員王偉機毀人亡，而美偵察機嚴重受損，被迫降落在海南島的陵水機場。于是美軍機上24名機組人員

全部被中共軍方扣留，形同“戰俘”，甚至“人質”。中方抓住這一有利條件，要求美方必須道歉才能放人，稱對方侵犯了中方的主權。美方則堅稱，發生撞機的水域，不在中國領海上空。該水域雖屬中方經濟專署區，但根據1982年4月30日通過，于1994年11月16日生效的新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200海裏專署經濟區，是指沿海國從領海基準綫算起不超過200海裏的海域。專署經濟區的法律地位不同于領海。建立該區的沿海國擁有勘探和開發，養護和管理區內一切自然資源的主權和對一系列特定的事項（除上空外）的管轄權。其他國家在該區內享有航行，飛越和鋪設海底電纜和管道的自由。因此美方認為，當時美軍機並未侵犯中國領空，是在公海上空發生相撞。由于美方所言有國際法為依據，中方無法反駁。但又不能就這樣把美軍人員放了，未免太丟面子。因此經過11天外交磋商，中方最終放棄了原先要美方使用的apologize(深表歉意)的道歉字眼，而美方的最終表態祇是“very sorry(非常遺憾)。中方至此才同意放人，了結此事。

現在讓我們回到前文美軍機人員被遣返時，更令人感動的一幕發生了。根據當時外電報導描述的細節是：“機組人員首先讓級別最低者開始打電話，最後才輪到奧斯本上尉和母親通話”。該上尉就是這個機組中行政級別最高的軍官。用中國大陸的說法，他就是這個機組的“領導”。

于是我便又想起了也是十多年前，也是一件一時轟動世界的大事。請看在這個事件中，我們的“領導”是如何展示自己風格的。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瑪依市教育局，為歡迎上級派來作“秀”的所謂“義務教育與掃盲評估驗收團”的25位官員，組織全市最漂亮的、能歌善舞的中小學生796人在友誼館劇場舉辦“專場文藝演出”。演出中因舞臺紗幕太靠近光柱燈被烤燃而引起火災，火勢迅速蔓延。不言而喻，此時首先應疏散場內的人群，而中小學生是最易受傷害的孩子，更應首先撤離。但我們的黨政領導、克拉瑪依市教育局的官員，却作出了一個令全世界跌破眼鏡的“果斷決定”。該官員對中小學生大聲命令道：“大家都坐下，不要動！讓領導先走！”。

可悲的是，從小受黨灌輸“教育”已被“馴化”了的學生們竟無一人敢不聽話，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動。更可悲的是在場的26位名曰“人民公僕”的“評估驗收”大員，竟無一人像“美帝國主義”的空軍上尉奧斯本先生那樣想到還有別人，何況還有更弱小的孩子。他們一個個心安理得、當“仁”不讓的首先從第一排逃生。等到“人民公僕”們安全撤退完畢後，大火已蔓



延到劇場，電燈全滅，逃生之路已被熊熊火焰堵住！（當時劇場祇開放一個安全門，其餘安全門均鎖着）孩子們逃生的最佳時機已經錯過。最後造成323人死亡，132人燒傷致殘。其中288人是“祖國的花朵”——中小學生。有36位教師遇難，絕大部分為掩護學生而殉職。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場的克拉瑪依市副處級以上官員有20幾個，當時他們的位置離火源最近，離逃生門最遠，竟“奇迹般”的無一人傷亡，而且走出劇場門口時還個個衣冠楚楚！這就是當年雖被官媒極力淡化，仍震驚世界的克拉瑪依劇院大火與“讓領導先走門”事件。

我並不認為美國人就是道德完人，也不認為那個奧斯本上尉就如何優秀。關鍵是人家有一個好的社會制度。在那個社會制度下，大家有一個尊重普通人的人權、而非祇尊重權勢者“官權”的普遍共識。所以事無巨細，人家首先把“人”、特別是普通人、弱勢者的安全、利益放在首位。這就是保障人權的基礎和首要標準。而王歧山先生所謂的“東方文化”與“文明古國”，首先要重視的是皇權，現在加以包裝後便美其名曰“國家利益”，其次就是官權，現在加以包裝後便美其名曰“領導”。領導的安全、利益乃至面子，都是絕對優先於草民的生命、財產與安全，更遑論草民有何“尊嚴”可言了。因此王歧山所謂的“真正了解中國並不容易，因為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屬於東方文化”。這個所謂的“不容易”，正是王副總理的難言之隱，是祇可“操作”不可言傳的。說白了就是中國（確切地講是中共）對於人權的認知標準與美國、及當今整個文明世界的普世價值觀，是完全冰炭不容的兩碼事。也就是說與美國及整個文明世界恰恰相反，我們這個“文明古國”首先尊重的是“皇權”（黨國的大權），其次是官權（領導的特權），至于普通的草民、“屁民”，根本就無“權”可言。用官方的話來說，“讓”你有碗飯吃，暫時當穩了奴隸，（中共稱為“生存權”）就是“最重要的人權”了。（《中、美人權標準的根本區別——評王歧山為中國人權落後的辯解》，《民主中國》）

批駁中共愚弄國人、欺騙世人的所謂“生存權就是最重要的人權”，右派領袖章伯鈞先生早已有言在先：“生活上有二個東西，一個是物質的，一個是精神的。僅僅叫他穿西服、住高樓、吃西餐，而不叫他獨立思考，這就好比西郊公園裏的獅子和老虎，吃的雖好，可沒有自由。”（1957年7月4日《人民日報》）

2008年8月7日，美國總統布希參加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前夕，在泰國

曼谷發表演講時說，“我們呼吁實現開放與正義，不是爲了把我們的觀念強加于人，而是爲了使中國人民能够表達他們的意見。正如中國科學家許良英所說：‘向往自由、平等，是人類的普遍人性’。”（傅國涌：《“向往自由、平等，是人類的普遍人性”——爲許良英先生 90 歲而寫》）在上一世紀，中國人像讀《聖經》一樣在讀《毛主席語錄》，誰也不會想到本世紀美國總統却在“活學活用”右派語錄！

李昌玉表示，反右鬥爭是錯誤的，絕對找不出一點可以肯定的，古今中外都沒有這樣反文明、反人權、反道德的運動。除了被打成右派的人之外，每個人都要被戴帽子，被評為左、中、右、中左、中右、極右。這是極不人道的。

任眾表示：

我每次提到自己的經歷，心裏都非常痛苦，這件事情是壓了一生的。這場錯誤的政治運動不僅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的災難，而且徹底毀滅了 50 多萬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的前途、青春、愛情、幸福，絕大部份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艱難掙扎在社會最底層達數十年，與冰刀共舞，和霜劍爲伴，沒有人格，沒有尊嚴，祇有凌辱、鞭笞、勞累，饑餓……這是一場反天理、反良知、反歷史、反文明的災難。這不僅是我們“右派”的災難，而且是全中國的災難。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不僅僅是爲了賠錢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們認爲人的尊嚴、生命價值應該得到尊重。一個人的生命是非常寶貴的，不是爲了自己而生，而是爲了人類而生的。我們在垂暮的生命中，覺得有責任，特別是對歷史的責任感。

我們這一輩人曾經接受過中華傳統文化的教育，那種非常美好的、高尚的道德水平在當今社會流失了，但是在我們心中仍然根深蒂固。我們不僅僅是追求自己的平反問題，而且覺得還有一份責任：呼吁良知和道德提升的責任，呼喚公平和正義的責任。

爲什麼這一兩年、在反右鬥爭過去 50 年後的今天，衆多知識分子提出平反的問題？因爲人民在不斷覺悟、不斷蘇醒，不斷發現許許多的問題，上當受騙的感覺不斷爆發出來，社會矛盾越來越廣泛，民間維權浪潮不斷高漲。這都是促成我們今天勇敢的站出來的原因，其實這就是老右派的維權行動。（《幸存者的心聲》新紀元，第 19 期）

## 游行示威致中共中央公開信

尊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我們幾個是原北京大學的學生右派和一個右派死難者之子，決定依法用游行示威的方式，表達維權訴求。這是因為，我們用其他方式提出的要求，不僅沒有得到任何回音，還受到“維穩”非法監控打擊。

1957年，我們是17歲至23歲的在校學生，所謂風華正茂。我們出于愛國動機，關心社會進步、民族的命運，勇敢地寫大字報和發表議論，建言獻策，却被非法打擊成右派份子，受到勞動教養、勞動考察等嚴厲懲罰，未能完成學業，還在精神和肉體上飽受折磨，家屬受到株連，在各方面慘遭極大的迫害。1977年，北大黨委的一紙通知“改正”，原來我們都被“錯劃右派”了。

1995年以來，我們要求北大黨委賠禮道歉和賠償損失，寫了無數給北大黨委和中共中央的信，多次上訪北大，都沒有結果。這使我們很痛苦，深感我們國家沒有公理和正義，有的祇是無理和強權。

為此，我們依法行使公民游行示威的權利，呼吁社會關注，依法維護我們固有的合法權益。

損壞東西要賠，天經地義，為什麼中共中央對我們的合理訴求始終置若罔聞？裝聾作啞？

我們的要求如下：

- 1、由錯劃我們為右派份子的單位賠禮道歉；
- 2、以現金的方式賠償我們所遭受的精神損失、肉體折磨和經濟損失；
- 3、公布1957年北京大學“反右派”的有關檔案資料，補充這個時期的北大校史。

你們的意圖很明顯，無理拖延，不理睬，等我們這些右派都死光了，右派問題就“徹底解決”了。這很陰暗，很可耻！

歷經54年的磨難，我們這些當年的青年學生，都已七老八十，老病纏身，時日無多，我們決心在臨死之前，發憤一搏，以死相爭，決不帶着遺恨和窩囊進棺材。

我們當中唯一的右派死難者之子俞梅蓀，其父在1957年因錯劃右派，不堪忍受凌辱，跳樓自殺，其弟弟受刺激患了精神病，至今沒有得到昭雪和

賠償。其本人遭受冤獄，至今沒有平反。

寫信人（按姓氏筆劃為序）：

姓名 所在系 退休單位

王書瑤，物理系，國家稅務總局；

紀增善，化學系，北京光華染織廠；

沈志庸，物理系，北京第四制藥廠；

俞慶水，地質系，首鋼建材化工廠；

博繩武，物理系，北京瑞普電子集團；

燕遁符，物理系，北京紡織職工大學；

俞梅蓀，法律系，右派死難者之子，受冤獄無業。

2011年7月4日

響應者衆。

劉鳳麟（78歲，原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實驗室24歲實驗員右派份子，1976年起上訪清華黨委，持之以恆，至今無果。）：我正思念被打傷的北大閆桂助難友，讀此文，心潮激涌，魂飛心裂！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嗎？這就是中國公民的政治權利嗎？向北大七君子、右派老英雄們致敬！你們的維權行動已為歷史留下了深深的脚印。我遠離北京，心向往之，作詩贊頌。

今年伊始，我依照《國家賠償法》向清華當局遞交《索賠申請書》，大大超過法定的兩個月回覆期限之後，清華當局依然裝聾作啞，日前我已致周永康公開信。近來我在微博中呼吁右派維權，7月1日被警方約談！但沒什麼，我不怕。

## 北大難友是楷模

北京國府燈下黑，耄耋老人滴血淚。

游行申請被封殺，自由行動警察衛。

正義人性理難求，七君聲言賽夜雷。

是非置于陽光下，史學犬儒論功罪。

北大難友是楷模，公正良心燃似火。

耄耋之年喚人性，依法維權被禁鎖。

梟首噬夢定是非，人間地獄血淚河。

以人為本水中月，法治人權騙術多。

中國歷次政治運動都是對人性、民主精神的大掃蕩。獨裁統治是造成一切禍害並使冤案至今無法糾正的罪魁禍首，現在各個方面的弊端都和獨裁統治有關。現在很多右派受害人要求伸張正義，最終目的是對民主的呼喚。

右派的教訓是慘烈的，但作為歷史來總結這個教訓，則可以把它總結為一條常識：知識分子誤把毛澤東（共產黨的化身）當成人來看待，其實他沒有一點人性、人味兒，純粹是魔，是吃人的魔王。為什麼不說他是吃人的野獸呢？因為野獸沒有他壞。從另一面也可以這樣說：知識分子誤認為毛澤東會把他們當成人來看待；但人是目的，毛却把一切人都當成工具、炮灰、犧牲品；人是有人格尊嚴的，但毛却可以侮辱、踐踏一切人的人格；人是有人權的，但毛對任何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生殺予奪……這條教訓歸納為：誤把應打倒的人民公敵當成應供奉的人民領袖。單從反右派運動的性質而論，祇有弄清楚了“一手定乾坤”的毛澤東民族敗類、黨的敗類、家庭敗類的本質，自然就會為他發動的反右派運動做出斷然的定性。像他這樣連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兒女都要做出徹底背叛和無情犧牲，祇對自己負責的人，祇會專門利己、毫不利人！一生祇為一個“權”字而鬥爭，發動反右派運動就是兩眼盯着這個“權”字。本質地講，他發動的所有運動以及所作所為都是為了奪權、保權、擴權。大處着眼在政權，落到實處就是性交權。自古，人稱壞皇帝是“荒淫無道”，可是，再荒淫無道也壞不過當代的“鐵鷄巴”（這是蕭三對毛澤東的封號）。總之，這現象、那現象，釘在歷史耻辱柱上、罪大惡極的是毛澤東現象；從血管流出的是血，從噴泉噴出的是水，流淌在陰溝中的毛澤東思想祇能臭而不可聞也的污穢。

馮志軒 1957 年在中央第一機械工業部工作，提出以下意見：1、要治理國家，需要健全法制，依法治國，不能搞運動，否則會搞亂人心，侵犯人權。土改中亂打亂殺，肅反中亂批亂鬥，很多好人受傷害。公安懷疑誰是反革命、敵特什麼的，要有證據，不能私立公堂，亂批鬥。2、在建設國家方面，要大膽使用人才，不要有門戶之見，要任人為賢，不要任人為黨。但共產黨是不考慮德才，只考慮是否是黨員，這個幹部路線不可取。3、對干部的管理、檔案制度等不尊重人，不利于人才的發現和成長，也不利于國家建設。4、共產黨在執行政策方面，說的和做的不一樣。

馮志軒因此被打成極右份子，開除公職，勞動教養，1958 年 2 月到 1978 年 8 月一直被關押在清河農場勞動改造。1978 年回到國務院下屬的中

央機械工業部擔任總經濟師。

馮志軒表示：“划右派的經歷我沒什麼後悔的，因為我問心無愧。我為我的說真話感到驕傲。我覺得很充實。錯的不是我，而是共產黨錯了，是他們違反了1954年的憲法。一個黨沒有權力做處置，即使我犯罪了，應該由國家機關處理，更何況我還沒犯罪。”“這場悲劇的根源雖然主要是毛澤東，但也不是一個人造成的，而是整個共產黨學說、理論、政策、制度都是錯的，即便換成其他領導人，也要發生同樣的運動。因為共產黨的理論、制度方法都是錯的，因此這些運動和悲劇是必然的。上個世紀共產黨運動都一樣。”

他說：“共產主義理論整個體系、系統都是錯的，必須被否定。共產黨不可能變好，不可能進行政治改革。在中國，共產黨高干政治經濟都是權貴經濟、官商結合，都是黨文化培養出來的標準件，不可能改變。”

這就正確的反映了反右派運動及其歷史教訓。那些仍寄希望于共產黨會搞政治改革、民主轉型、改良主義的人們，既不吸取歷史教訓，又對中共頭子嚎叫的“五不搞”：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這些頑固不化、反動之至的言論，充耳不聞，繼續昏睡不醒。

## 附 錄

### 附錄一：6月8日今又是

#### ——駁毛澤東爲《人民日報》所作社論：《這是爲什麼》

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那麼，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該怎樣總結呢？中國御用的理論家不可能完成此一任務；外國的“中國通”書上得來總覺淺。一個國內的馬列主義教授說，他帶研究生中出現的問題是“學了反”。“學了反”才正常。證明學懂了。學得越徹底、反得越徹底。胡錦濤號召學習毛澤東思想就表明他不懂毛澤東思想。從理論與實際結合上用毛澤東的語言加以表述，就是：“毛澤東思想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無理有理。”用群眾的諷刺語言說，就是“毛澤東最講道理。祇講倒理，不講正理。什麼理都是倒着講的。”

毛澤東1957年6月8日爲《人民日報》所作的社論《這是爲什麼》，是他公開發出的反右第一道動員令。啊！原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是“引蛇出洞”呀！輿論嘩然，衆皆嗤之以鼻曰：“陰謀”！這一下他無理了，但蠻纏道：“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437）真是豈有此理！好像生造一個詞頭，無理就能變成有理。玩弄詞句，這在毛澤東那裏是屢見不鮮的。周恩來“反冒進”是正確的。毛批判“反冒進”，讓周恩來三番五次做檢查，在事實上是絕對錯誤的，導致大饑荒，在理論上是絕對站不住腳的。可他又無理蠻纏道：“自從‘躍進’這個口號提出以後，反冒進論者閉口無言了，‘冒

進’可反（冒進即‘左’傾機會主義的代名詞），當然可以振振有詞。躍進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拋到一個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當然，他就可以“光彩”地冒進了。

現在人們提到“陽謀”的時候，從語意上講就是“陰謀”；從語感上講，是惡心生造此詞者是爲人所不齒的政治流氓。事實正是如此。當時毛曾是如何表誠心要整風，對知識分子牙是牙、口是口，聲稱“言者無罪”；一而再、再而三，千呼萬喚不出來。一旦你說出真話，擊中時弊，他馬上翻臉劃右派。你叫他落實“言者無罪”。他說你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這種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他們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438）且不講他說的“行者”也全屬無理蠻纏，權且往下看，同一頁上：“另有一種右派，有言論，無行動。”無行動當然不是“行者”而是“言者”了，怎麼也劃成“另有一種右派”了呢？因爲有錯誤的言論。“錯誤的言論一定要批判幹淨，這是不能留情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439）要是批評對了呢？“右派的批評也有一些是對的。”（《毛澤東選集》五卷，頁426）。雖說意見正確，但用意惡毒，那也不行。毛澤東思想具有火眼金睛，一看而知：“善意，惡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毛澤東選集》五卷，頁427）要是鳴放期間根本不講話，就沒有材料，怎麼辦？請看郭羅基的文章《周揚是按名單抓右派》，其中有答案。

周揚說：“抓右派之前，主席給我一個名單，名單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匯報‘戰果’。我說，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麼辦？主席說，翻延安的老賬！”

這和毛澤東在社論中所宣稱的那一套，是怎麼說也相違背的：“這是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信號。”“少數右派分子利用幫共產黨整風的機會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拉歷史倒退，企圖把中國人民重新放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之下。”劃右派的前提條件是“利用黨的整風運動”，右派言行是發出“階級鬥爭的信號”、“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老賬”與此是不沾邊的，既沒有前提，也沒有發出信號，更沒有拉倒車。但却“都要一一戴上帽子”；我們不禁要借用社論的題目來質問：“這是爲什麼？”

讓我們來看一則《伊索寓言》——《狼和小羊》吧！



狼就故意找茬，氣衝衝地說：“你怎麼敢到我的溪邊來，把水弄臟，害得我不能喝？你安的什麼心？”

小羊吃了一驚，溫和地說：“我不明白我怎麼會把水弄臟。您站在上游，水是從您那兒流到我這兒的，不是從我這兒流到您那兒的。”

“就算這樣吧。”狼說，“你總是個壞家伙，我聽說，去年你在背地裏說我的壞話。”

“啊，親愛的狼先生，”可憐的小羊喊道，“那是不會有的事，去年我還沒出世哪。”

狼覺得用不着再爭辯了，就齜着牙咆哮着，逼近小羊，說：“你這個小壞蛋！說我壞話的不是你就是你爸爸，反正都一樣。”說着就撲到小羊身上，抓住它，把它吃掉了。說明狼的理就是“吃”！

狼畢竟沒有人復雜。它就不知道把時間安排到小羊出生之後，另外，追到小羊爸爸身上也遠不如查祖宗三代徹底。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歷史審查，是要查祖宗三代的。毛明明不講理，反正要劃右派。但毛在反右上發表的講話和文章，却是連篇累牘，說得天花亂墜。而所有這些反右派的說辭，却標明着同一本質：“無理有理”。什麼叫做“無理有理”？就是無理纏三分；就是理不直而氣壯。毛澤東反右的最經典的理論是《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此文，直到現在仍被奉為建國的戰略方針。它講的是什麼理呢？我在拙文《〈矛盾論〉與論“矛盾”》中指出：

一則，“敵我矛盾”就是為了轉移目標而制造的欺人之談。反右就是殺雞儆猴。當時工人罷工、農民退社、學生鬧事。毛澤東就採取了反右這一招。頭號右派章伯鈞當即看穿，說：“老毛是要借我的頭。”（見《往事並不如烟》）費孝通也說過章先生對他說：“章伯鈞約我去，他說：‘共產黨要借我的頭，貼上個反動派的字條，我也願意，這叫借東風。’章伯鈞的意思是說，共產黨受到了群眾的反對，壓不下去，所以要借他的頭。這句話，章伯鈞重復不止一次……”（戴維·阿古什《費孝通傳》）二則，“敵我矛盾”是懸在人們頭上的一把恐怖之劍，類如斬首示衆；三則，借“敵我矛盾”解決“內部矛盾”，一石投二鳥：一是團結內部，一是消滅內部異己（如，讓日本多占地，假日滅蔣和借蔣滅張國燾、項英）；四則，就說他為轉移目標而創造的“敵我矛盾”，這個概念也是、也祇能是“內部”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中國這個“內部”，從概念與實際相結合地說，官與民是相對的概念；

而事實也正是，騎在人民脖子上壓迫和剝削人民、而為人民所切齒痛恨的不是地主、富農，不是資本家，不是知識分子，甚至也不是帝國主義，而正是共產黨的各級黨委和行政領導幹部，以及爪牙、嘍囉、痞子等所謂“積極分子”者流橫行鄉裏。有絕對充分的血淋淋的事實來支持這樣一個挺拔的立論：

“毛澤東本人就是中國各族人民（尤其是農民）最凶惡的敵人”。毛澤東所以“抬舉”工農、打壓知識分子，就是為他實施愚民政策掃清道路，就是要消除為民請命的人。潑婦罵街式地批判梁漱溟和背信棄義地發動反右，就是最為明顯的例證。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子弟為毛打天下當了炮灰，毛哄騙他們說是他們坐了天下；這些坐天下的人又數以千萬計地被餓死，却一息尚存不忘“呼爾咳呀，他是人民大救星！”毛說他們餓死是由于民主革命不徹底，階級敵人搞報復。于是大搞階級鬥爭，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重把地、富拿來問斬；彭德懷為民鼓與呼，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頭子；劉少奇搞了三自一包的救急政策，被說成是復辟資本主義，要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泱泱大國，堂堂元首，慘遭迫害而死。食髓知味，這就是“敵我矛盾”的真精神。

“兩類矛盾”說，從動機上說，不打自招是“陽謀”；從作用上說，是要堅持極權專制的“人治”、徹底堵死中國走法治道路的可能性。因為，劃分兩類矛盾的權力（如劃胡風為反革命，不僅高層中有很大的反對意見，即便連胡風的死對頭周揚也感到太過分了——這是劉賓雁告訴我的，還說，周總理很了解胡風）是毛大權獨攬、一意孤行的。再說，所謂“正確處理”，劃右派有99%以上都劃錯了，20年後，鄧小平還說是“正確”的，問題祇是擴大化了。右派無人犯法，對他們的處理也是烏龜王八蛋——什麼“整風反右領導小組”說了算，全屬非法。究其實，法律上的“矛盾”，也祇有合法與非法、罪與非罪、重罪與輕罪等等的區分。你怎樣區分是“敵我矛盾強奸犯”，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強奸犯”呢？更何況，在毛心目中哪裏有什麼法律？立幾條法律也僅僅是個擺設！

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建議加強法制，毛澤東對他說：“你要知道，法制是捆住我們手脚的。”（李世濤：《知識分子立場：激進與保守的激蕩》頁231）而“兩類矛盾”却可以任由他變戲法，祇要判定某人為敵我矛盾，他就在劫難逃；在人人喊打，國人皆曰可殺的起哄聲中，什麼法律、憲法！統統變成了廁所裏最粗糙的手紙。共產黨人死後、

蓋棺論定的悼辭上都寫有：“XX 的一生”，如“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等。毛澤東的悼辭上本該寫，但沒有寫：“和尚打傘的一生”。毛雖作惡多端、罪大惡極，但這並非祇是他個人的問題，列寧界定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和尚打傘”的意思。這就是“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鄧小平文集》二卷，第 293 頁）的原因。斯大林的罪行就是在“消滅人民的敵人”的名義下進行的。

毛澤東思想如此蠻不講理，毛澤東罪行又如此罄竹難書，而今不僅得不到清算，還得到官方的提倡；“這，又是為什麼？”

## 附錄二：談談右派的正名問題

### 一、正名的意義

武宜三先生就着張允若先生的來信（簡稱“來信”），稱：

“最近浙江大學張允若老師提出為‘右派’正名等問題，雖然我主張不爭論，但是大家在茶餘飯後一起來研究研究，也未嘗不可。

#### 1、右派到底怎麼正名，非常難哦。

a/ 叫“民主戰士”，有失偏頗。因為有的本來是“左”派打手，即使現在，不是還有幾個右派分子在那裏為虎作倀、甚至張牙舞爪嗎？有的是迷迷糊糊當了的（如四川、安徽的中小教師右派是用“是非題”畫+、一號畫出來的）；有的是因為出身、成分、歷史問題、派系鬥爭、株連等等；有的是被湊數的；有的因為老婆或者女朋友漂亮的……

b/ 叫“受難者”（我的叫法），有歧義，也不準確；

c/ 加引號？則不勝其煩。丁抒、宋永毅的《反右派文庫》據說有兩千萬字，我的《名錄》已經有 11000 個案，超過 600 萬字了。起碼我個人不會為引號來浪費我的時間。”

反右派運動專門針對知識分子進行迫害，從中國歷史到世界歷史，從規

模之廣到程度之烈，都是空前、估計也是絕後的。研究和記憶這個運動，首當其衝的問題便是正名問題。正名對於歷史或現實，都有絕對的必要性：從事實上說，可達到“名副其實”，保持歷史真相；從意義上說，可達到“評價正確”，深刻汲取歷史教訓。

### 二，就叫右派，不掛引號

來信說：“因為右派這個惡名是專制政權強加的，是完全不正確的也是我們決不接受的。祇能說這是所謂的右派，即打了引號的‘右派’，實際上我們決不是右派，而是站在歷史前沿的民主派、改革派。我們決不能自稱右派，否則，我們的訴求還有什麼意義？我們還有什麼道理要求當局徹底平反並道歉賠償？”

請問：“站在歷史前沿的民主派、改革派”——如果按着政治上左中右來劃分，該是什麼派？如果不言左、中、右而言他，就叫做“民主派”吧！民主，不論在歷史上還是就現實講，都屬於資產階級政治範疇。所謂高出資產階級民主千百倍的“無產階級民主”或“社會主義民主”，它的實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即你說的“專制政權”。這絕不是當年右派所追求的“民主”。所以就祇能正名為“資產階級民主派”——這個名字正好是文革中對走資派的命名。因為走資派是毛澤東加給他們的惡名，所以沒有一個人願意當走資派。事實上，例如劉少奇、鄧小平、鄧子恢等，他們推行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不就實實在在是資本主義嘛！不僅那時候“走資派還在走”，而且現在“走資派走得更厲害”。人家“毛派”在這一點上攻擊得他們無招架之力。魏巍臨死一聲吼：“祇有毛澤東思想才能救中國！”他在陽間可以胡說八道，但現在他已到了陰曹地府，恐怕那裏大躍進中的三、四千萬餓死鬼，會對它進行批鬥。在批鬥他的大會上，照例是：“首先讓我們宣讀一條最高指示：‘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這裏也有一個正名的問題，必須把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認識到毛澤東思想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災難之源。否則，名不正則言不順，不僅坑國害民，連你們胡溫政權也難以擺脫動輒被毛派揪住小辮子的窘境。

走資派為什麼自感理虧呢？這是因為人們灌進腦子裏的“社會主義”是美名、“資本主義”是惡名。豈不知社會主義，往好處說是烏托邦，實質上

是坑國家、害人民、滅種族之毒蛇猛獸也。當年右派林希翎就大聲疾呼、大加斥責過這種“封建社會主義”！劉少奇批過“農業社會主義”！事實已無可反駁，比起毛澤東走資派是正確的，以毛為頭子的走社派是造成災難的罪魁禍首，是罪惡滔天的。對這樣明明白白的事實，誰能否認掉？就算毛派，能否認掉嗎？

至于右派的惡名，無非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放了最臭的臭屁、最毒的毒草（毛澤東語）。現在已清楚明白，反一黨專政、反封建社會主義，是唯一正確的。你翻出右派言論看一看，毫不誇張地說，那就是一部中國真正現代化的初稿。比起時過半世紀之後的“零八憲章”，有過之而無不及。

至于說“平反”、“賠償道歉”，那是輕的。他們對右派處理，從道義到法律、從程序到內容，都是傷天害理的，全是違法的，理應置于歷史法庭被告席接受審判，追究其法律責任。

信中說：“有人認為‘右派’一詞已經由貶義轉為褒義的了，不必介意。這種說法是虛妄的。這個詞的含義是二百多年來國內外政治生活社會生活中已經定型了的，不是少數人的自我感覺所能改變的。至于有人以此為榮，願意繼續自稱右派，那是他自己的事，即使自稱反動派、反革命分子、壞分子，‘顛覆一切舊概念’，這都悉聽尊便。但不能強加于其他人。”

當年章伯鈞的女兒問爸爸：“爸，人當了右派，怎麼別人就不理睬了？日子也難過了？”問話使父親激憤起來，他忿忿地說：“祇有在中國當右派才是這個樣子。小愚，你哪裏曉得——在西方，右派也是很體面、很神氣的呀！議會裏，還有他們的席位呢，與左派的區別僅僅是政見不同罷了。議論國家大事的時候，左派、右派、中間派各自發表看法，陳述主張，申明立場。因為各派所持立場、主張、看法不同，他們之間勢必要有激烈的辯論、爭執以及相互攻擊。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政治現象，並受法律保障。西方國家的官方政策，往往也要經過這些辯論、爭執和攻擊的考驗或矯正，現在，老毛把右派定性為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還劃了個資產階級成分。那麼，左派與右派便不屬於思想差異，而成為革命與反動的政治對立了。在我們這個國度，誰一旦成為統治者的政治對頭或被看做思想異端，日子就很難過了。國家、權力、輿論、黨派、社會、朋友、甚至家庭，都會糾合成為一股力量，不斷地打擊、迫害、除滅這個對頭和異端。”（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第153 - 154頁，時報出版）

的確如此，“這個詞的含義是二百多年來國內外政治生活社會生活中已經定型的了，不是少數人的自我感覺所能改變的。”

### 三，結論

我總是自信“右派是為民請命的，人民內心是贊成右派、反對左派的。”我在勞動教養期間，有一次接觸到農民，談話間我亮明身分，說：“我是右派來勞動教養的。”農民說：“比作蟲鳥，右派是益蟲益鳥，左派是害蟲害鳥。右派就是友派，你們是農民的朋友。”農民親身體會、內心知道，右派、右傾機會主義是維護他們利益的。左派大裝積極，是不顧他們死活、專門為上面拉套的。

認真研究一下中國現代史，左派、右派，誰在開歷史的倒車，危害人民利益，因而會被釘在歷史的耻辱柱上？誰是站在歷史發展的正確方面，作出了重大犧牲，因而推動了歷史向前進？史實照漢青。

## 附錄三：怎樣理解陳澤昆老先生？

### ——讀《從老報人陳澤昆說到民間辦報》

于50年後的今天，一個當年的“小”右派在懷念一個當年的“老”右派。這是由于老右派的學問道德、人格魅力，感人至深，使得小右派“五十年半個世紀，我總想着他。”有道是，“唯英雄能識英雄”。當然這並不意味着“唯右派能識右派”，但畢竟心靈上相通些；雖然“小”和“老”又難免會有些隔膜。

那麼，到底陳澤昆老先生是個什麼樣人、能讓後生晚輩在他生前死後總想着他呢？

陳先生學養深厚，是個淵博的老人，“是老報人，當過《工商導報》（《成都日報》前身）的總編輯，懂的東西多，肚裏有的是貨，三部卡車也拉不完。”

“學養”，一般是指知轉化為識、言轉化為行，進一步說，就是把詞句

變為生活；甚至把詞句都忘了的時候，而仍遺留下來的東西，謂之“學養”。學養深厚的他，對辦報的專業性的精辟論述，如說家常話，真正是深入淺出的能手。惟其深入（學識淵博，融會貫通），才能淺出。與時下許多生吞活剝、淺入深出、故弄玄虛之輩的高論相比，更更令人肅然起敬、見賢思齊，同時警示自己要拿出老實的態度來做學問，力戒嘴尖皮厚腹中空。與時下那些學問不大、架子大的人相比，他平易近人，特別是對後生晚輩的期望，其心也拳拳，其情也殷殷，其言也諄諄；“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當小右派問他什麼是新聞時，他回答：

我們職業有句行話：“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是新聞”。新聞就是新奇的、剛剛發生的、為大眾關心的事情，決不是上面的指示、命令……現在說，報紙是黨的喉舌，那時說報紙是社會的眼睛。

現實的情況是：“新奇的、剛剛發生的、為大眾關心的事情”，是祇能按照上面的指示、命令報道的，並嚴格規定：不許報道突發事件；違者罰款。

“他又說：新聞，是新聞記者在有新聞的地方去搶來的，不是開會開出來的，更不是領導講出來的。我那時當記者，每天都得跑，走街串巷像個小販，得靠腿快、筆勤、耳尖，累呀累呀，但愉快。搶到一條好新聞能高興三天，就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記者祇對所寫的事實負責，不對政策方針負責。”

現在正好相反。你不用搶新聞，不用對事實負責，祇用當喉舌、對黨負責就行了。一個外國記者把當天全國幾家主要報紙展示給人看，頭版頭條新聞，從標題到內容一字不差，字型也完全相同。輿論一律，一至于此！

“他真有學問，不愧是個老報人。他說：報紙的功能就是監督政府，把官員們為非作歹的事情公諸于世，比如貪污呀，腐化呀，辦事不公不義呀，侵犯老百姓利益呀，全給它兜出來，使他們再不敢做壞事。那時，我就是個專揭國民黨老底的記者，當官的見着我怕三分……”“一個國家，一個時代，報紙辦得多不多，活不活，為不為老百姓說話，是民主政治的表現，有沒有言論自由的分水嶺。”

他說這話並無意反黨，這原本就是他的認識，就像血肉組成人們的血肉之軀那樣，這樣的情、知結構組成他的大腦。不在于你主觀上反不反黨，而在于你祇要是堅持了人性、說出了常識、闡明了真理，那你在客觀上就是反黨。這也是為最高指示“知識愈多越反動”作了個注腳。羅隆基說“即使把

我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反黨陰謀。”如果說重在“陰謀”，這話可能是真的；他的確沒有陰謀，中共事後也承認了這一點。但如果重在“反黨”，這話便失真。他曾對章詒和說過，“唉，唯有你羅伯伯可憐哪！二十幾歲，在美國讀政治學博士學位。後來在英國又投到拉斯基門下。那時用功、記性又好，資產階級政治思想的一整套，在腦子裏裝得特別牢，要不然怎麼還是費邊社的呢？可現在想掏出拉斯基，裝進馬克思，就不行了。我一發言，自己覺得是在講馬列，人家聽來，仍舊說我是冒牌貨。”（《往事並不如烟》，時報出版，頁385）這就說明，他骨子裏都是些與黨不相容的東西。最高指示如果改為“掌握的真理越多越反黨”，那就堪稱“坦白”了。

與此相映成趣的是，鄭義在劉賓雁逝世周年暨紀念文集發表會上的講話中說：“這樣一個民族！這樣一個社會！我有時候就在想：活該！——真是活該！殺得還不够！否則，爲什麼還要在美國首都高唱什麼《東方紅》？又没人拿槍逼着你！完完全全的自願！”（《劉賓雁這個人物本身就是一個奇迹》）

爲什麼會出現這種情形呢？孔子說：“繪事後素”。素就是原來的底子。我們今天說的素養、素質、底質等詞，即源于此。“鍍金”的比喻再恰當不過了。羅隆基“反黨”與高唱《東方紅》者的“愛黨”都是底質，都在起先；羅的愛黨與高唱者的口稱民主、人權等都是後來鍍上的金子。所以實質上，這班“還要在美國首都高唱什麼《東方紅》”的人，是在嘔吐狼奶。這沒有什麼奇怪的，飽滿自溢。

就事論事，別的一句不說，單說唱《東方紅》。最好是，不要擠着眼睛瞎唱，要睜開眼睛看看明擺着的事實：1，毛澤東呼兒咳呀，他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還是大災星？他爲人民謀的什麼幸福？2，共產黨的統治帶來的是“哪裏人民得解放”還是哪裏人民受奴役？3，“毛澤東愛人民”嗎？“爲了建設（什麼樣的）新中國”呼兒咳呀？他死時留下的“新”中國，政治上權鬥殺紅了眼睛，被迫害之衆、數以億計。就在你們這些高唱《東方紅》的人中，能找出一個人（哪怕僅僅是一個人）本人、或家屬、或親戚朋友是沒受到迫害的嗎？經濟上瀕臨崩潰，人民處於饑寒交迫之中。這不都是連共產黨自己都承認的嗎？可在大陸民不聊生、哀鴻遍野之同時，中華民國却是“四小龍”之首。這有一點兒假嗎？請問這些海外的混混：是你們眼睛瞎枯了，還是智商低極了？你們居然忍心、還在唱血淚染紅的



《東方紅》！這裏面真正的原因，恐怕是你們遵循了你們偉大領袖的教導：“我們是很沒有良心哩！……良心少一點好。”（《毛澤東選集》五卷，頁198）當然，你們被消滅了良心，也是受到了不小的迫害，也有可同情之處。良心是人性之本；共產黨害得你們根本就不是人了；其悲、其苦、其慘、其哀莫大于此矣！還有一個政治學鍍金博士，對反右問題大放厥詞、大噴狼奶，雖令人作嘔，但並不令人稱怪；因為，此乃屬於萬象之一象、百態之一態，同理之可證、觸類可旁通耳！

我們還是回到陳先生。鐵流用心良苦，把陳先生當年那些、仍不見容于當今的言論重提，旨在起到強烈的針砭時弊、呼喚療救的作用。同時也讓人看清楚共產黨的改革開放的實質；在政治上以對媒體的開放程度為例，是開倒車的、是與時俱“退”的：現在比1989年以前卡得更緊，那時政治改革還是可以討論的；這一下倒退了20來年。1989年以前比起1957年以前又倒退了30年；那時還有《光明日報》、《文匯報》、《新民晚報》等幾家大的非黨報紙。當然更無法與1949年以前相比了；“他列舉了1949年前成都一大堆報紙名稱，什麼《民衆時報》、《民聲報》、《西方日報》、《中央日報》、《華西日報》、《華西晚報》、《興中日報》、《建設日報》、《益報》、《新中國日報》、《新新新聞》、《新民報》。想不到這個不足六十萬人口的小城市，竟有這麼多的報紙！使我更為驚訝的是，這些報紙除《新新新聞》是國民黨的官方報紙外，其它半數是共產黨和民主黨派辦的。”民國時代的新聞自由可見一隅。至于在全國，比方說罷：“《大公報》在中國是張赫赫有名的報紙。它的創辦人叫張季鸞，提出一個口號：‘不黨、不盲、不私、不賣’。堅持民間性，以文人論政為特色，在中國新聞事業史很有名。他們批評指責國民黨一黨獨裁，支持共產黨民主政治，在當時政局中具有重要的影響，1941年獲得美國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的榮譽獎章……”共和時代，可以產生名報、名報人，一到極權時代，盡數以毀。旁及文化界如名作家、名作品也然。這是人所周知的，不用多談，祇用舉出毛對“假如魯迅活着是否可能劃右派？”曾表示過照劃不誤的意思就足够了。

我忽然提出一個新問題問：國民黨蔣介石垮臺潰敗大陸，逃到臺灣，是不是與未搞報禁有關？

他沉思一下說：有關係，但不是直接的關係。國民黨真正垮臺的原因是

它堅持搞獨裁統治，以及它官員們的貪污腐敗，經濟亂成一鍋粥。打垮蔣介石八百萬軍隊，是解放軍而不是報紙。報紙從來沒有這個作用，頂多造點輿論，輿論最大的作用是警示。如果我們國家放開了輿論，準許私人 and 社會團體辦報，讓人講真話，說真話，就不會有“反右鬥爭”和“大躍進”，就不會有餓死人的事情。

以陳先生辦報人的身份，他不會不知道，日本一宣布投降，養精蓄銳的八路軍便開始活躍起來，這時的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國軍都是千瘡百孔，共產黨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上的搗亂，給醫治戰爭創傷雪上加霜。例子之一，國民黨搞整頓，被整頓的人就去投共，“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爺去投八路。”光用想想共產黨喜獲、收留了多少漢奸就說明問題了。這一切都不說，就說搞獨裁統治、官員們的貪污腐敗吧！共產黨在二者中的哪一項不超過國民黨的 100 倍；它為什麼沒失敗？陳先生的答案證明他很清醒。他知道：“國民黨真正垮臺的原因……打垮蔣介石八百萬軍隊，是解放軍而不是報紙。報紙從來沒有這個作用，頂多造點輿論，輿論最大的作用是警示。”這就是他把國民黨當年失敗、共產黨如今不失敗的本質原因，引而不發、意在言外了。他驗證了共產黨所揭示的真理：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反動派你不打他就不倒。不管多獨裁和腐敗也不會自動倒臺，例如小小的北朝鮮。這話的現實意義，值得深長思之。

仔細想來，許多慷慨激昂、義正詞嚴的話，對極權當局來說，即便不是不痛不癢，充其量也祇是一時的切膚之痛，而陳老這些心平氣和而又擊中要害的話，却使當局與時俱進、與日俱增、死而後已地心腹為患。鐵流說：“我因‘干預生活’小說〈給團省委的一封信〉，流毒全國罪該萬死，自難逃脫此劫。而老報人陳澤昆在‘整風鳴放’中連屁也未放一個，也是‘右派分子’。他不像我又吼又叫，而是痛痛快快‘低頭認罪’，別人揭發什麼就承認什麼，不推不賴，態度極好。”這在陳先生和共產黨雙方、都是胸中有數的，都知道對方是什麼貨色。反右時不是有“骨子裏右派”的說法嗎？

我們對許多人、事、物的認識，往往局限在常識範圍，陳先生却能拿出專業水準來。例如對五糧液的評說，又如對辦報經驗的介紹，甚至具體入微到特寫與小說的異同。他的言談總是那樣爐火純青、左右逢源。這，豈止于淵博？學問之功，誠于中而形于外。聞其聲而感其慈眉善目、仁者

愛人；溫馨之情溢于言表，沁人脾胃。他待人接物，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地，君子坦蕩蕩（如對劃右派和改正）；對己，達則兼善天下（從前辦報），窮則獨善其身（1949年後），心底無私、與世無爭。共產黨把所有這樣集真善美于一身的人們當作自己的敵人，那麼，這樣的黨、這樣的社會主義社會、這樣的黨天下，事實表明，他就是集假惡醜于一身的國家、民族、社會的大毒瘤。陳先生們的悲劇，就是這個毒瘤——共產黨、毛澤東把真善美毀滅給人看。

1985年65歲的老報人陳澤昆，妻子死于癌癥。兩年後，他和一位小他近30歲的姑娘結婚了。我祝賀他，開玩笑地說：老陳，你真有艷福。

兩年後傳來消息，說他跳樓自殺了。事起，是年輕貌美妻子，一邊和他百年交好，一邊私下與另一年青男人往來。年邁的他，認為人格受到了莫大玷污，老臉無處放，一氣之下竟然輕生。唉，知識分子常常能承受巨大的政治壓力，却經受不起世俗勢力的衝擊。唉，聰明人也有糊塗的時候啊！他不知道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社會，已非理想世界，物欲橫流，享受至上，道德淪喪，自私自利，早成了生活的主旋律……

他感慨于“反右鬥爭沒明堂啊！”如果說，階級鬥爭為綱、扣白帽子奪去了先生的政治生命；那麼，世風糜爛、物欲橫流、一頂綠帽子便奪去了先生的自然生命。說是先生一時“糊塗”；實在是不理解先生。先生哪裏是糊塗呢？如果是頂着綠帽子、涎着臉皮糊塗度春秋，還會有這樣的結局嗎？

人是“意義”動物。中國知識分子認定的“意義”，在于修、齊、治、平。1949年後，他對“治、平”就基本上不抱希望了。“他不看，也不寫，超然世外，好像報社風雲與他沒關係。”以及：“現在講成份，講階級，過去辦報的人就不能再辦報了，必須要有新人，你不就是一個嗎！言談間，他有種無奈的失落感。”改革開放給他帶來了希望，他卻發出“老夫耄矣，弗能為也”的悲鳴：“我一生就愛好辦報，可辦不了報。年齡大了，雄心也沒有了。”

他的“艷福”給他帶來的，是蜷縮在避風港裏，不追求事業，難得糊塗地度過風平浪靜的晚年。可是，在風燭殘年中，避風港裏又掀起了腥風惡浪，這就衝破了他活下去的底綫；誰能告訴他：再苟活下去又有什麼意義？他對這個假惡醜的世道再也沒有什麼可留戀的了。共產黨對自殺的政治解說，自絕于人民、自絕于黨；在運動中自殺就是畏罪自殺，或是向黨示威；對右

派自殺還有一種特殊說法，“戴着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而我對“自殺”的哲學界定則是，“對‘意義’的孤注一擲，最後掙扎。”具體到陳先生則是，“質本潔來還潔去”。他既是一個淵博的老人，又是一個單純的老人，還是一個不幸的老人。他最大的不幸是生逢黨天下，斷絕了辦一張作為“社會的眼睛”的報紙（他人生的主“意義”）之希望。

人都有局限性，祇是各有各的局限性。鐵流先生則是表現在對陳老先生稍欠理解、說他“聰明人也有糊塗的時候啊！”。還有，如他說的“反右鬥爭前的中國，言論未有禁區，說話嘴上無需加鎖，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無人說你在‘攻擊誣蔑’或‘反黨反社會主義’。人人當時心抒情暢，故無虛假之詞，似乎大家都活在理想中。”這簡直是同着失意人、在說着得意話。別忘了剛說的“言談間，他有種無奈的失落感。我不願刺傷他，把議題轉到另一邊。”這就說明並不是“人人當時心抒情暢……都活在理想中”。更需從大環境指出，這話是說在反胡風和肅反之後！反右時，因受反胡風、肅反之害，進行血淚控訴，非但無有伸冤，反而遭牢獄之災，甚而遭迫害致死者，比比大有人在。

延安整風時，艾思奇舉過一個例子，說的是小孩問媽媽：“姐姐為什麼要哭？”媽媽說：“姐姐傷心。”小孩怎會理解包辦婚姻下，作小媳婦的姐姐、在惡婆婆手下的日子是如何地傷心呢？小右派對老右派“傷心”的理解，也可作如是觀。

語雲：“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通過朋友之間的思想交流，智愚可以互補。至于我持此議，果為智者之失，抑愚者之得耶？敬候作者、讀者明教。

### 附錄四：不堪回首憶往年

#### ——讀《反右研究文集》有感（之一）

在普林斯頓召開的“反右 5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是一次歷史性的會議。第一個、第二個 10 周年，是在文革大動亂和餘波蕩漾中，自無召開

紀念會的可能；30周年時，政治氣候尚可，不料被錢偉長向當局告密，會議倡議者方勵之、劉賓雁、（許良英被誤認為是）王若望，被定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受到開除出黨的懲處，會議胎死腹中。此後，直至今日，“反右”一直是禁區，作為話題都比不上文革曾經有曇花一現的解禁，文革畢竟曾被“徹底否定”過，所以反右50周年紀念也祇能在海外召開。國內小規模、零星的紀念會，就像是“春風野火”般地跟國安打游擊戰。

我們這些老右派歷經艱險，深知天下無易事，得來全憑費功夫！因而特別感謝會議舉辦人的勞神費力。對於我們這些在倒計時中生活的人，60周年的會是不可思議的。我們不僅對此次會議的巨大意義有高度的評估，而且估計到它很有可能是空前絕後的，因而，《反右研究文集》作為大會的結晶和碩果僅存，也就更加“彌足珍貴”了。我本人是，書一到手，愛不釋手，時間優先，一氣讀完。

王若望先生生前曾說，死了的有話也不能說了，我們趁活着、就要說。現在他老先生也作古了，我們這些來日無多的老右派，如果不趕快說，恐怕就會因對不起作為歷史見證人的使命、對不起自己流血、流淚、流汗的慘痛代價，而死有遺憾了。我們這班人不僅有使命感，而且有急迫感。李昌玉說：“我可以像眾多退休老人一樣，終日無所事事、悠游林下，或打打門球下下棋，也可以游山玩水、周游列國，還可以含飴弄孫、頤養天年，總之我可以非常太平、非常安全地壽終正寢，但是我在良知上覺得自己還是應當報答歷史對我的恩寵，這就是把我的經歷、閱歷和思考還給歷史，因此我被迫選擇了這種在中國要冒犯政治風險、失去安全保障的生活方式。”（頁17。凡引自本書，祇注明頁碼）

與會的每位右派都是抱着這同一想法的。張先痴說：“我不計後果，我要勇往直前，到了我這個年齡，如果我們還象膽小鬼，就對不起我們的子女、我們的後代。我們應該像李昌玉先生一樣，勇敢地出來寫，出來說。”（頁29）為什麼寫出這些東西還需要“勇敢”呢？這，除了因為是要冒外在的政治風險外，還要經受內在的痛苦折磨。張先生寫《格拉古軼事》，曾告訴我（這個也是許多右派寫回憶錄的共同情感經歷）：多次為自己和朋友的難苦哭泣而擱筆。我在為他寫的書評中，專門寫了一節“受罪分類學”，簡述如下：“第一步，把所受的罪、分為死罪（自殺、被殺）和活罪；第二步，把活罪分為心靈的（辱罵、批鬥、花腦殼、住黑監、假槍斃）和肉體的；第三步，

把肉體的罪分爲刑具的和非法刑具的（饑餓、超體力的勞動、毒打、武鬥似的批鬥會、屢被推倒跌得鼻青眼腫，頭破血流）；第四步，把刑具的分爲法定的和非法的……”每一類別，都有具體內容，現在，作爲一斑，單單指出：“非法定的刑具中，‘捆’，俗稱‘挨繩子’，也是我們的國粹之一……坦率地說，我對這種酷刑深惡痛絕，一許因爲我生性頑劣，我挨過的繩子的確不少……棕繩和麻繩捆起來的感覺並不一樣，粗繩子和細繩子捆起來的味道更不相同，如果用細繩子捆緊後再澆水將繩子淋濕，感受更是具體（其實何需澆水，受刑者流出的汗早已將繩子浸濕，本人深有體會）。捆的時間長短則與疼痛程度成正比（但有臨界點，如受刑者已昏死倒地，則疼痛將降爲零，施刑者此時用氨水置受刑者鼻下以使蘇醒，頓時其疼痛度又上升爲一百，本人終生難忘之體會）。而穿着厚衣服或者薄衣服乃至於打赤脚受刑者感受的麻辣湯又別具風味。在挽繩子的方法上如在胳膊上饒三圈還是兩圈，從頸背後往上提升到什麼高度使受刑者感到最疼、次疼和微疼又另有學問。本人對法律可謂一竅不通，祇是在法律對我反復而長期的實踐中得到一些感受。我見過一個姓何的成都暴牙齒在監捨門邊的一棵樹上被捆了一個通宵，嚎叫了一個通宵；我還見過一個姓蔣的逃跑犯被捆得上身起水疱甚至睡衣脫不下來。總之，這種強力阻止血液循環而給人的椎心刺骨，別說我輩凡夫俗子，就是李逵、魯智深也會疼得在地上打滾，張飛、岳飛也會疼得撞牆跳岩。”（《格拉古軼事》，頁 151）這種受罪的日子不是熬一天、兩天，一月、兩月，一年、兩年，而是 23 年！

許多人用“九死一生”，來形容右派是怎麼熬過來的。其實，對常人說這是形容，說經歷“九死”祇是言其“多”的意思，誰能真的經歷“九死”呢？可對右派受的罪來說，簡直是世人難以想象的；你去讀一下北大右派學生領袖陳奉孝的回憶錄《夢斷未名湖》，請你毫不含糊地清查一下，他歷經死亡的準確數字竟是“13”次！他是從 13 次的死亡中逃生的呀！右派文徵赫恩的妻子被幹部強姦，我對他寫的《苦難的歷程》作的書評中寫道：誣說是他們夫妻合伙預謀拉幹部下水。對他隔離審查、加重勞動、還要他交待問題。冬天勞動多半是平整土地，用筐抬土。每筐重 50 斤，要他一次抬四筐。下班後，每晚八點開批鬥會，叫他交代怎樣和妻子合謀把幹部拖下水，怎樣陷害幹部進行階級報復。每次開會就作噴氣式，被揍一頓，打得鼻青眼腫，宣稱，什麼時候你承認、批鬥會就什麼時候停止。就這樣，鬥了他八個月，

240天，一天沒拉。“我爭那口氣，死也得頂住，決不屈服！我已經兩次從死神那裏奪回了生命（所謂死過兩次，一次是把他當成已死的人，拉在車上去埋，由於三輛堆滿屍體的車子震蕩，把他甩下來，掉在河裏的冰上，把他凍醒了。“我要不醒，那活埋就是我的命運。”（《苦難的歷程》頁91）另一次是得了病毒性大葉性肺炎，兩個肺全感染了。醫學書上記載，死亡率高達85%。），連死都不怕還害怕什麼呢！我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罪名是共產黨無中生有捏造強加的。如今我是受害者，又被誣陷為拉幹部下水。難道天下竟有這樣的男人，讓自己的老婆叫別人任意踐踏蹂躪嗎？”（《苦難的歷程》，頁120）共產黨胡編亂造的《白毛女》悲劇，倒是自己社會的真實寫照；右派不就是白毛女嗎？戲劇家文徹赫恩不就是白毛女嗎？你聽！白毛女在劇中的控訴，不就是他這時、內心悲憤的呼喊嗎？——“刀殺我！斧砍我！好不該這樣糟塌我！”

有一次，在鬥爭會上，把他妻子也叫來旁聽。“你老婆已經承認了拖幹部下水，你還不回頭是岸，爭取寬大處理！”（頁120）他已被打成血人，還要不停地打，流血過多，昏厥過去了。

可見，寫回憶錄對他們就等於是自找地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在自己的傷口上撒鹽。但他們就是要忍痛而為，文徹赫恩在會上對我說：“我活一天，就要對共產黨口誅筆伐一天。”最近打電話告訴我，他見人就說，就控訴共產黨的罪惡，那個小城市的人都認識他了，有的說他成了祥林嫂。

讓我借用一下作為反右動員令的《人民日報》社論的題目：“這是為什麼？”

任衆答曰：“我們寫書，我希望大家都寫，把自己血跡斑斑的經歷寫出來，我總結的話就是：凝血成文史，留給世人知。”（頁21）

林希翎答曰：“因為中共要把這段歷史抹掉，不要說後代，當代的年輕人，對這段歷史也莫名其妙，不感興趣。他們最感興趣的就是賺錢。所以，我覺得我們這些幸存者，有歷史使命，我們作為歷史的見證者，要把歷史留下來。”（頁47）

魏紫丹答曰：“我要寫，更要推廣別人的成果。”

剛逝世的黨治國先生，他向大會提供的論文《家天下、黨天下和反右運動》，讓毛澤東的“反右”，向歷史上一切暴君昏君、倒行逆施的“反右”，認祖歸宗，而把他們這群祖祖輩輩、徒子徒孫捆在一起，一同釘在歷史的恥

辱柱上。在此，我謹向治國先生獻上沉痛的哀悼之意、誠摯的敬仰之情！讓右派精神永照汗青！

吳弘達先生在開幕詞中說：“我們不久就會消失了，但歷史上將永遠留下 1957 年。”（頁 9）這使我在不勝感慨之餘，又一次受到歷史使命感的鞭策：與其像沒出息的“蠟燭”，“成灰淚始干”；何如學辛勤的“春蠶”，“到死絲方盡”？

### 附錄五：還原反右真相

#### ——讀《反右研究文集》有感（之二）

反右真相之所以需要還原，是因為官方居心要掩蓋歷史罪惡、隱藏與消滅原始資料、篡改事件本來的樣子，以誤導世人。又因為，“起因”關係着事件的本質，所以，難度和關鍵以及與會者的注意力就比較集中地表現在這個方面。遇羅文說：“我一直認為，反右運動不是偶然發生的，即不是毛澤東的一念之差，也不是他突發奇想，而是蓄謀已久的。因為前幾年的鎮反運動就消滅了大批有可能對毛氏政權不滿意的人，反右祇是這種政策的繼續——方式有所區別，目的都很明確——剝奪這些人的說話權利。”他“看出這麼一個規律：凡是那些為民請命的、有獨立見解的、民衆喜愛的人物，都難逃厄運——躲過了這次，躲不過下次。所以在毛氏政權下反右是必然的，頂多改變一下時間、名稱，受害的依然還是這些人。為什麼？因為你想做一個好人。邪惡政權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好人。”（頁 24—25）張軼東說：“我認為，不可低估赫魯曉夫在 1956 年前蘇聯共產黨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秘密報告對於毛澤東的影響。

“其實，遠從 1930 年的富田事變起到 1955 年的肅反為止，毛澤東一直是依靠高壓和血腥奪得和維持他在共產黨內、紅區和國內的統治的。但是在那一時期，他的這種統治和統治方法，是有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斯大林體制為依靠的，即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有斯大林這麼一個上帝。而在當時所有共產黨掌權的國家乃至一些西方共產黨中，都有一個小斯大林。



“然而平地一聲雷，1956年赫魯曉夫在前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上的秘密報告，徹底推翻了斯大林這一尊神。這不祇是否定了斯大林個人，而是從道義上、理論上和制度上都否定了在共產黨內和共產國家內有一個至高無上，集一切大權于一身的領袖。于是在所有共產國家（主要是東歐國家）小斯大林們紛紛受到衝擊，波蘭的布魯特急病交加，沒回到華沙就死了。匈牙利的拉科西在該國人民十月起義中被推翻。我本人因當時身在前蘇聯，對赫魯曉夫報告所引起的震撼深有體會，這是當時在國內和西方的中國人所感覺不到的。”

“其實，前蘇共 20 大對毛澤東的致命打擊，還是從理論上否定了在任何一个共產黨和一個共產國家內，必須有一個至高無上的專制領袖。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毛澤東至高無上的地位。”（頁 56）這最後一句話，簡直太中肯綮了！而從他親歷的事實中却得出這樣一個不應該得出的結論：“在中國的確有過一個民主潮的興起。而且這個民主潮的鼓動者就是毛澤東本人。”（頁 57）毛不是說要“釣魚”嗎？“民主”之餌對知識分子最具誘惑力，這就是謎底。對此，張先生說：“我的這種分析，的確祇是個人推理，而沒有原始材料作證，但是，‘陽謀’和‘引蛇出洞’，不也祇是毛澤東事後說的，而沒有事前的原始材料作證嗎？毛澤東肚皮裏的東西是不可能變成文字資料的啊！”（頁 58）“陽謀”是胡說。至今雖眾說紛紜，但是，無論黨內外，却没有聽說有人支持“陽謀”說的。趙紫陽說：“陽謀是托詞”。“引蛇出洞”屬於陰謀，很多人，包括李維漢、胡耀邦等都承認毛在 57 年 5 月 15 日以後實行“引蛇出洞”；爭論僅在于，從一開始“毛澤東肚皮裏”是否就心存“陰謀”？姚監復說：“既是陽謀，又是陰謀。”他說的“陰謀”仍是指 5 月 15 日之後。他說的“陽謀”是指：“1926 年，有一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這篇文章有的地方打了 XXX，上面有眉批。XXX 是《毛澤東選集》裏刪掉的，上面的眉批是《毛澤東選集》改的。這裏我念一段：‘一部分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的教授和學生乃極端的反革命派，乃民族革命運動之死敵。中產階級右翼的許多高級知識分子，大部分留洋學生，大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和學生一定變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要成為我們的敵人……’因此，從 1926 年開始毛澤東實際上把共產黨變成一個現代的、半現代的青紅幫，以農民為主的一個革命造反派。到勝利以後，它就變成一個特權，在這種情況下，它必然對知識分子憎恨。李銳告訴我，30 年代的

左派，內部殺了 10 萬，40 年代的整風，有資產階級思想就被整肅。1953 年社會主義總路線時期，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知識分子被劃到資產階級一邊去了。這就是陽謀。”（頁 62）應該說，這正好就是陰謀，或說，這就是反右的遠因。毛明明是從來就敵視知識分子，這個時候却表現出空前絕後地、笑容可掬地、嬉皮笑臉地、千呼萬喚地請這些“黨外的朋友”、“有志于改革的志士仁人”，拿出“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幫助黨整風。為解除你的顧慮，猴不上杆直敲鑼，又是信誓旦旦：“言者無罪”，又是保證“參加和退出自由”。事過 50 年，回頭看，除了欺騙還是欺騙；出河才見兩腿泥，陰謀、陽謀涇水、渭水間！

章立凡對此作了專文論述，《毛澤東在 1957 年的兩大政治目標——“反右”動機之研究》。他說：“1957 年的政治風潮，可分為兩個階段：先是黨內‘整風’，後又全國‘反右’。祇有把‘整風’研究透了，才能搞懂‘反右’。歷史的內幕和人物的心態都是復雜的，從前因後果上看，整風的目的未必純為‘引蛇出洞’，祇因‘反右’的創痛太沉重，以致很多人忽略了‘整風’也是有目標的。”（頁 79）這個“純”字，自是無可反駁的。因為“純”者 100% 也。誰能保證整風的目的連 1% 的不是“引蛇出洞”都沒有呢？如果不說“純”而說“主要”，就好說了、並且連“兼”也排除了。這也才絕對合乎毛自己的哲學：“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着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的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抓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萬千的學問家和實行家，不懂得這種方法，結果如墜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決矛盾的方法。”（《毛澤東選集》，四卷本，頁 297）這時候的主要矛盾是什麼呢？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遇到了大地震，波蘭，特別是匈牙利，知識分子、大學生，聯合工人，舉行起義，納吉提出要建立聯合政府、蘇聯撤軍、走芬蘭中立化道路。這要是抹上中國特色，就是要反對“黨天下”，反對“一邊倒”。毛尚未號召黨外、幫助黨整風前，對黨內說：“黨內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隨著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現在情況起了變化，他們不吭聲了。不吭聲不是本心，本心還是要吭聲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 334）隨後的號召幫助黨整風，就是因為“他們不吭聲了，不吭聲不是本心，”定要“螞蟻出洞”、“烏龜王八都出來”，要誘着他們“吭

聲”的嗎？

“我要準備出大事……在國際，無非是打世界大戰，甩原子彈。在國內，無非是出全國性的大亂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幾百萬人起來反對我們，占領幾百個縣，而且打到北京來。我們無非再到延安去，我們就是從那個地方來的。我們已經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請我們回延安怎麼辦？”

（同上，頁 352）再加上知識分子，特別是大學生對蘇聯“解凍”、反對個人崇拜，現在的人都無法想象反應是何其強烈！這些我就不展開了，有興趣的去看看毛反右前的所有對內講話（都在毛選五卷上），再看看前後兩副絕然相反的嘴臉，就不用我多置一字，事情本身就具有自明性了。

章先生說：“以致很多人忽略了‘整風’也是有目標的”。他對整風目標的敘述倒是很謹慎的。而“很多人”却相反。許良英說：“不少人，包括李維漢和陸定一，以及鄧小平定調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論述鳴放、反右歷史時，都重復毛澤東 1957 年 5 月以後那種自欺欺人的論調。出人意料的是，被官方斥為‘自由化分子’的阮銘，直至 80 年代還持這種觀點。甚至 1994 年出版的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的回憶錄，竟也附和這種顛倒是非的說法，說什麼毛澤東“感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自信心受到極大挫折，因此毛準備狠狠‘整’民主人士。”李醫生顯然不了解外界實情，輕信了毛澤東自編的由頭。”（《關於反右運動的片段回憶和思考》，《北京之春》1997 年 2 月號）其實，何止阮銘！王若水說是“急轉彎”（《新發現的毛澤東》第 275 頁。）；趙紫陽說“陽謀”是“托詞”（柳萌《鄧小平是反右運動的特大劊子手！》）；胡耀邦說“引蛇出洞祇是短時間。”（《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212 頁）朱正的“毛確實有消除弊端的願望”說（《1957 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頁 540）、凌鋒的“大吃一驚”說（《中共風雨八十年》，頁 124）、余英時也信了李志綏的“毛錯估”說（《在榻上亂天下的毛澤東》，《反叛的御醫》，頁 92）等，和本書上大部分人，都是這樣認識的；至于“猖狂進攻”說，就更不屑一提了。在識破這一陰謀上，有先見之明的，劉賓雁說，祇有鄧拓一人（劉賓雁為華民《中國大逆轉——反右運動史》作序：《毛澤東一手定乾坤》），我認為吳宓教授也該算一個。有後見之明的，有李慎之，許良英，劉賓雁，王若望……就多了。

問題中有一個奇怪的共性：凡不贊成“陰謀論”的，祇要據實論證下去，

就必然反而導致“陰謀論”。前已屢見不鮮，謹再以王若水爲例以明之。他說：“從整風以後，黨外人士、知識分子批評的尖銳程度超過了毛的預料，當時幹部的怨氣也超過毛的預料，於是，他來了個急轉彎。”（《新發現的毛澤東》第275頁）且看他隨後在第293頁又是怎麼說的？“在這次會議（1956年11月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可以看出（毛和劉、周）有不一致的地方。一，在如何吸取匈牙利的教訓上，劉少奇強調搞好經濟，關心人民生活，擴大民主，反對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要限制領導人的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毛澤東則強調階級鬥爭。在經濟建設的方針上，周恩來強調穩妥可靠，批判了1956年的冒進傾向；毛澤東則強調不平衡是絕對的，錯誤難免。在第一個問題上，我們看到了來年“反右派鬥爭”的殺機；在第二個問題上，則爲其後的批評反冒進和大躍進埋下了伏筆。”

好一個“殺機”！先一年有“殺機”，來年動手“殺”，這本是順理成章的事，哪裏用得着“急轉彎”呢？

由“殺機”論導致“急轉彎”論，在邏輯上，無論如何也是說不通的；而在事實上，二“論”則是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的。祇有毛先有“殺機”，後來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才會有“急轉彎”，同時，這也才叫做“急轉彎”。

我所以說王先生發現的這個“殺機”好！好就好在，這使我們看到，毛1956年懷有“殺機”後，1957年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和宣傳會議上以及天安門城樓上，請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所表現的態度誠懇，開放開明，溫柔敦厚，談笑風生，活潑風趣，甜而且美，臉上堆着笑迷迷……這一切，是爲中國人形容陰險毒辣，陰謀詭計的詞語——“口蜜腹劍，笑裏藏刀”，作了一個血腥的表演。同時使人們反思到，如果不是出于陰謀，他的這番表現，與對梁漱溟的潑婦罵街、對胡風因言定重罪相比，是極端反常的，也與他“哪個蟲兒敢開口”的、不容他人置喙的一言堂惡霸作風，絕不相容的。

章先生論政的着力點有二：一是變聯合政府爲一黨執政，一是變黨的領導爲個人獨裁。就是章詒和說的：“中共獨霸全國，毛是獨霸中共”。（頁42）也和本書216頁之拙文《再論“反右”與“文革”》的“兩個範疇”說，具有相通之處：“毛澤東自認爲一生中幹了兩件事：一件是打倒蔣介石，黨內贊成的多，反對的少；一件是發動文革，黨內反對的多，贊成的少。何以如此？從‘立’講，前者是建立共產黨的‘黨天下’，後者是建立毛氏的‘家

天下’；從‘破’講，前者是‘打倒反動派’，後者是‘鬥黨內走資派’。當然，‘家天下’絕對必須以‘黨天下’為基礎。”故而，反右在先，文革在後，不能畢其功于一役。

我對本書的內容歸納了一下，總結出，要想徹底恢復反右的本質真相，就必須認清如下的九對矛盾：1、反對斯大林主義與擁護斯大林主義——蘇共20大，特別是赫魯曉夫作的秘密報告，在中國引起的反響；2、中共八大路線的建立與廢除——中國的政治風向標；3、反冒進與反“反冒進”即反右傾——黨內鬥爭的主要形式；4、雙“百”方針與大鳴大放——滅資興無與反擊右派的預謀；5、波蘭事件與匈牙利事件——引發毛澤東決心要開展新式肅反，徹底鏟除中國的“螞蟻”；6、毛在黨內的秘密講話與在黨外的公開講話——陰謀乎？陽謀乎？無謀乎？7、中共整風與邀請黨外幫助整風——引蛇出洞；8、反右前與反右後的各項重大政治運動——“龍”從哪裏來，“脈”向哪裏去？；9、共產極權制度與毛澤東個人野心——狼狽為奸，如虎添翼。

## 附錄六：讓歷史記住這一年：一九五七

### ——讀《反右研究文集》有感（之三）

#### 一、探討歷史的定位

祇有在還原真相的基礎上，才能作出正確的歷史定位。

吳弘達的“開幕詞”、陳奎德的“前言”，言簡意賅地為會議定了位，會議將從三個方面的性質來作定位：對右派“人”、對反右“運動”和對“研究”反右運動意義的歷史定位。

張鶴慈的如下概括，對“人”和“運動”方面作了準確和深刻的闡述：“思想上的右派，從對49年後現實的極度不滿，到對一些具體事、具體人的不滿、牢騷。人數相當多，這些人占據了右派的絕大多數。這些人，內心深處真正明確反對共產黨的不多，但對無處不在的黨領導的反感，是基本相同的。”

“57年的反右，是給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最後的致命一擊。在經過土改、鎮反、反胡風，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一連串的政治運動的打擊下，元氣大傷的士和士氣，又被引蛇出洞的陰謀徹底摧毀。

“反右，基本上徹底斷絕了中國和西方文化和思想聯系，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如儲安平等人，除了出賣靈魂的人，無一例外地都被打翻在地，當時的大學生，中學教育也是在49年前，受過西方文明的熏陶。這也就是在中國的歷次民主運動中，右派是所有反革命中，素質是最高道理。”

“這是一次比秦始皇狠毒萬倍的焚書坑儒，數量是萬倍，狠毒也同樣是萬倍。秦始皇祇是一次性的埋葬了儒生的身體，毛澤東是長時期的活埋了知識分子的肉體和靈魂。”（頁73—74）王友琴、魏紫丹、姚監復從反右與文革、大躍進的聯系上為其定性、定位。

遇羅文的發言，一望題目，《右派是一群最可愛的人》，而知是專門說“人”的。他說得樸實可愛，誠實可信。我覺得他是“右派最可愛的子弟”。他說：“事後我們很容易就可以總結出來，右派的品格無非五種：1、單純，2、誠實，3、正直，4、有深謀遠略，5、肯捨己為人。（頁25）

不言而喻，別說右派不是按一定章程組織起的，而是由共產黨判決、硬加的“犯罪團體”，即便是經過“政審”、自覺自願地自由結社，五個手指伸出來也不會一般齊。比如右派中的“左派巴結三”，就是派別異己分子。但以營壘為單位，整體而論，這五種品質，對照史實看，恐怕就會發現這正好是右派的五大特徵；同時又是左派要開除出派的五種條件。

他例舉出了儲安平、馬寅初、黃萬裏、米昭曾，以及在場的曾慶民。由于接觸關係，我們從前都不知道聖女林昭，她是我們右派精神的代表，是中華民族狗熊輩出時代的異類，續寫了中華民族英雄譜。這個時代，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也先成為真正的右派而後才能成為真正的英雄。

中共坐天下，人成為運動的主體和客體。人是運動中的人，運動是人的運動。主體始終是共產黨，代表人物是毛澤東。客體，到此時為止是地富反壞右。

現在右派在當客體，程慶民說：在北大，“小小一個數力系的教職工群體，打出幾十名右派不算，光是自盡身亡、判刑處決的至少有10條人命。而最後‘落實政策’、‘復查改正’，竟全部是冤案！這些冤死的孤魂，全是學術精英，包括世界著名的解析數論大師、概率論大師、拓撲學大師、固

體力學大師、科學院士（學部委員）、青年勞模、學派傳人……”

“‘見微知著，歷史已經證實：毛澤東是極端卑鄙陰險的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中國人民的叛徒、世界革命的叛徒、出賣祖國的叛徒、內奸、工賊，他用暗害領導人的奸謀，篡奪了共產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大規模迫害人民，長時期禍害國家，多渠道毀滅文化。他是敗壞中國的罪魁禍首、愚蠢邪惡的陰險小人、道德淪喪的無耻流氓、五毒俱全的亂倫敗類，不僅不耻于人類，而且不耻于狗屎堆。其罪行罄竹難書、十惡不赦、百死難贖、萬年遺臭……’

“以上的話是我在北大的右派生涯中，經過反復批鬥、反復檢討，最後忍無可忍，向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控告毛澤東的匿名控告信。”（頁44）後被揭發、輪鬥後等待槍決，恰遇林彪事件延緩，陰差陽錯，四人幫倒臺，胡耀邦當組織部長時主持平反。

誰能說我們的程慶民老先生不是英雄？他是雙重英雄。遇羅文說：“反右時他是北大的教授，爲了保護兩位學生不當右派，自己却成了右派。爲此受了20多年的罪，以至差點命喪黃泉。”（頁27）二則，他對中共中央作出對毛的徹底揭露，純屬燈蛾撲火。燈蛾不知撲火會死而爲之，他却是明知“惡攻”會死而爲之。難道還會有比自覺爲真理而獻身的壯烈行爲，更能無愧于英雄稱號的嗎？

歷史學家余英時致歡迎詞，“我這裏談兩點看法，權作歡迎。

“第一，我要說的是，右派分子是一個光榮的名詞，作爲當年的右派，是一種歷史榮譽。”（頁3）

“第二點是，右派過了50年，右派的歷史、上百萬人及家庭的遭遇，我們知道得非常少……前兩天我看了猶太人的博物館，我就很感慨，他們把每個小細節都找出來。所以我們不應該忘記這段歷史，不能說過去了就算了。”（頁4）

細數起來，祇有“反右”在共產黨發動的所有運動中，才是最兼具闡揚民主自由思想的深刻性和面面俱到的廣泛性。這次運動是民主自由在毛澤東時代的最後一戰，內中人物，涉及“老和尚”和“小和尚”；問題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科學、藝術、文化、教育、衛生、國家、民族、社會、人口……從宏觀到微觀巨細不漏；地域波及東西南北中，直至老（老解的最後一戰，也是共產極權的政治本質一次頗具深度的充分展示。放區）、少（少

數民族區)、邊(邊界區)、山(山區)、窮(窮鄉僻壤);部門橫跨黨政工農兵學商,各行各業;而且右派們所提問題,其尖銳性、其科學性、其超前性,至今看來,在大陸上,仍是無有出乎其右者——政見是當時的政治家和政治學家鳴放出來的;如何辦教育呢?則是教育家和教育學家發表的高見;法學家談法治,經濟學家談經濟,文學家和藝術家談文藝,社會學家談社會;新聞出版界、醫藥衛生界、學術界都是名報人、名醫藥專家、名流學者們懇切陳詞。從毛澤東主觀來說,自稱“陽謀”;就事態發展的客觀進程來說,則是將計就計,一代精英(包括大學生,也都屬才華橫溢的高才生),得以乘機傾巢而出。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們的見解代表了當時的最高水準。胡平說:“我發現,和文革中出現的各種所謂異端思潮相比,57年的右派言論所含有的自由民主理念要豐富得多,清晰得多,也純正得多(這並不是說文革一代人的素質比右派低下。這祇是因為文革一代的成長環境更惡劣)。我從57年右派言論中所獲得的啓示,要遠遠超過從文革中異端思潮所獲得的。”(頁107)八九民運學生領袖王丹說:“可以說,不了解‘反右運動’,就不能深入了解中共的政治本質和中國的當代史……今天的民主運動,從‘四五’到‘思想啓蒙’,從‘八六學運’到‘八九民運’,所提出的政治主張,其實都沒有超出‘五七一代’人的思想框架太多。”(《重新認識“五七一代”人》著名記者高瑜說:“毛澤東的反右運動企圖將20世紀上半葉中西文化培養出來的精英人物一網打盡,主要要消滅知識分子批判社會的功能。而89一代,作為57一代的兒子,又經歷了六四一場大屠殺,專制暴君打算‘殺他20萬,換得20年的穩定’。現在20年就要到來,中國知識分子追求憲政民主的精神仍然在不斷成長,而且信心百倍。”(《從反右到六四——89是57的兒子》)吳國光教授研究反右問題的結論是:“可以說,從宏觀的歷史眼光來看,‘反右’運動不僅決定了中國知識分子在毛時代的命運,而且決定了毛時代的中國的基本政治走向。在這個意義上,‘反右’運動是理解毛時代中國政治的樞紐事件。”(《中共“八大”與“反右”運動》,《當代中國研究》2007年第3期)所以,研究“反右”問題,就成為每個研究中國當代史和展望中國未來的人的必修功課。

## 二、老驥伏櫪，小駒咆躓



毛澤東因其逆歷史潮流而動，在培養接班人上機關算盡，終究是有心栽花花不發。右派因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雖他們不都是師者、歌者，但自有後來人繼其志、繼其聲，無心插柳柳成蔭。這該算是縱向的失道寡助與得道多助吧！

與會者，右派僅有 13 人；其餘的，能來參會的人，都必在研究反右運動方面，學術有成，而最可喜的是後起之秀占據絕大多數。

老家伙人還在、心不死，筆耕不輟，“黑色文庫”內外，大部頭、小部頭、單篇，卷帙浩繁。繼起者，長江後浪推前浪，堪稱浩浩蕩蕩。除已提到遇羅文、章詒和、章立凡、張鶴慈、胡平、王秀琴、陳奎德等等之外，邵江的發言無論從思想性、政治性、專業性上講，都是高水準的。他是從“非官方雜誌《廣場》”說開去的。俞梅蓀是言者兼行者，他做了很多有意義的實事。多了，黃肖路、齊家貞、邢小群等，加上更大量的會外的人，就更數不清了。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們不僅在寫歷史書，而且在延伸歷史。爲了說明這一點，我放兩個鏡頭作今昔對比：

一個鏡頭是李慎之先生在《毛主席是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一文中提供的，說的是第一號大右派章伯鈞“繳械投降”、“叩頭如搗蒜”——

其實，反右派鬥爭一開始就可以說是大獲全勝。用毛主席自己的話說“基本群眾在我們手裏，軍隊在我們手裏”，幾個知識分子豈止不是對手，而且一上來就祇有求饒的份兒，可是毛主席不依不饒，非要他們“繳械投降”不可。可憐他們根本沒有什麼“械”，又如何“繳”，祇好搜索枯腸，挖自己的反動思想，這就是聶紺弩的名句“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椎心坦白難”的由來。許多自殺的右派分子就大多是實在熬不過這一番折磨而不得不“自絕于人民”的。我在自己成爲右派以前還聽到傳達說，章伯鈞“叩頭如搗蒜”。其實，章伯鈞的頭腦要比許多人清醒得多，他在儲安平被批鬥以後，還說過“盧（郁文）這種人不過是一個小醜而已。我看胡風、儲安平倒是要成爲歷史人物”。無奈他是處在一個完全封閉的體系之中，無所逃于天地之間。除非自殺，也祇好“繳械投降”了。毛主席的江山真是鐵打的江山。

另一個鏡頭是章伯鈞先生的女兒章詒和如今的態度：“別人覺得可耻，我備感光榮”——

我的“伶人”也在被查禁之列。官員還不點名地點我，說：“這個人的思想有問題。我們已經反復打過招呼，她的書不能出……”由此，我聯想到

第一本書（《往事並不如烟》，香港版更名為《最後的貴族》）被禁，完全是因為一位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把它定性為“反黨宣言”。事情再明白不過了：從 1957 年到今天的五十年間，我就是被左派認定為的一個右派。右派就右派——別人覺得可耻，我備感光榮，終於能和父母站在一起了。但誰也不能以此為由而剝奪我的公民基本權利。我決定拿出性命來討回屬於自己的東西。（章詒和：《胡發雲〈如焉〉香港版序》）

今昔對比，今非昔比，這才是真正的“形勢大好，不是小好。”  
夜正長，路也正長。歷史會跑在歷史書的前頭，寫出新篇章。

### 附錄七：尤甚于“莫須有”

#### ——讀《苦難的歷程》有感

文徹赫恩著：《苦難的歷程》

勞改基金會出版

從一滴水看海洋，從一粒沙看大千世界，從文徹赫恩個人的經歷看知識分子、乃至整個國家、民族、人民的苦難。他自己就是這樣寫的：“類似我這樣的冤假錯案，何止千百萬！還有那些在勞改隊裏餓死的、折磨死的、打死的……共產黨將怎樣向他們的家人和後代子孫交代！”（該書，頁 138）這就是說，本書記載的遠非某個人的《苦難的歷程》。

他出生于滿族貴族之家，是旗人，而且是上三旗，鑲黃旗，又是將門之後。家人全跟國民黨去了臺灣。“我有幾次去臺灣的機會都自動放棄了，堅決留在北京，等待解放，迎接共產黨的到來。誰知，這竟成了我終身遺憾的大錯。”（頁 29）

“從 1958 年 3 月 11 日被捕入獄至 1978 年 12 月 22 日平反止，我共計坐牢 20 年 9 個月零 11 天！加上 1955 年 5 月反胡風運動開始至 1958 年 3 月 11 日被捕止，共計被批鬥隔離 2 年 11 個月，合計批鬥加勞改共 23 年 8 個月。我今天能活着出來，離開人間地獄，算是命大。雖然我没有死，可精神上肉體上的傷痛將折磨我一生。我的鼻子被打斷、左耳被打聾、牙齒因營養不良

脫落 12 顆，打掉 4 顆，共 16 顆。腰部被打致殘，成終生疾病，這都是無法彌補的。特別是精神心靈上折磨摧殘，傷害至深，我將終其一生無法擺脫夢魘。”（頁 138）所有這一切，都是爲什麼？全屬“莫須有”。

## 一、奇冤不奇，比比皆是

反胡風反革命集團本身就是毛澤東一手遮天，搞的“莫須有”。這個我們存而不論，單說文徹赫恩，他與胡風無任何瓜葛，怎麼能扯上他呢？他在戲劇學院表演系讀三年級，突如其來，吃午飯時，他班廣播員說：“請大家注意，今天有重要廣播，請大家不要離開飯廳，聽完廣播再走。”廣播正文是：“我院表三文徹赫恩是胡風反革命集團在我院的代表人，他是暗藏的潛伏的反革命分子。他們一伙在學校散布反動言論，煽風點火，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攻擊社會主義，反黨反人民。他們組織反革命集團，罪行累累……文徹赫恩是皇帝子孫，快快坦白！”（頁 37）他當然什麼也交代不出來，已到期末，除了考試就是挨鬥。“我沒有組織反革命小集團怎麼能承認呢？他們用疲勞轟炸的辦法，把人分三班輪流上陣，八小時換一斑，不叫我休息也不能睡覺。有一次我實在是太困了，竟然把頭撞在書桌角上，雖然流着血，但我仍然呼呼大睡。事隔幾十年後，我頭部左角還有一個疤。”逼供信、誘供，所有辦法都用上了。一步步騙：先說小集團別人都坦白了，還檢舉了你；隨後說，現在可以把“反革命”三個字去掉，祇承認小集團，就馬上停止開會，恢復你學習、拍戲的權利；再後說，檢查、批判材料都不用寫了，祇寫一張小紙條也可以，承認組織小集團就行；“你看怎麼樣？”“你這不是叫我欺騙組織欺騙領導嘛！一切後果由誰負責？”“一切後果由項目小組負責，決不叫你承擔一點責任，這一點你放心。”“我仍然不能這樣做，這是自欺欺人，良心上也過意不去呀！”……

幾天後，由兩位女同學個別談話：“這樣吧，你寫一張小紙條說是自然形成小集團，一切就完了。”“不行，這是欺騙。”他要他們拿出證據，他們說：“你組織 105 樂團。”“我祇知道上海有個上海交響樂團，沒有聽說過上海有一個 105 樂團。怎麼來一個 105 呢？又是樂團？”“105 就是你住的宿舍門牌號 105 室。樂團就是你經常拉大提琴、手風琴。”仍然宣布：“坦白從寬的大門爲你開着。”（頁 37—46）他們心裏明明知道罪名是捏造的，

却硬是要你承認。任何人，祇要挨過鬥，都可以領略到，整個過程都是這樣凶惡、險惡、邪惡、醜惡、罪惡的！

1957年春天，那位大陰謀家講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號召幫助黨整風，空氣暫時寬鬆，院黨委副書記在大會上宣布：“根據中共中央文件決定，在哪裏鬥錯的，在哪裏平反，恢復名譽。我現在代表院黨委宣布，為文徹赫恩同學平反並向他道歉，歡迎文徹赫恩同學回到人民隊伍裏來。”

隨後反右，他自己硬是沒有上當，始終一言不發，慶幸這回反右反不到頭上了。“沒想到還是把我點出來了：‘別看有的人大鳴大放時一言不發，一張大字報也不寫。那也不行，他內心是仇恨共產黨的。在肅反的時候，我們已經把他揪出來了……’我祇有一個感覺，恐怖的日子又來啦。”（頁55）歷經殘酷鬥爭，最後逮捕入獄；竟把中共院黨委曾經當眾宣布平反的材料，又一股腦兒地都算成他的罪狀。“不但是極右派，而且是反革命小集團的頭頭。”（頁56）

### 二、妻子遭幹部強奸，反被倒打一耙

刑滿，留場就業，娶妻成家。管教幹事李立悟為了強奸文徹赫恩的妻子，調他到百裏之外的地方去勞動三個月。他回來、聽妻子哭訴之後說：“簡直不是人啊！月經來了都不放過，連牲畜禽獸都不如。”（頁117）第二天，他到隊部去找李立悟，原來為消除事情暴露後、他造成的壞影響，把他調走了。隊長警告文徹赫恩：“你少在大家面前嚷嚷，我勸你閉嘴，否則對你不利。”他說：“什麼？共產黨員、管教幹部強奸我老婆還不叫人說話，還有天理沒有？”隊長對圍觀者說：“大家都回去，別聽他胡說扇動！”（頁118）

勞改隊又立了一個假案，誣說是他們夫妻合伙預謀拉幹部下水。對他隔離審查、加重勞動、還要他交待問題。冬天勞動多半是平整土地，用筐抬土。每筐重50斤，要他一次抬四筐。下班後，每晚八點開批鬥會，叫他交代怎樣和妻子合謀把幹部拖下水，怎樣陷害幹部進行階級報復。每次開會就作噴氣式，被揍一頓，打得鼻青眼腫，宣稱，什麼時候你承認、批鬥會就什麼時候停止。就這樣，鬥了他八個月，240天，一天沒拉。“我爭那口氣，死也得頂住，決不屈服！我已經兩次從死神那裏奪回了生命，連死都不怕還害怕什麼呢！我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罪名是共產黨無中生有捏造強加的。如今我

是受害者，又被誣陷為拉幹部下水。難道天下竟有這樣的男人，讓自己的老婆叫別人任意踐踏蹂躪嗎？”（頁 120）所謂死兩次，一次是把他當成已死的人，拉在車上去埋，由于三輛堆滿尸體的車子震蕩，把他甩下來，掉在河裏的冰上，把他凍醒了。“我要不醒，那活埋就是我的命運。”（頁 91）另一次是得了病毒性大葉性肺炎，兩個肺全感染了。醫學書上記載，死亡率高達 85%。

有一次，在鬥爭會上，把他妻子也叫來，旁聽。“你老婆已經承認了拖幹部下水，你還不回頭是岸，爭取寬大處理！”（頁 120）他已被打成血人，還要不停地打，流血過多，昏厥過去了。

每天挨鬥，寫檢查，要他認罪，並深挖犯罪根源。“後來隊裏又出現了新的問題，在伙房做過活兒的河南人趙青山，拿舊報紙卷烟抽。有人檢舉，說報紙上有毛主席像和語錄。他頂替了我，也是天天挨鬥、挨揍，臉經常被打得變形。不到一個月被捕了，判刑 10 年，不久，死在大牢，年僅 40。

### 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這次事件後，我等于扒了一層皮，生命受到重大的打擊，雖然活了下來，但並不比死強多少。”（頁 122）

一天，正在田間勞動，隊長對他說：“你又犯案了，收工後你不能回家。從現在起隔離審查，交待問題！”

晚上開大會，宣布他是現行反革命分子。挨批、挨鬥、挨揍，他說：“你們打我也沒用，我實在不知道犯了什麼錯啊！這半年我規規矩矩幹活，沒有講過什麼話呀。”“你在家講過什麼沒有？”“沒講什麼，每天勞動挺累的，吃完飯就睡了。”

每天繼續批鬥，叫他做噴氣式，他說“醫生檢查過，不能再低頭彎腰了。”“那你就跪着向毛主席請罪！”原來是，謊稱孩子唱錯歌，把“打倒劉少奇”唱成“打倒毛主席”，狠鬥爸爸“惡毒攻擊”。“天天挨鬥挨揍，我也習以為常了。我確實不知道孩子是怎麼唱的，再鬥我也不能承認。”（頁 124）

社會上搞清理階級隊伍，勞改隊也不例外。禍又降臨在他的頭上，要他交待在美國的哥哥的問題。“隊長說：‘鞍山鋼鐵公司來人調查了，叫揭發你哥哥的特務問題。’本來祇有教小孩唱歌一件事，現在又加上哥哥的問題，

真是禍不單行。”（頁 124）

清理階級隊伍進入高潮，每個小組，每個房間都在逼供信，都有打人的聲音，受害者的呻吟、鬼哭狼嚎，形成一片淒慘的恐怖世界。小小林業隊，不過 100 多人，短短三個月就有七個人自殺！一個名叫崔喜德的人，大家看着他跳進水池活活淹死，隊長不準救，說反革命死一個少一個。

每年秋收動員大會，都要槍斃幾個人。鎮壓目的很明確，讓你拼命幹活，接受改造，累死也不敢發牢騷。槍斃三個人後，法院的人點他的名：“林業隊的文徹赫恩來了沒有？”他站出來了。“你今天回去後，老老實實給我交代自己的罪行，否則你的下場就和他們一樣！”（頁 125）

晚上，對他的鬥爭就可想而知了。真是慘不忍睹，慘不忍聞，慘不忍再說下去！讀完此書，感觸良深，感慨萬千，暫且先說這一點吧！

說共產黨肆意懲處（特別是殺人）全屬“莫須有”，這是任何一個受過迫害的人都可以現身為歷史作見證的。我們還可以從任一隨機事件中加以說明和證明。犯人參加大煉鋼鐵，到一個新地方住進帳篷。“大家還未穿好衣服就聽大隊長喊叫：‘大家起床後先集合，一個不能少。’全體犯人站好隊聽訓話：‘昨晚二中隊金 XX 企圖逃跑越過警戒綫，被警衛當場擊斃，大家排好隊參觀現場。’當我走到現場仔細一看，心裏已經明白了。其時金 XX 正在解小便，離警戒綫還有一公尺多遠，這是殺一儆百，殺雞給猴看，該着這小子倒霉。共產黨慣用這種手法，這叫現場教育會，目的是叫大家別想逃跑，這就是企圖逃跑的下場。他們一貫草菅人命，拿人命當兒戲。”（頁 77）

由此可見，殺你，並非你有可殺之罪，而是他需要殺你，一切的一切，都是依他血盆大口的需要為轉移；殺你的理由是“莫須有”的。這就是他自己叫做“無產階級專政”，別人叫做“極權”的涵義。這個恐怖的本質不僅僅是對外的，例如反右，從章羅聯盟到文徹赫恩，一樁樁、一件件，無一不是子虛烏有。其實，內外一然，遠如鏜除李文和、殺 AB 團，近如反右傾打倒彭黃張周，發動文革從批《海瑞罷官》、揪出“三家村”鄧拓、吳晗、廖沫沙、打倒“四家店”彭羅陸楊、直到炮打劉鄧司令部；隨後文革中打倒最大的保皇派陶鑄、擊退“二月逆流”、打倒關王威、打倒楊余傅、批陳、批林批孔、批周公、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直到罪魁禍首死而後已；有一件事不是“莫須有”的嗎？當然，被反對的人，也不一定是好東西，例如鄧小平，從關閉 79 民主牆，到 89 血洗天安門，中經反自由化，批白樺、開除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黨籍，罷黜總書

記胡耀邦、趙紫陽，也全然是“莫須有”。在“莫須有”方面，共產黨、毛澤東比秦檜做得更絕、更蠻橫有理、更理屈詞不窮、理虧氣猶壯。文徵赫恩說：“這是辯證法，橫說豎說都有理！這叫‘常有理’！”（頁 105）

## 附錄八：壯哉奉孝！

### ——讀《夢斷未名湖》

陳奉孝 著：《夢斷未名湖》

勞改基金會出版

奉孝之壯，壯在浩然正氣（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奉孝之壯，壯在意志堅定（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緣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南西北風。）；奉孝之壯，壯在神經堅強（忍受常人難以設想之獄苦二十餘載，即便活下來，精神也會崩潰、會被逼瘋，會成爲神經病；又怎能設想奉孝歷經磨難，竟能神經健全、作爲正常人出獄呢？祇用指出一點，就够讓你吃驚。他和另一個人，一同作爲死囚犯的陪綁；槍斃死囚犯的槍聲響後，另一個陪綁的人就嚇成瘋子了。他却依然故我。這祇是指出一件事來。）；奉孝之壯，壯在“命大撞得天鼓響”（假如一個人能有 13 條生命的話，他的遭遇可以使 13 條生命盡歸于陰。然而他超越過 13 次的“九死一生”，仍能昂然活在人間者，何也？曰：“命大撞得天鼓響”、天佑奉孝也。）奉孝之壯，壯在體魄（不說繩捆索綁、不說非刑拷打、不說超負荷勞累、不說人格侮辱、不說蚊子就咬死過人、不說漆黑前程讓人萬念俱灰……什麼也不說，單說饑餓一項，填于溝壑者，何止個、十、千、百、萬！奉孝不死，乃體魄健壯、生命力旺盛所致也。）奉孝之壯，多了去。如果不是他壯，怎能爲中華民族留下這份毛、共對中國人民、對中國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右派、對右派青年血腥迫害的歷史文本呢？數以百萬計的歷史見證人的慘絕人寰的遭遇，都烟飛灰滅、未留祇字，後人對毛、共的殺人滅口，無可奈何，祇能仰天長嘯、壯懷激烈、萬世唾罵而已矣！

他原是鼎鼎大名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數學系的高材生，以他的天分，

以他的勤奮，以他的興趣，以他的基礎，以他的上進心，十拿九穩應該是升起在世界數學天空中的一棵明星，放出燦爛的光輝，怎奈一代暴君、應該歸類為冷血動物的毛澤東，竟對思想活躍、秉持良知的（不祇）青年學子們進行了絕滅人性的、肉體的和精神的大血洗。從此，英姿勃發、才華橫溢，剛剛 22 歲的陳奉孝就一直陷入跟死神打交道中，度過了 22 個春秋。

在我尚未列舉完的“奉孝之壯”中，每一“壯”背後都有充分的事實依據。由于篇幅所限，有的點到就算，以 13 次死亡為例，至少有 13 個驚心動魄、氣壯山河的故事，端賴讀者自己去看原著好了；更多的是掛一漏萬，如貫穿書中的三大運動、五大改造、反右、大躍進、反右傾、七千人大會、四清、文革，以及其他令人發指的遭遇，我都基本上是付之闕如；又如，有數不清的次數，勞改隊的領導要打他的“反動氣焰”，管教科隋科長下令：“給他砸上腳鐐，打打他的反動氣焰！”（p.70）；又一次，管教幹部下令：“把他關起來！打打他的反動氣焰！”（p.94）……一次一次（中間過程，我祇能從略）、打盡管打，可是，直到他出勞改隊的那一天，難能可貴的“反動氣焰”非但有增無減，反而更形“囂張”。在他剛一平反、就轉回勞改隊辦手續時，驕橫得不可一世的常指導員懾于他“反動氣焰”的餘威，竟嚇得藏而不露。“有人說：‘你平反，也給我們大家長了志氣，你應該找常指導員問問他！’又有人說：‘他早躲起來了！’我祇好笑笑，没法插話。”（p.263）

如果對他作一總評的話，三個字：“硬骨頭”。他最看不起的是軟骨頭：“當年我看了不少右派分子紛紛在報紙上作檢討，檢舉揭發別人的文章，心裏十分反感，盡管這是在壓力下不得已而為的，但中國的知識分子大多數犯有軟骨癥，這是事實。”（p.116）這是他說別人的。他自己又是怎麼做的呢？在反右聲聲急時，他在大字報中寫道：“我是這次運動的組織者，你們對我自然是恨之入骨的，那麼請你們來找我吧！我知道你們會用捏造和無窮推論的方法給我制造罪名的，對於這些我都願意承擔，我祇是希望你們不必再折磨那麼多無辜的人，同時，我要求那些跟我接觸過的人不必再顧什麼情面，把你門所了解我的一切言行全部講出來好了！我絕不會怪誰。我的態度是這樣：如果有人（不管是誰）願意共同跟我把問題搞清楚，那麼我歡迎，如果有人叫我作什麼坦白交待，那絕對辦不到！保守派們！你們不是掌握着什麼權力機關嗎？那麼現在你們就用吧！不必再用什麼批判會的手段來欺騙群眾了。保守派們！雖然看來你們勝利了，但是你們曉得嗎？“五一九”的火種



已經播下了，它遲早會變成燎原大火把你們燒盡的。”（p.336）多麼一副光明磊落、鐵骨錚錚、理直氣壯、俠肝義膽的胸懷啊！這就是陳奉孝。

在獄中，有一次，孫教導員下令：“給他砸上鐐子！”48斤重的大鐐砸上了。“我進一步揭穿他：‘孫得才！今天我這100斤就交給你了，有什麼本事就使吧！’他說：‘好！今天我倒要看看你陳奉孝的骨頭有多硬！’接着下令：‘把他吊起來！’把我吊在了房梁上，連腳鐐子都吊離了地。這還不算，又拿來一塊72斤重的大牌子給我掛在了脖子上。那時我的體重還不到100斤，把120斤重的東西加在我身上吊起來，不到5分鐘我就昏了過去。他們認為我是裝的，就拿烟頭燙我，見我沒反應，知道我是真昏過去了，再吊着已沒有什麼意義，就把我放下來，用一桶涼水把我澆過來。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腰部怎麼這麼疼？低頭一看，左肋上起了三個大泡，我看見那四個紅衛兵嘴裏都叼着烟，才知道肯定是他們用烟頭燙的我，至今還留了三個疤。”（p.154）“過了很久以後，有一天我碰上一個參與整我的紅衛兵，他說：‘陳奉孝！你這家伙骨頭可真够硬的！’言語之中，對我好像還有點佩服。”（p.155）

在當今中國，如果說還有人保持了完滿的人性的話；陳奉孝就算一個。在陳奉孝的人生歷程中，體現出一條真理：除非人全都異化為“非人”，否則，人性就是不可戰勝的。他的人性就是不可戰勝的，雖然這並不是說他已戰勝了共產黨的邪惡，但應該說，在戰略上和戰役上，他用血肉之軀，確證了這種必然性的勝利前景。

人性的核心是良心。他從始至終都是秉持良心待人接物的。他向黨提意見，是秉持（沒有高于）黨的教導，憑着良心、良知、良能，或說憑着正義感做的。對之後的反右、住監也仍是如此。他有漢子做事、有漢子擔，既不自我作踐，也不出賣朋友。他橫眉冷對勞改領導、牢頭獄霸，甚至動手真的要殺他們，但對一個16歲的、沒娘的小勞改犯陳顯，破口罵他：“你是個孬種！膽小鬼！”（p.193）“他罵我，我也不往心裏去，因為他是個不懂事的孩子。”（P.194）他身處困境，却不忘幫助附近的窮老百姓，更不忘救助勞改犯病員。尤其是對一位窮困就業人員（二勞改）老朱的以誠相助，竟感動得他以自己漂亮妻子的身體相報。“她笑着說：‘我和老朱都知道你是好人，你在經濟上經常幫助我們，我們也沒有什麼東西可答謝你的，祇有我的身子……’我說：‘不！這事不能幹！’說着我就站起來要走。她却攔

着我說：‘怎麼？你嫌我不好？看不起我？還是頭一會害怕？你過去一直念書，沒有碰過女人吧？’我非常嚴肅地對她說：‘不！我過去是沒有碰過女人，但我跟朱是好朋友，我不能幹對不起朋友的事！穿朋友衣，不占朋友妻。這個道理你應該明白！’她還堵着門不讓我走，說：‘你放心，他不會怪你的！’我說：‘那也不行！我跟他犯的都是政治問題，不是那些犯亂七八糟的刑事罪的人，你不應該用這種辦法來謝我！我也從來沒有抱着讓你們謝我的想法！’”（p.243）他說：“我並不是柳下惠……不認罪、頂撞幹部、思想反動、愛打抱不平，我是出了名的，這些我全不在乎。但這種偷雞摸狗、男盜女娼的事，從來沒有沾到我身上過。”（P.244）在大節上，本文開宗明義、指出的第一“壯”，孟子稱爲“大丈夫”；在小（？）節上，他也是一塵不染，超過了孔子所說：“未有好德如好色者也。”他無愧于孔孟遺風。現在官員們包二奶、三奶，這是毛澤東遺風，要鏟除之，首在制度，次在官員個人品德應以陳奉孝爲準繩。

憑着良心辦事，憑着數學想事，這是奉孝的兩大特點。在他所有言行中，成也數學，敗也數學。例子多到俯拾即是，我祇舉出他令人哀其不幸時、又令人破涕爲笑的一例。大會批判幾個雞奸犯，人家檢討說是中了劉少奇的流毒，是劉少奇的孝子賢孫。你却叫起真來：“是劉少奇叫你們賣屁股、操屁股來？劉少奇要是知道有你們這樣的孝子賢孫非把鼻子氣歪了不可！”結果，人家雞奸犯沒事，你却被捆起來，拳打腳踢，給打成“貨真價實的劉少奇的孝子賢孫”。何苦呢？大概你覺得他們的檢討，不合乎你訓練有素的數學思維方式吧！你對兒戲也太認真了！

在人格（廣義地說，人格並非專指道德。還有，在哲學上是指主體性；在法學上是享受權利、承擔義務的資格；在心理學上是指個性；在俗話中還指身格、體態。）上，奉孝與林昭難姐難弟，而有所不逮者，乃認識之高度也。“林昭徹底否定那個制度，那個主義，那個黨，那個‘萬歲萬萬歲’的最高領袖，凜然大義，義無反顧。她以‘極權主義’、‘暴政’、‘一個發瘋的黨’、‘僞法院’直呼那不可一世的政權；以‘中世紀的遺址’、‘奴隸社會’定義那瘋狂年代的瘋狂國度；以‘披着羊袍的真命天子’直指那高高在上的暴君；以‘公義’、‘自由’、‘民主’，昭告人類的未來。難以想象，那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林昭使用的那些名詞，相對彼時的大眾而言，還十分陌生。而這些名詞，今天，已經蔚然流行。於是，我們看到，民主，自

由，權利……早在 1957 年，‘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年代，一個弱女子，就已經發出了時代的最強音。”（陳破空：《在〈尋找林昭的靈魂〉討論會上的發言》）

## 附錄九：《格拉古軼事》一書的價值所在

作者張先痴先生，是我的右派好友。書中所述，與我的經歷也是大同小異？對其大作，我倆已在電話上多次交換了意見。現在，再將它形諸筆墨，與讀者分享之。

### 一、總的印象

本書有三種價值：史料價值，研究價值，審美價值。

一曰：“史料價值”。它是其他兩種價值的發源地。史料貴在原始和掘新。雖說炒剩飯也是飯，但畢竟與新飯價值有所不同。所謂“原始和掘新”，表現在三個層面：在廣度上，要做到人無我有，前無古人；在深度上，要做到人粗我細，人淺我深，人表我裏；在綜合性上，要做到在前人單一化的基礎上，進一步系統化。系列化。這本書的史料價值，正好是在這三個層面上。均有所表現。就我的視野所及，尚未發現其他任何右派回憶錄。有如本書提供的史料所描繪出的——共產黨的“謊言與恐怖，兩手都要硬”（頁 298；凡祇標明頁數的，均引自本書）的血腥、狡猾的統治，重疊着知識分子受騙、受苦、掙扎與覺醒的歷程——這樣一個濃墨重彩的軌迹。

二曰：“研究價值”。這就是本書所提供的史料和認識，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表現在理論方面，是對現在人文社會科學的建設做出了貢獻；表現在實踐方面，是對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付出了血的代價。

三曰：“審美價值”。它表現在，從黨語言的虛張聲勢中揭示其虛偽脆弱的本質；從上司的裝腔作勢中揭示其敗絮其中、卑鄙無耻、殘酷殘忍的本性；與此對應，作者遇到了大量的好人（包括幹部）表現出了美好的人性、悲憫的情懷、俠義的心胸和承擔風險的犧牲精神，讓讀者在真善美與假惡醜的強

烈反差中識別美醜，在作者敘述的黑色幽默中享受美感？

與三種價值相應，體現出作者的三種素質。

一曰：直面真實地客觀審視歷史，艱苦韌性地主觀創造歷史，通體表現出“勞改英雄主義”（作者造詞）的本色。此書不僅是作者作為主體用筆寫出的一部勞改史，而且是作者以勞改犯的血肉之軀、心靈之魂作為受罪的客體，參與創造的一部苦難的歷程。因此，作者本身也就成為一部活的史料的載體。一切實際的罪受過之後，現還能寫出這部著作，這也是令人佩服的英雄主義的體現。因為很多同樣經歷的朋友，不堪回首憶往年，這自然是值得同情的。但作者却不畏懼在精神上吃二遍苦，來完成這一自認為的歷史使命。

二曰：兼具史學家的史識和思想家的深度。正如作者說朋友們的話：“我這些歷盡艱辛的朋友，他們每個人幾乎都是一本歷史教科書，更重要的事，這種教科書在市場上絕對買不到，因為該書的內容正是‘謊言與恐怖，兩手都要硬’的統治者，視為足以揭開其卑劣伎倆的實證。”（頁 297-298）也如朋友說他的話：“你是一座寶藏。”（頁 326）更如他自己所申明：“凡史料，必須真實與全面。”（頁 194）

三曰：讓人在嬉笑怒罵中發泄鄙視與仇恨！讓人笑着傷心落淚！讓人在調侃醜惡、贊揚美好中，通過美醜對比以審美，表現出作者創造美與鑒賞美的詩學氣質與才能。

我會把這幾層意思，寓于下面的展開中。

### 二、先從受騙說起，這是知識分子與共產黨關係史的起點。

國內現在有“兩頭真”這個說法？意思是說，一批老革命家，開始參加革命是出于理想主義的真心；晚年用自己一生的革命經歷，因為終於看透了。所以就來揭穿體制內的、用謊言包裝着的種種罪惡。例如跟隨毛澤東南徵北戰的老革命，現在，竟從他們的口中、在公開的會議場合，親口說出：“毛澤東是一個政治流氓！”卒爾又歸于真。

其實，在各個不同歷史階段，即如作者一代，是在共產黨篡政前後參加革命的，同樣也經歷了一個相似的過程。其最大相似之處在于，都是以“受騙”為起點。

## 1、對外騙外

作者在《一群愛國者的昨天和今天》一文中寫道：“在 1949 年這個國家命運曲折的年代，已變成十七、八歲的純真青年，在‘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不知天高地厚的懵懂中，共產黨用建造民主自由天堂的謊言，把我們騙成為它的門徒，我們竟然任其讓暴徒去鬥地主，殺反革命，而我們竟真的以為在從事‘解放全人類’的崇高事業。”（《黃花崗》總 22 期）

1949 年 4 月 25 日，由毛澤東，朱德簽發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茲特宣布約法八章，願與我全體人民共同遵守之。”其中第五章宣告：“除怙惡不悛的戰爭罪犯和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屬國民黨中央，省，市，縣各級政府的大小官員，‘國大’代表，立法，監察委員，參議員，警察人員，區鎮鄉保甲人員，凡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者，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虜，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責成上述人員各安職守，服從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負責保護各機關資財，檔案等，聽候接收處理。這些人員中，凡有一技之長而無嚴重的反動行為或嚴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準予分別錄用。”（《毛澤東選集》四卷本 P.1347）這個約法就是法律。

黃紹竑（右派）在幫助中共整風中，鳴放道：“有些國民黨人對革命出過一些力，但因歷史的關係被懷疑，判了重罪，希望徹底檢查，無辜的平反，歷史上有罪的應酌情處理。”（《人民日報》1957 年 7 月 19 日）這裏說的國民黨人是對革命出過力的，都判了重罪，一般的情況之慘就可想而知了。鎮反中，一汽車、一汽車拉出去槍斃的，大多屬於約法中所謂三“不加”的，據說是一共槍殺了幾百萬反革命分子；而判刑、管制的就更是不可計其數。

著名民運理論家胡平先生的父親是起義軍官，也是被背信棄義的共產黨給槍斃了。本書中又提到，作者夫妻及其好友黃代玉的父親（頁 18）都被槍斃了；“巧遇江青（一個女右派的化名）”一節中，江青的“外公土改時被槍斃了。”（頁 71）被編號取代姓名的右派小學教師“29 號的父親是個惡霸地主，解放後 1950 年被槍斃了。”（頁 94）我掛一漏萬地列舉在這裏的事實，不僅是要揭露共產黨殺人如麻，而且是更進一步指出，即便像選入《毛澤東選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這樣鄭重其事地向全中國、向全世界宣告的文告，都能是一篇一文不值的騙人屁話；其他的，夫復何言？由是可以想見，什麼《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就統統應該正名為“謊言

選集”、“謊言摘錄”了。但僅此，還是沒有歸結到本命題“受騙”上。本書作者（自非單指作者，猶指相當大一批知識人士）受騙之深，已到了駭人聽聞、被逼到喪失人性的程度。錢理群教授對此的評論是：“這樣的‘劃清界限’其實是逼迫背棄血緣之愛，從而越過做人的底綫，是最無人道的。”（序言）

“父親于 1951 年冬在重慶菜園壩槍斃而死，那時我剛剛調到西南軍區土改工作團，住在嘉陵新村部隊招待所裏學習土改政策，第二天就將出發到合江縣參加土地改革，領導宣布放假一天，大家去買點日用品，作好下鄉的準備。我並不知道父親被抓並關在重慶（全家都在成都），我在重慶觀音岩的街上走着時，突然有一輛卡車上面擠滿了五花大綁的犯人從我身側駛過，我不經意地向疾駛的卡車上盯了一眼，似乎我發現車上有一个人很像我的父親而且他正望着我，就在此時下着坡的卡車一個左轉彎就消失了。我的頭向右一偏，身邊的牆上正貼着一張槍斃人的大布告，第一名就是我父親的名字，我當時一點也沒有傷心，因為經過參軍後的一系列學習，我相信共產黨是絕對英明正確的。我是革命戰士，他是階級敵人，在前不久開展的‘民主運動’中，我已誠懇地向領導表明了這一立場。回到住地便主動向我的青年團小組長武角（現在成都，他從四川音樂學院教務長職位上離休下來，我們偶爾同桌搓麻將）匯報了這一情況，並表明我決不會因此而動搖我的革命意志。”（頁 119）

這就說明，因受騙而造成的“精神奴役的創傷”（胡風語），已達到了何其巨且深的程度！上文提到了“認賊作父”，這裏却做到了“認父作賊”？試想，即便是遇到槍斃一個素不相識的人，也會不由自主地產生一股惻隱之心，何況這是“沒有你？哪有我”的生身之父呢？怎麼能“我當時一點也沒有傷心”呢？就算“因為經過參軍後的一系列學習（洗腦），我相信共產黨是絕對英明正確的”；按一般的規律，當時總會有“一點”傷心的，然後經過內心的鬥爭，想通了，“洗”掉“腦”中的那“一點”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情感，最後才能說服自己，跟上“國人皆曰”的：“可殺！”很難設想，受騙到何其巨、何其深的程度，才能做到自始至終？“我當時一點也沒有傷心。”

讓我們再引申下去？如果（實際就是）帶着這樣受騙到六親不認的思想情感，去搞土改，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還會看不慣？做不出？相當多的右派在以前的剿匪反霸、土改、鎮反、三反五反等運動中，就像文革中被打倒的走

資派在反右運動中一樣，大都是充當了積極分子的。從根源上講，是受了共產黨的騙；從自我反省說，應檢討自己是否有投機心理（倒不一定人皆有之）？

我看胡君並沒有投機心理，純粹是受騙？“胡君在地委整風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每期《整風簡報》他都會帶回家裏，我自然會讀到關於我的新聞，我對胡君說：‘這幾乎都不是事實？’看我憂心忡忡的樣子，胡君安慰我說：‘要相信黨是實事求是的？’又說：‘領導上說過，右派祇是思想問題。’——任何一個妻子也不願意看丈夫那張愁眉苦臉。”（頁 18）

“縣級機關的整風運動開始了，妻子反復對我說：‘要相信黨。’”（頁 21）直到“天真幼稚的胡君在得知我劃成了右派之後，立即向她所在的整風領導小組辦公室呈交了一份書面報告，說她以朝夕相處的妻子對我的了解，可以向組織保證，張先痴決不是反黨反人民的右派份子。胡君這個類似殉情的行動，按當今已經進化的漢語詞匯來表達，無疑就叫做‘頂風作案’，第二天她就成為鬥爭對象，就成為右派份子。”（頁 25-26）她忠勇於愛情的精神可嘉，但畢竟表明她受騙已到執迷不悟的程度。一、她迷信黨是實事求是的；二、她自信黨是了解和相信自己的，黨會欣賞她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幫助黨弄清事實，因而也就搭救了丈夫；三、她不僅沒有鳴放，而且從未有過不利于黨的言行。自然的，她想一百想也不會想到自己會被劃成右派？當時的她，當然也不會有後來丈夫“一改 24 年前的淳樸天真”。認識到“反右運動是全國範圍的誣陷運動，是使 50 多萬右派和他們親屬子女蒙受苦難的運動。”（頁 21）

錢教授在“序”中接着說：“但即使如此，也不可能獲得信任，因為在‘革命的邏輯’裏，出生在被鎮壓的‘反革命’的家庭，就必然有‘刻骨的階級仇恨’，也就天生的可疑，甚至有罪？”因此，類似作者這個龐大的社會群體，不管你如何向黨表忠心，從出發點說，都是自作多情；從效果說，都是“瞎子點燈——白費蠟”。誰也擺脫不了一步步地被打入另冊的命運；殊途同歸的下場，就是在反右運動中算總賬。然後去承受人間的生不如死的活罪，或活罪受足、死而後已。

## 2、內內外外

共產黨並不是祇騙這部分人，而是謊言要經常講、反復講，祇讓少數人受騙不行，要使大家都受騙。例如，絕對稱得起根正苗紅，22 歲的縣委宣傳

部幹事朱老弟，受到他的革命引路人組織部張部長的指使，為“陽謀”作綫。“張部長突然找朱老弟談話，態度依然和藹可親，說朱老弟進步很大，他十分滿意，最後希望朱老弟準備一下，明天在全縣的擴大幹部會（即縣區鄉三級幹部參加的大會，50年代的專用詞匯叫“三級擴幹會”），希望朱老弟帶頭作一個大鳴大放的典型發言，以帶動全體幹部的鳴放，最後的兩句至關重要：“內容不妨尖銳一些，反正組織上知道。”（頁272）鬥爭非常殘忍，結局非常悲慘，和作者一樣，判處三年管制？勞動教養？這和我在《還原1957》一書中所列舉的、與我一起勞動教養的一位區委副書記、區長劉漢昌的例子如出一轍。

“鳴放不起來怎麼辦？”他受到區委書記的指使，“帶頭鳴放”，關鍵的一句話是：“我們都是老戰友，這話不必說了，誰還信不過誰？”他和朱老弟一樣，一頭栽進陷阱裏。

在《勞改隊裏的奇奇怪怪》一章中，有一節的題目是“號啕大哭的家伙”。說的是一位工人階級出身、反革命犯王京良，年齡40左右，刑期12年？“受到判刑的打擊以後，王京良謹言慎行吸取教訓，但他從內心並不認為自己真地犯了什麼罪過。有次幹部批評某個犯人，說那人‘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兩天後他私下對我說：‘我經過兩天的考慮，覺得這個現象很正常，因為人鬼之間語言不同，又找不到二者之間的翻譯，不說鬼話怎樣交流？’

“那天，大約在下午4點鐘左右，田野裏的高音喇叭突然奏出了陣陣哀樂聲？我們知道，伴着哀樂播音員用沉重的語調宣讀的訃告，通常是國家某位領導人逝世的消息？遠處發出的廣播聲簡直祇是哇哇哇的叫聲，聽不清每個音節吐的什麼詞，根據當年中央領導人的年齡情況和最近去世的情況，肯定不少知道點政治的人猜測，這次可能是毛主席去世了。祇是沒有一個敢把這個後果嚴重的猜測說出來，原因一目了然，因為毛主席太偉大了，偉大到不該死的地步。

“又過了20分鐘左右，王京良挑着空籬篋來到田坎上，這時他小聲對我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但你祇能蒙在被子裏笑——毛主席逝世了？’”

收工的時候，我們一個個哭喪着臉從中隊部門前走過，我看見我們的指導員一雙眼睛已經哭腫，正在給立在門前的一個大型花園上貼着白色紙花，其他的幹部、家屬也都眼淚汪汪張羅着制作花園的事，總之氣氛十分肅穆。

這時，從隊部院子的中央傳來陣陣呼天喊地的號啕大哭，其聲音之洪亮可以用悲痛欲絕四個字來形容，但其聲調特點似與隊上任何幹部的音色不同？



出于好奇我就多看了一眼，原來這號啕大哭者竟是我夢想不到的王京良，其哭聲、其動作因為誇張而給人做戲的感覺。但是誰又敢揭發他是在偽裝積極？當時我想：“他怎麼可以這樣？”

可是片刻以後我又一想：“他為什麼不可以這樣？”（頁307-308）問題是，怎能證明指導員不是做戲！從這個歷史瞬間的細節，是否可以把文人對共產黨車載斗量的吹、拍、溜、歌功頌德，與王京良的號啕大哭聯繫起來？“貓哭老鼠”，人們常常說起；但“老鼠哭貓”，却是極權社會創造的奇觀。你想：貓死了，老鼠哭個什麼勁兒？難道老鼠還真想要貓“萬壽無疆”嗎？

他說的這事情，發生在文革行將結束，這時我早已解除勞動教養。

我在農場教養時也經歷過這類做戲事件，但卻發生在幹部身上？那是三面紅旗照耀的年代，我們的“政府中隊長”（當時的稱呼），家裏來人告訴他：他父親餓死了。他同着我們兩、三個勞教人員，好長時間含淚不語，最後終於說出：“營養不良咋能這麼厲害？”到底還是堅持了黨性，沒從他口中拋出反動言論，“餓死”二字。

又過了一時，可能沒人提醒他：“爾忘饑餓殺爾父乎？”他就犯了中國人的通病“健忘癥”。在一次訓斥右派份子要認罪服法，認識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時，大講黨的英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時訓話道：“在如此嚴重的、百年未有的、持續三年的特大自然災害面前，全國能夠不餓死一個人，祇有我們共產黨能夠做到；祇有社會主義制度下，夠三個人吃的飯、五個人均着吃，才能保證不餓死一個人。這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提出‘低標準？瓜菜代’的英明所在。在舊社會，即便是好年樂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也是正常的現象？你們憑着良心說一說，是不是？”

有時候是不明真相；有時候是真像早已大白，說者和聽者都知道是假話，可是，假話仍舊厚着臉皮照說不誤；因為說者也有苦衷——“你不信？不怨我，我不說，黨性難容。”這不也是對當今的寫照嗎？

全書以翔實的資料說明，受騙（包括真受騙與假受騙）和騙人（包括黨騙人、人騙人、人騙黨、黨騙黨）；受害（包括身、心、生命、財產）和害人；這便是大陸這臺絞肉機的運轉機制。反右是這方面的集中表現，是一場典型的騙局：耍陰謀是欺騙，把陰謀說成“陽謀”更是騙中之騙？一手遮天？認天下人皆可欺。對此，有三種態度：一是揭破；二是上當；尤其是三，作適應性受騙？這就是所有洗腦的最終結局，不過不明說罷了。如有人明說了，大

家反而咄咄稱奇。作者說他的彝族分隊長“沒有文化，說話也決不會轉彎抹角。有一次他對犯人訓話，教育犯人要聽黨的話，他用手指着牆壁說：‘這塊牆壁是白的，共產黨說是黑的，你們就應該說是黑的。’我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直率這樣勇敢這樣動聽這樣可愛的語言。如果不是因為受這個犯人身份的約束，就為這句樸素的真理，我真恨不得立刻跑上去擁抱他。”（頁 261）這裏的真善美與假惡醜是如此的涇渭分明而又相反相成？分隊長有限的真善美，正好表現在對共產黨無限的假惡醜的率真暴露上。我所以說是“有限的”，是首先肯定了“真善美”，但遠遠不能以此為滿足。因為他沒有文化而又純真，就像一個無知的孩提把娘偷養漢的醜事說了出來一樣。一則他並不能分清真假？善惡？美醜；二則，他這樣說的目的是要你接受和服從假惡醜，不是揭露假惡醜並和它作鬥爭。比起劉賓雁說的“第二種忠誠”，都不可同日而語。可知層次之低下了。總之一句話，是“出于為你着想”要你安于受騙。

如果不受騙，這臺絞肉機就運轉不靈。知識分子若是都如胡適先生那樣清醒，就沒有下面的歷史發展了。可惜遠非如此，連他的孩子胡思杜，也不“思杜（威）”，偏偏要“思馬（克思）”，硬擠進受騙的行列中，被卷入歷史的漩渦；經過認賊作父與認父作賊後，帶着一頂右派帽子，自絕于黨、自絕于人民，自取滅亡，走完了自己的“四個 S”。（潘光旦教授去世之前的最後的日子裏，老友葉篤義來看望他。早年他們都曾經留學外國，取得學位，然後回到中國工作的。潘光旦告訴老友，他自己的生計，從前一直實行三個 S 的政策，這三個 S 是指三個以 S 開頭的英文詞，SURRENDER, SUBMIT, SURVIVE，意思是：投降、屈服與活命。葉篤義說，那就繼續實行吧，繼續投降，繼續屈服，繼續活命。潘光旦說，現在我病重快要死了，我會有第四個 S。我的三個 S 政策要變成四個 S 了，這第四個 S 就是 SUCCUMB。SUCCUMB 這個詞的意思是“滅亡”。（《黃花崗》總 3 期：王友琴《中國知識分子的四個 S》）

### 三、本書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四個 S”作證。

#### 1、受罪分類學

“有一個老態龍鐘的勞改犯對我說：‘說到底，世界上的罪不外乎就是兩種，死罪和活罪。’”（頁 19）這個簡短的概括，可真算是“說到底”了。

除毛澤東一人而外，可以說，勞改、勞教、右派分子、知識分子、全國人民，絕無例外地。都是在這兩種罪的受難下或威脅中過日子。

這本沉重的書却是從談情說愛，“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頁1）中開場的。這也不是偶然的，因為飲食男女在人類生活中，是古今未來、東西南北中、永久普遍存在的現象和溫馨的話題，唯有共產黨能使它變為一個十分沉重而血腥的話題。

男女的婚姻，要受到雙方的組織根據檔案材料給予橫加干涉。作者夫婦經過鬥爭終成眷屬；朋友黃代玉可就悲慘了。因抗不過組織的阻止，竟和她的未婚夫相擁跳河自盡。作者說：“黃代玉用勇敢的殉情承受了她的死罪，却把那漫長的活罪留給了我們。”（頁20）還有更慘烈的，作者在1950年6月下旬，正在人民解放軍二野軍政大學當一名學員，一天在水壩裏游泳，忽聽一枚炮彈的爆裂聲，聞到一股血腥味，同時看到飄來的血絲和肉渣。到上游看到一位20多歲的軍人幹部，來這裏自殺，雙腳已被炸掉。他參軍前是南京某大學進步學生，在“反饑餓反內戰”運動中顯示了出類拔萃的領導才能。一位低年級的漂亮女孩和他墜入情網，她倆一起參軍，分配到一個文工團。“領導”發現了在舞臺上手屈一指的漂亮女孩，就表示了“意向”。組織部門審查女孩的檔案；問題不大。決定由“下級”出面代表組織找女孩談話，說出一堆冠冕堂皇的革命大道理，說服她接受這位跟父親年齡一般大的“老領導”當她的白馬王子。女孩拒絕，談話規格不斷升級，始終得不到關鍵性的突破，最後二號首長親自出馬面談，她亮了底牌，說早有了意中人，戀愛了兩年多並一起參軍。首長的回答令她大吃一驚：“這些情況我們早已知道，你放心，我們會給他做工作。”首長說：“為革命犧牲個人利益。”

就在“漂亮女孩”結婚的日子，這位青年軍官引爆手榴彈犧牲了自己。（頁158）這裏的史料價值在於補寫了人所未寫的“50年代初流行的婚姻程序”，（頁162）同時也提供了一個可以使社會學家學問的空間。如果與共產黨的“養二奶”上掛（毛澤東）下聯（任一貪官）起來，更可資研究其成文和不成文的《婚姻法》。

第二篇《“叛國投敵”途中的點點滴滴》。是他忍受不了勞動教養的遙遙無期和野蠻的肉刑才逾獄逃跑的。一路之上，歷盡了千難萬險，而使他感受最為深刻的是處處寸步難行，時時一籌莫展。“那個年代沒有身份證，社會管理却十分嚴格，不論買車票、船票或住旅館，都必須出示你所在單位為

你的旅行所開具的證明（農民由人民公社開），勞教隊當然不可能為我們出具一張逃跑證明。”（頁 47）“沒有戶口，也就沒有了糧食關係，這意味着國家供應給城市人口的那一份口糧也沒有，雖然一個月就那十來斤，在沒有副食品供應的災荒年代，這點供應糧吃十天都不夠？”（頁 35）他的每一步行動都會受到舉報；國家對舉報的材料和你的歷史、社會關係，都有一本老賬，即檔案。組織、單位關係，戶口、糧食關係，互相舉報，檔案、全民都戴上了銬和鐐，全國就是一座大牢房。

一路目睹了民有饑色、野有餓殍，逼良為娼、逼良為盜，令人慘不忍睹、椎心泣血。他寫的這一部分雖感人至深，但除了關於游民的論述，史料價值很大外，別的已不乏紀錄，而他所寫的勞改的史料，才是本書的重點，也是“獨家舊聞”。

為了讓讀者看清楚這些“獨家舊聞”，我們借用像生物學按界門綱目科屬種的分類方法，來分門別類地敘述于下。但又為篇幅所限，所以祇能花開兩朵祇表一枝，另一枝祇好點到就算，割愛不表：

第一步，把所受的罪分為死罪（自殺、被殺）和活罪；第二步，把活罪分為心靈的（辱罵、批鬥、花腦殼、住黑監、假槍斃）和肉體的；第三步，把肉體的罪分為刑具的和非刑具的（饑餓、超體力的勞動、毒打、武鬥似的批鬥會、屢被推倒跌得鼻青眼腫頭破血流）；第四步，把刑具的分為法定的和非法的；暫停于此，我們來稍加分析：

法定的刑具有銬和鐐：“戴手銬顯然比戴腳鐐高一個檔次，而戴手銬又要分戴前銬還是戴背銬或者蘇秦背劍銬，乃至單手單腳銬，其中還得分為是戴洋銬子（兩手之間有幾個小鐵環那種）或土銬子（以小鐵棍穿插兩銬之間），洋銬子又比土銬子‘舒服’一點（這說法並非崇洋媚外，切身體會而已）。戴腳鐐也得 10 斤鐐、20 斤鐐乃至 30 斤鐐。”（頁 143）如果再和“烟杆”相結合，那就成為法定與非法、兩栖的刑具了。“這種非同小可的刑具叫烟杆，受刑者戴着它就像農村中的老年人嘴裏含着一根葉子烟杆一樣，因此而得名。其實那根貌似烟杆的鐵棒並沒有含在受刑者的嘴裏，而是在他的後頭，那裏有個鐵圈在受刑者的頸項上戴着，鐵圈上有兩個對稱的孔洞，用以和烟杆（鐵棒）一端的孔洞匹配並拴連在一起，並用小鎖鎖上。這時受刑者的手被鐵棒的長度局限着，祇能作橫向擺動而不能做縱向活動，其行動之困難可想而知。那烟杆的長短規格還各不相同，還得看施刑者對受刑者的仇恨深度

而定，愈深則烟杆愈短。我見到最短的才 20 多公分，戴着它就意味着受刑者的手祇能在下巴頰附近作橫向運動。仇恨淺一點的烟杆也可以換成一根長一點的，最長的可達 50 多公分。如果用數學方式表達，可說成仇恨的深淺和烟杆的長度成反比，受刑者的痛苦也同烟杆的長度成反比。這幾種規格都是我目睹過的，據說‘兵器庫’裏還有一種鏈接腳腕和頸項的烟杆，祇要想一下成天屈着腰杆受刑的味道，就令人毛骨悚然，別說親自受用，幸好這祇是犯人間的傳聞而已。”（頁 102）

還有一種床，“床名叫刑床，它是當年那些死刑犯專用的床，全由厚鐵皮制作，分上身和下身兩大板塊合成，上身的兩側各有鐵環一個，專為銬手腕而設計，下身也有兩個就是銬腳腕的了。如果將此床豎立起來，手脚靠在床上，蓬頭垢面的犯人，肯定與在十字架上受難的耶穌相像。這床的上半身可以立起來，使犯人除睡以外還可以享受‘坐’姿，祇是在屁股下面有一個橢圓形的洞，該犯的大小便經由這個洞泄到體外。”（頁 316）

非法的刑具中，“捆，俗稱‘挨繩子’，也是我們的國粹之一。坦率地說，我對這種酷刑深惡痛絕，也許因為我生性頑劣，我挨過的繩子的確不少？棕繩和麻繩捆起來的感覺並不一樣，粗繩子和細繩子捆起來的味道更不相同，如果用細繩子捆緊後再澆水將繩子淋濕，感受更是具體（其實何需澆水，受刑者流出的汗早已將繩子浸濕，本人深有體會）。捆的時間長短則與疼痛程度成正比（但有臨界點，如受刑者已昏死倒地，則疼痛將降為零，施刑者此時用氨水置受刑者鼻下以使蘇醒，頓時其疼痛度又上升為一百，本人終生難忘之體會）。而穿着厚衣服或者薄衣服乃至於打赤脚受刑者感受的麻辣湯又別具風味。在挽繩子的方法上如在胳膊上饒三圈還是兩圈，從頸背後往上提升到什麼高度使受刑者感到最疼、次疼和微疼又另有學問。本人對法律可謂一竅不通，祇是在法律對我反復而長期的實踐中得到一些感受。我見過一個姓何的成都暴牙齒在監捨門邊的一棵樹上被捆了一個通宵，嚎叫了一個通宵；我還見過一個姓蔣的逃跑犯被捆得上身起水疱甚至睡衣脫不下來。總之，這種強力阻止血液循環而給人的椎心刺骨，別說我輩凡夫俗子，就是李逵、魯智深也會疼得在地上打滾，張飛、岳飛也會疼得撞牆跳岩。（頁 151）無怪乎一位老革命說：“日本人、國民黨的監獄我都住過，都沒有我們黨做得絕滅人性。”

### 2、“罪”有應得

作者自我嘲諷地說：“我先後蹲過的看守所、勞教和勞改廠礦企業、農場、醫院、集訓隊總計 11 個，時間共 22 年另 7 個月加 13 天（自反右鬥爭第一日被鬥之日起到收到平反裁定書之日止），他幾乎占用了我充滿活力的青壯年時期。如果用這些歲月讀大學，估計最少可得四個博士學位。我想說的是，由于我生性好學，又被專政了這麼多年，如果世界上某個國家的學術界設立一個‘被專政’專業，而我張某‘攻讀’該專業 20 餘年，還拿不出兩篇有分量的論文，掙個什麼學位，弄一個像模像樣的職稱，那我這輩子真正是白活了。”（頁 101）

我們的這位張先痴先生，用盡自己的青春年華，對別人說是叫做“嘔心瀝血”，對他來說是死幾死、活幾活，應該叫做“斬頭瀝血”，致力於“被專政”的“研究”。應該說，封他為這個專業的博士生導師，是“（他所受的）罪有應得”。你單從張博導講的《刑具學》，即可浩嘆其造詣之深了。他無論講什麼都是系統成套、細致入微、高而可測、深而不奧、他打過交道的專政機關有派出所、收容所、看守所、游民改造農場、天津市火車站政法研究室和正規的勞教、勞改場所；在這些場所最受罪的是集訓隊（也叫嚴管隊）；住的監房有大監房、小監房、最受罪的是黑監房（很少能活着出來）；受的刑罰，已如上所述，不過却存缺了每日每時發生的？就像空氣那麼彌漫的語言暴力、勞教勞改分子受到的、鋪天蓋地的語言侮辱、恐嚇，使他們產生了“抗貶性耳朵”和刀槍不入的“國防臉皮”。（頁 173）

而張博導更突出的特點是理論密切聯繫實際，實踐經驗特別豐富，而且身教重于言教，能夠講得“入骨四分”？這是在國際上？任何別的博導所難以企及的？比如他上面所講“挨繩子”這一課題，就以自己的身體為教具，介紹了生動感人的直觀材料，這就把活生生的現場搬到了教室：

鬥爭大會是在部隊門口一個石板地壩上舉行，指導員講了話之後那位解除教養分子和炊事班長兩位營養過剩的分子，取出一根質地精良的細繩對我實施捆綁，解除勞教分子那段時間因為協助政府懲處各類違紀分子，已積累了相當豐富的捆綁經驗；炊事班長心靈手巧、力大無比、配合得絲絲入扣，很快便達到入“骨”三分的理想境界。不到十分鐘我已大汗淋漓醜態百出，呼媽喊娘丟人現眼，到了這個地步，那位解除勞教分子還去舀了一盞水來，澆在麻繩上，使它進一步收縮，以便入“骨”四分。

多年來，一直使我感到納悶的祇是這類可圈可點、精美絕倫的代表作，常常出自受凌辱的同類之手，幹部們通常祇在一旁欣賞着“狗咬狗”的表演？不知這件事是不是和古代羅馬貴族在角鬥場觀看奴隸角鬥士互相廝殺有血緣關係。總之，我被捆以後，在我兩祇手腕上都留下三圈血痂，後來血痂脫落，又變成三圈黑色的疤痕，歷時兩年多才慢慢褪淨。（頁 46）

張博導循循善誘，引人深思：“他為什麼納悶？”古“文論”有言：“令人驚不如令人喜，令人喜不如令人思。”我們的博導全占了。

作者使此書成為認識“勞改”這個範疇的一部小而全的小小百科。

全書的重點，是敘述勞改（包括勞教）的制度與職能的各個方面，揭露其凶惡、邪惡、醜惡及其罪惡滔天，絕滅人性：凶惡是指殘忍、邪惡是指陰險、醜惡是指無耻。書中所指出的和沒有指出的，共產黨的所有罪惡都是如此。無論智商高下，誰讀到這裏，也不能不說“住監獄真受罪啊”！可是你看：

“那天中午，我們 76 個人出工抬石頭，收工回來時在哨兵眼下依次報數，結果多出一個變成 77 個。值班看守兵令我捫重報，我們祇得列隊再報一次，這樣反復報了三次仍然多出一個。顯然這也是另外一種性質的突發事件，一般的突發事件是逃跑掉一個，由 76 人變成 75 人倒偶有發生，而多出一個則簡直不可思議。因為很難設想有人願意混入勞改隊來受苦受累外加受氣。”

開飯以後，暫緩出工，喚來了中隊長、指導員、管教幹事、生產幹事整套班子，再加上一個排的“戰鬥力”，全部聚集在操場，中隊長拿出花名冊逐一點名，點一個就站一個到另處。幹部、士兵一個個聚精會神，目不轉睛，想看一看究竟會出現一個什麼奇迹。結果硬有一個 30 多歲的矮個子沒有點到名，鐵的事實證明他是一個“偽劣假冒”。

幾天以後，有位實事求是的幹部在教育犯人要知道好歹時透露，那是一個想到勞改隊來混飯吃的農民。幹部說：“別抱怨你們吃不飽，那個農民想吃還吃不上哩，嘻嘻。””（頁 303）

無獨有偶。一個犯人名叫吳大肚。

此人寡言少語力氣特大，幹任何農活都十分賣力，而且是我見到的真正出自內心感謝政府判他刑的人。他在農村常年餓肚皮，他家附近有一個平泉勞改農場，規模龐大，吳大肚仰慕已久，他想進去勞改又不得其門而入。70 年代初，在他家鄉的公路旁，立起了一座毛主席語錄牌，上面鐫刻着奉若神明的“最高指示”。在一個春光明媚的吉日良辰，吳大肚手執一把二錘，用

盡全身之力，對着一塊語錄牌好一陣猛砸，終於將它攔腰砸斷。吳大肚扛着二錘便去公安機關投案自首，最後以現行反革命罪判刑 20 年，拿着判決書等于拿着一張 20 年不致餓死的飯票，他高興得幾乎要高喊吾皇萬歲。

我一直認為吳大肚是個好人，他比前叙那個想混進勞改隊吃飯的矮個子勇敢得多，也果斷得多。遺憾的事，他畢竟祇是一個可憐蟲。不過我又想，如果一個社會使人越來越蛻化成低等動物或者工具，應該遺憾的就不是吳大肚了。（頁 304）

無獨有偶，鼎足而三，再三再四——我的老師是判刑 20 年的反革命右派，他也曾告訴過我“農民混進勞改隊”的故事，我自己所在的農場，也有此經歷。

如果古人說：“苛政猛于虎”；那麼，今人就該說：“極權下的生活猛于監獄”。

一切有志于中國當代史研究的朋友，應該收集利用這些難得的、全面而系統的素材，來研究中共的國家絞肉機，它的構成、運轉和罪惡及其消亡。

### 三、掙扎與覺醒

當潘光旦先生在死前說出四個 S——SURRENDER（投降）？SUBMIT（屈服）？SURVIVE（活命）？SUCCUMB（滅亡）的時候，顯示了先生不甘于四個 S、憤恨四個 S 的制造者，祇是無可奈何而已。你說說，當時誰是有可奈何？別說斷絕了你的錢源（工資），即便你有錢；沒有糧票足以餓死你，沒有布票足以凍死你，沒有戶口讓你死無葬身之地，沒有單位證明信使你旅無舟車，住無旅館；甚至親人劃清界限可以揭發你；群眾專政就可以隨時隨地追查你，扭送你；更別提星羅棋布的、各種名義的公安機關了。我勞教時，有位逃跑者想遠離人世，跑到寺院去當和尚，人家要他的證明信，這一下他没轍了，後被抓回，他告訴了我走投無路的絕望。在這種極權下，除非你要第四個 S，決定自取滅亡，或者說，當英雄、當烈士，否則，祇有取前三個 S，受活罪了。所以，當潘先生其言也哀地、總結自己一生是四個 S 的時候，其實這時產生了第五個“S”，是 SOBRIETY（清醒）的表現了。

“敗”也中共，“成”也中共。一向把別人當成“反面教員”的中共，現在自己起勁地當起了“反面教員”。知識分子被教育得大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反黨覺悟，錢理群教授說：“正是勞動教養將他從一個糊糊塗塗的右派，改造成了一個有自覺意識的真正右派，這大概是改造者未曾料及的。至于本



書提及的勞教時成立的‘列寧共產主義聯盟’的數十個參加者，更是‘網’自身培育出來的‘衝決網羅’的戰士；這是足以使‘網’的制造者膽戰心驚的。”（《序》）現在的知識分子如果不反共產黨，祇存在于如下兩種情況之一：出賣靈魂，或渾渾噩噩。

知識分子的覺悟，人民的覺悟，是“謊言起作用的一般規律”的反應；這條一般規律就是，“謊言不能欺騙大多數人于永遠。”這條一般規律具體到共產黨身上，又體現為一條特殊的規律：

是共產黨充當了盡職盡責的“反面教員”、“把壞事做絕”，才使大多數人識破了它的“把好話說盡”——這條鐵的規律已經為共產黨敲響了喪鐘、是致共產黨于死地的規律。所謂“鐵的”，意即不可抗拒之謂也。

作者每一個常識水平的覺醒，都是以鮮血為代價的。如：“終於從騙局中清醒，斗膽地說出過去連想都不敢想的話：‘我不相信！’”（頁43，過去說“相信黨！”猶如老和尚張口閉口就是“阿彌陀佛”一樣。）“那時我太單純了，也把革命看得太聖潔了。”（頁6，曾為革命理想而大義滅親；曾為愛情理想，一對青年戀人同時加入革命洪流；最後，輕于鴻毛，被吞噬于革命的化身、領導者的血盆大口中。）“1958年秋……我悄悄地對他說：‘我相信我們挨整的事是下面的人幹的，毛主席一定不知道？’而他却用斬釘截鐵的口吻對我說：‘就是他！’說這話時，我忽然發現他的眼眶裏竟閃着淚花。于是這怒吼般的三個字，這怨我麻木不仁的閃閃淚花，對當年幼稚天真的我，真是振聾發聵的劃時代的怒吼。使我銘記至今。”（頁23）經過這次啓蒙，作者提高了覺悟，在“叛國投敵”途中，看到了全國規模的慘景，就認透那些“假話、大話或騙人的鬼話、為了掩人耳目，把自己頭腦發熱、超英趕美、骨子裏想當地球球長而犯下的低級錯誤，推給了永遠保持沉默的大自然，說什麼是‘自然災害’造成的、在連篇累牘的報紙宣傳中，輿論一律地在‘自然災害’四個字的前面，加上‘特大的、嚴重的、持續三年的、百年未有的’四個刺人耳目的定語，為無辜的大自然制造了一樁空前絕後的大冤案。”並且譴責這個“惡魔剝奪了我們幾千萬兄弟姊妹、至高無上的生存權。”（頁42-43）這一認識是很徹底地揭示了毛“骨子裏想當地球球長而犯下的低級錯誤”這一“骨子裏”的本質。這是官方和御用學者至今諱莫如深的。

勞改（包括勞教）隊裏，更是把饑餓當成殘酷迫害的手段。加之于犯人們的，所以了解此情的人，一提到“勞改”，浮腫得如一尊佛爺、骨瘦得像

一具骷髏，這樣兩極的形像，就會出現于你的腦際。在反映這一題材的作品裏，都少不了要說到“饑餓”。本書專辟一章《難以忘懷的吃吃喝喝》，正經八百地談論這一課題，好像是以戰勝共產黨的姿態、數說自己的英雄業績、其內容之全面、系統、詳細、透徹，可以說是舉世無雙。而點睛之筆却在于，它反映了本能的、求生的掙扎；合法的、半合法的、非法的鬥爭；“生存是他不可被褫奪的最基本的權利”（頁 218）的？社會意識的覺醒。

本書所反映出的覺醒，不僅有政治的、道德的譴責：“在回顧毀了我一生的那場運動時我要說，人的生命是那樣的短促，爲什麼要用一些神聖的名義，讓不容易來到人世的人去承受肉體和精神的折磨？”（頁 24）“我抬起腳邊的一塊瓦片，在泥地上寫下‘慘絕人寰’四個大字給肖大哥看，他噙着淚水微微點頭。”（頁 31）“改革開放後，我在一個刊物上讀到一首詩，依稀記得題目叫《陽光，誰也不能壟斷》，如果當年這位詩人知道世界上有個地方叫做黑監，他那首詩也許就不會用這樣一個題目。”（頁 105）“我永生永世地詛咒將無數善良青年置于死地的魔鬼。”（頁 167）

除憤怒聲討以外，還從法律上進行了追訴。本書對當局的無法無天，多有斥責。運動害人，無法無天；草菅人命，無法無天。即便有法，他也可以不執行，或任意執行。這裏還攪着一個政策的問題，“我被依法懲處了 23 年乃至到了‘人之將死’的今天，我仍然爲許多法律問題所困擾：比方說我依法判了刑，却又靠黨的 11 屆 3 中全會的政策平了反，這就意味着政策能糾正法律所犯下的錯誤，顯然政策在法律之上，能約束法律。政策是黨的政策，聽黨的話就是執行了黨的政策，黨叫我幫助他整風，叫我大鳴大放，黨叫我暢所欲言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那時我是個年輕的基層幹部，大政方針從上級布置後照辦，提點意見也不外乎鷄毛蒜皮，什麼縣委書記作報告要避免讀錯別字之類的無關宏旨。然而膽大的法律又竟敢置言者無罪的政策不顧，說我向黨猖狂進攻，判處五年管制送勞動教養。從這一點看，似乎法律又在政策之上……”（頁 45）其實這個問題，在鳴放時期已經有很多人提出？當年 12 月 12 日，《人民日報》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賈潛說：“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們是司法不是司政策。”他因此而被劃了右派，至今這類問題仍是一筆糊塗賬。因爲這不是法律部門或法律學者所能够解決的問題，比如說，共產黨裏有個政法委，雖然從法律觀點說，他什麼玩意都不是，但他却掌握着生殺予奪大權。至于在執行方面，“我國的許多政策法規，

官員在制定它們時，或者簡要地說祇要政策法規裏裝配了某種神秘的儀器，因此，一旦這些政策法規妨礙它的制定者的行為時，或者簡要地說祇要政策法規通過神秘儀器識別了來者是一名官員時，該法規便會朝有利于官員的方向自動‘傾斜’（這是一個妙不可言的詞匯，近年來十分流行）。例如周老太的侄女是一位有頭銜的官員，死人不準運到外地的政策法規在她面前‘傾斜’了一下，救護車載着大塊冰磚保護着的遺體，經數百公里之遙去到了朱老弟的戶口所在地。”（頁 295）

中國的法律不僅殘缺、虛假、殘酷，而且荒唐。即以罪名而論，我敢肯定，就算是法學權威，他也難以知道，什麼叫“夢奸罪”。本書中，以“夢中犯下的罪行”為小標題，寫道：176 號（犯人代號）不過 20 出頭的年齡，甚至還有幾分孩子氣，他暗戀着家住對面的一位豆蔻年華的女郎，一天，他與女郎八、九歲的弟弟說：“昨天晚上我做了個夢，夢見和你姐姐抱在一起在床上睡覺。”往下他就再無其他作為。因為該地方風氣極端保守落後，弟弟當趣事告訴姐姐，姐姐竟做出過激反映，三天後自殺了。法院宣判：“176 號以夢奸罪判刑三年。”（頁 95）

任何法律也不能判瘋子死刑，在中國不僅能，而且在死前還要讓他受足活罪、捆綁吊打、用軍犬撕咬相恫嚇、冬天冷水淋頭、假槍斃把人嚇瘋。真槍斃又是如此這般：

押到主席臺前進行審判的反改造分子五花大綁，每兩名士兵扭着一個現行犯快步進入會場，為首的一個背上插着死囚標牌的竟是杜瘋子，他漠然的表情，說明他不知道即將發生的事對他有多麼重大。他不哭不笑不吵不鬧，時不時還抬起頭來環視一下會場，然後嘴皮子蠕動幾下似乎嘀咕着什麼。擴音器吼叫着他的現行罪狀……最後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按慣例，這種大會的最後一個程序是全體犯人從已被槍斃者的屍體邊繞過，形式上倒和現今流行的對某些人物的遺體告別儀式大同小異。區別祇是此間的目的與殺雞給猴看異曲同工，當然這也得納入苦口婆心的範疇。”

我從杜瘋子屍體邊走過時特意放慢了脚步，我看見他腦袋的右上方已變成一個巴掌大的窟窿，旁邊塗灑着紅色的血和白色的腦漿，還有一團團腦漿和鮮血混合的小塊……左腳上穿着一祇布鞋，右腳却赤裸着，估計是推赴刑場時跑掉的，我知道勞改隊是不發布鞋的，莫非他穿的仍是那年他妻子為他送來的那雙鞋。”（頁 147）

據我所知，作者寫到這裏再也禁不住大哭了好長時間。然而作者還將此比作“對某些人物的遺體告別儀式”，這個含意是多麼深刻，而又又是多麼辛辣的幽默啊！這也是本書處處所包含的美學意味：以寫喜劇的手法來寫悲劇？使悲劇更悲，即如：“要想甜，放把鹽。”

看過此書的許多朋友，如著名詩人流沙河就說過：“此書如寫成小說，就是一部《日戈瓦醫生》，”作者 20 出頭就是青年作家，他當然是會寫小說的，但他考慮到小說是虛構，讀者不會確信這些超出人們想象力的慘絕人寰的事實，會在時鐘的具體滴答裏、在具體的衆多的血肉之軀上發生。本書是歷史，絕對沒有絲毫的虛構，這也是我在一開始就肯定了的，它的史料價值。

另外，作者本想在國內出版此書，所以在書寫上分外自律，不僅言詞上磨鈍鋒芒，而且在追究罪惡的根源上也是淺嘗輒止，祇保留最基本的史實，我舉一例，該書在寫過“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一篇國情咨文中，他的一句話引起我的警覺，他說：‘我們這個時代有許多名詞正被人濫用着，他們把警察統治稱之為解放……’。”在這話之後，特別又加了一句塗上保護色的話：“這話可能是對他當年的政治對手蘇聯(?)說的。”(頁 53)從這句“此地無‘中共’三百兩”的話裏，即可窺見一斑：此書決不會有“直指中共的”特別是危及現政權的、過激的東西，至多是“同着和尚罵禿驢”。就這，為在國內出版此書，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甚至有社會影響力的名流相助，也無濟于事，所有出版社都以“上級通不過”而一一告吹。由此可證，某些人士散布的“國內言論尺度已經放寬”；祇是自欺欺人之談而已。更甬說，前時發生的禁書風波了。

面對現實，加以展望，中國的法治道路，中國法學的學科建設，簡直讓人望而却步：表現在海內外的民間方面，則是抱着幻想。企求中共建立與健全法治，而罔顧中共的命根子則是人治、黨治，所以表現在官方方面，盡是欺世之談，如俗話所說：“把孩子哄得不哭了算拉倒。”雅一點說，就是讓你永遠“望梅止渴”。

我們喜見右派作為一個群體，已經有了反黨的自覺。更喜見，如人們說的：“若按 1957 年的標準劃右派，全國就都够當右派了。”我不知，有没有一個勇士站出來，拍拍胸脯：“我就不是！”

常言道：“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可共產黨却在 50 年間就把國人“樹”為右派。能說這不是大躍進嗎？不過，這個大躍進的後果，不是餓死 4,600

萬人民，而是為共產黨自己“樹”了千百萬個掘墓人。

我們應該記取的歷史教訓是，右派鳴放中的言論，不管尖銳到何種程度，大多是旨在完善黨、完善社會主義，大多是補天而不是反天，結果證明，這就如同完善銹鏽、完善陷阱、完善癌細胞一模一樣。有了這個教訓，就要認識到，你向他要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就是緣木求魚和與虎謀皮。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患；與虎謀皮則會果腹虎皮中。從中共那一方面說，他賞賜你民主，祇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我剛進入勞教農場，就有一位右派告訴我：“原來毛主席說，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後來在報上發表時，改成民主祇是手段了。就是說，讓我們鳴放祇是要手段。”所以，祇要你聽到共產黨說要擴大民主，不管他說民主是個什麼東西；你就認定他‘不是個東西！’是他在耍手段，他萬變不離其宗的主意是：“我們就是要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那我們該怎麼辦呢？這個問題，說復雜是真復雜，但如果簡單些說，那就是，你想一想該怎樣對待銹鏽、陷阱、癌細胞；也就是對“該怎麼辦”？（去掉？）做出的回答總之是，與虎謀皮則會後患無窮；君不見維權民衆、維權律師、暴露實情的記者、上訪者、法輪功、家庭教會、異見人士……前僕後繼、紛紛葬身虎皮之中乎。

現在的覺悟，已經聚焦在這一點上：你是繼續與虎謀皮呢，還是把毛澤東的話反其道而用之，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

“我們要學景陽岡上的武松，在武松看來，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2011.7.19）

## 附錄十：理達：讚辛灝年先生的《〈還原1957〉序》

當我打開電腦，在開始閱讀辛灝年先生為魏紫丹先生《還原1957》一書作的序言時，我的心就立即被序言的每一個文字，每一個詞語，每一句話語，每一段文章所激惹，所燃燒！我再也不能平靜，我再也不能無心餐飲，我再也不能入睡，因而在這萬籟俱寂的子夜我從床上坐起來，開始向鍵盤敲擊我的心房裏的“汹涌澎湃”……

什麼是嘔心瀝血，什麼是鞭辟入裏，什麼是有血有肉，什麼是聲情并茂？我七十一歲的小老嫗，平生第一次真正體味到了！當我看到魏紫丹先生上綫時，我激動得給他打了兩行字”：

**辛先生的序太棒了，  
簡直像我寫的了！**

您看，理達激動到不知自己是老幾了！也說明辛先生的序已經融化成理達自己的心聲了！

辛先生當頭就寫“魏紫丹教授是一個‘右派’，而我是一個‘右派之子’”。這真是開宗明義，直擊主題，再也沒有這樣的開頭簡明扼要了！理達也想趁此機會加上一句“而我是 1955 年肅反運動中被逼跳樓自殺血濺漢口中山大道的‘貧農’兒子的獨生女兒！”當時我是上初中二年級的 14 歲的中學生。我想辛先生可以認為我有資格靠在“右派”和“右派之子”的後邊吧。

接下來辛先生將《誰是新中國》的作者和《還原 1957》作者的關係總結為“順途同歸”。因為理達幼稚而頑劣，不學而無術，沒有《誰是新中國》和《還原 1957》這樣的劃時代的巨著，因此，不敢厚着臉皮往前“附會”了，但我起碼是“同是天涯淪落人”，“同是海外流亡者”！我在辛先生這段後的感言如是說：“作者和序者是同一戰壕的錚錚戰友，《誰是新中國》的作者非凡，《還原一九五七》的作者了得！”

下一段辛先生非常自然地引入了兩位哲人的相遇、相識、相知、相敬、相親依然是《還原 1957》之淵源！《黃花崗雜誌》為魏紫丹先生提供了一個聲討毛的罪惡的平臺，而辛灝年先生通過《還原 1957》發現了一個情致超然、文筆生動、思想深邃的“老右派”，辛先生當年就為《還原 1957》寫下了如此的按語：“右派分子魏紫丹教授的新著《還原一九五七》一書，無疑會成為一部真正還原了‘一九五七’的學術著作。其充滿著學術精神的嚴密論證，特別是他對馬列主義、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毫無戀情和決絕之慨，猶將他對‘一九五七’的痛心研究和艱苦追述，推升到了一個更其純淨和高遠的歷史境界……”（《黃花崗雜誌》2005 年第 1 期）

如此的精到、精道和精辟——驚倒了筆者我！你能够品味出辛先生用詞的精當和深邃嗎？“學術著作”、“學術精神”、“嚴密論證”——辛先生幾年前就以其賢哲的慧眼將《還原 1957》的理論價值做了精準的定位！而“毫無戀情”、“決絕之慨”將魏紫丹先生的“錚錚鐵骨”和“鏖戰風貌”，便

被表露無遺!“痛心研究”，“艱難追述”則是祇有“志同道合”、“知音知己”才能深知《還原 1957》的作者是如何用飽蘸千千萬萬右派血泪的戰筆在書寫那段歷史真相的！辛灝年最懂魏紫丹，他也是以‘痛心和艱難’去讀、去評、去序、去還原《還原 1957》的！

我們的際遇是如此的相似乃爾！理達不由得又要“附會”或“附庸”起來。那是 2009 年，我在美國聖路易的中國超市順手拿取了一份《大紀元時報》，在回家的路上，美國先生開車，我如饑似渴地抓緊瀏覽，忽然《我劃右派的全過程》赫然入目！一口氣讀完，回到家立即給作者魏紫丹先生留的郵箱發了一首“言絕由衷”的詩篇《深深震撼》，表達了筆者對“情致超然、文筆生動、思想深邃的“老右派”（敬請辛先生原諒我的“公然抱茅入竹去”的剽竊行爲，因爲我太欣賞您對魏公的描述了！）

不過發信的當時，就有“如石沉大海”的預感，覺得人家魏紫丹，大手筆，大右派，大教授，大人物，絕無暇來顧你這無名小卒的什麼“詩篇”，什麼“感言”！你就“閑拋暗灑”，“自作多情”吧！

果不其然，真的如石沉大海。不過理達既沒有希望，也就沒有絕望。十分自信一旦魏紫丹先生看到“拙詩”，斷然不會無動于衷！

幾個月後，一則短信出現在 lucklida@hotmail.com 信箱中：

李愛玲（本名）女士您好！

我們是同輩人（因我去信稱呼他爲長輩），又大致是同命運的人，所以我們的心是貼在一起的。我所以遲誤這麼長時間才回您信，是我那個信箱于 6 月 1 日突然無故消失，今有朋友幫我又激活這個信箱才得以見到您的信，并立即回信謹表衷心的感謝！李白鳳老師我們同在五二農場勞動教養。這封信不知您能否收到？如收到，就用此新信箱回信，那個信箱怕仍會出問題。我的電話號碼 630 - 262 - 9828，今後我們可以通話。我會從網上去尋找您的大作，認真拜讀，作心的交流。

祝您家庭幸福、生活快樂、身體健康！

魏紫丹

原來魏先生的信箱因故障打不開了，幸虧有高手恢復了信箱，果然不出“聰穎”的理達所料，魏先生絕不會無動于衷，而且從短短的兩行文字中捕捉到“以心的交流”而且賜予電話號碼！

理達如獲至寶，就如 1957 年以一個 16 歲的女中學生在河南大學大禮堂

聽胡耀邦報告時激動得她毅然向高高的講臺和矮矮的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遞上“我是否也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的寸方紙條一樣的“如石沉大海”的心情，而不到一周就有代表第一書記的開封市團委李秘書專門來學校看我這個中學生的“驚人之舉”。李秘書給了我三句指引終生的心語，支持我，一棵快死的幼苗，繼續掙扎成長，堅持初中畢業，堅持高中畢業，堅持大學畢業，堅持鄉村女教師十二年“畢業”，堅持中專教師八年“畢業”，堅持大學二十二年教授“畢業”，又挺住了1996年遭遇喪夫之痛的滅頂之災，2001年堅決支持女兒留學美麗的澳大利亞，2002年六十一歲的理達首次踏出國門，2005年上帝派了美國吉姆先生來加拿大找我，2007年11月2號，鬼使神差地讓美國駐卡爾加里領事館的簽證官給了我踏上美利堅大地的簽證，理達、理達、理想目標一定到達的理達終於踏入美利堅自由王國！

這不，又是一篇《我劃右派的全過程》“使我發現了情致超然、文筆生動、思想深邃的老右派”！而且在互相交流思想和閱讀相互的文章中成了情同手足的“知音”。

回顧七十年的生命歷程，竊喜由于自己總是“情之所至”造成的“勇敢精神”“冒險行爲”和十分自信的“文筆”，使我邁出了幾個關鍵的人生步驟。而今大言不慚的“很像我寫的！”出口狂言又使我可能會拜識久仰的、爲還原辛亥革命歷史真相的勇敢鬥士辛灝年先生了！

魏先生欣賞我的單純，聰慧和文筆，在他的鼓勵下我開始寫平生第一部回憶錄《愛玲回眸》，看了初稿的同學和親人都說好看，如今還在孕育之中；而另一部2011年收筆的《風景這邊》，今天可巧收到了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的即將面世出版的信息。呵呵七十一歲第一次發稿，就收到了如下的評價：

李老師：

您好！

感謝賜稿。我們相關編輯已拜讀了大作的部分內容，大致了解大作的基本情況，經討論，研究，處理意見如下：

大作主題鮮明，格調很高，文筆流暢，情真意切。經初步審閱，可以公開出版發行。

閱讀魏先生的《還原1957》，認爲魏先生思路很清晰，思維有邏輯，親歷有事實，推理有高度。理達深深明白，寫這部沉甸甸的著作，對一個近八十歲的老人是多麼的沉重的任務和歷史使命！對他來說，他鄙棄作蠟炬、



“成灰汨始幹”，寧願學春蠶、“到死絲方盡”；為歷史留一份見證，就是他夢寐以求的人生價值之體現！

于是，情同手足的魏老接受了我的忠告，暫時放棄了寫小說反映這個時代，一心一意認真、細致地整理《還原 1957》的書稿。期間魏老由于痛風的不斷發作，受盡難以忍受的疼痛。他說，痛風一發作，疼得倒地打滾兒，有一次油鍋在火上炖着冒烟，都爬不起來去關火。即使如此，魏老依然堅持寫作！我們肩負的歷史使命向我們發出警鐘——

賢哲雙肩擔道義，  
偉岸身軀豈容倒！  
慎防積勞成惡疾，  
悔不當初逸代勞。

魏老是有濃厚的文學興趣的。下面是，“右派兒子”以極其親切輕鬆的語調“娓娓道來”與右派“父輩”之間的文學緣。是“右派”發現了“右派之子”早年在國內時文學苑裏的瑰寶，以十分欣賞，十分愛憐，十分推崇的眼光對其作品做了高度但恰如其分的評論。而辛先生受寵自得，幸福滿滿地追述了魏老的贊賞，從而對自己今後重走文學之路而恢復了自信與興趣！這是父子之愛，這是同氣相投，這是命該如此！理達也正是通過魏老的推薦有幸閱讀了早期的高爾品（即現在的辛灝年）的！過去祇聽說過此高人，祇知道他也是在武漢，祇知道他是一名異數。自從魏老的力薦和講述，從高爾品到辛灝年、從魏老的《一支文革中的青春之歌》對《華采》的力薦、從《誰是新中國》到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辛灝年先生的動態，直到今天的“天下第一序”，理達同樣經歷了“遇”、“讀”、“識”、“羨”、“敬”和今天的“狂愛”的歷程！為什麼說“狂愛”，還記得我給魏老在網上的留言麼？“我正在閱讀辛先生的序，棒極了，好像我寫的！”如此的大言不慚！如此的口出狂言！可見“知音”、“同好”、“共鳴”、“心聲”這類詞匯之所以長存不是沒有道理的。理達小老嫗怎能與辛灝年并駕齊驅！“惡俗不堪”的我理達，怎能大言不慚地說辛灝年大手筆的序“簡直像我寫的”呢？皆是因為太贊賞這個“序”了！被這個序醉倒了！現在冷靜下來，魏老對我的口出狂言不僅沒有嗔怪，反而對我這一時的發昏，說：“你這樣說話，我很高興。我希望你寫出文章發表！”這對理達是無原則的放縱，還是我們真的是“同聲

相應、同氣相求”啊！

在這裏我要說：我敬愛你們：右派之子——辛灝年！老右派——魏紫丹！我也敬愛我自己——被肅反迫害跳樓自殺貧農兒子之女李愛玲（即理達）！

尤其要強調的是辛先生還要“對魏紫丹教授的這部巨著，我將有一篇實實在在的專論會發表出來。”啊，辛灝年先生啊，您太有責任心了！您太不辭勞苦了！那該是一篇更加完善和登峰的專論！我一面極其期待您的專論的誕生，又一面極其擔心您的健康會因更加登峰的論述而遭到損害！矛盾啊！這篇專論是辛先生“自找”的！是辛先生‘自討’的！他是自告奮勇地充當《還原一九五七》的鼓吹手，他是心甘情願地為《還原一九五七》而含辛茹苦、茹苦如飴的！我不能再什麼庸俗的字眼來褒貶辛先生了。祇想道一聲：“辛先生，保重！”

在介紹了《還原 1957》的來龍去脈，在抒發了右派父輩與右派兒子之間的政治血緣之後，辛先生‘書歸正傳’，以一位賢哲的眼光對魏老嘔心瀝血而成的巨著即將出版而做出了令理達又要叫絕的評述：

他經過不懈的努力，用“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的精神，特別是懷着對歷史忠貞不二的意志，懷着對在“一九五七”年所有遇難者的痛苦深情，懷着他對我們民族的拳拳之心和深沉期望，終於就要出版他的巨著《還原一九五七》了。

面對如此的評價，理達除了用‘叫絕’二字，還能如何呢？辛灝年懂魏紫丹。讀者請讀下面一段的精辟之論吧：“這部巨著的不凡之處，就是它確實達到了那種‘純淨和高遠的境界’，而此一境界的三個明顯特征，就是——‘還原的學術性、還原的真實性和還原的真理性’。它的理性，它的高度，它的歷史價值，它的哲學豐碑都被‘還原’的學術性，真實性和真理性以高屋建瓴般地定位！”

大家好好去研讀辛先生對“還原”的三性的述說吧！

辛先生對魏先生靈魂做出下的一段評價：“魏紫丹教授多年來矢志于《還原一九五七》，沉潛于《還原一九五七》，皓首窮經于《還原一九五七》實非為一己之痛和一己之冤。他如赫爾岑一樣，‘向后看，是為向前進’，是為我們民族的出路和前程。誠如他在‘還原’一書中談及中國前途的慷慨陳詞，就是：‘在宏觀上，革命之外無出路！’”

辛先生最後的精要是：

一九五七，是我們民族的一個巨大悲劇。真正地還原這場悲劇用血腥所包裹著的真實性和真理性，才可能使我們的民族擁有未來。所有在“誠意正心”地還原着一九五七者，都將功不可沒。而魏紫丹教授却以其卓犖不群和堅如磐石的還原精神，以其還原的高度、廣度和深度，實為今人和后人留下了一位“卓越右派”的楷模，一部浸透著還原意志的巨著。

辛先生啊！您高度贊揚“還原”的三性，您刻骨銘心“還原”的三度！這實在是不刊之論！《還原一九五七》的確是一部“浸透着還原意志的巨著”啊！

網上看到謝功果先生這樣地評論辛先生：“從文學家變成了歷史學家”，他這本書《誰是新中國》“是理的匯聚”，也是“情的凝結”。

我對謝功果先生對辛灝年先生巨著如此精準的評價，祇有“擊節三嘆”，自愧不如！是的，辛先生的“序”何嘗不也是“理的匯聚，情的凝結”！其實，理達認為這既是辛先生的品性，又是他必然的行文風格！

理達在此又要附會：許多網友的評論，都與我心有戚戚焉。茲介紹一個網名“老共黨”的，對魏老的論文《〈矛盾論〉與論矛盾》的評論——2010-02-26 老共黨：

所謂“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純粹是毛澤東自編自話的詭辯！怎樣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標準是什麼？誰也不知道，標準在毛澤東嘴裏。他說什麼就是什麼。他要整你，黨中央副主席就成了敵我矛盾，他要保你，可以“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一切都按需要！！毛澤東純粹是政治流氓、市井無賴！！一個借助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造成的國難趁機奪權的痞子而已！！

中國需要魏先生這樣的理論家，系統的、全面的批判毛澤東的屁話、鬼話！！

沙鷹就着魏老的《〈實踐論〉為什麼是反科學的？》作的評論：評論人 [沙鷹] 發表時間：2009-02-27

中國曾出版過所謂雜文八大家的著作，這八大家中看來邵燕祥和魏紫丹先生的思想境界是愈來愈高了，尤其是魏紫丹先生，簡直是大徹大悟了，清醒之程度似已達巔峰。——沙鷹。

我早就認定紫丹的立論高，2010年2月26日，理達的日記是這樣寫的：  
《自信》

紫丹立論劃時代，  
達具慧眼第一人。  
望君自信向前走，  
高論定將震乾坤！

（爲找這首《自信》詩，我去年費了很大周折沒找到，今天我終於在兩大本日記中細細搜尋，終於“擒獲”，這可以展示理達對魏老的立論像辛灝年先生一樣，很早就有了“劃時代”的評價，當然也是爲了顯示理達有“非同凡響”的慧眼真睛。）

此刻，理達激動得一塌糊塗必須收筆時，我要送辛灝年先生一首：

《絕響》

魏公“五七”勝還原，  
灝年絕響做序言。  
理達狂喜魂出竅，  
皆因情真同志緣。

注 1：李白鳳爲河大中文系知名教授，剛在我們女中做完精彩的報告即被打成右派。

2：本文，以及文中的“老共黨的評論”、“沙鷹的評論”，均來自阿波羅網站。

### 附錄十一：我劃右派的全過程

日本投降後不久，我們這兒的農村裏，能跑出來逃活命的地主都跑到城裏來了。這些流亡地主，家家都是共匪流血鬥爭的受害人和見證人。滿城彌漫着咬牙切齒的對共產黨的憤恨。那時我十三、四歲，正在上初中，課上課下，言談話語，三句話離不開揭露土改中血淋淋地套着牲口拖死地主，上“望蔣臺”摔死地主，燒紅的鐵環套在地主的頭上等等慘絕人寰的話題。對此，我在作文上寫道：“毛澤東是國家的敗類，民族的蠱賊，屠殺人民的劊子手！”

不期，時至今日，60多年過去了，驗證這一結論竟用去七千多萬條中國人鮮活的生命。

“解放”那年，我剛進入16歲，求知欲之高不讓食欲。我大口大口地吞食新知識，狠命地學《新民主主義論》、《人民公敵蔣介石》，甚至于啃斯大林的《列寧主義基礎》、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半懂不懂，在強烈的新奇感支配下，生吞活剝，好像在吃盡命食。再加上聽報告，參加暑期青訓班學習《社會發展史》等唯物史觀知識。初經洗腦之後，貌似“恍然大悟”，啊！原來真理在共產黨這一邊。我雖信不過共產黨把一切鐵證如山的罪惡都歸之于“國民黨的反動宣傳”，但說是土八路胡作非為，毛主席不知下情，我却認可。時日順延，中毒益深，後來參加工作，當了教師，直到反右時，我都是竭誠擁護人民領袖毛主席的。但偏偏是，他老人家發動的反右運動，“鍋裏下了我的米”，而我又偏偏不願意“吃不了兜着走”，這就展開了一場人家反我的右派、我反人家的反右派，在寡不敵眾的情勢下，垂死掙扎了八個月。雖未獲勝，也未認輸，算是與陣地共存亡。

1957年暑期，經過兩天學文件，接着就是傾盆大雨，我的大字報被貼得裏三層、外三層，花紅柳綠，我真的陷入了滅頂之災。幸好有我的好友、剛出大學門的王豪杰（教歷史課）給我打氣，說：“振作精神！鋤他們的毒草！”因為他是幹部子弟，有正義感，所以話說得直出直入，毫無遮攔。到底他老子是多大的幹部？他没告我，祇是說，他父親曾親自跟聶榮臻說過話。在他眼裏，好像反右運動就是要鋤他們的毒草。學校黨支書梁乖真及其麾下的專吃政治飯的狼一群、狗一伙，統統都是邪惡、凶惡、醜惡之輩。他為他們起了別有一番趣味的綽號：熊包（狗屁不通）啦，一灘兒（鼻涕）啦，河漏（一種食品，方言諧音“何辣！”）啦，長舌婦（溜溝子）啦！……

我拿着鋼筆，在別人貼給我的大字報的空白處，批上我的回答：

問：“你為什麼為儲安平の‘黨天下’搖旗吶喊？……”

答：“我祇說過他當過《觀察》的主編。”寫時筆尖朝上，寫着寫着就下水了，我又換了一支鉛筆。

問：“為什在章乃器受到批判時，你對梁書記說他‘心安理得’，不是要向黨示威？你還說他知識分子的骨氣令人佩服！”

答：“我才是道聽而途說呢！是在一個象墨水一樣黑的夜晚，遠遠地聽到有人如此說。”

對貼在袁鴻儒老師辦公室門前、那棵歪脖子樹上的大字報，我祇能腹誹了，因為鉛筆無法在那上面畫道道。貼在我鼻子上、正對屋門口的那個壁報架上的大字報，讓我開門見山：

“魏紫丹！你爲什麼要爲葛佩琦說‘殺共產黨的頭’拍一手一稱一慶？”

答：“我是在讀《人民日報》，不小心讀出了聲音。如此而已，並未拍手！”鉛筆又折斷了！我把它摔在地上，恨不得再踩它一脚，心中不忿，暗自嘟囔：“不是驢不拉，就是磨不轉！不是鋼筆不下水，就是鉛筆又折斷。”

……

9月2日我被宣布：“確系資產階級右派分子。”9月8日，在市委機關報《大眾生活》上，標題赫然入目：《魏紫丹是大右派分子章乃器、儲安平、葛佩琦在我市的應聲蟲！》尤其其中白紙黑字寫着，說我猖狂已極：“魏紫丹拿着報紙，學校有五個黨員就在四個（！）面前說：‘要殺你們共產黨的頭！’”甚至我在中國科學院出版的《數學通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也給說成是抄襲王九丹（河漏）的。爲鼓舞左派的鬥志，他們在鬥爭會上首先宣讀報紙，並宣稱，這是歷史性文獻，用以慶祝他們的勝利，打擊我的狂妄氣焰。報道通篇可以用三個詞概括：“捏造、歪曲、誇大”。聽過報上的胡說八道，我就壓抑不住反駁的衝動：“即便我是特務、反革命，但我祇要不是神經病，也就不會跑到你們面前去喊：‘要殺你們共產黨的頭’，難道我活膩歪了、要找死？我才24歲，還不想夭折。”我氣得上氣不接下氣，“這樣說吧，咱們對對質，我在你們哪一個面前說過這話？請舉手。”結果“五個黨員”面面相覷，都爭當“五個黨員”中（我沒給他說過的）的那“一個”，而不當（據說我給他們說過的）那“四個”。我想，你們真是膽大妄爲！到底要把黨報當作何物？你們這樣抓住鼻子不顧腮也好，越明顯地違背情理越好！禿子頭上的虱子反而好抓，要是似是而非，糾正起來反倒費時費事。

有梁秉真的一個狗腿子，名字叫做“賣引弟”（賣這個姓不多見，名字的意思，她曾告訴我過，是她父母希望在生她之後引出個弟弟來。她是生物學教師），她在給我提意見時，我却正在盤算着如何給《大眾生活》以有力的回擊，當時心不在焉地瞥了她一眼，沒想到嚇得她猛一抖索，隨後又壯着膽，氣勢如牛地聲稱道：“你瞪我；我也不怕！”

散會後回到辦公室，我模仿着列寧雄辯的風格，給報紙去了一封有根有據、得理不讓人的聲討信。我的居心，就是要激怒它！有理咱就辯，反正我

成竹在胸，真理在握，既然打破頭就不怕扇子扇。後來我的同學（任報社文學總編輯）向我報信兒：“報社接你來信後，很被動，說：‘稿子是下面他們支部送來的。’”

我知道他們靠謠言吃飯，底氣不足，我相對占精神優勢。但我認為必須講究策略，方可設法轉虛勝、為實勝，否則，就有可能把好酒做釀成一缸醋。于是我把《毛選》中關於戰略、策略的論述，反復學習。把心得集中到一點就是：在戰爭的展開中，敵人一定會犯錯誤的；要密切關注，抓準戰機，給敵人以殲滅性打擊。我又憶起《孫子兵法》上說，敵人不犯錯誤，你就戰勝不了敵人；你不犯錯誤，敵人也戰勝不了你。祇有敵人犯錯誤，而你不犯錯誤，你才能戰勝敵人。我想，也就是，一個跳蚤不犯錯誤你都抓不住它。由于我反擊《大眾生活》，旗開得勝，嘗到了敵人犯錯誤的甜頭，就故意進一步激怒敵人。對他們給我的栽贓、胡編亂造，我拍着桌子聲討他們，寸步不讓，真的，不是他們跟我拍桌子。好像這也正中他們的下懷，假如我要老實交待，獲得從寬處理，反倒不解他們的心恨。他們以為現在捏造的材料，已足夠我吃一壺了；我却內心也在竊喜，看我把你們告到市委，你們這個彌天大謊怎麼給你們的上級交待？別說違反政策就意味着破壞運動，光說你們這一副副扯謊撂炮的嘴臉公之于眾，看你們今後還怎樣做人？更何況，我還把材料告到了中共中央？于是乎，我們交戰雙方都陷入對對方的幸災樂禍，和自個的興高采烈中！

在這樣硬碰硬的鬥爭中，犧牲慘重，尸體狼藉。我把筆記整理了一下，意見（即我的罪狀）已經超過 100 條了。上級如來調查，雖能說明他們不按政策胡亂來，但一條條落實，已經不勝落實了。如再繼續惡性增長下去，更對我不利。我就又從《毛選》中搬救兵。用了許多戰例說明，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要先退一步。于是，我第一次在鬥爭會上逆來順受，隱忍守志，並誠懇地檢討自己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驕傲自滿情緒，企圖對他們造謠的勢頭釜底抽薪。但也沒忘記要貫徹“積極防禦”的戰略思想，不能放棄有利形勢下出擊一下的機會。我檢討時還刺了狗腿子一下，說：“我對賣老師深感內疚。大鳴大放本是為了整黨，人家一不黨、二不團，祇是在爭取火線入黨；大家都看不起她，我認為這不對，她好給領導匯報同志們的缺點，安的却是好心眼，她是要靠攏黨和幫助同志。我曾如實告訴她，‘大家討厭你好打小報告’，但我却未如實告訴她，別人都說她是個‘無耻的女人，溜溝子的巴

結三兒’。這是由于我小資產階級愛面皮，才幫助同志不徹底。”她脫口而出，一口否認：“你從來什麼都沒給我說過！”我也立即回答：“你別包庇我，我都認識到了，你又何必呢？”我看到王豪杰在下面撲哧笑了。

運動僵持了一段，領導和同志們都有點厭戰了，覺得如果我接受他們的造謠污蔑，就可見好就收。因為我擋着道，打亂了運動的進程，對許多別的右派的鬥爭，八字都還沒有一撇；特別可惡的是，我還為別人樹立了一個狡猾抵賴的惡劣先例。後來他們給我歸納為十大罪狀，並用許願來進行政策攻心：祇要我承認，還屬於“坦白從寬”的範疇。“哼！我才不管你飯稠、飯稀；誘降？沒門兒。”

“高爾基同志說：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梁乖真咋咋唬唬地宣布：“不獲全勝，決不收兵！”從此隔離審查，讓我單獨到一邊寫交代去。

洞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在我閉門造車的兩天期間，市委宣傳部朱秘書駕臨，好話歹話說了一籬筐，臨了說：“市委認為你年輕有為，去年讓你在全市向科學進軍誓師大會上作典型發言；今天你頭腦膨脹，恃才傲物，走向反黨的道路，我警告你，你沒什麼了不起！你如果不接受挽救，別說你一個魏紫丹，就是十個魏紫丹，中國沒有你照樣建設社會主義！”

“我希望市委能研究研究我的申訴。我認為學校不實事求是，運動的方向打根兒就錯了。”

“學校如果按兵不動，不搞反右，那方向就錯了，祇要是在搞運動，上前來說，方向就是正確的。這是本質和主流，其餘都是枝節和支流。”

“理能這樣講嗎？”我心裏想：“完了！他一屁股坐在梁乖真一邊；混球兒一個！”

第二天市監委王委員來了。一張虛糕臉，令人惡心，我立即斷定來者是個吹胡子瞪眼睛之人。他坐在我的床邊，說：“我的任務是說服你認識錯誤，知過能改，還是一位好青年。”倒是長者的口氣。我硬是耐着心，裝作虛心往下聽。

“我經的運動多了，延安搶救運動，許多人，正在交待問題就拉到山溝給槍斃了。後來毛主席規定‘一個不殺，大部不抓’，運動才走上健康的軌道。這次反右也是這個政策。”他看我的反應，看我在紙上寫什麼？我把紙遞到他面前：

“我思右派雖冤案，天經地義惟改造”。



接着說：“改造世界觀對於我是天經地義的，問題是劃右派的根據純屬子虛烏有。”

“這是群眾運動呀！哪能像你教的數學二乘二等於四那樣準確？認死理是要吃虧的！政治可不是鬧着玩的呀！我不是嚇唬你，你前面就是萬丈深淵，再走一小步馬上就一切都完了；于你、于小韓（我妻子）都成千古遺恨。”他還怪了解我哩！

“你說怎麼辦？”我為他的真誠所感動，又在他臉上掃了一眼，不覺得他惡心了。可真是，人不可貌相。荀子說：“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

“依我說，你立即承認錯誤，還是有前途的。”

“不合事實怎麼辦？”

“管它合不合事實！你就相信，反正胳膊擰不過大腿。”空氣寧靜了半分鐘，“你是我那個老小最崇拜的老師。”

衝着這句話，我吃着勁盯着他的面龐，腦子裏出現王誠清晰的畫面。“是王誠——誠實的‘誠’吧！因為我還有一位學生叫王成，成功的‘成’。你的老小，他去年考取了開封師範學院。”

“正是。他暑假沒回來，在學校參加運動，可能言論上也有點問題。”

“那我就更不能違心地承認‘錯誤’了。為了騙取從輕發落而撒謊，不合乎我對王誠關於‘老實做人’的教導。要是那樣，今後我還怎樣為人師表呢？”

“人各有志。”他喟然興嘆：“愛莫能助，我祇好無功而返了。”

“請王同志你把這個材料帶到市委替我反映一下情況！”我遞給他一本59頁的申訴書。《我的一些意見》，這個題目都是受到了儲安平《給毛主席周總理提一些意見》的影響而命名的。我對他們100多條不實之詞逐條駁斥，不管言者有罪無罪，總算把他們駁了個體無完膚，該說的話，一吐為快，言無不盡。

我所以能苦撐着“豪情滿懷”，是由于：一，我幹板硬直，他們除了靠造謠，就無法抓到我的小辮兒；二，我不是捏個方就方、捏個圓就圓的人。在本市還小有名氣，領導談起我都說：“魏紫丹是個才子。”三，我對總的形勢有個估計，確信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剛剛前一時本省處理了“宋北方事件”，省委為學生宋北方所受冤枉平反，受處分的最高領導我記

得是商丘地委書記（？）紀凱夫，他自稱是“幾乎中央委員”。所以我說共產黨就是真理的化身，事情再複雜最後總會真相大白。尤其是毛主席在莫斯科接見留學生說了“共產黨最講認真”那一番話，簡直是讓我抱住了真理的大腿。因為後來宋北方被安排到團省委工作，他來我校視察工作時跟我交談過。所以我認定，今天的我就是昨天的——更準確些說是明天的宋北方；四，是毛主席親自保證“言者無罪”，以十二萬份誠懇的態度請求黨外人士提意見的；別說他是我們心目中獨一無二、頂頂偉大的領袖，就是隨便一草芥小民，祇要是正經人，也不能說話不算話呀！除非他是一個流氓無賴、死皮不要臉的畜類東西！

又輪到我到大會上去交待我的右派言行了！走到會議室門口遇見了王豪杰，多想從他的眼神裏尋到一絲安慰啊！不料他偏偏扭過去了臉。開始開會，上前就給我一個出乎意外的驚喜，梁乖真說：“黨中央是我們的黨中央，不是右派的黨中央。”我脫口而出：“是誰說的？難道你敢規定黨中央是誰的不是誰的嗎？黨中央是全國人民共同愛戴的黨中央。”他没反駁我，祇是從牙齒縫裏衝出兩個字：“可惡！”不過，他的說法等於透露了，我寫給黨中央的信有了回音。他接着宣布把對我定的十大罪狀，減去一半，剩下五條，並指出：在我面前擺着兩條道路，一條是徹底清算自己的罪過，跟大家一起參加運動，揭發自己小集團的成員，爭取戴罪立功；一條是繼續頑抗下去，與黨較量到底，不用說這是死路一條。他在等我表態，我面臨最後決戰的關口，一時躊躇。這時，半路闖出個程咬金，就是王豪杰，他高舉着手：“報告！我揭發。”梁乖真愣了一秒鐘，“也好，你先說也行。”

“魏紫丹受地主家庭出身的惡劣影響，根深蒂固，他仇視工農，醜化工農幹部。他在背後給我說，我們的梁書記是‘梁菜包，一肚子青菜屎，狗屁不通’！”

原子彈爆炸了！狂飆爲我從天落。沸沸揚揚，義憤填膺，是可忍孰不可忍？看誰的階級覺悟躡得高吧！一個個紅頭漲臉，憤怒聲討我對黨的污蔑，都來揭破我“熱愛黨”的畫皮！我却在警告自己：“冷靜、冷靜、再冷靜！沉着、沉着、再沉着！”

後院失火了！連我尊敬的長者袁鴻儒先生都要與我劃清界限。他是語文教研組組長，我是數學教研組組長，我倆是忘年交。祇因爲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星期天，我替他把被窩搭出來曬了曬，就成爲我們是右派小集團的鐵證。

現在他要對我反戈一擊，揭發我跟他說過肅反積極分子夏銀河（一灘兒）“陰險”。其實我們之間還說過比這更厲害的話，看來他是“話到嘴邊留半句”了。

緊迫感驅使我，更得向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請教“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了。可是找不到可以對號入座的論述。

人們爲了自衛，或爲了染紅帽子，都向我開火了，朋友也全都背叛了，惟有妻子自始至終抱着葫蘆不開瓢。

私人之間、朋友之間言者無心的隨便談話，誰會想到今天竟都能上綱上綫成爲大逆不道的罪狀呢？我說話還比王豪杰謹慎得多。是他先說梁乖真“熊包”，我隨後跟着說“菜包”的。他對我無話不談，告訴我說：“北京大學貼出了三害（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根源是一黨專政”的大字報；“林希翎在北大演講，說肅反多殺了70萬人，胡風是冤案。她拿出事實，舌戰群儒。誰也說不過她，祇能無理取鬧，高喊‘打倒林希翎！’底下紛紛遞條子給她：‘我們堅決支持妳——林希翎！’”他說得眉飛色舞，我一則佩服他消息靈通，二則爲他的正義感所感召。認爲，做人就要如此坦蕩磊落才好。這樣勇敢的人，怎給嚇尿了呢？

對立面之間，說話都互相提防着，就算那樣，話仍是經不起分析的。比如賣引弟，她就在我面前贊揚過流沙河的《草木篇》：“我是教生物的，都沒有發現草木的性格竟是這樣美！詩人獨具慧眼，科學應向藝術學習。”說着就大聲得意地朗誦起來。王九丹在一旁，伸出食指，右手高舉，口中振振有詞：“碧指藍天！”（《草木篇》中詩句）我認爲這正是他們心靈美表現的一個側面，說明愛美之心人皆有之。說來也奇怪，凡是合乎美、合乎良心的事，分析下來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我若用此例來報復他們，就會陷我于不義，盡管他們給我造了那麼多謠，我恨死了他們。但我若是這樣做，就不僅是攻擊他們，而且是傷害美，傷害我本人的良心。對朋友王豪杰，我就不更不報復他了；我這右派是沒跑的了，再拉個墊背的又有什麼意思！況且共產黨就是這樣讓你狗咬狗，他好“漁翁得利”的。雖然我受盡右派的活罪，受過牢獄之苦，苦撐苦熬到了七老八十，但回首當年在反右派運動中，我沒有對任何一個人，無論好人或壞人，對他的任何一件事、任何一句話，進行過任何揭發、檢舉，因而在反右派運動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是由于魏紫丹，而給他帶來了禍殃。拂心而思，聊慰終生，終算我没有白讀了《四書五經》。讀孔孟書，所學何事？孟老夫子所說的人生三樂、我有其二：“仰不愧于天，

## 還原 1957

---

俯不作于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惟有父親在剿共戰場陣亡，幼年喪父而失“一樂也”。可能是由于父親遺傳給我的精神基因，使我雖在苦水中泡了一生，失敗了一生，但從來也未曾精神崩潰過！

## 內容簡介

《還原1957》不是單純寫1957年那段反右派運動的歷史，而且還對那段歷史作理論的思考，是“史論并舉，以論帶史”的心血結晶。

在中共黑箱作業、掩蓋歷史、毀滅檔案、歪曲真相的情況下，人們在“還原1957”方面進行了艱苦卓絕、持久的努力、掙扎，做出了得來不易的巨大成績。在此基礎上，身受其害的作者，經過幾十年的思考，收集資料，在海外自由的環境下，寫出了《還原1957》，本書揭示了反右派運動的罪惡本質，史論是更高層次上的“史實”，是重在“本質”的實。所謂“作理論的思考”，即期望能夠達到由表入裏，認透運動及其發動者的罪惡本質之目的。

